

绪 论

肇始于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现代化嬗变历史，是在中华民族负载着两千年来所从未经受过的巨大的民族耻辱、焦灼和痛苦之际迈开沉重的脚步的。在长达一百多年的艰苦卓绝、悲剧丛生的历史行程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了与中国的现代化变迁结伴共生的三大社会思潮。这三大社会思潮在现代化价值取向上所形成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它们各自不同的价值面貌和精神历程。自由主义无疑是它们当中具有更深沉和苦厄的悲剧意蕴的一种。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比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诞生得更早的社会思潮，究其本质而言，是一场充满悲剧意蕴的知识分子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广泛辐射到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各个层面。其中，它对中国现代

新闻传播思想，特别是在价值建构和实践操作上所施加的影响，尽管有着深刻的悲剧性，然而，它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认真地回顾和反省百年来的现代化历史，却是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文明寻求意义的。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生，是西方古典文明嬗递演变到现代的必然结果。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而言，它不是中国古典文明嬗递演变的必然结果，而是地地道道的舶来之物。但是，正如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是由西方社会内部各种因素所促成的一样，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由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因素所促成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在猝不及防中遭遇到了空前的文明挑战和民族危机。从那时起，中国社会在激烈的动荡和深刻的反省中就已经埋伏着一种普遍的社会期待心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组织中，这种深刻的期待必然通过社会思想文化的载体——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所显著地反映和表达出来。政治季候的突变必然影响学术的更张和转向。而学术的转向又必然成为政治革新的前导。这种社会期待又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迎纳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提供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观念基础。从这样的历史心理背景来考察鸦片战争的后数十年间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所兴起的一系列政治学术思潮，如汉宋调和论的提出、经世致用之学的风行；今文经学的复苏、社会批判意识的张扬，直至导向对西方的普遍兴趣和热烈寻求，足以窥见晚清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深刻的动荡和变局中——在各种社会内部因素的矛盾冲突中，是如何注定要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遭遇并产生强烈的心理认同的。林则徐和魏源编译《四洲志》和《海国图志》、徐继畲撰写《瀛环志略》等等，毫无疑问都是这种心理期待的必然产物。简言之，中国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在这种心理期待中所暗暗生

长起来的。同样，后来兴起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也是在这种心理期待的暗中支持下与西方自由主义发生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关系的。尽管张之洞等洋务领袖从本质上讲都不是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心理期待，特别是他们热衷于摹仿洋人创办报刊，希望通过西学知识的传播来推动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客观上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积极的条件，并且为维新运动的发动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正式登台作了积极的历史铺垫^①。从政治学术的角度来看，康有为发动的维新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具有悲壮色彩的知识分子救亡运动，然而，它同时也是一场带有显明的自由主义基调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更热衷于楔入权力中心，寄希望在皇朝内部进行以君主立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遮掩了他们对自由主义价值的寻求，因而使以严复为代表的更为本朴执著的自由主义者在这场必定以失败告终的知识分子运动中成为了真正的思想启蒙的旗手。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康有为只能被称作维新运动的政治领袖，而严复却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换言之，严复更集中反映和准确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价值取向上的更高意义的原则期待，因此，他是惟一有资格被褒举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开山鼻祖的人物。

严格地讲，严复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策动和推进是有巨大贡献的。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哲学观念的系统和完整建构方面。可以说，中国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是从严复开始，才

^① 知识分子尽管有诸多历史局限，但是他们是当时最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了。他们的现代意识突出表现在对时代大势、世界潮流的清醒认识上。这种全新的认识客观上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创造了积极条件。

真正找到其本土化的哲学凭据和精神支撑的。按照西方的经验，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在价值目标上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启蒙运动确实深刻地影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品质。严复在其所领导的启蒙运动中依循这一经验所强调的普遍理性和个人自由，正是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奠基时期所必需的精神动源。严复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来完成他的哲学贡献的：首先，在哲学观念上他十分推崇实证主义^①，认为掌握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朝着其预设的价值目标前行。他坚信西方的立宪民主制度和实证主义方法，是引导中国走向富强的两大法宝。其次，在伦理观上他十分推崇个体主义。他认为中西文明的差别归根到底在于中国没有个体自由，而西方尊重个体自由。对个体自由的充分尊重是自由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他还严肃地指出，个体自由必须先于政治自由而存在，它应该是政治自由的伦理基础。提倡个体自由的原则意义有二：其一是，言论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重要义项，必须体现为个体表达思想的充分自由；其二是，即使在政治自由无法实现的情境下，个体自由也可以通过人格操守的凸显来宣示其精神价值。严复的这两大提示对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所给予的伦理支持极为重要。“如果说严复以后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者都是其思想的传人的话，那么中国自由主义真正能坚持到底的，也就是严复关于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理想。”^②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报人能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顽强抗

^① 约翰·杜威认为：作为一种实验方法的自由主义是以对社会愿望和实际条件的正确见解为基础的。

^② 胡伟希等著：《十字街头与塔》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10月版，第27页。

争，不改信念，的确与他们将思想言论自由视作不可侵犯的人格操守来坚持是分不开的。再次，在历史观上他十分推崇进化论。这种进化论在自由主义的背景上所呈显的要义有二：首先要坚信人类历史是在循着进步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但这种进步和发展不能以激进的方式来推动，只能以渐进的方式来推动。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自始至终是不主张暴力革命的。他们主张政治改良；主张开民智、新民德；主张建民主、开议院等等，实际上都是这种渐进主义的进化观在支配其进行实践操作。中国近现代的几乎所有的报刊自由主义者，都是这种进化论的奉行着。他们之所以那么执着地选择“中道”而行，并毫不惧怕来自激进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指责和凌压。其实就是这种历史观已熔铸成了他们不灭的信念。第四，在经济思想上严复是一个放任主义者。他认为亚当·斯密在《原富》中所提倡的经济上的放任主义，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意义的。他认为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其实质是对个体自由的严重侵犯；经济利己主义和放任主义不仅有利于国家富强，而且更应该有利于个体自由的发展。很显然，中国近现代的报刊自由主义者都在这里得到过极其重要的启示：经济独立是言论独立的基础和前提——经济活动本身应该是个体自由的体现。后来的史量才和张季鸾、胡政之等民间自由主义报人，在阐释和实践商业办报原则与独立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时，明显可以追踪到严复的放任主义思想源头中去。约翰·杜威说：“自由主义意味着，把科学的思想习惯运用到社会事务之中。”严复从哲学观念到思想方法向中国的自由分子提供了系统完整的体系，并且将这些又变为了自由分子普遍认同和接受的“科学的思想习惯”，进而还将它们“运用到社会事务之中”，这无疑是极大的成功。但是，倘若我们同样从哲学的角

度来反省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史，反省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新闻传播思想史，就不能不由此生发无穷的感喟——这种感喟主要是来自对这样几重悲剧的检讨和启悟：一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困扰和冲突；二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困扰和冲突；三是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之间的困扰与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三重既来自于“先天不足”又来自于“后天失调”的悲剧困扰和冲突，不仅伴随着自由主义运动始终，而且同样伴随着自由主义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始终。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重悲剧。坦直地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是困扰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的和核心的哲学悖反事件，而且更是严重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的和核心的哲学悲剧事件。只不过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将这个悲剧事件一下推到了最醒目的历史和思想位置上罢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悲剧遭遇必须首先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自身进行检讨。前面在谈及晚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期待时，实际上就已经埋下了悲剧冲突的内在伏笔。在中国的自由分子的理念中，个体价值和个体自由固然是第一重要的。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又坚持认为，个体价值和个体自由如果不作为国家的富强之道，或者说不服务于种族与国家的强盛，那么它就缺乏意义和价值的基本前提。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娘胎里一落地，就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一对紧张关系带到了人间。由于国家富强暗暗上升到第一重要的位置，原本处于第一重要位置的个体价值和个体自由被迫屈居第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对紧张关系在严复那里就已经严重构成。严复在破解以英国为标本的立宪民主政治之谜时，用“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作了相当精辟的诠释和概括。但是，作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开山鼻祖，他的体会却又是相当微妙的。严复在解

释自由时反复强调：自由必须与国家富强共生同长，否则是毫无意义的。虽然他说人民的自由是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但是，他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将自由完完全全独立出来、不去附庸和充任任何一种神圣理由或目的的先决条件。在维新运动之前，洋务派用工具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而到了维新领袖，甚至严复这样的前卫思想家那里，这种工具理性的眼光不过是由船坚炮利移注到自由主义身上罢了。岂止是严复，甚至在稍后的梁启超这样的著名自由分子那里，自由也只赋予了服务于国家富强的工具论意义。在严复和梁启超看来，“新民德”是自由的核心内容；“新民德”的必要前提是有助于国家富强。这一对紧张关系源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理念，因此必然会反映到他们的报刊理论和实践操作中来。从晚清之际王韬创办中国的第一份自由主义报纸开始，这种悲剧冲突就一直没有停歇。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甚至是包括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办报办刊，或鼓吹洋务、或鼓吹改良、或鼓吹革命，尽管他们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然而他们的目标无一不是锁定在国家富强这一价值寻求上。岂止是对自由和自由主义才投以工具理性的目光，他们对整个西方的制度文明又何尝不是投以相同的目光！他们对报刊的性质、功能和作用在不同程度上都作过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发挥，甚至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思想言论自由是个体自由最重要和最本质的一种自由，是独立个体存在和受到充分尊重的要件。但是，他们又都把思想言论自由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乃至“富强”的目标紧紧系结在一起。于是就不能不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公式：办报是为了广开言路，或者说为了提供思想言论自由的场地；而广开言路，或营造思想言论自由的局面，归根结蒂是为了国家“独立自由”和“富强”！从王韬、郑观

应、洪仁玕始，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一直到孙中山、章太炎、于右任等，这么一大批对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历史影响很大的著名人物，他们对报刊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实践，无一不深陷在工具理性的困惑和冲突之中。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为代表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领袖，曾试图缓解和消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困扰和冲突，将个体自由彻底从国家富强的功利胁迫中解救或剥离出来，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尽管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中留下了思想的光荣纪念，可是在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国家未来的命运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能从这种悲剧境遇中逃脱出来。

当然，并非这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些口是心非的人物。他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应该说是真心拥抱的。但是当中国的危厄压在他们的心头时，这二者就构成了他们强烈的内心冲突。中国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的矛盾和尴尬实际上也就是这种整体内心冲突的必然反映。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在理论上和实践操作上将这二者统构和整合——即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迭合——使富强之道能超越其工具意义而更醒目地呈显出其所更应具有终极价值意义。比如他们对思想言论自由，对宪政民主，对超阶级超党派立场的坚持和神往，就同时交互迭压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重意义和由此带来的矛盾和尴尬。在他们的理喻中，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是完美无缺的；报刊自由主义当然也是这样。但是，他们却总也弄不明白，这种完美无缺的东西何以到了中国竟然与他们的救亡强国的实践构成如此紧张的冲突？以舆论界巨子梁启超、黄远生为例，这两人可谓铁杆的自由分子。他们对言论自由、宪政民主不能说没有怀抱终极意义上的价值信奉，同时，他们对袁世凯政府的极权主义本质也不能说没有起码的识别和透视能力。既

然如此，又如何理解他们曾对袁世凯抱有的那些幻想，甚至为袁出谋划策的失误呢？难道真的是他们在个人品格操守上出了严重的问题吗？其实说穿了，就是因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严重困扰着他们的内心。他们之所以将国家的富强寄托在袁世凯这样的专制强人身上，也就是说当专制与民主、权威与自由发生严重对立需要他们作出抉择时，他们居然让民主和自由屈从于专制和权威，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袁世凯的专制或许有益于国富的现代化发展、有益于整饬革命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有益于国富民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严复别无二致。由是观之，汪康年对民众的不信任和对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始终抱以幻想；甚至于后来像张季鸾这样的杰出人物自觉维护“国家中心论”、维护蒋介石的权威等等，无一不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而压制价值理性。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报刊理论中所主张的渐进主义大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认为开明专制、好人政府是自由主义的渐进理性必然接受的——特别是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夹击中，这不失为一种两难的选择。即使像胡适这样的坚决反对专制独裁的铁杆自由主义者，也终于没有脱身于这一悲剧的窠臼^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在推出全盘西化论的政治化主张时，又都不约而同地成了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是接受西方文明的严重阻碍，而且还是中国通往现代化的严重阻碍。

^① 格里德博士认为，在胡适的思想中，以及在中国自由主义的一般倾向中，否定过去是一个普遍性的因素，它与“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构成了最密切的联系。自由主义在中国遭到谴责和攻击，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参见《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38 页。

他们在文化观上的偏执更加剧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从而喜剧般地将他们自己变成了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者；这种喜剧情境也必然折射到他们所建构的报刊自由主义理论当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报刊实践。

可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第二重悲剧，是由第一重悲剧所引发的。在价值理论上，中国的报刊自由主义者其基本文化性格是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然而，不可救药的是，他们却都在潜意识当中深藏着“激进主义”倾向。颇有意思的是严复和谭嗣同。以这两人为例可以分析出这其中的诸多奥秘。表面上看，严复是最典型的保守主义者，是自由主义渐进论的鼻祖，而谭嗣同却是最典型的“激进主义”者，但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观念对立无非是一枚银币的不同的两面罢了。也就是说，在严复渐进主义的表情后面潜隐着的不是别的，正是谭嗣同激烈主张的那些内容。严复在骨子里是一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是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谭嗣同不过是将严复潜意识中的那种“激进主义”情绪直接写在他的颜面上罢了。最有意思的当数梁启超。这个具有中国自由主义标本意义的思想家和改革大师，他一生中不停地在激进和保守两极之间游走和闪回——他的报刊理论始终充满着矛盾和对立，其实正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内心紧张。他们之后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是那么的醉心于伦理和道德革命，醉心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并且将这一切贯穿到他们的报刊理论中指导其实践，也同样说明这正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他们内心冲突的产物。由于始终不能走出这样的深刻的矛盾困境，这个悲喜剧性格一直伴随着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而成了压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内心的魔魇。40年代末期，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在呈显声势浩大、伸手可触的“乐观”局面的同时，这种悲喜

剧性格不可避免地使他们陷入了全面瓦解的危机中。在以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成舍我、陈铭德、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报人中，其理论和文化性格上的混乱与矛盾更呈显加剧的态势。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民主和自由作为一种占显着地位的政治语境，不仅更急速地跌入了工具理性的窠臼，成了他们所企望的能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道路的功利性法宝，而且仔细透析还会发现，民主更成了压倒自由的更令他们垂青的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激进主义”利器。糟糕的是，这种混乱和尴尬还一再得到来自学界的强大的理论支持。以张东荪、张君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界名流试图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找到一条更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从英国自由主义大师拉斯基倡行的费边主义那里受到了启发和鼓舞，认为将古典自由主义导向功利主义方向是最佳的选择。具体来说，他们既不赞成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又不赞成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取巧的方式是：在经济上采取苏联的计划模式，在思想文化上采取英美的民主模式。而费边主义提供的思路就正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第三条道路”或曰“中间道路”，既可以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整合得天衣无缝，又可以免除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夹击之苦。这样一种理论背景，在给40年代末期的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乐观”依据的同时，还理所当然地为其提供了自信的思想基调。当时的报刊自由主义普遍有种幻觉，他们认为，在激进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所选择的这条“中间道路”，是一定会得到“第三种力量”，即民众力量的支持的。他们始终没有觉悟到，中国的自由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从来未与民众产生过水乳交融的联系。在寻求国家民族自由富强之道的历史抉择过程中，自由主义的超前和曲高和寡使它始终无法与激进主义争胜。尤其是在个人自由

与国家秩序重建的价值选择上，民众的力量不是倾向于个人自由而是明显倾向于谁能给他们带来国家秩序重建的那种政治力量。“第三条道路”尽管还是全盘西化的产物，但究其实质，却始终缺乏中国民众那样的居于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意识的普遍认同^①。与马克思的中国化成功移植相比，西方自由主义的中国化移植一直处于一种超前的幻觉之中。自由主义的报刊理论表面上看似乎无懈可击，但由于指导其付诸实践的理念体系始终充满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充满与中国民众在文化意识上的严重疏离，因此，尽管其愿望良好，却仍然无可逆转地导致了它的悲剧结局。

第三重悲剧来自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的困扰与冲突。这同样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间冲突的必然呈显。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富强所保持的热烈执着的政治关怀，其直接的来路是儒家的积极用世主义观念。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意识，从他们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处于观念与行动的矛盾困扰和冲突之中。按照传统的指示，知识分子必须加入官方秩序才能够兼济天下，施展其政治文化抱负。超然于官方政治秩序之外是根本无法实现其政治文化抱负，并对历史施加影响的。然而，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却指示他们必须站在官方秩序之外以民间的、在野的身份对官方政治施加影响，并施展其政治文化抱负，进而推动中国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于是，他们从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训导的那一天开始，在政治观和文

^① 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中国连结现代化的最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凝聚人心的意识形态象征。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谁就占领了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就掌握了中国命运的合法性资源。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化观上就必然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也就是说，从传统的政治文化经验上，他们深知不介入官方秩序很难大有作为。但是，从西方自由主义所提供的价值理性上，他们必须拒绝这种来自传统与经验的诱惑。中国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不少人都在这两者之间痛苦地徘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谭嗣同都难以摆脱这种痛苦。他们信奉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同时又必须强迫自己加入官方秩序去施展其政治改良的宏图。加入的结果又必然以丧失其自由主义立场为代价。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普遍选择办报办刊的方式，或者选择办学的方式，显然与他们竭力想摆脱传统的入世方式大有关系。“他们公开标榜不做官，要以社会良心与社会舆论代言人的身份发表政见。他们相信，通过在报刊上制造舆论、反映民意，可以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形成一种监督与压力，从而避免政治的腐败与有助于政治的清明。而且，这种介入政治的方式也符合自由主义关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理想，它本身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体现形式之一。于是，从 20 年代初到 40 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者从不放弃报刊这块阵地；发文章、开演讲会成为他们介入政治的重要方式。他们设想，反映民意与制造舆论远比个人到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其政治作用的发挥要大得多。”^① 岂止是这样。这些自由分子还视官方政治为人格畏途；他们认为，在肮脏不堪的官方政治之外以高迈清洁之身去自由批评政治，既有西方的绅士风度，又有东方的儒道精神。所以，当无冕之王和独立于官方政治之外的学者，就不能不成为他们新的政治和人格选择。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与观念背景之下，中国的自由知识分

^① 胡伟希等著：《十字街与塔》第 51 页。

子大都以不做官，或不介入党派政治为他们的政治和人格基线。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睥睨官场，傲视群丑，甚而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官帽的诱惑；即使他们中曾有人介入过党派政治，但稍有觉悟即深以为悔。最具有代表性的感喟来自胡适。他为梁启超而深深惋惜说：“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去做总长”^①，并以此为鉴戒，表明自己最好不要当官。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比胡适来得更坚定的是三四十年代的那批咤咤风云的自由主义报人。张季鸾、胡政之等人在接办新记《大公报》颁布“四不原则”的同时，即约定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募款，不许担任有任何官俸的“公职”如谁今后要去做官必须马上离开《大公报》。成舍我更是从“五四”时期开始把做官和加入党派政治视为独立办报的最大危害。他一生中多次拒绝来自国民党的拉拢，就是为了在官方秩序之外，能以独立的精神品格和立场，代表社会良心和社会舆论。最有意思的要数徐铸成。他曾以幽默调侃的自由主义口吻回拒了陈布雷的政治劝诱。他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② 他们的这种集体性的政治和人格态度必然会渗入到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术和报刊理论的建构中去。一时间，超党派、超政治、超官方等，成了学术自由主义和报刊自由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和人格标语。

然而，他们的这种超验姿态很快便遭到了中国现实的嘲弄。事实证明，幻想通过独立的民间舆论去干预和影响官方政治朝着理性、民主的方向发展，不啻天方夜谭、痴人说梦。邵

① 参见《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24 页。

② 参见《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 1991 年 4 月版，第 107 页。

飘萍、林白水被专制主义的屠刀和暗弹所制裁，就是对自由主义者这种超验的“浪漫理性”的迎头痛击。学术界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犯了抽象谬置的错误。他们虽然移植过来了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中的“忠诚的反对”这概念，却始终没有弄明白，这种“忠诚的反对”是西方民主政治运动的重要成果，即宪政的确立，个人自由权利被普遍尊重，于是才有了这种独立自由的舆论局面，才有了自由主义者在官方政治之外参政议政的自由和潇洒。荒谬的是，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却不得不先有“忠诚的反对”，然后再去寻求宪政和民主、自由秩序的建立。其实，问题的悲剧症结并不在这里，而在于18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大为不同。“欧洲的启蒙哲学家所进入的是一个与他们的目标十分相宜的环境；而他们的中国模仿者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最难堪的是“(欧洲的)启蒙哲学家由于他们的世界主义使其本质上始终是西方人，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只是些西方化的人……启蒙哲学家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早期现代人，而他们的中国模仿者则是些自我意识到的现代化的人……”^①这种“西方化的人”和超前的“现代化的人”，不仅使他们成了传统的不肖子孙，而且还使他们成了中国本土政治最忌恨和最讨厌的敌人。20年代初由胡适、蔡元培等人发起的“好人政府”运动，可以视作中国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对其先前的政治姿态的一个重要调整。“好人政府”的主张者认为，自由知识分子这样的“好人”，不应该把加入政府权力视作自由原则的丧失。正是由于“好人”的加入才有可能使政府变为“好人政府”，从而实现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抱负。他们甚至认为，“好人”不加入政府权力机构促使其朝着

^①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35~336页。

“好人政府”转变，是极不负责的。相比之下，民间报界的自由主义对此却要理智冷静得多。且不要说他们中很少有人有以“好人”身份加入“好人政府”的政治道德冲动，即使是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他们也多少抱有相当的警惕。从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框架来看，也是与学界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好人政府”的思想理论大异其趣的。戈公振和任白涛等新闻思想家不仅在著述中强化了徐宝璜、邵飘萍等先驱者的超党派、超政治、超官方的新闻理论，而且更有着思想史意义上的延伸和拓展。

“好人政府”的主张实质意义上是儒家积极用世精神的翻版，是中国学界自由主义者于无可奈何中产生的一种迷幻；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中呈显出的又一次深刻的悖谬。对于民间报界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尽管也仍然深陷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悲剧困境之中，但具体到这一次，他们却远离了这种悖谬。当然不能说他们在潜意识中缺乏儒家的积极用世信念，关键是，与学界自由主义者的临空蹈虚、习惯处于象牙塔中耽于浪漫怀想相比，他们日夕与专制主义的屠刀和暗弹打交道，因此，绝少产生那种象牙塔式的迷幻。民间报界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坚持将不加入官方机构，不领取官方俸禄；不介入党派政治、不盲目附会党派政见等写入办报原则中，就是因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他们要比学界自由主义者清醒和理智得多。

当然，这并不足以表明学界的自由主义者与民间报界的自由主义者有何质的差别。特别是在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的矛盾冲突方面，他们其实是相当一致的。也就是说，从观念上讲，他们都不愿意放弃自由主义立场，更不愿背弃自由主义原则；这种立场和原则要求他们必须坚持理性和个人自由，因此，做

一个观念人物，即官方政治的“忠诚的反对者”无疑是最具原则性的政治选择和人格选择。但是，他们除了是这种西方意义上的价值理性主义者之外，同时还是儒家意义上的工具理性主义者；他们不能容忍自己完全超然，立于危殆的现实政治之外，他们必须迫使自己在充任社会良心和社会公人的同时积极地参与现实政治，并试图竭尽全力将丑恶肮脏的现实政治朝着宪政民主和自由宽容的路上导引。他们认为自己在将中国导向现代化的文明进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的历史责任。所以，强迫自己做一个行动人物似乎并不矛盾。不过，这种自我强迫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痛苦和尴尬的过程。他们的内心痛苦不能不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史和报刊思想史充满悲剧的精神印迹。这种内心痛苦不仅在黄远生的忏悔录中可以找到足够的依据，而且在张季鸾、陈铭德等人的“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中可以找到悲剧的依据。可以说，这既是他们自己所构筑的精神困境，同时也是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为他们所构筑的精神困境。

是否可以这样说，他们在执着于观念时，即醉心于思想启蒙、道德革命、批评政府、为民代言时，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人物，而他们在执着于行动时，即乐观于加入“好人政府”，或以“国土”的身份批评和监督官方政治时，都是些放弃原则和操守的工具和功利主义者呢？严格地讲，这种说法是简单肤浅和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他们在试图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迭合，力求达到兼容并行的良好效果时，同样认为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是可以集于一身而既有利于个人自由，又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民主进程的。这种观点在以胡适和蔡元培为代表的学界自由主义者那里，是以“好人政府”的主张为重要标志的。“好人政府”的行动不仅可以监督和预防政府的腐败堕落，而且可以充分运用和促使权力机关为全社会造福；可以促使政府

充分容纳个人自由。而在以张季鸾和胡政之为代表的民间报界自由主义者那里，他们是这样表述的：“知识分子之为社会的活力，不在位高爵显，不在财富倾城，而单凭了他们见解深阔，勇气磅礴，而致一言兴邦的伟绩……成为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紧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①在他们看来，光持守观念而不付诸行动，这种观念人物是鄙陋而不负责的，是与国家民族无益且不合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人格的，而光有救国和救政治的行动，而没有自由主义的观念予以贯彻指导，这种行动是盲目而有害的，因而同样是有违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人格的，所以兼而有之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等于他们就真的能超越这种矛盾和尴尬，就真的能走出历史的悲剧。

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和自由主义学术思想史一样，从滥觞的那一天始，就深陷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和困扰之中，它们共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严复那里。格里德认为中国大地上的自由主义的意义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主义所意味的东西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它在中国的结局却是失败的。这种惨重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它所不能克服的内在因素所导致的，然而，它在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却产生和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在报刊实践中引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观，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视角试图改良中国的专制极权主义政治，进而把中国社会推向西方那样的政治文明体制。从客观上讲，它的确有着顺应世界潮流的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反对和摧毁封建专制主义；呼唤个性解

^① 《上层知识分子的责任》参见《大公报》1940年5月10日社评。

放、精神自由；培养独立人格、追求民主政治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等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在具体的理论探索和指导方面，尤其是在反对封建专制新闻统制政策、争取思想和言论自由；主张建立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新闻法治秩序；认为言论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自由之上；倡导建立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也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参照意义。这些都说明，中国的报刊自由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尴尬和失败的原因。费正清在破译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时说道，它的失败，其原因除了缺乏法制的保障以外，就是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这不能说没有见地。但更深刻的悲剧成因却是：“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总体设计未能充分满足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历史水平不向它倾斜自有其内在理由。20世纪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按其自身的逻辑在运行着，任何以为中国只能按西方国家的某种模式跻身现代行列的理论，都不免是一种教条式的空想。”^①从这样的理性视角回顾和检讨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固然会带给我们一种沧桑和沉痛的感喟，但是，我们也会同时获得一种深刻的启迪和觉悟。我们回顾和检讨这段曲折坎坷、险象环生的思想历史，不是为了讥嘲和苛求前人，而是为了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推动中国的新闻事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健康、合理和有序地向着明天发展——这不仅是学术的要求，而且也是历史和现实的要求。

^① 胡伟希等：《十字街头与塔》第344页。

第一章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 思想的传入

第一节 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

一 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嬗演历史描述

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其发端可远溯到 17 世纪末期，而真正牢固地奠定其思想和政治哲学地位，却是在 18 世纪中叶；这

一理论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特别是全面普及到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报刊实践当中应该是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由此可见，这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步进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为了从教会和封建极权主义者手中夺取权力，因此，要求享有完全的“出版自由”；强烈反对政府对这种至高无上的自由的粗暴干涉。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西方社会政治民主与宗教自由的生长，以及自由贸易与旅行探险的扩展，自由放任主义经济被社会广泛地接受。再加上启蒙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哲学观念的强大影响——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之下，自由主义理论可谓应运而生——作为历史潮流必然的思想和哲学产物，使自由主义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包含有这么几大义项：其一是经济上的放任主义；其二是政治上的有限政治与法治；其三是社会伦理观上的个体主义；其四是历史观上的社会向善论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革新运动，最早滥觞于英国的“光荣革命”，其后经由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逐渐普及壮大起来，终至风靡欧美，形成席卷全球之势。

但是，严格地讲，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学理，其哲学发端却并不始于英国，而是始于古希腊的怀疑论哲学家那里。当时，这些被称做“智者派”的自由意志者，就对诸如人的普遍平等、国家是基于契约所产生的、法的惟一目的是保障个人的安全不受侵犯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这些思考又通过雅典的城邦政治得到充分的体现，成为了人类追寻和建立民主政体和真正的自由天国的意志发端。古罗马时代的李维、塔西陀和西塞罗等杰出人物，就是那个时期自由意志的典范，或者说精神具象。这是一些执着于自由原则的历史学家和

演说家，他们对罗马法的维护集中体现了他们对自由精神的尊崇和守护。

后来的若干世纪中，与自由意志紧密联系的民主政制虽然已不复存在，特别是在中世纪，西欧被笼罩在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的黑暗当中。即使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由主义却暗暗地潜藏在基督教的宽容精神里面得以传承。终于等到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来临，蛰伏已久的自由主义精神迅速从宗教的外壳包裹中腾跃而出。在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号角鼓吹之下，以张扬个体主义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又赢得了蓬勃生长的季候。那个时期的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究其实，都同时又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专制主义的反抗勇气，其中最主要的精神支持就是来自古希腊的自由传统。他们理解的自由应该是这样的：一切来自专制和外力的干涉和侵害，都是对自由的干涉和侵害；自由的政体理应是这样的：它的一切行动的目的都必须是尽最大的可能维护全体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民治的政权比君主权要好上一千倍——这种奇迹甚至发生在像马基雅弗利这样的被人们视作“为专制主义寻找理由”的思想家那里。由此足见，自由主义的魅力是稍有理性的人都难以抗拒的。

到了 16 世纪，有两个重大的事件刺激了自由主义思潮的向前发展。第一件是由德国的一个叫马丁·路德的异教徒所引发的。他在教堂公然张贴“告示”，否认教会拥有司法权，甚至否认其拥有督导和管理基督徒的权威。他还认为，教会根本没有可以干预世俗社会的合法权力。马丁·路德的这番“胡闹”终于引发了一场由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扩散的革命性大地震。他宣称，只要信奉新教，他就确认任何国家的君主都是合法的宗教首脑人物。于是，导致教会与王权、相异教派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战争。数十年过去了谁也无法赢得战争。在这期间，宗

教的宽容精神复苏并助长自由主义信念的发展。第二件是波兰人哥白尼因出版《天体运行论》引发的祸端。在他受到教会质疑和刁难的同时，近代科学终于打开了蒙昧的窗户，开始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认识时代。到了 17 世纪，人类科学的巨大进步，不仅使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这样的科学巨匠获得了理性的力量，而且也使培根和洛克这样的哲学巨子深受功利主义精神的鼓舞。他们提倡怀疑和思想自由，坚决反对盲从权威，并且提倡和讲求实效。后来接踵而至的工业革命的浪潮，使科学家与哲学家合谋颠覆教会和王权的统治，为自由主义赢得广泛发展的空间，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17 世纪中叶，在英国，中产阶级开始从自由主义哲学家那里寻找武器，同时在议会上与王权统治分庭抗礼了。17 世纪末期，经过长达 40 年的革命运作，英国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以“光荣革命”的方式埋葬了君主专制政体。辉格党人洛克在《政府论》中对这一巨大的自由主义成果作了理论的总结。后来，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流传到美国和法国，在 18 世纪后半叶先后引发了这两个国家的革命风潮。但是，由于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发生了严重偏差，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以为凭借“极权民主”即可以达到驱除黑暗，建立理性王国的目的，却没想到带来的是血腥和混乱的严重反自由主义局面。只有美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才准确理解了英国的自由主义精神，从而在革命演进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理性。这时，以边沁和穆勒为代表的功利自由主义完全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成为了风靡欧美的主流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边沁和穆勒认为，只有通过国家政策的干预，个人自由才能在得到维护的同时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取得利益上的一致。欧美许多国家产生了成文法和议会，并扩大了选举权，宪法明文规定要保障人身自由——这些

国家并没有因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而丢失所获得的革命成果。

二 从弥尔顿到杰弗逊

自由主义理论最初导源于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约翰·弥尔顿、约翰·洛克、托马斯·杰弗逊发起的自由主义运动，以及法国的启蒙运动。约翰·弥尔顿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具有开山意义的思想大师。1664年，他在世界上第一部自由主义经典之作《论出版自由》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自由主义观念。约翰·弥尔顿愤怒地谴责了封建极权主义治下的出版检查制度的荒唐理论和野蛮实践。他宣读道：人们运用理性，即可以辨别正确与错误，分辨好坏。而要运用这种理性，人们就必须不受限制地去了解他人的思想和观点。他坚信真理是肯定的，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只要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论争，它就必然有战胜一切错误意见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甚至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大声呼喊道：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怀疑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即出版报刊需要登记——引者注）和查禁制（即出版物检查制度——引者注），那就是伤害了它。让它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交手时吃过败仗呢^①？后来，弥尔顿的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了两大著名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那就是：“观点公开的市场”和“自我修正的过程”两大概念。自由主义者认为，必须让所有想说什么的人都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政府不仅无权参加战斗，更无权去协助交战的任何一方；即使错误和虚假的一方可能暂时取

^① 参见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

得胜利，但真实的意见总是会通过自我修正的过程，最后战胜其他错误和虚假意见而被人们接受并珍存下来。弥尔顿愤怒指出：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就是妨碍真理的发展；真理战胜谬论邪说的惟一良途就是使每个人必须有言论出版自由。他严正抨击虚伪丑恶的出版检查制度。在《论出版自由》中他是这样痛斥王权专制主义的弊端的：

“让二十个横行霸道的统治者建立起寡头政治，给我们的的心灵再度带来饥荒，使我们除了经过他们用斗衡量过的东西以外，就不知道旁的东西”；“让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弥尔顿坚持认为，言论出版自由是每一公民与生俱来的合法权利，这种自由“是一切伟大智能的乳母”^①。列宁在评价弥尔顿的历史贡献时激情难抑地写道：“‘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②当时，弥尔顿在国会大声演讲说：“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圣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圣·阿尔巴斯子爵曾说过：责罚一种智能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真理的火花……”^③从1641年到

①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6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三卷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2页。

③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第5、33、34页。

1660年，弥尔顿写过大量的政论文章，大力宣传说：执政者的权利来自人民，人民有权审判、废黜甚至处决专制暴君，有权更换和严惩贪官污吏。紧随弥尔顿之后，以极大的勇气和理性精神继续推动自由主义理论向前发展的，是英国天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约翰·洛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热忱地评价道：“自由思想正是从美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思想的始祖。”^① 洛克在发展和完善自由主义的努力当中，其杰出贡献是从哲学线索中为自由主义寻找到了动人的依据。他着重在理论上论证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政治哲学原则，从而建构成了“人民主权”的学说。其精义是：权力的中心在于人民的意志，政府不过是受人民的委托在办事；人民既可以赋予政府这种权力，也随时可以从政府手中撤回这种权力。当然，洛克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两大著名观念学说。他揭示道：人们在理性的外衣下，把自己的个人权利交给了国家，以换取国家保证承认和维护他的天赋权利。正因为如此，才使洛克思想最终成为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批判武器，同时也使他本人最终成为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精神教父”。最引人注目的是洛克的许多思想成果，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警言，都最终写入了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当中，作为人类最珍贵的精神遗产被传承下来。自由主义理论在北美大陆的流行，当然离不开另一个思想纵火者托马斯·潘恩的自由主义努力。但是，真正使美国革命赋予深广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内涵，并贯彻到其立国的法理之本当中去的，当首推托马斯·杰弗逊。作为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灵魂的这个卓越的倡导者，杰弗逊毕其一生都在为

^①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 商务印书馆 1958年版，第5页。

自由主义理想而奋斗着。为了能在北美大陆建立一个既能保障国家安全，又能保障个人机会和神圣权利不容任何侵害的理性政府，他坚信理智的力量。当然，这种理智的核心含义应该是自由主义的。杰弗逊指出，众人们在运用理智时，个别的公民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大多数人作为一个集合体，必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为了促进这一过程，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受教育，必须有了解一切与公众和个人有关的情况。而受教育和必须了解情况，是每个人不可让夺的神圣权利。对成年人而言，真正贯彻自由主义思想的报刊，是人们了解情况、行使神圣权利的重要保证。杰弗逊以弥尔顿和洛克那样的气魄和口吻宣讲说：“因而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人打开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找到最好的办法便是新闻自由……必须肯定，打开通向真理的门户，巩固用理性来考验每一件事情的习惯，是我们能传给我们的继承者的最有效的约束物，以这种约束来防止他们用自己的意见约束人民。”^①他还以格言的方式提醒每一个公民：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当中。

杰弗逊还是《独立宣言》倡议者和撰写者。他在这部被马克思赞誉为“人类第一个权利宣言”^②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得有害这些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

^① 科普斯姆：《杰弗逊写作选》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3~34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9页。

它，以建立新政府……’^①当然，杰弗逊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贡献有这么几点：一、他是北美大陆第一个提出为新闻自由立法，并努力促成其实现的革命家。最早可追溯到 1776 年他为弗吉尼亚州起草宪法草案时。1787 年，因国会通过的宪法没有制定权利法案来保障自由，他多次表示反对意见，直到最终促使“人权法案”成为美国保障新闻自由最权威的法律文件载入史册；二、如何运用新闻自由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力。他指出：“人民是其统治者的惟一监督”这是因为“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是政府惟一的可靠的保护人”^②；“(人民)只有通过报刊的途径，才能让他们充分了解事务的全部情况”；^③三、新闻自由与探索真理的逻辑关系。杰弗逊从理性主义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弥尔顿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的思想：“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人们打开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新闻自由”。这些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报刊自由主义的理论。

三 这种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约翰·密尔——这个 19 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中最具有前卫性的人物。与前辈自由主义大师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56 页。

② 《外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4 ~ 55 页。

③ 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3 页。

同，约翰·密尔是站在“实用主义者”的视角上来观察和考量权威和自由之间的种种微妙关系的。他认为，自由意味着成年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在行使这种自由时不去伤害他人的同样的权利。他还强调说，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为最大多数人创造幸福，包括增加和维护这种幸福。这是因为最美好最理智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这种社会当中最大多数人享受着可能有的最大限度的幸福。一个社会必须保证每一个成员为此作出最大的贡献，其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予每一个成员能自由思想和自由行动的权利！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一纲领性原则贯穿到具体的四大要点当中。他阐释道：第一，假使压制某种意见，那么就我们看到的结果来说，就等于压制了真理；第二，错误的意见可能包含着为发展整个真理所必须的那一点点真理；第三，即使大家接受的意见是全部真理，但是，他们往往习惯作为一种先人之见而不是在理性的基础上来掌握的，除非他们被迫来维护这种真理；第四，如果大家接受的意见，不是常常和别的意见发生争执，那么这种意见就会失去活力……很显然约翰·密尔的这几条具体意见，更具有自由主义的实践指导意义和操作意义。因而，其对 19 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报业的发展更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此外，兴盛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其对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贡献也是巨大的。与英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传播努力遥相呼应，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在欧陆掀起了足以摧毁封建极权主义统治的自由主义狂澜。启蒙运动的旗帜上同样地写着自由和理性这两个耀眼的语词。这个思想解放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在充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去解决宗教和政治、社会问题时，能挣脱一切外在的束缚。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领袖不断提醒人们，人必

须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借助于超自然、超人类的力量去理解整个世界，特别是必须相信，这种全新的理解一定会带来一种掌握整个世界的全新的方法。启蒙运动最了不起的功绩是将这一自由主义基本原则贯彻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当中，并且在伦理学、宗教哲学、法律哲学、政治哲学和近代物理等领域中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尊重。在其后兴起的自由主义报刊实践运动中，这一基本原则更是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主要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等。他们高擎的思想火炬不仅是烛照法国大革命前进的精神圣火，而且也是烛照日后席卷全球的自由主义风潮的精神圣火。

“很难说启蒙运动的精神与自由主义的观念是一回事，但是就18世纪自由主义在西方的萌芽与形成来看，启蒙运动确实相当深刻地决定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品质。尽管在当时浪漫主义及开明的保守主义对界定什么是自由时也有若干影响，但是这些反对理性主义及社会进步的思想毕竟无法取得主要的发言权。”^① 即使后世在分割自由主义的学理来源时，对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家有诸多诟病，但是，正如恩格斯所称颂的那样：

“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② 因而他们是“启蒙过人们头脑的伟大人物”。^③ 在回顾自由主义思潮激动人心的历史行程时，弗雷德·赛伯特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意味深长地赞叹道：按自由主义的理论，报刊不是政府的工具，人民有权对政

① 江宜桦：《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回顾》，《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页。

③ 同②。

府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他们对政府的主张。报刊必须有权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为了让真理生存，必须倾听各种见解。思想与消息必须有自由市场，即观点公开的市场。无论多数或少数，弱者或强者，都有权接触到报刊，并自由发表他们的各种意见。他认为，尽管贯彻自由主义最广泛最彻底的报刊自由主义理论，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受到新一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质疑，甚至尖锐的抨击，但是，他也认为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历史功绩，以及它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精神滋养，却是无法否认，更不能抹杀的。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核心是言论与出版自由。按照美国新闻学家莫瑞斯·恩斯特的注解，这种自由主义是人类的“第一自由”。这种观点认为：出版自由不光是新闻问题，最根本的是政治问题。作为“第一自由”它认为人类的其他各项自由均赖以争取、赖以捍卫。甚至在以“新自由主义”自我标榜的“社会责任理论”的赞成者那里，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最基本原则同样得到极大的尊重和继承。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其最具代表性的文件《自由与负责的报刊》中，尽管竭力贬抑古典自由主义派生出的报刊自由主义理论，并开列了它在实践上的所谓七大弊端，然而，这种“新自由主义理论”仍然不敢动“言论与出版自由”一根毫毛。不仅如此，它甚至重申道：“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全部自由的中心。……它是其他自由的保卫者和促进者，……宪法（指美国宪法——引者注）第一修正案把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并列显然是有道理的。”^①西方思想界和新闻界认为，出版自由是现代国家的一种象征。这一

《自由与负责的的报刊》转引自张隆栋《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7 页。

见解在伊格纳兹·卢森堡的著作《报纸》中得到有力的支持。他写道：“（法国国民议会和美国国会）的这两个关于出版自由的宣言，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旧世界和新世界，许多国家在政治上获得自由以后，都仿效法国和美国的范例，在宪法或出版法中规定了出版自由——这已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个象征。”即使这种被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视为“现代国家的一个象征”的“自由”的标榜或装饰，与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向往的理想境界有明显的质的差别，但是它毕竟证明了自由主义卓越的历史努力，使得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都不敢公开蔑视和排拒言论与出版自由——即使只停留在它们的口头上和纸面上。

第二节 西方报刊自由主义新闻实践历程

一 政党报刊的堕落与大众报刊的崛起

尽管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自 17 世纪末开始，即在约翰·弥尔顿、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杰弗逊、约翰·密尔等精神领袖的策动下，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有力呼应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完善，但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政党报刊，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中，却并没有去理会报刊自由主义理论，因此更谈不上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来指导其办报实践。封建极权主义制度被推翻了，可是，绝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政党报刊却从此变成了相互争权夺利，相互攻讦谩骂和充分表达其“自由意志”的工具。在那个时期，作为报业主

体的政党报刊最显著的特征有这样几点：一是在经济上依靠政府和政党的津贴，因之报价昂贵；二是接受对象以政客和上层资产阶级人士为主要读者；三是沦为了政客们争权夺利的舆论工具，内容多以政论文章为主，新闻很少，即使有一些，也主要是有关政客们活动的无聊新闻。政党报刊如此堕落，不能不引起真正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理想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深深忧虑。那些曾经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发挥过巨大感召力的政党报刊，这时竟成了人们诅咒和唾弃的对象。乔治·华盛顿非常愤慨地斥责说：“很可惋惜的是，联邦政府各种报纸的编辑们，除了把谩骂、胡说八道的攻击塞满他们的报纸外，根本没有更全面、更正确地发表国会里所有有关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① 美国革命的“精神教父”、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杰弗逊同样对此进行了愤激的谴责。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国报纸信口雌黄，捏造事实，已经比波拿巴设计的锁链更加有效地破坏了报界的效用。”^② 在英国，代表土地贵族和高级教士利益的托利党与代表工商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它们分别是现今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前身——笔者注）为了刺激和操纵选举，互相间经常爆发争权夺利的攻讦谩骂，而它们各自掌握的报刊就是进行这种恶斗的最好的工具和武器。为了压制报业领域的自由主义思潮，被政党操纵的政府通过征收印花税、运用法律制裁以及实行津贴收买等手段，软硬兼施，试图压制和瓦解敢于批评政府和各党派的民间报刊。这场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从 18 世纪一直持续到 19 世

^① 维佩特鲁森科：《垄断报刊》，转引自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 117 页。

^② 转引自《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 118 页。

纪。在法国，官报和政党报刊在相当一个时期占据报业的统治地位。政府重新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并依照英国实行出版物印花税法等钳制手段，重新给民间报业套上了反自由主义的枷锁。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政党操纵下的“党报”为了压制和打击政治对手，已经蜕变成了舆论一律的工具，直至走向自由的反面。这种肮脏恶心的办报局面可以说是整个 19 世纪西方报业最有特色的景观；直到 19 世纪快要谢幕的时候，情况才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大众化报纸的勃兴。

西方大众化报纸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这是因为在以美、英、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工商业迅速得到了发展。教育的普及和选举权的扩大，以及市民社会的相应扩大，印刷、造纸技术的飞速提升；特别是革命后，美国政治体制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为成熟，社会更为稳定，所以大众化报纸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民间报业开始逐渐朝社会中下层拓展其生存空间。到 19 世纪 30 至 40 年代，率先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出现了一些面向中下层民众的廉价报纸。由于这种新型的报纸在内容与形式上亲近大众，并且与自视甚高，满版空论妄语的政党报刊形成鲜明反差，因此面世不久即迅速蔓延到美国各地。又由于美国的廉价报纸在创办时，曾受到过英国早期无印花税报纸的启发，因而它们的成功经验又反过来极大影响了英国乃至欧洲大陆报业迅速朝民间化廉价报纸的方向发展。尽管有些廉价报纸曾经一度与政党报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随着它们斩关夺隘、攻城掠地的迅猛发展，它们与政党报刊逐渐脱离了关系。到南北战争以后，独立的民营报刊全面取代政党报刊，进入了独立化、自由化的全新阶段。

二 大众报刊与自由主义理念

大众化报纸在当时的称呼是“廉价报纸”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在新闻理论和采编业务乃至报业管理上，都完全摈弃了当时那些臭名昭著的政党报刊的陈旧观念和愚蠢做法，而以一种全新新闻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廉价报纸作为开现代报纸先河的角色，最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报刊自由主义的那些普遍性的原则，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重要特征是：它们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党派，是最具有独立品格和意志的、代表全体公民利益的民间报纸。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大众化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已经取代了几乎所有的政党报刊。在这些以自由主义理论为旗帜的民间报刊中，《太阳报》、《纽约时报》、《纽约先驱报》和《纽约论坛报》堪称是大众化报纸的杰出代表。大众化报纸不视自己为自觉贯彻自由主义理念的行动者，因此，几乎每一份“廉价报纸”都争相向公众表明它是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的。比如《太阳报》就在其发刊词中声明说：“我们决定创办一个独立的报纸……我们采取独立的方针……真理是我们的格言，我们不怕掠夺者控告本报诽谤，也不接受谋求官职者的钱财。”^①这个声明最引人注目的是，为了保障政治上的独立无惧，它自觉地拒绝接受来自任何政治派别，以及官方的经济资助。因为，只有做到经济独立，才能保证在政治上的独立。嗣后，相继创刊的《纽约先驱报》更在《太阳报》的基础之上，将报刊自由主义原则体现得更为全面和彻底。它宣称：“我们

^① 弗兰克·奥布赖恩：《太阳报的历史》，转引自《中国新闻传播学
说史》第120页。

将不支持任何政党，不做派系或小团体的机关报。我们对于从总统到官吏的选举都不感兴趣；我们将致力于记录事实、记录公共的和主要的事件与问题；我们不说废话，不带偏见，公正、独立、无畏和善意地进行报道，并适当加以评论。”^① 这个发刊词之所以在世界新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就在于它是自由主义的超党派形象来设计和期待自己的。其中，它对政客们争权夺利的“不感兴趣”和对客观事实、公众事务以及重要社会事件、社会问题抱以极大的兴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同样，《纽约时报》也公开宣称自己是一张绝对独立的自由主义报纸。它的创办人亨利·雷蒙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论述独立报刊与政党报刊的重要区别。他说：

“不能把政党机关报误认为是公众报纸。它们不是新闻事业的合法成员；它们不对新闻事业负责，因此没有资格享有新闻事业的荣誉……公众报纸具有高尚的职能……报纸能够取得公众的信任，必须是超党派而独立的。它一定要让人们感到它不是根据政党的利益或忠于政党的需要，而是出于真正对公正、福利的责任心。……《纽约时报》由于不卷入政党斗争的纠纷，不追求政治利益，而谋求公众福利，它在提倡某种行为、解释一些事件时，总是从全国民众而不是从任何派系或政党的利益出发。”^②

这种成熟的自由主义风度甚至在一百年以后，还深深地感动和启迪中国的自由主义报业。我们将在本书中见到以《申

^① 转引自弗兰克·莫特《美国新闻事业史》，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56页。

^② 布莱耶：《美国新闻史》转引自张隆栋《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第75~76页。

报》、《大公报》和《文汇报》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自由主义报刊，是怎样远溯和继承西方大众化报纸的这些自由主义原则的。的确，从《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的办报方针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原则的意味。

当然，在美国大众化报纸当中，并不是所有的报纸都有着鲜明的自由主义个性和坚贞的自由主义操守。大众化报纸在逐步演进中又发生了分化：一种叫做“高级报纸”，另一种叫做“大众报纸”。

“大众报纸”又叫做“通俗报纸”。其读者以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和普通公务人员为主要对象。其刊登的主要是日常、奇趣甚至怪诞的内容。其最擅长的是进行煽惑性新闻鼓动甚至刺激性报道。“大众报纸”不惜滥用自由，并对自由主义肆意进行曲解，因此，后来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了典型的黄色报纸。相比之下，“高级报纸”最集中信守和体现了报刊自由主义的原则，因此又被称做“严肃报纸”。这种报纸不仅面向各阶层的公众提供丰富翔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新闻，而且，其言论关注社会民生，维护公众民权，尤讲究摆事实、讲道理，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劝服力，尽管发行量不是很大，但它们对社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对中上层人士的影响，却是任何一张黄色报纸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在西方大众化报纸的演进发展中，英国的《泰晤士报》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了整个西方报业中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大报。换言之，这张报纸堪称“高级报纸”的杰出楷模。日本新闻学家杉村广太郎先生在其所著的《新闻概论》中，讲述了《泰晤士报》在19世纪50年代初与当时的首相德尔贝勋爵的一次有趣的争论。这次著名的争论是围绕着“报纸的责任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敏感的论题而展开的。德

贝尔勋爵认为，报纸理所当然应代表政府的利益；与政治家保持一致是报纸的基本职责；政治家决定什么新闻该登，什么新闻该压，这是天经地义的……面对德尔贝勋爵的自负和傲慢，《泰晤士报》的主笔狄兰坦然应答道：“我们报人的责任，是对全体英国人民负责，并不是对你德尔贝勋爵或上议院负责。我们认为有害于公众利益的，一定保留；否则，适当而正确的消息，均予发表……报纸借坦白记述而生存，任何重大事件，一经发生，都应成为现代知识与历史的一部分。而政治家的职责，却恰恰相反。……所以报人的职责在说话，而政治家的职责在缄默。”狄兰重申的不过是约翰·弥尔顿倡导的最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他完全是在向德尔贝复述“观点的公开市场”这一自由主义常识。可惜的是，居然连首相都浑然不知“政府不应该参加战斗”，即：既不允许协助交战的任何一方，更不允许胁迫任何一方为政府所御用。因此，狄兰教训德尔贝：缄默，才是政治家最得体最守序的明智之举。而代表社会公众说话，恰恰是报刊最合法、最称职、最神圣的权力。

后来，狄兰这样的自由主义风采不断在中国自由主义报人那里得到充分而动人的展现；《泰晤士报》之所以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报人景从追效的“高级报纸”的典型，它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之神髓。其笑傲王侯，讥弹公卿之风采，只不过是因自由主义在胸臆间充塞，然后才在眉宇间自然流露罢了。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实践的成果可谓丰硕诱人。然而，就在狄兰与德尔贝争论的那个年代不仅中国知识分子浑然不知自由主义为何物，而且，他们甚至连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也浑然不知。一切就像日本新闻学家松本君平曾描绘的那样：“殊不知此时的欧美各国，已进入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报纸时代，现代报纸正以其‘猛大势力’，创立近世文明之基础与发达思想

之自由，而使之永进不止。”^①

伴随着西方船坚炮利而来的还会有什么呢？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那些先驱者，究竟会看到什么呢？当他们终于认识到现代报纸具有开启愚蒙、强种保族以及恢复中华的神异功能时，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也不可避免地登岸而来了——尽管这个过程比较漫长，且充满惊惧、怀疑和诱惑，但它毕竟不可阻挡地来了。

第三节 西方传教士与出版自由观念的渗入

一 文明链条上尴尬的马礼逊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输与近代西方报刊的逐步东渐是绝难分开的——这是一个比较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如果从 1807 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踏上南中国大陆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 1868 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韦廉臣等人创办《教会新报》为止，旅华西方传教士通过长达整整 60 年的努力，才使其办报活动在中国取得合法化的地位，从而为外国人在华传布包括西方报刊自由主义观念在内的“西方文明常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法律上的保障。不过，与西方传教士的积极姿态截然不同的是，中国人包括当时的官方和士大夫阶层，以及不少的民间知识分子，对

^① 参见松本君平：《新闻学》之《序论》。

用武力开道的西方文明这个“怪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不仅对其充满着深深的疑惧，而且可以说很少知道那种异质文明，除了可供利用的“坚船利炮”部分之外，其余的部分到底还有何用场。所以，从一开始，马礼逊这些人就在中国政府顽固保守的闭关自守政策前碰了一鼻子灰。中国人似乎告诉他们：这块封闭的大陆不仅不需要基督的拯救，同样也不需要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的拯救。当然，要讲明白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国文明历史的背景说起。

马礼逊到达中国时候，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还早整整33年！当时的中国仍停留在皇权专制主义阶段，是那时世界上一个独立的封建大国。这个由清王朝统治下的泱泱大国，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是皇权至上的君主专制极权制度。在这样一种文明背景之下，不光是官办的邸报，还是民办的京报，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近代西方报刊有质的区别。而且，这两种所谓的报刊，长期处于抄传谕旨、奏折等官方文书的陈腐、保守状况。因此，与生龙活虎般的西方大众化报刊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照。特别是，当西方近代报刊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不仅在精神气度上依仗自由主义理论的强大支持，而且在技术手段上更凭借着工业文明的强劲鼓舞，其功用日渐彰显，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信息传媒和舆论工具，乃至革新武器，与此相较，中国传统的报纸形式，以及躲在其身后的衰弱不堪的“办报思想”，就愈益显得滑稽可笑了。

西方近代报刊其办报思想的重要性，不惟当时中国的官方未认识到，即使是当时的那些“先进分子”也同样没有认识到。当然，西方的近代报刊最初并不是作为上帝的礼品而赠予中国人的，严格地讲，它是作为殖民化进程的意识形态传播

品，而伴随着洋枪洋炮进入中国人的视野里的。其实，早在16世纪，葡萄牙等国就开始对中国进行殖民侵扰。欧洲工业革命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了殖民扩张的热潮。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在统治了印度，并相继侵入缅甸、马来半岛等东南亚地区后，更加紧了对中国的扩张。商船紧随着兵舰，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紧随着军队侵掠的步伐接踵而来。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国人不需要的血腥和耻辱，也同时带来了商品，以及尚不清楚其用途的鸦片、《圣经》和近代报刊。马礼逊就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尴尬的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登岸而进入中国大陆的。

马礼逊这个人的重要，不仅仅在于他是基督教新教派遣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人，还在于他是将西方的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带入中国的第一人。遗憾的是，马礼逊的这种历史和文化重要性，许多年里，竟因为他的传教士身份而被严密地遮蔽着。王正伦先生在揭示马礼逊的特殊意义时写道：“英国新教徒马礼逊再次掀起了来华传教的热潮。但此次传教活动与此前的唐朝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清耶稣会士是迥然有别的：新教徒是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所设置的新教话语系统下进行的。”^①因此，马礼逊宗教意图中所曲涵着的自由主义因素必然也随之挟带入中土。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 ~ 1834），英国诺森伯兰人。19岁入神道学校攻读，其间主动要求到“困难最多”的中国去传教。到中国之前，豪情万丈的他充分地做了准备，并突击学习汉语和与传教有关的各种知识。1807年，受伦敦布道会派遣首先到达美国并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同年5月乘坐一艘

^① 参见《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第153页。

鸦片走私船离开纽约，四个月到达中国澳门，后来又到了广州。马礼逊是一个虔诚的新教传教士，他肩负着“征服中国人的心”的神圣使命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应该说，在那时争相到中国来传教的洋人中，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据《马礼逊传》记载，当时有个美国商人对他的举动深表疑虑，问他：“中国六亿兆，先生思化之乎？”意思是说，6亿之众的大国，你难道都能教化吗？但他却坚毅而且肯定地回答说：“余不能，然上帝能之！”^①马礼逊虽然到了中国，但却不敢以传教士的身份活动，而只能假扮成美国商人隐居在美国商馆。隐居中他继续潜心研习汉语，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辞典》。1813年，伦敦布道会派出另一个传教士米怜来华协助他。此时，他已经可以公开进行传教活动了。但就在翌年，清嘉庆皇帝再次颁令：“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为有满汉等受洋人委派而传播其教……应严为防范，为首者斩……”^②即使在如此险恶的情境之下，马礼逊也毫不胆怯退避。他一方面派助手米怜到南洋华人中散发《圣经》，一方面积极地秘密筹办报刊，力图将基督教新教思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渗透到中国去。1815年5月，在马礼逊的委派下，米怜带领中国优秀的刻字工人（同时也是后来中国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笔者注）梁发抵达马六甲，在那里开办学校和印刷所。同年8月5日，在中国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正式创刊了。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月刊，是纯宗教性刊物，其开宗明义即称，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然而却并不同囿

① 《马礼逊传》参见《遐尔贯珍》1855年8月第8号。

② 参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

于此。它将灌输知识、砥砺道德也作为与传教并行不悖的两大重要内容。其中，主编米怜在阐释该刊宗旨时说的一番话最引人注目。他写道：“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它各端，亦未敢视为缓途而掉以轻心。知识科学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①尽管 1820 年米怜在《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一书中又解释说：“该刊的根本目的是阐扬宗教，其余的一切相对而言都是附属的，但也不容忽视，知识和科学始终是宗教的奴婢；同时它们也可以为增进道德服务。”^②强调传播宗教教义是其主要的办报功能。但是，知识和科学的特殊功能意义，并未被他们所忽视。正因为如此，《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中国第一次对清王朝的愚民政策发起了挑战。该刊自第 2 卷起以专栏的方式相继刊发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普及文章，如《论行星》、《论恒星》、《论彗星》、《论地为行星》、《论日蚀》以及《论地周日每年运转一轮》等。虽然，它将这一切都归之于神的赋予，然而，在严重窒息民间心智的当时，不啻起了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

二 传教士报刊的自由主义示范

不惟如此，马礼逊和米怜还充分发挥西方大众化报刊所擅长的通俗化、趣味性优长，十分注意研究和迎合读者心理。他

^① 参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 2 卷第 10 期。

^② 参见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

们特别针对东南亚华人多属下层劳动者，其文化程度低，但有很强的祖国意识等特点，文章内容一般采用简洁、通俗而富有生趣的语言表述，并且有意选用大量的儒家格言来附和、阐释基督教义，因此非常具有亲和力和劝服力。尤其给人留以深刻印象的是，该刊每期封面均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儒家警句，显示其对中国圣人的尊重姿态，从而一扫华人读者心理和文化上的隔膜，因此，其在研究和迎合读者心理上可谓非常成功。正因为这样，马礼逊和米怜二人还可以被称为在中国最早倡导和推行“白话文”的先驱。当初，马礼逊翻译《圣经》时，有人曾主张采用文言，而马反复思考后决定采用浅白的文字。后来他在写给伦敦布道会的报告中特意呈述他之所以要采用白话文的理由。他是这样写的：“中国有学问的人以为凡可敬重的书籍，当以深奥的古文辞出之，而不当以白话写成，一如欧洲中古的学者们必用拉丁文一样。朱子写其理学，始别开生面，用语录体。因为新的观念之传达，诚不如用浅白文字之为愈，若采用这样深奥艰涩的文体翻译《圣经》，以取悦于一般的学者，或以炫耀自己的文才，是无异埃及的祭司们已写出的象形文字，除却他们自己或少数人可以会意之外，真是难索解人。翻译《圣经》当用浅白及简易文字之为至高原则。则是不得不完全承认的。……我宁愿采用易认易解的通俗字，而舍弃深奥罕见的经典字；我宁愿被人视为俚俗不雅，而不愿令人难读难解……”^①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马礼逊所呈述的这种西方大众化报刊信守的通俗化和面向中下层读者的办报和译书观念，恰恰是包孕着最基本的自由主义因素。如果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语言深奥费解，不仅对宣传任何一种学

^① 转引自《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113页。

说都会造成严重障碍，而且还会对任何试图参与意见、进行论争的人造成严重阻碍。马礼逊的杰出意见和他卓越的办报实绩，无疑带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后来，普鲁士传教郭士立在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之所以很快取得成功，其得益于马礼逊、米怜的经验是十分明显的。郭士立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的作品为了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对于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论题。……决不要写成长篇大论。”^①《中国新闻传播学学史》因此评价道：“中国士大夫直到 80 年之后，才想到要开通民智，宣传革命，才创刊了白话报章，而真正不以写白话为俚俗，更要待百年后的五四运动之后。可见马礼逊的上述观点是十分难得的。”这段评析可谓中肯，其感喟可谓深长。

马礼逊还有最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是，他是第一个向中国输入西方新闻出版自由观念的人。那时，中国人中几乎无一人知道有约翰·弥尔顿以及他那惊天动地的思想。马礼逊的那篇文章名叫《印刷自由论》，刊发在当时的《广州记录报》上。由于该文是用英文写的，估计只引起少数懂英文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但是，这篇文章在思想文化传播史上意义非同小可。中国新闻史学界有专家甚至称颂其为“是出现在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②。该文忠实地阐述和发挥着约翰·弥尔顿的那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观点，着重宣讲道，所有的人均拥有天赋权利，均享有发表和传播自己观点和意见的自由。尤其强调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干涉和压制每一个人沟通意见与参与争论的权利，除了最危险最恶毒的囚犯之外，每一个人所用以表达自由意志的笔墨和纸绝不

① 参见《中国丛报》1837年3月。

② 参见《中国新闻传播学学史》，第114页。

容许褫夺。而神奇的印刷机可以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使人们彼此自由地沟通心灵和思想，向有理性的人提供精神上的享受；而禁止书报的印行，就是侵犯天赋人权，就是最严重的犯罪行为……

在此，有必要提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人、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郭是继马礼逊、米怜之后在华创办中文报刊最有影响的人物。1821年，郭士立受荷兰布道会派遣到东南亚一带传教，主要活动在爪哇、暹罗等地。后来，他脱离荷兰布道会转为伦敦布道会工作。从1831年起，他经常装扮成中国人到中国内地广泛探取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他还曾担任过英国大鸦片商行查顿洋行的中文翻译，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在考察和刺探过程中，他发现打开中国大门的主要障碍是大清国人的愚蒙无知却又夜郎自大、敌视外夷，因此萌发了依照马礼逊、米怜自办一份中文报刊的念头。1833年8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办，是中国领土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在正式出版这份月刊之前，他在创刊意见书中阐明了其办刊宗旨：“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的观念。”^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形式和内容上尽量做得非常“中国化”。它采用雕版印刷，循中国书式，内容结构酷似《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尽管宗教、道德和科学为其三大主要内容，但宗教已退居其次，凸显的主要内容是西方科技、文化的发达和优越，以反衬中国文化意识的野蛮落后。除着力介绍西方的人文地理、实用科技外，在伦理道德内容方面着力表示平等友好、和睦亲善、买卖公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等

^① 参见《中国丛报》1833年8月。

适合中国人接受的理念。特别是重视回答在华洋人遇到的一些社会难题，并教中国人与洋人做生意要诚信，以及贸易可使国富民强等自由资本主义的常识。尽管郭士立等西方传教士在华办报刊的主要意图是配合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战略，但是，在客观上却或多或少起到了宣传西方文明，祛除中国人蒙昧状态的作用。因此，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明碰撞背景之下，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挟带而入就是必然的了。米怜在《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中有一段话，一直被过去的研究者视为外国传教士竭力粉饰其来华意图的托词，其实是不确切的。他当时非常同情地说：“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报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欲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岂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万一耳。”米怜同时对中国人民是报以深深的友好和期待的，这种期待正来自于欧洲革命提供给他全新的思想理念，以及基督教提供给他价值信念。即使是像郭士立这样的集传教士与间谍于一身的奇异人物，也不由自主地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写了一篇名叫《新闻纸略论》的文章，概略地向“中国人民”在介绍西方报纸产生和发展的诸多常识时，也郑重其事地向他们介绍了“新闻自由”为何物，以及它的重要性。总之，西方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就是这样经意和不经意地传输到中国来了。但是，这种“西化”的念意识要演变成“中国化”的东西，还得假以时日。

第四节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中国化历程

一 “产婆的职责”与“新中国文化”的孕育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宣告彻底失败，因此，在刺刀的威迫下不得不授予洋人在华任意办报的权利。于是洋人所办中外文报刊由数十种急增至 170 余种。尽管传教士办报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宗教内容普遍已不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商业性报刊发展迅猛，并且很快取代了传教士报刊先前所盘踞的主角地位。《申报》和《新闻报》就是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洋人所办的商业性报刊。即使如此，传教士报刊仍在悄悄的转型改制中发挥着它们的影响。

事实上，在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中，传教士报刊和商业性报刊都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助作用。

先说传教士报刊。据资料统计，1840 年以前，外国传教士在华开办的报刊仅十多家，到 1840 年已突增至 32 家，1890 年一下增至 76 家。这当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遐迩贯珍》（1853 年创办于香港）；《六合丛谈》（1857 年创办于上海）；《中外新报》（1858 年创办于宁波）；《教会新报》（1862 年创办于上海）；《中外闻见录》（1872 年创办于北京）。这些报刊相当一部分完全以商务信息和新闻言论为主，即使设有“宗教”栏目，亦少有早期传教士报刊那样的丰厚内容。总的来说，大

多已成为综合性时政刊物。传教士报刊当中，首推《万国公报》影响最大。《万国公报》的前身即《教会新报》是一份编给中国人看的周刊；1874年9月5日起更名为《万国公报》。该刊创始人和主编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要撰稿人除林本人外，尚有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

这么一批对中国的近现代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传教士，多年来一直被学术界置于贬抑的地位，其实有失客观公正。台湾学者龙应台的评价相较之下显得更冷静更理性。她说：“由清法、清日两次战争失败，直接促成了维新运动的高涨，而英美德等国新教在华的自由派传教士，作为新政的助产士，活跃的程度更引人注目。这批关心救时远甚于救灵的自由派人数虽少，却有上海广学会为基地，有《万国公报》为喉舌，有大量的科学工艺、政论哲理的译著为教材，更重视广交志士、游说权贵，顽强推销他们的改革方案。”^①她认为“李提摩太便堪称典型”。其实，早在龙应台之前，自由主义作家和报人曹聚仁先生亦发表过相同的意见。他强调说：那个时期的几位著名的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他们都以虔诚的宗教家心理，希望东方这个老大帝国的新生。”^②他还特意提及李提摩太感人至深的布道精神：

李提摩太在同治年间便从伦敦到山西传教。他眼见大旱后的华北灾民，觉得在先输入科学知识，改进一般人民的生活，才谈得上宣传教义。他的这份大同主义的思想，为其他教士所不能理会，因此，他就被排出了教会，在山西无法立足，转到

^① 朱维静、龙应台：《维新旧梦录》 三联书店 2000年10月版，第190页。

^②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 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6月版，第26页。

北京广学会去做编辑的工作。那一时期他翻译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变革的历史，以及政治家的学说……

李提摩太被逐出教会后，是以独立传教士亦即更彻底的自由派身份顽强进行他的拯济工作的。他在中国民间赈灾、办学、办报、译书，同时广泛地与中国上层的洋务派官僚和维新派领袖交往。他经常奔走于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以及康有为的府第，甚至忧心如焚地向光绪皇帝进献维新方略。他创办的《万国公报》“一而再，再而三把他的富民强国主张，明明白白说了又说，引起当时有志之士的普遍注意。”^②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只不过是在发挥他思想；梁启超后来大出风头的《新民说》也无非是转述了他在《新政策》中那个著名观点。甚而至于康、梁后来自鸣得意的“时务文体”也不过是从他那里描摹过去的罢了。

与李提摩太最相投契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他和王韬是至交好友，他从王韬那边吸取东方文化的知识，又把西方文化灌输到王韬的脑子里去……他翻译了大量的欧美书报，对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提出了许多积极主张。康有为许多引人注目的维新主张，几乎都得益于他的提示。同样非常热心于中国维新事业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他在山东长年进行拯济和传播活动，对中国有相当深厚的感情。他能说华北各地的方言，过着最俭朴的民间生活；他积极学习汉文化，在济南延聘塾师、习文制艺，还想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他努力要打破民族间的隔膜，增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他还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名为《尚贤堂纪事》的杂志，破嗓裂喉，鼓吹维新变法。他说：中国的地

①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 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6月版 第26页。

② 同 ，第27页。

幅、气候、人口、文教皆具备了第一等国家的条件，如果能顺应文明潮流，其前景真是不可限量，“他的见解、主张和文章风格，也可说是替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开了路。他乃是时务文体中的‘白眉’。”这些传教士，他们“渴望中国蜕变革新的热忱，却又是西方型的（即宗教拯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典型——引者注）。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文化的孕育，而尽产婆的职责的。”^①

乙未以后，教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行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扞吁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篚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了也^②。

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的这番评语，应该说是比较肯綮切实的。西方传教士译书办报，的确称得上是从上帝那里刮来的强劲有力的启蒙运动的季风。

二 自由主义坐标上的《万国公报》

李提摩太和林乐知推出的这份特殊的刊物，采用毛太纸铅印，中国书式，除宣传基督教义、联络教友和报道教会活动外，亦有相当篇幅介绍物理、化学和医学知识。改名后，其内容大变，主要篇幅以报道中外新闻，介绍“西国制造机器军械电线天文地理格致算学”等西方文明常识及商业信息为主。尤诱人注目的是还增设了“论说”，对中外时政进行评析臧否。

^①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29页。

^② 参见《张之洞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5页。

林乐知毫不隐瞒其办报目的：就是要用西方的文明价值观念去干预和影响当时正在清王朝内部开展的洋务运动。1883年，林乐知因忙于他务无暇顾及，该刊告停。1887年，以基督教传教士为骨干的广学会，即同文书会在上海成立。广学会实质上是一个文化出版机构，其宗旨是印行书刊，用西方文明去开启中国人头脑，干预中国的政治文化进程。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万国公报》又于1889年2月复刊，改原周刊为月刊，仍由林乐知主编，李提摩太等襄助编撰。应该说，只有在这个时期，该刊才确实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化”狠狠地加了一把劲。广学会的创办人、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此前在《同文书会发起书》的一段告白，完全可以视作《万国公报》的“发刊词”。他阐释说：“……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版物。……只有等到我们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我们才能最终对中国的开放感到满意。”其基本的思路与李提摩太在《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所表达的信念如出一辙。李认为只要控制了国家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国家的头和背脊骨”^①，因此，该刊复办后更明确地把“开放”的主要目标对准中国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官僚和新派知识分子，力图引导他们的思想逐步“西化”。该刊还宣称道：“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循此宗旨，大量介绍西方的科技知识、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以“开放”中国中上层人士的思想牢笼，同时还大量刊登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问题的新闻和评论文章。由于适销对口该刊影响日增。1894年以后，《万国

① 参见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

公报》更不遗余力鼓吹新潮、推助变法，在中国的维新人士中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发行量最高时增至近 4 万份，读者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就连光绪皇帝也订阅了全套《万国公报》，并对其赞不绝口。李提摩太除在该刊撰写了大量的鼓吹维新变法的“论说”外，还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过从甚密，并广泛结交中国上层官僚，以传布西方思想，故而深得清廷权贵和上层知识分子赏识。后来，王韬之所以盛赞《万国公报》“有益于我国非浅鲜矣”不是没有原因的；更不要说康有为在《致李提摩太书》中褒举它“于中国事一片热心”。就足以证明它在“开放”中国人思想上取得的成功，确不是虚言。

《万国公报》给中国自由主义史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其一，以“大公”精神来标举其独立傲岸的政治立场，以确保“实事求是”精神的全面贯彻；其二，以“主笔”应该具有的自由主义风范来训导中国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具有非暴力革新改创倾向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刚刚出现不久的中国报人。

关于“大公”精神，林乐知曾在《教会新报大者》中阐释道：“作者唯实事求是而不叩虚无而索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事之是录之，事之非者去之，以大公无私之心，作大公无我之报，听阅者之去取可也……唯有立定主见，不敢拒拂于人，亦不欲曲徇之人，阅公报者其谅我也。”^①这可谓西方人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和文化精神来附丽和解释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最早一例。同样，用“大公无私”这一中国古老的政治和道德理想来附丽和解释自由主义最具有独立品格的

^① 转引自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51 页。

精神风貌，也无疑是第一次。据此，即可得知，后来英敛之之所以在立志投身中国的自由主义报业实践时要选用“大公”一词作为自己的报名；张季鸾和胡政之们之所以坚持用“大公精神”来鼓励他们自己确保民间立场，很显然，是受到了林乐知这个“大旨”的启迪和鼓舞的。

关于“主笔”风范。主笔的权威何在？在当时中国报人社会地位普遍低下，为世人不屑的情形下，《万国公报》特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复阐述西方“严肃报纸”在主持公论和社会正义，特别是坚守报纸的独立品格方面主笔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公众心目中享有的巨大威望。“事至巨，权至尊，虽万户侯不易焉”^①其社会地位之崇高，足令人望而生羡。那么，做一个主笔，怎样才能彰显出其自由主义的人望和威权呢？根据《万国公报》所刊载的杨鉴堂的《总论新闻纸十益说》和李提摩太的《六读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等文章的提示所归纳，至少有如下三大要点：一、良史之才，“不避权势，不畏奸豪，苟有非理之处，皆得从容而议之，恒寓规谏之意”；二、文字表达之才，行文“无不婉而可思，曲而善达”；三、切中世务之才，“每述一事，必使人可法可成，阅之者茅塞顿开”。^②不仅如此，《万国公报》还对当时鱼龙混杂，良莠淆乱的中国报业深感鄙薄和忧虑，尤其是对“秉笔政于市侩，无行者相伯仲”的滑稽局面痛加斥责。认为，要挽救和振兴中国人自己的报业，惟有依照西方的专业模式，以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来培养中国人自己的主笔和编辑、记者，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

^① 参见《万国公报》(一)《新闻》。

^② 参见《万国公报》第407卷、第67卷及《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纪录》，转引自《中国新闻传播学史》。

变这种“报人形同无赖”的严重局面。

三 自由主义“中国化”嬗演中的《申报》

再说外国人在华办的商业报刊。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商业报刊发展很快，并一举取代了传教士报刊成为主流。1845年2月英商肖锐德在香港创办的《德臣报》是当时最典型的英文商业性报纸。以后随着西方国家对华贸易及政治、文化活动逐渐扩张，相继冒出了一大批中文商业性报刊，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上海新报》（1861年创办于上海）；《申江新报》（1872年创办于上海）；《字林沪报》（1882年创办于上海）；《时报》（1886年创办于天津）；《字林汉报》（1893年创办于汉口）；《新闻报》（1893年创办于上海）……此外，分别创办于广州、福州、北京、沈阳、旅顺和汉口的商业性报刊亦不在少数。这些报纸最初以刊载商贸信息，为商业服务为特点，但并不都赚钱。后来随着贸易活动迅速扩大，办报已成为有利可图的一大事业，于是以上海为贸易和文化中心而出现了相当一批以赢利为旨归的商业性报纸。这当中，要数《申报》运作得最为成功；而这种成功一则体现在经营方式、报刊业务和内容拓展、形式活泼方面；一则更体现在其传播和示范西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实绩方面。

《申报》即《申江新报》的简称。该报1872年4月30日创办于上海，由英商安纳斯托·美查与伍华德等人合资开办，后归美查一人所有。其办报宗旨“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但亦愿自伸其不全忘义之怀也”^①足见其办报观念与西方大众化

^① 详见《论本馆作报本意》，《申报》1873年10月11日。

报刊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申报》的重要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促进西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中国化”转化方面。首先,《申报》聪明的是没有采取《上海新报》热衷于聘用传教士主持编务的老套路子,而是针对读者层绝大多数是中国中上层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特点,专门聘请熟悉中国的典章文物、风土民性,特别是文化心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如蒋芷湘、何桂笙、钱昕伯、吴子让等担任主笔或编辑——这是第一个关键用力之处。

其次,不厌其烦地向中国读者宣讲这种商业性大众化报纸的好处。为了说明这种“新报”与中国的官方“旧报”的迥异,《申报》指出“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①。为什么呢?是因为:“新报是合朝野之新闻而详载之,京报仅有朝廷之事而闾里之事不与。”^② 为了强调其“民间性”,它还反复陈述解释说,《申报》不光是为士大夫所办的,它“亦为工商贾所通晓”。很显然,用这样的完全中国化的语言既利于联络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感情,又利于迎合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心理。针对义与利——这一对中国人最在乎的矛盾,《申报》还专门撰文作了有利于中国人接受的说明,其曰:“其谋疏义以仅谋利或有之;其谋利而兼仗义者亦有之……虽曰必能媚悦报者,方可多销报纸,亦本报不屑此浅计也。”^③——它声言义利兼顾,并不专以谋利而弃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所说的“义”绝不仅仅只是中国人所喻解的“仁义道德”或“江湖侠义”之“义”,而是别有所指。什么呢?那就是西方文明,

① 《邸报 别于 新报》,《申报》1872年7月13日。

② 《论中国新报异于外国新报》,《申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号。

③ 《论本馆作本报意》,《申报》1873年10月11日。

特别是包含在商业性和文化性当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鉴于这样双重的目的，它又不厌其烦地开导中国读者说，“自新闻纸出，而凡可传之事，无不遍播于天下矣；自新闻纸出，而世之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才力智巧之士，希奇怪异之事，几乎日异而岁不同”；最后总结说：“新闻者，真可使民而有益于国者也！”^①很显然，这些思想观念一方面固然出于美查等外国人企图通过报纸教化中国人心的商业和文化动机，另一方面又未尝不反映出加盟报务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报纸变革图存的民族自强信念。

再次，为了进一步促使西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运用得以推广，《申报》在创刊伊始即在《本馆告白》中巧动心思地说：“新闻纸之说，有之，则始泰西始，而不知实非始于泰西也。（中国）古者，警箴诵谏；鼓善旌，无非求言之道。每岁孟春，……以木铎巡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凡此，皆所以使下情壅于上。上闻而勤求民隐，此圣贤王所不敢废焉者也。夫欲下情之壅于上闻，则舍新闻纸奚属哉！”这段用以恭维凡事好争“天下第一”的中国人办“新闻纸”的“先驱”的话，实在是摸透了中国人自卑亦又自尊自大的特殊心理。《申报》刊出这篇名为《新闻纸之益》的劝谕文章，其目的并不在这里。待恭维话说完，它马上极有针对性地向中国读者：既然统治者向民间行征求各种意见是中国人办“新闻纸”的优良传统，那么，现在，你们在“新报”上充分发表自己对统治者，或者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这难道不是很符合你们中国人的伟大传统吗？而在另一篇名为《论各国新报》的“论说”当中，《申报》干脆顺势将西

^① 《申江新报缘起》，《申报》 1872年 5月 4日。

方民主政治观念中，关于报纸“既是联系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又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桥梁”的两大功能介绍给中国读者^①。该文引导说：“朝廷之行政，小民纵欲有言，未免君民分隔，诸多不便，一登于新闻纸内，则下情立即上达。至于闾阎行事制器，或远隔重洋，或另在他国，信函相商，多劳往返。一登于新闻纸内，则千里如同面谈。此言泰西之新闻纸有益于朝廷、闾阎也。”因此，“新闻纸”的确是“知民之好恶”和“知己之得失”的好东西啊！

《申报》不仅非常注重言论，每期必在首页刊发一篇“论说”。以宣传科学知识、文明历史和西方政治、法律、新闻观念，而且还非常注重报道有重要认识和教育价值的社会新闻，敢于触及中国当时的黑暗现实，抨击专制极权行径。其中，尤以对当时浙江省余杭县轰动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所作的连续四年的追踪报道最为牵动人心，一举突破了该报曾声称“慎勿品评时事，臧否人物，以撻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羞”^②的陈规陋矩，而为后来中国人自己办报树立了“见义勇为”的刺世于政楷模。

当然，除了《申报》之外，亦有不少洋人所办的商业报刊为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并力促其“中国化”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如《新闻报》和《字林沪报》等所刊载的：《报馆着重主笔说》、《论报馆立言应实事求是》以及《官场新重报纸说》等文章，“除了少数为李提摩太等外人所撰，其作者大多系中国人。表明了以西方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报刊

①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 122 页。

② 《论各国新报》，《申报》1873 年 7 月 20 日。

观念随着社会化的商业报刊的实践，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人。”^① 中国第一代报人知识分子正是在西方传教士报刊和商业报刊的加盟和“见习”中，了解和掌握了全套的本领，并将其改创到日后的自由主义实践运作当中——“盗来火种煮自己的肉”，这新的一页，将由中国人自己来掀开了。

^①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 124 ~ 125 页。

第二章

启蒙救亡与西方报刊思想的先期传播

第一节 第一代国人报刊的自由主义尝试

一 第一代国人报刊整体描述

随着第二鸦片战争的又一次惨败，中国国势更处于激剧的衰颓和动荡、飘摇之中；在与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接触和交手当中，中国的一些进步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最具有忧患意识的人们，以及许多的民间知识分子，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的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体制和人文形态的本质层面，因而普遍萌生了效法西方之“道法”，以改变国家愚蒙落后、封闭保守的现实，而走出一条富国强种之路。这些忧心如焚、悲情难抑的人们终于从外国人鼓吹办报的理论中和他们办报的具体实践中，发现了报刊在开发民智、撻动人心、沟通讯息、拯救国家的过程中种种“神效”。加之外国传教士和商人所办的报刊，在解决中国问题时有隔靴搔痒之嫌；更因为外国人长期独占中国报刊市场的情形，早已引起国人的不满，于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中国人出面创办自己的报纸，并通过报纸去推动国家逐步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应该说这种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和有效的，尽管从一开始这种选择就充满着悲壮和曲折。在这个时期，西方的报刊自由主义不啻是一剂绝妙的良药，即使这些先进的人们习惯于用君主立宪的惊讶去解释和实践它，它的药效也注定不会丢失多少。

据资料记载，最早与西方报刊发生接触的中国人是梁发和蔡高，但严格意义上讲，他们都不是道地的报人，而是受雇于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的雕版印刷工匠。中国人仿照西人办报，有稽可考，当是在 1873 年 4 月创办于上海的《西国近事汇编》——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张由国人所办的近代意义上的官办内部报纸。不过这个“第一”并没有给中国新闻思想史留下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倒是 1874 年由民间知识分子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才正式翻开了中国报刊最富有思想价值的一页，因而极有理由被我们视作中国第一代报人知识分子，奉献给这个古老帝国的第一枚酸涩的自由主义之果。

其实，《西国近事汇编》只是江南制造总局主办的一种时事性不定期杂志，每日由德、英等西方国家报纸上摘译数量有限的要闻，主要印送当时的官绅阅览，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译报。因有美国人金理楷和林乐知参与译介工作，所以，该刊的办刊思想与《万国公报》等相去不远，除了没在其中刻意“推广基督教文明”之外，倒是显示出其刻意用“西方文明”提供给“中国所需要的新道德的动力”^①的企图。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民办报纸是《 报》（初名《汇报》——笔者注），问世于1874年6月，由留美学生副监督容闳发起并集资合股在上海印行。《 报》的股东结构在当时颇有代表性：既有接受过严格的西方教育的留洋学生，亦有商人和官僚，如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和上海知县叶固之等，都是主要股东。这些人尽管各自私人动机不同，但却都是洋务运动的鼓吹者；都抱着实用主义的观点对西方文明中有益于洋务运动推进的内容，不遗余力地刊载介绍。这与《西国近事汇编》专注于鼓吹维新变法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慑于《大清报律》的严酷监控，《 报》言辞相当谨慎，尤其恪守不评点官府政事，不臧否官员是非的规条，因而显得比较局促小心。然而，尽管如此，该报还是在刊行不文久因报道忤及官方，而横遭非难，被迫改组，特请英国商人葛理挂名发行人兼主笔。这以后尽管言论仍相当谨慎，然针对时弊总不免时有指陈；更多的时候是转载《循环日报》的言论，以此曲折表明其观点和态度。尤值得称道的是，《 报》还译介过相当数量的有关西方政治制度和道德、法律思想的文章，其中对英国议会制度的着力介绍，足见当时的士大夫、官僚中的进步人士对君

^① 参见《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序言。

主立宪制的醉心程度。《彙报》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其对中国权益的竭力维护 为此与《德臣报》、《字林西报》、《申报》等外报的论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它已经接近了西方“高级报纸”的水平和风范。在这个“观点公开的市场”上，倒是那些以传播西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为荣的对手处处显得窘态毕露。

稍后于《彙报》还有 1876 年 11 月中国人自办的《新报》，以及 1879 年国人自办的译报《新闻纸》和 1884 年创办的《述报》、1886 年创办的《广报》等。这一批最早由国人创办的报刊主要集中在受西潮冲击和影响最大的上海和广州，因此，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熏染，只是其表现不同罢了。

下面简略说说上海的《新报》、广州的《广报》和《术报》的办报情境。

《新报》是一份官商合资，而由当时的上海道台冯焌光控制的报纸。其资金名义上由上海各口商帮集股，实际上绝大部分由道库所出。《新报》之所以在第一批由国人自办的报刊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主要有这么两点：其一，竭力鼓吹洋务；其二，竭力维护皇权道统。因此，与其说它是一张“新闻纸”，不如说它是一个官方的宣传工具。鉴于这样的特点，它不能不与那些关注社会，关注国政的“民报”拉开了极大的距离。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它所刊载的国外新闻，以及与外务有关的经济、商务信息中，不可避免地挟带不少西方的价值观念。只是因为该报主要是针对外国读者，所以在国人中影响并不大。

《广报》开办于广州。这份报纸之所以比较典型和特殊，主要是因为它的主办人邝其照曾经当过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的秘书。那时的国人报纸大多仿照《申报》的栏目、体例，甚至

版式，《广报》亦不例外。该报内容分为论说、新闻、商情、广告和“京报”、“辕门抄”六大块，后因刊发参奏某大员的奏折，惹恼官方，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查封，于是被迫移到沙面租界更名《中西日报》，并邀外国人挂名。这以后，不仅其言论较先前大有增加，而且也比较大胆；尤其是它增设的《西报译登》专栏，对传播和介绍西洋典章文物、风土人情、科技知识和人文思想等，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述报》始创于 1884 年 3 月 27 日。这张报纸在同时期的国人报刊中意义不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撮其要：一、有较高的业务水平，甚至超过当时外国人在华办的报纸；二、新闻内容丰富时效性强；三、言论大胆犀利，为人称道；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在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报纸功能的前提下，明确向清政府提出应实行西方式政治改革方案。该报在《开言论为自强首义说》的论说中，公开推崇西方的政体模式，认为广开言路、上下沟通、尊重言论自由，才能使国家走上文明富强之路。很显然，《述报》所达到的思想和认识水平，虽不及《循环日报》，却是《新报》和《广报》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除上海和广州外，汉口也是国人办报较早、较多的城市之一。艾小梅的《昭文新报》就创办于 1873 年 8 月；另外甲午战争前，国人还在汉口办有《公论报》和《汉报》等。不过，这几张报纸寿命都不长，影响也很小，因此谈不上有什么自由主义的尝试之类。

真正有意识、有目的开始自由主义尝试并卓有成效的，首推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这张报纸不仅在中国的新闻事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同样占有相当重的地位。《循环日报》于 1874 年 2 月 4 日问世于香港，虽是一份商业经营型报纸，但是它还同时具有非常鲜明的

政论风范。该报是中国近代仿照西方商业型报纸、并体现独立的民营立场的第一个成功范例。在首批国人报刊中它之所以鹤立鸡群、遗响久远，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一，它置身于英人统治，特别是《大清报律》无法管束的香港，可谓得天独厚；其二，主笔王韬不仅有深厚的学养和弘毅的抱负，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有实地考察的经验、对西方的人文思想有直接和系统的学习和体会，这在同时代中国报人中可谓绝无仅有；其三，王韬假《循环日报》实践其服膺追慕的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是全面的，而不是零星的；其四，正因为以上这些优势，该报才和当时许多国人创办的鼓吹洋务的报刊拉开了极大的思想和认知距离。它对西方议会政治和君主立宪制度的全面深入的描述和阐释，特别是对西方报刊在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发挥出的社会政治、法律和道德进步的威力更是心向往之。因此，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所作的巨大努力，不仅对中国的近代报刊有着杰出的示范意义，而且对中国的现代民间报刊更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这种示范和指导是道地的自由主义的，当然也是“中国化”的第一个成功标本。

另外，《循环日报》在中国所开创的“文人论政”的自由主义传统，却是西方报刊自由主义实践中所没有的东西。因此，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自由主义报刊又确实比西方多了一份醒目而悲怆的亮色。不仅如此，《循环日报》对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始终怀抱批判和警惕的立场，因而成为了其后中国民间自由主义报刊遵奉的一大原则和传统。

二 洪仁玕的自由主义梦憬

中国人当中最早对西方报刊有较为深刻认识 并且提议创

办近代报刊的还有洪仁环。在西方报刊自由主义思想的东渐传布过程中，洪仁环所起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洪仁环（1822 ~ 1864）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同时也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很早就参加了拜上帝会，曾在广东组织暴动以策应金田起义，失败后被迫遁入香港，在外国传教士家中任教长达六年。这比王韬到香港整整早了将近年 10 年。在香港的几年是洪仁环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时期。这期间，他不仅接触了大量的外国报刊，而且还潜心学习研究了大量的西方书籍，从而对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这种接触和了解不光对他作为知识分子个人而言，具有醍醐灌顶般的非凡的思想飞跃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飞跃，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来说也是不同凡响的。在香港，他对西方的政治文化资源始终抱有开发、利用的极大热情。1859 年春天，他带着改造和振兴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强烈愿望秘密潜抵天京，旋即被洪秀全册封为干王，总理天国朝政。其实，当官并不是他的志向，他的真意图是想借太平天国这个国中之国来实验其拟定的带有显著的西方政治文化色彩的“治国方案”。当时，太平天国正处于衰退期，其官风腐败、制度混乱，上层争斗流血，下层人心涣散几到不堪入目的境地。因此，他是带着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壮志来做这件大事的。有意思的是，洪仁环的这种革新举动曾引起美籍传教士林乐知的注意和兴趣，1861 年，林曾赴天京专门寻访过洪仁环。毫无疑问，林的到来，更激发他实施革新方案的勇气。

洪仁环向洪秀全献出的治国政纲，就是他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政新篇》。当然，这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杰作，其着力处主要并不在新闻上面。但是，他在将欧美的政治观念和法理精神全面贯串到他的这部著作里面时，自然不能漠视西方自由报

刊在推动自由资本主义大步前行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对报刊功能的认识就必然从国家政治结构的角度予以了相当的重视。这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可谓绝无仅有。比如，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当时也仅把西方报纸视为“塘报”（即军事情报——笔者注）之类，而对其功能的认识自然是极为肤浅。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其在所编撰的《海国图志》中，虽然比林则徐前进了一大步，在“知己知彼，可款可战；匪证奚方，孰医瞑眩”^①的认识基础上，并未完全将西方报刊的价值功能锁定在“夷情备采”，最终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功利目的上。但稍加比较，即知洪仁玕的认识水平也远高出他们许多。《资政新篇》中专门提出了“新闻篇”的系统设想和具体操作方案。为了促使政治体制改革能有效地朝着他所向往的西方君主立宪的方向稳步前行，因此，对报纸的政治功能他作了全面而且系统的阐述，其精要之点如下：第一，报纸是沟通下下，联通信息的最佳渠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第二，报纸可起到监督各级官吏的良好作用。使“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也就是说，可以将官吏置于“人心公议”的监督考核之下。第三，报纸可以起到收集和了解百姓意见的作用，所谓“收民公议”，关键在“议”，即民主参与上，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第四，报纸可以传播交流各种商贸信息，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同时亦可以让治者随时了解政治和经济形势，便于理性合度地治理国家。所谓“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

^① 参见魏源：《海国图志叙》。

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使整个国家的面貌为之一变。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报纸所发挥的政治传播功能、舆论监督功能和宣教感化功能是极为重要的。当然，要真正发挥这些功能，报纸自然必须贯彻西方那样的自由主义精神，才能有所保证。

事实上，洪仁玕的自由主义办报理想还具体表现在另外几个方面。这就是针对报纸的出版和管理所萌发的一些设想。很显然，这些设想无一不是取径于西方商业型报纸的独立办报思想。他提出：一、报纸应准许由民间来办；二、报纸是商品，赢利乃天经地义；三、报纸应有其法律地位，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并担负法律责任，对“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四、设“新闻官”，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其“独立”行使监督权。他解释道：“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使忠奸皆置于“独立”的新闻监督考评之下。《中国新闻事业简史》评价说：“这些阐述表明，洪仁玕对近代报刊的多方面作用，如反映民情，传播商业和时事信息，已大体上有所认识。他的办报构想明显具有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政策的性质。”^①洪仁玕的深刻悲剧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至死都没有觉悟到，他的那种卓越的政治革新理想，不仅根本不适合像太平天国这样的、极端腐朽落后且带有明显的邪教性质的政治集团，即使是对腐败保守的清王朝而言，也同样是根本不适合的。也就是说，他想让一个带有浓重的邪教色彩的、背历史潮流而动的农民政权，在

^①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 1983年8月第1版，第73页。

他的指导下走向西方那样的民主法制社会不光是找错了实验的对象，而且也让自己陷入了深重的悲剧渊藪。尽管这样，他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革新历史的思想贡献却是不容抹杀的；同样，他对中国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定和发展，以及对实践的具体指导，也是应该承认并得到我们的尊重的。

“洪仁玕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重的知识分子。平心而论，他的一些新闻思想和政治改革主张，在理论上是大大超前的。他以前的林则徐、魏源远不能比，甚至他以后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活动家也不能相比。这恐怕是因为他虽然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思想，却又没能全面深入地体验和研究；虽然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报刊的巨大作用，却又未能亲身从事报刊工作实践；虽然迅速登上太平天国的最高决策层，却长期以来一直身居局外，没能全面地、历史地认识这次农民运动的实质。他比较超脱，这使他的思想超前，也使他的思想成为空想。”^①这段对洪仁玕的总体评价，除认为他没有全面深入地体验和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思想一句尚值得商榷外，其余的评析无疑是比较准确的。其实，理想主义的“超脱”导致其“思想超前”，岂止是洪仁玕悲剧的特点和紧要之处，根据我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一个多世纪实践的考察，发现这恰恰是几乎所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共有的悲剧特点和紧要之处。惟其如此，他们的悲剧实验才值得我们去认真反省和深入研究。

① 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135页。

第二节 中国最早的报刊自由主义大师——王韬

一 生平与思想简述

王韬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刊言论自由思想的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将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系统传输进这个古老帝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报人。尽管他没有像后来的梁启超、严复那样，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进行“全面”的译介和阐述，但他最了不起的贡献却是以他的办报实践，曲折地转述和发扬了古典自由主义学说中那些最有价值意义的民主和自由理念。特别是从他对英国老牌的自由主义报纸《泰晤士报》的仰慕和竭力追效中，可以让人知道，他对自由主义是多么的沉醉和神往。事实上，正是王韬的自由主义报业实践，尤其是那些潜藏在启蒙救亡表情背后的民主自由主张，才深深启迪了中国近现代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报人，从而鞭策他们奋身投入险象环生的自由主义新闻实践。

当然，王韬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更强烈地是通过以后的严复、康梁，以及谭嗣同、汪康年等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政治文化活动而显影出来的。

王韬(1828~1897)原名畹，字利宾，又名翰，号兰卿，苏州甫里(今江苏吴县)人，出生于塾师家庭，自幼即受过严格的儒学教育；14岁时已贯通群经、旁涉诸史。1845年在乡

试中以第三名的成绩中秀才；次年在南京的科考中惨遭败绩，愤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科举的失利使他完全灰心，想寻找另一条士遇的捷径，于是期望通过上书言事打动朝廷官员。当时他接二连三地上书江苏巡抚徐君青等人，主张与英、法等国修好，并仿效西方，实行政治和军事改革，但这些苦心并未奏效。这种“士不遇”的打击常使他痛哭流涕。1849年，他应英国传教麦都思之聘，在伦敦布道会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协助传教士伟烈亚力等将一些西方典籍翻译成中文。这期间曾参与编撰《六合丛谈》。王韬思想发生关键性的变化，麦都思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麦是伦敦布道会继马礼逊之后派到中国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因此，这个人物对中国自由主义历史的早期影响也是相当重要的。当时，他并不知道与麦都思的不期而遇，对他及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王韬与许多旧式文人不同，或许正因为没有进入官方体制，他才没有什么顾虑。据他在《漫游随录》中的描述，当时许多中土之“士”对来华“夷人”一般采取冷淡躲避态度。马礼逊、麦都思来华之初，连雇佣中国工匠作助手都颇费周折，哪谈得上有中国“知识分子”敢来与他们合作。王韬的出现和他的积极合作，令麦氏大为惊喜。1848年初夏，王韬正式接受麦都思的恭请到“墨海书馆”参加编校工作。在这之后的十年中，他通过麦氏结交了许多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其精神境界受到西方科技和人文思想的强烈冲击和陶染。在这期间他与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人合作编译了《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格致新学提要》、《泰西著述考》、《英华通商事略》著作等，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862年，王韬回乡省亲时，曾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

长官刘钧，受其器重，因此大受鼓舞。于是翌年 2 月化名黄畹上了一个条陈给忠王李秀成，为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的战略出谋划策。该条陈在清军攻克李秀成大营时被发现，他被通缉逃匿到香港，至此才在正式更名为韬，笔名有天南遁叟、遁窟废民，欧西寓公、弢园老民等，开始协助英国传教士雅谷翻译经籍。1864 年，他受聘主编中文报纸《近事编录》；1867 年随雅谷赴英三年，其间两次赴欧洲大陆考察和游历，1870 年，结束欧游归返香港。“沧海归来的他，已经由一个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忧国伤时的魏默深。”^① 这以后，他曾经为《香港华字报》撰稿，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鼓吹革新；同时又与友人黄胜合伙购买了原英华书院印刷所，成立了中华印务局。1874 年该局正式创办《循环日报》。

二 由器物到“道法”的理性飞升

但是，直到第一次赴欧之前，王韬对西方文化的惊叹和理解，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器物”的层面，因此根本谈不上从“道法”的层面上去思考和深究。这种情态，仅从他对香港“英华书院”院长、洋人理雅各的博物馆的赞美中即可窥其一斑：“西国书籍甚多……輿地之外，如人体、机器，无不有图，纤毫毕具。院中鸟兽虫鱼、草木花卉，神采生新。制造之妙，得未曾有。”^② 1867 年，王韬随理雅各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欧陆之旅。他自诩“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前路之导，捷足之登”。确实如此，他在苏格兰住了很久，才听说由张德彝、志刚、孙

^① 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 1985 年 5 月版 第 143 页。

^② 王韬：《漫游随录·物外清游》。

家谷等官员组成的第一个中国外交使团被派往欧洲。而较郭嵩焘、刘锡鸿等驻英使节的到来，他更早了整整7年！

其实，王韬的“前路之导，捷足之登”的深刻含义还不在于这里，而在于他由“器物”而至“道法”，即由感性到理性的快速飞升——从西方现代科学向人文精神，尤其是在向西方政治制度的探询上大大超过了那一批又一批的官方考察团！为了能更深入具体地了解和感受西方政治的优长，他多次到英国下议院去旁听其开会议政。在这里，他受到的震撼已远远超过先前“声光电火”对他的刺激。至今我们虽然无法找到他当时是否接触过亚当·斯密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著作的文字依据，但是，从他以上的赞叹中可以知道他对古典自由主义在操作层面上的一些理解和首肯。这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墨海书馆”中做编译工作的打工仔了。对英国的“士庶”可以和“宰辅公侯”齐聚一堂，公开研讨大政重务，而且“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实在不胜羡艳之极。因为能这样自由地表达意见的情景，在朕即国家、言路不通的中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在英国的两年，王韬的主要工作是和理雅各合译《春秋左氏传》、《易经》和《礼记》。这些作品后来以《中国经典》命名，出版以后轰动英伦乃至欧洲，王韬也因此而名声大噪。英国的许多大学、教会和民间团体竞相邀请他去讲学。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哈斯佛大学院”（即牛津大学——笔者注）的讲坛上演讲的中国人。他呼吁中英两国应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同时更从哲学的高度来纵论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之“道”重伦理，也重人生，讲究从人出发而扩大到整个社稷，并强调人际关系的秩序和调整原则。而西方的基督教神学无疑是作为西方之“道”的基础，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而产生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这些观念，他认为终究还是被归结到了“人”的层面上来，因

而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他甚至宣称，欧洲的空想主义者的自由观念与孔子的大同思想是一脉相承，颇为契合的。后来，在爱丁堡大学，在苏格兰大学，他都进一步充满激情地宣讲了自己对中西文明交融契合的独特感受。“吾道其西矣！”他对自己的思考和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回应惊喜莫名。

《循环日报》对于王韬、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是中国报刊史上首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而且更因为它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特别是在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史上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

事实上，早在创办《循环日报》之前，王韬就曾先后担任过香港《华字日报》的主编，以及《近事编录》等报刊的撰稿人。这期间获得的办报经验，为其日后从事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新闻活动，无疑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里面称赞他是“中国报界记者名闻世界之最早的一位”^①，可谓独到精辟。

为何要将自己的这张报纸命名为《循环日报》？原来，王韬这时已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他的“循环史观”的中心涵义，就是“天道循环，人事变迁”，是趋世界文明潮流之必然走势，同时也寄寓有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弱走向富强，从专制野蛮走向君主立宪……的理想。总之，决不是戈公振断定的那样，是寓含“革命”^②。因为，只要对王韬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他从来就不是以一个“革命者”自居的，他对任何形式的“革命”都持不赞同的态度。他“虽有上书之举，但不过是怀才不遇的投机行动，并不表示其支持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120 页。

② 同，第 119 页。

对于法国大革命他也持激烈的反对态度”^①。由此可见，他确实是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新派人物”。

《循环日报》不仅在精神走势上受到英国报刊的影响，而且在编排方式上也偏爱英国报刊的审美趣味。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还自觉仿照英国报纸的体例，每日在首栏中撰写并发表“论说”一篇，开了“文人论政”式报刊之先河。

王韬渴望“变法”，但他竭力主张“渐变”，而坚持反对激进主义式的“速变”。他说：“求变者固有之，然皆取渐变之途，而不求骤克其功。”^②

在《循环日报》创办后的整整十年中，王韬撰写了大量的时政评论，借以倡导洋务，推进变法，希望以“渐进”的方式将中国推进到英国那样的文明国家的序列中去。

《循环日报》不同于那些与官方有直接和间接钩挂的洋务派报纸，它是纯净而独立的民间思想论坛，同时亦是缔造中国第一代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实验园地。

王韬的政治理想和办报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在报纸上提出必须实行君主立宪的人。由于深受英国议会民主政体的影响，同时考虑到“渐进”的意义，他认为“君民共主之国”较之君主专制之国和民主之国，更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因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③。那么，这是否说明他就真的反对民主政治呢？如果这样，那就太低估这个早期自由主义者的政治

^① 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性 1990 年 4 月版，第 121 页。

^②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③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一《洋务下》。

智能了；他只是认为所谓“民主之国”，“法制多纷更，心态难专一”，而并不是反对民主本身，更不是忽视和取消民主在改善和推进国家进步中所包含的重要文明意义。事实上，王韬所推崇的“君民共主之国”，其核心乃是“重民”思想——这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民主性质。他在《循环日报》的评论文字中反复提醒和忠告统治者说：

“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盘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①

怎样才叫：“重民”呢？他提出了一揽子方案，其中重要的有这么几项：一、让民众自由择业；二、民有所难，政府救恤，民有所求，政府为之；三、允许发展民间工商业，使民众得利；四、政府必须倾听民众的声音，让民众讲话……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大量描述和解释西方的议院制、共和制，并以欣赏的口吻来教导君主和民众，其苦心孤诣的确不与自由主义搭界。尤其是内中所包含的人权思想色彩，甚至影响到后来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更不要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如何因受到他的震动而提出“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政治主张的。

王韬的始终对英国的议院制赞赏不已。他说：“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

^①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①。他以一种审美激赏的态度在劝喻和梦幻时将自己深深地陶醉于其中。

“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大胆地揭露黑暗的现实主义精神，却是民主思想产生的必要前提。王韬以前的龚自珍、冯桂芬都对封建政治作了大胆的犀利的批判……而王韬则汲取了前人的养料，不仅揭露批判封建黑暗政治，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改造社会、使中国得到新生的途径。”^②《循环日报》自创刊开始，便把抨击和揭露专制罪恶与呼喊中国社会在思想和体制上实现根本性变革，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为了能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合乎英式体制的君主立宪制政府，王韬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改良措施。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他的这些主张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三 “文人论政”的第一个样板

当然，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报人、一个“窃火者”，王韬更引人注目的贡献还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办报思想当中，王韬的伟大不仅凸显在第一个动用民间舆论工具来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上，而且他还是第一个撰写专文，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办报思想的前驱者。他的这些思想除散见在大量的“论说”中之外，主要集中表达在这样三篇专论当中，它们分别是《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等。它们均撰写在19世纪70年代。内中，王韬就民间办报之目的、民间报刊的职能及新闻学思想

^①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

^② 忻平：《王韬评传》第125页

等，都作了具有“开辟草莱”意义的论述，实为中国自由主义民间报业的开山和纲领性启蒙之作。

王韬认为，报纸的首要作用是上情下达。在君主立宪制条件下，消除君民之间的隔阂这一大任非报纸莫属。他说道：“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欲得民心，是在以有维持而联络之。”因此他进言当局在各地兴办报馆，“朝廷有兴作，大政治，则必先期告民。”使君民上下联络”；“合一国之人以共为治”。

报纸的第二个作用是“民隐得以上达”。他痛感清廷吏治腐败之极，“堂帘高深，舆论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垓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昨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四方之水旱”、“民情之苦乐”、“货物之虚盈”、“讼诉之是非”均不能上达朝廷，这种“下情之瓮于上闻”^①的弊端均可由报纸予以革除。他呼吁在各地广设报馆，在报上辟民情栏，广登社会新闻，以“达民情于上”。

报纸的第三个作用是“通外情于内”。他在西方看到列国“采取舆论、探悉群情，即出自日报”。而清朝大员，昧于时势，鄙视洋务，“夸张粉饰，玩愒因循、蒙蔽模棱、枸墟胶固，于西国之情昏然如隔千重帘幕”，以致历次中西交涉屡屡蒙辱。基于此，王韬倡设“译报局”，“译西事为汉文日报”，择其要点登于报纸，并“呈送总理衙门”，以便朝廷随时了解时事动态，“即遇交涉之事，胸中自具成竹”。他认为这也是“启民

^① 《申报》刊 1878年 2月 19 日《循环日报》：《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

智”的一个重要途径，“此所谓通外情于内也。”^①

报纸的第四个作用是“达内情于上”。王韬提出：“通中外之消息”，“中外交涉之事，时时可刊之日报中，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认其间”，使事实之真相公布于众，“勿使外人独言，舆论背我”；同时也还主张设立“西文日报”，发挥报纸“达内事于外”的作用。他痛感每有外事纠纷，西方在华报纸往往抑中扬外，颠倒是非，迷眩国人耳目。

报纸的第五个作用是引导舆论、感化人心、扬善贬恶。在欧洲香港，他目睹报刊能够纵横清议，言论自由。

他对英国第一大报《泰晤士报》极为羡慕，赞扬道：“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②他向往在中国大地上，有朝一日也能自由办报，出现那种“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事，位至卿相。国有大战事，投笔从戎，随营记录，视其毁誉以为胜负”的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出现，皆以开放民主、言论自由为前提。为此，他多次提出了言论自由的要求，认为清政府不应压制舆论，而应鼓励民众积极“言政议政”，这才是国家“兴盛发达”之表征。相反，一个国家如果“万民默然”那么“其亡不远了。”

王韬这些饱含着现代文明精神，特别是那些隐含着自由主义因子的办报思想，在19世纪的中国简直是惊世骇俗、大逆不道的。作为中国前现代文明时期自由主义的先行者，他的这些杰出思想深刻地影响和导引了梁启超、陈炽、陈衍和郑观应

^① 《申报》刊1878年2月19日《循环日报》：《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

^② 王韬：《韬园尺牍：上丁中草药丞》光绪十九年刊本，第107页。

这些历史人物。可以说，王韬以后那些顺应潮流前行的思想家和实践家，绝大多数的思想来路都可以追踪寻溯到王韬那里——甚至可以毫不夸饰地说，王韬才是真正的、在中国引进和播撒自由主义火种的第一人，尽管他的自由信念被“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所遮掩……另外，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奠基者，王韬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他一生都在努力，以“不作人间第二流”自我期许和鞭策，希望通过创办具有独立地位的民间报刊，系统地介绍西方的科学，特别是政制思想，以及操作模式，来推动舆论，感化人心，最终引发国家、民族的亢进奋争，以昂扬独立的姿态跻入现代文明国家的序列之中。

王韬作为中国民间自由主义报业的创辟者，其突出贡献还在于他首创了民间报刊“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这种“文人论政”与后来泛滥成灾的党派论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指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一党一派，独立昂扬地运用自由主义的原则发表自己的政见，闪耀自己独异的批判和建设的光芒。后来的郑观应、严复、谭嗣同、梁启超、胡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英敛之、张季鸾、李敖、金庸、邓拓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王韬的这一自由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

王韬的创辟是非常艰难的。他为了使自己的《循环日报》成为“文人论政”的第一个样板，借以传布自己的政治和社会革新主张，在深入考察了欧洲现代报刊，特别是《泰晤士报》政论特点之后，认为新型的报刊政论不仅要坚持进步的主张，而且还必须在文章的义理和辞章法度上彻底冲破古旧陈腐的束缚，为自己被解放的思想寻找到合适的载体，为自己一颗战斗灵魂找到合适的“家园”。王韬的这种努力，终于开创了一个

被新闻史家所称誉的“政论时代”。这个时代后来经过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罗隆基、张季鸾、王芸生等自由主义报人的接续，整整燃烧了近一个世纪。

王韬的政论笔锋涉及之广，气势之雄，可谓前所未有。举凡国政大事、洋务外交、传教开埠、鸦片贸易、民生民权、中西文明、君主立宪、科学民主、议会政治、军事得失、教育医疗、政治改革、经济参与等等，无一不被纳入他的思考、批判和评析当中。

文人论政，文人论政！文人之论政是民间与生俱来的一大神圣权力，是知识分子探寻真理、褒贬善恶、评判美丑，以及张扬其自由独立意志和实现民主自由理想的神圣职能。王韬就是这样来认识“文人论政”的卓越意义的。据此，他认为，文人论政不是文人的无聊好事，而是代表民间言论自由的要求所行使的神圣权力。民间报纸是代表民间意志的“公器”，而民间报人则无可置疑地是民间自由意志的代言人。他在苦苦备述欧陆现代报刊代表民间意志，可以自由评论国家政治，干预决策，与议会政治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同时，还苦苦地向中国的专制主义者备述“文人论政”的诸多好处。尤其是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一文中，他劝导统治者应该尽快学会如何在尊重民间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理智聪明地治理好国家。

在这篇著名的时评文章里面，他系统归纳和总结了民间办报和文人论政对国家政治进步和文明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共四个方面：其一是“知地方之机宜”；其二是“知讼狱之曲直”；其三是“辅教化之不足”；其四是“指陈时事无所忌讳”。这最后一条所要求的放宽言路、准许民间自由办报，才是实现民族进步的根本。所谓“新报盛行而中国振兴矣”，就正寄予了他对国家民族自由强盛的殷切期望。

但是，由于他把开放言禁进而获取民间自由的企望寄托在极权主义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开明和恩赐上，故而这种文明前景的渺茫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对极权政治中的重量级人物，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祈颂，都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带有天生的悲剧性格。他很像但丁这样的历史人物——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第四节 体制中的导质：从魏源到郑观应

一 被“放逐”的思想者

从严格意义上讲，魏源（1794~1857）和郑观应（1842~1922）不是一个时代的人。1857年魏源怀着无限的伤感和遗恨辞别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之际，郑观应才正当弱冠之年，对这个世界尚未产生什么思想上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西方文明，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强力影响这一过程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思想“接力”的承续和发展关系。

郑观应和魏源多少有些相似之处：一则是，这两人虽然都是官方体制中人，但却又与权力中心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二则是，两人都精通外语，对西方的新思想和新知识都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求知的渴望，都属“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著名人物。只是魏源由于时代的局限，眼睛睁得不算大，而郑观应由

于时代的“进步”，眼睛睁得大了一些；三则是，他们分别以各自著述在两个既不完全相似，却又有相当的逻辑勾连的时代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结构，而这种影响中确实是含有程度不同的自由主义价值因素的。

魏源是晚清最有煽惑力的思想家之一。前面述及王韬的思想转变时，曾提到他从唐伯虎型的旧式文人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这一过程中，魏源思想和人格魅力对他的重要牵引。王韬1870年归国前在写给妻兄杨莘圃的信中回顾了他思想的亟变过程，并且自豪地宣称自己是魏源的私淑弟子和其精神财富的当然继承者和发扬者，以此来表达自己被放逐于皇朝“主流文化”秩序之外的那种“前卫”却孤独的精神状态。由此足见，他对魏源的感谢是溢于言表的。魏源虽然与官方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只是表面上，其思想却始终处于一种被放逐的状态。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革职流放，魏源的思想和他本人的处境逐渐趋于“边缘”化了。他的重要著作《海国图志》100卷，就是林则徐托付给他完成的一项重大的知识和思想工程。对外国报纸的重视，是魏源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

《海国图志》当中专门辟有报纸部分，即可见其对西方新知识和新思想的浓厚兴趣。如前所述，魏源最明显的功利目的，是“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译书始”^②，最终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如果将其放在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会看到更有价

① 学术界最新观点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有“剽窃”林则徐之嫌。甚至至于认为，魏源的思想其实根本就没有给时代贡献什么新的东西，最多不过与自由主义擦了点边。

②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

价值的部分。经世致用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应该说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精神。经世致用的核心是面向现实，注重实效。与讲究修身养性、道德自律的“内圣”精神相对应，其主要体现在治国安邦、讲求建功立业的“外王”精神。通常情况下，社会稳定，王朝强盛时，内圣之学特别兴旺；而当社会衰颓，政治危机出现时，经世致用精神就会崛起。两者相辅相成，是构成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传统的两大支柱^①。19世纪中叶始，中国士大夫中的前卫人物之所以相当一部分都迅速转变为“经世派”，并推演成声势浩大的经世致用思潮，其深隐的政治文化秘密正在于此。当时的经世派人物普遍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②，因为变是历史的必然，“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倡导以一种立足现实的理性精神，从实际效益出发，进行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这才是《海国图志》编撰的真实背景，因而，也是西方价值观，包括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之所以能博得这些经世派人物青睐的一个真实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所谓的“夷情备采”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远不是停留在林则徐那样的初始认知阶段；也不是停留在只看到学习“船坚炮利”的功利性地步。《海国图志》之所以非常关注西方的报纸功能，其深刻的用意是将其置于西方的历史、政情、社会、文化以及道德、法律和民俗等全方位进行研究和思考的。比如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就着意介绍了西方国家“广设学校”，普及国民教育，以及教育在西方文明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又如，这本书还介绍了美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3 页。

^② 见《魏源集·筹鹺篇》 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167 页。

国、英国等西方的民主选举制，以及首领任期制，对英国上下议院议事制度的欣赏。而这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歆羡，在当时先进的士大夫中不仅非常普遍，而且非常深意的是，他们是在将其与中国专制皇权的衰朽落后加以比较而表现出的一种思想情绪。尽管魏源他们在赞赏西方文明时常常用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去附会和理解，因而与西方文明所包含的民主、民权观念和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真实含义有相当的距离，但是，这种歆羡和接纳的理性姿态，无疑为西方宪政思想和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完成“本土化”移植奠定了理性的基石。

应该说，鸦片战争以后，正是因为有以魏源为代表的一大批经世派思想家渴望了解西方接纳西学的努力，才使得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知识分子走出中国封闭的文化体系，最终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向现代化转变的桥梁。19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洋务思潮，更是在接过前辈经世派思想家的观念火种的基础上，将这种向现代化的转变向前大大地推进了许多。当时的洋务派人物，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僚，到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知识分子，都是在洋务运动的旗号下，公开宣传西方科技知识和政治制度之优越，而不遗余力的。因此，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考察郑观应的思想贡献，才是有意义的。

二 思想史上的奇书与奇人

郑观应世居广东香山 出生在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像王韬等人一样，18岁以前曾醉心科举以图仕进，但由于“小试不售”即遵父命到上海学做生意。正是在上海这个受西风

熏染浓烈的商埠，他的思想和人生观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他充当买办的同时，他还潜心研究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著作。他后来投身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不仅仅是以一个商业资本家的身份，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以一个民间思想家的身份而屹立在这段历史中的。郑观应最有历史影响力和煽惑力的重要著作，是其在 1894 年刊行的《盛世危言》。这本堪称思想史上的奇书，不仅在当时影响了许许多多的维新派人物，而且在以后的历史中它还影响了许许多多的激进派人物，像孙中山、黄兴、邹容、陈独秀、毛泽东等，都受到过它的强烈的思想冲击。《盛世危言》是围绕着被经世派人物青睐有加的西方议会政治的角度来大谈西方报刊自由主义的若干好处的。在该书中他专辟有“日报篇”来集中介绍西方的报刊体制及其功能优长，并大声呼吁，欲变法图强必须允许中国民间自由办报：“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各县设报馆^①；为什么呢？因为民间自由办报的好处是相当多的：“夫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子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阎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② 报纸的社会功能是如此的大，“若欲富国

①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

②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

强民，舍此而无它！”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盘点模仿西方办报的益处：“若夫官家之鬻笑，京国之传闻，各国之约章，列邦之强弱，战守之情形，时务之缓急，物料之价值”，总之“凡益于国计民生、日用行为，性命身心者，则无不录，录无不详”^①。在这里，他所提到的有益于“性命身心者”更有着西方民权主义意义上的自由理念，而这种以充分尊重每个公民“人权”的法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是绝对没有的。当然，郑观应竭力鼓吹办报，表面上看似乎处处都紧贴着变法图强的“时代主旋律”，其实详加分析，却不难发现其隐匿着的自由主义企图。他认为，允许民间广办日报的前提必须是设立议会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报纸是“泰西民政之枢纽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而设日报的第一大好处是民隐悉通，民情悉达。但其终极目的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人人可以参政议政，可以自由发表于国家有益的各种意见。且看他对西方，特别是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政治的赞美，足见其何以对民间办报抱以那么大的热情。他写道：“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每有举措，询谋金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②，“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③。他指点说，在保证议会制度的推行和具体操作中，民间办报言路畅达是不可缺少的一翼。所以他称颂道：“日报与议院，公议如秉炬”——观点的公开和自由的论辩，才有可能产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的奇效。

①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

②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③ 参见《郑观应集》上册《易言》。

应该看到，即使是在魏源那个时代，经世派思想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其眼界和思想就已经突破了对西方的器物惊叹与激赏的层面，而透视到西方的“道法”的层面。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详细介绍了英美的议会选举制，而且还深刻地觉悟到，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才最终产生了“船坚炮利”的奇效。那个时期，有此觉悟境界的思想家还不在少数。如徐继畲就在《瀛环志略》中专文详述了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创立民主选举制的动人事迹，而且还对英国上下议院议事制度感佩不已。他称叹道：“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再如梁廷相，他亦在《海国四说》中对美国民主政制大加述评。称誉其为“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未有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这些超前的思想觉悟无疑都隐含着他们对中国封建皇权政制的忧虑和怨忿。因此，这种源于思想和智能的痛苦到了郑观应时代，就更其深重了。他之所以向皇朝当权者大声疾呼准许民间自由办报，确实是为了借此仿西方政制而成为英式的君主立宪国。他还这样劝诲当权者要学英、美，不要效仿日本对新闻的约束：“日本无郡不有日报馆，惟禁报馆要言，以肃观所；英、美、比三国无禁报馆言事之条。”^①他还说，中国现今没有“报律”，可以将英国和日本的“报律”作为借鉴，以资取舍。为此他特意将其翻译出来呈献给光绪，希望能制订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报律”。郑观应认为，报律只能是合法规范新闻健康发展的保障，而不能是闭塞言路的借口和手段。故而，他写道：“至各省及都会之地，其日报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

^① 以上所引皆见《盛世危言·日报上》。

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偶摘细故，无端封禁。’^① 尽管碍于当时的政治情势，郑观应将开言路定是非系于皇上一人，但是，他希望通过创办西方式的报刊格局，去影响和冲击僵化板滞、野蛮腐朽的专制政体。在这种思想努力中，他们包藏的自由主义企图是不言而喻的。在《盛世危言》中，他还着重提出了“明义理以伸公论”的带有自由主义理念的观点。“盖新闻者，浅近之文也，增人智能、益人聪明，明义理以伸公论，俾蒙蔽欺饰之习一洗而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秉笔者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之分，是非自见，必无委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不疑；论事者可以之为准则，办事者即示以为趋向，使大开日报之风，尽删浮风，一秉直纯。主笔者，采访者，各得尽言无隐，则其利国利民实以无尚之也。’^② 在这段著名的议论中，我们显然可知，他所期待的“日报”其实就是西方大众化报纸，特别是那种“严肃报纸”。这种报纸不仅是社会各阶层每一个人都与之利益攸关的“高尚报纸”，而且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家的巩固和繁荣主要是依靠启迪民智、尊重民权、关注民生，而绝不是依靠专制暴力——这无疑是“明义理以伸公论”的第一层意思。其第二层含义是“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其实表述的无非是西方与政党报纸不同的那种“独立报纸”的性格。所谓“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就是享有独立表达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因为，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看来，只有这种报纸才是新闻事业的合法成员，而政党报刊没有这种“合法”地位，所以它们不可能

① 参见《盛世危言·日报下》。

② 参见《盛世危言·日报上》。

“据事直书，实事求是”，并进而得到公众的信任。郑观应所说的“民信不疑”，说的就是“独立报纸”的合法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郑观应时代，各政治派别操纵的“党报”相互攻讦谩骂，编造歪曲事实已成为一大痼疾，因此，他的这种立足于自由主义的提醒和告诫，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观念指导意义的。

第三章

维新派报刊思想中的自由主义要素

第一节 维新派报刊思想与实践的认识论背景

一 自由主义谱系中的维新报刊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皇权系统中的所谓

“顽固派”与“洋务派”同时遭到战争失败的沉重打击——这不仅充分暴露出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腐朽和不堪一击，同时亦毫不留情地宣告了洋务运动及其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彻底失败和终结。在这样一种万分危急的情势之下，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自然成了填补洋务派留下的思想空缺的政治主角。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维新思想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起即已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中上层官僚以及民间知识分子中开始传播，但是，其作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政治革新运动，当是由甲午战败所诱发的。这个时期，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成了继洋务运动之后深刻震撼中国政治文化古老体系的又一次全新的启蒙运动。在推动维新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报刊的作用得到了以康、梁为领袖的维新派的极度重视和推崇。1895 年 8 月，在经过紧张的筹措之后，康、梁等人主办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等人创办的那张《万国公报》不是一回事——笔者注正式在北京创刊。这张报纸的问世，不仅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件大事。

《万国公报》后来作为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的机关报，更名为《中外纪闻》，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面旗帜。1895 年 10 月，康有为赴上海敦促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将刊布报纸视作维新派亟需做的四件“要事”之一。翌年的 1 月正式出版该会机关报《强学报》，与《中外纪闻》遥相呼应，紧密配合，形成宣传维新派变法主张的强大声势。尽管这两张完全依照西方政党报刊而创办的政治报纸很快就在顽固派的钳制手段下被查禁，但是，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政治派别主办的机关报，却标志着中国政党报刊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896 年 8 月，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成了重集结维新派力量的一面新旗帜。《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联名发起创办，不仅其办报力量较前更为雄强，而且办报经验亦更加丰富，宣传艺术亦更加圆熟。在这张政治报纸上，他们致力于用“报章体”大力宣传改良思想，鼓吹变法维新，由此开创了中国的“政论文体”，即“文人论政”继王韬之后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尤其是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文采风流，言动朝野，“一论既出，万人争读”，成了当时报刊文章之思想和文采典范。在主编《时务报》的同时，梁启超还对《知新报》、《湘报》等维新派报刊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并在许多维新派报刊上撰文，普及新知识，传布新思想。报纸之功能和效用在这时得到了自王韬等人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发挥，其在先进士人和开明官僚当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该报“数月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1897年冬，梁启超在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干预下愤然辞去《时务报》主笔一职，离沪至湘任时务学堂教习，这张报纸虽改由汪康年主持，但其锋芒和气度已大不如从前。待1898年8月汪将该报更名为《昌言报》，直至维新变法流产，其影响力日渐衰微。

但是，《时务报》在中国政治文化史和新闻思想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却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在《时务报》之鼓舞和示范下，仅从1896年8月到1898年8月这两年间，国内创办的维新报刊就多达70余种。这个数字比此前国人所办报刊之总和还多40余种！由此形成了近代以来国人办报之第一个高潮。这期间，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之维新报刊除《时务报》外尚有《新知报》、《湘学报》、《湘报》、《国闻报》等。

《新知报》创办于1897年2月，是康有为与澳门富豪何廷光动议所创。由于该殖民地为皇朝势力所无法管制，因此臧否时政、评析国事比较自由放胆。正式出刊前，梁启超还亲赴澳门

细加指导，并特地为该报拟定了章程，同时还积极应邀兼任撰述。这份刊物从版式到内容都完全仿照《时务报》，尤其着力于言论，而且远比《时务报》大胆和尖锐，凡《时务报》不便刊行之消息和言论，都拿到它的版面上去传布。和《中外纪闻》、《时务报》一样，这份刊物非常重视译介有关西方政治体制的“常识”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立宪法”、“开国会”以及三权鼎立等大肆鼓吹。继《时务报》之后，该刊成了改良派在国内最重要的舆论机关同时也是传播西方报刊自由主义思想的重镇。

《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1897年4月在长沙创刊。这不仅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份近代报刊，而且也是该省有史以来第一张自由主义倾向的报刊。本来，湖南地处中国内陆，长期闭锁保守。后来，由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领袖人物将其视作一旦亡国后的复兴基地，因此，在当地大力宣传西学新政，使该省一跃而成为全国的思想革新典范。《湘学报》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问世的。这块维新派的思想阵地，先后由江标、黄遵宪和徐仁铸督办，以长沙校经书院之名义发行，唐才常等人任主笔。尽管该报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但在中国政治革新史和新闻思想史上的贡献却是不容忽视的。

《湘学报》的撰稿人多是长沙校经书院和时务学堂的年轻士子，他们在鼓吹维新变法的同时，更着意推举传播西方各国的民治政体、伦理法律、历史地理、贸易外交常识等，而且也刻意选载不少国内外报刊上的新闻与言论，适时地为维新运动提供思想武器。“尤其是从1897年7月到1898年5月这段时间，‘立论处处注射民权’……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思想理论先导。”^①

紧紧尾随《湘学报》而崭露锋芒的《湘报》于1898年3

^① 参见《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89页。

月创刊。由时务学堂负责人熊希龄任总董，董事成员有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唐同时亦担任该报主笔。这张报纸和《湘学报》一样文字尖锐，议论激烈，是当时最有自由主义民权个性的热血读物。该报所刊发的大量文章，以极大的热忱歌颂西方的君主立宪政制，抨击中国专制极权统治，尤其是对西方民权平等观点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湘学报》大声疾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湘报》即大声响应：“权也者，我与王臣卿相共之者也；国也者，非独王侯卿相之国，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国也。”其对西方“公权于民”的政治体制简直充满无限的向往。值得注意的是，在湖南这样的皇权政治根深蒂固的守旧之区，《湘学报》和《湘报》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一开始就受到代表极权政治右翼的顽固派的野蛮反攻。在这场尖锐的政治遭遇战中，唐才常可能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牺牲的自由主义烈士。

几乎同一时刻，北方的维新志士在天津创办了声名赫赫的《国闻报》使之成为了又一个宣传新政的自由主义重镇。《国闻报》始创于1897年10月，创办人为中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以及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育才学堂总办夏曾佑、内阁中书杭辛斋等维新派名士。毫无疑问，严复是这批开明官僚的当然领袖。《国闻报》在创刊号的《缘起》一文中即以自由主义自我期许。它公然声称要“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将自己办成一张类于西方社会的“高级报纸”。该报在内容与版式上都尽力仿照《申报》，但其风格特点独具。尤喜运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阐释历史和时局，对西方政治、文化和哲学著述的译介更投注了极大的传播热情。戊戌政变发生时，该报以独立无惧的新闻姿态，毅然披露专制极权的阴谋和血腥真相，在当时的国内报刊中可谓绝无仅有。

二 悲怆而艰难的思想接力

在维新运动的策动和引领下形成的第一个国人办报高潮中，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挟西学的强劲东渐之势，更得以在中国的开明官绅和先进知识分子中广泛传布。但是，假如我们从认识论的视角去考察，就会知道，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志士其对西方的理性认知，不仅与魏源等先驱人物拉开了相当的思想距离，而且甚至与王韬等启蒙思想家也有质的不同。也就是说在怎样认识和对待西学，亦抑是怎样认识和对待西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这个问题上，魏源等人也好，王韬等人也好，他们其实都未真正迈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或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牢笼，而根本不可能像康、梁和谭嗣同、严复那样，在凌厉批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短视和保守、荒唐中，真正树立起理性的思想接力的坐标。

我们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曾客观地评价和肯定了魏源在译介和传布西方的宪政思想、民主民权观念，以及自由主义报刊理念方面的理性努力，但是，从哲学，特别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衡量，就会发现魏源等人的严重思想局限。尽管从哲学上他能意识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不断变易的，因而有“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①的沧桑感喟，但是也却迷失于“干尊坤卑，天地定位，……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②——“不变者道”的荒唐和浮浅。睿智如魏源这样的先驱人物，何以竟深陷于如此矛盾悖反的尴尬

① 参见《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

② 参见《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十一》。

境地？原来，究其所以，是早期的洋务派思想家在“道”与“器”；“道”与“气”；“道”与“势”的关系问题上，一直没有迈出传统哲学观念的囿范。在魏源的认识系统中，构成事物的基本物质元素“气”，以及作为时代发展趋势的“势”，当然是可以变，因此，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政制以革新再造旧邦，然而，要命的是，他认为作为封建极权政制维系的纲常伦理之“道”，是绝对不能变的。这种“势变道不变”的典型观念，作为深层的哲学意识，不仅左右着洋务派的认识高度，而且也严重窒息了他们的思想生命力。即使后来的王韬、薛福成等人对西学的认识，以及他的政治主张都较魏源等人有相当的长进，然而，他们同样也未从根本上超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羁缚。否则，王韬就断不会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的话；郑观应也断不会宣称：“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①——“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②当然，郑观应毕竟不完全等同于王韬，他在认识论层面上亦有相当的“跃进”——尽管他一面为“器可变，道不可变”所框束，但是一面又居然暗持怀疑主义的态度。他说：“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③他的意思是，既然道与器的关系是密不可分，那么，西方的科学技术，“船坚炮利”怎么能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截然分开呢？你皇朝希图强大，怎么能舍本而逐末呢——“合之则本末兼赅”这不是明摆着的简单道

①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

②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

③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

理吗？事实上，正是郑观应等启蒙思想家的这种怀疑和诘难，才为其后维新人物在更大胆全面地接纳包括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在内的“西学”指出了一条走出牢笼的理性大路。哲学上的道器、体用之争必然深刻地反映到现实的政治文化取向中来。维新派虽然和洋务派一样，也非常专注于启蒙救亡，但由于前者在认识论上已突破了“器可变，道不可变”的牢笼，因此不再愚蠢地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恰恰相反：以西学为“体”。这种全新的价值取向，在维新领袖康有为的大量言论中表现得极为显豁。他针对洋务派的肤浅保守说道：“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①——变器而不变道简直愚不可及！而谭嗣同和严复更深刻而缜密地对“道器”和“体用”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述。谭嗣同指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②严复与谭嗣同的见地简直是不谋而合，他指出，政教与学术、民主与科学的不可分割，就如同“体用”不可分割一样，“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③，我们怎么能够“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大滑稽吗？

正是因为他们“道器”、“体用”关系上作出了远比魏

^①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参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十五，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1页。

^② 谭嗣同：《兴算学议》，参见《谭嗣同集》上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6页。

^③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参见《严复诗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第59页。

源、王韬和郑观应等人更符合逻辑的理性努力，所以，他们在迎纳“西学”时就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认识水平上。康有为宣讲道：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完全是由于立宪法、开国会实行三权分立带来的结果，这才是人家的富强之“本”。谭嗣同亦非常不客气地指出：学船坚炮利仅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根本者何？西方的“良法美意”也^①！意思是说，学西方的“法度政令”，才是聪明和理智的选择。严复更尖锐地将奚落的锋芒直指张之洞说：“西艺实为西政之本”，你不学习和接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只学习和接纳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头来难免竹篮打水一场空^②。必须指出，康、梁等维新思想家正是由于在认识论上彻底解决了“道器”、“体用”争论中最关键的问题，因此，他们大力提倡办报，并且能真心实意地在实践中宣传和贯彻西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确是从哲学层面上获得了强大的支持。以往治新闻思想史时，许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实在是不该得很。

第二节 中国的马丁·路德——康有为

一 立宪政治与党报思想

作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康有为在接纳

^① 谭嗣同：《兴算学议》参见《谭嗣同集》上册第160页。

^②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严复诗文选》第87页。

和引申发挥西方宪政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并继续促进其“中国化”转变过程中的贡献是相当重要的。当然，康有为转述和实践自由主义原则时，并不只局限在办报这方面，而是广泛贯彻在他所组织、领导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当中。因此，这就提醒我们，在考察和研究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报刊活动时，必须把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都拿进来作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惟有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住他们的精神主脉。刘军宁先生有个了不起的发现，他说，现在人们很少把康有为与北京大学联系起来，但这个人正是北京大学的催生婆^①。也就是说，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形成，是与康有为分不开的。岂止如此，假如我们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和探究，同样会发现，康有为掀起的改良主义运动，的确是影响中国现代历史的自由主义运动有着渊深的精神联系的。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今属海南省)，祖父赞修，为连州教谕，治程朱理学；父初达，曾任江西补用知县。有为幼孤，先后从番禺简风仪学经，从祖父学诗文。年十九，乡试未取，就学于同邑朱九江潜心研习程朱、陆王之学。1879年入西樵山、居白云洞，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攻佛道，“哀物悼世，慨然以经营天下为志”。就在这一年，康有为初游香港，思想产生了重大转折。他涉猎西学，认为西人治国有法度，因而对西方的政治制度非常神往。1882年，他应顺天乡试，游京师，路经上海。购买和研读了更多的西方政治学术典籍。1884年冬始，他独居一楼，“悟大小齐同之理”写成《人类公理》，此为日后的《大同

^① 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页。

书》之雏形。1888年，再游京师，因受马江战败之刺激，愤而发声道：“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引不治……势无及矣”。1889年冬春之交，与四川廖平会晤，受其启发，写成《新学伪经考》。1894年，甲午战败，朝野震动，第二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鼓动各省来京会试的举人数千之众上书，请求皇上下诏变法，自此成为声名显赫、影响广远的维新派领袖。其后，他不仅以著名的维新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且还以著名的报刊政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新闻思想史的册页中。

康有为从事办报的具体工作并不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办报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1895年创办《万国公报》和1896年指导创办《强学报》期间，前后不到半年。当然，他还参与后来的《时务报》创办活动，但梁启超此时影响已逐渐盖过了康有为。故而，《时务报》简直成了梁启超的另一个名字。

康有为的办报思想，如果仅仅着眼于他的一些专门就办报而发表的意见，很容易得出与自由主义思想相左的观点来，所以必须参证其最重要的一些政治学术意见，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可靠的结论。

毫无疑问，康有为的办报思想曾受到过西方政党报刊意识的影响，因此，他在很多有关办报的议论中，对创办政党报刊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在创办《万国公报》之际，他就是将这张报纸作为机关报来期待的。事实上，该报正是担负着这种宣教使命，为康、梁组建政党组织“强学会”奠定了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是把报刊作为政党或政治组织、政治派别的舆论宣传工具，即西方政党报刊的那种价值功能来看待的，因此多少与王韬等思想家心仪的西方大众化民间报刊的情形有所区别。早在“公车上书”流产

后，他就萌发了“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①的组党意识。1895年他在草拟《强学会章程》时，更着重把“刊布报纸”、宣传党义视作强学会的四大工作重心之一。其后，又在《国民宪政会简要章程》中强调所有组织成员，都必须关注党报的宣传内容，但他同时又颇有感喟地写道：“政党之权利之大而专，实为可骇”，而且不无忧戚地预言，随着党报宣传的普及，“则吾党众愈大，将来所得之权利，不可思议。”^②需要辨明的是，康有为的党报思想更多的是建筑在立宪政治前提下的西方式的党报观念，而决不是日后以国民党为典型标本的极权主义统驭思想背景下的“党报思想”——因为，组党、办报、参与议会政治，才真正符合康有为的政治理想。所以，这一区别相当重要。

二 立宪政治与官报思想

除贡献党报思想而外，康有为还有一种“官报思想”。这又与他从醉心立宪而跌入保皇的窠臼有极大关系。早在“百日维新”时期，他就曾奏请将《时务报》更名为《时务官报》，并建议设官局来管理各省报馆，“希望利用官报的宣传来统一思想，清除阻力，甚至考虑到了变法成功后的‘舆论一律’问题。”^③尤其可笑的是，在奏请中，他还建议采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做法，先设“官报局”，而且还将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世界报》和法国的《巴黎时报》这样的大众化

^① 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② 参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页。

^③ 参见《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150页。

民间报纸，硬说成是国家设立的“官报”。他所谓的官报具体来讲，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即功能和作用呢？在《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里面，他是这样描述和阐释的：首先，“一依西报体例”；其二，“其中论说，皆按切时势，参酌中外，切实可行”；其三，“所译西报，详言兵制学、农矿、工商各政，条理粲然”。应该说，康有为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他的确是希望办西方那样的报刊，宣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科学技术知识的“良美”；但另一方面，他又深受中国士大夫忠君报国传统意识的陶染，虽醉心君主立宪，然而又摆脱不了皇权大一统思想的深度干扰。结合他在解释“党报思想”时所说的，是为了达到“发明大义，鼓舞大众”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与“官报思想”所要达到的“以崇国体、广民智”的目的颇为一致，就不难发现，“党报思想”最终是统一到“官报思想”那里去的。这两大重要的“办报思想”又必然牵引出康有为的新闻控制与报业管理思路。当然，他设计和期待的决不是专制极权治下的新闻钳制与报业管治图式，而是类似英国君主立宪治下的开明的新闻控管图式。就这一思路，他提出过许多建议和主张。除前述设“官报局”便于统一管理舆论外，他还上奏过《请定中国报律折》等多篇建议。他呈述道：“惟有当开新守旧并立相轧之时，是非黑白未有定论。臣以疏狹卑微，忧时迫切，昌言变法，久为守旧者所妒嫉，谤议纷纭。”又说“然他日或有深文罗织，诬以颠倒混淆之罪，臣岂能当此重咎。……臣查西国律例中，皆有报律一门，可否由臣将其节译出，凡报单中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能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康有为对西方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新闻自由一直很神往。他有感于在没有法律保障的中国，自由随时受到顽固派官僚政客的攻讦陷构而苦不堪言，因此，

他的这个建议，不仅在法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史而言，其意义也是不容小觑的。值得庆幸的是，康有为的奏请很快被光绪皇帝批准，并责令其草拟首部具有西方政治法律风范的“中国化”的报律；不幸的是，由于变法的失败，光绪被囚禁，他苦心经营的这部报律也自然成了一迭废纸。

如前所述，康有为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一些意见，更集中地还是凸显在他的学术著作或者奏疏当中。当然，学术表述比较艰深，不如奏疏那么直捷了当。

康有为特别醉心的是鼓吹西学中的政治法律制度，他认为要把这个“本”拿过来，否则中国的变法不会有更好的效果。因此，“行宪法”、“开国会”，实行“三权鼎立”才有可能奏效。最著名的是在《请定立宪开会折》和《上清帝第四书》中的那些精彩的意见。他写道：“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按指立法、司法、行政——引者注）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惟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今变行新法，因为治强之计，然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①对中国专制政体在奏折中如此放胆的批评，可谓前所未有的。他还借批判、奚落洋务派的浅薄之机，称颂政治体制的改革：“今数十年诸臣所言

^① 参见《请定立宪开会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页。

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方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① 这些政治改革意见，他索性都具体归结到学习西方“讲法立政”、“立科以励智学”和“设议院以通下情”等操作层面上来。为了证明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天经地义，他还刻意从中国传统的典籍中寻找支持。他甚至认为立宪法、开国会等，不仅非常合符圣人之道，而且与“春秋之义”暗合，是中国本来就有的东西；他还解释说，孟子的民本思想，其实属于“国会之前型”，“春秋改制，即立宪法”。这种解释确实太牵强了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下，亦可见他的策略和智能。

康有为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议论，最系统地还是集中在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大同书》等政治学术著作当中。

在《新学伪经考》里边，他机智地运用今文经学的观点方法，并传承龚自珍、魏源的思想薪火，结合变法的需要，论证和暗示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学”，是“伪经”而非圣法，必须坚决抛弃。在《孔子改制考》中，他又通过论证孔子的“托古改制”，说尧舜、文王均是孔子改制假托的“民主君主”，其人其事大可不必相信。他还把“公羊三世”之变易思想与西方的历史进化论联系起来，以证明封建专制制度必然是要“进化”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再进入到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人类社会不过是从“据乱世”而到达“升平世”，再到达“太平世”。而“太平世”，在他看来，就是最合其理想心意的“个人自由”和“一切平等”的至高境界。他还认为，孔子既主张

^① 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0年版，第 215 页。

“行君主仁政”，更主张将来“行民主之太平”。也就是说，他最憧憬的并不完全是君主立宪制，而是被其神圣化和审美化了的西方民主制。

《大同书》更集中地描述和阐释了他的这种政治和哲学憧憬。可以说，康有为最具有自由主义理想光芒的就是这部不朽的著作。他以西方的自然人性论为依据，对程朱理学的“义理之性”大加抨击。同时，以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学说为武器，尖锐批判了封建极权主义治下的种种非人性、非理性的罪恶。他梦想的大同世界应该是这样一种充满着自由主义温情的世界。在那块“伊甸园”里，“人人平等，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无有教主教皇”；最令人神往的是，在那里，“公政府只有议员”；“议员皆由人民公举”；“大事从多数决之”……他特别提醒道，在大同世界里，“个人自由”、“一切平等”才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离开了这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的原则，大同世界也就失去了灵魂和旗帜。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使他与前辈思想家一下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特别是其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早期的经典文献，《大同书》所具有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的高度，在此前是从未有过的。《大同书》的自由主义要害是：个人自由的原则。即自由的个人有权不服从任何专横的外力强制；在自由的关系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主义与民主制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必须限制任何政治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也就是说，康有为报刊思想中的“官报思想”和“党报思想”，甚至包括新闻控制思想，都仅仅是着眼于推行君主立宪时的“阶段性”思想和政治策略，并不是其思想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可以断言，《大同书》中的种种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畅想，才是他没有具体表达出来的“报刊思想”的最精粹的部分——由于政治实践和思

想憧憬的严重脱节，才使得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尴尬之中。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他的弟子梁启超后来终于将他想说的全都说了出来。梁启超曾把康有为比作马丁·路德那样的历史人物，应该说是非常有见地的，但毕竟是悲剧的^①。

第三节 激进派自由主义烈士——谭嗣同

一 悲剧哲学家的“民史”思想

谭嗣同是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悲剧英雄，同时也是最具有自由主义独立意志的启蒙思想家。与相当多的维新人物截然相异，他的报刊思想中始终充满一种浓烈的激进主义气息。当然，这又与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中的激进主义色彩是相一致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先生是这样来评价和回味谭嗣同的悲剧表现的。他写道：“谭嗣同是近代中国解放思想的

“康有为在思维的深层把握上，虽然尚未认识到作为资本主义精神背景的西方基督敎义的转换对现代的巨大支配作用，但确实已经感受到奔涌而来的利甲锐兵表象之中，跃动着一种奔腾不息的宗教理性力量，这种宗教理性力量是新生代知识群体对抗政治王权的精神土壤。康有为朦胧地认识到，西方宗教精英作为独立势力的崛起，经过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之后，日益成为独立于政治大系统之外的精神监护人，成为控驭王权，呼唤工业文明喷涌而出的文化预言者。”他的确希望自己能营造出一种独立的“宗教意识形态”，以便崇敬教主之神威，领时代之风骚，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参见《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第131页。

一个典型。他的思想不太成熟，词意之间充满悲怆凄厉的气氛，又有一股湖南辣子味冲鼻而来。他的壮烈事迹托起他不太成熟的思想摄人注意。自谭嗣同以来，烈士们是拿热血当论证的……谭嗣同在这里所展现的，是无穷反复，狂风夜吹古月，英勇直前而又回荡不已，横决一切以至空无定着的冲动。显然得很，他这股子劲是我佛悲悯之情透过这个人激越的性格而狂涌出来的……这种激动与理智毫不相干，但是，它却有助于制造‘慷慨赴死’的烈士感。”^①殷海光的评点虽有种枝刻的意味，但是他的这种裁断应该说是比较真实而准确的。谭嗣同的这种“烈士感”，在日后接踵而至的道德革命和政治革命运动中，最能诱使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个性解放和意志自由时获得某种浪漫的刺激和满足。毫无疑问，这种“烈士感”也必然贯接到他的报刊思想中来。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于官僚家庭。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少时从欧阳中鹄学习，鄙视科举，好今文经学，仰慕颜元、龚自珍等思想家，最喜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1883年随其父赴兰州攻《墨子》；“初怀摩顶放踵之志”；1884年入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府，时中法战起，愤而作《治言》，始有变法救国思想。1893年，28岁，旅迹上海，结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从而读了大量的西学著作，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其深受刺激，于是更发愤提倡新学，呼号变法。1895年，在业师欧阳中鹄、友人唐才常襄助下，成立算学会。同年夏天，在北京强学会与梁启超晤

^①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3 ~ 284 页。

面。梁转述康有为“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因之“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① 1896年在天津与民间秘密结社“在理会”发生联系；4月，在北京拜谒翁同龢和藹畅谈洋务；6月，到南京，以一年时间写成一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仁学》，提出“以太”——“仁”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尖锐剖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号召“冲决一切网罗”——这部戊戌变法运动的宣言书里面隐藏着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观念。这一年他还曾打算在汉口创办《民听报》，未果。1897年初重返南京，与杨文会等倡设测量学会。同年回湖南，与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发起创办时务学堂，并另设南学会。自此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和思想核心人物之一。谭嗣同的报刊活动以及一些重要的报刊思想言论，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极其短暂的时期中。1898年，“定国是”诏下，扶病入京，被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同年8月3日走访袁世凯，授其机密；6日，因袁告密，被囚系死牢，13日与杨深秀、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弟一同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是通“民口”和“民史”这两大主张而反映出来的。其中尤以《湘报后叙》最引人注目。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他指出：“报纸，即民史，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谍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而徒专笔削一己之私，滥褒诛于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谥之曰官书，官书良可悼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

^① 参见《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二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2页。

其将长此汶汶暗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此番议论完全与康有为的“官报思想”和“党报思想”大异其趣。如果说，康的办报思想主要还局限于将报刊视为政党宣传工具和官方舆论工具，而将其自由主义向往完全遮蔽了的话，那么，谭嗣同的“民史思想”无疑已经彻底冲决了“工具论”的牢笼，而且具有更显明的自由主义风范。在他看来，报纸不仅不是旧式起居注之类的、系于一己之私的“官书”，而是植根于民生、民权基础上的“民史”。民史者，“民之生业”、“民之教法”、“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等等，总之与民众生存与发展有关的一切，都必须忠实地记录和反映在里面。

然而，忠实地记录和反映民事，还不够，还应忠实地访察和反映民意，只有这样，方能确保民权。因此，在《湘报后叙》中他又阐发道：“人与禽兽灵愚之比例，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以其能言耳；而喑之、哑之，其于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因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①何谓“国口”？“国口”即“民口”，而非“官口”！

二 超越工具论的前卫姿态

与严复的温和主义相较，谭嗣同称得上是 19 世纪末中国自由主义者中的激进大师。他的办报思想一如他的政治哲学主

^① 参见《湘报后叙》，《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12 页。

张一样，带有非常强烈的西方自由主义民权色彩。他坚持认为，报纸应该和只能是“民史”和“民口”，它必须自始至终站在民众和民间的立场；它必须充分反映民隐民情，运用报纸打开上下通达的民主和自由之路，而不是管制和统驭之路。他还坚持认为，报纸是衡量和实现国家民权政治的“公器”，决不容许任何专制力量打着种种美丽的幌子去钳制和御用它。

他还接过严复的思想发挥道：“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钜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可贵。”^①在他看来，开民智必须办“民报”，而办民报又必须以彰显个性解放，贯彻言论自由为其首要。惟其如此，始能抵达“公权于民”的民主社会和自由主义的至真至美至善境界。就报纸的功能特性，他还发表了居于启蒙立场的精彩议论。他说，学堂、学会和报纸是开民智、兴民权的最佳方式，但前二者都不如报纸影响广远。“学堂之所教，可以传于一省……书院之所课，可以传于一省”，然而都远赶不上报纸的巨大威力：“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特别是“不徒一省然也，又将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之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而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乎其间无憾矣！”^②区别于康、梁的是，谭嗣同所期待的报纸，不是康、梁工具论意义上的“官报”和“党报”，而是具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内涵的、真正独立于党派、代表民意的“民报”。当然，他的那些大逆不道的自由主义主张，主要集中在通过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强烈地表达了出来。和康有为不谋

^① 参见《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下册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36 页。

^② 参见《湘报后叙》。

而合，谭嗣同也曾就“道器”、“体用”关系问题作过相当精辟的阐述：“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尤其可贵的是，为了说明民主、自由、平等这些西方政治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原则具有举普适性，而绝不能以中国国情特殊而妄加排拒，他又说：“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以私诸中国则大不可。”^①

与康有为极为相似，谭嗣同把他的“道器”观，同他的进化论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尽管他的“逆三世”与“顺三世”历史观相当神秘，但是其愤激的字里行间奔溢而出的，却是非常鲜明的民主政治意念和自由主义信念。他提示人们：生民之初，哪有什么君主？不过是为了办理公共事务的需要，人民才“共举”了某个人为君主。既然君主是由民所共举，当然民为本，君为末；君主办不好事，民当然可以“共废之”——“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② 请看，他的这番议论不是与西方的民主选举制相当一致吗？他还解释他的“顺三世”说，即由君主专制进到君主立宪，再进到民主共和、世界大同。他坚信这是人间正道，天下公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甚至使之逆转！苟有敢阻碍者，当以冲决网罗的壮烈气概将其践踏之！

谭嗣同的历史进化观中尽管蕴涵着强烈的自由主义信念，但是也蕴涵着同样强烈的激进主义情绪和意志。正是因为这样，与严复不同，他非常欣赏暴力革命。在《仁学》和其他的著述中，到处可见他对暴力手段的审美激赏和期盼。他非常赞

① 参见《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上册 第 251 页。

② 参见《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 第 124 页。

赏法国大革命，认为在中国只有通过流血和恐怖，才能彻底冲决专制主义的羁绊，从而迈进民主共和与世界大同。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与王韬反暴力的渐进主义拉大了思想的差距，而且与严复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大异其趣。因此，使他的自由主义精神似乎显得不那么纯正和道地——这恐怕就是殷海光惋惜他“不太成熟”却又格外“摄人注意”的根本原因吧！

不仅如此。谭嗣同还在《报章文体说》中，为王韬提倡的“文人论政”思想提供了更为系统坚实且具有操作意义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后世那些有志于社会革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更为自由的表达形式。

谭嗣同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在维新思想家中自有其不可逾越的高度，即使这些思想里面始终充斥着矛盾和浓重的悲剧意味，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他对中国早期自由主义运动的贡献。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贡献，才使得他以冲决网罗重重的悲剧面貌凸显在那个时代的前卫序列。

第四节 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思想鼻祖——严复

一 不是领袖而是灵魂

比之于康、梁和谭嗣同等维新运动领袖，严复不能算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贡献主要还是在思想文化，特别是哲学方面。因为这个明显的历史特征，《中国现代化史》在提到他

时是这样来描述的：“在传统格局中打开缺口，接纳西学的，应推康有为，但以中西势难两立的态度讲西学的则是严复。严复无政绩可言，戊戌时没有直接参与变法，辛亥后则拥护袁世凯称帝。但他的西学传播活动却影响深远。”^①这样的评价固然简洁明快，却也显得荒率和武断了些。当然，如果仅从报刊活动家这种身份来谈严复，也同样会陷入简单和肤浅的境地。严复的主要报刊活动，无疑是在其创办《国闻报》前后的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他针对办报所发表的一些议论，也仅限于这个短暂的时期。所以要从这个有限时段中的有限言论中去挖掘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然有诸多困难。因此，惟有把眼光拓展到他的系统的政治哲学构架中，才能真正找到。须知，严复一生中贡献给中国政治哲学史和新闻思想史的两大大命题，确实都与自由主义大有关系：一是“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二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也就是说，只有把握住“自由”和“民主”这两个政治哲学支点，方能找到严复思想的准确定位。

严复（1857~1921），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闽侯）人。严复14岁，父死，家境困窘，无力就学，时闽督沈葆楨设船政学堂，他以第一名被录取。19岁毕业，从军舰实习，周游南洋、黄海；1876年，奉派赴英国留学，先于抱斯穆德肄业，然后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深造。在英期间，他广涉西方政治哲学典籍，并对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作了深入、系统的比较。时郭嵩焘任驻英公使，曾与他彻夜讨论中西学术政制问题。1879年毕业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翌

^① 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203页。

年，李鸿章办北洋水师学堂于天津，调严复任总教习。光绪十六年（1890），升任总办。由于对洋务派的怀疑和失望，他一度幻想经由科举之途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36岁到41岁，几次乡试均告败而归。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他深受刺激，次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惊世之作，宣扬“尊今叛古”、“尊民叛君”。此后，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维新变法提供有力的思想和哲学依据。1896年，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大倡西学，培养具有自由主义精神信念的维新人才。1897年，在天津与王修植等人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借“通中外之情”的名义，宣传普及西方的学术、政治思想。“百日维新”时，经王锡藩所荐，受清德宗召见，嘱以抄呈《上皇帝万言书》。这是严复一生中最为积极意义的政治活动。1898年，“六君子”死难，他不仅主持《国闻报》义无反顾披露了死难真相，而且还客观报道了康有为脱险的经过，并作《戊戌八月感事》诗，有“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的悲悼和自励。《国闻报》被查封后，通艺学堂并入京师大学堂。因此，严格意义上讲，严复称得上是奠定中国大学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人物。1911年辛亥革命后，严复开始走向与时代“反动”的悖谬之途。但是，若从1898年算起，到1911年这13年间，在译介和传播西方政治学术思想方面，其贡献无疑是卓越而耀眼的。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推动历史前行。1902年，出任北京编译局总办；1905年，在上海襄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等。1921年，走向“反动”的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监督，次年又被委任为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4年，袁解散国会，召开约法会议，严复当了议员；1915年，与杨

度等人合伙发起筹安会，劝请袁世凯称帝。1917年到1921年养病闲居，最后在极度的政治落寞和梦幻中逝去。

严复是从封建士大夫艰难转型为当时为数极少的新型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他既熟谙中国传统的经籍，特别是政治学术，又非常了解西方的人文体系，特别是政治法律，因此，深刻懂得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这表明，他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理念的理解和体察，胜过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先进分子。《天演论》的译述，其最大的贡献是为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尽管他在当中巧妙地参会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变易观，使其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更容易为中国的革新家和士大夫阶层所接受。严复另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是传布科学的思想方法，即经验论哲学。这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对立的。他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全在于其行为是以科学和理性为指导。比之康有为等人，他不仅视野更开阔，而且更切中西学之本源。严复最富有自由主义激情是在维新时期。虽然他没有直接楔入权力中心参与变法，但是他的思想鼓动力却大大胜过了那些风头甚健的维新领袖人物，因而成了维新运动的真正灵魂。严复认为，启蒙思想家和维新政治家要完成的三大任务是“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而要完成这三大任务，又必须唤醒中国民众的自由意识，并进而形成自由意志。他阐释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为教者。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其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①他意思是说，个人充分享有自由，国家才是自由的国家；个人没有自由，国家也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参见《严复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页。

必然不会是自由的——国家的作用就是尽力去帮助每个人充分获得自由，而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阻挠和压制自由。

二 中国的第一部“自由主义宪章”

严复的《论世变之亟》，称得上是中国第一部“自由主义宪章”。在这篇杰出的政论中，他系统深入地比较了中西社会的人文学术，道德政治的诸多差异。他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倡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①他还进一步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那么，到底是何因造成如此对立的局面？严复的结论是：“自由不自由异耳！”

他并不像有些所谓的思想家那样，热衷于讥嘲和指斥中国普通民众“素质太低”，无资格亦享受民主和自由。他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前景还是抱有希望的，只是有深深的感喟：“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但是“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贮能，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参见《严复集》第4页。

虽摧斲而不可灭者。”^① 他还在大量的政论文字中愤怒指斥皇权专制的种种罪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非是“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引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② 他因之认为中国文明的根本出路，必在于实行西方那样的民权制度。不惟如此，他还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解释道：“合天下之私以为公”使人民“各私中国”。

假如不知道严复深藏在其政论中的这诸多的自由主义秘密，就不会读懂他的报刊思想的真正内涵。在《国闻报》的《缘起》中他声称要“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借以“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其实他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便是“以自由为体 以民主为用”！

由于对西方民主政制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严复在臧否时事、评鹭今古时挥洒自如、臻于化境，几乎时时事事都能以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念来衡度和抨击中国皇权专制治下的种种痼疾和疮痍。比如，他在《说党》一文中，居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对政党制度的利弊，特别是多党得失、一党专横有极为深入的剖析和忧虑。为此他感慨说：“党非佳物也。自国之政柄归民。而其势必归于有党，故英国某政家言：‘政党乃民权政府不可遁之恶果’。自由主义不欣赏政党政治的相互倾轧、阴谋血污，却不能不捍卫结社自由的原则。基于此，严复对英美的多党政治是持赞赏态度的。他说，“党派必为政治前途之梗，所幸门户繁多，其势有以相制，不至使一党得以专横云云……”他还说：“是故英、美治体虽相愚殊，而其政府机关几为对待之朝野二大党而设，胜者在朝，负者在

① 严复：《社会通论》按语 参见《严复集》第 123 页。

② 严复：《法意五章》按语 参见《严复集》第 147 页。

野。在朝者为之敷施，在野者为之程督，伺隙牴牾，各有报章，各有结集，在大抵务为相胜而已。”^①在这里，他对政党报刊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但明显可见他对“各有报章”的各政党将报刊当作相互对峙争胜的工具，确是持贬抑态度的。

同样，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的政论中，他接过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的思想作了酣畅淋漓的发挥。他认为，大学是培养治学之材的场所，必须严守治学与治事分开的原则，不能让任何政治势力越过它们应信守的边界，而侵染和肆虐培养自由主义精神的教育领域。教育必须独立于治事的官府和以政治为职业的政党。严复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为后来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实践“教育独立”的原则，在理论上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在暗中补足了“报刊独立”和“新闻自由”的理论依据。

客观地讲，严复的长项是在为历史进步提供锐利有用的思想武器上，办报于他来说并不内行。比如，他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对日报的作用并不重视，而独钟于旬刊，这当然与他不重视新闻，而重视思想言论大有关系。再比如，在文体写作上，他偏执于所谓的“修辞”与“尔雅”，甚至发誓要“文追秦汉”。因此，致使其原本深刻前卫的思想理念悬于“太务渊雅”，而仅能在中上层进步官僚和知识分子中传布，这就大大限制了其影响力向底层民众的辐射和冲击。显然，这又与严复一生所执着的文化守成主义立场大有关系。

严复认为，惟英国君主立宪为蓝本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是最值得中国仿效的理想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新闻界最需要锐利的思想武器和操作示范的紧要关头，他所转达、

^① 以上所引皆见于《说党》，《严复集》第235页。

发挥的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全面革新了一代知识分子和报人的政治哲学观念，尤其是他对约翰·弥尔顿和穆勒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译介，更是在中国专制主义的躯体里埋下了危险性极大的“定时炸弹”。他最痛恨极权主义者顽固坚持愚民政策，认为，惟有鼓励民间自由办报、自由发表言论，才能彻底摆脱蒙昧和奴役——每个国民都自由了，这个国家才称得上是自由的和文明的。

第五节 变化多端的自由主义 大师——梁启超

一 政治文化史上的重量级人物

与谭嗣同骁勇壮烈的激进主义风范相较，梁启超是一个变化多端的自由主义大师——尽管他在早期曾一度受到过谭嗣同激进主义情绪的影响——他不仅在思想的原创方面赶不上康有为和谭嗣同，而且在思想的沉雄和精粹方面也比不上严复。但奇怪的是他的政治哲学主张其中包括他的文学主张和新闻主张等，就其影响而言，却大大超过前述几位思想家和革新家。梁启超的奥秘在于，他在承前启后上所下的功夫、投注的情感和智能，明显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作为继王韬之后，中国政治文化史和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重量级早已有之的东西等等，似乎都是王韬、郑观应，乃至康有为旧说的翻版。但是他居于民权主义的立场，不仅对这些旧说作了新的

发挥，而且他还专门就“官报”与“民报”的本质区别，做了民主政制和带有自由主义理想色彩的理性辨析。文章中，他还特地就报人的社会定位大发议论。他认为，真正的报人（梁启超时代习惯以“主笔”来指称报人——笔者注）应该是像英国自由主义大报《泰晤士报》主笔那样的独立不羁的理想人物。他以自己系统的报刊思想理论和持久的新闻实践，使他最终成为了开一代自由主义风气的大师。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84年，即光绪十年，补博士弟子员；1889年时16岁，举于乡试。次年，随父入京，春闹不第，归道上海，于坊间购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始知有五洲各大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洋典籍多种，心焉好之。同年秋，与陈千秋交，闻康有为上书请变法不达，从京师归返，偕往拜谒，翌年拜康为师，自愿求学于万木草堂三年，助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同时读西书，于傅兰雅所辑《格致汇编》多有感喟。1894年中日战起，内心忧戚愤激。次年春，入京师，与康有为联合各省候考举子上书，请求变法。7月，北京强学会成立，任书记员。居会数月尽读该会所藏西书。同年，与谭嗣同相识。1896年，应黄遵宪、汪康年所邀，赴上海任《时务报》撰述。7月，《时务报》出刊，旋任主笔。此前，曾任《中外纪闻》主编，对办报情有独钟。梁启超为文，议论新颖，文字流畅，情感丰沛，极具煽惑力。《时务报》开办数月即飚升万余，一时成为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旗帜。后与汪康年发生龃龉，愤而辞职，抵澳门筹办《广时务报》后改名《新知报》任撰述。这期间，他还应湖南巡抚陈宝箴、臬司黄遵宪之邀，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同时上书陈宝箴，言变法维新事宜。其主要思想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其

具体主张为三点：“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讲学专以《孟子》、《公羊》为教材，倡兴民权，主变法之议。至此，天下以“康梁”并誉，一跃而为维新领袖。1895年2月，与康广仁同人京师，助康有为开保国会；5月15日，奉旨“赏六品衔”，并令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21日政变起，“六君子”遇难；7月东渡避难；10月在横滨筹办《清议报》，倡勤王，骂慈禧。时孙中山曾偕孙少白约康、梁会谈，康未到，梁态度暧昧，合作未果。1899年冬，唐才常起兵勤王，梁亦助其议。次年，唐兵败被杀。1902年创办《民报》爆发激烈论战。辛亥革命后梁搜罗立宪党人为基础，组建进步党拥袁。1916，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又与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其后与段祺瑞合作，任财政总长。1921年欧游归返，四处奔走讲学，与胡适呼应宣传自由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蒋介石上台后二年，梁启超就死了。他总算未与蒋介石合作，以学者病死。”^①

和不少前辈思想家和社会革新家一样，梁启超对办报始终怀抱一种思想激情和政治激情。早年在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遭清廷封禁后，他曾追忆说：“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及至《时务报》开办 年仅 23 岁的他，竟一人担负起全部的编撰事务。后来他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中感喟万端地说：六月酷暑，洋蜡皆化为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记当时所任之事，自去年（指 1897 年——引者注）以

^① 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出版，第 521 页。

^②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记》，《梁启超选集》第 162 页。

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① 《时务报》开办的首篇政论文章，就是梁启超充满民权主义豪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尽管他在文章中所宣讲的诸多观点，如强调报刊的“去塞求通”于国于民作用非凡；如解释近代报刊无非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东西等等，似乎都是王韬、郑观应，乃至康有为旧说的翻版。但是他居于民权主义的立场，不仅对这些旧说作了新的发挥，而且他还专门就“官报”与“民报”的本质区别，作了民主政制和带有自由主义理想色彩的理性辨析。文章中，他还特地就报人的社会定位大发议论。他认为，真正的报人（梁启超时代习惯以“主笔”来指称报人——笔者注）应该是像英国自由主义大报《泰晤士报》主笔那样的独立不羁的理想人物；当然，报人面对政府，也应是一如英国君主立宪制那样的政府：“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文稿甫脱，电已飞驰，其重之又如此。”^② 也就是说，他所理解的君主宪政体制下的报人，其社会地位与政府官员是平等的：报人在野可监督政府官员，亦可被选举进政府参政议政；官员被罢免，亦可下野办报监督在台上的政府官员。

不过，梁启超的报刊自由主义观念并不凸显在这类专门论述报刊功能和业务操作事宜的文章中。这些议论仅仅是梁启超系统而深广的自由主义理论所冒出来的冰山之一角。因此，有必要对他主要的政治哲学观念作一个基本的了解。

①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记》，《梁启超选集》第163页。

② 梁启超：《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选集》第56页。

二 “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梁启超鼓吹和实践报刊自由主义主要有这么两个时期：其一是鼓吹维新变法的《时务报》时期；其二是鼓吹保皇保种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

《时务报》时期是他一生中风头最健、政治激情最高昂，并且爆得大名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在知识分子和开明官绅中激起强烈共鸣。”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穿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而在此之前，他“只能算作康有为的走卒，与徐勤、汪康年、麦孟华辈同在康有为的圈子里过活。他的思想议论，纯粹是康的思想议论……”^①可以说，启蒙思潮掀动的每个重要阶段，几乎都有他活跃的影子，他追随过康有为讲今文经学，效法谭嗣同讲所谓的“应用佛学”等。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影响最大的是长篇政论《变法通议》；另外的重要政论文章还有：《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擅之理》、《开议院论》、《中国自强策》、《中国除害议》、《古议院考》、《商战论》以及《说群》等。这些政论虽然也有汪康年、麦孟华等人执笔之功，但其主要的思想多半还是对康有为政治哲学体系的转述和发挥。

梁启超最能体现其独立意志和思想特色，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也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积累得最深厚、发挥得最出色的时期。特别是 1901 年到 1903

^① 李剑农：《戊戌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7 页。

年旅居日本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热情颂扬西方文明史中为争取自由和宪政而功垂史册的那些卓越人物；其发表数量之巨，可谓严复译介西学后的又一个高潮。仅以 1902 年计算，其撰写的论著就有《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泰斗边沁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和《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数篇；所作名人传记有《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其言地理者，有《欧洲地理大势论》；文艺作品中除《新中国未来记》外，有《世界末日记》、《新罗马传奇》和《侠情记》三篇……^①。不仅如此，他还撰写了一部《西儒学案》，分别就培根、笛卡尔、斯宾诺沙、霍布斯、卢梭、边沁、孟德斯鸠和康德等人，进行了描述和阐释，他在这些卓越的历史人物身上所投注的政治和道德热情，所寄托的自由主义向往，远比严复更深沉、更强烈。特别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期间，他还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述——同时也是当时历史中最具有震撼力的“自由主义政纲”——《新民说》。译介和评析“西儒学案”，事实上与他所提倡的“新民说”有至为重要的关系。何耶？那就是，这两者互为表里。梁启超的确是在接过严复的那个著名的政治哲学命题“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来大做自己的文章。严复工作的重点放在“开民智”上，而梁启超努力的重点却放在“新民德”上。在《新民德》中，他反复强调：民德、民智、民力与政治、学术、技艺是对应的。然而，民德在民智之先。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国

^① 《梁启超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5 页。

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①但梁启超认为，他所强调的新道德观念，其面对的是公德与和自由两大突出问题——公德的对面是私德；自由的对面是专制：“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②他依据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近代自由制度中以利群为基准的公德观念，来对照和抨击只重私德而践踏公德的专制社会，从而进一步提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③那么，“新民”的核心要义又是什么呢？梁启超回答说：那就是自由。《新民说》中专门有一节“论自由”。他宣讲道：“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在肯定自由为“天下之公理”的普适性原则的前提下，他又居于自由主义立场，对“自由”作了政治、宗教、民族和经济的分类。政治上的自由，即“人民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宗教上的自由，即“教徒对于教会而保其自由”；民族上的自由，即“本国对于外国而保其自由”；生计上（经济上）的自由，即“资本家与劳力者相互而

《梁启超选集》第 206 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选集》第 213~214 页。

③ 同②。

保其自由”。其中，关于政治上的自由，又可分割为：“一曰平民对贵族而保其自由；二曰国民全体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三曰殖民地对于母国而保其自由是也。”^①他对“政治自由”至为重视，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诸问题，确立“政治自由”是大前提和大关键。前述曾指出，梁启超是严复自由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那么，他发展和深化了什么呢？那就是他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中受到了启发，特别是从卢梭的《民约论》中找到了关于“自由”的先验依据。这与严复推崇的英国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大为不同，因而“显示出梁启超的思想不同于严复而接近谭嗣同的一面”^②。尽管学界认为他硬将这两种有明显区别的自由主义扯到了一起，从而引发了他对卢梭及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颂扬情绪，并将其导向与严复主张的“缓进”相冲突的“破坏主义”；但是，他却沿着卢梭的思想启示，从自由观念的先验提示中触摸到了民主政治的结穴，即个体自由与公民权利的思想。

三 “自由之德”与宪政精神

梁启超在求证和追寻自由，并由此而抵达“新民”的政治道德极境时，何以走到了“破坏主义”一端？这是否有违其自由主义初衷与原则？其实非也！他坚持认为中国“变亦变，不变亦变”，文明潮流所迫，任何力量休想阻遏。亦即：变革是文明历史之大趋势。但“变革”与“改革”是根本不同的。他

^① 《梁启超选集》第 223 页。

^② 胡伟希等著：《十字街头与塔》，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8 页。

阐释说：变革是整体的，改革只是局部的；变革是突变，而改革只是渐变。变革就要争自由、争权利。这样争来的自由和权利才不会失去。人民不能等待专制主义者施“仁政”，因为“仁政”是主子恩赐给奴隶的东西，它随时都可以被主子夺走，而以“虐政”取而代之。建设非有激烈的毁坏不可，惟有破坏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政体，“新民”世界才有可能到来^①。当然，这只是代表梁启超堕入保皇派前的思想情况，从根本上说，他是反对一切暴力革命的。比如，1903年他去美国一趟，归返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之破坏主义与革命的排满主义，至是完全放弃”^②。梁启超不仅对中国专制政治压制和绞杀民间自由至为痛恨，而且尤其痛恨专制主义者假自由平等的名义大作其恶，同时还坚决反对对自由平等的曲解滥用。在《自由平等真解》中，他写道：“任意设立名目，搜括民膏，使我民无财产之自由；监谤防川，偶语弃市，使我民无言论集会之自由；凡信皆拆，入城必搜，使我民无通行行旅之自由；动辄搜索家宅，使我民无生命之自由；伪造民意，胁迫推戴，使我民无良心之自由。”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他更从个人权利的视角，对他所期待重视的“政治自由”作了全面的阐述。他写道：“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他认为，中国就处于这种毫无自由的惨境之中。他所论证和期待的“政治自由”应该是包括这样一些个人权利。即：交通之自由、居住行动之自由、置管产业之自由、信教之自由、书信秘密之自由、集会言论之自由等等。他还解释说，中

① 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

② 《梁启超年谱》第79页。

国“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意思是，这些“自由”中国过去或许也多少有一点，但糟糕的是，在专制皇权统驭下，从来没有用法律的形式来予以保障。专制主义的喜好，决定这些“自由”的有无，于是，就自然引出了他对立宪政治的期待与重视。也就是说，保障个体自由与确立立宪政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这也是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支点。

梁启超非常重视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他强调，只有将立法保障与自觉守法的自由结合在一起，才有真正的自由；自由必须与公德紧密系结在一起，才有理性的自由。他还指出，专制奴役下滋生的奴隶意识，是自由的最大敌人，因此，要生成自由意志，就必须破除奴隶意识。怎么破除？行民主政治是关键。他解释说，民主政治其要义为：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所有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因为没有法律保障的那种“自由”，只能是随时都会被专制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强权政治剥夺走的假自由，亦即“奴隶之自由”。在《组织能力与法治精神》一文中，他特别强调西方理性主义引导下的“规则意识”。由是写道：欧美人的社会，大而国家政治，小而团体游戏，人人心坎中，都认定若干应行共守的规则，觉得他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规则，……一经公认之后，便不许违反又不许利用。一群人靠了这个，就像一副机器有了发动机，个个轮子自然就按部就班的运行。”痛憾的是，中国自来是个不讲法治的国度，这种理性守则观念始终难以养成：“政府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人民也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命令的人权利无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出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所以，宪政既是自由主义政体思想的核心原则，那么理性守则意识当是体现这个原则的要件。

宪政精神是梁启超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灵魂和旗帜。他认

为，宪政的精髓即在于必须用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划定并严格限制政府和政党的权力和行动范围，并提供相关的制度保证。由此，他提出了立宪三原则。即：其一，平等论。“宪法为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导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①；其二，有限政府论。“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②；其三，人民主权论。“各国宪法，既明君与官之权限，又必明民之权限者何也？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③在这三大原则当中，他又特别强调人民主权在防范和遏止君主和官吏滥用权力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对人民主权进行了法律上的限制。在这一点上，他明显赞成康有为作为保皇党领袖后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性评价。康有为在《法国革命记》中惊惧地说：“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按指罗伯斯庇尔——引者注）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也就是说，民之权若不加限制，同样可以结出暴民“专制民主”的恶果来。如果我们能理智地将这些打上保皇印记的议论加以分析，就会知道梁启超所谓“民权有限”论实在是用心良苦、卓识不凡。

① 《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8 页。

② 《梁启超选集》第 149 页。

③ 同②。

四 报刊自由主义的哲学精核

从自由主义原则出发 同时也从保皇的需要出发 梁启超坚决反对一切暴力革命。1906 年至 1907 年这期间所爆发的，以梁启超主政的《新民丛报》与章炳麟主政的《民报》之间展开的激烈论战，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原则。双方围绕的中心论题是：可不可以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旧的皇权政体？尽管梁启超更直接的政治功利目的是为了保皇，实在是不可取。但是，其隐伏在思想深处的自由主义意念，却少有人注意到。尽管他公然声称自己是“宗旨顿改（即由以往笃信破坏主义和排满革命——引者注）标明保皇，力辟革命”然而他并不是反对一切革命手段，而是表明自己只反对暴力革命手段。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中，他说，他反对暴力革命，即当时的种族革命，却赞成政治革命。何谓“政治革命”？就是宪政轨道中实行的“革命”，也就是“立宪革命”；他认为，只要清政府能接受和保证实行这种“革命”，就切忌用“破坏主义”毁坏“秩序”。在反对革命的问题上，梁启超与康有为还是有所区别的。以后他之所以与胡适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形成政治学术上的呼应，明显是循守这一自由主义原则的必然结果。他先前在《释革》中，诠释“革命”是“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则其言非徒误中国，而污辱此名词亦甚矣！”^①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只不过是惊惧和痛惜“革命”这一名词被“暴政”所僭改和利用罢了。

毫无疑问，要真正触摸到梁启超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精

^① 梁启超《释革》，参见《梁启超选集》第 236 页。

核，就必须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有全面、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时务报》时期，他的思想还处于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笼罩之下，尚缺乏独立的思想和政治秉赋的话，那么到了《清议报》，特别是《新民丛报》时期，他的思想明显走向卓然独立，成为了承续严复所开创的自由主义事业的最优秀的光大者——这时，从表面上看他似乎隶属于保皇一路，但实质上他是站在思想启蒙的立场。他毕生最有价值的思想贡献，也正是凸现在这一时期。

因此，奋力捍卫个体自由与竭诚呼唤宪政民主，就恰好是结构成梁启超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大核心元素。其中，以他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敬告我同业诸君》尤具有纲领性意义。他写道：“政府者，受公众之委托而办理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以主权，则事因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①有何办法和手段能阻止和限制政府“滥用其权”？他慨然答曰：“莫若报馆！”因为，“舆论无形”，报纸行使监督权乃神圣之“天职”——何谓“天职”？就是“人民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的必须。为了捍卫个体自由，自然必须救助于宪政：“若立法、司法两权之独立，政党之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②其结论是：“报馆有两天职：一曰，对政府而言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

^①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 参见《新民丛报》 1902年10月2日。

^② 梁启超：《新民丛报章程》 参见《新民丛报》 1902年2月8日。

向导者。’^① 何谓“向导者”？“意即通过报纸，一方面对国民进行“自由之德”的启蒙教育；另一方面又必须逐步将国民引向真正摆脱“奴隶之自由”的“新民”理想境域。由于此时的他已经完全超逾了维新时期政治功利企图的浮浅层面，而全然跃升到思想启蒙的高水平层面，因此他对报纸的功能地位才有了更准确更深刻的自由主义认识。他是这样来表达他的杰出认知的：“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非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也。”^② 这是梁启超用“民权主义”来宣示其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所必然得出的结论。正因为政府与国民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他又提示道：“无论政府或国民，苟其举动有不轨于正道，不适于时势者，皆当竭吾才以规正之。”除此之外，梁启超对西方政党报刊的弊端深有所察，因此，居于自由主义立场的他不能不对代表国民公意的报纸发出这样的警诫：“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为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固然不可取，但“自命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③ 而笼统排拒，同样不表示赞同。有鉴于此，他指出：必须“极力保持言论独立精神，与一切个人关系及党派无涉”。^④

然而，正如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陷于悲剧的境域一样，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憧憬也必然充满悲剧的意蕴。他一生

①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

② 同①

③ 梁启超：《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 参见《梁启超选集》第 215 页。

④ 梁启超：《本报特别启事》 参见《庸言》 1914 年第 25 ~ 26 合刊号。

为自由和宪政奔走呼号，同时渴望在“司法独立”的宪政背景下，有一大批能“极力保持言论独立精神”的民间非党派报刊出现，可是，到头来，他又不能不“为言论界之前途悲也”。他去世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终于发现，在此前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的自由主义运动中，都有，或将会有他的思想精魂在活跃着。

第六节 悲剧政治家和新闻奇才——汪康年

一 上下求索与内外交困

汪康年是一个具有很深的悲剧蕴意的启蒙思想家、维新政治家和新闻奇才。在他短暂的 54 年的生涯中，竟有整整 26 个年头是在报馆中度过的；直到他罹患严重的肺癆咳喘不已，悲怆而逝，他没有一天离开过他所钟爱的新闻岗位。临死时，他“挟着轰隆隆的咳嗽声，还念叨着袁世凯不是华盛顿，不能给中国带来现代化的明天……”

汪康年的悲剧，不只是他自己的政治文化性格的悲剧，从实质意义上讲，应该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悲剧；应该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的政治文化品格遭遇到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品格的巨大刺激和诱惑，从而产生强烈的冲突

①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 年 5 月 17 日。

和抗拒所必然导致的历史悲剧。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以匹夫之勇，试图颠覆古老的皇权专制，并试图将其改创为民权政治而惨遭挫败的历史悲剧。汪康年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几乎都是屈原式的悲剧人物，他们上下求索，九死而犹未悔。但是，就他而言，这种上下求索的悲苦无助，上下碰壁的悲苦无告，较之别的思想家显得更加典型——更加惨烈、更加凄楚。

汪康年是那种心雄万夫、豪情万丈的思想家和行动家，是那种书生意气直压万户侯的理想主义者。他原本可以做高官显爵，可以凭借的心力和智能在皇权政治中游刃有余，而为自己家族牟取荣华富贵，然而他却对此弃如敝屣，嗤之不顾。在汹涌而至的时潮中，在险象环生的大变局中，他更乐于做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做一个挥舞剑器、保持独立品格的侠客式人物。他认为，千百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仕途，醉心于做帝王师、做皇权政治的御用工具，这不仅是士人的无知和耻辱，而且更是中国民智不开、民心涣散的罪恶根源之一。知识分子怎能放弃他们的历史责任？怎能在历史需要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大声疾呼自由、平等和大义、创辟民主、民权政治的关头满足于“不在位”和“不在场”的尴尬和怯懦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挺枪而出——在肃杀空漠的战场，在危机四伏的岗位，他勇敢地现身说法，顽强地上下搏击。他坚信，西方的政治文化制度不只是西方人的政治文化制度，而是对整个人类都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文明成果和精神财富。将西方的政治文化制度移植到中国，完全可以解决中国积重成灾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他最早打算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方略，希望从皇权政治的高层打开缺口，进而将体制改革的成果推向全国。可是回敬他的是痛心疾首的惨败。后来，他又重振信心，采取自下而上的改革措

施，试图从民间奠定基础，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文化诸领域产生全面的自治成效以后，再将此推向庙堂。可是充满实验热情的他得到回应仍然是不堪回首的惨败！尽管中国的知识界称赞他“拥有丰富的政治想象力”^①，但是，他的这种超常的想象力与他执意要改良的政治文化之间，不能不形成巨大的悲剧反差。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他们执意要撼动、要全面改良的中国传统和现实所呈现的巨大的悲剧反差！与任何一种激进主义思潮相比，他们所选择的非暴力渐进主义手段，都更令极权主义警惕和惊惧。有趣的是：当激进主义风头占尽，宣称汪康年们早已被“时代”所淘汰出局时，他们的思想价值却重新浮出海面，在人们的惊异中再次得到珍视。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一字毅伯，浙江钱塘人，早慧，熟习经籍，少年时即怀抱经国济世之志，然直到40岁，屡屡失意于科场，遂无仕进之心，转而特别留心经世之道。1894年旋又参加科考，竟中三甲进士，却不愿做官，宁愿选择民间立场，千方百计敦促清政府变法维新。1890年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在任自强书院编辑的同时又充任两湖书院学斋分教，襄助张之洞推行洋务运动。1894年甲午战败后，在上海鼓动罗振玉利用《农学报》办“东文学社”。1895年起至1902年止，曾做7年的七品闲官。1896年在张之洞的赞许和运动下，与黄遵宪、梁启超等维新领袖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任总理。汪善经营，多奇招，该报创办不久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山陕粤桂，成为当时的士大夫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时人惊呼：“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自有《时务报》，

^① 廖梅：《汪康年 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

而申、沪、汉等报均废纸矣！”《时务报》兴创后相当一段时期，汪、黄、梁三人的关系融洽到亲密无间的程度。后来，因设立董事会一事，黄遵宪、梁启超对汪产生误解，出现矛盾的最初裂痕。1897年，梁启超有意随黄遵宪出洋去英、德，这“说明办报不是黄遵宪、梁启超追求的惟一事业，对于汪康年来说则不同。汪是把办报馆当作自己主要的，甚至惟一的事业来做的。”^①为了不影响按时出报，他四出物色合适的主笔。谁知因前述董事会误解一事，竟招到黄遵宪来信驱逐汪康年的事件爆发。加上稍后又发生了康门子弟聚众欲殴章太炎的极端事件，汪受到很大的刺激，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同年9月，因《时务报》刊文指称“满州为彼族”，引起张之洞不悦。张对汪摆脱其羁绊到上海办报一直不放心，遂生迫使该报改为官报之意。1897年12月，汪偕曾广铨东渡日本，打算联络同道筹办《时务日报》，以脱出与康、梁间的矛盾，重新开创独立的新闻事业。其间，因拒刊大同译事局告白事件，导致他与“康门中人”最后的决裂。1898年，康有为上奏，建议朝廷把《时务报》改为官报，“其意在借官报名义，以强收归《时务报》借以报复私怨”。^②汪在张之洞的示意下避开康党挑衅，后以《时务报》原产改办《昌言报》。该报不久停办，汪便将主要精力花在办《时务日报》上面。1907年，他到北京创办了时政性启蒙报纸《京报》，因言论出格而被权贵所封禁。1908年再次入京与王侃叔等创办了“海外通讯社”。1909年10月又创办了《刍言报》。晚年的汪康年已由早年的激烈民权论

①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170页，第177页。

② 同①。

立场转变到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刍言报》是一张鼓吹以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中国现存的政治问题的小报。在立宪派看来，他已迂腐不堪；而在极权政府看来，他又过于聒噪。惟有严复、章梈这些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将汪康年和他的这张小报视为世间尤物。早年的汪康年在办报总原则上与黄遵宪、梁启超堪称一致，但因其主张不要涉及当时朝野争论最大的“康学”而专意于启蒙救亡，正是在这一点上，康、梁等人与他结下了化解不了的仇怨。1911年10月，他终因积劳成疾，满怀遗恨死在新闻岗位上。其弟汪诒年编有《汪穰卿遗著》以表纪念。

二 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

汪康年不是那种长于思想而疏于行动的人物，他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贡献，是同时经由思想和行动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来体现的。诚如中国新闻史界对他的客观评价，他是将办报视作他的性命、视作他一生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去对待的。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与更热衷于做官、更热衷于走上层政治路线，并将这些视作重要价值目标的黄遵宪、康有为和梁启超完全不同。按照学界的陈规，长期以来，他基本上是被划在启蒙思想家的序列之外的。即使从政论家的角度，也很少将他纳入。但奇怪的是，无论是思想史，还是政治文化史，都无法绕开汪康年；尤其是中国新闻史，如果离开了汪康年，诸多重要的段落和细节简直难以连接和说清，就更不要说他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史上所占有的特殊位置了。

汪康年有7年时间是以张之洞幕僚的身份而介入改革现实的政治活动的。但是，他并不以做幕僚和做闲官而自得自足，他有很深的民间情结——正是这种感人至深的拯济情怀，使他

身在幕府而忧伤于民瘼。他的文笔不如梁启超犀利煽情，思想不如康有为大胆亢奋，他“刻意提倡维新、又务实近拙，在广泛交游中，凡以为有神帝国‘自改革’的良策，无不铭记于胸。因而当梁启超各方争相延请而暂离报馆的时候，汪康年为填补刊物主论的空白，握笔作文，反而因拙于藻饰，仅列纲目，将他的改革追求的真意和盘托出……”^①这三篇著名的文章便是1896年6月在《时务报》上连载的《中国自强策》。他开篇即情急忧愤地嚷道：“事至今日，危迫极矣！……虽至愚之人，亦知其殆。然则庙堂无定策，中外无定义，旧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则非安于不为，即以为无策也。……以为无策，尚未然也。”^②那么，谁来献此良策也？他自告奋勇的说就是他汪康年！

《中国自强策》所献之策不是先前洋务派所谓的“师夷之技”的“技”这一肤浅层面，而是希望当局全盘袭用“夷”之政治文化制度。他认为，先仿效西方设立议院应为当务之急：

“或日立则不免擅权之虑，开议院则权在下，且散而不合，徒滋论议，于事非便。不知有议院以与相相持，则相不能擅权。议院之人多矣，且有议事举人之权，而无行事之权，虽在下何病？又议院论虽不一，西例必择其多者从之，何器杂之患？且凡事初行，必多漏略，要在随时申正耳。若其成规，则西人之议院章程，可择而行也。”^③

① 朱维静、龙应台：《维新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10月版，第215页。

② 《汪康年文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页。

③ 《汪康年文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5页。

这是汪康年提出的首套改革方案。他相信，由中央政府出面，先从最上层着手施行政治改革，之后再逐层扩展铺开。而设立议院是这套方案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君民立宪和议院民主制的确立和推行并无逻辑上的不妥。当然，他没有低估改革在中国将会遭遇到的极大困难，应该说，他对中国皇权政治积弊之深，是有清醒和深刻的洞察的。但正因为如此，反激发了他冒死犯难、义无反顾的万丈豪情。他对将中国以外的民族和国家一律视为“蛮夷”极为不满，对此鄙见陋习痛加训斥：“中国自古独立于亚洲之中，而其外皆蛮夷视之。素以君权为主，务以保世滋大为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君恐臣之侵其权，故不使之有纤毫之权；恐臣下之结党，故务散其党，牵掣之使不得行其志，锢蔽之使不得极其聪；以天命怵之，以鬼神惧之。臣不承之，以讳饰为能，以敷衍为工，以趋避谄卸为巧。其于民也，但以压制欺吓为事，无复有诚意以相孚，故吏习于弊混，民安于刁玩，土成于陋劣，兵惯于晔溃。其齐民，皆以闭户不与外事为秘策，惟积财遗子孙为得计。故上下之大弊，不出四事，曰徇私，曰恶直，曰崇虚，曰耽逸。循习至久，全国之民，皆失自主之权，无相为之心。上下隔绝，彼此相离。民视君父如陌路，视同国若途人。夫民之弱与离，君所欲也，积至今数千年，乃受其大祸。然则至今日，而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

不错，“落后就要挨打”，弊深就要被淘汰。但是，他指出，中国的落后和积弊不在于“技不如夷”，而在于皇权专制政治是逆文明潮流而动的衰朽和野蛮的政治，是“挨打”的万恶之源！“与西人相角”的关键不是在技艺和器物的层面，而是在政治乃至整个文明制度的层面上展开——用今天的话来

说，就是必须尽快“与国际接轨”！但这“接轨”如果不是真心诚意在政治制度上主动自觉，那终将一事无成。汪康年不是书呆子，而是理性精神十足的改革实践家。他提出“复民权、崇公理”，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公民意识、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人人平等……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权主义者，是断不会看到问题的核心所在的。他深知，一个愷吝于还权于民的国家，是不会建成为一个法治社会的——民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国的改革是否沿着现代化方向发育成熟的关键。

汪康年并不是天真浪漫的乌托邦主义者和脱离中国国情现状的傻瓜思想家。他从一开始就已经预见到改革的艰难，将会遭遇到的巨大阻力。从主观愿望上讲，他企望第一套改革方案能一举奏效，所以指望当局能采纳这个“上策”。但他同时又出具了中、下两策，以作“上策”失败后的备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绝大多数都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积极进化论者。但是他们面对强大的极权主义势力及社会基础，又不能不在内心中充满浓重的悲观主义情愫；又由于他们的民权主义倾向，他们没有理由对民间的改革热情表示疑虑。汪康年的“中策”，即第二套改革方案就是在这样的集悲观和乐观于一体的认识背景上推出的。当然，民权之立又当以尊重民生，造福民生为至要前提。他指导说，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尊重和体恤民生的制度，若不旨归于造福民生，民权和公理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在教训当权者时细细地列举了西方国家造福民生、有益邦国的种种好处后，特意提到了仿照西方设立报馆的特殊文明意义。他由此写道：“厘定祀内，公私无名之祀，悉行停止，一切虚诬术数之说，皆不得行，则邪说息，而正务举矣。设报馆以达民隐，凡中外交涉、选举、狱讼、报销，悉由官登之

报；新理新法，及一切民间之事，及其冤抑，无不可登报，则上下之情通矣。定齐民之等级，以有能者为上，有业者次之，游惰为下，则民勤于所事矣。而又设舆图局以测全国之形势，设翻译馆以收各国之书籍，设制造军火局以给军用。如此行之十年，国以富，兵以强，始可收回已失之权利，除租界之法，改进口之税，定管辖异邦人之制，而与泰西各国相抗衡。’^①

汪康年与康有为等人不太相同，他是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即自由主义者中最本朴的那种人物的立场来写这自强三策的。在他看来，这个国家不是哪个私人的家产，而是每个中国人的国家；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当然的权力就这个国家的命运发表意见。只是，他纳入第二套改革方案并视作改革动力的这个“民间”，只是以各地政治势力为代表的“民间”。他相信，如果实行地方独立变法自强的主张，一样可以达到“逆向”成功的目的^②。正是抱着这一顽强

① 《汪康年文集》第 59 页。

② 汪康年的地方自治思想主要来自严复的点拨。严复在其所翻译的孟德斯鸠的《法意》第十七卷按语中写道：“地方自治之制，乃刻不容缓者矣！窃计中国即今变法，虽不必遽开议院，然一乡一邑之间，设为分局，使及格之民，推举代表，以与国之守宰，相助为理，则地方自治之基础矣。”严复之所以忍痛舍弃设议院的主张，退而求于地方自治，与汪康年一样，主要是遭遇来自皇权专制上层的梗阻和打击。但是，先求地方自治却使他们的政治主张更贴近民权主义，这是更高意义上的智慧和觉悟，而决不是什么中策。当然，汪康年与严复相同还在于他们都痛感在中国改革之艰难。在这样一个连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都不具备的国度里，怎么去搞议会代议制？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依靠地方上的豪绅建立咨询性的地方自治机关，才有可能对政治进步有所促进。其实，这种思路与梁启超所谓的“开明政治”非常接近。

的信念，他不辞辛劳地奔走各地去游说那些地方实力派政治人物。他的那种坚定乐观的神态让人想到春秋时代的孔子。不同的是，汪康年没有弟子追随，而是孤身一人，其悲壮和执着既让人心生感动，又让人深感滑稽。直到他接而连三在张之洞、刘坤一和李鸿章那里碰得头破血流，他才不得不考虑将眼光移到更下层的民间。然而，一连串失败击打着，一直到他喟然总结到：一个没有自救意识的民间，任何拯救的企图都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他又转身回去，将希望重新寄托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上面……汪康年就是这样跌跌撞撞、反反复复，即使晚年蜕变成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丝毫没有放弃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没有放弃他对“复民权，崇公理”的悲情企望。

汪康年一生的政治努力，以及他惨痛的失败经验，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中确实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的报刊思想是他的政治文化思想的一个逻辑延伸。他也曾尝试过办学和组党^①——尝试过不少能推行渐进主义的民间事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办报这一民间事业，“为自己找了一项动口不动手的工作，那就是作为一名舆论批评家，时刻监督政府和社会……”^②与其说是由于他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的必然选择，倒不如说是由于他顽梗的自由主义秉性决定了他的悲剧选择。

三 本朴的自由主义报刊实践家

汪康年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典型意义

^① 汪康年曾试图拥戴他的老师瞿鸿机（字子久）任党首，未果。瞿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和内务部尚书。

^②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

的。尽管他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面与康有为及康门子弟有原则的分歧甚至较大的冲突，但是，在诸多的自由主义原则上却是比较一致的；其中与梁启超的绝大多数见解可谓相互呼应、相互注释。他与梁启超最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具体的报务，特别是经营方针和经营战略上。梁十分满足于做报刊评论家的潇洒和辅助康有为做“帝王师”的自负上面，而汪康年则考虑到自由主义报刊如何策略地在专制下周旋——求生存与求发展如何谋得一个巧妙的契合点。相比之下，康、梁自以为是做大事的人，哪屑于理会汪康年在这上面所花费的苦心。如果从操纵政治的大胆和娴熟来比较，他就更不是康、梁的对手。“康有为则更侧重于‘康学’和康党势力的消长，抓住一切机会以求一时之逞”^①，而“汪康年为了要保持《时务报》的生存权利，不得不对康门弟子容易生是非的地方有所制约”^②，这样就必然形成报馆内部的矛盾和内耗。这实际是一个本朴的报刊自由主义实践家和两个打着思想启蒙旗号的政治家之间的政治道德冲突。这种冲突也势必反映到他们之间对报刊功能性质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微妙差异上来。

汪康年认为报纸的功能是“沟通消息、宣达上德，振奋民气”。所谓“沟通消息”，主要是指“内之情形曝于外，外之情形告之内，在事者得诉艰苦之于人，僻处之士，不出户庭而知

^① 参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 187 页。殷海光先生认为，康有为图功太急，缺乏历史感，其最大的败笔是将变法维新这一公事，看作是皇家权力争夺的私务，并进而看作是康门的私务——似胡子与头发纠结一起分不清。可悲可叹！

^② 参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 187 页。

全球之事……于撤壅蔽辟顽固，力甚大而效甚捷”^①，也就是王韬所谓的“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这四大功能。这种见解与康有为无异。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汪康年不同意康有为关于日报之制是袭用“先王遗制”的机会主义说法。他认为，“日报之制，仿于中国之邸钞，而后盛于泰西，又大变其制。”^②这个“大变其制”不是什么袭用“先王遗制”，而是来源于一种质不对等的文明制度背景。

不仅如此，汪康年还反对康有为所谓的“党报思想”。他坚持认为，报纸应该是保持自由主义立场、立足民间的社会公器，其最大的功能是“效昔贤之强聒不舍，向政府作忠告”，因而“纠政府之过失”^③当是其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和义务。后来，他还在《京报发刊献言》中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和立场。他慨然写道：

“处今日之时，合同志结国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犹惧晚也，遑恤其它？……假发言论之权，以尽已之天职……邇有应匡救应警告之事，报纸甫经刊登，一时即阐于政府，冀可将从善如流之效。”

当然，政府是否正视其过失，是否能从善如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他认为，政府如果螟顽不化，那就更应力纠，更不能放弃报人之天职。相形之下，康、梁等人专注于控制报刊，以作为“发本会之主义”的舆论工具、作为政争的手段，

① 汪康年：《论设立时务日报之宗旨》，见《时务日报》创刊号。

② 同①。

见《汪穉卿年谱》之按语。

不啻有云泥之别。

汪康年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另一大贡献，是他所提出的报律思想。这种宪政意义上的深刻认识源于他对皇权专制主义无法无天、肆意箝制和处置报纸的黑暗现实的悲愤。他在《上瞿子久相国书》中严肃地写道：“吾国报馆 进无法律之保护，退无社会之后盾，敌之劲而得援，与我之孤而无助，益相去万万……”^① 这段控拆和呼唤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至少有这么两点：一、他并不认为当时的《大清律》和《大清报律》是合民意合潮流合理性的现代法律，其语隐含着他对皇权专制主义所订法律的非法性的斥责。在他看来，只有仿照西方宪政制度而产生的报律，才是合民意合潮流合理性的报律；二、他认为，清政府皇权专制主义所订的报律是野蛮的和落后的，否则就不会产生“敌之劲而得援，与我之孤而无助”这样的悲惨结局。他敢称皇权管控为“敌”，足见其批判锋芒是何等的犀利，何等的毫不留情。虽然宪政和民权社会离他还十分遥远，但他并不认为制订现代报律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尽快制订现代报律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尽快制定报律事关政治改革的成败，事关中国宪政民主的成败。由是，他充分发挥其政治想象力，耐心地教导当局，应该从如下四个方面考虑，着手制定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西方宪政精神的报律。这四个方面是：

其一，“令准民间开设报馆”，不能再视民间办报为非法，应将民间办报尽快纳入合法的轨道；其二，必须制定法律保障民间言论自由。民间报刊“进无法律之保护，退无社会之后盾”，不止是中国民间报人的悲剧，而且是皇朝当局的耻辱，是自甘落后于文明潮流的愚蠢之举；其三，鉴于当时的日报大

见《汪穰卿年谱》。

多躲在租界里，或“挂洋牌”而于国家不利，因此，应及早结束这种局面，“知照各国各使，无任何国人在我国界内办报，皆照报律办理。”使国人与洋人在办报上取得平等地位；其四，报律的制定，有利于管理和协调各报馆之间的关系，化解纠纷。他愤慨于当时的报馆热衷于“彼此相角”，屡添内耗而无法可依，认为，有了按宪政精神制订的报律，这一切都将迎刃而解，报馆间“如有不协，皆以报律从事”^①。汪康年的报律思想在当时是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的，这也是他所坚持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体现。

的确，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和新闻思想史上，汪康年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重要人物。汪康年的报刊思想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自由主义资源。他认为，报纸不能只满足于做政府传达声气、拾遗补阙的工具。在没有宪政训导和约束政府的那个时代，他更痛感民间报纸失去法律庇护和帮助的尴尬和险恶。因此，他急切地希望在中国能有一部合乎现代宪政精神的报律，以此来保障民间思想之独立和言论之自由。在这一点上，他与章太炎在激进自由主义情绪支配下一味反对报律的偏激形成鲜明的反照——他的理性精神尽管是悲剧的，但却是令人万分感动的。

^① 以上所引皆见《汪穰卿年谱》之《上瞿子久相国书》。

第四章

清末民初政治报刊与自由主义思潮

第一节 党派报刊与自由主义的流布与冲突

一 保皇政治主题压倒自由主义

中国最早的政党报刊当数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于 1895 年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这是中国最早具有政党性质的团

体“强学会”作为其舆论宣传工具的机关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政治家和思想家成了中国最早萌发政党意识以及“党报思想”的一批人。

根据西方政党报刊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尽管从一开始，这些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党报”就陷入了攻讦谩骂以及争权夺利的“战争”当中，但是，当它们运用启蒙思想家提供给它们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博爱等自由主义理念，以削弱和打击封建皇权统治时，不可否认，确是发挥了积极的文明推动作用的。政党报刊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即肆无忌惮地嘲弄和糟践曾与它们亲和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博爱诸原则，则恰恰是在西方各政治党派夺取政权以后。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后，政党报刊的恶劣表现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美国新闻史专家莫特愤然将这一时期称做是“政党报纸黑暗的时期”^①。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党报刊也几乎循着这样的演进轨迹走过了极其相似的一段悲喜剧之路。

利用办报为组建政党作舆论准备，同时在组党以后让报刊充当其舆论宣传工具，这个办报思想不惟康有为等维新派（后称“立宪派”）所独擅，而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也有极为相似的办报主张。有趣的是，这两大政治派别在竭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最终酿成誓不两立的论战对手时，其实也没有放弃他们各自所坚守的自由主义信念。不同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所握持的是引申自卢梭民权思想的那种自由主义；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所怀抱的却是杰弗逊式的自由主义理想——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梁启超们“在解释西

^① 弗兰克·英特：《美国新闻史》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14 页。

方民族主义的起源时，误将自由主义视为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动力，从而模糊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界限”，与此相较，“倒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比梁启超头脑清醒得多，理论上也明晰得多。”^①不光如此，孙中山主张走美式或法式的共和道路，这与严复、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道路，其在自由主义的具体内涵上是有区别的。如果不加仔细地辨认，就很有可能将他们各自的“党报主张”混为一谈，从而发现不了其笼罩在“党争”背后的这种复杂的政治学术秘密。因此有必要预先作一交代。

维新派的政党报刊活动虽发轫于《万国公报》，但其“党报思想”真正贯彻于实践、活跃于政治斗争中，事实上是在其后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这个时期，已被称为“保皇党”的康、梁及其追随者，在竭力宣扬他们的改良主张时，也在竭力托举着他们的自由主义信念。

1895年12月，亡命海外的康、梁在日本横滨创办了这个流亡政治组织的机关报《清议报》，重新开始他们的政治活动及宣传活动。这张旬报不仅在思想脉系上承续着《时务报》，而且在样式上也尽量仿照那张前机关报的风格。《清议报》名义上的编辑兼发行人是侨商冯镜如（紫珊），但实际的主编是梁启超、麦孟华以及欧榘甲。严格地讲，这张“党报”的政治灵魂此时已不是康有为，而是康先前的走卒，当时被誉为舆论界“骄子”的梁启超。

梁启超此时较前更有着热烈的自由主义畅想。仅1898年至1901年这三年间，他就以哀时客、任公、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和定远等广为人熟谙的笔名，在《清议报》上撰

^① 参见胡伟希等著：《十字街头与塔》第113~114页。

写了数百篇政论和大量诗文。

《清议报》将这个政党组织的政治功利和理想憧憬掺合在一起，这种特色从该报宣示的宗旨“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即可一目了然。所谓“主持清议”，即从政治功利着眼，讥评咒骂慈禧和荣禄为首的“后党”，维护和拥戴那个已被囚系而死期临近的光绪皇帝。所谓“开发民智”就是接过严复的思想启蒙的大旗，用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来烛照皇权专制下的万民，使他们从“奴隶的自由”中解放出来。从梁启超等人的本意来讲，他们更执着的应该是自由主义理想，但由于急功近利的政治企图的诱惑，却使“保皇”的政治主题一下压倒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主题，其直接后果：一则策略上陷于被动和尴尬，二则使自由主义的努力在陷入尴尬境地时，轻易就被革命派击中其政治破绽。也就是这个原因，尽管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也不遗余力地转述和张扬以卢梭《民约论》为思想基调的自由主义观念，热情奔放地描述和阐释伯伦知理、霍布士、斯宾诺莎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学说，特别是将亡友谭嗣同的遗稿《仁学》整理刊发，并作为最锋利的自由主义批判武器介绍给中国的思想界和知识界等等，但是由于纠缠“帝后之争”的酸腐和荒谬，不能不使《清议报》的自由主义努力被这狭隘无聊的政治功利所遮蔽，因而大打折扣。1901年12月22日，即梁启超发表《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之经历》的著名政论的翌日，《清议报》报馆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焚毁，这份“党报”因此告停。

二从《新民丛报》到《大公报》

一个多月后，即1902年的2月8日，就如同涅槃再生火

中凤凰——《新民丛报》宣告诞生。作为立宪派的一份全新的“党报”，《新民丛报》虽并未更改其“保皇”的禀性，但其在宗旨上却无疑有思想启蒙意义上的补充和修正。其曰：“开民智、造新民”。该报还反复申明：“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很明显，主编梁启超对“党报”宗旨的修改，使他的思想传播努力更贴近自由主义，而不是屈从政治功利而导致疏离。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估，梁启超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开山大师的地位，当是在这一时期所奠定的。

《新民丛报》对历史造成重大影响并引起持久关注的，不是因为它的那些保皇滥调，而是因为它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大力宣传“民族御侮论”和“民权救国论”。尽管梁启超并不知道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是质不对等的两大政治文化概念——前者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列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三大世界性思潮；而民权主义究其本质是隶属于自由主义的——然而，它们所激起的巨大的思想回应，却是不容忽视的。《新民丛报》从第34期始连载梁启超的划时代的自由主义政纲《新民说》。这篇十余万字的政论长文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自由”、“立宪”与“新民”的逻辑关系以及个人权利与政治自由的实现及法律保障关系。深怀自由主义浪漫情愫的他还给自己取了个“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来抒发其具有审美期待的政治畅想。其后，围绕着宪法与民权，梁启超还撰写了大量的政论予以呼喊、探究和推理。

承续《时务报》和《清议报》的一贯风格，重视西方文明成果的全面译介，同样是《新民丛报》乐此不疲的一项大工程。该报对“西学”的译介可以说成绩斐然。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到文学、历史、宗教哲

学；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从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到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圣西门等等，可谓兼容并蓄、百川纳海、气象恢宏。其影响之巨，堪称自严复以后掀起的第二个思想启蒙高潮。

除《新民丛报》之外，同期，维新改良派在海外创办或控制着的“党报”，大大小小尚有数十家，其重要的有这样一些：他们是新加坡的《天南新报》、马尼拉的《益友新报》、檀香山的《新中国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和《金港日报》，以及温哥华的《文兴日报》等。这些以“保皇为其旨归”——在政治上大都秉承康有为提出的“办报、办学、办会”的“三位一体”的思路，忠实地发挥着政治宣传工具的作用。因此，不光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不足以与《新民丛报》比肩，即使是在政治功利上的影响亦同样是望尘莫及。1903年前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立宪派保皇党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的矛盾激剧尖锐，而他们与清廷的矛盾已逐渐减弱。《时报》就是在此政治文化背景下，由保皇党人在国内创办的首家机关报。该报正式创刊是在1904年6月12日的上海，由康梁直接筹谋和进行思想与业务指导，康有为的得意门生狄楚青和罗普分任该报经理和主笔。《时报》之谓，取意《礼记》中“君子而时中”，标明“允执厥中”，鼓吹适时、执中而渐进。这不仅曲涵了康有为反暴力革命的一贯立场，而且还直接反映了梁启超此时的重大思想变化——即对自由主义反暴力原则的服膺和握取。

这一时期，政治上倾向于改良、立宪温和主张的报纸不在少数，但较为著名的不多，主要有《大公报》、《东方杂志》和《京话日报》等。这些报纸在政治诉求上不如康、梁属下的机关报强烈，倒是在思想诉求上明显有自由主义的强烈愿望。

1902年6月创办于天津的《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相

当有影响力的一张自由主义民间大报。该报的创办人英敛之，维新时期曾追随过康、梁，因而受其反暴力的渐进主义的影响，对民权和宪政怀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向往，他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事实上，《大公报》就是在法国天主教教主的赞助下开办的。这张报纸可以说是康、梁思想启蒙的直接成果之一。只要我们观其宗旨之所谓“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以及自我宣称是一张“敢于替穷苦大众说话”的民间报纸，即可知道，其近无疑是效仿《时务报》和《新民丛报》的自由主义风格，其远亦确信是追摹《循环日报》和《国闻报》的自由主义精神。《大公报》有别于立宪派保皇党的“党报”，其坚守民间立场，独立不羁、卓尔不群，因此在中国日后兴起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多有引人注目的表现，确称得上是中国大众化的“独立报纸”或“高级报纸”的早期典范。

1904年3月创刊于上海的《东方杂志》，同样是清末维新运动所收获的自由主义成果之一。它最初是一份大型文摘月刊，后来演进为大型综合性思想学术杂志。《东方杂志》在中国现代史是具有相当地位的自由主义重镇。其创刊之际，即在宗旨中明白宣示：启导国民与和平改革。与《大公报》一样，醉心于民权和立宪而反对激进主义，特别是暴力革命。

1904年8月创刊于北京《京话日报》，是一张以中下层市民为启蒙对象的民间小报。该报的创办人彭翼仲亦是深受维新思潮感染的自由知识分子，是中国最早弃官不为的职业报人。

《京话日报》敢于在皇权专制的中心地带宣传民权思想，抨击官府豪门，加之坚持用白话著文和价格低廉，因而在民间影响广大，弥补了维新派“党报”面向中上层宣教所遗留的空白地带，为日后活跃于京畿的《京报》和《社会日报》等自由主义报纸树立了良好的品格风范。1906年9月，京师警察厅以“妄议朝

政，容留匪人”为名悍然封禁了该报，彭翼仲被判罪流放新疆。押解启程那天，“市民去送者数千人，赠送程议者无算”^①由此足见中国民间百姓对自由主义报人的诚挚感激和依恋。

《大公报》等民间维新报刊，从康、梁的政治系统中分化和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于党派政治的成熟姿态，以及矢志追寻更加纯粹的报刊自由主义理想的自觉形象。

三 “党报” 交锋中不同的自由主义基调

与维新派保皇党人截然对立的革命党人，从创立他们的第一个政党组织兴中会始，就陆续在海内外创办了不少宣传其政治主张的报刊，同时也产生了他们的“党报思想”。虽然这些鼓吹暴力革命的报刊中真正称得上是机关报的并不多，但是，它们在传布其政治主张时，也没有忘记对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进行广泛的介绍和阐释。

1900年1月，孙中山领导创办了革命党人的第一份党报《中国日报》。这份报纸之所以被誉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②，除了它作为孙中山“党报思想”的最初且最见成效的实践工具所有的特殊意义外，还表现在它所宣传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康、梁之间的政治学术差异。《中国日报》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谓，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它对欧美自由主义的大力宣传，却一点也不逊让于保皇党人。鼓吹反清排满当然是这份机关报的政治主题，但是，思想启蒙也同样是这份报纸极为重视的政治主题。革命党人在《中

^① 转引自袁军、哈艳秋：《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第68页。

^② 转引自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112页。

国日报》上发表大量的传布欧美民主政制，特别是人权、自由的文章。抨击君主立宪，憧憬民主共和，因而构成了与康、梁完全不同的自由主义基调。孙中山针对保皇派“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渐变论而提出了著名的“突驾说”观点。他强调：中国欲实现“民权之治”，舍“流血之争”是达不到目的的。欧美诸国民主制度都是经过暴力革命和流血政治而逐步确立的。他还强调：民族主义不是目的，而在中国实现杰弗逊式的自由主义理想才是目的。革命党人信奉的自由主义含有非常浓重的激进主义进化论成分，“突驾论”较之“渐变论”无疑更激动人心且更具煽惑力，但革命后面临的政治文化困窘，恐怕就没有康、梁等人带保守主义色彩的进化论管用了——即使保守主义本身也是悲剧的。

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报刊上展开激烈的论战，不仅是 20 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文化史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两派的尖锐交锋不仅直接影响到整个 20 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中国自由主义运动自身的历史走向。

双方最初的交锋是在《中国日报》与保皇党主办的《岭海报》之间进行。这是在 1903 年初，双方“激战”了一个多月。其后，《中国日报》又与另一张保皇党报、香港的《商报》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随后扩大到其他一些革命党报刊和保皇党报刊之间。譬如兴中会的另一张机关报《隆记檀山新报》就发表了孙中山最早的两篇论战文章《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对檀香山保皇党机关报《新中国报》宣扬的“革命招致瓜分”和“民主要有过渡”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驳。^①

^①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 114 页。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革命党报刊，特别是创办于日本的留学生报刊更是向保皇党报刊发起了凌厉的集团冲锋。这些报刊主要有郑贵公任主编，冯自由、冯斯栾等任编撰的《开智录》；杨廷栋、杨荫杭和雷奋等主笔政的《译书汇编》；秦力山、沈翔云、王宠惠等创办的《国民报》，以及湖南留日同乡会主办的《游学译编》；湖北留日同乡会主办的《湖北学生界》；浙江留日同乡会主办的《浙江潮》；直隶留日学生杜羲等主编的《直说》；江苏留日同乡会主办的《江苏》等等。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些或隶属于革命党，或是有激进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报刊，在政治与道德激情的裹挟下，虽奋不顾身地参与了这场混战，但遗憾的是，由于 1905 年前后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清廷假立宪等事件的冲击、排俄拒俄运动的勃兴，“此后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自由主义虽没有完全消逝，却淹没于民族主义的巨大声浪之中”^①，最终招致思想界不该有的一次大转向被迫发生。

1902 年至 1905 年，除海外的革命党机关报和留学生报刊已达数十种之外，国内创办的倾向革命的报刊也达到 20 多种。尽管在数量上不及保皇党报刊，但其鼓吹革命、宣传以民主共和为基调的自由主义思想，却影响广远，且日益深入人心。

《苏报》的出现，以及“《苏报》案”的发生，无疑是这一时期最具有典型意义的非常事件。

《苏报》于 1896 年 6 月创办于上海。其创办人胡璋（铁梅）以日籍老婆生驹悦为“馆主”，在日本领事馆注册，1900 年，该报因声名狼藉被迫出卖给了有进步倾向的中国退职官员陈范。陈范是个有着自由主义诉求的人，因此该报接手之初便

^① 胡伟希等著：《十字街头与塔》第 34 页。

倾向于改良。1902年以后陈受排满革命影响，对“渐进主义”产生厌倦，故而倾向激进主义革命——由此，《苏报》一跃而成为了革命派在上海的重要言论机关。蔡元培、黄宗仰等主持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与《苏报》关系密切，他们轮流撰写的政论文章成了该报最诱人注目的思想亮点。1903年5月，陈范延请中国教育会下属的爱国学社社员章士钊担任该报主笔；章炳麟、蔡元培等任主要撰稿人。此后，《苏报》的激进自由主义言论不仅激起民间更大的反满情绪，而且也惊动了皇权专制中心。1903年6月，《苏报》辟专栏重点介绍邹容的激进自由主义小册子《革命军》，并先后刊登了章士钊的高度评价文章和章炳麟为《革命军》所撰写的序言，因此引起清政府的极大不安。同月，该报又在重要位置推出章炳麟的《驳康有为最近政见书》一文的摘要。文章公然辱骂光绪并公然讥嘲康有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的保皇言论。最后高声宣讲道：要推翻清王朝就必须经过“血战”，否则民众决不可能得到“自由议政之权”。当日，章炳麟等人被租界当局拘捕，31日邹容自行投案，未被拘押的章士钊继续出报并刊发革命言论。旋即，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勾结查封了《苏报》。其后，章士钊和蔡元培等又相继创办《国民日报》、《俄事警闻》、《中国白话报》、《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刊继续倡言革命，鼓动激进主义思潮。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同年12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正式创刊。该报的创办，既标志着资产阶级政党报刊走向成熟期，而且还标志着孙中山所领导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更趋于成熟与符合理性。孙中山为《民报》口述的发刊词，就直接体现了这一思想理论特点。他首次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简

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除民族主义在理论上分属民族革命外，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都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且属于政治革命范畴。《民报》所公布的六大政治主张，特别是其中的第二项，宣传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可以说是孙中山从事政治革命的自由主义核心。《民报》主编先后由胡汉民、章炳麟和汪精卫担任。其主要撰稿人除三位主编外，尚有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刘师培、黄侃、汤增璧等核心成员。《民报》创刊伊始，即向康、梁发动了规模最大的新一轮攻击，其中尤以 1905 年至 1907 年，双方交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场事关国家政治走向和自由主义命运的大论战表面上看，确实围绕如下这三大问题而展开。即：其一，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其二，要民主共和还是要君主立宪？其三，是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还是实行平均地权？但从实质上看，论战焦点却正如梁启超所言：“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尽管双方都握持有自由主义信念，但终因分歧太大而万难调和，不能不演变成激烈的冲突。在论战中，双方各持党见，互不相让，诋毁谩骂，情绪激昂，因此，即使其间双方都在不倦地宣讲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但遗憾的是，他们留给历史的印象更多的是气急败坏的政治表情，而自由主义者应有的绅士风度却很难见到。论战的结果是革命派大获全胜，然而，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梁启超所面临的自由主义难题，却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

第二节 伟大的革命家和报刊 思想家——孙中山

一 生平及报刊思想简述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报刊理论家。很久以来，他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早已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而有非常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然而，其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报刊理论家，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在学术探究上取得的认知也是非常不够的。不仅如此，恐怕很少有人发现，他还是一个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报刊理论家。

不错，孙中山的确是继康有为之后，最热衷于创办“党报”，鼓吹“党报思想”的政治人物，因此，很难使人相信，他还会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感兴趣。作为最早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提出报纸应该充任“党的喉舌”的革命家，他怎么会尊重和允许报纸的自由主义选择呢？与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例子是康有为。人们怎么会相信，这个在维新、保皇政治功利驱使下，“试图阻挠革命前进”的政治人物还与自由主义发生过什么深刻的思想联系。但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他们与自由主义有广泛的政治勾连。孙中山“党报思想”深处理伏着的自由主义意念，尽管不易让人发现，但确实是他整个政治思想体系中最鲜活与最动人的精核之一。

孙中山（1866~1925）初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又号日新。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香山毗邻港澳，商品经济发达，受西方文明濡染极深。1878年起，他便在其兄、华侨资本家孙眉的资助下，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接受西式教育，并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1886年他赴广州英美传道会学医，次年返香港入医科大学继续深造，五年后获博士学位。嗣后，他到澳门行医，因无葡萄牙文凭而处处受到刁难，愤而回到广州。1885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惨败，他由此大觉大悟，“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894年上书李鸿章，向清廷提出系列政治改革建议，但被弃掷。“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求襄助。同年，甲午败讯传来，悲愤不已，经“革命同志”宋耀如函促回国，密谋起义，旋即告败。于是绕道香港、日本、美国，1896年10月到达伦敦，不久被清廷侦探诱往使馆密捕，后经英国友人康德黎营救脱险。之后游历欧陆，广泛、深入考察西方各国社会政治经济之历史与现状，并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政治学术著作，深受自由、民权思想影响。据其所述，三民主义思想即孕育于这一非常时期。1898年，百日维新流产，康、梁流亡日本组建保皇党，孙中山偕陈少白与之联络遭拒，遂创办《中国日报》抨击保皇、鼓吹革命排满。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其领导下正式成立，其政纲宣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与此同时，创机关报《民报》于东京。从1905年到1911年，孙中山先后组织八次反清起义，均告惨败，其中尤以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黄花冈起义”最为惨烈，因而也最凸显出激进自由主义的象征意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帝迫于革命压力而逊位。1912年元旦，孙中山被各省代表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一个带有自由主义理想色彩的国名

——“中华民国”的历史从此开始。同年，孙中山在党内外压力下辞去临时大总统。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3年，他领导“二次革命”武装反袁。“二次革命”告败后，先后经过讨袁、护法诸役，革命党退守广东一隅。1914年，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1917年，在广东组建护法政府；1917年至1919年，在上海完成《建国方略》；1921年，他在广州组织正式政府，并指挥“党军”首次北伐。此时陷于政治和思想绝境中的孙中山，不得不为“革命”寻找新的出路。1925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甚或可以说对自由主义若干原则进行修订。之后，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遗训抱憾辞世。

二 民权主义与自由主义

孙中山一生的政治追求和思想憧憬，可以说全都贯穿到他倡导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这两条政治和思想主线当中。因此，他的报刊思想里，也分别体现和贯彻着这两条主线，所谓民族主义，其要义为反清排满、推翻帝制；所谓民权主义，其要义为民主立宪，共和自由。为了区别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不同，他曾这样解释道：“那民族主义，决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路人，也决不会把路人当做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一样的”；因此“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不惟如此，他还专门举例道：“照现在这样

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佛兰西大革命及俄罗斯革命，本没有种族问题，却纯是政治问题；佛兰西民族政体，已经成立，俄罗斯虚无党，也终要达到这目的。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这也是人人晓得的。”^①在这段解释中，他明白地告诉我们：民族主义是革命最浅的一个层面，“决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而民权主义才是革命最核心的层面，“是政治革命的根本”。那么，民权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本质属性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为了严格区分两者的性质，他分别用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来界说这两大主义在具体推行上的不同。也就是说民族革命是容易取得成效的，但政治革命却不是那么容易奏效的。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之所以忧心如焚，感喟“革命尚未成功”，这里的“革命”已明显不是指民族革命，而是指包含着伟大的自由主义理想的政治革命。不过，他以为俄罗斯虚无党，以及这以后他所联络信服的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也终要达到这目的”，的确就太天真和主观了。

为何要花如此多的笔墨来阐释孙中山政治学术体系中，这两大主义的政治学理区别？这于我们所要讨论的孙中山的报刊思想到底有何联系？其实，问题的重要性正在这里。

人们之所以在政治和学术探讨中过多着眼于孙中山的“党报思想”，而对其在大量论述中并不隐讳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视而不见，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只盯着“民族主义”，抑或“民族革命”这一浮浅层面大做文章。而全然忽视了对“民权主义”，抑或“政治革命”的穷根究底。如此一来，又怎么能

^①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论著选辑》，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41 ~ 542 页。

避免这种重大疏漏的发生呢？应该说，孙中山初时对报刊本质功能的认识，是与后来大张其帜的“党报思想”毫无关涉的。在基本认知上他与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特别是严复等人别无二致，或者说深受他们的影响。其认识主要系之于思想启蒙，而不是后来醉心的“革命”，也就是说基本上属于严复这一派的。他对报刊的期待基本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的。这在《上李鸿章书》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建议办“学报”以“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①，明显是追循着严复那种思想启蒙轨迹——这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一条拓展主线；而另一条主线就是与自由主义若即若离的“维新”——“革命（指民族革命）甚至在1894年后，即最热衷于报刊宣传活动的相当一段时期，他依然没有脱离思想启蒙的轨道，其提出的“晓喻群蒙”等办报指导思想就是最好的证明。

孙中山其后形成系统严密的“党报思想”，是与他在领导《中国日报》和《民报》等“党报”反击康、梁保皇党的论争中所逐渐完善的。但是，其哲学思想背景却不能不提到他所宣讲的那个著名的“突驾说”。当然，不能说“突驾说”只能作民族主义的逻辑背景，而不能作民权主义的逻辑背景。可是，就其所着眼的激进主义革命功利一端，即可知道，“党报思想”更多是与这种哲学观念有关。

在“突驾说”的哲学鼓动下，孙中山对保皇派提倡的渐进主义厌烦至极。他已经等不及“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的“循序而行”，因而更青睐于他自己发明的这个涵有“飞跃”进化意志的“突驾论”。在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他情绪激动地宣讲说：“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然今后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当然，“突驾说”不止影响到他急欲求成的民族革命的具体操作——既包括接二连三、不计血本的武装起义，还包括大办“党报”，以推动革命早日成功——还直接影响到他对政治革命急欲求成的操作上的焦灼。他全然忘记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通常采取的是渐进的路子，而激进的路子通常是走不到自由主义的归宿上去的。

这样，矛盾就产生了：一方面他的确是想走杰弗逊式的自由理想道路，但另一方面，他却是在激进主义的“突驾论”的蛊惑之下，对自己原已明晰的自由主义，亦即民权主义的涵义产生了怀疑。他在《三民主义》第二讲《民权主义》中居然这样说：“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大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他还特别强调说：“要这样去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这时，他所诠释的“自由主义”已经完全偏离了自由主义的轨道。他甚至不知道，这样解释“自由主义”已经为日后国民党的政治全能主义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借口。因为，自由，恰恰就是首先应用到个人上去，而非用到国家上去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在本质上是坚决反对政治全能主义对自由的垄断，即使它打着为了国家“自由独立”的旗号，也决不允许它侵入个人自由的界域，更没有权力强迫个人去牺牲自由。

三 “党报思想”与自由主义悖谬

由于这一严重的思想迷失，他就不能不急速走到用“党的思想”指导个人如何“正确认识”平等和自由的悖谬中来了。在《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的著名演讲中，他的慷慨激昂就有些令人生疑，而且不能不感到惊骇了。他说：“在普通社会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团体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团体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力量，分散了政治团体。……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讲“政治团体”必须有组织纪律约束本来是对的，但是，令人惊骇的是，“团体的平等、自由”居然可以凌驾、甚至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这岂不是南辕北辙——须知，争个人的平等、自由，才是杰弗逊式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呀！

孙中山的这种严重的政治学理矛盾自然反映到其报刊思想中来。他历来重视思想启蒙，但由于后来他非常烦厌用和平手段去推动政治变革，所以他对思想启蒙的理解就必然与和平、渐进脱离了关系，而直接与激进的政治功利挂上了钩。在他看来，报纸不是服务于“个人的平等、自由”的，而是必须无条件服务于“团体的平等、自由”的。这个“团体”是什么？就是“党”。这样一来，系统而严密的“党报思想”就产生并逐渐完善了。它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报纸就理应是“党的喉舌”，而不再是谭嗣同先前

所说的“民口”；

第二，新闻就是宣传；新闻记者就是“纠正人心”的宣传工作者。“政治之发动，足以导其机”；“国事蜩螾、民生涂炭，只可藉以一叹呻吟者，吾新闻记者外，更属诸谁何？”^①

第三，宣传不仅是民族革命的重要武器，而且也是政治革命须臾不可离弃的重要武器。所谓“武昌起义，当时能够达到目的……完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②。所谓“当革命时代，报界之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界这鼓吹更不可少……鼓吹建设之思想，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使人人知建设为易使之动”^③，都是反复强调这个“常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常识”已不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了，而是全能主义政治或革命意义上的了；

第四，党报既是“革命宣传机关”，又是“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党报的作用，一为大力宣传“党义”；二为积极投入到攻讦、批判政敌的斗争中去。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就是阐释和宣传“党义”。他说：“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④思想的旨归只能是对“主义”的信仰；

第五，党报应成为培训“党义”宣传人才的学校。他还兴

^① 参见孙中山为伍超《新闻学大纲》所写的序言。转引自《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193页。

^② 参见孙中山：《国民党奋斗之法应注重宣传，不宜专注军事》。

^③ 参见孙中山：《建设杂志发刊词》。

^④ 参见孙中山：《民族主义》。

致勃勃地说：“如果这种学校办成了，我在每星期中，到学校来演讲，担负教员的责任”；

第六，党报应是体现“舆论一致”的典范。他强调：“今日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舆论。”^① 尽管他也指出报纸上“虽有不正当之舆论淆惑是非，而报馆记者率抱定真理，一往不渝”，而用“正确之真理”去“同化”“不正当之舆论”^② 应是党报责无旁贷的一件大事；

第七，党报是不讲报刊自由主义原则的，能“同化”的当然一律予以“同化”；不能“同化”的，必须剥夺其言论自由的权利：“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为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③

不能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对自己所追求的杰弗逊式的自由主义理想产生了动摇。关键在于他的政治上急欲求成冲动，先是由此造成其在实践与理论上的脱节，然后是由此造成理论与实践上的混乱和局促。作为一个饱含自由主义情愫的社会进化论者，他相信人类社会必然走“神权——君权——民权”的进化道路。然而，由于他在组建革命政党后逐渐醉心于全能主义政治，并过分夸大，甚至神话了这种隐伏着反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因此，必然陷入了用“党报思想”遮蔽报刊自由主义思想的尴尬境地。辛亥革命遭遇困窘后，孙中山曾总结反思其经验教训，以为“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党内同志”认为他的主张“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从而涣散了斗志所致，继而提出所谓的“知难行易”说，其实

① 参见孙中山：《各报言论须求一致》。

② 参见孙中山：《在上海民立报之答词》。

③ 参见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就集中反映了他陷于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和局促——即无法整合自由主义政治理想与全能主义政治诱惑而带来的大尴尬。

第三节 佛学革命家和道德 宣传家——章太炎

一 生平及报刊思想简述

集思想家、革命家和学术大师于一身的章太炎与他的政论对手梁启超，同为开政党报刊之先河的人物。章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办报思想因大异于同时代革命党人而多有招致诟病，然而，其中的不少内容恰恰是他颇具有自由主义风采的优长之处。这个笃信佛学，迷信道德救世的怪异人物尤好标新立异、独往独来。与孙中山相较，他最大的特点恐怕是：多有自由主义的个人表现，而少有系统、周密的自由主义理论，更谈不上对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进行自由主义视角上的分割和透辟的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卓越的报刊政论家，他坚持认为报刊应有“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①之天职；同时还应有“不务谄媚，不造夸辞，正色端容，以有天下直道”的风骨节

^① 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参见《大共和报》 1912年3月7日。

操^① 简括之：舆论监督与国民向导应是报刊自由主义的两个最基本的支点。这一识见不仅比孙中山的“党报思想”高出许多境界，而且还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意见相合。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竟然是不共戴天的政论死敌。

殷海光先生在谈及章太炎那个时代的著名思想人物时曾这样说：“严格地说，像西方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真是少之又少……”他由此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迄未定型”；然而他所指定的“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者独擅的几大义项，即——“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从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团的气象……”^②——几乎都可以在章太炎身上找到。当然殷海光还为“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具体列出了六大义项，即：一，抨孔；二，提倡科学；三，追求民主；四，好尚自由；五，倾向世界；六，用白话文。除坚决反对白话文外，章太炎几乎算得上是那个时代比较合格的自由主义者。

章太炎（1869～1936），初名乘，后改名炳麟、绛，字枚叔，太炎原是自取别号，浙江省余杭县人。1880年，11岁起，即从外祖父读经。于《东华录》中见到有清王朝大搞文字狱的历史记载，称“余之革命伏根于此”。1883年，始研读《史记》浏览老庄；1884年又研读周秦、汉氏之书，尤与王夫之、顾炎武默契；“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年十六，当应县试，病未往，“冥志覃思，然后学有途径”，由此打下古文

^① 章太炎：《新纪元报发刊辞》参见《大共和报》1912年5月创刊号。

^②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7页。

经学之坚实基础，1886年，“十八岁，‘壹意治经，文必法古’”；翌年，得《明季稗史》17种，“排满思想始盛”；1888年，？读经训，旁理诸子史传，“始有著述之志”；1890年，父死，至杭州从俞樾学稽古之学，同时又向高学治（宰平）问经；向谭献（仲修）问文辞法度。至此，于经学、史学、文学诸领域，日渐广博雄深。

1894年，章太炎忧愤于国事，有了强烈的维新思想，于是加入强学会。是年《时务报》问世，毅然走出书斋，投身报务，任编辑。1897年，国势日亟，因感召于孙中山之革命事业；心甚壮之”。旋因在拟定孔教为“国教”问题上与康有为分歧太大愤而脱离《时务报》。1898年，他上书李鸿章的同时，至武昌助张之洞办《正学报》，鼓吹洋务。同年，维新失败，只好逃到台湾，在《台北日报》当记者，从此与改良派分道扬镳。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0年，唐才常在上海召集“张园国会”，章去参加，竟当场剪掉发辫，表示与清廷誓不两立。1901年，任教于东吴大学，大肆鼓吹民族革命。由是，与俞樾断绝师生关系。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及为《革命军》作序而被捕入狱。这年冬天，在狱中策划创建光复会，并潜心于佛教经籍，皈依法相宗。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在欢迎会上章太炎致词：一，用宗教发起信心；二，用国粹激动种性。这两大思想基点不仅构成其政治哲学主要内容，而且还构成其办报思想的重要基调。1907年，继胡汉民后接任《民报》主编，与梁启超主笔政的《新民丛报》展开新一轮笔墨大战。至次年9月13日《民报》被查禁，共撰文58篇之多，其中政论和时评占42篇。1909年，重组光复会，与孙中山隔隙日深。自编《太炎集》，重视“传世”之文，轻视其政论。次年，反复修订文

集，反思昔日“订孔”的“失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急速归国后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著名评语，招致孙中山和同盟会强烈不满。翌年，任临时大总统枢密顾问，并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主张与传统媾和，同时主张拥戴袁世凯。1913年，宋教仁被刺，章“托事南行”。同年8月，冒险入京，“以大勋章为扇坠，临大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被幽禁3年。1916年被释后参与“护法”，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与孙中山貌合神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其已跟不上潮流，于是“退居宁静学者，粹然成为儒宗”^①。

章太炎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革命家和道德主义宣传家，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发挥，也主要是通过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激进的道德主义政治哲学和报刊宣传所凸显出来的。

从章太炎的政治学术经历来看，他与孙中山是大为不同的。章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基础主要是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不仅缺乏孙中山知识结构中那些系统的西学知识，特别是以西方民主政制为最高理念的那些重要部分，而且缺乏对西方文明的实际考察和体验。这种区别，或者说差异决定了他既无法分清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政治界限，更无法分清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法理界限。在章太炎那里，最显明的政治哲学表现是：他几乎是将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混为一谈的。所以思想界和史学界在总结他的一生时，都一致称他为“反满革命家”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① 章太炎生平所引征之语，参见汤志钧著：《戊戌人物传稿》上册。

二 自由主义与“俱分进化论”

民族主义激进情绪对章太炎来说，不能完全判定为缺点。章太炎没有系统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素养，因此，他作为一个“无神宗教论”者，无论是对生物世界，还是对人类社会的诸多解释，都显得滑稽可笑。那些被他视为“传世之文”的著述，如《视天论》、《天论》、《菌说》以及《无神论》和《建立无神宗教论》等等，无不充斥着他对西学知识的一知半解和自以为是的胡乱发挥。比如，他混淆无生物的化学作用与有生物的生理作用的界限；比如他认为人是“五行秀气”所生等等，都可以让人领略到他的这种傲然屹立，狂放不羁的“自由”风采。人们很难发现他的这些“信口开河”中竟暗藏着民族主义的激进情绪——而且，有时这种不太理性的东西还会变成观察的优势。最著名的是他对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剖析和批判。他说：“景教者，远西成学之士之所轻，其政府亦未重也。纵之以人中夏，使驱于相杀毁伤而已，得挟其名以割吾地！”^①进而指斥说：“若说那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最上一流，是借此学些英文、法文，可以自命不凡；其次就是饥寒无告，要借此混日子的；最下是凭仗教会的势力，去鱼肉乡愚，陵轹同类。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②这种出于民族主义愤怒的批判，应该说是既尖锐又中肯的。

① 章太炎：《检论卷六·争教》。

②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这种“自由”奔放的优势还更多地体现在他对专制主义的猛烈抨击中。因为对专制主义国家的极度厌恶和愤恨，使他在解释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属性时，显得既不“历史”，也不“唯物”。但是，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也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譬如他在《国家论》中说：“一，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二，国家之作用，是劳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三，国家之事业，是最卑贱者，非最神圣者。”^①意思是说：国家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个人是有“自性”的存在，国家则是假有而实无自性的东西；国家是不得已而设立的东西，不是理所当然而设立的东西；而且是卑贱的东西，不是最尊贵的东西。这样解释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当然好笑，但是却不能说充满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豪情和精神穿透力。因为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个人自由是最高原则。国家若不为个人自由提供所需的一切法律保障，亦即为个人自由提供一切方便，反而成为凌驾和剥夺个人自由的邪恶的、卑鄙的东西，这样的国家确实是“假有而实无自性”的东西。因此，他怎能不喟然叹曰：国家是不得已而设立的东西。如果它蜕变成了妨害个人自由的怪物，不如干脆将其捣毁。章太炎的这种认识显然来自谭嗣同的激进主义政治哲学的指拨——其实，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乃至自由主义者，他们中很少有人没受到这种“国家论”的影响而变得热血沸腾，义无反顾的。

不一而足，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也有民族主义激进情绪在暗中起作用。有意思的是，他持有的那种被他称做“俱分进化论”的思想，与孙中山的“突驾说”完全不同。孙中山的进化

^① 章太炎：《国家论》。

论思想是建立在“革命”和乐观的学理基础上的，因而坚信人类社会的进化必然要由“君权时代”，最后抵达“民权时代”。他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革命”的和乐观主义的进化论思想。而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却主要建立在“无神宗教论”和悲观的立场上，因而认为人类社会并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所谓“俱分进化”，是说善恶和苦乐都是双方并进的。他解释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而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主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随形，如罔两之逐景。……果以进化为最幸耶？其抑以进化为最不幸耶？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①显然，他甚至对“进化”都产生了惊惧和怀疑。为了能进一步说服，或批评那些笃信“革命”的和乐观的“进化论”的党内同志，他还特意举了西方国家的历史作为例子：“欧洲各国，自斯巴达、雅典时代以来至今日，贵族平民之阶级、君臣男女之崇卑，日渐划削，则人人皆有平等之观，此诚社会道德之进善者。然以物质文明之故，人所尊崇不在爵位，而在货殖，富商大贾与贫民不共席而坐、共车而出，诸雇佣者之事其主人，竭忠尽瘁，犹必以佞媚济之，虽无稽首、折腰之礼，而其佞媚有甚于是者。……此非其进于恶耶？”^②于是他悲慨道：“生物之程度愈进，而为善为恶之力亦因以愈进。”^③由此可见，章太炎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主要来自更深层的哲学思想分歧和政治学术分

①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

② 同①。

③ 同①。

歧。从“俱分进化论”的悲观立场出发，他对未来的担心，多少还是有着预言性质的。譬如，在著名的《讨满洲檄》中，他在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预见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中国兴起。他说：“新学诸彦，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兴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以成他日之社会革命。”^①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其法近于平等，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也就是说，实行与自由主义有“姻亲”关系的社会主义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其在思想情绪上还是悲观的。

三 自由主义与“佛学革命论”

要有效地把“革命”推向成功、导向美善的境地，他竭力主张以佛学增进“革命道德”。章太炎一直认为，道德不仅决定国家的兴亡，而且还决定革命和革命党的兴亡。因此，提倡和搞好道德建设是革命和革命党成败的关键。在回顾其革命经历时，他说，戊戌维新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之所以失败，归根结蒂，是这两次运动的领导者缺乏“革命道德”：“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而林旭、杨锐等人则“萦情利禄，贪着赠馈”，缺乏“赤心变法无他志”的舍生取义情操。尤其是唐才帝，不但不能与人共事，反而“狎妓饮燕不已”；“才常死，其军需在上海，共事者窃之以走……”这怎能不令其悲慨不已：“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庚子之变，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②因而将道德作为革命者首要考评依据，甚至提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的道德主义

① 章太炎：《讨满洲檄》 参见《民报》增刊《天讨》。

② 以上所引皆参见章太炎：《革命之道法》。

激进口号。他后来在回答黄兴的征询时所说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不能单纯视作无稽之牢骚，其实话里暗含着其对革命的道德期待与道德义愤。应该看到，章太炎“道德革命”论，特别是“无道德者不能革命”的政治伦理观，几乎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各个政党的思想和组织路线。另外，他还将中国社会的职业人分为十六种，“研究”认为这些职业人中，以农人和工人“道德为最高”；而“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这种激进的政治伦理思想，无疑是五四前后兴起的民粹主义思潮的一支重要的学理源头；它甚至还深刻影响到毛泽东日后创意的那个著名的“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毛泽东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无非是章太炎道德哲学观的一个翻版罢了。

那么，怎样才能增进革命党人的道德意识，进而提高革命的道德水准呢？他慨然答曰：“欲兴民德，舍佛法其谁？”切莫以为这是戏言，他虽激进，但却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过，这多少有些怪异。因为佛学思想的核心不是积极用世，而是消极避世或逃世的。然而，仔细审察，却能发现章太炎的以佛法拯救革命道德的观念，里面竟然还隐伏着自由主义的因子。对此，殷海光先生可谓洞若观火。他揭示道：“在中国文化里，跟自由主义能发生亲和作用的是佛老思想。可是，佛老思想只是一种人生境界，和一种生活态度。它不是像孔教那样的制度。佛老思想所造成的境界和态度，可导致人采取退避不争的方式来缓和暴政的迫害借此‘保生保真’，但不能鼓起人争自由的热情。”^①章太炎的“以佛学增进革命道德”的观念，表面上是以激进的面目出现，其骨子里却隐涵着对革命及其道德

^①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275页。

前景的深深的失望。他日后逐渐走向保守、悲观和颓唐，事实上，早在辛亥以前就深深埋下了其伦理哲学的悲观种子。

这一切必然要反映到他的办报思想中来。首先，用道德评估革命与用道德拯救和推助革命，是他最得意的一大重要创见。同时也是他与孙中山以法治党和以法治国宪政思想最大的不同之处。孙中山在指导报刊舆论中，不仅非常重视宣传民族主义，也非常重视宣传民权主义，其中尤其重视对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学说和他创立的“五权（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笔者注）分立”学说的宣传。相比之下，章太炎只重视道德建设，自来对宪政立法之类不感兴趣，甚而至于达到极度反感的地步。在他主政《民报》时期，这份党的机关报竟连篇累牍发表宣传“以佛学增进革命道德”的文章，“几乎把《民报》办成佛报，曾引起一些革命党人的非议、责难。他力排众议，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①他之所以冥顽和偏激，除生性固执外，主要就是因为有这种不伦不类的伦理哲学在给他的报刊思想打气壮胆。针对《民报》创刊时提出的六大政治主张（即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立共和政体；土地国有；维护世界真正之和平；中日国民之联合；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笔者注），他竟报以讥讽，认为没有他的“佛法”管用。他说：“所谓六条主义者，能使其主义自行耶？浮华者不足践此主义，猥贱者不足践此主义，诈伪者不足践此主义。……而与震旦（指中国——笔者注）习俗相宜者，厥惟佛教。”^②因此他从来就不信奉什么立宪和什么法律。最典型的

^① 张锡勤、饶良伦等著：《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第 165 页。

^② 章太炎：《答梦庵》。

一例，莫过于 1912 年他在《大共和报》上就报律与言论自由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大共和报》是他与孙中山分灶另立后所创建的“统一党”的机关报。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宣布，在民国报律尚未颁行前，先施行《暂时报律》。于是，激愤难抑的章太炎以一篇《却还内务部所订报律》的社评予以痛击。他诘问道：“案民主国本无报律，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亡清诸吏，自知秕政宏多，遭人指摘，汲汲施行报律，以为壅遏舆论之阶。今民国政府初成，杀人行劫诸事，皆未继续前清法令，声明有效，而独皇皇指定报律，岂欲蹈恶政府之覆辙乎？！”何况内务部根本就没有立法的权力和资格。他认为，这是“恶政府”^①钳制舆论、压迫言论自由所制定的“恶礼法”，全然缺乏其合法性。他的这一番捣腾，终于迫使孙中山下令取消了《暂时报律》，并同时发表了检讨。

章太炎的激进自由主义情绪固然有其独立傲岸的积极的一面，但他不问专制与宪政，一味反对报律，甚而反对一切法律的激进思想，并不利于中国的自由主义报人在寻求法理的框范和保护时，进而获取自由权利的斗争——尽管在中国，通往宪政和自由的路还十分遥远。

出于对革命的道德前景的深刻失望，以及对党争的极度厌倦憎恶，他历来是反对用“党报思想”来统驭机关报的。尽管他自己时常也不能免俗。他认为，政党报刊的毫无节制地陷入“党义”统控和指挥，其后果必然是对言论自由的滥用和扼杀。

^① 章太炎在《五无论》中说：众多恶人势必造成恶政府；而恶政府势必制订恶礼法。以恶人治恶人，以恶礼法制恶行，结果势必以恶增恶，而断乎不能生善。就更不要说以恶礼法制善人和善行了。

由此足见，这种意见里面，除开政治分歧和个人意气的因素之外，还有他对西方政党报刊提供的历史教训的惊惧和怨愤。譬如，他在《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中还说了这样一番话：“政党相仇，争在一相，思乱者知不可倡言革命，腾为谣诼，以寄名于旧朝之子遗，乃至私引远人，阴为奸宄，诡更幡信，密起名言，……此则乱人之害，复以帛书狐鸣无异！”在他眼里，政党借报刊攻讦谩骂，污浊堕落，最为可耻。最典型的案例是 1912 年 7 月，共和党系统的《国民公报》与同盟会系统的七家“党报”在互骂“贼党”、“贼报”之后，竟然互挥拳脚，甚而丑态百出闹上法庭。正是有睹于此类腥秽，怎能不致使具有道德洁癖和自由主义独立傲岸精神的他，在对“党报”痛加斥责的同时，产生佛法意义上的深刻的遁世思想，以及进一步对他的“俱分进化论”的印证和确信。

第四节 诗心苍凉的报刊革命家——于右任

一 生平及报刊思想简述

在中国自由主义新闻传播史上，有两个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的著名人物。他们中的一个在于右任，另一个是陈布雷。于右任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影响，是通过他坚韧不拔的办报活动和办报主张而施加的。于右任的贡献不光是他在光复前公开提出的那些报刊自由主义观念，如“监督政府”、“为民请命”以及“讽喻”和“清议”等等主张，甚至自况法国大革命之

《人权宣言》所阐发的诸多政治和人文思想，而且更明亮的是显示在革命“胜利”之后的那些自由主义办报主张当中。当革命“胜利”之后，革命党的报刊已由在野报刊跃升为执政报刊，他居然在《民立报》上公开发表异见说：执政党报刊“更非一二党派之言论机关”，它理应是“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①为什么呢？他尖锐指出：“党见有则人才沦落，故不敢有党见。”^②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于右任的悲剧不在于他的这种自由主义清醒主张横遭奚落，被坚持党见者讥嘲和憎恨，而在于他枉费心机，到头来根本无法撼动党见左右党报，以及用“党报思想”统驭舆论的严酷现实。他后来在思想上之所以皈依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显然与这严酷现实带给他的灵魂打击有极大的关系。

于右任（1878～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右任为其笔名，另有笔名骚心、大风、神州州主以及剥果等传世。陕西省三原县人，家世贫寒，自学不辍。每夜，与父亲共一灯互相背诵经史；背诵时皆向书一揖。年17考中秀才，1903年，25岁时中举人，被称举为“西北才子”。1904年，他在所著的《半哭半笑楼诗草》中写有“空言侠骨爱卢骚”^③和“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等诗句，讥讽时政，渴慕自由，因而被清政府密旨拿办，被迫出逃。“舟次南京，潜行登岸，遥拜

① 于右任：《民立报之宣言》参见《民立报》1912年2月23日。

② 同①。

③ 卢骚，卢梭之旧译。近代以来，无论是革命家，还是维新家，都一致将卢梭与“自由”一词等同。于右任后来取笔名“骚心”，亦即表明他是一颗“自由之心”或可说是一颗“自由主义之心”。

明太祖孝陵，稍伸多年蕴积之民族悲怀。”到上海后，化名刘学裕就读于震旦学院，旋即担任教员，并与革命党人结识。1905年与友人先后创办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自始为革命党报刊撰稿鼓吹排满，并使两校师生多数倾向革命。1906年4月，在东京与孙中山会面，同年11月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长江大都督”，授权负责联系东南八省党务。回国后，于1907年4月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并暗中作为革命党的秘密机关和言论喉舌。该报之所以取名“神州”，是为了“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因而隐含反清民族革命之用意。《神州日报》开办不久，因报馆失火，于右任自动辞职离去。1909年至1910年，两年之内，相继在上海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史称“竖三民”^①报。《民呼日报》于1909年5月创刊，于右任自任社长，陈飞卿为总主笔。该报声明“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问世后即痛揭官吏丑恶，并抨击时政，终遭清政府忌恨，勾结租界当局将他投入狱中。该报在出报仅95天后，被迫终刊。1909年10月，出狱后，于右任矢志不改，更踔厉奋发，又在租界内创办了《民吁日报》。由于他不便公开出面，遂由朱少屏任发行人，范鸿仙任社长。之所以取名“民吁”，是寓指“民呼”被专制主义挖掉了两只眼睛。该报笔政实际上由他主持，每天以“骚心”撰稿。宋教仁、陈英士等著名政治活动家都在该报以记者身份出入。《民吁日报》又成了革命党人寄迹的据点。出报仅48天，《民吁呼报》即因评论赞赏朝鲜

^① 所谓“竖三民”，是指时间上的纵向关系和精神上的一脉相承，又是与后来的“横三民”，即《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新闻》相对而言。“横三民”主要是指空间上的横向联系。

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事件，而被封禁。1910年，斗志益坚的于右任又在该年的10月创办了《民立报》并亲自出任社长；另聘吴忠信、邵力子负责编务，宋教仁、范鸿仙、章士钊、张季鸾任撰述，阵容强健异常。该报的发刊词题为《中国万岁！民主万岁！》为于右任所亲撰。他还以“骚心”、“剥果”、“大风”等笔名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在社会各界激起极大反响，于、宋二人因之“爆得大名”。1913年，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失败，于右任被迫亡命日本。同年9月14日，《民立报》被迫告停。“竖三民”时期，是于右任报刊自由主义思想付诸实践的巅峰期，同时也是他一生中最富有独立意志的传奇时期。

《民立报》遭禁前，他的思想已深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其所撰论说中有“使托氏魂飞于东亚，而来主笔政于吾民立，则世之鼓动，又当如何？”之激切之语。“五四”前后，“于尤喜读克鲁泡特金等书籍”；1926年，他横跨欧亚两洲考察，为“革命”和自由主义寻找新的出路……1949年，在风雨飘摇中随蒋介石先生去了台湾……1964年，在思恋大陆的无限感伤遗憾中辞世。此前曾作诗：“神州旧主哭神州，君子东行何所求，但望于思能革命，再来作弹震寰球！”其对“竖三民”时代自由主义和“党人”风采的追忆和渴慕青春若再的遐想跃然诗情词意间。1927年以后，于右任处于“有所不为”的思想和政治境域中^①。他一生中从未放弃过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深情向往，即使是一直处于一种流落的无奈与苍凉之中。

^① 详见屈武为《于右任诗词集》所撰序言，《于右任诗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6页。

二 诗人气质与底层意识

于右任是一个诗人气质和民族主义感情均非常浓重的自由主义者和报刊革命家。他不像孙中山和章太炎等革命家有深厚的政治哲学素养和学术功底，能够为自己的自由主义表现提供非常丰富的政治哲学和学术背景；他的政治思想风格，更直接的还是通过他早年的办报活动，以及大量的诗文来鲜明展现出来的。人们或许不知，他在作为一个报刊革命家操作舆论、干预国事、鼓吹革命的同时，还是一个带有激进民族主义浪漫憧憬的“南社”诗人。这一点又使他与孙中山、章太炎这样的革命领袖人物大为不同。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孙中山和章太炎对革命和自由主义来说，其创辟和影响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而于右任只是在这种革命的政治哲学战略思想指导下，投入具体战斗的一个“战术家”——这个界说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假如没有于右任这样的杰出的“战术家”，革命和自由主义的战略构想，无论怎样卓越，都将无法有效地落实到具体的战术操作当中。比如孙中山，他就长于“党报思想”的战略谋划，而对具体战术兴趣不是很大。他有一句名言叫做“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就明显暴露出在“舆论归一”主观愿望支配下的错误判断，这固然是战略上指导原则的错误，但又何尝不是操作上的主客颠倒与滑稽？！再比如章太炎，其政治哲学建构尽管罅漏百出，但作为战略远景，也不失其将帅风度。然而，他又爱处处斗气逞能，一投入具体的战术操作，就纯然一通胡搅。《民报》在他手里弄成了一张“佛报”——成了他用“佛法”对革命进行道德宣传和驯化的工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尽管于右任办报活动的时间

并不很长，但是，他在战术操作上的贡献，甚至有时还弥补了领袖人物在战略指导上的不足和失误。

与孙中山和章太炎的另一不同，是于右任的出身和经历。他既不像孙中山那样，出身在一个华商家庭，并受过系统严格的西式教育的训导，其身为医学博士，即使不革命，也一样会过上优裕的生活。又不像章太炎那样，出身在一个殷实的书香世家，从小便受到过系统严格的传统典籍文化的陶染和训练，20多岁便著名于士林，已成为学术大师的胚子，假使不投身革命，也断不会有衣食和地位之忧。于右任出身最寒微的社会底层，属于与皇权统治中心距离相当遥远的“边缘人物”——尽管孙中山和章太炎也同样处于“边缘”，但于之边缘化尤甚于他们，完全可以称做“边缘的边缘”，这一点很关键。为什么呢？于右任的这种边缘化从短处说，妨碍了他在政治哲学上的胸襟和视界，尤缺乏政治学术上的高屋建瓴。然而从长处说，却使他在投身革命和自由主义的追求中，始终有着一种强烈的底层意识，亦即后来的自由主义报人所强调并坚守的“民间立场”。而这种底层意识的顽强和充满奋斗的活力，尤其放到他与章太炎作比较时，就会发现，后者之所以喜欢临虚高蹈，天马行空，固然与其笃信的佛法意念有关，但其要害却无疑是严重疏离民间社会、缺乏起码的底层意识。以致于后来颓变到尊经颂孔的守旧主义立场上，实不足为怪。可以说，有许许多多出身寒微的边缘知识分子，他们与于右任一样，其投身反满民族革命，正是带着强烈的底层意识而来的；他们亲近民权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后来亲近社会民主主义，甚至社会主义，都可以从中找到清晰的逻辑联系。这一点显然被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先生注意到，并引起了 he 浓厚的兴趣。他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有一段文字专门描述了于右

任早年的贫寒苦读生活给他带来的严重刺激和影响。其“爱卢骚”、“爱自由”这种与民族主义掺和在一起的自由意志当中，就有着感人至深、朴素至深的底层意识。于右任的自传性文字《牧羊儿自述》中反复称自己是“牧羊儿”实际上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底层意识萦绕一生、挥之不去的反映。他早年的大量诗作，几乎都贯串着这种底层意识。如1902年的一首《杂感》诗曰：“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寰宇独立史，读之泪盈巾，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①又如同年的一首《署中狗》，诗曰：“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②显然，其爱卢梭、爱自由是基于强烈的底层义愤的。另外，他还在诗中吐露其之所以赞同以暴易暴，全因愤恨专制主义者眼中没有天下子民。诗曰：“伟哉说汤武，革命协天人。夷齐两饿鬼，名理认不真。只怨干戈起，不思涂炭臻。心中有商纣，目中无商民。叩马复絮絮，非孝亦非仁。纵云暴易暴，厥暴实不伦。仗义讨民贼，何愤尔力伸。”^③故而，于右任投身反满民族革命的底层背景，不仅划开了他与许多来自中上层出身的革命党人的界限，而且还强有力地影响到他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以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核心的“政治革命”的持续一贯的支持和贯彻。

《神州日报》是于右任参加民族革命，并由此投入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报刊实践活动的第一站。于右任创刊伊始就敢于公开宣称该报“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实，唤

① 参见《于右任诗词选》，第1页。

② 同，第4~5页。

③ 同，第2页。

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并且公然不用清帝年号，而用干支纪年和公元纪年，固然是激进民族主义情感在起作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底层意识对这张报纸编辑方针所起的引导作用。因此，《神州日报》一开始就与绝大多数的“党报”不同。表面上看，它似乎称得上是一个党的秘密机关，是一张若明若暗的机关报，但实际上在于右任的主政下，它根本就不急于宣传和鼓吹“党义”，而是将“监督政府”“为民请命”，以及讽谕时政、主张清议等作为办报宗旨而公开凸显出来。于右任对该报记者进行训导时，尤注重底层意识的培养。他一再告诫记者们：“一报之名誉，一报之价值，乃至一报之精神命脉，皆悬于诸君之手……”，因此要求他们“务必对于本地，俨然为各种社会之监督。凡于其地发生之事件，害群者必纠弹之，利群者必扬励之”。^①正因为这样，这张所谓的“机关报”就与当时绝大多数“党报”热衷和执着于与“敌党”报刊展开论战划出了明显的界限。这在当时确是罕见的。

三 独立是自由的大前提

《神州日报》筹办之前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可惜被不少报史专家漏掉了。那就是于右任在东京时专门去考察了日本的两张民间大报：《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其自由主义办报倾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者，《神州日报》的发起人和主

^①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19 页。

要编撰者，几乎都是“不名一文之穷书生”。^①因此，文人论政自然就成了它的一大显著特色。而其后的“竖三民”报之所以能接续和光大“神州”精神，就是因为有这种自由主义倾向起潜在的支持作用。于右任并不隐讳这种自由主义企图。在筹办《民呼日报》时，他即以个人名义在上海各报刊登了这样一条启事，曰：“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日报，因火候不支退出，未竟初志。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亦初创神州之志也。……卷土重来，誓以劫后之身，雪前此无功之耻。”^②请看，坚持民间立场，奉行为民请命宗旨，才是这张半明半昧的“机关报”的真实面目。

不惟如此。《民呼日报》更公开宣布其肩负的自由主义使命。该报在创刊日所刊发的《民呼日报宣言书》，在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史上之所以占有重要的一页，盖因其已超逾民族主义的局限。这份宣言书居然以法国的《人权宣言》自况。于右任写道：“《民呼日报》为何而出现哉 记者曰：《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 则人民之权利亡。”^③在这篇宣言书里，一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原则被大声呼喊了出来。这就是：政府的权力是依法保

^① 参见陈四长、潘志新：《民国奇才于右任》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年6月版，第84页。

^② 参见《民国奇才于右任》第90页。

^③ 《民呼日报》参见《民呼日报》1909年5月15日创刊号社评；文中“记者”，为于右任自况。

障人民的自由，人民有监督政府是否依法行事的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依法保障人民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如果人民没有依法监督政府的自由，那么人民的权利就彻底丧失了！除此之外，他还在当天的报纸上郑重公布其所奉行的办报“十要素”——里面明显包含着对中国后来的民间独立报刊具有重要启迪意义的自由主义“要素”：

“一曰志。志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二曰仁。忧人如己，苟利于人则为之；三曰义。急人之急，善善而恶恶，如江河之决，不可终日；四曰智。社会有不善未尝不知，自元恶慙，细奸私匿，视之如烛照而数计也；五曰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白刃可蹈，而口不可关；六曰公。自天子至于庶人，皆直切言其得失，无所偏袒；七曰洁。誉之者非其有恩于我，毁之者非其有怒于我，嚼然尽力于社会，而不希丝忽之报；八曰忠信。其志所在，始终如一，忠于社会，忠于国家，永不背叛；九曰讽谕。有直言之者，有委屈以言之者，故惟选诗歌小说之文，多其方以诱导社会；十曰财力。必有充分之金钱，足以供调查社会种种之事实，及预备议论、文学之材料。”^① 慷慨激昂、义无反顾的表态中充满了民间独立报刊应有的理性风度，尤其是西方文明系统中“自由”（Liberty）一词所涵有的“独立、自主、无阻碍”的精神义项几乎全都有了。显然，张季鸾、胡政之们日后倡行的“四不”主义确实也是从《民呼日报》的“十要素”中吸取了丰厚的思想营养的。继《民呼日报》之后若凤凰再生的《民吁日报》在其“出世广告”中所声张的“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业为宗旨”，虽语义笼统，但其居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立场却

^① 《民呼日报宣言书》 1909年5月15日创刊号。

是不难窥见的。值得重视的是它所强调的“讲求实业”，以及《民吁日报》强调的“财力”其实表达的是言论独立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这样的自由主义原则。

《民吁日报》悲壮告停后，于右任又在其新创的《民立报》发刊词中，以“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的悲慨高洁、执着任远之情写道：“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权，有独立之民权，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权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伤，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①他认为，“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才是实现“独立之言论”的大前提。在自由主义那里，言论自由的实质是思想自由；而“独立”又是实现“自由”之大前提。他还强调：必须将中国人追求和实现“独立之思想”与“独立之言论”的伟大事业，投放到“世界之知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去。否则，独立也罢，自由也罢，都是堪忧且缺乏深厚强大的文明依凭的。

然而，他又对中国人的精神现状和前景表示悲观和怨忿——“人人知政府不足恃，人人知非以自力改革，不足以图存，及至大任当前，仍人人退立于旁观之地位，而惟是高谈雄辩，曰英雄能造时势也，曰健儿能卫社稷也，曰人民能以自力战胜政府也；其言甫势，其身已复萎靡不振。彼所谓英雄健儿者，固不过子虚乌有也。”^②其实，孙中山也有过类似的悲愤和焦虑，他曾抱怨道：“现在中国人何以听到自由便不理睬，

^① 《民立报》1910年11月《发刊词》。

^② 于右任：《论国民最近之心里与今后之责任》，参见《民立报》1910年12月7日。

听到发财便很欢迎呢？其中有许多道理，要详细研究才可以明白。”^①可惜，他直到弃世也没有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道理很简单：如果革命家对自由的怀想只停留在“约法”或者“宪法”之类堂而皇之的纸面上，而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操作支持而真正落实到每一个人具体的自由诉求和权益保障当中，中国人自然还将对发财大感兴趣，而对“自由”敬而远之。

于右任报刊自由主义思想中最突出的另一点是，他对“党见”统驭和框束“党报”持反对态度。早在《民立报》主笔政时，他就一再指斥“党见”带来的的腥秽局面。他说：“……夫吾国政界，本为一大烘炉，一入其中，未有不与之俱化者。朝廷日网罗此辈，以孤吾民之势。吾知自今以往，假政党之名义，以为博取功名富贵之阶梯者，方接踵而竞起。”他禁不住厉声斥骂道：“吾民岂尽木石，而乃甘为此辈之傀儡乎？！”^②革命“胜利”后，他之所以敢于再次向“党报思想”发起挑战，指责其不应以“一二党派之言论机关”自居，并凌驾于民众之上，成为“自由”的阻碍，而应蜕去其党派性质迅速转变为“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③就来自理性的启悟。他还认为：“党见有则人才沦落，故不敢有党见。”^④甚至在遭到《民权报》的批评，说他竟然对“党报不提携”时，尽管他也承认《民立报》还是“党报”，但是，其理解和阐释已经距“党报思想”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了。不能说，他就肯定同意章太炎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说法，然而，他对西方政党

① 孙中山：《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57页。

② 于右任：《论国民最近之心理与今后之责任》。

③ 于右任：《民立报之宣言》参见《民立报》1912年2月23日。

④ 同③

报刊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能很快变为大众化报刊的经验提示，却是心有所动并且非常神往的。于右任的这种眼界使他与同时代的绝大数报刊革命家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即使这种距离的悲剧意味十足，但其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确实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他对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对报刊自由主义的威胁有种理性的恐惧和警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第五章

自由主义新闻观与 新文化运动

第一节 自由主义新闻观及哲学伦理依据

一 “自由分子”与第二次办报高潮

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前，民族主义随着民族革命的成功而逐渐退隐。曾经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严重干扰的

这个激进主义主角的隐退，使自由主义逐渐有了复苏抬头的舒张空间。尽管清王朝旧极权政治的轰然崩隳，给新闻言论自由带来了民权主义意义的想象和实践天地，但这种繁荣竟是那么的短暂，并不足以聚集相当思想和实践力量，进而形成声势浩大的新一轮自由主义浪潮。不过，这个短暂的自由期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1912年，临时革命政府给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带来的“自由”幻觉毕竟是可贵的。仅在那一年里，革命党人为言论自由所做的努力就比两千年的总和还多——除悍然下令废止以《大清报律》和《大清印刷物专律》为标志的专制主义的钳制手段外，还先后颁行了《鄂州军政府临时约法》、《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这些法令争先恐后地将“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动人条款写入其中。不仅如此，各省军政机关都尽量做出尊重人民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姿态；军政要员在关心“党报”建设的同时，更嗜好的似乎是与民间报人的频繁接触：听取意见和交流感情。比如督军们经常邀约记者开座谈会，积极倡议和组织成立“报界俱乐部”，与党内外报人共同推进言论自由局面的发展，其中以沪军都督陈其美和赣军都督李烈钧的表现最为动人。大汉四川军政府在颁行的《独立协定》中规定：“巡警不得干涉报馆”……甚至连袁世凯掌握下的国务院也特设有新闻记者接待室，每日委派国务院秘书长出面接待记者采访。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由于越权发布《民国暂行报律》而激起全国舆论界的愤怒声讨。所有政治派别的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要求取消这个非法制定的报律，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这一反抗的胜利，使社会上民主、自由的空气更加浓厚，言论自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在这种鼓舞人心的背景之下，光复后仅半年内，各种报纸

迅速由 10 年前的 100 多家骤增至 500 多家，总销量达 4200 万份；除官报和少数宗社党报刊销声匿迹外，所有革命前已有的报刊照旧出版；曾一度被皇权专制取消的报刊也恢复出版；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团体纷纷创办新报刊，由此形成继戊戌变法后全国的第二次办报高潮。尤其是在革命风潮影响较大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重庆等地办报热情高涨。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其发展势头最猛，很快竟超过 100 家，甚至连许多县城都竞相开办各类报刊。这些报刊中有相当部分是各级党政机构的机关报，但商业性、文艺性和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性报刊亦为数不少，特别是一些宣扬女权主义，提倡妇女解放的女性报刊最引人注目。这些轰轰烈烈的变化，似乎标志着传统价值，特别是其中作本位价值的传统伦理和政治威权已经全然失去了其在社会中的价值轴心地位。当然，这种变化更本质反映出的是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社会，已不可阻遏地进入了一个系统调整或需要重新建立价值体系的新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大时代即将到来的动人前奏。此时，自由主义在中国已不再像维新运动时期那样，仅仅局限在少数先知者的预言和呐喊当中。在“咸与革命”的政治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各类报刊似乎一夜间取得了共识：赞美共和、拥抱民主和自由，几乎成了所有不同政治派别报人的共同口号。他们普遍认为报刊是天然的“舆论之母”和“舆论代表”；新闻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所以应当仁不让地肩负起监督政府和指导国民的“天职”。报上不但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道姓批评和斥骂总统。报人和报纸的社会地位可谓空前提高。中国报界促进会、上海日报公会、北京报界同志会、广州报界公会等，甚至连最偏远落后的贵州也成立了贵州报界同盟会等从业团体，并纷纷代表报界对

报律、新闻邮电费、报纸和报人权益等敏感问题频繁地与当局交涉。尤其典型的是，中国报界俱进会于1912年6月在上海召开特别大会，吸收新会员、参加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国际新闻协会”等组织。并且还公然不承认所谓报律，他们自办造纸厂、自办新闻学校、自办通讯社和广告社、设立记者俱乐部等。一时间，自由主义的作派风靡中国报界^①。

可是，这一切都来得是那么突然。可以说，“咸与革命”的任何一方政治势力和知识阶层都不能马上提供一个足以与传统价值相抗衡的僭夺系统。在革命家忙于闹哄哄的权力分配时，几乎所有向往民主和自由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不能不暂时被参政的热情所吸引到某种浪漫的幻觉中。“绝大多数人甚至还不曾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悄悄发生。民国初建所带来的兴奋乐观，事实上加速了社会价值、社会规范新旧交替脱节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清末以来逐渐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在民初已初具规模，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民元后出现的几百家报纸、几十家学术和政论性杂志，以及十几万所大中小学校，不仅使知识分子在数量上猛增，而且为他们提供了更为独立的职业（例如教师、记者等），以及社会地位和更大的社会流动可能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留学生运动在辛亥后有了较大发展。它既直接影响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规模和质量，同时也直接规定了知识界的分化趋势。因为留学不同国度的人们，显然各自受到了当时当地的文化影响，在素质、观念、行为上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国别性。”^②有意思的是，这种分化趋势和明显的国别性，都不足以阻挡自由主义的复苏和

① 参见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149~150页。

② 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第295页。

伸展，反而使自由主义活跃在了各种各样的主义和主张当中，呈现出异彩多元的“自由”相竞共生局面。

这一时期，曾经在传布民族主义和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民权主义的革命进程中占尽风光的政党报刊，由于陷入狭隘和丑陋的党争泥淖，已明显丧失了曾一度领导思想主潮的前卫地位。即使是像《民立报》、《天铎报》，以及曾颇有社会影响力的《民意报》、《国风日报》、《亚东新报》和《太平洋报》、《国民》等同盟会系统的报刊，也几无回天之力；就更不要说与之抗衡的进步党系统的报刊像《国民公报》、《庸言》、《时事新报》、《时报》、《大共和报》之类，其在社会上的感召力亦日渐式微。就是它再作古正经标榜自己“平正允当”和“不偏不倚”，也很难引起社会的关注了。

但是，就在这个被思想史家称为“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与政制系统的高度整合”被骤然打破，从而“松懈了政治对文化和经济的刻板控制”的非常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专制主义者，迅速摘下其热爱共和、民主、尊重言论自由的假面具，甚至不顾梁启超为其“设计”的“居服从舆论之名，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及“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的表演套路，公然袭用《大清报律》的阴毒和无耻，在“法律”的幌子下强行颁布所谓的《报纸条例》和《出版法》等，对所有批评和指责袁政府倒行逆施的报刊进行了残酷而血腥的钳制和镇压。在北京，《中央新闻》的主笔和经理等被野蛮逮捕；在武汉，《大江报》的主笔凌大同被野蛮杀害；在广州，查封《公言报》和《佗城独立报》社的同时，报人黄世仲、陈

① 见李侃：《从梁启超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堕落》，原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13日。

听香被野蛮枪杀……据统计，从 1912 年 4 月至 1916 年 6 月，全国至少有 71 家报纸被封禁；49 家遭传讯；9 家被捣毁；24 名记者被枪杀，60 多人入狱……^①昙花一现的言论自由时期很快逝去——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在“共和”的旗帜下所享受的基本待遇竟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和发人深省。袁世凯企图用传统权威形式来填充政治权威的真空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愚蠢地运用了专制主义的手段，而是因为他戏弄和违逆了“共和”的潮流——即使所谓“共和”不过是一面与自由主义关系不大的幌子。

二 “价值重建”中的自由主义新闻观

当那些曾经高擎着启蒙救亡思想旗帜、引领全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前行的领袖人物，接二连三地不是陷入党际纷争的歧途，就是坠入颓唐保守的旧价值体系的缒继时，新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无法听任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以阻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主动接过思想启蒙的火把，以谭嗣同式的冲决网罗的自由主义勇毅，同时在文化领域和思想学术领域向袁世凯新专制主义发起了悲壮的冲锋。黄远生与宋教仁的死难，之所以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在于“宪政”和“言论自由”这两种东西，不光是袁世凯不喜欢，同样，号称酷爱民主、民权和自由的国民党在骨子里也非常厌恶它们。尤其是黄远生的死难，则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报人在“共和”的旗帜下所享有的基本待遇，同时也是新专制主义者发出的“自由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又一次严厉警告。但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按照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 720 页。

他们所理解的全新现代意义和文明标准，开始了重建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卓越努力；未来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在沉痛的反思和顽强的探寻努力中呼之欲出。

在思想文化界，除留居本地的知识分子在艰难地寻找自由的出口外，留学归来的一个为数颇巨的崭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带着与自由主义血肉相连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民粹主义、泛劳动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声势威猛地登上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和政治舞台。西方政治文化思潮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渴望价值重建的背景下，又一次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施洗的喜悦。这是一次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施洗的新经验和新升华。

1915年9月，《新青年》的创办（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笔者注），不仅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同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许多年以后，当胡适将《新青年》同仁的一系列思想言论简括提示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①的时候，他事实上非常清楚，这种重估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为思想砝码来衡定的。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强劲策动和组织推进过程中，现代中国形成了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广泛而坚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队伍。尤其是随着一大批经历了英美和欧陆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西方思潮的又一次大规模东渐，自由主义遂在中国成为了显学并由此铸就了“五四”及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自由灵魂。如果说，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

^① 《新思潮的意义》参见《胡适作品集》第6集，台湾源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5页。

激进自由主义者，主要是以苏俄式共产主义摹本的面目出现的话，那么，以张君勱和张东荪为代表的这类自由主义者，则更多是以社会民主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系列中的右翼修正派的面目出现，而引起历史的注意。同样，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新的自由主义，亦不可避免地将“社会主义”纳入了他们的政治学术框架，由此形成了一种风头甚健的“自由的社会主义”。但是，后两种自由主义与前一种自由主义的显著区别是：后两种都不赞成采用激进的手段来改变社会和历史进程；其中尤以新自由主义“师法英美”的政治学术主张和以社会民主主义提倡的、试图超越英美和苏俄，走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在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阵营内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响应。

从这样一种宏大的政治学术背景来考察自由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嬗演，就会发现诸多潜藏在报刊表层操作后面的秘密。毫无疑问，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同时又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价值重建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价值重建的两项主要内容，不可避免地带着诱人的价值信息，特别是它们各自所蕴含着的现代化的动人可能性，同时摆在了《新青年》的同仁面前。尽管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示出新一代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化方向的选择上所产生的尖锐分歧，以及预示着价值重建运动的悲剧解体势所难免。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探询和规划未来的文明前景时，所迸发出的哲学革命和道德革命热情。

比前辈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时代精神有了更加深切的领悟。这种领悟尤其集中地反映在哲学和伦理体系的价值重建方面——这是一项宏大的文明工程的钢筋构架部分，而新闻传播思想自然是附丽在这个宏大的文明工程中的一个鲜明的局部……这个时候，以陈独秀、胡适、蔡元

培、李大钊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所从事的价值重建运动，“无疑深及了中国现代化最艰难、最根本的一环。从重建价值、人格塑造、人性批判到传统价值的现代变革、语体革命，以及美术音乐革命、婚姻与家庭革命等等，启蒙思想家在信仰、知识、意识形态诸层面上展开的细密的命题，不仅具有旷日持久的原创魅力，而且将不断使历史学家们为自己无法完整描述其意义而深感愧疚。”^①具有现代意义的新闻传播思想体系的建立，就是价值重建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语体革命、美术音乐革命、婚姻与家庭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完全相同，“新闻革命”所带来的自由主义季风更具有全面颠覆的深刻社会意义。

新文化运动旗帜下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其“原创魅力”来自启蒙思想家重新建构的“新哲学”和“新伦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虽有明显的分歧，但大体上却是“亲和”与相互依系容忍的——这当然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同时又兼任自由主义者的双重身份有关。即使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与李大钊的“合理的个人主义”有价值取向上的明显区别，但是，仔细分辨，却发现这两者之间竟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陈独秀青睐的“自利主义”与蔡元培所提倡的“完全的人格”，其实都是从不同的方向与自由主义发生着深刻的精神联系。

因此，在考察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体系特征时，必须要考虑到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是，新闻传播思想的哲学和伦理学依凭不仅相当坚实和完整，而且较前辈思想家建构的那些内容，更具有原创意义上的自觉；其二是，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第321页。

新闻传播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并不完全都是由“纯正”的自由主义者提供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民族主义者，也同样从另一些方向作了极有意义的价值提供。

当然，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底层所赢得的普遍欢迎相比，自由主义更适合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自由主义的新闻观在社会现实中不能不处于曲高和寡的孤独和尴尬境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遭遇到的这个难题，将成为横亘在整个 20 世纪中的政治文化之谜——而光靠这一代自由主义报人的努力，是无法破解这个千古之谜的。

第二节 陈独秀：从“总司令” 到客死的自由思想者

一 生平及思想地位

《新青年》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其次，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虽然，这个重大事件的产生，有诸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政治文化因素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若是离开了陈独秀这个政治革新家和自由思想家的卓越的个人秉赋，在这一事件中所发挥的非凡作用，它即使出现，也不会全然是这样一副带着浓重的陈式印记的狂飙突进的面目。

陈独秀和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人，都是新一代知识分

子的典型和扛思想大旗的人物。他们作为一个坚强的自由主义群体的出现，固然有着传承薪火的历史必然，特别是中国民族趋赴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但是，从当时的国家政治情景，尤其是社会现实的悖谬情形来考察，就会知道，这些划时代的领袖人物，无一没经过一个从满怀希望到失望的思想痛苦历程。陈独秀之所以在 1915 年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执意要创办《青年杂志》并最终通过它走向自己一生中从事的报刊活动的光荣顶峰，其实最直接思想和情感刺激，就是来自于“共和”招牌下血腥污浊的种种现实。当然其间接的思想和情感刺激还有自戊戌变法以来，几代怀抱自由主义理想的先进分子的努力，在“共和”的旗帜下居然全化为了泡影。陈独秀一班人由此而深刻地意识到：“共和制不过是空招牌；作为现代国家基础的新国民，并没有伴随民国而自然产生。因此，宣传新思想、培养新国民已经刻不容缓。更重要的迫在眉睫的困难和无所适从的这个困窘，也促使人们在审度国家富强所需的社会价值时，还要考虑这种价值能否满足新国民的个体需要。这样，国权与人权；国家富强与个性发抒的综合，将注定成为《新青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新目标和新尺度。”^①可以说，陈独秀饱含自由主义精髓的政治学术思想，以及报刊思想，都鲜明地贯穿在这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全新的思想文化努力当中；而这种努力，最终使《新青年》跃入了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前卫序列——成为继《时务报》和《新民丛报》之后，中国最有思想辐射和穿透力的思想批判重武器^②。

^① 参见《中国现代化史》第 1 卷，第 300 页。

^② 胡适曾对友人说：“中国近三十年有三种划时代的刊物：《时务报》、《新民丛报》和《新青年》。”参见曹聚仁：《文坛五十年》。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后改名干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今属安庆市）县人。“独秀”是1914年11月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时始用的名字，有特立独秀、傲岸卓越的自由奔放的用意。陈独秀出身于一个旧官绅家庭，其父早逝，少年起即跟随祖父攻经史子集，并练习八股应试之文。1896年考中秀才，第二年赴南京乡试，名落孙山而归。其思想发生重要转变是在甲午战后。由于受维新变法思想的鼓舞，使他很快成了康、梁的忠实信徒。他后来回忆说：“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①，显然，这是其最初受西学陶染时觉悟情景的自况。1902年和1906年，他两次去日本留学。在那里，他受到由日本“转述”的西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他思想历程中的第二次蜕变。1903年，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激进民族主义者的陈独秀在安庆因从事反满活动遭通缉逃到上海，与章士钊、张继等创办《国民日报》此为其从事报刊活动之始。1904年，又与房秩五等人创办《安徽俗话报》，并自任主编。之后，还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鼓吹激进革命。这时他还称不上思想家。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积极参与地方自治活动，试图促进地方宪政和民主，但希望很快破灭。此间，曾协助柏文蔚参与讨袁战争。1913年“二次革命”流产后，他再次逃到上海；1914年第三次东渡日本，并参加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的编务工作，由此与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等人结识。梁启超读到他发表在《甲寅》上的文章不禁击节赞赏。此时的陈独秀踌躇满志，

^①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参见《新青年》第2卷第2号。

曾自我期许说：“若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①匹夫豪情，可谓气吞万里。1915年9月15日，他在上海正式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具有自由主义内涵和声势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他应蔡元培所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由上海移往北京出刊，正式成为中国新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灵魂和思想阵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成为了这个运动的“总司令”；1921年，在中共一大被选为总书记；1929年被中共以“取消主义者”和“分裂党”的名义清除出党，从此放弃阶级斗争而彻底转变到自由主义立场。1932年至1937年被囚禁在国民党监狱中。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出狱，从事抗日活动和学术撰述活动；1942年客死于四川省江津县。陈独秀最后是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孤独地客死在思考和探询的历史险途中的。

陈独秀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并非形成在《新青年》时期。早在《国民日报》和《安徽俗话报》时期，他就已经有较为清晰的自由主义倾向了。那时，他以“三爱”的笔名，撰写了大量的白话时评，宣传鼓吹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就已经对中国民族的“奴隶根性”痛心疾首。梁启超之所以非常欣赏他，其实就在于这个青年后生身上寄托着他的“新民”理想。然而，正是因为《新青年》，才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延烧成了燎原的大火。

^① 参见《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

二 新闻思想的哲学伦理背景

《新青年》对于陈独秀，抑或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其贡献绝不仅仅是报刊思想意义上的，也绝不仅仅是“文学革命”意义上的。它首先应该是思想文化意义上的——因此，从哲学和伦理思想的背景入手，可能比较容易把问题说清。

在《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的那篇作为发刊词的《敬告青年》就公开宣示了其办刊宗旨——即后来影响很大的“六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不仅如此，他还专门解释说，“中国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人权并重”。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他说的是“科学与人权”而不是后来所说的“科学与民主”。显然，他更多的是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来指示其思想文化动向的。尽管后来这个动向并无大的更改，但“人权”和“民主”毕竟在学理意义上有相当的差异。他说得很明白：这本杂志的根本宗旨是：“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意思是：个人自由必须先于政治自由而存在，同时乃政治自由之基础（也就是为民主提供的基础——笔者注）；但是，个人自由本质上是一种人格涵养和操守，即使是在政治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情形下，个人自由也完全可以通过自我改造和自我修养提高而获得。他的意思是清楚的：“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修身治国之道”。也就是说，只有先抵达个人自由的境界，然后才谈得上获取政治自由，即治理好国家，或曰，把国家政治改造成能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天地。陈独秀是在社会价值紊乱

的背景下，从戊戌知识分子（特别是严复和梁启超——笔者注）曾经宣传过的“社会有机体”的观念中获得工作热情的。他不无浪漫地构想着：个体与社会，犹如细胞人体。细胞新鲜活泼，人体才有旺盛的新陈代谢、健壮的生命力。因此，惟有作为社会新鲜细胞的青年既有年轻体魄，又有新鲜人格、价值观念，社会才会产生无限的生机。所谓新人格、新价值观，应该包括在“六义”中……直白地说，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权平等观；在社会和历史观方面具有进化信念；在人生观方面具有进取精神；在民族观方面具有与世界联系观念；在伦理观方面具有实利主义观念；在信仰观方面具有科学的理念。稍后他又补充说，国民精神再造，必须以战争而非安息为本位；以个人而非家庭为本位；以法制和实利而非感情和虚文为本位^①。须知，这正是构成陈独秀报刊自由主义思想及特色的几大重要义项。

首先，个人为本位的人权平等观，这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义项。他认为，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是国家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青年的自我改造，从而获取心性的自由，当是祛除“奴隶的根性”的前提和必须。“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自信；决不任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盖自认为有独立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② 必须注意，他表述的这种自由主义意义

①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见《青年杂志》1915年创刊号。

上的自我解放观念至少有这样两层涵义：其一是，修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才能听命自己的智能，不会盲从和被动于他人；其二是，独立自主的人格决不能侵害（奴役）他人的人格。亦即，要使自己“独立”，必须充分尊重他人的“独立”，否则不能获取真正的自由。应该说，这个最关键的自由主义原则，陈独秀从一开始就捕捉到了。这不光是有感于皇权专制主义凌压和侵夺国民的自由，终使皇权国家（当然亦包括打着“共和”旗号的“民国”——笔者注）无法自由，同时也不能不说他从民国以来，对那些打着“自由”幌子而肆意侵夺国民自由的各色政客的行径所表示的极大反感。他还进一步阐发说：“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①那么，谁可以作观摩和效仿的榜样呢？他举荐说，应学习西洋的“以个人为本位”的政治伦理习俗和制度。由此导致了他从社会和历史观上，用“进化”的理念，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和纲常礼教进行了全面的、猛烈的抨击和清算。他的这种批判最后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伦理革命指向——这一次轰轰烈烈的自由主义运动所突显的道德主义批判风范，后来既成为了它的光荣，但不可避免也成为了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指责它的罪证和口实。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的“旧文化”、“旧道德”、“旧伦理”其批判是相当严厉的。他愤激地指斥道：“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

^①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

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① 为何必须扫荡孔子所提倡的“封建时代的道德”？他说，是因为这种僵死陈腐的道德：其一，“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相背驰”其二；“他不能支配现代人的心”其三；“孔教与共和 乃绝对不兼容之物 存其一必废其一”其四 最万恶的是；“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② 特别是以西洋的自由主义原则为考核标准来衡度，就发现这种“道德”的有悖“现代潮流”的政治伦理严重性——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③ 因此，他号召“青年”，务必在“西洋个人独立主义”和“东洋以家庭为本位”之间迅速作出抉择。和几乎所有的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者一样，陈独秀也是一个坚定的进化论者。对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终究会摒弃“封建时代的道德”，而逐步“进化”到像西洋那样的“个人独立主义”盛行的理想社会，他坚信不疑。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他是这样表达这种信念的：“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兼容之物……”^④

三 自利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一场大论战。杜

① 陈独秀：《孙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② 以上所引分别见诸陈独秀：《复辟与尊孔》和《一九一六年》。

③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④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亚泉（伧父）是《东方杂志》的主编，同时也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杜亚泉坚决反对陈独秀将东西洋文化差异视为优劣差异的观点，认为这两种文化“乃性质之异”，甚至坚信“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①，于是引发了陈独秀的强烈反弹：“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他进而尖锐指出，中国传统所谓“民贵君轻”；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②由此厘清了“自主自由之人格”与国家“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间的逻辑关系。不仅如此，《新青年》还大量发表有关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文化观念的文章，并继续表达和深化对自由主义的认识，特别又集中在针对保守主义者提出的“非君主不足以立宪”和“尊孔教为国教”的问题上，更充分表达了这样的自由主义信念：其一，政教必须分途，这是西方的政治常识，国家政治决不允许染指教育；其二，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基，“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陈独秀还坚持认为，现代国家有政党是正常的，但投身政党的前提，并非从此泯灭个人独立信仰精神，“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搞封建的人身依附那一套。这也是他最终被逐出政党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参见杜亚泉：《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东方杂志》第15卷，第12号。

^② 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页。

陈独秀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引人注目的另一点是：特别强调功利主义在自由主义中的特殊价值意义。也就是说，他自诩是一个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者。他在不少文章中反复讲述：功利主义是每一个人争取民权自由和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功利主义之所谓权利主张，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等，乃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中的重要条件。”^①他并且自报家底说，他自己主要是继承了边沁和穆勒这两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功利主义遗产，从而确认功利主义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伦理道德的至高原则。他认为，尽管功利主义与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不是同一概念，但是，其与这四者的关系之密切，有如交融之水乳。尤嫌不足以服人，他还例举说：“自约翰·穆勒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德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②

那么，功利主义的自利原则与社会自利又是什么关系呢？陈独秀讲解说：“天下无论何人，未有不以爱己为目的者。其有昌言不爱己而爱他人者，欺人之谈耳”，因此，“自利主义者，至坚确不易动摇之主义也！”^③但是，这与极端自利主义绝不是一回事。自由主义坐标上的自利主义应该是这样的：它强调自利，强调国家、社会必须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自利权利，但它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自利；它还要做的一件事是，将自利主义与国家自利、社会自利和人类自利有机结合起来，共创一种既有利于自由主义生长，又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人类健

① 陈独秀：《再质问 东方杂志 记者》。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

③ 详见《陈独秀著作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7 页。

康发展的理想天地。舍此，“人类思想生活之冲突无有已时。”^①他甚至严厉警告说：“自广义言之，人世间去功利主义无善行。”^②尤其是对照西方文明社会，就会发现：“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③因此，只有把自利主义和社会自利同时放到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价值背景上考察，才有可能准确把握其进步意义。

他还强调说：自利主义不同于中国人所理解的“个人发财主义”。因为“以个人发财主义为幸福主义者是不知幸福为何物也。”在他看来，人生幸福必须是自由主义原则实践意义上的一种绝高的人生和社会境界。首先，一切幸福都是“自力造之”万万“不可依赖他人”；其次，这种幸福应体现为“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群”。最后他总括为五大要义：“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④

陈独秀之所以非常重视从伦理哲学视角上发动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打击攻势，其根本的目的，是希望从此入手彻底击垮皇权专制主义国家对个人独立自主人格的扼杀，以及对自利主义的非法侵掠。与前辈革命家相较，他并不急于动用政治革命的

① 详见《陈独秀著作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97页。

② 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③ 同②。

④ 陈独秀：《敬告青年》。

手段去解决这个相当棘手的难题，而更乐意用思想革命的手段，并分别运用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伦理观上的个人主义和历史观上的进化论来全面贯彻自己的政治文化主张，从而为价值重建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

如果不深刻洞悉到这些秘密，就不会知道陈独秀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具体到他为《新青年》制订的“六义”，即办刊的六大原则，其实说穿了，就是他所倡导的报刊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内容。

四 学术自由与报刊自由

不错，陈独秀的确是职业革命家和启蒙思想家，但其最基本的底色却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新青年》是鼓吹思想革命和伦理革命的产物，但它绝不是政党报刊，而是西方报刊自由主义意义的同仁刊物（在这一点上，它显然比《时务报》和《新民丛报》更具有超逾党派意义上的高度——笔者注）。在《新青年》信守的宗旨中，“六义”截然有别于“党义”。因此，这表明，陈独秀所追求的办报境界，既不是孙中山所醉心的“党报思想”，也不是于右任那种顶着“机关报”的幌子干着“为民请命”或者“监督政府”的勾当。陈独秀曾公开说《新青年》“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在他的视界里，报刊必须是像《新青年》那样，不仅要超逾党派浅见，而且还要超逾“为民请命”和“监督政府”的“细枝末节”，始终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争取民权自由和社会进步为圭臬——当然，“监督政府”与“国民向导”自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陈独秀报刊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反对学术专制，倡导思想自由。因为，言论自由的实质就是思想自由。

可以说，陈独秀一生中大量的自由主义言论，都集中归结到这个核心问题上。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国民之所以“奴隶的根性”难除，全在于皇权专制粗暴剥夺了国民的独立自主与自由之权。因此，在《旧党罪恶》中他大声疾呼：“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时代的第一重要条件。”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又必然表现为坚决反对将某一学说奉为一尊，这在陈独秀报刊自由主义思想中有十分鲜明的反映。在愤怒批判封建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时，他指出：这也只不过是儒家的一部分而非全体，而且儒家学说也只是传统文化的“一家之言”，何以要奉为至尊？以西方文明作参照系，他又指出，在西方，像康德、孔德、卢梭、达尔文、斯宾塞等，莫不是集众说为一家之言。不同的是，西方传统尊疑尚异，所以有助于思想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在中国却强制尚同，专制主义者利用手中权力，将某一有利于统治者的所谓学说定为惟一真理，强令天下尊崇之，这样的严重后果就是阻碍了思想自由发展，阻塞了社会进步的道路。因此，他认为，“妄以思想统一与否定优劣，不知适得其反也。”^① 办报办刊如果不以争取和体现思想、言论自由为基本原则，那么这样的报刊也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报刊是具有独立品格，思想自由的报刊，那么其先决条件是参与办报办刊的人，首先应具有独立自由的高尚人格，既不奴于人，也不奴人。他最称道的报刊独立品格是这样的：“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在他看来，“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

^① 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集，第485页。

之自由也’^①，而提倡神圣自由的报刊，怎能容忍其无独立自由品格而听命于、御用于他人呢？

但是，报刊持独立自由的立场，还必须以充分的经济独立地位作保证。费正清惋惜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成气候：一是由于缺少独立的经济基础，所以必须以依附为生存代价，而无法独立自存；二是由于根本就没有法制的保障，所以独立自存很难。事实上，这一尴尬，起码早费正清 30 年就被陈独秀所点破了。他在五四时期指出过：“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主义乃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证互明，其说遂致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② 他还强调，只有建立在“个人财产独立”基石上的“个人人格独立”，才称得上是真正符合现代文明潮流的新道德；也惟有这样的新道德，才能纯化社会风纪，促进人类进步。西洋各国之所以“个人独立主义”能大行其道，“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③ 应该说，陈独秀关于经济独立是个人人格独立和报刊人格独立的重要前提的观点，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意见不仅引导了《新青年》的独立精神走势，而且还深刻地启发了后来的史量才和胡政之这样的民间自由主义报人——他们将经济独立视为言论独立的基础，正说明了《新青年》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尽管《新青年》最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同仁间的思想分化，并从中裂变出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既对立又互有

① 陈独秀：《答崇拜王敬轩者》 参见《新青年》第 4 卷第 6 号。

②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③ 同②。

联系的意识形态，但是，就言论自由必须首先体现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又必须首先有经济自由作保障等意见，即使分化了的同仁中也没有人持反对态度。这就足以证明，陈独秀的这些报刊自由主义主张是超逾党派政见，且具有普适性价值意义的。事实上，严复早说过，所谓中西社会与文化的根本差异就在于“自由不自由尔”。陈独秀不过是薪传于严复，将西方的文明历史简括为争自由人权、求个人解放的历史。正是这一种“现代观念”构成了《新青年》同仁间的共识，并由此构成了《新青年》最明亮最动人的报刊自由主义品格。出于职业革命家的爱国激情和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完成社会改造的热忱，陈独秀毫不怀疑知识界的价值探究的使命，应当以意识形态为核心；人格或价值建设为的是根本解决政治和国家富强，而自由、科学等等理所当然是价值重估的尺度。换言之，从最终意义说，启蒙是革命的补课，重建价值是政治革命的变式，个性健全则是社会改造的根本途径。^①陈独秀全部的思想文化贡献，包括其自由主义报刊实践的贡献，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这一系列贡献里面始终充满了悲怆的意味，但它的确不失为卓越，因为它是“独秀”的。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 303 页。

第三节 胡适：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悲剧灵魂

一 生平及思想地位

与陈独秀相较，胡适不仅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占有与之同等重要的思想和文化地位，而且，如果我们有兴趣将这种比较置放到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运动的演进历史当中，就会知道，胡适的地位远在陈独秀之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或者是新文化运动的策动者，确是不错的。但，要说他是那个时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总司令”，那就不对了。因为，那个时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总司令”不是别人，正是温文尔雅，着一袭中式长衫的胡适先生。不仅如此，这个胡先生严格地讲，还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总军师”呢！

胡适对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他在执着地坚持用自由主义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方面所作的努力，几乎无人可与之比肩。与前辈自由主义领袖人物——特别是梁启超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不完全相同，胡适首先是在西方受过严格、系统的自由主义训练，然后带着这种既被他视作信仰，又同时被他视作“科学的思想”，运用

到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事务之中的。^①而在这之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由于没到过如此严格、系统的训练，因而在某种意义，只能被称作是自发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到了胡适，或者说从胡适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才真正可以被称作是自觉的知识群体了。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全面的和深刻的，报刊自由主义实践，仅是他博大深邃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智能所辐射到的一个方面。在他正式加盟之前，《新青年》只具备一种自发的自由主义品格；当这本代表中国“文艺复兴”精神的启蒙杂志第一次刊登了他的文章之后，才真正标志着它具有了自觉的自由主义品格。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分子任期最长的“精神领袖”，胡适终身未动摇过自由主义信念：从早年加盟《新青年》，到后来创办《努力周报》、主持《新月》与《独立评论》，一直到最后成为《自由中国》的“灵魂”，他的悲剧可谓多姿多彩、险象环生。在与极权政治抗争的复杂变局中，他逐渐学会了以“容忍”来应对严酷的现实，同时也一再以“容忍”来解释自由主义和他自己。他的灵魂历程，就是一部精练的自由主义的奋斗史和悲剧史。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出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母到台湾；1895年回家乡人私塾发蒙；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参加竞业学会，开始为《竞业旬刊》撰稿，1908年任该刊主编，不久卷入学潮。同年10月离校，旋即入中国新公学任教。1910年2月，经王云五推荐入上海华童公学任教。同年6月痛悔放浪人生，在友人资助

^① 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348页。

下赴北京参加庚款考试，9月入美国康奈尔大学。1914年毕业，旋即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学位，开始酝酿“文学革命”并尝试白话诗写作。1915年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著作……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这是他在《胡适留学日记》中的回叙。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与陈独秀等人轮流编辑《新青年》杂志，因而“爆得大名”，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坚和领袖人物。1919年2月，所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同年4月发表《实验主义》，并在上海迎接来华讲学的老师杜威。同年6月因陈独秀被捕而接办《每周评论》；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遭到激进主义者的猛烈批评；1920年，出版《尝试集》；1921年初，与陈独秀等人通信讨论《新青年》的编辑方针；同年3月写完《红楼梦考证》；1922年5月，创办《努力周报》；1925年12月致函陈独秀谈“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1928年3月，参与创办《新月》；次年发表多篇政论，大谈“人权与约法”；1932年5月，创办《独立评论》；1933年，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久被除名；1935年，写成《充分世界化和全盘西化》；……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放弃武力”；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与雷震等创办《自由中国》杂志；1955年撰写《论中共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1957年，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1960年，“雷震案”发生，与殷海光展开激烈论战；1962年2月24日猝发心脏病辞世。蒋介石赠挽联总括其一生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颇值得人回味无穷。

殷海光先生在评价胡适时，是将其放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

的历史坐标上来审视的。他说：“梁启超以后的言论大家要数胡适。拿梁启超作参考点（point of reference）来看，胡适的思想是进了一步。胡适没有严又陵那种古典气息，也少梁启超的浪漫气息。陈独秀的思想构造粗糙，文笔则颇泼辣。胡适的思想，比他们细密，文笔则特别清和。作为思想家来看，……梁启超以多变出名；胡适虽不像梁启超那样多变，可是他的思想也大致有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分别。因为，胡适究竟是一个以早期杜威的实验主义作底子的社会思想家。”^①殷海光说得很清楚，无论怎样分期，胡适的思想家底都以杜威的实验主义为其根本。尤其是他那不多变的思想原则性，因此较之中国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多变而言，不仅招来的嘲讽和詈骂超过了几乎所有的人，而且其赢得的荣耀和注目几乎也超过了所有的曾经风头甚健的历史人物。

二 新闻思想的哲学伦理背景

五四时期，胡适在一篇名为《不老》的短论中谈到自己所期待的那种文明局面时说：（一）养成一种欢迎新思想的习惯，使新知识、新思想可以源源不断地来；（二）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布下新思想的种子。可以说，这差不多就是他的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或者说主要动机。为了实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理想，胡适认为办报办刊最重要的是能由此“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布下新思想的种子”。需要说明的是，这新思想的种子不是那种“党义”意义上的，它远比政党间出于争权夺利的需要来播撒的那些“思想

^①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317~318页。

的种子”要博大得多，深刻得多，同时也自由得多。

新思想常常又表述为“新思潮”。那么，何谓新思潮呢？他解释道：“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①那么，何谓“评判的态度呢？他干脆一语挑破：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这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②最后，人们或许还要问一句：到底用什么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呢？用胡适一生的启蒙努力来回答，那就是：用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来估定。事实上，这也是后来胡适与他的激进主义者的盟友产生重大政治学术分歧的根本原因。胡适所谓的“评判的态度”，亦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归根到底就是叫人们千万不要盲从任何权威，千万要站在“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养成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习惯，并最终锻炼出一种自由主义的清省和傲岸品格。他后来在进一步解释他的这种用意和期待时说了一段著名的话。这段话因之成了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罪恶证据。他是这样说的：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寻决不想牵着谁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一点防

① 《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第728页，《新思潮的意义》728页。

② 《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第728页，《新思潮的意义》，728～729页。

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惑的人^①。

胡适之所以热忱加盟《新青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努力把当时的青年教导为一个“不受惑”又有独立思想和能自由表达其意志的全新的自由主义者群体。曹聚仁先生认为，《新青年》这一派文化战士，也是等到胡适回国后，才有了并然一套完全的社会观、人生观、宇宙观和方法论的^②。尽管这套东西最后与激进主义者信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产生了严重分歧，但是它们在最初猛烈攻击传统的道德和旧文化的斗争当中，还是能相互策应接纳并产生某种认同感的。

胡适所信奉和倡导的实验主义，亦称实证主义，集中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普遍接受的一种哲学观念。这种哲学观念远可寻索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家斯宾塞和穆勒等实证主义者那里，近可追究到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严复那里。胡适在《五十年来世界哲学》中坦承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这两个人分别是 19 世纪著名的实证主义者赫胥黎和 20 世纪的著名实证主义者杜威。他还阐释说，实证论是 19 世纪以来的世界哲学的主潮。所谓实证，就是强调经验证实，不盲从轻信的原则，亦即严复所谓的“内籀之术”^③。我们知道，赫氏是假道严复而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中产生深远的影响的，这和胡适直接受教于杜威的实证主义还是有相当的区别。在讨论和

① 《胡适文存》第 1 集第 4 卷，第 623~624 页。

②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 年 6 月版，第 111 页。

③ 严复所谓“内籀之术”，就是指一种强调经验观察及“科学”归纳的实证方法。

追究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特别是哲学构成背景时，之所以专门要提及严复和杜威，全在于这两人在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史上的重要性上。严复认为，西方之所以“文明”和强大，之所以自由和平等，其实总括起来不过两大因素：其一，是有立宪民主制度作保障，其二，是有实证方法作“科学”指导。胡适说自己受赫胥黎影响最大，不如说是受严复的影响最大；而杜威于他，其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我的歧路》中说：“我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个方面的应用。”也就是说，加盟《新青年》，以及后来主持《每周评论》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和《新月》等，的确都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办报办刊上的具体应用罢了。

正是因为坚守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与绝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相仿，胡适在历史观上同时表现为是一个坚定的“进化论”者。这种“进化论”，与章太炎的“俱分进化”的悲观消极和逻辑混乱截然不同，胡适对历史最抱着一种乐观、“进步”的观点。应该看到，这是胡适也包括《新青年》同仁在内的绝大多数反传统主义者之所以有旺盛的道德反叛激情的重要哲学依据，或者说勇气来源。胡适在大量的反叛文章中强调知识、真理和伦理观念的相对性，并以此来攻击和反对道德不变论，坚决否认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体系。但是，他所持守的这种“进化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提倡渐进和积累，以此来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坚决反对任何激进的方式。他后来提出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以及以“容忍”来注释自由主义和他自己，都是严格循守这一渐进的“进化论”原则的产物。他最著名那个政治学术观点：“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也明显是根源于这种“和平的

渐进的进化论”原则。这样一来，《新青年》就有了两张不同的面孔：一张是激进主义的面孔，还有另一张是渐进主义的面孔——前一张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社会主义者所赋予它的，而后一张却是由胡适来顽强描画的。“渐进主义”并不表明胡适对中国传统旧道德和旧文化的攻击就是软弱的，其实，恰恰相反，胡适的细密、周全和理智正突出表现在这当中。他不像陈独秀那样凶猛而粗糙、率真而缺乏策略，他对反叛对象的打击更显出其训练有素的步骤和功底。胡适不只像陈独秀那样，先大呼孔孟旧道德、旧文化是如何的不对，如何的“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相背驰”，以及“不能支配现代人心”之类，他还深刻地“实证”分析说：中国正统的儒家道德文化，仅仅强调道德行为中的“自觉”原则，而竭力排斥道德行为中的自愿原则和意志自由原则，因此最终被封建皇权专制所利用，甚至走向了道德的反面。他认为，只有强调道德行为必须出于自愿和意志自由的原则，每个人才真正具有独立的人格，才真正具有自由意义上的道德品格，这样才能最终抵达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觉”。

三 “健全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

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的“易卜生专号”可以说集中反映了以胡适代表的一批实证主义者的社会批判立场和他们所持守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这期刊物上，除了他与罗家伦合译的《玩偶之家》，以及陶孟和译介的《人民公敌》引人注目外，应该说，最诱人关注和思考的是他撰写的具有导言性质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这篇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文献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观点，同时还鲜

明地发表了他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一系列意见。胡适认为，中国封建皇权专制所提倡的旧道德，其最大的罪恶就是专事扼杀个人自由意志，排拒道德自愿原则。他之所以要引进易卜生和“易卜生主义”，是因为“易卜生最可代表 19 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精华”。那么，何谓“易卜生主义”呢？他是这样回答的：

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便是易卜生主义^①。

他还解释说，易卜生生平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那就是“主张个人须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这种关于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又被他归纳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胡适最赞赏易卜生实话实说的胆略和批判精神。他认为，他和易卜生所揭露和反抗的这个“社会”，包括家庭、宗教、法律、道德以及风俗、习惯，特别是政治制度。他慨叹：“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真实状况。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② 十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文存》第 1 集卷 4，第 812

^② 胡适：《易卜生主义》见《胡适文存》第 1 集卷 4，第 14~15 页。

分明显，在这种强烈的批判和反抗意志中，也包含着胡适的报刊自由主义观念。那就是：负有思想启蒙重任的报刊，必须敢于直面和勇于揭露社会“男盗女娼”的现实，这样才能真正肩负起推动社会文明前进的历史使命。

胡适尖锐、猛烈地谴责专制主义控驭的社会的罪恶，其“最大的罪恶 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 不使他自由发展”。他还指斥说：“易卜生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人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①怎样才能使这种罪恶的社会现实彻底改变？怎样才能使“新青年”们的反抗成功？他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第一，须使个人要有自由意志，亦即“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强调，惟有这样，才会有由独立人格组成的理想的、合理的社会，才会有真正自由的社会。只有充分理解了这两点涵义，才能充分认识到什么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或者说“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②。那么，可不可以提供这种“最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楷模，或者说最佳标本呢？胡适回答说：斯铎曼医生就是。《人民公敌》中的斯铎曼医生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他不满现状，敢于说实话，他对自己的思想信仰和所有言行敢于负全部的责任。就因为他无所畏惧地揭露和批评社会的黑幕，所以被全社会的人唤作“国民公敌”。但是他一点不惧怕这种“公众舆论”的恶毒凌压，继续表达自己对这种罪恶重迭着罪恶的社会现实的反抗

① 胡适：《易卜生主义》，见《胡适文存》第1集卷4，第24页。

② 同，第36页。

和蔑视。胡适提醒说，这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是最值得中国的“新青年”学习的真精神。胡适还有许多的潜台词包括在里面。比如，他自己就一直以斯铎曼医生自喻自励。因此，他也要求具有自由主义品格的报刊，必须具备这样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品质。其实，说穿了，胡适在这里所说的斯铎曼，完全可以看作西方式的民间独立报刊的品格具象。他感叹说，中国太缺乏像斯铎曼这样的敢于作“国民公敌”，而绝不惧怕与邪恶的“公正舆论”相对抗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者了。在真正自由的国家和社会里面，缺乏独立自由的人格是无法想象的，一群既无自由选择之权，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担干系、不负责任的奴隶，是决不会构成真正自由的国家和社会的——对每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每一张报纸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

“健全的个人主义”，是胡适运用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指导人生和个人人格建设最精粹的一种表达。他的这种表达虽然强调了自由意志和个承担责任等主要的自由主义内容，但是却没有杜威在解释“真的个人主义”时那么清晰简洁。“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他的特征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①事实上，随着他对实证主义的进一步深入理解，他对杜威的“思想完全独立”和“个人必须对自己的信仰负完全责任”的理念有了操作意义上的创造性发挥。

^①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见《胡适文存》第1集卷4，第174页。

四 宗教意义上的新闻观

1920年8月，胡适联合李大钊等人在《晨报》上发表了著名的《争自由宣言》，公开谴责北洋军阀控制的极权政府颁布的“治安警察条例”，要求废止这个以限制国民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无耻条例，并要求切实遵循《人身保护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1920年9月，《新青年》迁往上海，正式由自由主义者的同仁杂志变为激进主义的机关刊物，胡适慨叹说：“在北大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①大有鲁迅所谓“荷戟独彷徨”的寂寞和无奈。当时这个以中国的“斯铎曼医生”自喻的胡适，他还忍不住连续写了好几封信给陈独秀和李大钊，指责他们把《新青年》几乎都“变成《苏俄》周刊（当时在美国出版的左倾刊物）的汉译本了”，并要求陈、李二人速将《新青年》迁回北京。由于双方分歧太大，陈、李均拒绝了他的建议。自此，这个同仁团体正式走向分裂。

1922年，脱离《新青年》后的胡适干脆自己创办了一份道地的自由主义杂志《独立周刊》，借此来宣传自己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和社会、历史观。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这个刊物发挥了多么重要的社会影响，而是这年2月22日他在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上的演说中所公开宣示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胡适主要讲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他之所以非常欢迎“新闻记者同志会”的成立，并且鼓励说：北大学生愿意从事新闻事业的人越多，他就越高兴，是因为他向来将新闻工作视作自由主义者最合适的职业岗位——参加者越多，

^① 参见《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0页。

说明自由主义者的群体越壮大，“健全的个人主义者”也就越能形成改造社会的力量了；第二，他又表示了对一些从事新闻职业的北大学子的不满情绪。他希望报刊是传布新知识、新思想和引导青年养成一种自由空气的启蒙读物，希望报纸不要被任何政治派别和政治学说“牵着鼻子走”，但他感到非常失望。原因是，有些人竟然“拿马克思等人去做充篇幅的事”。他认为这是“最痛心的……很可耻的事情”。第三，“独立的”和“自由的”报刊应当像“健全的个人主义者”一样，专注于“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应该大家来讨论，变为有力的主张，这个对于社会才算有贡献。”言下之意，被“主义”之类“牵着鼻子走”是不算有贡献的；第四，他强调，报纸和记者应该学习斯铎曼医生的精神，勇于面对血淋淋的社会现实，敢于大胆揭露社会丑恶，“宁可为讨论活的问题被封，坐监禁，遭枪毙，不可拿马克思……来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的报纸充篇幅！”^①总之，胡适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与他一贯所坚持的实证主义哲学信念指导下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坚持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该像斯铎曼医生那样，永远甘于做一个“特立独行之士”，哪怕被“公众舆论”视为“国民公敌”——因为，“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他还在《科学的人生观》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两篇具有“特立独行”宣言性质的政论文章中，反复陈述了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崇高和神圣，他甚至将这种人生观举颂到了宗教化的地步，最终提出了他的“社会不朽论”。胡适以一种少有的宗教热忱阐释说：

^① 以上征引详见《新闻研究资料》第47辑，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76~78页。

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①

在这里，他把人类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解释为“大我”和“小我”的关系。“小我”构成“大我”；“小我”可以消灭，但“大我”却是不朽的。只是“大我”的不朽，必须以“小我”的高度的自我负责精神和独立自由意志为前提。这样，“小我”表面上消失了，但是究其实质，它却活在“大我”的不朽当中。然而，这个“大我”必须要尊重“小我”的独立和自由意志；这样，这个“小我”才会为“大我”担干系和责任。

事实上，“社会朽论”中关于“小我”与“大我”关系的逻辑描述，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不光为每一个自由主义者提供了宗教意义上巨大的精神慰藉和支持，也为每一份自由主义报刊、每一个自由主义报人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巨大的献身热忱。这种虔诚而且义无反顾的献身热忱，我们不仅能在胡适本人身上可以醒目地看到，而且在后来的邵飘萍、史量才、张季鸾、胡政之、雷震、李敖，特别是胡适晚年的思想对手殷海光等大量的自由主义者身上都可以醒目地看到。

^① 参见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存》第1集卷4，第221页。

第四节 李大钊：若隐若现的自由主义豪侠

一 生平及思想地位

当胡适执着于自由主义信念，依然坚持用西方的社会价值观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来支持自己，进行“点点滴滴”的价值重估和重建的努力时，《新青年》营垒已经悄悄地开始发生重要的裂变了一——一批曾经接受或信奉过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悄悄地接受并醉心于西方送来的另一件新的思想礼物——社会主义了。李大钊是这批人当中最早分裂出的一个。

1918年，这个具有燕赵豪侠悲剧气象的思想界明星，突然决定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好好读点书。几个月过去了，他长舒一口气，以一种醍醐灌顶的畅快走出书斋，当即向世人宣布，他将从此信奉社会主义。“这位热情的爱国者从第二年开始，以不太明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说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心仿照苏俄，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另辟一条能够迅速见效的劳工革命、阶级斗争的道路。”^①这个时候，陈独秀却仍旧沉醉在其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学术眷恋之中，他对俄国革命尚缺乏李大钊那样的豪迈感觉。然而，《新青年》同仁营垒中谁都知道，新文化运动造就的这个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已经不可避免将走向终结。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18页。

这个行将到来的终结，不仅预示着中国新一代自由主义者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蜜月将告一段落，而且还预示着他们之间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将发生严重的政治和文化冲突。

不过，对李大钊来说，此前他以一个自由主义者身份所做出的那些思想贡献，并不因为他转变成社会主义者而失去了意义；同时，也不因为他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体系中就不再没有一点自由主义的成分。在 1919 年以后，当严复、章炳麟、梁启超等人已先后由自由主义转变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时，胡适和李大钊分别代表着从《新青年》中分化而出的两大社会思潮——这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它们与保守主义思潮一道，共同呈显为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三大政治学术派别。

和陈独秀非常相似，李大钊的自由主义出身，使他在鼓吹和宣传以苏俄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思想时，不可避免地常常显露出他的自由主义本色。尤其是在他的报刊思想中，这种本色简直达到了自然流露且挥之难去的境地。应该承认，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领袖人物，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但是，作为一个前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贡献同样令人不容小觑。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早年丧父母，与祖父相依为命。1905 年入永平中学；1907 年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那里他开始接触“新学”，关心国家政治。1913 年发表《大哀篇》，愤怒斥责专制制度和北洋军阀的血腥罪恶。1914 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并发起组织“神州学会”，秘密从事反袁活动；1915 年日本与袁世凯勾结，他拍案而起，散发《警告全国父老书》、编印《国耻纪

念录》。袁试图复辟帝制时，他痛斥筹安会的罪恶活动，名声大震。1916年由日本归国，被《晨钟报》聘为编辑，同年投身新文化运动，所著《晨钟之使命》等时文，最具有自由主义的浪漫情怀。同年秋，针对保皇党领袖康有为等人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而奋起著文反对，并讥嘲孔子是“残骸枯骨”及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护身符。1917年，其主要的身份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提倡和号召青年“到农村去”；1918年初步完成由自由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加盟《新青年》，同时又与陈独秀等人创办《每周评论》，与王光祈等人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就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与之爆发激烈的论战。1920年2月在北京大学校内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为小组领导人。1921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他虽未出席首次党代会，却被公认为“党的创始人”之一。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为主要领导者；同年6月，国共首次合作，李大钊为积极促成者之一，同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5月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6年3月18日，组织领导北京学生举行反对英美的示威游行，被北洋政府军警殴打头部，“3·18”后，为躲避通缉，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的军队逮捕，4月28日在绞刑台上从容演说，壮烈牺牲。

在《新青年》同仁当中，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具有相当长的办报办刊历史，同时也具有相当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但若是以数量计算，李大钊还远胜于陈独秀。从1912年到1927年他从容就义，这15年间，由他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报刊就多达15种。除前面介绍其生平时述及的那些事迹外，他还参与了如下

一些报刊的编辑工作，从这些活动中可以考察其思想经历及变化轨迹。他几乎是由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兼自由主义者，再过渡到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最后突变为社会主义者兼自由主义者的。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在他的思想发展中若隐若现，或暗或明。然而，终其一生事实上他都没有完全与之脱离干系。

李大钊早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时，就参与了《言治》月刊的编辑和组织工作。他最初的政论和文学活动就是从这本杂志开始的。稍后，他还与同仁一道合编了一份名为《法言报》的学生政论报纸。当然，最值得纪念的是他在留日期间所主编的《民彝》杂志。这是当时的留日学会总会的机关刊物。1916年，他应汤化龙和孙洪尹之邀出任《晨钟报》总编辑，正式拉开了他“铁肩担道义”的政论家和思想家的激情帷幕。后来，他还与友人白坚武、秦立庵等联合创办了《宪法公言》杂志。1917年1月，《甲寅》日刊在北京创办，他应邀出任编辑。1918年底加盟《新青年》营垒，但其主要的工作却是协助陈独秀办《每周评论》，在思想启蒙之外另辟一块政治斗争的阵地，以满足陈独秀和他自己的“政治革命”嗜好。参与编撰《每周评论》，是李大钊由自由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最初的信号。《新青年》解体后，他还参与和组织创办过一些报刊如《劳动音》、《工人周刊》、《政治生活》还包括他协助国民党左派创办的《国民新报》等，但这些活动都不过是他所从事的党派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罢了。不仅与此前所从事的报刊自由主义活动毫不搭界，而且与此前作为启蒙思想家所表达出来的内心焦灼也大不相同。然而，李大钊给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留下的印象，以及投射的影响，就一如他给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施加的印象和影响一样，却是同样的深刻而绝难磨灭的。

二 新闻思想的哲学伦理背景

李大钊与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不太一样。尽管他在历史观上是一个“进化论”者，但是由于他教授经济学，因而他在发动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攻击时，常常习惯于用经济的视角来审察罪恶的历史和现实。这或许就是不少官方学者称赞他“善于用唯物史观分析和批判封建纲常礼教及其经济基础”的主要原因。应该说，在《新青年》同仁都从各自的术业专攻方向上向旧文明体系发动打击的情景下，李大钊选择的这个角度的确是新鲜而且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他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这样写道：中国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创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它的表层构造。

这种古旧的“农业经济组织”无疑是产生皇权专制主义的直接土壤。而“孔子主义”，或曰“孔门伦理”正是这种专制主义的“护符”——是维系和服务于这种专制和这种土壤的“专制社会之道德”。与胡适以西方的“斯铎曼医生”为参照，并用实证主义的眼光去发现中国旧传统、旧道德严重阻碍和扼杀个性和自由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大钊从经济制度入手，条分缕析终至发现中国的皇权专制，以及为这种专制制度提供道德庇护的“孔门礼教”同样是阻碍和扼杀个性和自由的元凶。因此他不能不大声指控道：“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

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全结晶体。”^①就如同胡适指责孔孟道德是以扼杀或窒息道德行为中的自愿和自由原则一样，李大钊尖锐地指出：孔门伦理的作用，就在于“使人牺牲他的个性”服从“绝对的权力”；“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这是“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李大钊非常具有自由主义的批判激情。在愤怒揭露和批判了“孔门伦理”的专制主义罪恶后，他又指出：

社会上种种的解放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②

在正式成为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者之前，李大钊对中国专制主义及其帮凶“孔子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是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的，其指出的社会革新方向也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他非常乐观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文明的大规模东渐，将从根本上摇撼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中国旧式农业经济基础。这样，伴随着新经济势力乘虚而入的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将毫不留情地冲毁中国的大家族制度。他断言，“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溃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在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参见《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② 以上所引皆参见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这样一种局面下，他甚至已经瞻望到了自由主义的道德前景：即“变弱者之伦理为强者之人生”美境——这种美境“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李大钊和严复等启蒙先驱一样，认为近代西方历史就是争自由、争人权、求个人解放的历史。这个观念成了《新青年》同仁的共识，同时，也是李大钊这样的激进主义者能和胡适这样的渐进主义者调和共事的知性基础。“为人持重的李大钊提出：中国必须改变‘不尊重个人之权威与势力’的立国精神，‘非大声疾呼以布扬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而胡适则借易卜生‘救出自己’的自我主义，……一位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先驱与一位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异口同声，显然说明了《新青年》同仁……有感于中西社会对自由、个性的一贬一褒，而更加强调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谋求人人自我解放。”^①说“异口同声”不错，但如果认为李大钊一经成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先驱”就全然抛弃了对自由主义的眷恋，那就大谬了。李大钊在倡导价值重建、呼唤个性解放时，所设计的那种具有独立自由品质的理想人格，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调和互融的产物。这种具有浓厚的“原创”色彩的道德人格，他把它叫做：平民化的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平民化的自由独立人格不同于斯铎曼式的贵族化的自由独立人格，李大钊的“原创”弥补了胡适的不足。

李大钊认为，《新青年》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催生出一大批“新人”，而决不是圣人和贤人。这种“新人”首先应具有自由独立的人格，他们渴望个性解放，勇于改造现实，抨击传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 315 页。

统，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怀抱有执着的“大同”理想。在《平民主义》当中，他全面阐述了为什么要将个性解放与大同理想整合的道理。他先从西方近代历史中找到说辞：近代西方有两大运动，一个是个性解放，即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另一个是大同团结，即社会主义运动。他认为，“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并且还号召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这段话，是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补充的。由此看来，他在成为布尔什维克先驱后，并没有一举将自由主义所涵盖的人道主义逐出他思想领域，而是信心百倍地认为二者是可以相辅相成，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不可偏废的。这可以说是他与胡适的最大区别——虽然胡适在后来曾有个短暂的时期对苏俄的“社会主义”经济试验表示过好感，但他一直认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两种意识形态。

三 “合理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

李大钊执着认为，平民化的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其最高境界应体现为个性解放与大同和谐的统一，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在此前提下，他还进一步引申并提出了“合理的个人主义”的概念。他阐释道：首先这种个人主义必须与“合理的社会主义”统一，才能获得自由独立的人格；其次，这种自由独立的人格还必须是“秩序”的产物。在《自由与秩序》中他是这样说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应是秩序中的自由，而真正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但他又补充说：“真实的自由，都是建立

在‘爱’字上的。^①这无疑更具有自由主义的色彩。他还说：“人类相互之间，自然要各尊重各的个性；各自的个性，不受外界的侵害、束缚、压制、剥夺，便是自由。”但是，他最后还是将这种个性的自由归结到“大同的远景”上——如果说在没有找到苏俄模式之前，他所理解“大同的远景”还停留在康有为的审美层面，即将西方的天赋人权和平等、自由、博爱理念与儒家的“大同”思想整合，而描画出的一个乌托邦图景的话，那么，对苏俄模式的惊喜和追摹，似乎使他看见了更加“真实”的幻景。这又与胡适截然相异。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是完全以西方的，特别是以美国的价值理念为背景的。

然而，李大钊还是充满了矛盾。他在《真正的解放》中提到的“自用其我”自由观念，又绝对不是苏俄的，反倒使人多少想到了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某些特征：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里，打出一条光明的路来。^②

“自用其我”是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显著特征。其一，真正的解放完全靠自己，不乞怜于任何权威的恩典；其二，还必然“至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境”——亦即，先有个人独

^① 李大钊：《双十字上的新生活》，参见《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315页。

^② 李大钊：《真正的解放》，参见《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95页。

立自由，后才有“福益于其群”，也就是社会的独立自由。

李大钊与自由主义难以割舍的暧昧关系还体现在 1919 年冬天，由蔡元培领衔、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当中。这篇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自由主义宣言，其署名者就有李大钊和陈独秀。“尽管李大钊已经走上了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陈独秀的转变也是近在眼前的事，但这份宣言却几乎或完全未反映出他们这种新的热情。相反，宣言却表达出了胡适的观点，尽管他在这方面做出了最小限度的让步。”^①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并不复杂，李大钊此时对苏俄“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并没有发展到要与自由主义彻底分道扬镳的地步。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还是可以携起手来共同反抗传统和形形色色的专制威权，还是可以结成统一战线，把“个人主义”引向“合理”的“大同的远景”上去——还有，他当时还无法预见到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会结出斯大林主义的珠胎来。自由主义倒的确是斯大林主义的死敌。李大钊不是政治巫师，他给自己选定的角色是做一个平民化的独立自由的“合理的个人主义者”——所以，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没有彻底与自由主义“划清界限”。

可以说，在李大钊成为社会主义者之前，其报刊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站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上的；在他成为社会主义者之后，在鼓吹俄式阶级斗争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也在暗中继续使用自由主义的武器，只不过他给这件他用熟了的武器装上了一个叫“布尔什维主义”，或者叫“大同的远景”的醒目刀鞘。

早年在日本，他所鼓吹的“青春”哲学，事实上是道地的

^① 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 193 页。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历史观的哲学，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最基本的观念特征之一。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他解释了这种“青春”哲学，认为“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他的乐观昂扬和奋不顾身，执着反抗，热情瞻望，其实都是来自于这种进化论历史观的强力支持。他主编《民彝》和《晨钟报》时，最爱动用“青春”这个浪漫而充满生机活力的语词，又最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两句联语，都明显来自这种自由主义理性品格的鼓舞。

同样是出于自由主义的理性自觉，李大钊始终坚信，只有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彻底废除和扫荡统治与屈从关系，才能使个性得到真正的解放和真正自由舒张的发展。他认为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实质，同时也是他所期望的“合理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基于此，他历来反对政党政治对个性的统驭钳制。他与章士钊之所以最后割席分手，“彼此厌倦”，就是因为他拒绝章士钊的胁迫，不作拥黎（元洪）反段（祺瑞）的政治附庸。他尤其鄙视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热衷于党派之间的争权斗狠，热衷于做段祺瑞政府的御用工具。由此他专门著文尖锐批评这些屈从于政党政治的傀儡，并公开表明自己的自由主义态度。他说：“（政党政治）宜求之于政制之主张，不宜求之于人物之依附。”在这一点上，他显然已超逾了“党报思想”的概念。他与章士钊等人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巨大的分歧，全在于他所暗暗持守的报刊自由主义观念。他认为即使是像《甲寅》这样的报刊，也决不能放弃独立自由的立场，去做“人物之依附”的工具。应该说，这与他一贯赞赏和提倡的平民化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是一致的——人，应该有这样的理想人格；报刊，应该是这样的具有理想人格的报刊。

四 新闻思想中的独立意志

1922年2月12日，李大钊、胡适等人一道参加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胡适的演讲我们已经领略过了。李大钊的演讲同样应引起我们的注意。须知，这时他已经是为国人所熟知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他理应利用这个机会宣传阶级斗争学说。但奇怪的是，面对胡适在演讲中一再重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类的话，以及希望报纸不要作任何政治附庸的指责，他并没有当场予以反对和驳斥，而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北大的学生：“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并基于平民的立场批评说：“现在的新闻界，遇着督军的举动，或阔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用大字，排在前几版；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很大的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这简直“就是新闻界的一大缺点”和耻辱^①。他甚至当场给新闻下定义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情况的写真”——之所以使人感到惊讶，是他的演讲词中居然没有一句与“党报思想”有关的话。惟有的却是以平民化独立自由人格对新闻事业的殷殷期待。李大钊还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承认报刊具有商业属性的人。他曾在《晨钟报》上著文指出：“报馆本来性质，在于营业，既为营业，则经济学上需要供给之原则，不可不一顾也。”^②坦然承认报刊是商品，这在西方报业中本是一个常识，用不着惊骇。但是，李大钊说这些话时，正是民初政党报

^① 参见《晨报》1922年2月14日报道。

^② 参见《晨钟报》1916年9月14日李大钊著：《新现象》。

刊泛滥之际、“党报思想”统领舆论界之际。说报刊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喉舌、号角之类谁都没有意见。如果谁胆敢说报刊是商品，恐怕会背上大逆不道的骂名。所以，他说出这个常识时，明显是因为有西方大众化商业报纸，特别是“独立报纸”的自由主义实践在给他提供说真话的依据和勇气。

对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争取和维护，始终是李大钊一生奋斗的核心内容。作为思想启蒙领袖时是这样，作为政治斗争的领袖时同样是这样。在此特别要提到他的几篇不大为新闻学专家青睐的文章。它们是：《哪里还有自由》、《宪法与思想自由》、《议会之言论》和《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这些文章中的思想，不仅是李大钊新闻思想中堪称精华的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中不可多得的思想文献。这些文章所凸显出来的李大钊的精神形象，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这些使人一睹将终生难忘的文字表明：“李大钊是言论自由的极力鼓吹者、思想专制的猛烈抨击者、自由理想的热情捍卫者、宪政政治与代议民主的真诚追随者。”^①

在《哪里还有自由》中他愤怒地斥问道：

“约法”上明明有言论自由，可是记者可以随便被捕，报馆可以随便被封，“约法”上明明有出版自由，可是印刷局可以随便被干涉，背反“约法”的管理印刷法可以随便颁布……可怜的中国人呵！你哪里还有“约法”！哪里还有自由！

在《宪法与思想自由》中，他是这样宣讲“自由”这个文

^① 参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 81 页。

明常识的：

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需之要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

他还悲愤指出：“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西班牙、土耳其。中国文字之劫，烈于秦火……”对照英国的《大宪章法》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他更是悲慨不已。他认为，“思想自由是出版自由、信仰自由与教授自由三位之一体，也是自由最核心的部分。”李大钊等人对教授自由的强调，构成了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部分。”^①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中，他强烈反对专制主义者以“危险思想”的借口禁锢言论，扼杀自由，不仅是凶残罪恶的，而且是愚不可及的。这篇文章堪称继承和发扬约翰·弥尔顿自由主义思想的典范之作。他大声疾呼道：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心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他还转述约翰·弥尔顿关于“言论公开的市场”的精辟观

^① 参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 81 ~ 82 页。

点，主张让各种各样的主义和学说在大地上流行。真理只有在与谬误的公开斗争中才能被人们认识和接受，“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最后，他严厉警告专制主义者：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思想是绝对自由的，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李大钊一生的努力都是循照着思想自由的方向勇猛而去的。他不仅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且还给中国的传播事业提供了以自由主义和“合理的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传统。

第五节 蔡元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审美旗帜

一 生平及思想地位

蔡元培的出现，在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险程中称得上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异数”。在辛亥那一辈革命党先驱人物中，蔡元培是很少几个能紧紧追随世界文明潮流执着前行的思想者和实践家。而鼓舞他鞭撻他、义无反顾、躬行不辍的正是深深植根于其内心的自由主义信念。

蔡元培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影响同样是既深且巨的。用自由主义理念去影响和规范教育和学术，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审美人格建构，可以说，是他以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在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自信的同时，影响和规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旷世杰作。

许多年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对蔡元培作过许许多多的评价和赞美，有说他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的，也有说他是伟大的教育家、美学教育家和新闻教育家的，这些赞美都不能说有错。然而，却很少有夸赞他是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具体到中国新闻史，特别是中国新闻思想史的研究中，这种不该存在的聳盲现象，还依然存在。蔡元培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性，或许我们今天还难以真正认识到。北京大学有三个重要的校长：严复—蔡元培—胡适，结成了一根非常坚韧的自由主义链条，而他正是这当中最关键，而且最引人注目的一环。严复虽然在这块自由的实验园地中率先呼喊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响亮口号，但后来，很快由于政治上的颓唐、昏聩和在思想上的保守、萎缩，使这两个基本原则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落实。是蔡元培将这两句口号切实地变为了具有操作意义的生命资源、最终使北京大学成为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最坚强的重镇，同时也成了培养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摇篮。这种局面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似乎也是绝后的。“蔡元培先生的贡献，既是北京大学和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骄傲，但其中也隐含着一种悲哀，即他所提供的平台仍然

是人格的平台，而非制度的平台。要想使兼容并包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所有大学的办学方针，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就不能不关心如何把过去支持兼容并包的人格平台，变成将来不随人格力量而动摇的制度平台。否则，即使再次出现建立人格平台上的‘兼容并包’局面，在历史的长河中仍将是昙花一现。^①刘军宁先生对蔡元培的这种悲剧审视和理性评价，不仅对中国大学的教育方针，而且对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都是具有相当的反思意义的。蔡元培在建设“制度的平台”方面不是没有作过顽强的努力，他的悲剧是：中国的专制极权主义不喜欢，并且野蛮地阻止了他的这种建设和努力。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后改字仲申。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人，其父宝煜，从事商业；1877年父病逝，无钱请塾师，附读于他家；1879年，受业于秀才王子庄，习八股文、渐“崇拜宋儒”；1883年考中秀才，与蒙师分手，回家“自由阅读”；1884年充任塾师，在家乡设馆教书。此前曾受叔父铭恩指教，并入龙山、嵇山两书院就读；1886年，入同乡徐树兰的“铸学斋”校订图书三年，得以“博览群书，学乃尤进”；1894年被聘为上虞县志局总纂；1892年赴京补复试，中进士，并为翁同和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开始泛览西文书报，接触新学”，时感触甲午悲剧，大恸；1897年在杭州创立求是书院；1892年戊戌变法失败，痛感政治改革无望，挂冠还乡，任绍兴中西学监督；次年受聘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不久旋任诸暨丽泽书院院长，力劝改书院为新式学堂；1901年与张元济等创办《外交报》，分任撰述；翌年与同仁组织中国教育会，被举为董事长。是年夏，

^① 参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10~11页。

与高梦旦同游日本，1903年在上海张园发表演说，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同年还组织拒俄义勇队，为营救章太炎、邹容四处奔走、组织出版《俄事警闻》；1904年作《新年梦》，表达建造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浪漫愿望。同年聘任为《警钟》日报主编，与爱国同仁创建光复会；1905年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主盟员”；1906年任译学馆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1907年至1911年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系统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政治、法律制度等，并深受康德等人哲学的影响。这期间写作并出版了《中国伦理学史》和《中学修身教科书》；1911年被孙中山等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阐述其自由主义教育观念；1912年夏辞去教育总长职务，“不当伴食内阁”，以示对北洋政府的强烈不满。其间还主持了全国会议，领导制定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壬子、癸丑”学制。不久，携妻儿复进莱比锡大学继续攻读，并重入该校“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进行研究。次年6月奉召回国，参与宋教仁被狙杀一案调查。9月，“二次革命”失败，偕眷去法国，在科隆从事译著；1916年《旅欧杂志》在法国创办，任主编。同年11月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发表就任校长演说，重申以自由主义治校的立场。8月，在《新青年》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等著名自由主义文献性文章。12月，在校庆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希望北大能与有百年历史的柏林大学“相颉颃”；1918年1月，组织北大进德会，撰写该会“旨趣书”。12月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发刊词，阐明“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宗旨；1919年4月，发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提出“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5月8

日，向北洋政府提交辞呈，旋离京返浙。7月9日在师生强烈要求下复返北大继续任职；9月20日，在北大师生欢迎大会上演说，宣布循自由主义精神实行学校民主管理；1922年3月，发表《教育独立议》。4月，领衔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1923年1月发表《不合作宣言》抗议北洋政府摧残人权。并刊出“不再到校”启事，遂拂袖而去……其后，与宋庆龄、鲁迅、杨铨等组织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继续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1940年3月5日在无限的遗恨中辞世。

蔡元培一生中不仅有非常丰富的办教育经验，而且也有非常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无论是办教育还是办报办刊，他始终坚持将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原则灌注其中，力图做到能在制度的层面和思想的层面上体现出来。当然，能坚实有力地支持他在教育和学术、新闻领域进行这种了不起的实验的，是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理想。

二 新闻思想的哲学伦理背景

蔡元培的政治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更多的是集中体现在教育方面，同时，以这种哲学和伦理学为观念和价值背景的教育思想，又结晶为蔡元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精华，进而辐射到与个性解放和自由人格建设有关的其他领域——新闻教育无疑是最直接的影响和受惠领域。事实上，蔡元培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中原本就包含着新闻教育传播思想。

在他的教育思想里面，特别是具体到其主张和实践的结合上，可以明显看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并非一句空话——尊崇自由甚于其他任何的价值观念；尊重“人”的独立

人格而甚于尊重其它任何东西，特别是“财产”；提倡宽容、尊重理性；反对权威、崇尚批判精神等等，无一不包含在这个宏大的思想体系和实验意图里面。正是坚持循守这样一些原则，蔡元培始终认为，办教育也好，办新闻也好，首先必须从“砥砺德行”培养“完全人格”人手，惟有这样，所办的教育事业，所办的新闻事业，才称得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和具有“完全人格”的。

他很早就发现，人格建设的缺失，恰恰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历次革新和改良惨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有些见解比梁启超正式提倡“新民说”还要早——这种来自政治和道德的双重焦灼，可能曾受到过章炳麟的感染。章认为，戊戌维新和唐才常的悲剧，主要是党人，特别是其中的领袖人物在人格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维新失败后，蔡元培之所以痛感清廷改革“无可希望”除开其他的政治、文化因素，包括权谋上的失误外，根本还在于“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①故而认为，启蒙救亡，恐怕先要救救那些投身启蒙救亡的人，也就是说应先在人格建设上花力气。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确必须以自由主义精神来规划这种人格建设工程，然而，他已经萌发了取镜西方民主立宪体制下的教育思想来改革中国旧教育的强烈愿望。1901年，在南洋公学任总教习以及在其后创立中国教育会时，他就已经逐渐明晰并画出了他的教育思想的轮廓，那就是，“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

^① 黄世晖：《蔡子民传略》商务印书馆 1935年版，第 32页。

家。^①何谓“理想的国民”，他解释道，就是那种既有振兴实业的资质和技能，又“先养其道德”、在人格上非常坚定执着的新人才。在主办爱国女校时，他更明确指出：“德育实为完全的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恶，无益也。”^②此番议论与他的那个同乡自由主义者鲁迅极为相似。他们在当时都是深感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人格的卑微、奴性十足而萌发改造国民精神的豪情的。辛亥革命后，他尤痛感不少昔日的“同志”私德不修”这些已成为党政高官大员的新贵其道德水平令人作呕。他之所以在辛亥前就急忙将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介绍到中国来，就是已经预感了党人品行的堕落，而生发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壮志雄心。民初，他又急急在上海联络同仁创议发起“进德会”，旋即又与人组织“六不会”、“社会改良会”等，同样是为了阻止这种政治道德风尚的恶化。1912年，他正式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其发表的首篇纲领性文章：《对教育方针之意见》，就明确提出将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这五个方面，作为“养成健全的人格”的系统义项。这当中又以具有独立自由含义的“公民道德”为结穴之核心。其时，他还与宋教仁等自由主义政治家一道发表“社会改良会宣言”，公开主张：“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而无所谓骄谄；意志自由而无所谓侥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号召“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

① 蔡元培：《爱国学社之建设》，《蔡元培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5页。

② 蔡元培：《在爱国女校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01页。

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① 1918年，他组织发起“北京大学进德会”，其在亲自撰写的宣言中训诫北大师生：

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之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未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也。^②

蔡元培的伦理体系中，甚至包括其自由主义理念中，有非常明显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积极用世成分。在这一点上，他的所谓的“完全的人格”与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是有不少语义和价值观上的差别的。这种差异还可以具体从北大进德会将会员划分为甲、乙、丙三等，及不同的规定中看出：甲种会员必须励行不嫖、不赌、不娶妾三大信条；乙种会员又另加了“不作官吏”和“不作议员”两大信条；丙种会员除必严守以上五戒外，还必须循守不饮酒、不肉食、不吸烟三戒。蔡元培将民初提供的“六不主义”发展到“八不主义”并推行到北大，作为其道德人格建设的具体规条，其用心之良苦，自不待言。该会成立时的近470名会员中，教员有76人。其中甲种会员有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马寅初；乙种会员有蔡元培、范文澜、康白情、钱玄同；丙种会员很少，仅梁漱溟、张申府两人。足见，他是把超党派、超官方、超政治视作道德人格建设的更高等级和境界。

① 参见《民主报》1912年3月29日报道。

② 参见《北京大学之进德会》，《北京大学月刊》1918年1月19日。

三 “完全的人格”与自由主义

蔡元培的伦理哲学背景中的所谓“完全的格”，其全面涵义即德、智、体、美不可或缺。但他反复强调，这四个方面应以德育为灵魂。他说“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①。这里所说的“德育”，主要是指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交叉形成的价值体系中的独立自由意志与人格的道德化凸显——儒学中的积极成分也必须服从于独立和自由的原则。那么，“完全的人格”又经由何种渠道涵养而成？他回答说，必须首先要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意志。他始终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必须尊重学生“发展个性的自由”，大力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和“自动精神”；校方，特别是教师“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②；教育的目的最终是贯彻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以养成学生“优美之习惯”。为了使人们更清晰地懂得他所倡导的这种以“完全的人格”为内容的新道德到底应以谁为摹本，他又反复提到其心仪神往的法国大革命的人权意义。他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③，又说：“自由、平等、友爱为道德之大纲。”^④由是足见，他自始至终握持着自由主

① 蔡元培：《在爱国好校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02页。

② 蔡元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89页。

③ 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56页。

④ 蔡元培：《游保定日记》，《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23页。

义和人道主义的旗帜，其道德人格建设自然大异于皇权专制主义治下的奴性的“道德完善”。他指出：“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那么，这种“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具体操作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他铿然答道：“循思想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①他强调：世界观的教育，其精义全在于一点：即坚持思想自由原则，坚决扫荡任何思想专制！他的这些重要的伦理哲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现代化演进，同样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

虽然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事业在蔡元培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的实践经验，但是在学术领域和教育领域，还基本上是空白。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率先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新闻学术团体，率先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教育专业，由此开始了按西方专业模式大规模培养具有自由主义本色的“新闻人”的历史。

1918年初，具有左倾激进色彩的北大学生罗章龙、谭平山等去拜谒北大教授徐宝璜，恳请其传授西方的新闻学知识。徐与时任《京报》社长的邵飘萍商议后，当即致函蔡元培先生，请他出面发起新闻学研究会，蔡慨然应允。1918年10月14日，经过充分的筹备后，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蔡元培到会发表演讲，在指出“凡事皆先有术而后有学”之后例举了西方报刊实践与理论发展的规律并强调：“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济之以什么样的“学理”他没有说，但参照同一时期他关于教育改革的大量言论，即可明晰，这种

^① 《蔡元培自述》见黄世晖《蔡子民传略》第113页。

能指导新闻实践发展的“学理”，只能是以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为圭臬，促进国民“完全的人格”建设的这样的“学理”。

事实上，早在 1916 年 12 月，他行将赴任北大校长前，针对“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的担心，他就坚定表示了不妨用自由主义去“试一试”^①的信心。因此，他也相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北大新闻研究会就一定会在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的同时，也使自身“有特别之发展”^②。

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一直把报刊视作是社会的“公器”，是全体国民的喉舌、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园地。那么，不仅研究新闻实践的学术不允许违背和践踏这些常识，新闻教育更不允许走向这些常识的反面：“共和国家，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尤为绝对之原则”——因此，蔡元培坚持认为，包括新闻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派政党和各派教会影响。”^③为什么呢？他阐释说：“教育是要个性与群体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④这是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其自由主义政治伦理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与西方报刊自由主义的原则是完全一

① 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 1980 年 2 月版，第 36 页。

② 蔡元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 3 卷，第 198 页。

③ 参见《蔡元培全集》第 4 卷，第 177 页。

④ 同③。

致的。德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威廉·洪堡 1792 年就明确提出教育的独立性自由原则，认为国家和任何政治力量均无权插手教育：符合自由主义理念的大学应以塑造完善的个人和致力于真正的学术为其旨归。蔡元培留学德国，显然受到过洪堡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和指拨。当然，严复 1898 年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中主张的教育应独立于官衙和政党，也明显是蔡元培“教育独立”论的一支重要思想来源。这一原则不惟与前述他所提倡的“教育是培养完全的人格”的思想并行不悖，而且更是培养“完全的人格”的基石和保障。其实，在由他领衔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他们所企望和要求的“好人政府”其中一条就是“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具体到教育，就是在宪政的制约下严禁干涉和侵袭教育的独立地位。

四 新闻和教育思想中的自由风范

在《民治的起点》一文中，蔡元培认为，民治的起点必须从个人和社会各组织的自治做起。“独裁是自上而下”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狰狞侵掠、愚昧浑噩；“民治是自下而上”，多元并存、民主自由，相互尊重、清省有序。教育自当遵循民治原则而排拒独裁政治。

在《教育独立议》中，他还指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的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这种以政党的是非为是非，以政党的好恶为好恶所办的教育，其后果不惟扼杀自由，而且连真正的教育也没有了。

还有“政党不能常握政府，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岂止教育，回顾民初以来的新闻界，其情其境之所以惨不忍睹，不就因为不少报刊依附和受御于政党，不仅卑弱无骨、乞食无赖，丧失起码的自由；而且政党更迭此消彼长，甚至连生存的地位都没有了。此种教训实在痛心。他还从“信仰自由”一端引申说：西方文明中，尽管教会间有差别，但教育却是共同的。为什么要体现这样的自由并存风格？其理由很简单，如果任由回教、天主教、耶稣教分主教育，“彼此谁真谁伪，永远无定论。只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他的结论是：教育不光要超然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还必须超然独立于教会教义之外。

其实，最早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元培就公开发表了其反政教合一的严正声明。他大声宣布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由他们自由发展。”特别是在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又重申了这样一个著名观点：“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一自由主义界说后来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刻划。他坚决抵制来自官方和政治派别要其施压以干预言论自由的野蛮威逼，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

……至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学，以无背第一种主张（即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引者注）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其责。

事实是，他不仅为教员的言论自由负了责，而且还凛然维护了教育独立的尊严。这篇致《公言报》的著名函告，在凛然维护教育独立原则的同时，还包含着训诫保守主义者林纾，居然连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常识都不懂，还何以谈得上办报和办教育！在《为罗文干遭非法逮捕案辞职呈》中他再次挺身而出，凛然怒对当局非法干预、侵袭教育独立；同时再次表明自己作北京大学校长，不只是在口头上呼喊教育独立、学术自由，而且随时都可以在行为上作独立自由的捍卫者和殉道者：

窃元培承乏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虽职有专司，然国家大政所关，人格所在，亦不敢放弃国民天职，漠然坐视……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

他坚持在把自由主义教育理念具体化为北京大学的思想学术规则和制度范例的同时，也自然涉及到用自由主义的新闻理

① 此前蔡元培曾发表《复张缪子君函》。张系北大学生，来信述及林琴南常把攻击北大的稿件托其转交报刊发表。蔡先生复函说：林毁坏本校名誉，你“发布之，于兄爱母校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念来具体指导新闻教育和新闻人的敦品建设。1919年11月，他特地为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徐宝璜先生所著的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撰写了序言。其中他专门指出，新闻人应该是忠实于客观事实，不畏任何强暴，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历史记录者：“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为乎。”在备述新闻学科的独立性以及与众多学科的关联性之后，又饶有深意地提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事业对中国新兴的新闻事业的学术和实践参照意义：“新闻事业在欧美各国，均已非常发展，而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自美国新闻家 Joseph Pulitzer 君创设新闻学校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各大学之特设新闻科者，亦所在多有。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他希望北京大学和徐宝璜先生能带个好头，率先将美国，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自由主义教育和学术研究风气带到校园来，再吹送到校园外广大的社会空间中去。在他的鼓动和赞助下，北京大学的新闻学讲坛，才真正成了传播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培养自由主义新闻从业者的场所。徐宝璜、邵飘萍等人在这个讲坛所作的新闻启蒙努力，日后证明确是影响深远的——在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民间自由主义报刊运作中，那种薪火传承、燎原成势的因果联系非常显豁。而这一切，倘若离开了蔡元培等人勇辟草莱、特立独行的卓越垦拓之功，是断不会形成如此可观的实践局面的。中共领袖毛泽东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确为名实相符。而中共另一领袖周恩来赠以挽联称颂其“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就更具有高度概括的真实感人意义——为自由而生，为民主而死。这才是自由主义大师蔡元培的思想和人格真相。

第六章

自由主义新闻学术及教育体系的确立

第一节 学术建构与教育垦拓期的自由群像

一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学的再度影响

在价值重建运动中，新一代启蒙思想家更多的是以工具理性的眼光，去接纳和改创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在新闻

学术和新闻教育领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悲剧般地进射着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家和教育家的救世焦灼。

在这种奇特的经验和理想背景下，中国知识界掀起了第二次西方新闻学译介和研究高潮。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第一次开始认真构筑他们自己的新闻学术体系，开始从理论的建构上进一步完善、规范和提升他们自己。其显著的标志至少有这么几点：第一，自由主义或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新闻学术团体的兴办；第二，自由主义或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新闻教育事业的兴办；第三，具有西方自由主义风格的大众化商业新闻学成为中国新闻理论价值体系建构的主体内容；第四，相当一批自由主义或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新闻理论家和他们的经典著作问世^①。

在此，必须提到西方自由主义新闻学家松本君平和休曼给中国自由主义理论建构所提供的特殊意义。松本君平曾在美国留学，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深刻影响，是在日本最早传布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重要人物。美国记者休曼，却称得上是第一个对美国产业革命后的自由主义报业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重要人物。

松本君平的《新闻学》是第一部完整译介到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著作。尽管这本书早在 1903 年就经由商务印书馆译介出版，并很快受到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自由主义先驱人物的重视，但却没有直接给中国的自由主义报业带来强劲的思想冲击；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前夜，它才被急切寻找思想武器的新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所看重。松本君平状绘大众化自由主义报刊的独立与崇高风范的“名言”，被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广泛引用。

^① 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 280 页。

他说：“彼（报纸）如预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①这番话不能不引起新一代启蒙思想家的特别注意。不仅如此，松本君平还转述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说法，将新闻记者视为与贵族、僧侣和平民齐驱并驾的“第四种族”。其颂扬“新闻记者既可以为一代之师表，于政治更是为党派之方针，即全国思想之进步，尤以新闻之引导为多”^②的评语，不仅是直接鼓舞黄远生、邵飘萍和林白水等有力的思想资源，而且还是直接给初始建构中的中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所提供的最佳思想摹本。“松本君平从产业革命和民主政治入手，研究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与近世文明的关系……反映了政党报纸向大众化报纸过渡时期的西方新闻学观点……它把人们引入了一个比过去宽广的新闻学领域”^③，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系统化的报刊思想理论领域。

相比之下，休曼的《实用新闻学》虽然译介到中国的时间较松本君平晚了整整 10 年，但是，给中国新闻界和思想文化界所带来的惊喜表明，它是应运的和及时的。休曼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建构的贡献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他详细描述和阐释了美国报业所历经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由政论报纸过渡到政党报纸，再过渡到大众化商业报纸所提供的经验和觉

① 梁启超：《本馆第一册视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转述之语，《清议报》1901年12月21日。

② 徐培汀、裘正义、松本君平：《新闻学》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③ 参见《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81~284页。

悟。他认为报纸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是克服政党报刊滥用自由的良方；其二，强调新闻自由必须要有法律的框范和保障。由此可见了休曼的自由立场已经受到了西方报刊社会责任理论的影响。这种经过修正的报刊自由主义，必然也给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建构带来相当的影响。稍后，在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以及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黄天鹏的《新闻与新闻记者》等著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王韬、梁启超等前辈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探索成果在新一代自由主义者那里得到延伸和发挥，又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义新闻学术思想在这些著述中的“中国式”领悟与发挥。

几乎就在休曼被介绍给中国的自由主义报业的同时，国人朱世溱编著的《欧西报业举要》一书也适时推出面世。现今治新闻史者很少有人提及它，但这本书于中国报刊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所提供的经验，特别是其间所呈现的那些相当重要的思想和原则，的确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全书共 18 章，首刊于《申报》。自 1915 年 3 月始到该年 12 月止，足足刊载了近一年。朱世溱是留英学人，对西欧诸国的新闻事业有细致认真的考察。他坦承：编撰该书是为了“资镜”国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新闻界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空论太多，不中事实；党见强词夺理，无客观公正可言；二是无系统科学的新闻学理，“报业之主本不甚固”。该书对中国自由主义报业实践的重要启迪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新闻事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言论自由是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言论博大昌明……其国尚自由矣”；倘若“其国专制之淫威甚，而言论之自由尽矣”。报业要生存要发展，“所持言论之独立”是关键。其二，新闻理性与报业实践的关系。“报章是舆论之机关”，舆

论不是政党随心所欲左右的东西，而是“夫国民本之意见所向，发为言词……民意之所趋向也”。报纸代表民意务必做到两点，一是必须坚持真实性原则，取信于民；二是言论必须独立；“报纸之价值在于自立”但自立又必须取得经济独立的地位。否则报纸“必仰命于强有力者，遂为其所利用”，终至蜕变为“依赖者之奴隶，非舆论之喉舌也，非国民之指导也”。可以说，朱世溱对当时尚缺乏真正独立意志的一些民间报纸的自由主义提醒是相当对症下药和及时的。

同一时期，随着与自由主义多少有点“亲缘”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也逐渐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熟悉并接纳。尽管他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了解尚处在一知半解的兴奋中，但是他们中的先驱人物已经凭着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敏感，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两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思想中活跃着的自由主义因子。

1915年开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由它所引发的五四运动，成了催生和养育一代新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床。康德曾经给西方启蒙运动所作的那个简明扼要的提示和精神界说——“（知识分子）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恰好可以用来定义新一代自由主义者精神群像。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李大钊、周作人，以及徐宝璜、戈公振、邵飘萍等为代表的思想界和新闻界一大批明星人物，醒目地标志着中国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性崛起。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办报高潮重新扬起了约翰·弥尔顿关于“新闻自由（五四先驱们通常又表述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笔者注）的旗帜，并全面准确地予以张扬。约翰·弥尔顿关于“新闻自由”的三大著名观点成为了常识和公理，同时也成为了如空气、阳光和水那样的生命必需。

二 新闻学术与新闻教育业绩斐然

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逐步创立和系统完善的同时，自由主义新闻学术团体的兴起和大学新闻教育的广泛开办，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最值得骄傲的业绩之一。

1917年1月，在蔡元培自由主义学术思想的引导下，北京大学兴创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新闻学科；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由主义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之后，1922年，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家任白涛在杭州创立中国新闻学社；同年，黄天鹏等在北京创立中国新闻学会；1924年，戈公振等发起成立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在踊跃创办自由主义新闻学术团体的同时，一大批新闻学术刊物在思想启蒙的新的时代大潮中，成为了探索和演绎、宣传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阵地。

“新闻研究会”虽然不是正式的教育机构，但却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第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和有教材培训，并明显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民间新闻教育组织和研究机构，它的研究成果当时很快便被运用到了教育实践中去。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经常在北大授课和演讲，除邵飘萍外，蔡元培、李大钊、高一涵和徐宝璜都是当时北京各高校的常客。邵飘萍最初在研究会演讲，每周日讲两小时，广泛介绍西方国家新闻机构的组织结构、报纸出版程序、新闻采访的特点等，特别是对记者的自由主义素质和品格要求，作了详尽的发挥。研究会的宗旨、章程、组织和学术风气以及研究内容都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气氛合拍。徐宝璜、邵飘萍一班人希望通过研究和传播西方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来改造和颠覆中国的新闻现状和政治

现状。事实上，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包括一些后来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青年，如毛泽东、谭平山、罗章龙、高尚德、杨兴栋等，都曾或多或少在课堂里受到过他们的自由主义影响。

仍然是这个时期，中国自由主义新闻队伍的组建，已由过去的历史自发跃升到了历史自觉的层面；由过去古典知识分子好为“帝王师”而始终在“道”与“势”的牢笼中挣扎，真正蜕变为具有独立品格和批判意志的新型知识群体；由过去的“士”的自我艰难转型跃升到完全按照西方的专业模式大规模培养新型报人队伍的层面。继北京大学首创新闻学系之后，一大批新闻院系应运而生，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中外学者走上了新闻教育的讲坛——据《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统计显示，这一时期，全国有12所大学先后设立了报学系科。在北京主要有如下几所：

平民大学报学系。1923年创办，首任主任徐宝璜，教授有邵飘萍等。课程有由徐主讲的《新闻学概论》；由邵主讲的《新闻采集法》以及《新闻事业发达史》、《新闻评论》等；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办有《平民大学报学系级刊》。

燕京大学报学系。1924年创办。美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人士资助开办基金5万美元。美国人白瑞华任系主任。1927年曾一度因经费缺乏停办，1929年恢复后，体制和设施日臻完善，先后出有《燕京新闻》等报刊，附设有燕京通讯社，逐渐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新闻系^①。

另外，北京的民国大学和国际大学、法政大学等，也在20年代初开设了新闻系科。

^① 燕京大学新闻系还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互换教授和研究生。

在上海，主要有如下几所：

圣约翰大学报学系。1920年，该大学在普通文科增设报学专业，《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毕德生兼职授课，办有《约大周刊》。1924年成立报学系，由美国人武道任系主任。设有新闻编校、社论、广告、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等课程，教师用英语讲授。

南方大学报学系和专修科。创办于1925年春，《申报》协理汪英宾兼系主任，设有《报学原理》、《广告原理》等课程，戈公振主讲《访事学》；办有供学生实习的南大通讯社，向上海各报免费供稿。1926年南大发生学潮，报学系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戈公振主讲《中国报学史》并兼该系主任；《商报》主笔陈布雷主讲《社论写作》。此外还设有编辑法、报馆管理等课程。

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于1924年。最先是在中文系开设新闻讲座，两年后扩充为新闻学组，由邵力子主持。1929年正式组建新闻系，首任主任谢六逸，后来发展成为全国颇有影响的新闻系。

此外，1926年前后上海沪江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也设立了报学系；1928年冬上海民治学院新闻系在顾执中主持下创立。1924年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上海大学也曾开设过新闻课，由邵力子等人主讲。

在福建，1921年，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也设有报学系；在广州，1928年更创立了中国新闻学校……

这一时期，新闻学学术研究成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至1927年间，出版有影响的新闻学著作和译著约有16种，除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等人外，主要还有伍超的《新闻学大纲》、蒋裕泉的《新闻广告学》、蒋国珍的《中

国新闻发达史》，以及由戈公振翻译的美国学者开乐凯的《新闻学撮要》等。

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的学术交流日渐频繁。仅 1921 年到 1922 年间，来华访问的西方新闻界知名人士就有如下一些：英国《泰晤士报》社长北岩、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美国新闻出版界协会会长格拉士、《纽约时报》著名记者麦高森、美联社社长诺伊斯等。他们以饱满的自由主义激情奔走各地，特别是大学讲坛，进行讲学，发表演说，传播西方的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和办报经验，因而对中国的新闻界产生了广远的影响^①。

在此还必须提及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四大著名副刊对新闻学术和新文学史的特殊贡献。这四大副刊是：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京报》的《京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报纸开办副刊，是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创举。自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后，各种各样的副刊也在报纸上热闹起来。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民间报纸开办的副刊。到了二三十年代，这种由中国报刊所独创的自由文字，已经与新闻和言论一道，共同营造出了反抗传统、颠覆专制、鼓吹自由、歌赞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浩大声势，成为辅助和推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前行的重要的精神和情感动力。四大副刊在中国报纸副刊的演进和发展历程中所做出的垦拓意义上的贡献，尤其具有新闻学术和新文学史的双重纪念意义。

这当中，邵飘萍的副刊自由主义观念非常具有“学术”代表意义。他办副刊的指导思想和《京报》的自由主义编辑方针

以上征引资料主要见于方汉奇、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

是一脉相承的。他曾光明磊落地发表意见，以迎击那些对“自由”和自由主义新闻观、副刊观翻白眼的“同行”们。他说：

吾人做事，第一要问自己是否光明，自己是否诚信可以使朋友们完全谅解。其最足证明光明磊落之内容者，为各种附刊（“副刊”之最初称谓——引者注）上之言论，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与本报无须一致，本报编辑部从不对各附刊上参加一字。此即鄙人所首先声明可为与各团体真诚合作互助，而绝对不含有他种作用的确证。且此种自由之保障，乃鄙人所自动的于最初接洽先行提出，各团体当然赞成。实行以来，鄙人始终确守此旨，连本社所聘请之孙伏园先生，其编辑附刊，鄙人亦完全以言论上之自由权奉献^①。

毋庸置疑，四大副刊的自由主义性格形成，确是和新文化运动的鼓动分不开的。同时，它的开办，对于进一步巩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果，对于进一步在民间报纸上拓展自由主义的疆域，以及进一步普及挟带在新思潮和新文化中的自由主义观念、为中国的民间报纸树立一种宽大包容、正直透明的自由主义风范，的确是起到了开先河的重要作用。

在四大副刊中，持不同政治信仰，不同学术观念，乃至不同生活态度和不同审美立场的知识分子汇聚一堂，生动活泼，他们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亦有对共同的精神家园的神往。

^① 邵飘萍：《附刊上言论完全自由》，《京报》1925年1月14日。

第二节 徐宝璜：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教育的开山鼻祖

一 生平及思想贡献

中国的新闻理性并非始于新文化运动和北京大学。如前各章的描述，最远可追溯到王韬、严复、梁启超、谭嗣同那里。然而，将中国的新闻理性系统地进行分析整理，并逐渐提升为坚实的理论和专业思想；建构为能有机地融入现代文明潮流和推助中国的现代进程的学术和教育体系，却不能不归功于新文化运动和北京大学的卓越努力、归功于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者的创意和思想贡献。其中，蔡元培的贡献尤其具有特殊的文明意义。但是，如果没有徐宝璜和邵飘萍在这块新辟的自由主义教育领域的勤奋耕耘，恐难以得到细密的渗透和具体的贯彻。

诚如方汉奇先生所仰慕评价那样：

我们在为新闻学今天的发展和成就感到的欣慰的同时，不能不缅怀前贤感谢他们为这一学科的奠基和发展所作的贡献。对那些在新闻学领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如伯轩（徐宝璜字伯轩——引者注）那样的开拓者，我们始终怀

有至深的敬意^①。

徐宝璜和邵飘萍都称得上是“窃火者”：前者之所以被称为是“中国新闻界最初的开山祖”，是由于他在美国受过系统的新闻学教育，同时对西方的报业进行过细致、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并且将他的思考结晶为系统的新闻学理论——他的“破天荒”^②，还在于他把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转化为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闻教育资源，在理论建树上是第一人，在教育实践上也是第一人。邵飘萍之所以被称为是“足以振起新闻事业之精神”的启蒙先驱，同样在于他所转述的西方新闻价值观具有“立论本于国情，举例由于实践”^③。不同的是，邵飘萍是在日本受到《朝日新闻》的自由主义实践训练，从而将大量的思考转化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亟需的理论指导。

徐宝璜具有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那样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风范——像古代的斯多噶派那样，其信念和素养与其说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不如说是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在新闻教育领域、在他们创辟的第一块处女地里，他坚持要求他培养的学生——在成为一个新闻人的同时，首先成为一个合格的自由主义者，即胡适和蔡元培所指示的那样，成为一个“健全的个人主义者”和一个“完全的人格”的人。徐宝璜为了播撒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种子，在教育岗位上积劳成疾，

^① 方汉奇：《新闻学》序言，参见徐宝璜所著《新闻学》1994年1月版，第3~4页。

^② 蔡元培为徐宝璜《新闻学》一书所撰序言。

^③ 参见《新闻学界人物》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忧愤而逝。

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省九江市人，出身于一个新派知识分子家庭。7岁丧父，早年曾在九江文化学堂读书，10岁时跟其伯父徐子鸿先生到北京求学，先后肄于汇文中学和北京大学。徐宝璜少年时思想受惠最大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他的伯父徐子鸿。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族革命，为同盟会员，民初曾担任过国会议员，后因为“力抗袁氏罹难”。另一个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这两个思想上的蒙师都主张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都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1912年，徐宝璜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在密芝根大学（即密歇根大学——笔者注）专攻经济学和新闻学。1916年，学成归国后，先被北京《晨报》聘为编辑，旋即受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校长室秘书。1918年10月，由他和邵飘萍提议，蔡元培先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其为骨干会员。同年，北大正式开设新闻学作为政治系四年级选修课，他被聘为首任导师，每周讲授《新闻学大意》。此为现代新闻教育的发端，故而誉满学术界和新闻界，被称赞为中国“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①1920年始，他先后任教于民国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和平民大学，名播遐迩。此外，还先后担任过民国大学代理校长、京华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平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教授兼总务主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注册部主任。1928年后还担任过北京盐务学校校长两年。

徐宝璜在学术上深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的影

^① 参见黄天鹏：《新闻学概要》序言，中华书局1934年2月版，第2页。

响；在人格追求上深受蔡元培“完全的人格”思想的熏染，将道德完善和学术自由贯穿到新闻教育当中。他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在新闻学领域具有开山之功外，还著有《保险学》，编译有《货币论》。当然，其显著的成就还是在新闻学领域。1923年他与胡愈之曾合着《新闻事业》，1924年还参与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级刊》的创办和指导工作，1927年北京新闻学会出版的《新闻学刊》他也出力不少。他后期的新闻学论著主要有：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所撰的序言、《新闻之性质及其价值》、《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新闻事业之将来》和《新闻学刊全集序言》等。1930年，徐宝璜领衔积极筹办北京大学新闻系，同年5月29日在北大讲坛上突然昏厥，6月1日不幸辞世。

徐宝璜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事业的影响，主要集中体现在学术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新闻教育方面。他没有专门的政治哲学著作，但从其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中均能清晰地勾勒出他的政治哲学轮廓和伦理道德轮廓。从蔡元培、邵飘萍以及同时代，或后来的新闻史专家对他的赞赏和评价中，亦能清晰地勾画出他的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影像。说他是一个杰出的自由主义新闻教育家和一个具有“完全的人格”的启蒙思想家，是不会有异议的。

二 基本的新闻学术立场

徐宝璜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更系统、全面地还是凸显在《新闻学》一书当中。该著作原名《新闻学大意》，为徐宝璜在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时的课徒讲稿，曾先后在《东方杂志》、《北京大学日刊》和《新中国》杂志连载，1919年12

月始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刊出单行本。

《新闻学》第一次系统地以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为学术思想经络，全面论述了新闻的定义、新闻的价值、报纸的性质、职能以及编辑、采访、评论和报社、通讯社的任务、组织功能、广告、发行等等，囊括理论和实践的几乎所有内容。“所介绍的欧美先进国家报业及其发展状况都是我国学者以前所不大了解的。这本书反映了我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其实核心部分应是自由主义思想——引者注），是五四运动前夕，我国学术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的产物。”^①该书刚一问世，邵飘萍即在其主办的《京报》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介：“《新闻学》以前中国无专门研究新闻之书籍，有之自先生始。虽仅五六万字，以言简意精当，则无出其右者。在中国新闻学史上，有不可磨灭之价值……”^②1930年，著名新闻学家黄天鹏在《悼徐伯轩先生》的祭文中称：“先生为新闻界之先觉，提倡新闻学最早，今日执役报界者，多出先生之门下……”^③然而，其价值何在？其先觉何在？却众说纷纭，大多都将其定位于“爱国主义”，或“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一端，而少有人发现其价值和先觉主要是体现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层面。这的确是不应有的知性意义上的疏漏和“失误”。

徐宝璜的新闻思想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首推这样一条原则，即报纸应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在《新闻学》中他开宗明义写道：“盖自民权发达以来，各国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

① 余家宏：《徐宝璜与新闻学》，《新闻学》附录。

② 转引自《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313页。

③ 参见1930年6月22日上海《记者周报》，《悼徐伯轩先生》。

之大事、多视其舆论为转移，而舆论之健全与否又视其所根据之事实究竟正确及详细与否为定”^①；因此，必须界定报纸的地位究竟为何？他指出：“西人常云：‘新闻者，国民之喉舌也’。其所‘代表舆论’应居于国民立场而履行监督政府之责任，“若仅代表一人或一党之意思，则机关报耳，不足云代表舆论也。新闻纸亦社会产品之一种，故亦受社会之支配。如因愿为机关报，而显然发表与国民舆论相反之言论，则必不见重于社会，而失其本有之势力，如洪宪时代之《亚细亚日报》等是也。”^②他还例举说，中国戊戌以后在国民中影响很大的《苏报》、《警钟报》和《民呼报》等就是因为它们恪守其独立地位，刊事真切，持论公允，而“发生正当之舆论”。所以，他极赞它们为具有“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是合格的“社会公器”。

他的这一重要思想，还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学术文章，如《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新闻事业之将来》中反复昭告发挥。在论述“报纸的公共化”属性时，他是这样阐述的：

所谓公共化者，乃因新闻纸与社会关系愈趋密切而言。夙昔执新闻纸业者，辄以新闻纸为其个人私产，此殊失当。夫吾济献身于社会时，即当视此身为社会职所有，遑论其所执业^③。

① 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 月版，第 5 页。

② 徐宝璜：《新闻学》第 6 页。

③ 徐宝璜：《新闻事业之将来》 参见《新闻学》第 127 页。

然后，他又分别从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和宣传方面详述了“报纸公共化”的具体含义。在政治方面其论述最见自由主义功底。他写道：“现代之政治为多数人之政治，非复与昔日之专制。所谓多数人之政治者，将政权自少数人掌握中接交多数人也。此多数人未必具富有新颖之政治常识，则其如何研究，将特新闻纸以知识供之矣。”^①报纸既然肩负如此重任，那么，其在政治上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和地位，显然无法担当此神圣重任。由此，他认为报纸的公共化必须首先体现为独立化：

故视新闻纸为社会公有之记者，其布一消息，定力求正确与完全，于政治上，不作任何方之牺牲品，凡正当之议论，且将予各方面以平等发表的机会。而记者有所议论，亦必诚实，藉供执政者参考。一新闻纸或可作政治之中心点，力亦伟哉！^②

报纸具有公共化之独立地位，才能保证其发表能真正代表国民意志的健康舆论。在这一点上，徐宝璜非常赞赏约翰·弥尔顿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的观点。在《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中他写道：“新闻既为国民之言论机关，社外一切来件，但须所记不虚，言之有理，不应问其属何党派，及与本报主旨向背，而予刊出，从世人之讨论，给各方平等待遇”，他还强调“供给各方平等发表之机会”应是报纸公共化和独立性的又一原则体现——报纸的重要职能就是给各种观点、学说提供多元并存、相互论争的“公开的市场”。

① 徐宝璜：《新闻事业之将来》参见《新闻学》第127页。

② 徐宝璜：《新闻学》第128页。

三 独立的“新闻人”与自由的“新闻纸”

为了保证报纸真正具有公共化和独立性，他要求新闻从业者必须要具备自由主义所涵盖的公共化和独立性职业品格。因为“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那么，必须预先提出警告：“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彼此以颠倒是非，博官猎贿，或专此致富为目的而办新闻纸者，乃新闻事业之罪人也。”^①他所激赏的新闻人应该具有这样的人格风范：

“故伟大之记者，应有大无畏之精神，见义勇为，宁牺牲一身以为民请命，不愿屈于威武而噤若寒蝉，况全国报纸，如能同起而代表舆论，则政府虽有意干涉，亦莫可如何哉。”

意思是说，如果全国的新闻人都是这种具有独立品格，且富有献身精神的高尚之士，民意自然会形成强大舆论，政府意欲凌压也无可奈何。在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所作的序言中，他还着重指出：“报纸者，社会之耳目也。访员（即今之所谓记者——引者注）者，又报纸之耳目也。访员得人，报纸方能尽其供给正确迅速新闻之天职……”他叹息道，由于中国具有独立人格的访员太少，报社只能依靠通讯社供稿维系生存，“而通讯社（即今之通讯社——引者注）复因同一关系，多系私人或党系之宣传机关其通信遂常不免含有宣传作用，党派色彩。”所以他不能不忧心如焚，将希望寄托在办新闻教育，

^① 徐宝璜：《新闻学》第9页。

以大规模培养具有公共化和独立性品格的编辑、记者为当务之急。他认为，要培养出社会和民众需要的合格的新闻从才，新闻教育必须坚持其独立于政治的办学立场，任何来自官方和政治派别的染指，都将给新闻人才的培养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徐宝璜强调：与所有的其他领域的教育一样，新闻教育的独立性是天经地义的。他在为《新闻学刊全集》所撰写的序言中说：

新闻学者，以养成良好新闻记者，并导新闻事业于正轨为职志者也。斯学昌明，则人类受新闻事业之福，愈增其量，是斯学之重要可知矣^①。

他认为：只有充分贯彻了其独立意志的新闻教育，才是“良好的”新闻教育，亦才能够培养出“良好的新闻记者”。最终造福于人类，否则将祸害人类社会：不是陷入小报记者的低俗庸陋，就是坠入党派记者的相互谩骂攻讦。这样，新闻教育必须要明白：“新闻纸”是由办报的新闻人所造出来的；新闻人有否独立品质，直接关系“新闻纸”品质的高下：

余惟新闻纸者，近代文明中势力最雄伟之物也。其力足以维持政府，亦足以倾覆政府；足以促进，亦足以破坏外交；足以造成一人名誉事业，亦足以毁坏一人之名誉事业；足以激起一时之怒潮，亦足以惊醒世人之迷梦。君主遇之每多失其权，军阀遇之每多挫其势；名人一经其一致攻击，则倒如泰山压卵沸汤沃雪之易；秘密一经其详细披露，则如春雷一声，瞬息轰传于万里以外，乾坤震荡，无

^① 徐宝璜：《新闻学》第 132 页。

足以当其锋者。国民之政治思想，赖以养成；社会之道德知识，赖以涵育；思想之自由，赖以发扬；文明之基础，赖以奠定，其力诚莫与厚矣^①。

“新闻纸”既然有如此之魔力，那么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品质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民元以来，之所以新闻界名声很臭，全由于从业人员的品质低下所造成。黄天鹏在追念徐宝璜的贡献时感喟不已地说：“在一二十年以前，新闻记者在社会上认为无聊的文人；新闻纸一般人认为遣闲的读物。先生众醉独醒，大声疾呼，以改造新闻事业为己任，于是国人始知新闻事业之价值，新闻记者乃高尚的职业。新闻界风气的转变，这是先生提倡的效果啊！”^②徐宝璜是中国第一位自觉的和有独立意志的新闻教育家。他觉悟到：非采用西方的培养模式，是不可能训练出大批真正具有独立品格的记者和编辑的，也是无法改变“无聊”的新闻现状的。徐宝璜本人也坦言，他之所以忧心如焚地要开办新闻教育，就是有感于“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③由于“新闻纸”是社会之“公器”，新闻人是社会之“公人”；又“新闻纸”是言论公开的市场，新闻人是具有“完全的人格”的人。此种属性无不决定了新闻教育的独立性质。徐宝璜雄心勃勃，就是要力挽狂澜，把误入歧途的新闻界导向正途——此乃其办新闻教育的最基本的想法，其终极的目的在于这样的：

① 徐宝璜：《新闻学》第132页。

② 黄天鹏为《新闻学》所撰序言。

③ 《新闻学》一书徐宝璜自序。

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责任匪轻，处之宜慎，遇事当求其真，发言应本乎正，本独立之精神，作神圣之事业，信仰取得，权威自立，尊严立见……

在他看来，新闻人除具有独立的职业品质外，他们还应当充当“社会之导师”——亦即启蒙思想者——的角色；应充当“监督本国政府”的监督员的角色。如此这般，若离开了独立办新闻教育的立场，是绝对无法实现办学目的的。

与徐宝璜同时代的学界友人符鼎升在评价徐宝璜的独立办新闻教育的赫赫奇功时认为，他真正体现了卢梭那样精神意志：是代表民意、崇尚自由的开山人物，是令中国的政治文化史和新闻思想史永远不能忘怀的人物。

第三节 邵飘萍：走向涅槃之路的“异教徒”

一 生平及思想贡献

20世纪20年代初，浙东才子邵飘萍以“断梗飘萍”独立姿态和悲剧风范出现在“新闻自由”的舞台上。他是被中共领袖毛泽东所欣赏和称赞的一个自由主义者。

① 徐宝璜：《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 参见《新闻学》第125页。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穿着优雅、倜傥风流的书生，竟从青年时代起即发誓：要创办独立的民间报刊，用舆论监督政府、干预政局，最终实现自己“新闻救国”和营造自由主义理想田园的梦想。

黄远生的死对他可谓印象深刻！面对日益险恶的局面，他却凛然以对，笔力更加犀利劲猛。与胡适先生一班人主张“好政府主义”很不一样——邵飘萍认为：好政府也罢，坏政府也罢，都必须将它们严格地置于报纸这种“社会公器”和记者这种“社会公人”的批评和监督之下！

他把北京大学的讲坛视作宣读“新闻自由”和“思想独立”的布道者的圣坛：他自始至终都明白自己是一个思想的“异教徒”；极权主义者已经高垒着柴禾，手握着罪恶的火种在等着他——那是一条专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布设的涅槃之路……

邵飘萍最后是被极权主义者以“赤化”的罪名所杀死的。这种情形，就如同后来的许多自由主义者被强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而被放逐和关押一样，非常具有“黑色幽默”和深度的悲喜剧意味。

与晚近许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自由主义道路有不少相同之处，邵飘萍也是经历了最初的对中国传统的“诗云子曰”到对西方科学中的“声光化电”的迷醉，经历了从启蒙救亡的焦灼到对西方政制文化体制的神往，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报人和新闻教育家。

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名谈话中对邵飘萍先生的追怀和评价，也可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个自由主义新闻创辟者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

优良品质的人。’^①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字飘萍,浙江东阳人;1898年他竟以12岁的小小年纪考中秀才,4年以后考入浙江高等学堂。他第一次知道了“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的斗争,进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和《时务报》上的一系列自由主义言论,对他一生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梁启超所阐释、宣讲的新闻功能观和报人地位观,更成了他矢志献身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事业的精神灯火。在那时他即开始给《申报》撰写“杭州通信”和“金华通信”,后来被《申报》聘为了特约通讯员。1912年,他在杭州被杭辛斋社长聘为《汉民日报》总编。期间他像梁启超那样持论激烈、为文慷慨,在该报言论中宣讲民主自由,鞭挞地方邪恶势力,并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进行尖锐的抨击。他因之被公推为浙江省报界公会干事长;1913年,他因抨击地方官僚黑恶势力,攻讦袁世凯倒行逆施,竟三次被捕下狱。1914年冬,邵飘萍东渡日本,到浪人寺尾亨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政治学校”攻读。由于他是革命团体“南社”成员,又与秋瑾等革命党人交谊甚深,因而在留学生中威望很高。留日期间,他不仅结识了孙中山、黄兴、陈友仁、陈英士、黄膺白等这样的国民党要人,而且还结识了像张季鸾、胡政之、潘公弼、杨虎公、徐佛等这样的新闻界杰出人物。这时他与潘公弼等创立了“东京通信社”,专为京、津、沪、汉等地著名的民间报纸撰写新闻稿。1915年,邵飘萍最先获悉袁世凯卖国阴谋,当即通过“东京通信社”电传国内,激起全国性的反袁风潮。是年冬,他归返上海,毅然接受了《申报》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

和《时事新报》之聘，同时担任两报主笔。这时，中国的民间报业运作环境日益恶化，言论自由正日益受到袁政府的野蛮钳制，但他仍勇敢地以“阿平”为笔名不断向极权政治挑战。为此，袁世凯专门派特务“审读”他写的文章。其时，他又被《申报》特聘为驻京特派员，他的“北京特约通讯”风靡全国。1918年7月，他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人在京创办最早的通讯社，同年10月，他终于创办了独立自主的民间报纸《京报》。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出手更为干练劲猛，思想更为独立勇健，民间立场更为坚定鲜明。与此同时，他还与蔡元培、徐宝璜创设并成立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为骨干会员，并受聘于北京大学，主讲新闻采访学。此后又被聘请到北京平民大学、民国大学、法政大学主讲新闻学。1919年8月，因反对段祺瑞政府的专制行径，《京报》被加以“扰乱京师治安”罪名查禁，他仓惶出逃，第二次亡命日本。旅日期间，受苏俄革命思潮的影响，写成《新俄国之研究》与《各国社会思潮》两书。期间，他另一重要收获是在张季鸾的举荐下，到日本的自由主义大报《朝日新闻》做过一年编辑。1920年9月，段祺瑞失势倒台，他复返北京，当即恢复《京报》。1924年，冯玉祥进京讨伐曹锟和张作霖，《京报》旗帜鲜明予以支持，因而与奉系军阀结下仇隙。1926年“318”惨案发生后不久，直奉联军攻入北京。同年4月26日，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之罪名逮捕了邵飘萍，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绑赴刑场血腥杀害。

与徐宝璜不完全相同，邵飘萍不仅有系统的理论建树，还有实践经验。因此，他在新闻教育中对学生进行自由主义的观念训导时，既体现出一种理性的庄严，又充满着来自信念的献身激情；既体现着一种来自西方文明的觉悟，又充满深刻的中

国本土化的细致体察。他在全面贯彻蔡元培先生的独立自由教育精神和学术品格的同时，更与徐宝璜先生并肩携手，从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到自由主义新闻实践，互为补充、互为呼应，从而开创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的崭新局面。

二 一个自由主义的标本

纵观邵飘萍一生对中国自由主义事业的贡献，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大规模地进行自由主义新闻实验；第二个，与蔡元培、徐宝璜等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同时，在他的建议下，北京大学首办新闻学科，开辟了中国新闻学教育事业，对此，他无愧于“开先河者”的称号；第三个，潜心撰写了饱含诸多自由主义思考的学术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从实验的意义上，对自由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实践可能，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索。

从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视角上观察，《京报》确实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标本。可以这样说，《京报》就是邵飘萍，邵飘萍就是《京报》。当然，并不是说，他迟至开办《京报》才亮出了自由主义本相。事实上，严格地讲，他最初受到良好的自由主义训练是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日本的《朝日新闻》社，另一个是中国的《申报》社。

《朝日新闻》是日本惟一获得过美国“密苏里新闻奖”的国际大报，同时，它是向中国新闻人示范自由主义并进而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温床。在《朝日新闻》社服务期间，他和张季鸾认真考察了日本的新闻事业，仔细研究了西方的新闻学思想和报业的规模和结构，对自由主义的新闻理想有了更急切的渴

望。尽管张季鸾在通往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远没有抵达到邵飘萍那样的险恶程度，但是，这两个著名的中国自由主义报人却无疑都是在《朝日新闻》受到自由主义的深刻启迪的。

但是，《申报》于邵飘萍的重要性，更甚于《朝日新闻》。

《申报》的民间立场决定了它的自由主义倾向。应该说，北洋军阀时期，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混战连年，使中国的极权主义变得更加血腥和野蛮。但是，也正是由于割据局面的呈现，极权主义被撕裂成若干碎片，不能享有“大一统”的威严。这在客观上，多少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提供了一些“自由”的机会。邵飘萍在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的两年间，就正好处于这样的“自由”空间里，他撰写了 250 多篇被称为“北京特别通信”的通讯、特写。在这些文章中，自由臧否时政，公开批评政府，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所以，当他开办《京报》时，自由主义的笔法怎能不更加纯熟。当然，这一切皆来自于他的自由主义胸怀和眼光。

在现代报林中，《京报》与许多前辈报刊相比，应该算晚辈。但在邵飘萍的操持动作下却很快名列前茅。说到底，其奥秘就在它承续了晚近中国自由主义报刊“文人论政”的传统，挥毫泼墨，指点江山；纵论时局，锋芒逼人；剖析透辟，言辞疾利；动人心魄，振聋发聩。

许多年以后，杰出的自由主义报人胡政之在对《大公报》的记者、编辑进行训导时，所举的范例，绝大多数是邵飘萍的“典故”。邵的密友张季鸾对其自由主义的新闻风范更是赞美有加，他说：

飘萍每逢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且

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自官僚渐识飘萍，遂变重视报纸，飘萍声誉，以是日隆^①。

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汤尔和亦慨叹：“中国有报纸五十二年，足当新闻外交而无愧者……仅得二人：一为黄远生，一即飘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他还称赞邵飘萍在政界高层采访时神奇本领：“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亦不能自己。”^②邵飘萍风流倜傥，说话声调中和，且带有浓重的吴音，便由于思想的敏锐，因此口才极好；又由于他时刻处于捕捉新闻的态势，故而思维极为敏捷，交游极为广泛，可以说，上至总统及僚属，下至贩夫走卒，无不被他的魅力倾倒。然而在交往中，他又能始终把握分寸，“谦恭不流于谄媚，庄严不流于傲慢”，时刻保持其独立思想和品格。这当然与他的自由主义观念有直接关系，因为他始终认为，新闻人在整个新闻活动中，特别是采访活动中，应持守无阶级观念，也就是既“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不能以道德中和和政治归属为采访标准，只看对象是否与新闻有关。这样，便使他在进行采访和写作时均处于道地的自由主义状态，能在从容和放达中坚持客观主义的态度。加上他反应敏捷，文字功夫极好，所以，写作时根本不择条件，无论是在官衙豪宅，还是在茶楼酒肆，甚至偏街陋巷，他都能悉心静气，一挥而就。

^① 张季鸾：《追悼飘萍先生》，参见1929年4月12日《京报》1921年1月7日。

^②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399页。

邵飘萍最擅长采写内幕新闻和独家新闻，在当时的报界中一直被视为奇才。他认为要成为采写这类新闻的高手，必须将采访指导思想——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采访思想——与高超的采访技巧结合起来。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邵飘萍的卓越努力，《京报》在大量报道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新闻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特别是以上层为主的采访活动使邵飘萍终于成了一颗楔入高层的自由主义钉子。1917年，他还对中国的新闻自由事业争到了一个重要的权利，那就是“突破禁层区”，把内阁会议的内容公之于众。当时，官方竭力加以阻挠，内阁官员也因之发生争吵，但在他的力争之下，阁议秘密终于被迫公开。中国的公众第一次有了“知情权”、“透明度”的概念。以后，内阁会议的内容成了他创办的“北京新闻编译社”每周二、四、六必报的消息。

1918年10月，邵飘萍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胆略和胸襟独立创办了《京报》，大刀阔斧地对中国的新闻现状进行改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而骨子里却无疑是试图用自由主义的理念、立场去影响和改变处于极权主义统驭下的畸形报业现状。

邵飘萍所处的时代，中国的报纸在袁世凯的压制下，不光在数量上已远不如辛亥革命以前，而且在自由度上亦远不如过去。民国初年颁布的保障新闻自由的法令，已不如一张废纸，绝大多数的报纸几乎沦为议会、党派机关以及军阀派系的御用喉舌。这些报纸根本谈不上尊重客观事实，为百姓代言，它们专情于一党一派的私利，并且以津贴多少为见风使舵的砝码。大量的“新闻”实则是造谣生事、含沙射影、颠倒黑白、向壁虚构。这些竟成了报界的“时髦”。在这种情形下，记者几乎成了流氓无赖的代名词。嫉愤于此，邵飘萍痛斥道：“或受目

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泯灭其良知，视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逞其造谣之技，一旦被人指摘，则以‘有闻必录’一语自逃其责任。愚意我国报纸时见有所谓‘有闻必录’之无责任心的表示，乃最易流于不道德之‘专制的’恶习”，真可谓一针见血。他还说：“我国今日尚在幼稚时代之新闻纸，却以‘新闻材料缺乏及所载消息不确’为两种极大病根。”^①这是因为，当时的报纸常常投机取巧，不愿在采写坐实上下功夫，而是彼此转抄，故腐败丛生。直白地说，邵飘萍在这个时候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去荡涤秽浊，就远比 20 世纪 40 年代的《大公报》要复杂凶险得多。

当然他似乎也占了一些张季鸾和胡政之们占不到的便宜。一是军阀互剿，南北分权对峙。也就是说，政治与经济的分裂给中国的报业“提供”了某种可以“自由妄为”的条件；二是西方新闻思想，特别是其中的自由主义理论的渗入，给他以新奇而强烈的精神刺激。尽管对手强大凶狠，但是面对一大片荆棘丛生、待垦的自由主义的处女地，他又怎能不兴奋莫名？他所以在《京报》馆主笔办公室的墙上高挂自己手撰的条幅：“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明显就是来自于这样的诱惑和冲动。

三 鲜明的民间性与自由立场

《京报》创刊之日邵飘萍即亲自执笔撰写了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这篇文章可以视作中国早期新闻业中最著名的“自由主义宣言”之一。邵飘萍亮明其办报宗旨：第一，“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也就

^① 以上所引皆见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

是说，他坚持认为，只有真正的民间报纸，才能不折不扣地肩负起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神圣职责；而任何官方和党派、政治集团性质的报纸，则是根本无法担当和履行这一神圣职责的。第二，由于“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所以《京报》“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百年大计治本之策”。这里的“政治教育”实则是指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倡导的那些基本观点，以及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以“科学”和“民主”来将国民引导到自由主义的生活天地。他认为，报纸唤醒民众的真谛，就是要让民众真正懂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自由独立之身，都具有管理国家、监督政府、自由批评政府的天赋权利。第三，《京报》要“顺世界进步之潮流”，其前提必须是毫不动摇地把自己锻炼成“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而绝不能成为军阀、议会和党派所操纵的御用工具。为此，他对安福系控制下的那些御用报纸作了尖锐辛辣的讥嘲。他写道：“无论政府何种机关，苟其实际上无可取得国民信用之价值，纵挥霍多数金钱，言论界绝不能颠倒黑白以为之助。不观数月以前之安福系之功德者，盖其根本上不能存在，言论界接受多金亦爱莫能助也。”^①需要提及的是，邵飘萍所处的时代，新闻界中主动接受和索取官方和政治集团津贴“馈赠”者已非常普遍。政党报纸自不待言，各种抱有政治目的的下流报纸更是乐此不疲。收了人家的“津贴”，自然甘于豢养，做人家的走卒甚至鹰犬。《京报》对这种行径可谓深恶痛绝，因此不断在版面上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评。比如1922年8月4日就揭露了“报界代表”汪立元等10人在“报纸津贴事谒见元首”

^① 邵飘萍：《通讯社有可以操纵言论之能力乎》 参见《京报》1921年1月7日。

一事，向公众指出：北京竟有 28 家报纸、9 家通讯社居然靠津贴苟活着。之后，邵飘萍又在其所著的《新闻学总论》中公布了“中外报章类纂社”1925 年的调查结果，指出：本年度北京的 73 家通讯社中，竟然有 60 余家是靠政治津贴在讨生活。对此，他态度非常鲜明地予以痛斥：

津贴本位之新闻纸，我国今日尚占多数，新闻之性质殆与广告相混同，即不依真理事实，亦并无宗旨主张，朝秦暮楚，惟以津贴为向背。此则传单印刷物耳，并不能认为新闻纸，与世界新闻事业不啻背道而驰。①

道理很简单，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报纸接受“津贴”，就如同政治家受贿银钱，不仅不道德，而且还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事实上，就在《京报》揭露汪立元等人向“元首”讨要津贴一事一周后，邵飘萍又在“读者论坛”中“警告北京新闻”——批评那些接受了馈赠的报纸，居然对北洋政府交通部长高恩洪将京绥铁路的路权出卖给洋人的大事装聋作哑。而在此之前，他更是数次著文抨击安福系这类政治集团用金钱收买舆论、控制传媒所造成的“报馆腐败”之恶劣击行径。

当然，这并不表明《京报》自己就一点也不接受“津贴”。不同于别人的是，邵“津贴”照收，批评照发。由于经济的原因，他对“津贴”一般持来者不拒的态度。有时无关大碍的事，也暂且给当局或某人留点颜面，可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毫不让步。据李恩浩回忆，他在当北洋政府财政部总长和次长的时候，每月除送胡政之、林白水的《新社会报》三四

① 参见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 年 6 月京报馆初版，第 32 页。

百元外，也给邵飘萍送过两笔数目相当大的钱，“因为他是著名的记者，大家怕他，也不能不应酬。”^①当然，他还接纳过国民军将领冯玉祥的几次馈赠。尽管他在接受“津贴”的同时，仍然恪守其自由主义立场。但他这种“取巧”的态度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从《京报》开办之日起直到他殉难，一刻也没有摆脱过“谣言”的困扰。最初，新闻界盛传他收了“某次长要求选举费若干”；“向某总长索要二万元”已在警厅立案等；到后来又盛传“邵与苏俄宣传部门暗有联系”；“邵接受广东国民政府津贴”以及“新闻界邵某向孙中山先生亲信索万元以包办报界”等谣言。虽然这些谣言后来都不攻自破，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自由主义报人，不管出于何种“策略”考虑，都决不能收受来自官方或政治派别，甚至带有这两种色彩的“朋友”以“个人”名义给予的任何“津贴！”实际上，这种经验教训后来即被《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者们所牢牢记取，并订立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

或许是出于自由主义者的“本性”，邵飘萍常说“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②《京报》就是一张被他视为“终身以之”的“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的民间报纸。

《京报》创办时，正值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从一开始，邵飘萍就把顺应世界进步潮流，“建设社会，发表意见”的民间舆论机构当做自己“试验”的重要目标。十分明显，他深受《朝日新闻》的启迪——这张日本自由主义大报的

^① 徐铸成：《李恩浩生前谈北洋财政和金佛郎案》，参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7 页。

^② 参见《北京特刊》1929 年 4 月 24 日。

办报方针如下：

立足不偏不党的立场，贯彻言论自由，为建成民主国家和确立世界和平而努力；基于人道主义，献身于国民幸福，排除一切不法与暴力，和腐败进行斗争；公允、迅捷地真实报道，以进步精神保持公正；常怀宽容之心，注重品格及责任，尊重清醒厚重之风……

后来的事实证明，邵飘萍就是遵循这一自由主义的编辑方针来创办《京报》的。就在绝大多数报纸慑于专制的威压和利诱，颓唐畏缩、吟风弄月时，《京报》却勇毅地继承了“文人论政”的传统，以持论激烈和酣畅淋漓的评论为旗帜，以真实全面的报道为军阵，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地向一切不法和暴力、腐败和专制掩杀过去。当时虽然没有“舆论监督”一说，但《京报》却自始至终在艰难和危险中无畏地为公众行使着这一自由主义的职责。尤其是1920年9月《京报》复刊后，其行使“舆论监督”的威力可谓益加生猛。自由主义的眼光具有非同寻常的穿透力，邵飘萍凭借这种别人始终无法猜透的眼光，去透视军阀混战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现象背后的深刻根源。在对版面进行大规模革新的同时，他更加注重报道策划。为了保证报纸能长久地循照民间思想走下去，他还对报馆内部的组织机构、编辑方法、新闻搜集、排印体裁等全部进行了革新。到1922年，《京报》不仅创办了自己的“昭明印刷局”，独立承印《京报》及其所隶属的数十种副刊、杂志和

《朝日新闻》原办报方针中没有“为建成民主国和确立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字句，这段话是战后修订办报方针时特意加上的。

书籍，与此同时，邵飘萍还亲自操持设立了《京报》的天津分馆和杭州分馆，使《京报》在报界中独树一帜、鹤立鸡群。当然，在这里，自由主义立场是引导他成功的制胜法宝。

四 自由主义与新闻法制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邵飘萍的存在无疑是个奇迹。他曾打算结合自由主义新闻实践，编一套新闻学丛书，以便培养更多具有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人才。遗憾的是，拟议中的 5 本书，他只完成了《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的写作，而《广告与发行》和《新闻编辑法》等书的写作，则因他的突然被害而成为永久的遗憾。

邵飘萍的新闻学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自由主义新闻理想。耐人寻味的是，这个理想是他“参考欧美日本学者之专门著述，及自身十余年来实地经历所得”，他希望“有志青年，取法乎上，勉为其难”。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之所以深深感动着他，成为他景从的楷模，全在于它们在人类文明进步阶梯上所呈现出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先进性、可操作性。邵飘萍认为：新闻机构作为社会公器和国民舆论的代表，必须具有超逾一切党派和集团的广泛的社会性，同时它还肩负有教育、批评，以及督导政府的“天赋”权利，因此，必须从法律上保障和尊重它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性。何以要提出这样的要求？何以要标示这样的理想？这是因为，中国畸形野蛮的“新闻法制”，不是极权政治钳制舆论的产物，就是党派政治保护私利的手段。结合西方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他愤激地说：

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皆已渐成过去

……(日本)压迫之手段只能以法律为范围(而在中国)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实际上无一含有保护新闻事业之意味;……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①。

他还指出,在中国,法律压迫和人治的压迫是极权者惯用的手法,从《大清律例》到北洋政府,无一不是这样。中国新闻人之所以苦不堪言,盖因在法律严苛的管制之下,更兼以言代法、滥施惩戒。针对当时有的政治家和知识界激进人士,如章太炎等主张从根本上取消这类畸形野蛮的“新闻法”一事,邵飘萍及时地说,“法之有无为一总理,良否又属另一问题”,不能因恶法的肆虐而拒绝法律本身,关键是要制定适合自由主义报业生存与发展的“良法”完全弃绝“新闻法”新闻自由就更是专制者砧板上的鱼肉了。他因此呐喊:保障新闻自由的良途是必须制定与刑律相对独立的新闻法,变压迫钳制性质的法律为新闻保护之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的真正的法律^②。

如何看待和理解新闻自由?邵飘萍坚持认为:新闻自由归根结蒂是民众的言论自由。新闻法制的建立不是要囚系暗害这种自由,而是必须保护和尊重这种自由。毫无疑问,这是邵飘萍对新闻自由与新闻法制关系的杰出思考和逻辑贡献。他知道要实现这一理想的艰巨性和光荣性。在回顾西方各国为争取新闻自由而血战的过程时他说,这“乃是言论界与政府当局恶战苦斗的历史”。因此,他深刻地认识到,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是决不会发善心。主动自觉地放弃

^① 邵飘萍:《新闻学总论》第216页。

^② 同,第222页。

他们对舆论的管制和压迫的；新闻自由必须是新闻人和全社会经由坚忍顽强的斗争才能获取的：“今日之动说，新闻界要实现‘法律上相当的自由’就必须以义无及顾的宽大者，乃斯界（指新闻界——引者注）先哲之捕逮下狱、种种牺牲得之代价”。明乎此，他鼓动说，新闻界要实现“法律上相当的自由”，就必须以义无反顾的决死精神投入这场神圣而悲壮的拉锯战——“（新闻界）其自由的范围之大小每与政府的压迫力成反比例。盖从恶战苦斗、多次牺牲而逐渐扩张之结果，以历史所教训于吾人者观之，压迫愈严，则反对愈大，最后之胜利必归于人民^①。

他同时还尖锐地揭露说，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传统的法规法令，包括新闻法和刑律中凡关涉到新闻的内容，说到底，无一不是压迫法、钳制法，是统治者“自利之法令”和“箝制言论的利器”。尽管斗争的过程险恶异常，他却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因为在他看来，这是“顺世界进步之潮流”的壮举。为此，他将自己的思考进一步引向了纵深：“邵飘萍对新闻职能的一个重要见解，就是依照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与新闻民主的程度，维护言论机关，突破上层秘密，实行自由报道，使国民增长政治知识，以及舆论监督和立言的权力和义务。”^②在阐释这一系列要点时，他一再提醒新闻界说：其前提是必须突破上层秘密，实行自由报道。因为只有尽可能打破钳制，将新闻的触角强力伸展到不透明的上层，新闻自由才不是搪塞和讥嘲的对象。参照西方，特别是英国新闻界突破国会和法庭秘密艰难运作的历史，他介绍说，扩大新闻报道的自由权力，才

^① 邵飘萍：《新闻学总论》第162页。

^② 孙晓阳：《邵飘萍》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是新闻自由的根本体现，才是人民通过舆论监督并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根本体现。

邵飘萍非常了不起，他在最黑暗的时期，用一颗光明的大星来烛照中国新闻自由的未来。他所构想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新闻法》，其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一）关于因新闻纸上记载评论所发生之案件，只适新闻纸法（特别法）；（二）创办新闻机关只须呈报备案，无待于批准，且不纳保证金；（三）对于新闻记者不得有体刑，惟记者之个人行为不在此限；（四）不得没收新闻机关之财产；（五）罚金不得过二百元；（六）停止发行不得过一星期；（七）严禁揭发个人隐私（如有挟嫌诬陷之实据，以个人行为论）；（八）对于记者之传唤须用法律上严格之手续，不得非法逮捕及羁押；（九）非曾要求更正而不更正者，不得告诉新闻纸之责任，因更正而即消灭；（十）对于被雇之记者，与以生活之切实的保障。此外，如邮费、电费之减轻，邮电检查之废止（此法律以外问题），凡足以为新闻事业发达之障碍者，皆当设法解决之。”^①当然，他强调道：“总之，保护新闻记者之法律，乃扶助新闻事业之发达所不可缺者。然吾人又不愿新闻记者成为特别可以自逞之阶级，故制裁问题，亦认为有研究之必要。”因为，若不严加制裁，新闻界亦可“滥用威权流于专制”^②从而走向自由的反面。

五 “社会公器”与“社会公人”

邵飘萍自投身新闻事业始，即对新闻记者寄予厚望。他认

^① 邵飘萍：《新闻学总论》第 220 页。

^② 同，第 224 页。

为，新闻纸要真正成为“社会公器”、成为“社会公意”的代表和喉舌，而不是成为极权者或一党一派的喉舌，新闻记者这一角色至关重要——他给记者下的定义是“社会公人”，他要求记者必须持守的是“人格尊严独立”，最好的记者应该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记者于可能的范围，避免加入任何名义之团体，以始终立乎筑于真理与事实之上之第三者高垒……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无色之精神。”以“第三者”自况，正活脱脱地刻画了邵飘萍坚决独立于党见之外的卓然高节和独立风范。

他还一再强调，“记者之生命，惟在真理与事实之权比”。出于一个热烈的理想主义者的执着追求，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更在新闻研究会的论坛上反复宣讲：

若以理想言之，新闻社既为社会公共机关，非但不应有党派色彩，且目的尤不应在于营利；……以营业本位为理想的经营方法，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也。……外交记者发挥其社交手腕，与各方重要人物相周旋，最易得一般社会之信仰，亦最易流于堕落不自知而不及防，盖因其握有莫名之权威，则种种利俗之诱惑，环伺左右，稍有疏虞，一失足成千古恨矣。故外交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夫交游广则品类不一，上自最高当局国务要人、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资本家、奸人败类，以至卑官小吏、舆夫走卒，皆外交记者所可与接触之人物。外交记者心目中绝无

阶级之观念，惟以如何乃可尽其职务为交际活动之目的，故其品性为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是为养成外交记者资格之先决问题。世每有绝顶聪明，天才茂美，利用地位，藉便私图，至于责任抛弃，人格扫地。一般无知识者惊羨其豪华阔绰之日，正吾人认彼天良丧尽堕入地狱之时。此不过逞其最短时期之欲念，实际上毫无所成，一旦败露，则世人之厌恶非笑，集矢其身，欲挽回而已无术，不仅害及一己，新闻界之前途实受其累，是安可以不慎。此系必然之因果，固不独外交记者为然，惟外交记者之地位尤易流于堕落，愚故郑重为有志诸君告也^①。

1918年，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34岁的邵飘萍正在向北大新闻专业的学生讲授新闻采访学。以上这些话语，就是当时讲稿中的部分内容。从这些话语中，我们至少可以领会到这样几层意思：其一，作为新闻人（邵飘萍所谓的“外交记者”，其实是指外派记者，亦可看成新闻人的专称——笔者注），职业道德和节操当为“第一要素”，否则不能胜任新闻监督的工作；其二，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心目中绝无阶级之观念，惟有以如何乃可尽其职务为交际活动之目的”。因为，只有超越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的私利，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真正做到客观公正，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不被打折扣，不被扭曲；其三，新闻是“易碎品”，尤其是记者的品格和气节，最不易坚

^①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第355页、第389页。

守，“最易流于堕落”，所以，一经破碎，实在是惨不可复完，“不仅害及一己，新闻界之前途实受其累”……

与同时代的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邵飘萍的理想境界中挟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尽管他一再告知极主义者和各式政党集团，他是一个“无党籍”的第三者，但他最后还是被极权主义者以“赤化”罪名杀害。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军阀头子张作霖、张宗昌和李景林们相信，这个姓邵的记者和报业家不是“共党分子”——他不仅和北大新闻研究会中的中共高级干部有很深的交往，而且还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培养了不少的“新闻干部”；他不仅在《京报》上刊载“列宁专刊”、“马克思纪念特刊”，而且还和当时许多的西方自由分子相似，对苏俄革命作了狂热的介绍和赞颂，觉得苏维埃统治下的国土，几乎就是自由主义理想中的一块神圣的田园……事实上，在任何极权主义者和政治派别的眼里，自由主义者的不偏不党都是不存在的。他们狭隘冷血的内心永远无法理解自由主义者“兼包并蓄”的博大情怀。像邵飘萍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极权者和“党派人士”误读或“误杀”，那才真的是个奇迹！

邵飘萍的死，以及先于他的黄远生之死和后于他的林白水之死，说明自由主义在极权主义治下的中国是如何的“不合时宜”、“不得人心”；从张宗昌和张作霖始，野蛮绞杀和羞辱中国的自由主义报人者，不仅成了有趣的竞技活动，而且还成了他们建立“丰功伟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政治和政客极端厌恶，是邵飘萍与胡适一班人最大的区别——尽管他一生都把批评政治和政客当做自己最大的乐趣。

第四节 任白涛与戈公振：新闻史上的“双子星座”

一 生平及思想贡献

中国现代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创建，是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这个划时代的大背景上展开的。在猛烈捣毁传统的过程中，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开始了价值重建工作。这是一项浩大艰辛的政治文化工程。具体到徐宝璜、邵飘萍和任白涛、戈公振这些开辟草莱的人物，他们所进行的学术探究，就是这个划时代的政治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来看，中国早期的新闻学理论明显带有浓重的价值重估和思想启蒙的色彩。

如同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本身一样，早期的新闻学理论也是为重建社会政治文化秩序所作的、寻觅意识形态支持的一种试探和努力。任白涛和戈公振之所以与徐宝璜、邵飘萍显得同样重要，就是因为在他们的理论意图中藏匿着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相关的大量政治文化密码。新文化运动以欧洲的启蒙运动为蓝本，因此，它情不自禁，或者说顺理成章——必须从西方去寻求一切与重建有关的价值资源。尽管这种寻求早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有王韬、洪仁轩、严复等先驱人物从事过了。但是，前辈们不是在高擎“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下进行的，也不是在西方主流文化大规模地涌入中国社会，并统统被冠之为“新思潮”的名号下所进行的。从这样一种背景意义来看任白涛和

戈公振，就会发现，他们创建新闻学理论所凭借的精神动力，第一是“科学”，第二是与自由关系最密切的“民主”。其实，还不仅仅是精神动力，创建“科学”的新闻理论体系和“民主”的新闻理论范式，在他们的理解中，既是直接声援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绝佳方式，又是间接服务于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有力举措。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意图切莫忽视了，那就是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需要中国的新闻理论创辟者有明确的应答。费正清先生认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感情的示威”^①。这种“示威”的浅表层面是在广场上，在学生的游行行列中，它的深隐层面却是在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和李大钊的政治学术探寻中，在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和戈公振等人的理论建树中。在辛亥革命之前，甚至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笔者注）多有种族的观念而少有国家的观念，或者说，多将“种族国家”等同于国家。新一代启蒙思想家与他们的前辈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是比照西方的现代国家的价值观念来塑造民族主义的崭新的政治文化形象的。陈独秀、胡适他们是这样，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和戈公振他们同样是这样。

任白涛（1890~1952）笔名较著名的有一碧、冷公等。河南南阳人，早年投身民族革命，积极参加排满运动；辛亥革命以后，曾在上海任《民立报》、《神州日报》和《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负责采写中原一带的新闻，并深受于右任办报思想的影响，具有较明晰的自由主义倾向。1916年赴日本早稻田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7页。

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期间加入“大日本新闻学会”，泰列为首届会员，课余将主要精力用于钻研西方新闻理论和考察日本现代报业经营当中。由此，树立了较为坚定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信念。1921年归国后即在浙江杭州策划创办了“中国新闻学社”。1922年将他自1916年至1918年写作的《应用新闻学》一书付梓。该书问世后，给正寻求价值重建的中国新闻界，特别是新闻理论界和新闻教育界带来很大的兴奋，不少大学的新闻系科选用其作教材。1935年到1937年，任白涛又潜心研究并撰写了130余万言的皇皇巨著《综合新闻学》凡四册，其反响虽不如早期的《应用新闻学》，但其学术贡献也是引人注目的。1937年曾有一个短暂时期在广州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于1939年初到达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1941年到达湖北恩施担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不到一年旋即又担任了第六战区中校参谋，以及湖北省政府参议等闲职。抗战胜利后，又重返书斋从事新闻学研究。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以代表身份参加过官方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继续修订《综合新闻学》一书，同时还为出版界编写过一些文学和医学方面的小册子。1952年春，新政权总理周恩来电邀其去北京参与文化建设工作。其时任白涛已沉痾染身，故未能成行，同年8月31日不幸病逝。遗著除《应用新闻学》和《综合新闻学》外，主要的还有：《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国际通讯机构及其作用》以及《日本对华的宣传政策》等。

戈公振(1890~1935)原名绍发，字春霆，公振为其自号，江苏东台人，降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发蒙于家塾，善书画和音乐。1912年毕业于东台高等学堂，旋即进入淮南法政学堂。是年又在《东台日报》任图画编辑。1913年到上海有正

书局当学徒，期间，受到著名的维新派报人、自由主义者狄楚青的赏识，延聘到《时报》社，很快提拔为出版部主任，正式开始新闻生涯。戈公振一生主要的新闻实践活动是在《时报》展开的，前后长达 14 年，从校对助理编辑，最后一直干到总编辑，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1920 年，他创办《图画时报》，标志着中国画报由石印时代进入铜版时代。1925 年被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聘为教授，主讲《中国报学史》，同年编译出版美国新闻学家开乐凯的《新闻学撮要》，在作为大学新闻专业的主要参考书的同时，也成为了新闻界案头必备的新知读物。这一年，他还组织发起上海报学会，主持出版会刊《言论自由》杂志。他在该刊发表不少文章，大力介绍西方民主政治，鼓吹新闻自由。1925 年，是戈公振从事新闻教育最频繁的时期，除国民大学外，他还被复旦大学、南方大学、上海大学、中央大学和大夏大学争相聘为教授，主讲《访事学》和《中国报学史》。1927 年，他的学术专著《中国报学史》就是在课徒讲稿的基础上完善并推向社会的。1927 年 1 月，他自费去欧美考察新闻事业。期间，专门去采访了英国外长张伯伦和德国外长史特莱斯曼等政坛人物。同年 8 月，他在出席日内瓦国际新闻专家会议时，所作的《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的演讲，引起大会轰动，并赢得专家会议主席彭汉子爵的赞赏，因而被推选为“海电委员会”委员。旅欧期间，他还参加了国际联盟召开的世界经济大会、国际劳工会议，以及英美日海军裁减会议等。1928 年 1 月他被邀参加国际笔会。这一年当中，他还到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考察报业运作、研究西方的新闻学理论。1928 年底回到上海，马上又投入了《申报》总管理处的设计工作，同时被自由主义报业大王史量才任命《申报》总经理助理。当时，黄炎培为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

副主任，陶行知为顾问，史称之为“史量才智囊团”。戈公振对《申报》最大的贡献是：他比照西方大众报纸的经营模式建立起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科学管理体系。1930年5月，他还创办了《申报星期画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思想逐渐转向左倾。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大部分精力都用到研究苏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同年10月他参与《生活》周刊和《生活日报》的编辑工作，在信念上与邹韬奋逐渐靠近。1932年3月，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中国，他以记者和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双重身份随团采访，在沈阳被日本军方逮捕，后经营救获释。同年9月，又以特派员身份随顾维钧去日内瓦出席国联召集的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特别大会。1933年3月到1935年9月，他以中央社特派记者身份在苏俄居住了两年半，除曾去西班牙参加过第二次国际专家会议外，大部分时间是在苏俄采访和考察。在几乎所有的文章中，他都称苏联称之为“庶联”，足见其对这个“社会主义的天堂”的钟爱和神往。1935年10月，他在邹韬奋、胡愈之多次电邀的感召下回国，10月15日抵达上海，10月22日竟溘然长逝。其遗著有《中国报学史》、《新闻学》以及《世界报业考察记》、《从东北到庶联》等。

二 “优秀报纸”与“民本政治”

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和新闻实践家相当一部分都有留学日本、受假道于这个岛国的西方思潮影响的经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实践的许多著名人物，更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留学经历，因而给中国的启蒙运动投下了较为浓重的思想和观念影子。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是显明的两个例子。他们思想经历中最

重要一段就是在日本度过的。日本不仅给他们提供了自由主义的养料，而且也给他们提供社会主义的养料。当然，任白涛的经历可能和邵飘萍、张季鸾更相似一些，他们在日本有过一定程度的新闻实践经历，在研究西方的文明价值体系时，都同时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抱有程度不同的好感。只是任白涛少了一些更为激进的经历，观其一生，主要是以一个热衷于学术研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的，而不像邵飘萍和张季鸾那样，还有几分革命家和新闻斗士的色彩。

任白涛的新闻传播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应用新闻学》一书当中。后来他撰写的《综合新闻学》不过是在前书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修订和大量补充罢了。因此后书的影响力明显不如前书。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书面世时正是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最需要思想武器之际。《应用新闻学》的这种历史机缘奠定了它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小小的地位，但于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而言，其地位却是不小的。这本书在体例上不如徐宝璜的《新闻学》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那么细致和严密，作者坦言全书的结构借鉴的是日本新闻学家杉村太郎的《最新新闻纸学》的体例：该书还附有《欧美报纸史略》和华尔脱·威廉博士 1921 年 4 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词：《世界的新闻学》——华氏是美国新闻理论界的权威学者。任白涛特地在书中予以推荐，足见其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思想的认同，以及对北京大学兼容风度的欣赏。

任白涛新闻思想中最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是他提出的“优秀报纸”的观点。所谓“优秀报纸”其实就是他所心仪的、以美国的“高级报纸”为蓝本的民间报纸。对这种最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义的报纸的描述，尤能见到任白涛独运之匠心。他认为，真正优秀的报纸，是超党派的、坚实地立足于民间、代表

民意的自由主义报纸，这种报纸理应是“造成舆论之冶金炉，而运用政治之推进机也”^①。但是，他又指出，这种“优秀报纸”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能促使其生长发育的政治文化土壤。他把这种土壤命名为“民本政治”。那么，什么是“民本政治”呢？他解释道：

民本政治胜于官僚政治者，要在不以少数私人决国事，而以公众舆论决国事，健全舆论之造成，民治国人民之责任也，以舆论而行国家政治，民治国人民之权利也^②。

“官僚政治”是极权主义政治最典型的一种，这种“政治”在过去是以皇权的名义凌压社会公众，如今却是以“共和”的名义来实行这种“少数私人”对社会公众的凌压。任白涛的“民本政治”的立场显然来自西方政治文明中的天赋权利的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文化立场，他不光与弥尔顿、卢梭和杰佛逊等西方大哲取得了思想上高度认同，而且还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特别是陈独秀、胡适等时贤取得了观念上惊人的一致。在他看来，“民本政治”与“优秀报纸”间的逻辑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欲得优秀之民本政治，必先求真正优秀之报纸”。^③就是说，独立自由意义上的“优秀报纸”是造成或促进“民本政治”的先决条件。相反，努力建成“民本政治”亦即他所指称的“优秀的政治”那么，“优秀报纸”就能得到充分的发育和生长。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倚系

①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引论，1922年11月中国新闻学社版。

② 任白涛：《综合新闻学》第1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7月版。

③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1922年11月中新闻学社版。

互动，相辅共生。这与徐宝璜所描述的“公共化报纸”的内涵是相当一致的。徐认为，“现代政治为多数人之政治，非复与昔日之专制”，因此，“新闻纸为社会公有”，既不应为一党所私御，也不应为官僚政治所专擅。邵飘萍也有类似的意见。但是，就“优秀报纸”与“民本政治”间的逻辑互动关系，徐、邵二人却没有任白涛表述得这么严密和清晰。

或许是受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任白涛表白说，他撰写《应用新闻学》的立场同时还是民族主义的。以自己所治的学术服务于国家的复兴是他最大的愿望。“改善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直接的功利性目的，就是希图“把东亚大陆的干净的土上沾染的爱尔兰式的和三韩式的血迹，洗得一点不留。”^①在这一点上，他又是一个情绪颇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任白涛的确是属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在这里又得了有力的证明。事实上，终其一生，他的思想都未超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任白涛还强调，“优秀报纸”固然离不开“优秀的民本政治”，但是倘若“真正的优秀的新闻记者”不作办报的中坚，那么，也就不会有“优秀的报纸”产生。因此，对什么样的记者才是“优秀的记者”，他不能不站在独立性和公共化的立场上对记者提出自由主义的原则要求。

尽管他强调，“优秀的新闻记者”必须同时具备这样一些职业能力，如，要有“高等的理解力”；要有“明确的观察力”；要有敏捷的应变和反应力，以及要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等等。但是他最强调的却是记者作为社会公人应首先具备民本立

^①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三版的话”，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2页。

场，应以“大多数人之利害荣辱为标准”^①；如果记者只习惯于听从党派政治或官僚政治的驱策，以少数人之利害荣辱为标准，那么这样的记者不惟不优秀，而且完全可以斥之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和徐宝璜、邵飘萍一样，任白涛认为记者身为社会公人，所负责任重大；其言行举止，均受万众注目。“优秀记者”简直就是雨果所谓的“时代的书记官”，也可以称之为蔡元培所夸奖的“史之流裔”。记者的公共威权如此之高，不禁令任白涛陶醉在一种神话般的浪漫与崇高的幻觉当中。他写道，记者的确是“无冕之王”、“社会之师表”啊！“他们的地位是如此之高峻，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真正是了不得的王者气象啊！然而，记者决不能只陶醉在这样的感觉当中，他们必须时刻告诫自己：不能辱没记者的尊严；不能改变记者的独立立场——在任白涛的理喻当中，气节，当它与“民本政治”同构成一种全新的道德操守和职业尊严时，它必须是以这样一种姿态出现在社会面前：“故当具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精神”^②来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和公共性、独立性原则；捍卫言论自由之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笔可焚而事实不可改，身可杀而良心不可夺！”^③他认为，在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者面前，“优秀记者”必须以独立精神为本，以社会公人为职，以“民本政治”为魂，以义无反顾为勇。惟有这样，“优秀的报纸”才有人格上的保证，“民本政治”才有人才上的有力支撑。在这里，任白涛的“优秀记者”与徐宝璜的“伟大

①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第 156 页。

② 同，第 178 页。

③ 同①

之记者”可以说有异曲同共之妙。

任白涛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他是用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新闻学这门“最近发达起来的新兴科学”的。如前所述，实证主义正是中国自由主义者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独特眼光。他说：

新闻学是理论的科学，同时是技术的科学；是纯粹的科学，同时是应用的科学，是处理最现实的问题的活的科学……在一切科学中，最实证的科学，便可以说是新闻学吧。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立宪民主制度加实证的科学，是西方自由繁荣之道。我们中国只要将这个秘诀学到手，还怕国家、民族走不上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文明大道吗？任白涛研究和转述西方的新闻理念，正是怀着这个悲喜剧意图——他是有幸的，也是不幸的。

三 民主政治与报纸分期

戈公振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因此，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不能不具有这样的政治哲学背景。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着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者。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已经把自己视作社会主义者，然而，究其本质，他仍然没有疏离最基本的自由主义立场。

《中国报学史》是戈公振最有影响力的一部新闻史著作，其对于中国新闻学术史、新闻教育史的重要性，早已得到举世公认，但其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史，尤其是对中国新闻思想史的重要性，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也就更谈不上

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史的角度来予以认真的研究了。

戈公振早年服务于《时报》时，曾深受维新派中的许多著名人物的影响，这些人除有浓重的保皇倾向外，还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梁启超和狄楚青是他思想发蒙期的精神导师。可以说，《时报》时期的诸多带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实践活动对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在广泛搜求中国报史资料的同时，还与许多自由主义者有过政治学术的频繁接触，马相伯、丁福保、郑振铎、顾颉刚这些著名人物，都曾在学术上对他有诸多点拨。当然，在欧美和日本广泛、深入考察西方报业实况，潜心研究西方报刊思想，对其新闻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无疑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从严格意义讲，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现代国家观念至上的产物。在他之前，曾出版过不少的地方报刊史研究方面的专著，如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以及项士元的《浙江新闻史》等，多着眼于地方的角度，因此缺乏现代国家的“全国观念”——戈公振正是立足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价值重估和秩序重建的学术立场，方使得这部史论性著作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开山”的地位。而且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将中国报学史置放在中国政治文化演进史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上来展开，因此，自然收到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张弛有度的奇效。另外，将中国报学史置放在世界政治文化演进史这一全新的背景下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比较研究，也是这部专著引起海内外新闻史家垂注的一大特色。

用实证主义眼光来透视中国报学史，是戈公振开宗明义的主要意图。他认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

关于报纸自身发迹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① 戈公振的心理被顾执中一眼看透：“经验便是新闻学”^②。这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可以说是贯串《中国报学史》的主要方法论原则。严复所谓：“其为事业，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即指示了这种认识论情状。看来戈公振对此是了然于心的。他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将报刊的历史分期简单划分为口头、手写和印刷这三个“经典”阶段，而是从实证主义出发，将中国报业的产生和发展分为这样四个阶段。即：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和报纸营业时期。这四个时期不仅“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勾画出了清晰的报业发展进脉络，而且还勾画出了中国自古至今的政治文化发展演进脉络。

在细致缜密的描述和阐释过程中，戈公振的自由主义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对每一个历史分期的评判过程中，他都是以民主政治的标尺来进行衡量的。

他指出，自汉唐至清末为“官报独占时期”。其最显着的政治文化特点是“言禁纂严，无人民论证之机会”，而“官报之惟一目的，为遏制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③ 那么，“外报创始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又是怎样的呢？他写道：“自基督教东来，米怜创《察世俗每月统

① 戈公振：《经验就是新闻学》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1 月版，第 6 页。

② 顾执中：《中国报学史》参见《新闻记者》第 1 卷第 2 号，1937 年 7 月 5 日。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63 页。

记传》，其内容有言论，有新闻之记载，是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① 因之断然否定官报独占的合法性，不承认皇权统治下的传统报纸与“现代报纸”的血缘继承关系。这一立场，不仅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主义的典型立场，而且也典型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立场和自由主义立场。不过，他的民族主义情感也在论述中大加宣泄。他悲愤难抑地回顾道：“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议。及经几度战争，真相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混淆视听，无恶不作矣。’^② 或许出于对康、梁思想启蒙的感念之情，以及对狄楚青奖掖扶植的感激之情，他对“民报勃兴时期”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写道：“迨中日战争之后，强学会之《中外纪闻》出，始开人民论政之端……其性质又有君宪、民主、国粹及迎合时好之多种，故称之为勃兴时期。’^③ 应该说实证的理性的因素还是起了作用的。否则他就不会像这样轻松自如地跳出激进与保守的党争的局限，客观地将这一时期裁断为最具有自由主义趣味的兼容并包的政治文化争奇斗艳时期。在述及“报纸营业时期”时，他不能不充满自由主义的忧虑。他厌忿不已地指斥道：“民国成立以后，党争岁不绝书，凡不欲牵入政治漩涡之报纸，逐渐趋向于营业方面。物质上之改良日有进步，商业色彩大见浓厚……’^④ 他自信，政党报刊的无耻泛滥和争斗，终将逼出如西方那样的大众化、商业化报纸时代来。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103 页。

② 同，第 109 页。

③ 同，第 152 页。

④ 同，第 212 页。

四 公共意志与思想自由

从进化论者的乐观立场出发，他对中国报业发展演进的历史前景是持积极的态度。他甚至乐观地预言，西方报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冲击，除开“以厉行其殖民政策”的一面，其积极的意义无疑将促使“中西文化融和之机大启”^①。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还没有足够地体验和认识到中国的这个“报纸营业时期”与西方商业化报纸时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由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生存的艰难，大众化商业报纸是根本无法取代政党报刊，而乐现迈入这个本应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时期的。没有民主政制前提之下的法律保障，商业化报纸终究还是跳不出新专制的掌心的。

《中国报学史》最富有思想特色的是，他在用民主政治为价值坐标比较中西报纸截然相异的文化品质时，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强烈渴望。他认为，即使将中国的官报和西方的官报作一比较，也非常容易发现两者的品质差异：“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②中国新闻学术界有不少人自矜自傲，认为中国的官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新闻纸”之一，竟不知这种为皇权专制主义所御使的报纸，即使存在了近两千年，又怎么比得上人家那种产生于民主政制和法治秩序中的真正的新闻纸呢？戈公振还深入揭示说：“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23页。

^② 同，第86页。

无影响。^① 简言之，这种为虎作伥的产物，如果硬要说它有文化影响，那就是在奴性十足地为专制主义服务时，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和历史朝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正如任白涛指出的那样：没有优秀的民本政治作前提，就决不可能产生真正优秀之报纸。

戈公振明确指示说，真正的舆论，是民主政治环护之下的“公共意志”——“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②——同时，体现公共意志的舆论，又是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依据。那么，这就要求报纸必须要有独立的立场，否则，无以担当代表公共意志的神圣职责：“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③ 对记者而言，他们必须是具有自由主义品质的社会公人：“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④ 他坚决纠正那种“制造舆论”的错误观点。因为民主政治体制中的报纸，其特点是代表舆论，只有专制政治体制下的报纸才专干那种“制造舆论”的勾当！

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前者既是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合法性产物，又是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后者却刚好相反，它既不是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合法性产物，更不会向它们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戈公振悲愤地写道：“（民元以来）军人柄政，祸乱相寻……封报馆、扣报纸（杀报人——笔者添注）检阅函电，十余年来屡见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87 页。

② 同，第 182~185 页。

③ 同②。

④ 同②。

不鲜……’^①其根本原因就在专制主义，哪怕是打着“共和”旗号的专制主义——是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扼杀者；是民主政治的死对头，对此既乱且凶的政治局面，他不能不痛心疾首，不能不啼血呼号：“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②！”不仅如此，他更居于现代国家政治的角度提醒社会，也包括提醒统治者：

盖思想不能发表，徒成空幻，思想者必甚感苦痛，而郁既久，无所发泄，终必至于横决，国家命运之荣枯系之

.. .

他还大声疾呼：“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然而，在专制政体下，国民是无足轻重，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思想者的痛苦在专制者看来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国家命运哪有握权柄者的一己之私或一党一派之私重要呢？你最多只能在讲堂上发发感喟，在著述里发发牢骚。你如果胆敢效法黄远生、邵飘萍和林白水，那么不仅思想不能发表，连你性命也将丢掉！

戈公振是睿智的和卓越的，但他又是悲剧的和痛苦的。尽管海内外新闻界对他的思想和人格有相当高的评价，他的思想和人格对的民间自由主义报人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他的理想却无法在中国这块故土上实现——这也正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留连苏俄而忘返的根本原因。自由主义者都是些理想主义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275～277 页。

② 同①。

③ 同 ，第 291 页。

者，即使他后来又在理想主义中加入了苏俄式的“社会主义”的成分，也仍然难以改变他的悲剧命运。其实，被他视作灵魂皈依的“庶联”并不是“庶民”的天堂，也不是自由的故乡。所幸的是他终于没有活到 1938 年后的“肃反”时代，否则，很难说他不会又回归到更为本朴元真的自由主义立场上来。

第七章

专制与激进夹缝中的报刊自由主义

第一节 自由主义与政治气候多变的季节

一 权力失控中的悲剧性选择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陷入了危厄与茫漠的境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自洋务运动以来

半个多世纪中，曾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视作现代化范式的西方文明体系及价值观，突然受到了一大批具有激进主义倾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怀疑和诘难。巴黎和会的无耻和欧战血腥争夺所暴露出的西方世界的严重文明危机，深深地刺激着他们敏感的神经。“新思潮”纷至沓来，西方形形色色的主义充斥知识界、学生界，乃至社会各个阶层。这种喜剧情景并非说明制度化的西方文明又受到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重视，恰恰相反，它深刻地反映出这些焦灼而又充满理想渴望的人们，他们对前辈知识分子视作现代化摹本的西方文明体系的冷落，而对所有具有超验色彩的西方乌托邦价值预设产生了极大的热情——施蒂纳、蒲鲁东和巴枯宁等人的各式无政府主义；柯尔的“基尔特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民粹主义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政治文化情绪和道德情绪的直接反映。

这一时期涌现的大量的“进步报刊”包括已变为政治革命旗帜的《新青年》，几乎都强烈地表达着这种乌托邦情绪，同时也表达了思想启蒙的式微和激情主义热情的高涨。新文化运动的趋于政治化和苏俄式社会主义理念在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因而使五四以前曾占尽风光的自由主义思潮受到沉重的打击。“中国的社会变迁进程逸出了自由主义的预想，中国自由主义的早春也就在风风雨雨中消逝了。接踵而来的是乍阴乍晴、气候多变的季节。”^①处于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剧烈冲突夹缝中的自由主义不得不考虑寻找新的出路。“按照两害相较择其轻的原则所作的选择，必须

^① 胡伟希等著：《十字街头与塔》第 224 页。

消蚀其独立的地位，而变成某种依附性的社会力量。”^① 这种悲剧性选择，不仅一度发生在梁启超、黄远生等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报人的政治依附行为中，而且也曾一度在林白水身上有明显的反映。

袁世凯死去以后，中国陷入了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特殊时期。由于袁世凯试图重新建立被辛亥革命击溃的皇权政治秩序的失败，再加上五四激进的反传统运动的凌厉打击，更进一步将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危机推向了极致。北洋军事集团内部的割据与混战，使他们对政治文化权力的控制和统合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这个时期，中国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性质相异的权力体系，除北洋政府外，与其对峙的广东国民政府的崛起，使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局面显得支离破碎，而又五彩斑斓。无论是对北洋军人政权来说，还是对奉行“以党治国”的国民党广东政权来说，彼此间的僵持与对抗，使谁都无法实现其政治全能主义的梦想。

这种颇富戏剧性的局面客观上为中国的报业发展提供了某种“自由”的可能。这一时期中国报刊形成的几大板块，就非常醒目地反映出了这种大一统权力失控的情形。第一类是北洋军阀各派系所控制与豢养的报刊，如段祺瑞掌握的《甲寅》周刊、张宗昌掌握的《新鲁报》和《黄报》、孙传芳把持的《新申报》和吴佩孚把持的《上海报》等；第二类是形形色色的党派、政客创办与操纵的报刊，如国家主义派的《醒狮》周刊、《国光》、《国魂》、《自强》、《狮声》研究系的北京《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等；第三类是激进党人创办和主持的报刊如《向导》、《先驱》、《中国青年》、《劳动周刊》、《工人周

^① 胡伟希等著：《十字街头与塔》第224页。

刊》等；第四类是国民党创办和主持的报刊，如《政治周报》、《中国农民》、《农民运动》、《民国日报》、《中国军人》、《黄埔日刊》等；第五类是或多或少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民营报刊，如影响较大的《京报》、《社会日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申报》、《新闻报》、《时报》、《大公报》、《商报》、《益世报》、《庸报》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自由主义报刊的大规模出现。其背景一则是因为中国权力政治的暂时失控；二则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这时已逐渐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1921年至1927年，中国的民间商会发展很快。民族工商业所表现出来的对国家资本主义化和自由主义化的渴望，必然通过各种各样的创办实业的方式予以表达——创办民间报业，既有着资本主义化的商业内涵，又有着自由主义化的政治文化内涵。商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各省地方自治活动，更从深层意识上“反映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寻求政治多元化的努力”^①。有中国近代工商业领袖之称的张謇，就是领导地方自治运动的思想旗帜和头面人物。他说：“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②因此，必须从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上来审视中国民间自由主义报业的集团性崛起，才有可能真实地破解其中的诸多奥秘。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契机必须提及。这就是北洋末期所爆发的国民革命所起到的、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启搏作用。这种启搏理所当然地也反映到民间自由主义报业的兴奋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史》第1卷，第347页。

^② 《张季子九录·自治录》，参见《张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页。

和蓬勃生长上来。

这场国民革命对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不同于以往的那些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它是建立在社会变革基础上的各阶层民众的政治大动员——这种撼人心魄的动员规模和效果，不仅在以往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中见不到，即使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也见不到。“民众的政治动员是两个过程的结果：一是在一定的社会变迁基础上，民众自身社会政治心理变迁的结果；二是某种社会政治集团或势力（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新兴的社会政治集团或势力）动员民众参政的结果。”^①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特别是作其背景的国民会议运动，就是这场国民革命的成果体现。国民会议运动是波及全国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自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宣言》发出召集国民会议的号召，至1925年3月在北京正式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极短时期内，迅速成为全国民众的奋斗目标。国民会议的宗旨，是号召和组织和平的民众团体直接选举代表参政，借以解决中国的体制危局。孙中山的“直接民权”在这个运动中不仅成了中国各界民众的精神旗帜，以及迎合他们政治心理变迁的政治动员最有效的指南，而且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民间报业代表人物的精神旗帜和行动指南。

二 对政治全能主义的批评与反抗

对照一下这一时期《申报》、《世界日报》和《大公报》等民营报刊的表现，以及它们蓬勃发展的业绩，即可以知道“国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史》第1卷，第396页。

民会议运动”所倡导的“直接民权”对自由主义报业的刺激作用是多么的立竿见影。

史量才的《申报》从他接手的1912年到1922年，十年间苦心经营，也不过由7000千余份缓增到5万余份。但是在国民会议运动之后竟一下飙升到14万份，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大报。成舍我的《世界日报》在1925年8月的“女师大风潮”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期间，发行量都得到大幅度的增长。他所主办的《世界晚报》在“主张公正，消息灵确”的方针引导下，也同样成了民众最喜欢的报纸。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1926年9月在接手新记《大公报》后的很短时间内，就将该报改造成了一张直追史量才和成舍我的民营大报。显然，“直接民权”在这一时期是他们获得实业快速发展的法宝，也是他们在这个口号中适时注入自由主义最可喜的收获。尽管在这个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对新闻事业采取了最野蛮最严厉的管制，自由主义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的死难，为民间自由主义报业的发展蒙上了阴影。但总体来说，在“直接民权”波及的地区，特别是在政治全能主义尚无法施展其统治淫威的这个时期，对民间自由主义报业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一段“美好时光”。悲喜剧并存的这个时代毕竟是难忘的。中国民间自由主义思潮尽管被激进主义政治革命思潮所取代，但是，它最明显的蜕变是：由观念革命而嬗演为更具有实证意味的实践革命；由思想家、革命家和学者的求证、呼喊嬗演为实业界（包括教育、文化、农林、工商等领域）等民间社会团体的日常操作规程。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再也不是观念革命的武器，而真正成为了中国中下层民间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事职业活动时必需的普适性价值准则。

“好戏”很快结束。1928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

国”后，其按照苏俄模式“以党治国”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国民党以民众“保姆”的身份自居^①。开始了以政治全能主义为特色的新专制统治时期。在国民党的设计的“道统”体系中，三民主义独尊为向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动凌厉打击的理论武器——“党义”变为了渗透民间各阶层的社会化意识形态。一度最具有活力的商会、工会、联业团体、文教和新闻团体等自由主义基原受到最严厉的控制，并逐渐被驱赶出公共决策和参与的几乎所有领域。1929年，“党化教育”强行打入大、中、小学教育体系；1929年至1930年，又强行制订《出版条例》和出版法、设立图书电影审查机构，进行全面的政治全能主义控制。其间还相继颁布《设置党报条例》和《指导党报条例》，强行用“党报思想”来强化和统驭所有的民间舆论。1931年，又连篇累牍地颁布了《修正出版法》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1932年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1933年和1934年更相继颁布了《新闻检查标准》、《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和《戒严法》等等等等，终于完成了极权主义政治所需要的全部配套工程。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印发大量攻击共

^① 孙中山认为：“民众、民国之主人也，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可为我们模范”，由此建立党国和党军。他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更从理论上作了阐释。他认为，中国百姓的政治和文化素养低下，因此抱悲观态度，甚至发出“以这样的国民素质难以迅速适应和享受现代民主政治”的叹息。在如此情形下，国民党有责任以“保姆”的身份“引导”开化全体民众：“民众，民国之主人也，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但他最终的愿望是在地方自治完成后，马上还政于民。不想却被蒋介石极权政治所歪曲利用，成为新专制主义的理论依据。

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宣传品，以维护三民主义的独尊和极权统治的“道统”秩序。这一系列倒行逆施理所当然激起来自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持久不断的批判和对抗。截止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所颁布的新闻管制法规条令可谓车载斗量；抗战期间，打着“战时新闻管制”的旗号叠床架屋地颁布法规条令，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在与国民党政治全能主义展开激烈的对抗斗争中，列宁主义新闻思想继五四以后更大量地引入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当中，成为了影响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仅1929年1933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红色中华》、《实话》和《战斗》等就刊发了大量介绍和阐释列宁主义新闻思想的文章。重要的有《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党员对党报的责任》、《列宁主义与党报》、《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关于我们的报纸》和《论我们报纸的性质》等。1931年10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共党组织暗中领导的“我国第一个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学术团体”^①。这个学术团体主要以“左联”的外围期刊《文艺新闻》为领导核心，其参加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申报》、《新闻报》和《时报》，以及一些大专院校带有“左”倾思想的自由主义者。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统战色彩的对抗极权主义新闻思想的学术团体。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成立大会上发表宣言称：“新闻之发生，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生活的整体，是基于被压迫的广大的万万千千的社会群众。”^②不同的是，共产主义

^① 参见《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341页。

^② 《中国新闻研究会宣言》，《文艺新闻》第33号，1931年10月26日。

者是“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主要是列宁主义新闻思想——笔者注）的阐扬”；而自由主义者除在联合共产主义者对抗国民党极权主义新闻统驭思想这一目标上与之一致外，他们对理性、和平、改良和渐进的自由主义原则并没有放弃。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为数甚众的非“左”倾自由主义者却有着与“左”倾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思想和实践表现，其中以蔡元培的动向最耐人寻味且具有典型意义。这个以倡行“兼容并包”主义和在五四时期与共产党人关系甚洽名世的自由主义大师，在1927年国民党的“护党救国运动”中，竟与国民党有相当程度的合作。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刊物《现代评论》更明确表达了对国民党的某种赞赏态度^①。这些以“坚定”著称于世的自由主义大师的短暂的选择“失误”，很快便被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政治全能主义的全面推行而逼到了相当尴尬的境地。蔡元培等人很快从极权主义的逼视中警醒过来，重新回到本朴的自由主义立场——其实，他的这种思想经历在当时颇有代表性。那种短暂的犹疑和困惑下的“依附”，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刻自省和回归，在成舍我等自由主义报人身上也有类似的发生。当蒋介石极权主义公开谴责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自由主义民治主义政治理论，都不适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特点和文化道德传统以后，自由主义与国民党极权主义的短暂“蜜月”期不得不宣告结束。然而，自由主义并没有就此从激进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夹缝中真正走出来，只不过，他们将彷徨和恐

^① 胡造后来在《自由中国》的追忆文章中谈到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在那个时期的选择时说：“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

惧于这两种严重对抗的意识形态的尴尬，化为了“左右开弓”的挣扎，以求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突围出来。这种心态和姿态必然通过这一漫长时期中，他们的新闻思想和实践的诸多微妙表现所反映出来。1933年，史量才和成舍我相继创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和北平新闻学校，试图培养为我所用的自由主义新闻人才，1935年和1936年，陈铭德、张季鸾、成舍我等参与组织南京新闻学会和天津新闻学会，都能看出其思想和实践的微妙。当然，他们新闻思想并不像先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那样，主要凸显在政治和学术文章中，而是格外显目地凸显在为广大所熟知的办报方针和大量的新闻报道、社评文章当中。自由主义的普适性原则恰恰是通过这样的通俗表达而普及到广大的民间。这是先前那些只囿限在知识界和学生界，或者说囿限在中上层社会的文章从未达到的效果。

第二节 英敛之：慈航普渡的“大公主”

一 生平及思想简述

新记《大公报》作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这些年来得到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思想界的重视。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人们对《大公报》的前身：“旧”《大公报》显然重视得不够，这是很不应该有的学术态度。可以这么说：倘若没有“旧”《大公报》奠定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新记《大公报》在传统上就有明显的缺失——英敛之就是《大公报》自由

主义传统的创始人。

英敛之是以“大公”精神来阐释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他在《大公报》创刊号上专门对报名作了阐释。其曰：“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并且向社会宣布，这张民间报纸将以“扩大公无私我之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①为办报宗旨。后来，张季鸾和胡政之等人将“大公”精神传接发展为了“四不”主义。由此足见，新记《大公报》一班人对英敛之的自由主义苦心是有非常深刻细致的体察的觉悟的。张季鸾具体阐释的“四不”主义，应该说他对英敛之倡导的“大公”精神的理解是相当准确的。英敛之强调的是：报纸是社会之公器，报人是社会之公人。有公则兼容并蓄，无私则义无反顾。

事实上，“大公”精神正是英敛之报刊自由主义思想的结晶。“大公”精神的哲学与宗教背景是两大构成关键。从伦理哲学方面寻究，自然连通康有为“至平、至公”的大同理想；从宗教哲学方面寻究，又自然续接到天主教教义和他醉心的“宗教救国”论上。英敛之的思想与许多自由主义报人不同，就是因为其思想中深藏着那种悲悯普救的宗教精神。这在缺乏宗教精神支持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比较罕见的。

英敛之（1867~1926）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州正红旗人。幼年家贫，拙于生计，少时习武，旋入军籍。后来他在《也是集》中追叙说：“此等伎俩，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遂弃之。弱冠后知耽文学，则又以泛滥百家，流览稗史侈渊博……”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马相伯先生说他“弱冠后，始得耶稣旧教之书而读之。读之既久且多，因多而疑、而

^①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第1号《大公报序》。

问、而思、而辩，弗慊弗信，信岂苟然已哉！’^① 在 20 岁以前，他从好武转而好文，因博览群籍，涵养出一身浩然正气。1889 年，22 岁的英敛之皈依天主教。此前，他曾感时忧国，寻找灵魂皈依，先后攻读了佛教、道教和基督教新教等宗教典籍，最后他在深研了早期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主制群征》后，有醍醐灌顶的豁亮感觉。27 岁时，他突患半身不遂症，悲观至极；28 岁时，中日甲午海战，清军大败，其痛不欲生；29 岁时 康梁“公车上书”其深鼓舞。1899 年，32 岁的英敛之撰写了《论兴利必先除弊》一文，纵论国事，忧愤难当。这年秋天康、梁变法失败，他为免遭株连而亡命他乡。1900 年 3 月经友人举荐，赴云南蒙自法国领事馆充任文案。同年 7 月，该地发生焚教堂、屠教士事件，仓皇踏上归途，其间途径香港、上海等地，被西方文明所惊慑；年底返天津，又目睹了八国联军杀戮之惨状，悲愤交集，莫可名状。1901 年 4 月，他终于结束长达两年的“汗漫之游”，时恰逢实业家柴天宠集资万元筹办报纸，因慕英敛之的才华和胆略，于是登门聘请他去主持笔政。1902 年 6 月，经过一年的筹措，《大公报》正式出刊。英敛之自任总理、撰述和编辑，统揽言论和经营大权。主笔最初拟请汪康年出任，但未果。在筹划过程中，他还得到严复的具体指点。1902 年至 1908 这几年间，他就办报有利于开民智、促维新、立宪政、强国家等撰写了大量的言论文章。英敛之在政治思想上是追随康、梁的维新一派，因而并不赞成暴力革命。晚年的他，主要是以一个“爱国的天主教徒”的身份从事文化和慈善事业。1925 年，罗马教廷深为英敛之“爱国爱教”精神所感动，授权他在中国建立公教大学，即后来的辅

^① 英敛之著《万松野人言善录》之《马相伯序》。

仁大学，他是首任校长。1926年1月10日因病去世。

英敛之的新闻传播思想有很深的中国士大夫和西方宗教背景——这是我们在研究其特殊性时必须特别注意的地方。当然我们着重要揭示的是给他的思想以坚实支持的宗教精神。不过，先还是从他的士大夫精神背景谈起。

从英敛之家世和生平考查，他应该不属于士大夫阶层，而只能称得上是个自学成才的民间知识分子。按照旧时正统的观念，他是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作“士大夫”或“士”的。在这种视角上，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甚至和他后来心仪激赏的《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等人所处的权力中心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其边缘化和民间性几乎是天生的。这种“阶级”界定，使他以后在兴创报业和追求社会进步时表现得更加义无反顾。但是，在意识深处，以及在思想、品性上，特别是在文化和政治作为上，他明显凸现着与晚清进步士大夫阶层相一致的精神丰采和价值取向。他是属于紧紧追随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姚莹、包世臣、张际亮，以及后来的王韬、冯桂芬、郑观应、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经世派人物身后的私淑弟子。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的士大夫与西方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颇有相似之处，特别是那种敢于在公共事务上担当责任，匹夫之下、冒死犯难的气概，在晚近的国势危厄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从英敛之的成长经历来看，他是暗暗地以士大夫臧否天下、献身社会来要求自己的。

二 士大夫精神与宗教信仰

需要探讨的是，英敛之是怎样将士大夫精神与西方宗教精神对接，从而使自己寻求精神皈依与改良社会的梦想达成一致

的。有关史料提供了汤若望的《主制群征》对其完成精神对接的证据，这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据我研究，基督教新教当时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和宗教文化团体“广学会”，对他能完成这种精神对接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广学会”的主要发起人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曾在《同文书会发起书》（“同文书会”为广学会的前身——笔者注）中有许多重要的提示。这些提示对青年时代的英敛之在寻求精神出路和皈依时是很有帮助的。韦廉臣谈到了他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一个重大发现。他说：

很早以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每一个观察家一踏上他们的国土就会感触到这些特征，并且导致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版物……

韦廉臣进而兴奋地说，“这对于凡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是非常值得去做的。因为已经极为明显，只有等到我们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我们才能最终对中国的开放感到满意……”^② 韦廉臣发表这番兼具宗教和文化意义的宣言书时，英敛之还是个少年人。但是，当广学会后来通过大量的出版物，特别是它发行的《万国公报》来持续不断地影响中国的士

① 《同文书会章程、职责名单、发起书和司库报告》，1887年。

② 同①。

大夫阶层时，正处于精神追寻饥渴中的英敛之自然被广学会和《万国公报》的指示所吸引住了。我甚至隐隐感到他之所以弃武从文，由一个希图通过习武来除暴安良的侠者变为一个期望通过“文学”来拯济天下的学者，韦廉臣和李提摩太很可能对他的这一转变施加了相当的影响。当然，这些著名的意见中那个关于“利用出版物影响这个古老帝国”，并使之“思想开放起来”的启蒙思路，也同时对他施加了深刻的影响。

广学会声名大震之际，正值中国的维新运动初兴，洋务派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质疑，并产生强烈的革新皇权政治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之时。李提摩太们知道，对中国朝野知识分子灌输西学的大好时机终于来到了。他们坚信“他们所带来的信息，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还能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①。显然，这是点燃英敛之思想深处的最初的自由主义火星。他当时深信这些来自西方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哲学的信息，确实可以使之达到两全齐美的目的：既解决中国的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又可以解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信守的独善和兼济都一下在这里找到了满意的应答和全新的提示，至少对英敛之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① 1890年8月，韦廉臣去世后，李提摩太接替了他的位置，担任同文书会督办。李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中国社会究竟有多少人可作为影响对象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后来在做统计时又专门对举人以上的在职和在野的士大夫，包括全国的秀才和应试书生作了调查，得出的结果一共是44000名。李提摩太提议说：“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为止。”

《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序言。

后来，李提摩太还针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提出了这样一个宗教意味很浓的主张：

我们认为一个彻底的中国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新的道德和新的宗教基础上进行。除非有一个道德的基础，任何维新运动都不能牢靠和持久……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的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

三 严复宗教观的影响

英敛之的《日记遗稿》中多次提到他与严复的交往，以及对严复的崇敬。这种崇敬不光是政治归趣上的，而且还有宗教旨趣上的原因。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鼻祖，其所抱持的宇宙观中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他对宗教的诸多心得几乎都是居于自由主义的立场而生发的。严复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政治之所以持坚定的批判态度，盖因当时的宗教严重压制和扼杀思想和言论自由。他虽然也说过天主教若在中国流行恐怕会产生“乱吾国”的后果，然而，针对中国社会民智不开、道德颓废的局面，他认为天主教还是非常需要的。他在《法意十九章》的按语中说：

景教（天主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补苴之，殆无疑义……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降以天帝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

他认为“神道设教”不仅对中国的维新大业，而且更对开化民智、富国强种都堪称必要和亟需。在《法意廿四章》按语中他又说：

世法莫不相倚而立者，使民质污，道德固无由独立。方独立之说不足以维世，其时宗教之义，自不可破。迨民质进而教义衰，则独立道德将自有以持世而有余^②。

① 《严复集》第1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6页。

② 同，第131页。

严复的意思是：按当时中国人愚蒙混沌、道德颓隳的水平，西方宗教还是有积极的教化启蒙意义的；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民智大开、道德水准大幅度提高了，宗教自然会衰弃。英敛之对严复的这个观点是持赞成态度的。因为他深知，解决愚蒙和道德颓隳问题，面对的根本就是一个巨大永恒的悲剧难题，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整个人类来说，要让宗教自然衰弃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成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民间报人的同时，又成为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根本原因。

英敛之对严复的感念是至深的。1902年6月16日，即《大公报》正式创刊的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备明日出第一号报……近午，王寅皆、慕元甫等至；严又陵言来。近两点，催，以事止。德义楼饭，共六人……”^①由此足见，严复对《大公报》的创办是极为关心的。他的思想，包括政治哲学、宗教伦理、新闻观念等等，对英敛之的影响应该说是相当全面的。

在《大公报》创刊号刊发的《大公报序》一文中，英敛之开宗明义宣示道：“报人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②此番宣示显而易见是深受严复等维新人士所谓求通求变政治哲学思想的浸润的——事实上这里面还暗藏着严复等人给他的宗教启示。岂止于此，就连英敛之后来一直自诩的“大公主”这一称谓，还是与严复所共有的呢！

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办后的第10天始，连续三天时间

^① 英敛之：《日记遗稿》，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一日（1902年6月16日）。

^②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号。

刊载了一篇政论长文：《主客评议》，就“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之争，重申了《大公报》的观点。文章以断新、旧二客尖锐交锋拉开了论战架势，双方各持己见，反复进行诘难，谁也无法说服谁。这样，便引出了“大公主”“起而解两家之难”。他对“旧客”说，绝不能“据一时之国柄，而逞其禁锢剿绝之淫威”，倘若这样，无异于“执丸泥以塞孟津”，不仅“必不胜”，而且定要负导致“流血滔天”的恶劣后果责任。他又对“新客”说，中国几千年腐朽的“文物典章与一切之谣俗……其入于吾民之心脑者最深且坚”，倘若不经过“大力之震撼与久甚之渐摩”，实在奈何它不得，故而主张不必操之过急。他因此提醒革新者：“傲旧俗之余劲与沮文明之潮力，二者贤不肖异，而皆不祥之金也，以其皆长杀机而拂天演之自然故也。”^①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公主”始终坚持的“大力之震撼与久甚之渐摩”，特别是“渐摩”原则，实际上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自由主义原则：社会必须花大力气方能改进，但决不能操之过急，搞激进主义，而只能循序渐进，在坚忍不拔中建革新之功；须时时警惕“杀机”，而反暴力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大公主”的这番苦心却一直被激进主义者歪曲误读为“暴露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软弱和空虚”，这岂不让人啼笑皆非。《主客评议》几无异于为中国民间报业的第一篇“自由主义宣言”，其重要性除了它用意颇深的社会革新观念外，另有两点同样重要：其一，该文

^① 以上引文皆见《主客评议》，《大公报》1902年6月26日至28日。另注：此文未见署名。英敛之日记1902年6月24日记载，此文系严复为《大公报》专门撰写的。后因“海内外索此稿者甚众”，《大公报》又于1904年4月4日至8日共分五天再次刊载全文。

的“大公主”既是严复，又是英敛之，他们的办报主张别无二致，以进化论的哲学观念指示其办报实践，尤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反抗专制极权、造就多元社会的理性前提。其二，英敛之对英国的以君主立宪为蓝本的“现代”国家制度相当感兴趣，并认为它是中国应该效摹的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想来多半也是受了严复的影响。

然而，康有为之于严复对英敛之来说显得还要重要。这种重要与其说是政治和文化观念上的，不如更坐实地说是宗教和伦理意义上的。在维新人士中，严格地讲，严复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有神论者。他有丰富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虽称不上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但其对唯物主义毕竟是深有心得的。这些心得甚至贯穿到他的社会历史观和宇宙观当中，成为他鼓吹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理想的哲学动力。可是，康有为就不是这样了。严格地讲，康有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有神论者。严复不同意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宇宙来源于“元气”的说法，而是非常赞成西方自然科学观念中，关于宇宙是由物质和物质的运动构成的说法。他认为“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①另外，还可以从他对康德的星云假说论、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科学史观的服膺和醉心可以看出。

四 康有为宗教观的影响

康有为固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说，他认为“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尽管他也对西方的自然科学表示钦敬，但

^① 严复：《译天演论自序》见《严复集》第1卷，第59页。

是他却固执地将“声光电气”等等都归结到神那里。在《大同书》中，他专门阐述了这一神创观念。他说：“神者有知之电也，光电能无所不传，神气能无所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全神分神，惟元惟人。微乎妙哉！其神之有触哉！无物无电，无物无神。”^①他还从神道设教论者的立场出发，对世界上的四大宗教一一进行了狂放热忱的颂扬。他认为，在推动政治改良乃至整个社会和宇宙迈向大同圣域的过程中，神是必不可少的。他自始至终把自己看作是宗教家，是上帝派到人间布道拯济的牧师。他与严复截然大异，他是不相信法律的。他认为法律充其量只能起到制约人们行为的微小作为，而宗教却能于冥冥中管束和引导人的灵魂。他之所以坚持将孔教尊为“国教”，就是根源于这种虔敬不移的宗教哲学背景。康有为的宗教气息充斥他的几乎所有奏议、政论和学术著作。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义》中他宣讲道：“凡国必有所谓国教也。国教者，久于其习，宜于其俗，行于其地，深入于其人心者，是也。”在《中华救国论》中他又说：“夫将欲重道德之俗，起畏敬之心，舍教何依焉！”他甚至还宣讲说：即使国家灭亡了也没有什么，惟独宗教存在才是最重要的。宗教可以收拾人心、教化社会，可以重新将覆亡之国恢复，将羸弱的种族变得强健。在“保国、保种、保教”这“三保”主义中，“保教”是核心，是基础。他认为孔子是“中国之教主”，但是，把孔子“与夫苏格拉底仅明哲学者等量齐观”是荒谬的，因为孔子是神道设教论中的神的具象，是中国整个国家和种族的“通天教主”，而苏格拉底之类的西洋“圣哲”充其量是个哲学家，他们怎么能与

^①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页。

孔子比肩而立呢？对英敛之来说，他未必同意尊孔教为“国教”的观点，但是，他确实是同意康有为关于宗教是收拾人心、教化愚众、拯济社会、推动文明的惟一可靠的力量，只是在他的信念和理解中，把孔教换成天主教罢了。

英敛之与康有为一样，都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据持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又完完全全与他们所据持的宗教立场有关。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总结其学术思想时说，乃师的哲学其实用“博爱派哲学”和“主乐派哲学”即可简括之。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也认为，“以快乐为人生究竟的目的，以同情为道德起源”是康有为人道主义和救世主义的精要所在。康有为的《大同书》就是一个感人的宗教意念上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本。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礼乐政教、伦理道德都是凭借人情人欲的要求，出于人们求乐免苦的需要产生的。但是，这些与人的情欲要求有关的礼乐政教、伦理道德必须要有神的启导，要有宗教家的引领教化，否则，是根本无法摆脱悲苦，抵达大同至乐的自由和至善的境界。英敛之对康有为的这些意见是深表赞同的。他年轻时即在悲苦的社会底层中挣扎，以图解救自己和解救社会；他苦读佛教、道教和基督教新教之典籍，最后将灵魂安顿到“天主”那里，其心路历程与康有为戮力寻求国家和他自己的理想出路是非常相似的。

康有为和英敛之都对皇权专制主义系统中的礼乐政教和伦理道德表示过强烈的不满和尖锐的批评，但是，他们都并不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打碎和抛弃它们，而是竭力主张用温和的改良的手段去改造它们，他们的这种信念与其说是来自自由主义，不如说是来自宗教意念上的人道主义更恰当一些。由人道主义和救世主义出发，康有为还接过孟子的“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的伦理观念大加发挥，从而形成了他所主张的人性论的核心观念。这种“不忍人之心”的伦理哲学甚至发展成为宇宙观和本体论，成为康有为哲学的宗旨和“大本”。他在阐释人性问题时，既将“求乐免苦”说成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并且还将“不忍之心”解释为每个人都固有的东西。他的结论是：“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①他认为仁爱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他强烈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之异于禽兽，全在于人类独有和固有爱质、爱力和不忍之仁心。人之所以能结社会群体，人类之所以能“天演”进化，以及之所以最终能跻升人大同世界，全是因为有与生俱来的不忍之仁心：“天演者，无知之物也，人义者，有性识之物也。人道所以合群，所以能太平者，以其本有爱质而扩充之，因以裁成天道，辅相天宜，而止于至善，极于大同，乃能大众得其乐利。”^②惟恐人所不知其苦心，后来他的弟子梁启超又再度解释道：

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惟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人而不相知，不相爱，则谓之不仁，与一体之麻木者等。苟仁矣，则由一体可以为团体；由团体可以为大团体；由大团体可为更大团体，……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其哲学之大本，盖在

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143页。

② 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3卷，第132页。

于是。^①

梁启超说，康有为的博爱哲学、救世主义、大同理想等等，全都由“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人皆有爱力、爱质的核心观念所生发出来，它既是康有为伦理哲学的理论支柱，同时又是康有为宗教思想的观念支柱。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的宗教信念使他升华成为了一个高尚无比的救世主义者，他自况说：“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因此发愿要将所有众生普度出悲苦之海，“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就是“大同”，是一切都平等的真善美之邦。恩格斯在评价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拯济情怀时说：“（他们）往往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②岂止康有为，就整个维新运动中那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而言，谁又不是这样的呢？严复、梁启超、谭嗣同不都是这样的吗？其实，紧紧追随在严复和康有为身后的英敛之也是这样。他们不仅将这种悲悯普济的博大情怀用之于超阶级、超党派的广大社会和人生，而且还用之于超人类和超宇宙的无边的极乐世界。英敛之以“大公”精神创办《大公报》不过是其超阶级、超党派的宗教拯济事业的一部分罢了。

通过以上描述和探询可知，英敛之之所以紧追严复、康有为，不仅有政治上主张维新、改良、渐进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理由，而且更有着宗教上的神道普济的救世主义的超验理

①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文集》第5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页。

由。这样，就使得他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更接近于康有为，而不是谭嗣同^①。表面上看，他的许多办报意见几乎都没有宗教说教的色彩，但是，当我们将他的这些意见置放在以上的宗教政治哲学的背景中，一下就明白了他的自由主义用意里面，还深藏着他的宗教普济意念——他的超阶级、超党派办报思想的观念奥妙正在于此。

五 自由主义与宗教精神

英敛之虽然从未到过英国，但谈起英国人的自由办报“思想”和英国朝野对待报刊的自由主义风度，却如数家珍。他虽然不完全知道约翰·弥尔顿、厄斯金这些最早的英国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但是，他从《泰晤士报》的自由主义风度中，却受到了深深的启迪，并心向往之。英敛之认为，中国若要强盛，绝不能再造愚民；中国若要收政治维新之效，惟有两途：一是多办新式学堂，二是多开报馆。《大公报》创刊不到一周，即刊出社评《原报》，历数古今，比较中外，反复诉说报纸对国家文明进步的特殊意义。文章说：“以吾中国四万万万人计算，若上比于英、法、德、日文明诸邦，必当一万余家方可相抵；若下列于澳大利亚、阿非利加野蛮之国，亦必有一千余家乃可抗衡。而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对此他感叹不已，因为“报馆之多寡，销路之畅滞，记载议论之明通猥鄙”，无不与“国民程度之高下，智识之开塞，风俗之

^① 谭嗣同也是一个有神论者，但他的政治哲学勇气更主要是来自佛学的支持，特别是他的激进主义风格决定了他与英敛之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自由派人物。

美恶”^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大公报》开办伊始的1902年到1908年这几年间。英敛之就办报有利于开民智、促维新、助宪政、强国家等等，撰写和发表了数十篇社评，其中最著名的有：《原报》、《说报》、《某报发刊祝词》、《论阅报之益》、《论新闻纸之势力》、《说国家思想》、《有权者请再看》、《拟仿英国泰晤士日报例各省遍设官报局以开风气说》、《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告天津各大报主笔》以及《天津日日新闻三千号祝词》等。在这些煞费苦心的议论中，他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报纸的“自由主义”功能，即除了“开民智”外，还必须行使“政府监督”^②的权利。英敛之反复提醒读者，报纸绝不是一般的消遣性读物，它的责任主要有二：一为国民之喉舌，二为监督政府之利器。“如何做国民之向导？国民的智识未开，报纸可以开智识；国民的见闻不广，报纸可以广见闻。如何做政府之监督？政府有不对的事，报纸可以同它驳论；政府有见不到的事，报纸可以向它提醒。”^③事实上，英敛之之所以命名他报纸为“大公”，个中“玄机”就是想以真正顽梗客观的民间超阶级、超党派立场去监督政府，反映民意。1908年9月28日，他在《大公报》的“闲评”栏中透露了自己的这一良苦用心。当时，有朋友问他：“子之报名‘大公’果能指伏摘奸，毫无顾忌，一秉‘大公’乎？”他慨然回答说：“乃若其志愿则未尝不大公矣。奈事与愿违，实难名副何！……指伏摘奸虽极正当，而弄权者则情有不甘。夫不甘者

① 英敛之：《说报》 参见《大公报》1904年1月6日。

② 同①。

③ 何炳然：《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参见《新闻研究资料》第3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岂嘿嘿无为遂毕乃事乎？必设尽方法，钳之束之，倾之陷之，务快其报复而后已，此鄙人数年中屡经小试其端者也。今则谓仆为惊弓之鸟也可，谓仆为经露寒蝉也可。不过偷存视息，静待果熟，同沦于浩劫已耳。”这段感喟无疑透露出—个中国早期的“自由主义”报人的满腔无奈和悲苦。对“政府”或“弄权者”的监督谈何容易？虽心存大公之志，却不能不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呈“惊弓之鸟”和“经露寒蝉”之忧。可是，这并不足以消磨英敛之和《大公报》“指伏摘奸”、批评“政府”和“弄权者”的锋芒。即使在康、梁变法维新失败后情势非常险恶的情况下，《大公报》仍坚持“尊皇斥后”的批评立场，因此在舆论界和民众中有很高的声望。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大改版，由原来的“宣统”纪年改为“大中华民国”纪年。而这一天正值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但从这天起该报连续12天都刊登—条“大公报馆”的告白，称：“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为了表示对袁世凯专权的抗议，英敛之离开报馆，隐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以—个“自由主义者”不合作的态度，在那里孜孜不倦地从事有益于民间的宗教、教育和慈善事业，始终恪守其“大公”宗旨。陈垣先生在《天主教徒英敛之的爱国思想》等追思文字中称赞他说：“以一介不以取诸人，而体恤穷乏，则恒视其所有。”因此，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京西—带50岁以上的农民，少有不认识和不感念英敛之的。

英敛之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对报纸性质的认识和界定；其二是对报纸舆论监督功能的认识和界定；其三是对报纸社会责任和使命的认识和界定^①。

^① 徐培汀、裘正义著：《中国新闻传播学史》。

关于第一个方面，英敛之从悲悯普济的宗教视角和平民立场出发，指出现代报纸不仅与中国传统的“史记百家”、“志怪之书”、“稗官小说”迥然大异，而且还与中国所谓的“报纸”大相径庭——既不同于“宫门辕门之抄”，又不同于京报官报，现代“报纸则合朝野而编摩，极体制之美善，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可不出户庭而识天下之事。”尤其可贵的是，这种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报纸“首列论说，务使博闻，虽供局外之闲谈，要在集思而广益，但使民间疾苦达诸长吏庭除”；报纸“明白易晓，真实不浮，事必简而能详，文亦质而不俚”；更厉害的是，“报纸则大而国家政令之因革，远而人情风土之异同，中外交涉之要务，商买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惊愕可喜之事，凡是新人听闻者，无不具于尺幅……^① 概而言之，报纸不是官衙权势者之私物，不是文人骚客之雅玩，而是能开愚蒙、通智能、广见视、扩胸怀，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民主，乃至道德进步的现代文明‘公器’！”

关于第二个方面。可以说，这是英敛之报刊自由主义思想最重要的部分。这一思想从一开始，他就借《大公报出版弁言》宣示于天下。他写道：“本报但循泰西报纸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② 可以说，这番宣言正是日后的“四不主义”和张季鸾所谓的“随时准备失败”的殉道精神之最初源头。这当中的要害是“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关于“大公”，本节已作过大量诠释，在此只着重诠释“折衷之论”。所谓“折衷”其涵意相当深厚，它既是“大公”

① 以上所引皆见英敛之：《说报》，《大公报》1904年1月6日。

② 英敛之：《大公报出版弁言》，《大公报》1902年6月18日。

精神的理性发挥。折衷，既有客观、公正、理性的涵义，又同时有超阶级、超党派，不依傍和屈从于任何社会势力的气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反对暴力和激进的温和主义和渐进主义（甚至有后来所谓“中间道路”的涵义）之深刻内容。

“我在（存在）固我思（言、思之载体为报纸），乃不得不有‘折衷’的考虑，其实就是‘政治博弈学’……”“折衷”只问是非曲直，而不管任何政治势力的脸色如何，因此与“小骂大帮忙”无涉。

关于第三个方面，英敛之亦有大量论述。他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办报，首先要解决对报纸社会责任的认识问题。

“泰西人视报纸为人生要务，民智之开，报纸之多，国之所强也。”^②国家的强盛必须依仗多办民间报纸，开智通塞。他甚至将这一观点提升到“国家思想”的高度来强调。报纸具有的“国家思想”是什么？他说：其一为民众之向导，其二为政府之监督。报纸的此两种要义当然不是他的创见，但是他能将其提升到“国家思想”的超迈地位上来强调，确是有创见的。基于此，他还认为，中国的报纸应该向西方报纸靠齐，使之成为超党派的、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大众化“高级报纸”。这种报纸理应是思想启蒙意义和民主意义上的国民宣教的“大机关”，而不是分属什么政治派别的“机关报”。他理想中的这种“大机关”，其品格风貌应该是这样的：

……吾辈为在大处着眼，不能畏惧权势，不能瞻徇私

① 散木：《大公报的百年沧桑》，《博览群书》2002年第5期，第43页。

② 英敛之：《原报》，《大公报》1902年6月22日。

情，更不能逞其私愤，应如何力持公理，为国家谋治安，为人民谋幸福；应如何结一团体，扶正抑邪，兴利除弊，使社会隐受其益。此吾辈开宗明义第一章……^①

但，就是这样一个以高尚的人格和慈悲的大公情怀，不仅深深地感动了中国的平民和普通知识分子，同时也感动了罗马教廷的杰出报人、教育家和慈善家，后来却被王芸生和曹谷冰斥责为“崇洋崇到满脑子‘二毛子’思想……在当时就担任了帝国主义所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文化买办和奴才，而且还干得出色……”^②简直惊得人目瞪口呆。王、曹二人作为前“自由主义者”，在政治高压下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并授意参与了对英敛之这个自由主义者的恶毒咒骂，其中之奥妙（谬！）太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节 黄远生：中国的卢梭与第一个被狙杀者

一 生平及思想简述

黄远生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被党派暗枪所制裁的被

^① 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 详见《新闻研究资料》第 4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第 56 页。

^②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7 页。

狙杀者，但他并不是第一个被击倒的思想异类。这个无党派新闻记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生前根本就没有料想到，他的死竟然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历史轰响。这种轰响还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新闻自由史，而是更广泛和深刻地影响到 20 世纪及以后的中国政治文化史和现代化史——特别是以自由主义为前卫标志的文明演进史。

在他死后的几近一个世纪当中，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自由主义者，都在意味深长的缅怀和惋惜中窥见到了他那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

黄远生新闻自由思想的核心是：他笃信，在中国必须实现有宪政和法律保障的平民的言论自由；报纸发表“不党之言”乃天经地义。他甚至与梁启超、杨度之类的著名人物也是有相当的区别的——他不像他们那样机巧善变、思想和人格严重脱节，更不要说以臣妾的身份向极权者进言，并积极参与荒谬透顶的“法制建设”……黄远生的死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文化事件。这从当时为数众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他的祭念、追怀和评价中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个不可多得新闻奇才，同时又是一个有着深刻的灵魂忏悔意识的自由主义信徒。

黄远生这个人令人吃惊的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很短暂，总共不过才三四年。然而，他在中国新闻史，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显赫。黄远生对中国新闻写作的贡献，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创立了“远生通讯”——这种自由奔放的新型通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新闻在写作模式上食古和食洋不化的旧格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新闻写作上的成功，更主要的不是他弄到了什么写作妙法，而是他从西方自由主义报人那里盗来了“真经”。

还是唐振常先生感喟得好：“远生之死，实在是一悲剧。”

远生个人的悲剧。中国知识分子欲求保持独立的人格，在中国社会，在政党纷争中难矣！非此即彼，非杨即墨……”^① 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严苛环境中，一个自由主义报人欲维护社会正义和人格尊严，就得时刻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黄远生的被暗杀，预示着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命运和一种最基本的“死法”。他之后的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杨杏佛、闻一多、李公朴等人的“死法”，不过是将这种严酷的历史惨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凸现出来罢了。

当今中国“知识界”在围绕“忏悔”这一题目喋喋不休，从而充分暴露出整体人格的卑鄙和庸懦时，黄远生写在 80 多年前的《忏悔录》却明白地告诉我们：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精神资源……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基，字远庸，后以笔名远生行世，江西九江人，其父“文彩秀发”，然终生不第，其母“颇通诗书”，故而在当地亦称得上是书香门第。16岁时考取秀才。如果不是遭遇到了历史的大变局，他很可能继续沿着科举的路子走下去。由于醉心于“新学”，他很快进了当时的新学堂——南浔公学。这时，“他对专制制度已产生不满，书籍函牘间常写下自认为大逆不道的‘悖谬之文字’。”^②不久因参与学潮并作为组织者，他被迫辍学回乡。20岁时他又重新回到科场考中举人。1904年晋京参加史称“光绪甲辰会考”的大会试，又一举考中进士。当时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与之一同考取的还有后来著名的自由分子沈钧儒等人。不久，执意不

^① 唐振常：《黄远庸之死》见《文汇报读书周报》1993年8月14日。

^② 张宗厚：《黄远生》参见《新闻人物》第1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做官的他被清政府以“新进士”资格派往日本留学，在中央大学专攻法律。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 and 学术思想，他开始勤奋地攻习英文和日文。宣统元年，即 1909 年，黄远生学成归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极不情愿做官，但还是被迫接受了朝廷授予的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等头衔。但是，这些罩在头上的乌纱，很快就被辛亥革命的狂风所刮走了。这非但没有给他带来无所依傍的痛苦和落魄，反而有种挣脱了体制纒继的全身的自由感。从这时起，他坚定地选择了记者职业，并将其视为自己一生最醉心和最尊崇的神圣事业。

事实上，他早在留日期间，即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对从事新闻工作有极为深刻的认识。当时，他除了对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思想和新闻思想感兴趣外，更钟情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钟情于报刊自由主义理论。那时，他就是康梁体系所属的政闻社外围的活跃分子，但却始终不肯参加政闻社组织，认为无党无派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之身、自由之魂。欧游期间，他和王韬等先辈一样，最服膺的不是西方的“物质文明”，而是其“精神文明”，尤对西方的民主政体和自由思想大加赞赏。与他交谊深厚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家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有这样一番回叙：“黄初尝为北京《亚细亚报》撰文，兼为上海《东方日报》通信（即通讯旧称——引者注），《东方日报》停刊，乃为《进报》通信，后又为《申报》通信……盖报界奇才也 黄所为文 通信外又散见《少年中国》、《东方》、《庸言》、《论衡》、《国民公报》诸杂志。^① 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这些通讯和时评文章，后来大多收集编入《远生遗著》四卷当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212 页。

中。其思想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生，甚至文学艺术等领域，是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与演进、搏战与受挫的一座富矿。1915年，袁世凯称帝心切，他不满意美国人古德诺、“国学大师”刘师培和杨度等人写的拍马劝进文章，鉴于黄远生在舆论界的崇高声望，于是威逼利诱黄为之撰写劝其称帝的“鸿文”，黄思虑再三，决计逃出北京。同年10月，几经辗转流徙，他亡命到了美国。12月27日深夜，在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上，被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旅美支部指派的特务狙杀身亡。

二 “不党之言”与“平民政治”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报人，黄远生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现实有过正反两方面的透析和归纳：“（一）负面，笼统，故专制，故武断，故形式，故沉滞，故腐败；（二）正面，明画，故怀疑，故研究，故自由，故实验，故改良，故进步”。^①对现实负面的认识，导制其悲观主义愈加沉重；而对现实正面改造的可能性认识，导制其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前提下，更执着于自由主义之追问。黄远生执意选择的新闻职业，在民初是不太被人看得起的。特别是他此前既留过学，又中过进士，还当过前清大官，故此选择很让人不可思议。但是，他却利用这种别人少有的特殊优势——即对国际时政和国内政界都非常熟悉的便利，同时担任着京沪多家报纸杂志的特约通讯员和撰述的职务。他和一般的访员（记者旧称——笔者

^① 黄远生：《国人之公毒》，参见《远生遗著》第1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52页。

注)不同。由于他以前和政界交往甚多，因此常出入殿府，周旋于上至总统、下至部长之类的要人之间——一个介于新闻记者和政要故交之间的特殊人物。

黄远生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每日出入于上流社会，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丝毫不为私情旧谊所囚系。他那些巧妙“采”自官场的新闻，大多是些关于政治权谋、经济算计、军事筹划、外交风云等方面的消息，但他始终以实录精神来叙写，并以自由主义的态度予以冷峻客观的剖析与评说。

许多研究者对黄远生的写作功底和新闻才华备加赞赏，推举其为“新闻界巨子”、“通讯界大师”，这些都不错。然而，他更值得我们今天推崇和赞赏的，应该是他对中国报人的杰出的自由主义示范——

第一，他认为报纸必须立足民间，主持正论公理，严厉监督和批评政府。在《少年中国之自由》一文中，他大声疾呼，报纸必须“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元气……而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

第二，他主张报纸在报道上，应真实客观，尽可能全面公正，因为这是充分尊重每个公民的知情权，同时也是维护报人自尊的理性前提。在政府和权力者不承担向全社会开放自己行政决策的义务时，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就落到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报人身上。他在专为《庸言》杂志撰写的《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写道：“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惟一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主张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

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于有主张。”自由主义主张社会的多元化，观念的多极化，黄远生所谓决不以自己的主张为惟一主张，或自以为正确之主张，而排斥其他主张，就是强调和坚持这一重要的自由主义原则。

第三，他坚持报纸的“不党之言”立场，始终对党争深恶痛绝。他认为，报纸一经堕落为“党争”的工具，就势必酿成“党祸”，严重危及社会，危害百姓。辛亥革命后，“党报”风行，争权夺利，丑态百出，他们相互攻击谩骂对方是“贼党”、“贼报”。有睹于此，他愤而指出，所谓“党报”者，实质上是“置多数人民利害于不顾”、“视私人利害重于国家”。他还忍不住以自由主义者的愤怒断喝道：“不许此两派私人之势力，假政治为口实，而相与赌民国之基础为胜负。”由于他一以贯之地坚守这一立场，故没有一个私敌。他不幸被刺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许多持有不同政见，分属不同党派的人都追怀他、纪念他，这多少也算是自由主义者不偏不倚的人格魅力吧！

黄远生在集中表达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时，说得最多的一个概念是“平民政治”。也就是说，他毕生期待和追求的最佳政治文化境界，就是以“平民政治”为表征的自由主义境界。

在《新旧思想之冲突》中，他对中国极权政治的传统深为不满，认为这是严重阻碍“平民政治”实现的最大祸害。他说：“吾国秦汉以来，推崇一尊，排斥异说，闭关自守，习常蹈故，以至今日，余焰不死。”深究之，“笼统”（即高度的专制集权之谓——笔者注）是为害最巨的“公毒”——“故笼统

之国民必武断，武断者必专守形式，专守形式者必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必认为异端叛民，则必须火其书焚其庐……政治无主张战胜舆论，则最后手段，惟有专制。”因此，他断言，民国之后“以中国之社会制度言之，无复个性存在。大抵人之一身，为其祖父之奴隶，为其家庭之奴隶，为其亲党之奴隶……”^①。总之，是一丁点儿也谈不上有什么“平民政治”的迹象的。

“平民”和“奴隶”是有质的差异的。针对当时号称“平民”的一班人，黄远生讽刺道：

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矣。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矣。盖恣睢无道，惨酷不仁，至于中国今日之平民政治为已极矣……

……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享全国最高之俸，极其饮食男女之乐则一也。此等极乐世界中人，统计全国，最多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珍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为调查而研究。何则？以其为奴隶而非平民也。……革命以来，吾清洁高尚之国民，以爱国之热诚，奔走于义师之下，此所谓人心革命，非一手一足之烈也。

^① 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参见《远生遗著》第1卷，第231页。

顾国体既定，则争功攘利盈途，窃位素餐者载道，而议论风起，造作党会者，亦得游手而饱食。独吾伤痍满目，困苦无告之国民，惨为大总统之奴才。临时政府成立以来，政府之教令、议会之法律、报馆之呼号而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此无他，以其为奴隶非平民也。^①

在他看来，中国之没有“平民”、没有“平民社会”和“平民政治”，其根本就在专制极权。大总统也罢，政府也罢，官僚和党会也罢，他们最需要和最欣赏的是可随意供其驱使的奴隶，而绝非具有自由民主权利的平民，即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公民。

那么，又该怎样来实现他企望的“平民政治”的理想呢？他回答：必须行法治。黄远生所理解的“法治”具有非常鲜明的自由主义涵义。他试图通过“法治”对政府和权力者加以必要的限制，其目的是防止有限政府变为无限政府，有限权力变为无限权力。这无疑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最信奉的“外科手术”——黄远生一直认为，只要实行宪政和法治，个人的自由权利就会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奴隶”才会真正转变为“平民”。他的另一层意思是，个人的自由必须是“法治”之下的自由，“平民”也必须将自己的自由权利置于“法治”的强制和限制之下。事实上，黄远生关于“平民政治”的法治构想，已经触摸到了自由主义精核的部分。具体到《个人势力与

^① 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参见《远生遗著》第1卷，第233页。

国家权利之别》这篇极类于自由主义宣言的文章中，他激动地宣讲说：“法治之国之要素无他，在祛除个人势力，而以国家权力范四民于法律之内而已。非法制国则反是，个人之势力暴张，而国家之权力则扫地。有如专制之国，君主有势力者也，亲贵有势力者也，官僚有势力者也……大多数平民则奴隶而已矣，犬马而已矣。……立宪国则宜反是矣，民主立宪国则尤宜反是矣。立宪国之国治如何？全国之人，人人得有相当权利之主张，故人人皆有势力者也，然人人须服从相当之法律，故人人皆无势者也。法律者谁制造之，谁行使之？则国家之权力制定之而行使之者也，载之宪法。国家对于人民有若干若干之权限，以分配之于总统，分配之于议院，分配之于司法机关。故其机关有权力，而其机关之个人则无权力。”^①自由主义者都是些天真良善之辈。黄远生的这种构想和所有的中国自由分子的企图一样，在极权主义治下，屡屡被人讥嘲为天真幼稚，讥嘲为不通中国国情，但谁又可能遮盖住它至高无尚的价值意义呢？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法治之国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一名词，至为万恶之傀儡也，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②他还数次登报声明，自己的名字从此誓与一切党派断绝联系。也就是说，他要坚持以“文字救世”来实现自己的自由主义抱负。

而这一切又是那么的矛盾，因为他渴望有法治保障的言论

^① 黄远生：《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利之别》，《远生遗著》第2卷，第116~118页。

^② 黄远生：《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利之别》，《远生遗著》第2卷，第116~118页。

独立权利，这样才便于达到其“文字救世”的目的，才便于使自己更好地成为“平民”的代言者。可叹的现实中，“法治”云云几如云中月、雾中花，是官家的权谋，政客的游戏……其尴尬是必然的。

三 迷恋法制与坠入陷阱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黄远生非常迷恋法制。他万分渴望推翻皇权统治之后的中华民国能效法欧美尽快建立法制秩序，从而逐步实现他心中梦寐以求的自由主义理想。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来到北京这个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从事带有非常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的新闻实践和政治文化活动。

黄远生身上有“维新派”的色彩，但是他在骨子里却与梁启超和谭嗣同这些人物不同——尽管他曾深受过他们的影响。

黄远生竭力反对“党争”，在内心里极端鄙视“党派之见”，曾发誓要做一个“超越党派”的清洁知识分子。然而他却又参加过进步党，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这是因为他醉心于法制的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由于他将介入政坛以便推行法制和争取人权提升到了一个幻想的层面，所以他不仅入了进步党，而且还一度对袁世凯抱有自由主义理喻上的幻想。这种深具悲剧意味的举措，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民元之后的不少知识分子都曾一度陷入这种悲剧性的迷恋和梦幻之中。不仅像杨度这样的“筹安会”著名人物不遗余力地参与了拥袁的活动，就连国民党中的许多著名人物，也曾深信袁世凯是可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法治和繁荣富强的救星。袁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初，国民党的不少报刊就曾称颂和表彰他是“盖世英雄”和“革命伟人”，甚至是

可以和华盛顿、杰弗逊相媲美的伟大人物。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喜剧情境呢？其实这是袁世凯的复杂性，或称“狡诈性”所营造出的必然效果。袁世凯的新闻管制思想和他的极权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具有显目的“过渡色彩”。即，既有从清王朝那里承续下来的舆论专制特色，又有“共和政体”新闻控制，特别是“法制”控管的特点。所以，袁政权的这种“新思维”和“新做法”，在当时曾获得过广泛的喝彩。袁世凯就任总统后，还曾专门在巡警总厅召集新闻界代表发表讲话，声言“言论自由，为共和国之所不禁……”^①。因此这不能不令黄远生之类的自由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中的知识分子大为感动。梁启超这样的自由分子甚至还主动向袁世凯献言说：“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②梁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之一，研究“国学”能抵达如此体贴周到的境地，因此说他在政治上自甘“堕落”恐怕就太浮浅了。事实上，一方面他是在严肃认真地向一个民族的“救星”建言；另一方面他又何尝不知：不管建不建言，中国的极权人物都会以这种作秀的方式来对待舆论、对待受其所统治的民众的。袁世凯的低智是：到后来，他竟然连做一下“自居舆论之仆”的表面文章都不屑于了。当然，这种低智并不只限于袁项城先生，他死去以后，那些轮番登场表演的权贵们，哪一个又不是这样的呢？

黄远生当然与梁启超、杨度之类的人物是有相当区别的。一则，他与这些满腹经纶却日夕官迷心窍的“大师”级的人物

^① 《民主报》1912年9月25日报道。

^② 转引自李侃：《从梁启超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堕落》，《光明日报》1963年5月12日。

不同，他厌恶为官弄政、邀宠争风；二则，他并不像他们那样主动以臣妾的身份去进言和参与假惺惺的“法制建设”。他终于觉悟到，民元之后，中国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平民政治”，人民还是处于极权统治下的卑苦地位，中国还是在专制下匍匐着，法治云云，只存在于梦幻之中。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足以作为理由，让自己主动放弃对法治和自由的争取——明知无为也应为之。因此，在精神向度上他与梁启超、杨度这样的“注水”的自由分子一下便拉开了距离。

由于黄远生对“党见”、“党争”深恶痛绝，认为政党是“万恶之傀儡”，这样一来，他竟陷入了悖论式的人生抉择中，终至被袁世凯所利用，而背离了自由主义原则。20世纪80年代初，从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惊人的材料——这份1913年7月3日北洋政府的“国务院”致其内务总长的秘密公函。内称：“奉大总统发下黄远庸条陈一件，内称：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①

在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中，还附有黄远生的手书条陈原件。内务部当时即回复了黄，向他解释说，“查本部阅报，早已派有专员，即警察厅亦有专员司阅报纸”。这无疑对他的建言是一大幽默，看来他确实低估了北洋政府的舆论控制能力。尽管他的建言在主观上并非邀宠极权政治，以鼓励其加强专制手段，而是为了假袁世凯“法律控制”的手段来干涉和为难那些“持党见喜党争”而“祸害”国家和民众的政党报纸，特别是希望能限制被他视为“叛党”的国民党的“喉舌”。但是，

^① 转引自《新闻界人物》第1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这种行为本身不仅严重伤害了自由主义的神圣原则，而且还严重地丢失了自己作为自由主义报人的尊严——黄远生的这个教训后来被不少自由主义报人所诟病，自是理所当然的。

对袁世凯和中国的极权政治，黄远生是否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批判呢？其实不是这样，他很早就清醒地知道袁政权的那些本质的东西。这一切，都源于他对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国”深刻的失望。他很早就在报上撰文揭示说，辛亥以后“不过是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官僚之侵蚀如故，地方之荼毒如故”；他痛楚地斥问道，难道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大总统去代替皇帝，以都督、国务员、师旅长去代替督抚、亲贵、军统标统吗？“政治之日趋险恶，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命运可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① 国号虽变，江山未变；人主虽变，统制未变，尤其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手段在本质上并未根本改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迷恋于法制，幻想“人人服从相当之法律……袁总统泄溺于途，警察得而执之，罚金几角至几元，乃与吾辈等”的平等胜景，但是他却知道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袁政权“徇私弄权，无异前清……乃弊不革，而反加甚”。在这样的警察国家、特务国家之中，不要说总统随地大小便无人敢问，即便窃国又有谁敢声张。袁“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天下以袁门为最多！”但他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鬼使神差，后来竟差点成了袁门豢养的“鸡鸣狗盗之士”。1915年9月3日，黄远生就像前辈王韬那样偷偷踏上了逃亡之路。他在前门溜上了火车，旋即到了上海。在好友、自由主义者戈公振和吴贯因

^① 黄远生：《政局之险恶》，《远生遗著》第1卷，第60页。

的帮助下，准备到美国躲避。同年 10 月他先到了日本，但不久即发现有人盯梢，于是在 11 月中旬乘“佐渡丸”号客轮到了美国。在亡命途中，他写信给好友梁漱溟说，决计“脱履一切，誓将洗濯为人”，其中备述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生存的艰难险恶——“远往者行止之可疑，虽至亲近者，莫能为解，盖畏事太深，故不敢自远于瓜田李下，……窃闻士大夫之立身也，不畏斧钺之及其身，惟恐不及容于君子……”^①，未料，这伤痛悲怆之语竟成了他自己的不祥预言，这也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遗言。

四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忏悔录》

黄远生喋血暴毙时才 32 岁。但是他的思想和实践，却并没有随着他肉体生命的终结而终结。在后来的自由主义报人眼里，他永远都是一面耀眼的旗帜。我们从戈公振、胡适、梁漱溟、邹韬奋、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著名人物对他的恒久注视和感念中，可以清晰地掂测他的分量和高度。

黄远生留给中国自由主义报业的遗产是如此的丰厚，其之所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倘要深究起来，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忏悔——他完全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卢梭”。

为了能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认真读一读他留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自由分子和民间报人的《忏悔录》。

20 世纪 80 年代末，年轻的思想者许纪霖先生描述了黄远

^① 梁漱溟：《致黄远庸》，《梁漱溟选集》第 1 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6 页。

生冷不丁地从历史深处浮现而出，所带给他的惊异和巨大的灵魂震动。他这样写道：“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以《忏悔录》名书者，代不乏人，其中以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两本最为知名。然而，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类似的《忏悔录》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却鲜有所见。不过，近来偶然浏览 70 年前的《东方杂志》竟然意外地捡得一篇《忏悔录》，作者是黄远生。再回头索查商务印书馆 1984 年重新影印出版的《远生遗著》，方知已全文收录。这便不由得撩起了我对《远生遗著》特别是收入其中的《忏悔录》，以及透过黄远生所映现出的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心态的盎然兴味。”^①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人格心态”固然非常繁富芜杂，千头万绪，梳理困难，既有周作人、郭沫若这样的精彩标本，足够我们深入剖析，也有陈寅恪、梁漱溟、吴宓这样的绝妙标本，亦足够我们作“临床研究”。即使是我们从这些复杂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心态”中披沙沥金，淘汰出“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这样的旷世瑰宝，作为后来者承续自由主义事业的理由，以及强固其信心的依据，但仍然有明显的缺憾。那就是当今弥漫知识界的一片哀怨之声：“我们缺乏忏悔的资源 and 传统！”更有人顺势找到逃遁的充足理由：“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要什么忏悔呢？不忏悔是每个人（应读作知识分子——笔者注）的‘神圣’的权利！”

事实果真的是如此吗？凡是认真注视和研究了黄远生《忏悔录》的知识分子，都不应再作出这种无知无耻的回应。黄远生的《忏悔录》会帮助我们走出这种无端气馁和无赖耍横的窘境。我们其实并不缺乏“忏悔”的传统，同时也并不缺乏“忏

^① 许纪霖：《智者的尊严》 学林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 第 87 页。

悔”的资源……

很难设想，任何一个发誓要在精神上真正抵达自由主义极境的知识分子，却要顽固拒绝“忏悔”，而其“充分”的理由竟是：其一，我们缺乏这种传统和资源；其二，“不忏悔是个人的自由”。黄远生会告诉我们：忏悔，惟有忏悔才是使一个人，尤其是使知识分子获取全身心自由的不二途径。一个人连忏悔都凭种种理由而排拒了，他又怎么能跻身于自由主义之中呢？一个以自由主义标举自身的知识分子连忏悔（当然不是强迫的那种）都惧怕了，他又有何脸面死乞百赖地要号称是自由主义者或“现代知识分子”呢？

当今知识界，在围绕“忏悔”这一“话题”演出的这场“笑剧”，确实与他们不知道有黄远生存在，或明知有黄远生的示范和提醒，却竭力要绕过他有关——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悲哀和黄远生的悲哀并不处于一个层面之上。

只有很少的人，很少的知识分子发现了黄远生对中国自由主义事业的杰出贡献。他们深知：离开了“忏悔”来探讨和重建“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理性秩序，将是多么的无知和可笑！

其实，黄远生除了《忏悔录》一篇之外，另有一篇《反省》也深深地沉入了“忏悔”这一“难题”。写这两篇沉痛而畅快的自我解剖文字时，正是在1915年，离他死期很近的那个时刻。在《忏悔录》当中，黄远生毅然决然地对自己的一生，特别是“居京数年堕落之罪”^①作了无情的拷问：

余今年仅三十二。综余之一身，而谥以至确之名号，

^① 黄远生：《致甲寅杂志记者》，《远生遗著》第1卷，第81页。

实一堕落之青年而已。……余乃以身为形役之人也，……似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作呕既久，不可复住，则亦听之。此傀儡者之名片之衔号，实乃多种，曰学生，曰官吏，曰新闻记者，曰政客，曰律师，皆其经历中之最大者也。而此傀儡之于官吏、之于学生、之于政客、之于新闻记者、之于律师，亦犹其于饮食起居然，冥然罔觉其为自身饮食起居，之蠢蠢然若不自知其自身，实为学生、实为官吏、实为政客、实为新闻记者、实为律师也者，盖余之魂之死，亦已久矣……所谓魂死者，形容之词耳，魂非真能死者也。上方谓既有形死而魂不死者，即必有形未死而魂先死者，义似正确，实乃谬于论理。盖今方以灵魂不死为前提，故曰形死而魂不死，固得举种种例证以明之。若曰形不死而魂先死，则其义即大谬于前提，不能存立，且亦无法举其例证。即如上述，吾之一身，有如两截，一为傀儡，一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灵魂。吾之灵魂，实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能复动，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桎置之初，犹若槛兽羈禽，腾跳奔突，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无效，桎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从狱隙之中，稍冀须臾窥见天光^①。

^① 黄远生：《远生遗著》第1卷，第123页。

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国积习久远，狰狞龌龊的官僚政治一并进行了清算：“官僚不外三种：曰盗，曰丐，曰流氓。余既为流氓之官一年有余，亦以余力兼为报业，未几，而革命起矣。”为自己曾一度沦为“流氓之官”痛悔不已、鄙视不已。他一直认为，党争党见是政客产生的端由之一，因而尤为恶劣卑浊。尽管“政客中固亦有志洁行芳不受贿卖者，然所标种种政论，所拥种种势力，今日宁待深论。余固知今日之与余同具忏悔观念者，正不乏人也。余于民国二年，曾登报自绝于党会曰：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

黄远生与鲁迅极为相似，“一个都不饶恕”，包括他自己。这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基督教世界中那种忏悔与宽恕的亲和相关，在他那里根本无法媾合；他渴望自己通过忏悔能达到德行的增进和灵魂的救助，但由于他无法找到引领自己的走向宽恕的道路，所以到最后，他都一直深深地陷在罪孽带给自己的痛楚和恐惧之中，故而无法说服自己去宽恕那些威迫和诱使他跌入罪孽的邪恶。因此，他在提及新闻记者和“新闻自由”时，亦不能不予以严厉的斥责和清算，他写道：

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輿，指斥权贵，肆其不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然即法律上极其自由，究余个人而论，亦决无为新闻记者之资格。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为能听。刻画

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为能写。余无一于此，何能为新闻记者^①？

继而，枪口一转，直接黑洞洞地把子弹无情地射向自己：“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即可陷其人于举国皆曰可杀之中。盖一人杜撰，万报誉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近世以来，为报人者，谁敢如此凌厉而无畏地把灵魂的解剖刀刺向自己的内心？黄远生之前从未有过，黄远生之后，亦从未有过。他还有一篇著名的《消极之乐观》，也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清算。忏悔、颓唐、觉悟、走投无路的他竟然从这消极的人生中见到了熹微的乐观之光亮。下面这些话可以视作他献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最宝贵的精神馈赠：

万象中之最足悲观者，莫如此人心之消极。吾向者固亦以此种人心之趋势，为最为可悲观者也。今乃渐觉前途一线可为乐观之曙光，即起伏明灭于此悲观之黑影之中^②。

他又说：

“余亦一消极之人也，余亦一最抱悲观之人也，且自觉所引以为悲观之事实范围，以四五年来从事于新闻事业

① 黄远生：《忏悔录》，《远生遗著》第1卷，第201页。

② 黄远生：《消极之乐观》，《远生遗著》第1卷，第213页。

之结果，较普通之消极者为更深刻。……吾敢断言，凡在水平线上之有意识之人，其经过之痛苦，皆一一等于吾曹，而其因经历程序而得这观念，亦必与吾曹相等，故今日乃得此大致不差之总和。而吾人所以在今日犹以为得此总和为致足乐观者，即以此等为吾国进步所必经之阶级。……吾国吾群此后之大部分之希望，终不能不系于此种种失望归于消极之优等人类。若合此大部分人，不复苏生，无可希望，则即有一大智大勇之人孤立于上，亦复何补？则吾国吾君，必将海枯石烂，响绝声没。若其不然，则吾敢断言，最后之光辉，必灿烂而无极。以前之罪恶及错误，皆为吾曹此后忏悔及进步之最可宝贵之资料。而吾断言其必发挥此最后可宝贵之光辉者，何也？则惟人心不死故也，则以意识不死故也，则以文明不死故也，则以势力不灭故也，则以此优等人类经历程序最后所表现之共同潮流，已经磅礴郁积，回旋周转，而渐得其安身立命之地，而直接间接相合抱故也，则以自古哲人未有不经几度之愤思自杀而后成功故也。’^①

林宰平先生评述说：虽然黄远生像卢梭和托尔斯泰那样作了“忏悔录”，但是却既“没有卢梭的胆力，又没有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所以他格外苦”^②。这番深切的洞悉之语，其实竟道出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者当中最勇猛无畏者的极端矛盾和窘厄的灵魂处境。

许纪霖先生在考察分析黄远生这一自由主义个案时认为：

^① 黄远生：《消极之乐观》，《远生遗著》第1卷，第215页。

^② 黄远生：《远生遗著》序言。

尽管忏悔不是中国文化的土产，而是西方的舶来品；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所凭借的儒道互补文化传统严重缺乏宗教自觉的忏悔意识和自我超越精神，但是，从黄远生开始，他的庄严的忏悔毕竟使他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得到拯救，并进而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他超越了他自己。仅就这点而言，黄远生忏悔的意义就远了非寻常。”^①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黄远生作为一座丰碑的高度，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哪个自由主义者所超越。

第四节 史量才：向现代秦王 挑战的报界荆轲

一 生平及思想简述

在通往新闻自由的险恶之路上，史量才的教训是最为深刻的——他似乎忘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所立足的“游戏赛场”是中国，而不是可以容忍自由主义生长的英美等国。他与蒋介石先生博弈对峙的结果是：对方既无耐心，又缺乏优雅合体的绅士风度，更不顾起码的“游戏规则”。于是，趁这个民间报业大王轻敌“疏忽”之际，对方突然掷出了暗器……

悲剧的结论是：规则是外国的，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玩法。史量才先生居然一点也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① 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第95页。

惟一值得宽慰的是，与“前辈”自由主义报人遭射杀的环境大为不同。他被狙杀的所在，是充满古典诗情画意的江南秋野：芦荻瑟瑟，风声如诉，意境高远……

黄炎培先生破解史量才的悲剧时认为：这位自由主义者在“领袖”召见时气宇轩昂、睥睨孤傲，颇有孔融冒犯曹瞒之慨，而这，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

但是，其更深层的原因却无疑是：史先生仗恃其自由主义的信念，竟敢藐视极权者。否则，他断不敢有如此胆量厉言正色地藐视蒋介石先生的威权，说：“你有百万大军，我有百万读者，我也不敢得罪他们！”

史量才执意要在天下无道时，显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和至高无尚的尊严；执意像康德指示的那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因此，尽管他精通禅宗和国术，但在自由主义敌人的怪招迭出面前，那些东西却一点也不顶用……

实业救国和新闻救国是史量才救国梦的两翼。在经营报纸的同时，他还先后以独资或合资的方式创办了中南银行、民生纱厂、织布厂、米厂、瓷砖厂、药房、图书出版等一系列实业；另外，他还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梦想组建中国民间的报业托拉斯。史量才的思想、才干和胆略、胸襟为人所称颂仰慕，他自己亦成为当时中国实业界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

史量才（1879~1934）原名史家修，祖籍江苏江宁，1879年，即《申报》创办后的第8年，他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晚近的中国商人是最先接触到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一批人。受父亲史春帆的影响，史量才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清朝专制统治和科举制度表示出极大的憎恨，对“新学”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虽然他在20岁时曾考入松江府娄县庠为附生，但是，

他最醉心的却是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04年，他从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即在上海桂墅里创办了女子蚕桑学堂，努力推动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收效显著。然而不久，他却转而对新闻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最初投身新闻实践的是《时报》。1908年，他积极参与了由著名的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发起的保护苏杭甬铁路运动，并深受张謇先生的赏识。不久，他便被推举为商办铁路公司的董事之一。后来，他还发起组织了全国农务联合会，被推举为南京干事；还主持过沪关清理处工作、负责清理海关财产，主持过松盐局，负责整理盐政等，表现出了卓越的实业家才干。需要提及的是，在《时报》工作期间，他领略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初次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报人的辛劳和乐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江苏都督程德全与张謇等策动了江苏独立运动，史量才亦投身其中。同年底，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张謇代表立宪党人公开提出：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史量才是此一议案的谋划和动议者之一。此举其实并非表明他们的趋奉和软弱，他们不是预言家，更不是算命先生，他们哪能料到袁世凯后来的变化？第二年，立宪党人成了无用之物，张謇落拓赴上海卜居。未几，他便将自己的政治思路转向办报，试图从这里入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史量才亦积极参与筹办。

就在这时，突然遇到了一件将改变史量才一生面貌的好事——《申报》主持人席子佩由于经营不善，陷入困境。张謇等得知后喜不自禁，当即与史量才、赵竹君、应季中、陈景韩等人合伙，向席购进《申报》的所有权。众人协商后，共举史量才为总经理，陈景韩为总主笔，同时仍聘席子佩为经理。

这一天是1912年10月20日，史量才踌躇满志地走进了《申报》馆。接手报产后，他渐次对《申报》进行改造，推出

了一系列全新的改创措施，并将其全面贯彻到办报实践中去。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办报主张从这时起，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史量才和许多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报人不大相同，他不仅有思想有主张，始终把握着《申报》的民间方向，以温和的自由主义风度感召和影响官方与民众，而且他更长于经营实业，有一整套的经营和管理技巧。为了丰富和扩大《申报》的信息量，增强新闻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可读性，他气魄宏大地组建了遍布海内外的新闻搜集网络，将《申报》的记者、特派员和通讯员派往各地，像华盛顿、伦敦、巴黎、罗马、柏林、日内瓦、东京等地，都有他派出的“特派员”。这在当时国内的民营报纸中，可谓首屈一指。黄远生、邵飘萍都先后加盟，被派驻北京为“特派员”——从记者到编辑人员的组成，充分保证了其经营策略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贯彻。

鉴于《申报》的巨大影响，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时，曾打过收买《申报》，以作“政府”喉舌的主意。当时，袁派手下对史量才诱之以权财，说：“要多少钱，要做什么官，都可以照办。”史量才勃然大怒，当即将此人逐出报馆。同年12月31日，袁世凯颁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并命国内各报必须照登。史量才羞愤不已，指示报纸消极抵抗，拖到最后，有意将“洪宪纪元”四字刊登得很小，并故意刊出《本馆启事》，云：“接到警察厅通知，如仍沿用民国五年，即照报纸条行严行取缔，停止邮递。”以此曲涵其对极权专制压制报人的强烈不满。

1918年，史量的政治盟友和《申报》的合伙人张謇因政治上失意，转而投身商海，对办报心灰意冷宣布脱离《申报》，对史量才打击不小。但是，从客观上却促成了他后来的特立独

行——万般无奈中，报产终于归他独自所有。

不过，1931年以前，《申报》的评论文章一直是温和的，有时甚至到了温冷的地步，假如拿《大公报》以及后来的《文汇报》、《新民晚报》等自由主义报纸来相比，这一点就更加明显。这固然与史量才当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有极大的关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史量才公开以自由主义的鲜明态度改组《申报》，并且日渐激烈地批评政府的开端。从那时起，他便一意孤行地聘请了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加盟，尤其是以延请陶行知为顾问、黄炎培为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设计部副主任为标志。

1934年11月13日正午，史量才被蒋介石指使的特务狙杀在浙江海宁县翁家埭大闸口。酿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二 “百万大军”与“百万读者”

黄炎培先生在《八十年来》一书中谈到史量才被杀害的原因时，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百万大军，我有申、新（指《申报》和史控股的《新闻报》——引者注）两报百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此后蒋就叫陈果夫、陈立夫给申报馆多方为难，一度报纸被停邮，逼报馆撤几个人的职务，一是陶行知，另一个就是我……”^①黄炎培认为，在这次谈话中，史量才独立傲岸，睥睨总裁，而这，正是招致他被狙杀的直接原因。这固然有理，但其深层的原因却

^① 黄炎培：《八十年来》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年版，第92~93页。

无疑是史仗恃其自由主义的信念，竟敢在中国藐视极权者，而且这种藐视早在史接手主持《申报》以来就已经是经常性的了。可以说，蒋对史暗藏杀机也早就有了。

1931年9月1日，即事变前半月，史量才在《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首次系统、全面和公开地重新确定了这张老牌民间报纸的自由主义立场。他在遍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民主的匮乏、民主的凋蔽等无秩和野蛮落后无不与专制积弊有深刻的勾连之后，申明道：“今后本报当以极诚挚之态度，对政府尽舆论之刍蕘，对国民尽贡献之责任。”^①事实上，在日后的办报实践中，他的自由主义倾向远比这个宣言要厉害得多。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为了声援和鼓励十九路军抗战，《申报》怒不可遏，连篇抨击政府的隐忍和软弱。史量才不断撰写社评，言辞之激烈，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他写道：“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我国至此，万难再忍。”同年4月，他又在社评中指责政府居然“甘受城下之盟之奇耻大辱”，声称民众“绝无再忍让之余地”。与此同时，他还公开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自由主义主张，认定“一党专政”正是中国社会贫弱落后和各种灾难的万恶之源。他居然敢在邓演达被杀害之际，义无反顾地刊出宋庆龄撰写的悲愤文字《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团体》，并面对军警宪特的威吓在集会上公开演说：“宋庆龄是国父的夫人，她的宣言，为什么不能发表？！”

史量才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他坚信其膺守的自由主义的强大背景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他经常对身边的高级职员说：“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

^① 《申报》1931年9月1日所刊《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

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① 所以，蒋介石依仗极权武力向其施加威压时，他才会不为其所吓倒。他的一位好友曾规劝他说：“蒋先生有几百万军队，可不能得罪啊！”他凛然作答道：“《申报》有百万读者，我也不敢得罪他们。报纸产业虽属我个人，吾人宁为玉碎。苟且、巧取是可耻的事，我一向是厌恶的。”他历来对一党仗恃武力执意要剿灭其反对党的作法深恶痛绝。尽管他并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但是，他坚决反对执政党以“剿匪”之口实去杀灭在野党。为此，他支持陶行知撰写了以“剿匪时评”为总题的一系列社评文章，大声宣称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在其中的《剿匪与造匪》中他借陶之口愤然斥责说：

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谓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沦地狱，是正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此番激烈的议论，当然致使极权领袖的“龙颜不悦”。“剿匪时评”招致的直接后果便是蒋介石在痛恨其“犯上逆鳞”的同时，在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呈送的一份报告上，恼怒地用红笔亲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字。朱家骅秘呈的报告是这样控告史量才的“无法无天”的：“上海报阔史量才利用他的

^① 陈少校：《黑网录》群众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4 页。

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批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例如《申报》的‘剿匪时评’；对于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记载和评议；《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的登载陶行知等人的文章，聘黄炎培任《申报》设计部部长等，都是不利于党国的做法……

史量才把《申报》视为自由主义的前沿阵地，不仅自己挺枪直接与政府叫战，而且还鼓励像鲁迅和陶行知这样的“老牌”自由主义者在该报的著名副刊《自由谈》上频频向政府和“领袖”开火。这就更使政府和“领袖”对他恨之入骨。鉴于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史量才不得不委派《申报》驻南京采访部主任秦墨晒利用其与蒋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私人关系，去与蒋通融。秦遂在杨的引见下，见到了“领袖”。蒋表示，恢复邮递可以考虑，但必须答应三个条件：一、《申报》必须改变态度；二、立即辞退陶、黄等人；三、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申报》指导。史量才与报社同仁研究后认为，这无异于要《申报》彻底放弃其自由主义立场，但为策略计，觉得头两条勉强可以接受，发个书面文告就行了，待躲过风头后再公开自己的态度。然而，他坚决反对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报社“指导”。他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一定要派员进馆，宁可将报纸停刊！”史的强硬态度反馈到蒋介石那里，蒋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突然将《申报》这样有重大民间影响的报纸禁了，无疑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尴尬，于是又心生别计：一面派人去接总编职务，加强版面控制；一面故示宽容，允许《申报》恢复邮递；更有另一面，则是着手根除史量才。

① 陈少校：《黑网录》群众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6 页。

对最危险的这一手，史量才不是没有预见觉察，他一面强硬地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一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防范措施。其间，蒋介石指示上海市政府，向史封官许愿，让他在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和上海战区复兴委员会委员等职位中任选，但均被他死不开窍地严辞拒绝。尤为蒋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公然支持由宋庆龄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公开表示支持该组织“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同时更严厉地谴责政府和“领袖”钳制和绞杀言论自由和出版权益的专制行径。

就这样，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一步一步将自己导向了殉道的险恶境地。

三 自由主义与《申报》的蜕变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民间报纸《申报》的发展历史。道理很明显：史量才这个人，可谓成名于《申报》，同时亦成仁于《申报》。倘若离开了对《申报》的历史描述和阐释，是不可能将问题说透彻的。可以这样说：《申报》的自由主义品格最先不是史量才赋予的，但是，却是史量才最终将这种品格发扬光大，并奋力推向极境的。

《申报》始创于1872年4月30日，即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1907年以前，这张中文报纸是由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Ernest Major）和伍特华（C. Wood Ward）等合资经营的，最初的全名为《申江新报》，《申报》为其缩写。

《申报》最初的主笔是蒋芷湘，襄助编务者尚有何桂笙和钱听伯。以后蒋考中进士，笔政遂由何桂笙主持。早在《申

报》创办之前，安纳斯托·美查便曾派钱听伯赴香港去学习办报经验，而钱恰好是中国报业早期著名自由主义者王韬的女婿。钱会取来什么样的“真经”，可谓不言自明。王韬自然给了女婿很大的帮助，不仅从技术和管理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办报的精神指向上。由于王还与《申报》的大多数编辑人员有很深的交谊，因此，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最初即给《申报》以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当时这张报纸还显得审慎保守，譬如宣称：“吾愿世之为新闻纸者，慎勿品评时事，臧否人物，以撻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羞。”^①然而它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巧妙地宣传西方的一些暗藏自由主义观念的“新思想”和“新见识”。特别是在介绍欧美“新闻纸”之普及与产生的种种奇效时，更暗含对清王朝钳制言论出版、扼杀社会进步的批评。它说：“是故新闻者，真可便民而有益于国者也！夫民间不立新闻者何？惧其有诽谤之罪民也，惧其有虚妄之嫌也！”^②它还劝导统治者，告诉他们：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是直接促进国家强盛和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它向统治者举了《泰晤士报》的例子：“泰晤士者，英国语译言时也，盖谓按时势以立言耳。……总主笔虽无职位于朝，而名贵一时。……是以人皆愿为是馆之总主笔，而不愿为英国之宰臣。宰臣之所操者，朝权也；而总主笔之所持者，清议也。清议之足以维持国是，

《申报》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酉闰六月二十六日社评：《论各新报之设》。

《申报》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酉闰六月二十九日社评：《申江新报缘起》。

泰西诸国皆奉以为矜式。由是观之，日报一道安可忽乎哉！”^①
它还极为羡慕地说：

泰西诸国设新闻纸，……凡朝廷之立一政也，此处新闻纸或言其无益，彼处之新闻纸或言其有损，朝廷即行更改，必待各处新闻纸言其尽善尽美而后为；至于行事制器，无不皆然。所以有一举动，必历数十年之久，必经百数人之智，及其成功，则莫能与敌。盖自二百数十年以前，各国之新闻纸未设，而各国亦尚无如此兴旺^②。

在这些议论中，蒋芷湘、何桂笙和钱听伯一班人有意识地将民间报人的地位，提到朝廷命官，甚至宰相之上，而且告诉君王，民间报人评鹭臧否朝政乃至国家一切事务，乃天经地义；若拒绝批评，国势定衰颓；若善纳批评，国势定兴盛。以此观之，史量才日后笑傲王侯、睥睨“领袖”之气概，不能说没有受到早期《申报》这些思想的陶染。

到1901年，《申报》已开办30年，在这30年中，它的言论基调可以说是和洋务运动的推进大体合拍的。虽然在启蒙救国思路的指引下，它亦作过大量的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卓越努力，但是，它在平民百姓中的影响却并不广泛，基本上是一张停留在知识分子、官员和商人手中的“高雅”读物。在极权主义虎视眈眈的环伺下，为了艰难的生存，《申报》在行文时非常小心。及至黄式权主持笔政时，更注意文字的修

《申报》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酉闰六月二十六日社评：《英国新报之盛行》。

《申报》：《论各国新报之设》。

饰和琢磨，从那时起，就暗暗形成了言论的温和性格。在这一点上，它与后来的《大公报》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尽管如此，它却非常尊重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据传，那时申报馆里曾高悬着一块匾额，镌刻着“尊闻阁”三个遒炼儒雅的大字。而且在创刊伊始，它即在《本馆告白》中表示：“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所以，即使在最保守的时期，它也没有偏离自己最基本原则。

《申报》第一次明显向自由主义蜕变，是在 1905 年前后。这次蜕变，一则是由于受新思潮的冲击，中国报界进入了急剧的震荡分化期；二则是《申报》的保守，遭到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猛烈批评。

1905 年 1 月，《申报》召开全体同仁大会，经过激烈的论辩和商讨，公布了 12 条“整顿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更新了办报宗旨。它向世人宣布：“世界进化，理想日新，无取袭故蹈常，不敢饰邪荧众。”开始把立场逐步转移到康、梁的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上。

《申报》的第二次蜕变，是在 1907 年，当时，安纳斯托·美查等人惧怕中国爆发革命后，其财产不能保全，于是同意将该报以 7.5 万元的价格转卖给中国人席裕福。自此，《申报》之主权完全回归到国人手中。时值清廷在立宪派的压力下宣布实行宪政，《申报》抓住时机一口气延聘了一批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法政专家，如孟莼孙、秦晋华、邵仲盛、汤幼谳、张雄伯等。他们在报上大肆发表言论，呼吁清廷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到辛亥革命爆发时，《申报》已经完全掌握在带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的知识分子手中，然而，与同期的大多数政党报刊和民间报刊相比，它仍显得保守，特别是在言论方面始终保持较为温和的态度，惟将如何赢利、如何招

揽读者看得格外重要。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 1912 年秋天。

这时，史量才出现了——《申报》划时代的第三次大蜕变开始了。

不管怎么说，《申报》到了史量才名下，它的变化才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 1919 年的“五四”时期，《申报》是率先而持久报道和支持学生运动的大报之一。尤其是在它的时评当中，对这场运动的分析评价，以及由此生发的观念价值，已经带有更明显的自由主义成分。比如，在 1919 年 5 月 7 日的《解散大学之无识》中，它愤而写道：

“民气当愤激之时，不能保无越分之举，在位者苟能善用其气，而范围之，则国家兴盛之基，即在于此。若欲消灭，不但横溢而愈盛，且于国家本原大有所损焉。此次北京之事，决非发始者之本意，政府中人苟能平心静气以处之，断不至因一时之激触，而有解散大学以军法处置学生之说。何则？事有轻重，法有界限，不能径情而直行也。苟其不然，后祸尚有穷期哉？政府其深思之。”^①

非常时期，这种言论已不能再称之为“温冷”。自由主义者尤其见不得以屠刀来破坏他们心目中的“游戏规则”，倘若目睹，必会怒发冲冠。同样愤激的言论，又在 5 月 8 日的时评《北京之示威与教育》中发喊而出：“北京政府苟以此示威之举，而摧残教育，是诚政府自杀中国之策也。……毁国家之根本，以与一二人报仇泄恨，岂尚得谓有国家观念之政府哉！国

^① 《申报》1919年5月7日时评：《解散大学之无识》。

人必共弃之矣！’^①

以“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为契机，《申报》更明确了它以滴水穿石的方式来传布自由主义新闻理想的思路。1919年8月31日，它在《申报星期增刊》上发表《增刊之趣旨》说，此创意是在接受巴黎和会的教训后而萌发的。其理性思路是：世界与中国息息相关，因此用“世界知识”传输于国民，是言论之天职。这里的“世界知识”，主要是指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这样的知识。自1920年6月1日始，《申报》又创辟《常识》增刊，每日推出。其宗旨是以“新生活、新知识、新思想”来教育指导国民，就国民普遍关心的法律、道德、政治、文化、科学、健康等话题分门别类地以问答的方式刊出。史量才认为，用科学和民主来启迪蒙昧、锻炼智慧比什么都好。1922年，《申报》出刊了它的五十周年纪念册，特别刊出国内外知识界名流撰写的专论，60多篇文章中大部分都与自由主义有关，但其兼容并包的风度亦是格外彰显的。当然，《申报》的自由主义超然态度也给它自己带来过一些麻烦。如1925年对上海“五卅”血案缄口不语；1927年对“四一二”血案的“不偏不倚”，都曾招致激进主义者的指斥，这是理所当然的。

四《自由谈》与乌托邦梦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史量才的《申报》由温和自由主义转向“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水岭。徐铸成先生说很好，“他史量才和《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走的是

^① 《申报》1919年5月8日时评：《北京之示威与教育》。

交叉路，都以‘九一八’为转折点。”这一现象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关心中国新闻史和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的人们探询：

在此之前，《大公报》对蒋介石和宁国府（国民党南京政府）还是采取讥弹态度，“九一八”后却开始转向了，而史量才则由保守趋向同情进步（应该理解为向“激进”自由主义转变——笔者注），对高压采取不驯服的态度^①。

“蒋对《申报》和史不满，已非一日”，徐先生说，当时杜月笙曾拉史到南京见蒋，试图调解他们间的“矛盾”，不料，史仍以“我手下有百万读者”来讥对蒋的“百万军队”。这就很好理解，蒋介石为什么会急于杀史，而对曾一再将他骂得狗血喷头的张季鸾、胡政之却视作“诤友”，其原因不言自明——也就是说，当时《大公报》在“国家中心论”的指导下，从“激进”自由主义转向温和自由主义是一大关键。

的确，1931年的夏秋之交，重现辛亥时期慷慨悲歌风度的史量才不顾一切地把《申报》和他自己急速地推向了光荣与危险的顶峰。自发表《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之后，在延聘黄炎培、陶行知等人之后，更“引用”李公朴等自由分子创办了《申报月刊》和《申报年鉴》，举办流通图书馆和补习学校，广泛开展以抗日救国为主旨的民间自由主义运动。

在此，必须谈到《申报》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副刊《自由谈》，这是史量才用心极工的一块自由主义实验田。

《自由谈》创刊于1911年8月，由王纯根主持，其后接任主编有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周瘦鹃等人。但这些人几乎都属于“鸳鸯蝴蝶派”文人，开办后16年间，琐屑无聊是其基本格调。

^① 徐铸成：《报海旧闻》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1932年春天，史量才邀请了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黎烈文作主编，才使《自由谈》面目一新，真正有了“自由”的样子。当时，《申报》在史量才和黎烈文的策划下，专门发表了《今后本报致力的工作——纪念本报六十年》一文，其中刻意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自由谈》虽然只是一种副刊，但为调合读者兴趣，关系也很重大。……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①自此，这个副刊园地开始在黎烈文和他之后的张梓生的主持下，以自由主义的兼收并蓄风度影响读者，推动思想和文化进步，并最终成为中国报纸副刊的自由主义楷模而名垂史册。

黎烈文上任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坚决停载了张资平先生的三角恋爱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迅速将鲁迅、郁达夫、巴金、老舍、叶圣陶等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推了上去。开办初期，即针对《时事新报》和《新时代》杂志提倡“打打麻将”“国家事管他娘”等流行观点，发表了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的诘难文章。之后，还围绕读庄子文选问题、大众语问题、幽默问题、女婿问题，展开了几场大笔战，甚至惹得章太炎和吴稚晖也来积极参与讨论，其自由主义风度令人称羡不已。黎烈文先生激动万分地说：“本刊改革以来，每天接到许多来信，对于我们的努力赞许备至，真使我们又惭愧，又感激。我们以后当益加奋勉，务使本刊内容更加充实，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决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②然而，在极权主义的虎视下，这种

^① 《申报》1932年11月30日社评：《今后本报致力的工作——纪念本报六十周年》。

^② 《申报》1932年12月12日：《编辑室启事》。

“自由”注定是不会长久的。《自由谈》在黎烈文主持仅1年零5个月之后终于被迫停刊。1933年5月25日，黎在《编辑室启事》中对副刊自由主义的困窘喟然叹曰：“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呈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箴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怨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①

其悲愤讥嘲、硬朗无奈跃然纸上。黎烈文的继任者张梓生此后也不断受到“党国”的威吓警告，最终被迫辞职。到史量才死于沪杭道上之后，《自由谈》终于名存实亡了。但是，《自由谈》在中国现代新闻史、文学史和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容小觑的。正如陈子展先生指示的那样：“如果要写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杂感文不能不写；如果论述《新青年》以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又不能不写，这样才说得清历史变化的面貌。”他将《自由谈》与《新青年》等量齐观，不仅在文学含量上，而且在思想含量上，都是非常肯綮而且精到的。

史量才遭狙杀之前，在杭州休憩时曾做诗数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晴光旷渺绝尘埃，丽日封窗晓梦回。
禽语泉声通性命，湖光岚翠绕楼台。

^① 《申报》1933年5月25日：《编辑室启事》

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
案上横琴温旧操，卷帘人对牡丹开。①

诗境恬静飘逸，澄明透澈，禅语机锋，胸襟开阔，既有出世的自由怀想，又有入世的人间关怀，的确曲涵着他自身的一种矛盾情愫，曲涵着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梦幻和冒死犯难的战士的操守和坦然。

史量才不幸殉难之后，中国老牌的自由主义者章太炎先生沉痛亲撰了《史量才墓志铭》，对这个宁折不弯的自由主义报业大王的一生，进行了伤楚的追念和极高的评价。他写道：

史氏之真，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纾。卖浆洒削，华屋以居。以子高材，宜其有余。何烦辱任事，而不与俗同汙。恬智相养，则亦与天为徒。吾闻夫毅饰貌以内热，豹菟中而外枯。智之所不能避者，虽圣哲有所不虞。惟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斯古之伟丈夫欤！②

章太炎的意思是说，按照史量才的智慧和才能，他轻而易举就可以把自己弄成一个巨富，而他居然要选择繁重芜杂、担风冒险的民间报业来作为其人生最有价值的事业，不与那些低俗的追求同流合污；他的直猛顽强，无疑是来自春秋时史官子鱼的传统，正是由于承续了它，史先生才敢于在恶势力以刀相胁时神色不变，浩然若虹，古代的英雄豪俊也不过如此啊！

在这篇墓志铭中，章太炎先生还对史量才因何而死，作出

① 参见《申报流通图书馆第二年工作报告》插页。

② 参见《章太炎全集》（五）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80 页。

了学理和性格上的探询。他不同意有些人的浮浅之议，说什么，史量才是“暴得大名不详，清议之权，自匹夫尸之，常足以贾祸”。不过，“清议”倒也多少说到了一些，孔子谓：“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说史量才有东林党人的脾性确也不假，然而这些都是表象，真正致他于死的原因笔者在前面已经述及，在此不想赘言。倒是章太炎的探究很些意思，他认为，史量才精通佛学禅宗，习惯于打坐参悟，又兼练拳术，身手不凡，心胸阔远，平素与人无任何私怨，可是，刺客们竟要斩草除根，剿灭他全家，简直是不可思议！是章先生真的看不懂吗？非也！他是故作糊涂罢了。

然而，史量才的死，非但没有如极权者所期待的那样，达到使中国的民间自由报人惊惧裹足、激流勇退的目的，却反而成为了一个光荣的纪念，使后来者更加悲壮奋猛。

五 “史家精神”与独立风范

史量才对中国自由主义民间报业的思想贡献和技术贡献，都是也了不起的。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可以用章太炎先生的评价来概括，那就是所谓的“史家办报”精神。

“史家办报”就是直接远溯和继承子鱼的气节和胆略，也就是继承“士”的传统。但是，这种精神又绝不完全等同于“士”，它的主要精神内涵和养分却是来自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人观念，亦即作为社会良知的载体和社会批评角色的观念。有一种说法，认为像史量才、张季鸾，甚至王韬、英敛之和梁启超等人，都没有超出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不仅是非常荒唐的，而且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当这些自由主义报人以“士”或者“师”的名义同政治权威进行对峙时，

他们的发言立场已经远远超越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或别阶级，而成为最广大的民间社会良知的代言者。应该说，这才是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深层资源和勇气的来路。

近年来，新闻史研究表明，史量才的“史家办报”思想至少有三层涵义。严格地讲，这些涵义都几乎与他执着的自由主义理想有关。

首先，他把报纸提高到历史意识上来认识，他多次提出“日报负直系通史之任务”，并且要求“同人则以史自役”^①。他认为，报纸应该自觉地归属于历史，但必须高于历史；报纸新闻的价值与“写真程度”应超过史书。其最重要的标志在于，报纸在记叙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及细节时，它可以通过言论来分割评析，从而推动历史前行。感悟于此，他颇有见地地写道：

“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纪载而已也，而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善而相从。盖历史本为人类进化之写真，此则写真之程度，且更超于陈史之上，而其所以纪载行迹，留范后人者，又与陈史相同。且陈史以研究发扬之责，属之以后人；此则于纪载之际，即同尽研究发扬之能事。故日报兴而人类进化之记载愈益真切矣！”^②

因此，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就应该高于一切。真实与否，

① 史量才：《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

② 史量才：《最近之五十年》，《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第 49 页。

不仅事关报纸的信誉，而且事关办报人的良知和尊严。史量才始终强调：翔实无妄的新闻，加上公平明晰的言论，均应以真实的记述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他与邵飘萍、徐宝璜、戈公振等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家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192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Dr. Walter Williams）在中国访问考察时出席上海联华总会宴请。席间，威廉先生向中国民间报人提问：你们中国的报纸除经济因素外，最尴尬的是什么？史量才当即作答：“编辑方面，以消息为最难抉择，盖今日之新闻界，尚少忠诚之通信员也。”^①

其次，他认为报纸之高于历史，除“写真程度”为史书所不逮外，评论剖析和认识历史是其最大长处。他坚信，报纸“息息负历史文化之重责，又同时力趋于时代之前，应环境之演化，开风气于方新，所求不负其使命”^②，这是因为他深知民族生命之系于文化，文化之传后无穷者为历史”。另据瞿绍伊先生回忆：

平日先生之于报纸，持论主张公正，新闻主张翔实，孳孳为社会谋福利，尽国民天职。

再次，他认为报纸在记录和传承文化时，能体现出其真实逼人的良知和道义力量，是体现知识分子民间立场的最佳方式和最佳态度。他说：“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而策进文化，以新闻为前锋。”^③ 他曾在《最近之五十年》中回顾《申报》

① 史量才：《最近之五十年》，《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第53页。

② 同，第55页。

③ 黄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

的历史时感慨万端说：申报“始创于前清同治十一年，生活于帝制威权之下踟躇而不能展舒者，三十有九年，……民国肇始……民气方张、舆论界之精神，为之一振。《申报》亦奋其老马千里之志，愿为国民驰驱”。何以有此由局促到舒展之大觉悟？这是因为他认识到报纸是舆论机关，舆论者，民众之呼声、爱憎和利害之真实传达也，他强调报纸所负有的“劝导舆论”和“创造舆论”的职能，就是立足民间的良知立场。

当然，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核心是“独立精神”。在他看来，只有独立的报人品格，才能保证思想的自由和持论的公正，才能在批评政治权威时、在寻求社会政治秩序和道义秩序的重建时，显示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风度和气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史量才远比那些只会空谈“独立精神”的人要高明和务实得多。他一再提醒民间报人：独立精神必须体现为政治和思想，乃至价值观念的不偏不倚；而不偏不倚又必须以经济上的完全独立的前提。

在此可以举一个例子。1921年12月，美国新闻学家格拉士（F. P. Glass）来中国访问时专门去参观了《申报》馆。格拉士介绍的西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对史量才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格氏授意说，报纸没有独立精神是不可想象的，并且鼓励《申报》要始终坚持“不受潮流之浸润与打击，如是则心力专一，得惟人民之幸福是谋”。感动之余，他特地向格拉士先生致词道：

敝报创立至今，已四十九年，较鄙人之年岁，尚多六载。鄙人办此报，现历十年。以敝报言，如老人之身。惟全馆同人皆竟竞自勉，以新精神鼓运之，使向前进。现营业收入可以供用，故可自信不受任何方面津贴。虽十年来

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①。

独立精神的实现必须以经济独立，亦即自给自保为要。这一思想当然不是史量才所首创，往前至少可以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中找到依据。梁先生曾苦恼中国的民间报纸少“言论独立”的品格，除极权高压外，经济不能独立自保，当是最重要的问题。

为了争取精神之独立，史量才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他在世时尽力从这样两个方面来进行争取——在确保经济独立的同时，确保言论中立。这也可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办报的后期他会出人意料地变得那么勇猛无惧？

他欣赏和追求的最高的办报境界是：严格按照商业原则经营报纸，尽量不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尤其警惕在现实的政治纠葛争斗中，不受控制和诱惑而堕落成为一党一派的利益工具。为此，他使出浑身解数，发挥其惊人的才干，苦心管理，改革报务，延揽广告。据张蕴和先生在《申报月刊》中回忆说，“史先生曾一再自慰自赏地说：‘现在营业收入可以供用，故可自信不受任何方面津贴。虽十年来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②。由此足见他是多么的精明和可爱。

不仅如此，有经济的独立作保证，言论独立则更加鲜明。

《申报》1921年12月24日，史量才在欢迎格拉士莅临报馆时的致词。

张蕴和：《办报果罪孽耶》见《申报月刊》第3卷，第12期。

尽管《申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性情温和，但是，自他接手后总是想方设法保证这张报纸在政治上的不偏不倚，其后的言论尤为犀利醒目，真正体现了独立精神。他认为，陈景韩以“冷血”自嘲的中立式言论，虽也能表示不偏不倚，然而终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在主张多刊发“政治新闻”、曝光政治黑暗的同时，加强了言论独立的作为性。他说，报馆之责任在于提倡和主持公道，因为它是“为社会国家报人必须做到：‘事无大小，物无新旧，苟有结构，加之以奋斗之精神，主义而不为感情所冲动，事实而不为虚荣所转移，力争自存而不任自杀，充天地四大之力，能变化之而不能消磨也。’”

话虽这么说，心虽这么向往，可是做起来却是那么的难。和激进主义的政治派别不同，史量才不是要做政治秩序的颠覆者，而是要做政治权威的批评者和政治失范的整饬者——这才是他膺守的独立精神的真实涵义。矛盾和困难的是，极权政治和它的领袖人物不需要他持守这样的姿态，而是希望他能为他们提供“技术服务”和道义上的支持，并以此来证明极权主义的合理与合法。终于，在这个不可调和的问题上，他们的对峙最后演变成了僵局。这不是理论上的势均力敌，而是现实中的以弱制强——这个傲岸无惧的“荆轲”终于倒在了现代“秦王”的卑鄙算计之下。

① 史量才：《最近之五十年》，《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第 61 页。

第五节 张季鸾：“外圆内方”的自由主义斗士

一 生平及思想简述

在中国新闻史，或者说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没有谁的死像张季鸾先生那样，引起中国朝野，特别是各种政治派别的全方位震动，并得到他们至高无上的一致钦敬和评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惊惑却又令人感动万分的悲悼情景？这种奇异的历史景观的背后都深掩着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内容？王芝深先生认为，这一结果“实为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这一原则下的共识”。但更真实的原因却是：除了张季鸾先生作为卓越的自由主义报人所拥有的崇高的“人格魅力”的感召外，国共两党在相互制衡时期，都把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间自由主义势力，视作他们双方必须争夺的政治和道义砝码。

大公报人在总结季鸾先生一生的功绩时认为，他最引以为骄傲的有这样两件事：其一是，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曾赠予《大公报》荣誉奖章——在亚洲，此前惟日本的《朝日新闻》曾获此殊荣；其二是，早年的他曾为孙中山先生草拟临时大总统文告。其实，张季鸾先生一生最引人注目的贡献是创立了对中国民间报刊自由主义走向影响深巨的“四不”原则，这样，就使得民间报刊在坚持自由主义立场时，有了操作上的具体规则，从而使“文人论政”有了必须严格信守的精神条款和

自由归趋。

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景，他从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不像王芸生那样充满文学式的浪漫幻想，也不像史量才那样充满睥睨一切的自信。他生前曾反复训诫大公报同仁：我们必须怀抱随时准备失败的精神。这是因为，在中国，民间报刊要挣得一些言论自由的地位，要撑持言论自由的阵容，将是非常不容易的……

以张季鸾为代表的大公报人，他们既有着渊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清流背景，同时更有着假道日本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强劲支持；他们在早期既是有着浓重激进倾向的民族主义者，但在中后期又是有着显著的倾向于英美政治文化模式的自由主义者。

张季鸾（1888~1941）字炽章，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祖辈多武官，自其父张楚林始弃武从文。楚林先生受总兵刘原基、知府蔡北槐培植考取进士。因此，受其父影响，张季鸾的观念意识中有浓厚的报恩思想，这是他后来提倡的“以文章报国”的观念基础。13岁时父亲病逝，家中一贫如洗，母亲只好领着儿女扶柩归葬，从济南归返榆林。但他聪颖过人，十四五岁即以一手好文章名播四乡，因此深得延榆绥道陈北璜欣赏，先是如其入道署亲授经籍，后又送其到“关学大师”刘光蕡主讲的烟霞草堂深造。张季鸾日后留心经世学问，立言在天下，与刘光蕡的教导有很大关系。

1903年，他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在那里结识了于右任等三陕精英。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堂，专攻政治经济学。这时，他开始对西方的制度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5年到1907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机关报《新民丛报》展开白热化论战，他参与编辑的《夏声》亦投入了这场大论战，他撰写

了大量的论辩文章，并立志要走“言论报国”和“新闻救国”的道路。但是，和许多激进的留学生不同，他一直恪守超党派立场，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1908年，他学成回国，在关中高等学堂做了两年教员。1910年10月，应于右任所邀赴上海创办《民立报》。《民立报》的新闻实践为其日后接办《大公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更坚定了他对自由主义新闻方向的选择。

1912年1月，他报道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重大新闻——这是民国成立后的首条专电。不久，他担任了总统府秘书。不到一个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他也结束了短暂的秘书生涯，重返上海与于右任、康心如、胡政之、曹成甫等创办了民立图书公司。1913年，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任总编。不久，因刊载揭露袁世凯向六国银行私借2500万英镑的丑闻，直接成了引发“二次革命”的导火索，报纸当即被查封，他也被系下狱。三个月后经多方营救出狱，旋赴上海加盟胡政之主政的《大共和日报》，任该报国际版主编。从此，这两个杰出的自由主义报人终于结成了生死与共的事业和思想的同盟。1915年，他创办《民信日报》，以策应井勿幕讨袁。1916年夏返北京任《新闻报》驻京特派记者。从1916年到1918年，他还当过两年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18年9月因新闻犯禁，得罪段祺瑞，第二次被捕下狱。1919年被营救出狱又归返上海与沈钧儒等人主持《中华新报》，该报运作到1924年停刊。其间，因其自由主义表现突出，得到《京报》主编邵飘萍的高度赞赏。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因其反对激进主义思潮，而被激进报刊斥骂。1924年1月，发表时评《列宁逝世》，受世人瞩目。《中华新报》停刊后，他成了失业者。时，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举荐他去北洋政府做官，被他一

口回绝。他说：“我的志趣是办报！”1926年，失业者张季鸾与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在天津接办《大公报》。1927，因撰写著名的“三骂”社评（即骂吴佩孚、骂蒋介石、骂汪精卫——笔者注）而名噪天下。从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到1941年9月6日逝世，张季鸾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呼唤民主权利，斥责专制极权；呼唤新闻自由、宪政法治；主张渐进改革，反对暴力政治；主张民族和解，反对民族仇恨。国民党评价其为：“一代论宗 精诚爱国 忘劬积瘁 致耗其躯……”共产党赞颂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 尤为士林所矜式……”

二 自由主义与“四不”主义

“新记公司”的《大公报》创办伊始，就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是：吴、胡、张三人约定：一、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再向任何方面募款；二、三人专意办报，三年内谁都不许担任任何有官俸的“公职”；三、吴任社长，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四、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政，商榷意见，共谋主张，文字虽分任撰述，但张季鸾负整理修正之责，意见若有不同，则以多数决之，三人各不相同，则从张季鸾；五、张季鸾、胡政之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须由报馆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③

《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9月7日，第2版。

② 同①。

③ 胡政之：《回首一十七年》。《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

第二件是：新记《大公报》与旧《大公报》要有区别，首先必须确定它的办报方针，这将是决定《大公报》究竟将办成什么样的报纸的大事。“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人根据自己在政界和报界的经验认识到，如果让《大公报》这时公开地依附政界和军界中的某一派，难免有一天报纸会随着这一派的倒台而倒台。而当北洋军阀即将失势，南方新兴力量即将取代这时，《大公报》只有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才能站稳脚跟，求得日后的发展。”^①因此，他们在资金筹措和人员组织上定出了自由主义的规矩后，旋即于1926年9月1日在新《大公报》复刊号一版上同时刊出了《本报启事》、《大公报续刊辞》、《本社同人之志趣》等专题文章，庄严向社会公布其“四不”主义立场。

《本社同人之志趣》为张季鸾所亲撰，文中公然宣称其自由主义的“八字箴言”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并加以详述：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卖。欲言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① 夏晓林：《张季鸾》参见《新闻界人物》第1辑，第121页。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

在《本报启事》中，又重申两大原则：“一，本报完全公开，作人民真正喉舌；二，本报宗旨，注重民生问题。”

在分工上，张季鸾处于把舵和导航的位置。他的工作精力主要放在编辑和言论上，任务非常繁重。他每天下午到报馆主持编辑会议，与吴、胡交换对时局的意见；对京、津、沪各报详加评鹭，亲自撰写社评，亲自处理要闻，并对主要标题和版面进行细敲精推，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凌晨二三点钟，有时甚至熬到曙白。对张季鸾的自由主义职业风范，连中共领袖毛泽东亦赞佩不已。毛曾对吴冷西说：“张本人年轻时曾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了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经常往来于国共两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经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季鸾先生为人平易宽厚，随和健谈。“其文风如昌黎、如新会”（指韩愈和梁启超）；他虽严格遵守《大公报》所采取的写社评不署名的制度，但却下笔认真，一丝不苟；此外，他撰写文章从不留底稿，也不收集样报，风神潇洒，颇为独异。他从《民立报》时期主持言论始，到主笔《大公报》言论15年，30年间挥毫撰写了3000多篇社评文字；而《大公报》时期的社评，则是他一生

劳作的顶峰。

对言论高度重视，是因为他始终将其视作最能体现报纸自由主义宗旨的灵魂和旗帜——他是从过去的许多教训中获得这一觉悟的。早在 1923 年，他在《新闻报》出版 30 周年纪念祝词中就痛彻心肺地诉说到：“……且中国报界之沦落苦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无主张，遑言是非！”有自由主义的主张，必须产生自由主义的言论。《大公报》复刊第二天，张季鸾即以社评《嘉使团中立》展开了他的自由主义评说。他对苏俄“支持”中国南方政权北伐表示不同意见说：“故吾闻公使团严守中立主义，以为为缩小战祸计，乃绝对的必要。且足使我国民知立宪各国尊重公法，毕竟有异于赤俄也，岂不善哉？”这些当时被视为“反苏”的文字，在今天看来，所陈诉的不过是国际交往中的常识和原则。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以任何堂皇的名义向别国输出革命，都是不妥当的。同日，他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文章：《劝南北猛省》，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北伐，无非是西方列强和苏俄分别运动南北政治派系，以争夺各自的在华利益罢了，而饱受涂炭的却是中国的四万万人民。他尤对“国民党自信能以武力革命统一中国”表示忧惧，指出“实为大误”，并对受苏俄影响而遍起的工潮、学潮再三表示不解。

《大公报》复刊半年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4月 29 日，张季鸾撰写社评《党祸》，对国民党以暴力铲除敌对政治派别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怒。同一时期，他还在《明耻》一文中再次表示了他对苏俄热心插手干预中国党务政务行为的极端不满，特别对“国民党仿俄式而练党军”，开了中国党军的先河最为痛心。他指出：“政党不能为国民奋斗，国军私有，

民治沦亡，有以致之者哉？”其中，对俄式激进主义的警惕和呼喊，今天听来，仍能使人感受到一种来自预言家的恐惧。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虽讲宽厚包容、仁爱平和，为世人所夸美，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就不骂人。相反，敢于骂祸国殃民的权势者，敢于骂祸国殃民的权势者，敢于骂绞杀民主自由的独裁者，恰是他们的本色和义务。这期间，张季鸾的三篇“骂人”的社评，在社会各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三骂”的第一骂，被骂者是吴佩孚。他讥嘲挖苦道：“综论吴氏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第二骂题目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痛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对汪的预测可谓通神！第三骂直指蒋介石。在这篇著名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中，他竭尽嬉笑怒骂之能，痛殴这个新独裁者，并干脆剥下他的皮：

离婚再娶，弃妾新婚，然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然于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呜呼！尝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缘？

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是哓哓于革命？夫云裳其衣，摩登其车，钻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则洋汤华屋，行则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发此种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评之所以不利已也。不然宁政府（南京简称宁，时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引者注）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因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义之人生？甚矣不学无术之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①！

此前，蒋介石在与宋美龄举行婚礼前，曾发表《我们的今日》，文中称：“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针对此点，张季鸾层层剥皮，步步紧逼，论据充足，推理绵密，最后将蒋氏之斯文作态，驳得体无完肤。这就是张季鸾的脾气和风格。从他的批评风格中，我们不是可以明晰地窥见黄远生、邵飘萍和林白水的遒健勇毅，还有机智幽默吗？

^① 张季鸾：《蒋介石之人生观》，《大公报》1927年12月2日社评。

三 独立不惧与“超党派”信念

1928年元旦张季鸾撰写《岁首之辞》以“宣布本报同人的根本旨趣”的方式，再次较系统地向社会公开宣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他严肃地写道：

夫中国改革既有绝对必要，而改革之大义曰解放创造，非复古，亦非俄化，则大体之国是可定矣。此无他，对内厉行民主政治，提倡国民经济，采欧美宪政之长，而去其资本家专制之短，大兴教育以唤起民众，争回税权以发达产业；对内务求得长治久安之规模，对外则必脱离不平等条约之束缚^①。

对俄式激进主义的恐惧，使他认定：“无论……善恶若何，但苏俄布希维克（布尔什维克之旧译——引者注）赤化政略实断不可用。”他明确表示，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理想，是建立一个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事实上，在此一个月前，他就在《反共者亦注意改良政治》的社评中，初略勾划过这个理想，提出了“大兴宪政，尊重民权，发达产业，便利交通”的劝诫和构想。

《大公报》既为“公众喉舌”自然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就是它的日常功课。张季鸾目光敏锐，思维敏捷，很能抓住“政府”的纰漏和丑行大做文章。1930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演说时宣称：“下一极大决心，要造成

^① 《大公报》1928年1月1日社评：《岁首之辞》。

廉洁政府。”其幕僚戴传贤补充说：“须造成一有能力之政府。”张季鸾当即发表《论造成廉洁之有能力之政府》的社评，批评说，假如国民党每个党员都不能成为“常人模范”，政府高官不能“复为党员模范”，则所谓“廉洁政府”云云，只能是痴人说梦、骗子说谎。他建议：“惩治贪污并须自高级官吏始，导之以德，而齐之以刑。”^①显然，其辛辣言论自然不会让“党国”的高官们高兴。

自“四一二”始，张季鸾就对蒋介石屠杀中共党员表示极大不满，他曾一再大声疾呼反对杀人。这当然不能归结为他对中共奉行的主义有什么好感，而是自由主义的反暴力原则促使他必须站出来制止暴行。1931年6月1日，国民党在强化独裁统治时，公布了训政时期的“约法”，其中一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第二天，张季鸾即在题为《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的社评中，对国民党恣意捕杀异党和民众的野蛮行径进行了尖锐的嘲讽：“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则为关于人民身体之不法的摧残，其最多之例，则公安局任意滥行羁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羁押不审。夫有罪处刑，国家不为苛，人民不能怨。惟一切地方，一切人民之日常生活中，其最视为天外飞祸者，则偶受嫌疑而被逮捕被监禁，羁押甚久，呼吁无从，迨证明无罪，则已受数旬数月甚至数年之囚禁；且纵属有罪，亦多遭数旬数月数年之羁押。尤可痛疾者，警察机关动辄蹂躏人权，肆作威福，琐小违禁事项，往往即加拘禁，其犯刑事嫌疑者，则故意稽迟，不送审判机关。”最后，他痛心疾首地哀喟：“哀我人民，其受此冤刑，小而耗

^① 张季鸾：《论造成廉洁之有能力之政府》，《大公报》1930年11月13日社评。

财废业，大而毁肢体殒生命者，遍全国计之，一日之中不知有几千百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吾人愿神圣约法 故愿先神圣第八条 特以此条是否实行，以下约法全部是否有效”^①！司法腐败乃腐败之极限，此极限无存，人权自由，从何谈起？

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张季鸾尊重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党派。他反对蒋介石称中共为“匪”，因此在《大公报》的版面上，特别是在社评和言论文字中，一直坚持称“中央”和“共军”而绝不妄称“共匪”或“匪党”。他还是一个真正将真实性视为新闻生命的人，因为，自由主义要求尊重每一个人，就必须要求尊重一切客观真实的存在。尽管他反对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尤其反对中共的“土地革命”。比如，1934年10月，他回榆林老家省亲，就多次劝说陕北的学生，不要“入了歧途”，以免“赤化蔓延，到处恐怖”^②。但他同时也坚决反对蒋介石围剿攻打苏区。1934年，他不惧国民党的新闻钳制，指示《大公报》所属的《国闻周报》连篇累牍地刊载以“赤区土地问题”为总题的专栏文章，研究和介绍了“共区”的整套社会制度，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同情，总是有足够的理性依据的。1935年，在张季鸾、胡政之的策划下，《大公报》派出记者范长江去西北“共区”实地采访，此举在当时是惊人的。同年11月起，范采写的长篇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在该报连载，国统区的各界人士正是经由《大公报》居然发表了范长江在延安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对话

张季鸾：《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大公报》1931年6月2日社评。

张季鸾：《归乡记》 参见《季鸾文存》第2册附录。

的报道而认识了“共区”的。第二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大发雷霆，斥骂张季鸾。但张却独立不惧，继续顶住压力，让《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文章。这里需要提一下，张季鸾原本非常器重范长江，非常欣赏范的胆识和才华。范长江的成名，和张季鸾的支持提携有极大的关系。但是，后来当张发现范的党派倾向越来越显著时，特别是发现范长江在为《大公报》撰写的社评《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中，有公开谩骂国家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趋向时，便从抗日大局出发劝说范，不要随意改变《大公报》的“四不”原则。虽然最后范愤然脱离了《大公报》，使他生出无限的遗憾，但为了保持报纸的自由主义立场，也只好忍痛由他去了。

尽管张季鸾对苏俄的激进主义始终抱敌视立场，但他尊重事实，敢于用自由主义的原则去衡量和肯定苏俄的成就。譬如，1931年他派《大公报》记者曹谷冰到苏联考察采访，并忠实报道了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详细情况。由于当时正同时刊登塘沽技师团镜剑生（李烛尘笔名——笔者注）采写的赴日参观记，介绍日本高度发达的工业和技术。比较之下，张季鸾感慨良多，遂撰写了著名的社评：《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文中兴奋地说：“苏联五年计划，年来甚惹世界之注意……今观特派员屡次通信，不得不承认苏联建设规模之大，及其进步之猛。即专论工业制造方面，如最近通信所述乌克兰工业区情形，及今日所载大水力电厂情形，已足令人惊叹不已。或者曰：苏联特许外人参观者，皆其特可参观者也，已足为中国所深羨。夫俄国为工业幼稚之国，其历史犹浅于日本，科学技术，去西欧犹甚。苏联现政府之可称者，则在整个的远大计划，自根本上建设起来，以時計之，革命以来，仅十

年，拼命建设，不过数年，而成绩彰著如此。’^① 的确，20 世纪 30 年代初，苏俄的工业成就及经济制度引起了不少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极大兴趣，甚至极大感动。因此，他们希望中国将来最好的蓝图是：政治体制上学欧美，经济体制上学苏俄。张季鸾实事求是的背后，实际上还暗藏着这么一张天真可爱的自由主义蓝图。回过头来，面对中国血腥险恶的政治现实，张季鸾对“政府”则不能不痛加斥责：

中国人喜谈政治，作政争。实则今后立国之基础，完全在经济。易言之，完全在工农之科学的建设；任何政体之政府，如不能尽力于此目的，必不能长存，……中国之惟一出路，在如何节省国家财力，一面保护私人事业，迅速使全国工业化科学化！整个计划，应参考苏联；一般制度，可步武日本。中国得此出路愈早，则愈有效，迟则有混乱而灭亡之危^②。

其忧心如焚，字字可鉴。然而，对当时的政府而言，他们哪里能听得进这个道理？它们以为只要能依靠武力剿灭了对手，一切便都完事大吉了。他还建议：“必须先求政治安定。欲政治安定，必须指导民众的党本身先泯恩怨，停斗争，群策群力，共向此惟一目标前进。”他以自由主义的胸襟，超越党派之争，冷静地看到了经济建设对一个政府、一个国家的至关重要性。但是，那把“党国”之私利看作高于一切的政治派别——鼠目寸光的他们又怎么能觉悟到这一点呢？

① 张季鸾：《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大公报》 1931 年 6 月 4 日。

② 同①。

张季鸾和《大公报》的核心层人物对苏俄抱有非常矛盾的情绪。一方面，他们坚决反对苏俄的政治制度，除心羨美英外，民族主义的感情亦在左右着他们。他们反对外蒙独立，反对苏俄在“中东路事件”中的沙俄式强横……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决不让步；另一方面，他们又奉行尊重事实这一自由主义新闻原则。《大公报》对事实不抹煞、不歪曲、不捏造，不偏袒任何一个党派，不感情用事等等，可以说，都是和张季鸾等人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其人格上的独立不惧、光明磊落分不开的。季鸾先生的这种独立人格，在他去世后仍一直为《大公报》所持守。据李纯青回忆说，抗战后《大公报》笔政大权由王芸生掌握，“措词激烈，火气旺盛”，其社评“既骂国民党，又骂共产党”，“但是大公报始终不叫嚣战争，不拥护国民党戡乱”^①。始终走的一条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显然与张先生的训诫是分不开的。

四 “外圆内方”与中间路线

在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要走“中间路线”，坚守自由主义的信念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文人论政”这面旗帜不能倒，另一方面“士为知己者死”的古旧报恩思想又根深蒂固。这样，对张季鸾来说就颇有些两难了。

抗战之前，张季鸾社评挖苦调笑的主要对象是蒋介石这样的极权人物。他之所以由激烈地批评蒋政权，发展到后来的拥蒋抗日，与他崇奉的“国家中心论”大有关系。“九一八”事

^① 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 参见《大公报人忆旧》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年版，第314页。

变前，他对日本尚存好感，但事变之后，他成了一个坚毅的民族主义战士。这时，季鸾先生最大的转变就是提倡“国家中心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他决定促蒋抗日。从1931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撰写了难以计数的社评文章，一方面抗议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侵略阴谋，另一方面愤怒谴责“政府”的不作为。他在许多文章中破嗓裂喉地高声呐喊：只要中国人“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

张季鸾是当时著名的日本通，并且与日本的政界人士和文坛人物常有往来，再加上在批评“政府”时，其态度有某种转变，因此深得蒋介石器重。他虽然曾受蒋之委托，写过一些主张“缓抗”的文章，但其积极坚决抗日的立场却从未有过动摇。他后来成为了蒋介石的“诤友”，与张群和杨永泰的举荐有直接关系。张、杨二人不仅是蒋倚重的幕僚，而且还是政学系的中坚人物。当时，由于《大公报》影响愈来愈大，尤其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而与此同时，“党国”主办的报纸在读者中的公信度却大大降低，蒋介石于是采纳了张、杨的建议，也试着学学西方政客的模样，拉拢民间有影响力的报纸，以为自己所用。但张季鸾不是一个随便可以利用的人，他希望蒋介石能从谏如流，而自己又决不能以丧失独立为代价。

事实上，张季鸾是那种“外圆内方”的自由主义者，表面平易谦和，但内心却极有原则。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中国的抗战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他之所以诚心拥蒋，其前提是因为蒋在领导中国抗战，这和当时中共拥蒋抗日所持的立场是一致的。事实上，他与蒋的交往是极有原则的：第一，不当国民党的官；第二，不拿“政府”的津贴；第三，不许政府干预

《大公报》的事务。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与“领袖”的关系无论再“密切”，也绝对无损其自由主义的操守。还是胡政之先生说得好，他说：“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他的道德文章，处世技术，一切都在我以上。^①另有李侠文先生的回忆文字，亦可佐证王芸生和曹谷冰后来对张季鸾的揭发和泼污水是毫无道理的。他说“季鸾先生不但为文‘绵密警策’；且深受经学家讲究砥节砺行的影响……他对人一团和气，全无架子，却不是面面俱圆的好好先生。他外圆内方，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处事极有原则”。^②实际上，蒋介石一直是将他以“国士”礼待的。这种情况，连国民党高层的许多人都称羨和感喟，他们说，“蒋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他的部下，而没有和他平起平坐的诤友，有之，则惟张季鸾一人。”^③

张季鸾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崇高人格，都建立在其坚定的自由主义信念这一基石上。若要说他一生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奋力争取新闻自由，努力当好民众喉舌。从他投身新闻事业到他逝世的这几十年间，他矢志之顽强，精神之感人，确实罕见。尤其是在主政“新记”《大公报》以后，15年间，竟有上百篇社评是关于公民人权和舆论自由的。较著名的篇什有：

1927年11月9日的《反共者亦注意改良政治》，文中提出：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和财产营业自由，“大兴宪政，尊重民

① 胡政之：《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大公报》（上海版）1946年9月1日。

② 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 参见《大公报人忆旧》第258-259页。

③ 同②

权，产业发达，便利交通。此而不能，则共不共，反不反，一而已矣。”

1928年4月22日的《青年与党祸》，就国民党用暴力翦除政乱表示愤慨，云：“以杀止杀，一时之计也。以仁止杀，宪政之机。”呼唤真正还政于民。

1928年5月1日的《政轨》提出：“（1）民为帮本，为政必须尊重人民之基本权利；（2）政治必须循经济原则，凡违背国民经济之利益者，其政权必不长；（3）公钱须公用，其取也，须人民同意；其用也，须在公益之用途；（4）国家军队之根本性质必须为国民公共之军，并非一党所私有；（5）军队为公有则强，为私有则弱。”

1928年9月16日的《本报同仁启事》，宣布：“本报系营业独立性质，不受何方津贴补助，亦不添招新股。本社同人向以办、报为职业，不兼任何政治上任何职务，不作求官求差之任何活动。”重申其为民喉舌的基本原则。

1929年1月12日的《中央之宣传品审查条例》，强烈谴责“党国”之野蛮条例，指出：“国内言论界惟有钳口沉默，方得免于反动之咎矣。”

1930年4月26日的《对于言论自由之初步认识》，内称：“望有政权者认识：（1）言论界本为国家应有的一种独立的职业，并非天然应为治者之应声虫；中国有独立的言论界，言论界中尽有几许不求荣利忠于职业之人；（2）言论界有主张批评之自由，压迫批评，专听歌颂之辞，对于治者来说，在政治上为自杀之道。”

1930年5月27日的《极度压迫言论之恶影响》指出：“当局滥用宣传，恶化新闻，其恶影响是迫使报界专在社会黑暗面逞其笔锋。”

1930年7月24日的《言论自由与立言之态度》称：“吾人欲国民民主势力，宜彰言论信用，故一方面应为言论之自由奋斗，一方面亦应为言论之价值努力。”

1931年5月12日的《国民会议与言论自由》，就所谓“国民会议”代表提出有关言论自由之议案，要求废止《出版法》，指出：当局有法不依，使新闻者动辄得咎，“完全为奴隶的，被征服的，毫无法律保障，遑论言论自由”。

1932年3月24日、3月30日、4月5日连续发表《论开放党禁》、《再论开放党禁》、《党治与党禁》指出：“人心倾向，于政治集会、结社与思想自由之解放，已有不可遏止之形势，苟再横加抑制，逼其横决，不啻奖乱造乱”；“所贵乎宪政者，为许各政党之存在，并许其为政治上之自由活动。”

1933年2月10日的《民权保障与司法独立》，批评“政府”“不仅不守法尊法，更割裂法律，以意创造”，酿成“国家无法律，民权无保障”之恶果。

1934年12月9日发表胡适的《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就“政府”提出言论结社自由而具体列出五项要求，其中第四项为“政府应明令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凡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的结社与言论，均当予以保障”。

1935年2月18日的《中国不适宜于独裁》，提出：“训政结束之后”，国民党宜本孙中山之“遗教”，“以培养民主宪政为目标”。

1936年4月1日的《今后之大公报》第6次重申“不党、不卖、不私、不言”的方针。

1937年2月18日《论言论自由》提出：“政府对言论界须持‘但可放则放’之态度切勿‘但可扣则扣’。”

1938年6月18日的《国民参政会的诞生》认为：“此会

是发扬民权主义的精神，而树将来宪政的基础，也就是为民主政治的进路”。

1939年4月15日的《宣誓》重申：“本报是民营事业，不受公家津贴，同人皆愿为终身报人，不兼公职，不受外给，故本报虽有相当长久之历史，而始终为书生事业。”

1940年5月10日的《上层知识分子的责任》，认为：“成为当今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紧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物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

五 办报秘诀：随时准备失败

1940年9月2日刊出《“记者节”》时，张季鸾解释说：“我以为应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记者的节日，……再一解释就是记者节操。”

1941年5月15日，就美国密苏里大学颁授荣誉奖章予《大公报》季鸾先生在《本报同人的声明》中郑重指出：“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此前，亚洲国家中惟有日本的《朝日新闻》曾获得过密苏里大学赠予的这项殊荣。但是季鸾先生认为，“文人论政”这一中国自由主义报人的特征，却是日本同行所不能逮及的。

张季鸾不仅用自由主义的办报原则要求《大公报》同仁，而且他更希望中国的民间报人都能遵循这一原则。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强调说：“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

名。我们以为不求权不求财，是士人常行，容易办，不求名却不容易……因为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殆害国家。^① 在他眼里，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同时，国家观念还是其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生命资源之一。他还为战时重庆的一个记者刊物撰写了一篇叫做《无我和无私》的文章。他告诫记者们：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发表主张应尽到客观的探讨，不可夹杂着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更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又说：“报人的职责是在谋人类的共同福利，不正常的自私其国家民族也是罪恶。以中国今天论，我们抗日决非私于中国。假若中国是侵略者，日本是被侵略者，那么，中国报人就应该反战。”^② 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所理解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固然以国家利益至上，但他们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严格地讲，自由主义是远远高于民族主义的——张季鸾的执着理性正体现在这里。

就是这样的一个迂得既可爱又可笑的小老头儿，很难想象在长达 30 多年的时间里竟然是一位令极权主义者既怕又恨的猛士。在日常生活中，这个老头儿胸无城府忠厚得似乎已近于迂腐，但在争取新闻自由、坚决作民众喉舌的斗争中，他却坚韧顽强锋利得如磐石如崖松如飞矢。他对民间报纸的社会功能认识得非常深刻，尤其是对报纸言论的社会效用理解得非常透彻。他一直认为，“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③ 以

① 转引自《大公报人忆旧》第 287~288 页。

② 转引自《大公报人忆旧》第 287~288 页。

③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

前在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搏斗时，他可谓遍体鳞伤，但却死不悔改，后来在与国民党检查机关的冲突中，他更是勇猛非常。张季鸾始终向往英美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新闻制度，以此为参照，他对任何专制主义者制定的“新闻制度”都不买账，并表示出极大的轻蔑。他曾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中怒不可遏地斥责道：

查党国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多少有承袭苏联或法西斯式理论之趋势，将完全置全国言论界于党部指导管理之下，而绝对统一之。其所谓统一，非仅言论而已，经事亦然，故其理想的境界，为全国报纸言论一律，纪事一律，当局谓黑，则俱黑之，谓之白则俱白之，其所是与否者是否之，是此种制度下之报纸，其职责乃完全为当局作政策之宣传，不复含自由宣达民隐之意也^①。

他对这种以一党之私利为好恶、为法纪而造成的恶果极为憎恨，他严肃地指出其流弊：“其一，宣传过于统一严整之结果，人民神经久而麻痹，反使宣传失效；其二，报纸专为政府作宣传机关之结果，全国言论单调化……最后促使报纸失去信用。”正是局促于这样的办报环境，面对随时可能袭来的阴毒和无耻，他悲愤难抑。现代报人谁人不知，他办报的秘诀居然是“随时准备失败！”其含义，一方面说明中国报人，尤其是自由主义报人面临的政治险恶实乃防不胜防；另一方面说明他敢于冒死犯难，不惜玉石俱碎的斗志和决心。1939年5月5日，他又在《抗战与报人》的社评中以无限苍凉和自豪的口吻说：

^① 《大公报》1929年12月29日社评。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说，是反统制，反干涉^①。

张季鸾的理想确实是很难实现的：向专制者要新闻自由，简直无异于与虎谋皮。那么，是否张季鸾的这种价值追寻就毫无意义呢？或者就只能被称作是“乌托邦”呢？应该说，这种看法本身不仅短视肤浅，而且还显得怯懦鄙俗。事实上，张季鸾所传承的，是从王韬、严复、谭嗣同、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这些卓越的自由主义报人手中接过来的薪火。

1941年9月8日，《大公报》在《敬悼季鸾先生》的社评中高度称颂说：“先生一生志趣在新闻事业，以做报人为终身事业，故立志不做官。”又说：“忠勇二字，本做人行事之本，先生引为报人天职，故先生之主张能忠贞不惑，发表亦少所禁忌。先生文章之影响大，感人深，胥由忠勇二字得来。”^②

9月10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今后之大公报》借此重申该报坚定恪守的自由主义立场，认为，以这种姿态来祭奠张先生才是最为妥当的。社评强调指出：

大公报以过去十五年的奋斗，在社会上曾挣得一些言论地位，今后也必为民主的新中国撑持言论自由的阵容而努力。这所谓言论自由，自然不是违法荡纪祸国害俗的盲目自由；但我们根据国族利益，获得真知灼见，必须坦白

①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大公报》1939年5月5日社评。

② 王芸生：《敬悼张季鸾先生》，《大公报》1941年9月8日社评。

主张，纵使与政府见解或社会风气发生冲突而不辞。这一点随时准备失败的精神。本报在过去曾不断有所表现，季鸾先生生前也曾一再以此训诲同人，今后将永为本报社训，必坚持不坠^①。

第六节 成舍我：“世界主义”与新闻托拉斯之梦

一 生平及思想简述

在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中，成舍我是一个不应该被遗漏的人物。成舍我不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政治革命家而进入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他是作为一个民间报业大王试图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施加影响而进入这段历史的。

应该说，有这种雄心，或者说野心的民间报人并非绝无仅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推动中国民间报业朝着自由主义方向发展的不少著名人物中，有这种雄心壮志的大有人在。比如史量才、陈铭德；又比如张季鸾和胡政之等等。然而，成舍我却有他的独异之处。这个土生土长，既没有留学经历，又几乎没有“革命”经历的人，竟然是一个顽固的世界主义者。

“世界主义”当然不是他的发明。这种与自由主义有着密切亲缘关系的“主义”，既可以寻索到康有为的“大同”观念当

^① 胡政之：《今后之大公报》，《大公报》1941年9月10日社评。

中，但其更直接的思想启示却是来自“五四”“新思潮”中的一种，即“互助合作主义”。“五四”以后，当那些形形色色的“主义”基本上烟消云散，很少有人再提起兴趣时，这个以孟子“舍我其谁”自喻自励的青年，居然办起了数张以“世界”命名的民间报纸，执着地试图将这个“主义”贯彻到底。所以，他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惊心动魄的伏笔。

早年的成舍我思想非常活跃，行为亦比较怪异。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最早与陈独秀等启蒙领袖结识的激进青年，同时也是五四前夜最早列席参加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旁听者；他还是最早得到蔡元培赞助从事“新思潮”译介的北大学生，但他对“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示不感兴趣。在《世界日报》初创时，他就因痛诋段祺瑞极权主义政府，差点成了与邵飘萍、林白水齐名的自由主义烈士。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国民党极权政府短暂“蜜月”期结束后，他与国民党内的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有很深的思想认同。那个时期，他提出“小报大办”的口号来实践其自由主义主张。在国民党政治全能主义的威压之下，他竟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出令权贵们头痛不已的事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当中国最大的报业托拉斯大王，并期望用“互助合作主义”来统合中国的民间报业。这些具有“狂想”性质的梦幻，最后与他寻求的“第三条道路”一起全化为了历史的泡影。自由主义者张友鸾说：“他是我所尊敬的老师……”这句话中分明包含着极深的悲剧感怀。

成舍我(1898~1991)原名成勳，又名成平，后以笔名舍我传世。出身在湖南湘乡一个贫寒的“破落地主家庭”，由于无钱入塾，只得随父亲读书识字。1910年考入安庆旅皖第四公学，当年冬天辍学回家。1911年参加同盟会组织的学生军。

南北议和后，因逃避军阀追捕而潜行到沈阳，开始流浪生涯，期间在沈阳当过《健报》校对员。1915年流浪到上海，在《国民日报》当校对和助理编辑，并加入《南社》。这时他结识了陈独秀和刘半农，由此有了自由主义思想的萌芽。1917年，因与报社同事产生矛盾，一怒之下又踏上流浪之路。1918年，在陈独秀的帮助之下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不久结识了李大钊。李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并赞赏他的奋斗精神，因此介绍他到北京《益世报》当了编辑。他白天去学校听课，夜晚到报社编稿。就在这时他开始给报纸写社评，并开始用“舍我”来表达他的思想和意志。1920年，他已从小编辑变为大编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写过大量的煽动性文章鼓吹新思潮，抨击旧传统和专制主义，在读者中颇有影响。同年，在蔡元培的资助下，他在北京大学发起“新知编译社”，组织同学翻译西方学术名著。1921年又发起“北京大学新知书社”，采取股份公司的办法募集资金，蔡元培亦入股予以支持。1921年冬书社失败后，他用残余资金办了一张名为《真报》的小报，但很快停刊。1922年经人介绍入北京师范大学任国文教员，不久又回《益世报》作编辑。1923年秋到北京联合通讯社作编辑和记者，因采访关系结识许多政界要人。1924年入众议院任一等秘书，不久又当上华威银行监理官，但他的志向不在当官，而在从事新闻事业。1924年开始独立办报。由200元钱起家创办了《世界晚报》。到1925年10月，他又先后创办了《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1925年“三一八”惨案期间，成舍我的报纸因连续抨击段祺瑞政府而声名大震，业务迅速扩展，资产上升到几十万元。1926年8月因公开揭露和批评军阀乱政害民，不惜步邵飘萍，林白水后尘，而被张宗昌的宪兵队秘捕。后由于国务总理孙宝琦出面求情，方得张宽释。1927年，与

李石曾、吴稚晖等共同创办《民生报》，提出“小报大办”的自由主义策略性口号。旋即因大骂政务处长彭学沛而得罪汪精卫，该报被勒令停刊。1928年，李石曾仿照法国教制试行大学区制，邀成舍我任北平大学秘书长。1928年任南京司法行政局简任秘书。1930年初，他与李石曾以接洽学术文化的名义赴欧美考察各国新闻和教育事业。次年3月回国后，决心学习西方报业模式办真正的民间大众化报纸，使中国的报业实现高度资本主义化。1935年初与一批自由主义者合伙创办《立报》于上海。1936年，因不满社内牵扯太多和报纸上的左倾言论太多，将该报停办。1937年，愤而拒绝大汉奸潘毓桂的利诱，由北京潜往天津和上海。1938年4月在香港重新创办《立报》。1943年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1943初，拒绝官方邀其接任《扫荡报》社长，因坚持民间形象而又一次引人注目。1945年抗战胜利，恢复上海《立报》和北平《世界日报》，重新开始做报业托拉斯大王的“美梦”。内战爆发后，积极鼓吹走“第三条道路”。1948年12月北平告危，成舍我由天津飞返南京，神色黯然。1949年2月，在获知《世界日报》被中共北平军管会接管后一周“逃往香港”。

严格地讲，成舍我主要是一个自由主义报刊实践家而不是一个报刊思想家。但是，不能据此说他就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报业大王，就像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民间报刊实践家一样，可以说，他从最初投身新闻事业始，就是怀抱一种思想和价值信念的，这种价值信念的内核其实就是自由主义。

二 “世界主义”与自由主义

据成舍我的同窗好友吴范寰^①回忆：成在北大时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理念的影响，有很强的独立性，从不愿依附别人。他虽然最早被陈独秀、李大钊邀去参加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集会，但是他对共产主义并不欣赏。他当时“把帽子一扔，对几个熟悉的同学说：‘中国的布尔什维’今天开成立会了。这个主义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主义’，我可不赞成。此后他就再没有去参加过”^②。可见在这个时期，他就已经有自己所信奉的主义了。当然，他当时信奉的这个主义还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中的温和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之一为吴稚晖，这一思想派别的政治文化特点是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并把道德教化视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手段。很明显，这是成舍我当时拒绝“布尔什维主义”的最直接思想和价值依据。后来，无政府主义这一思想派别分化为许多支，其中一支就是成舍我奉为人类真理的“世界主义”。他之所以将自己所有的报纸都冠名为“世界”，其思想奥妙就在这里。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主义都是与自由主义在价值观上有密切联系的。特别是当成舍我稍后又将李石曾的互助合作主义加进来，他的新闻思想内涵就更丰富和热闹了。应该说，坚定地信守蕴含着自由

^① 吴范寰是成舍我小学的同学，曾担任《世界日报》经理前后达 15 年。

^② 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版，第 15 页。

主义价值观的“世界主义”正是他从办报伊始就敢于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勇猛无畏揭露抨击军阀和形形色色的权贵的主要原因。

《世界日报》创刊时即宣布要“引起国人之世界观念”^①。关于什么是“世界观念”，却没有详述。直到1930年4月16日，成舍我准备赴欧美考察新闻事业，“临行时兴致其豪，发表告别北平报界书，以未来的中国新闻巨头自许。”^②这时，才将他的具体想法合盘托出。其曰：“……今后经营新闻事业，无论其主张与立场如何，必将各个奋斗而趋于互助合作，大规模新闻事业不难实现。”^③ 这年年底，他又在布鲁塞尔报界公会的演说中继续发挥他的“世界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

对成舍我来说，“世界主义”还是一种“实业观”。他是中国民间报人中最早具有新闻托拉斯雄心的人物之一。尽管这种“实业观”在北洋时代就已经萌发，但真正使他燃起万丈豪情，形成更完整更具体的“实业观”思想体系，准确地讲是在欧游考察当中。他的野心很大。在布鲁塞尔演说时就自信，只要推行以“合作互助主义”为标志的“世界主义”，世界各国新闻记者就能“推诚合作”，世界和平就能得到保障。后来在考察英法德美等国期间，他又撰写了两篇重要的通讯来表达他的“实业观”感想。其中一篇叫《我所见之巴黎各报》，详述了法国主要的政党报刊和民营报刊办报方针及经营特点，认为值得仿效。另一篇叫《在伦敦所见英国报界之新活动》，对宪

① 参见《世界日报》1924年4月16日创刊宣言。

② 吴范寰：《成舍我与北平〈世界日报〉》，《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0页。

③ 同②。

政保障下充分享受新闻自由的民营报纸印象尤深，从而更刺激了他的实业野心。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英报界两巨头与最近政潮；二、帝国会议与英报界；三、伦敦市长在广告大会之演说；四、北岩爵士之铜像落成典礼。他对于英国报纸对政界的影响，尤其是报界两巨头罗赛迈（北岩爵士之弟）和毕维林左右政局的作用极为赞赏。他说：“‘符离街英报馆集中地 支配唐宁街英首相官邸’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之吾辈中国记者观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① 曾任《世界日报》经理的吴范寰认为，在欧美的考察，对于他经营民间无党派新闻事业有重大的影响，“使他的组织报业托拉斯、做个真正权威的‘无冕之王’的思想更坚定了。”^②

其实，成舍我此次欧游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并非限于新闻事业，而是相当全面、深入的。他认为西方报业的高度发达、言论自由的充分体现，不是孤立存在的，有其“科学合理”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他回国后，马上就写出了他的总结式文章。在近8万字的篇幅当中，他全面描述和阐释了欧美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新闻这四者间的依存和互动关系^③。在北京报界公会的欢迎会上，成舍我更是踌躇满志地演讲说：欧美新闻事业的发达，主要有这么五个原因：其一是资本主义发达；其二是教育发达；其三是交通发达；其四是工商业发达；其五是言论有保障。他还大发感慨说，欧美的民营报纸其言论“完全受民

^① 吴范寰：《成舍我与北平 世界日报》，《世界日报兴衰史》第75页。

^② 同^①

^③ 成舍我：《就算我的感想》详见《世界日报》1931年3月16日。

意的支配”^①，可以自由批评政界，因此，广受民众欢迎，盈利巨万。他不仅心羨无比，而且跃跃欲试。

把报纸办成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那样的民间自由主义大报，是从王韬以来许许多多中国民间报人的最大愿望。成舍我更是如此。他最羡慕的是这两张以“公众良心的独立信托者”自居的“高级报纸”，一是在政治上的独立，二是经济上的独立。1935年9月，成舍我与严诤声、严服周、钱沧硕、张友鸾、胡朴安等合资创办的《立报》，就最能体现他的这种渴望。《立报发刊要旨》是这样来表达的：“以最新姿态，使报纸功能，普及全国大众……夫报纸发达，为近代文明国家最大推进器之一，若使我国报纸之销行，长此蜷伏盘旋于现在状态之下，……则最大多数民众，势必无法认识国家与个人之关系……欲复兴民族，必使每一国民，能了解本身对国家的责任，为欲达此目的，则定价低廉，阅读便利，日销百万之大众化报纸，实有乘时崛起之必要。”^②创办欧美式的大众化报纸，以实现他的报业托拉斯梦想，是成舍我尤为醉心自由主义理想。

三 “大众化报是一种新革命”

《立报》创刊号上的《我们的宣言》就具体描绘了他的这种梦想。成舍我代表同仁们宣布说，“我们特举两个口号”：一是“报纸大众化”；二是“以日销百万为目的”。为了回答将会遭遇到的误解和批评，他还特意对这两个口号进行了颇为细致

^① 详见《世界日报》1931年6月25日。

^② 《立报发刊要旨》，《立报》1935年9月20日。

的自由主义诠释：

第一，“报纸大众化”，这是十九世纪以来，近百年间，世界新闻事业，最共同普遍的一个原则。从一八三三年，美国彭佳命创办《纽约太阳报》，到一八九六年，英国北岩爵士发刊《每日邮报》，报纸大众化的潮流，实已弥漫了全世界新闻之国的任何角落。只有我们孤立自诩的贵国，到现今，所谓“精神食粮”也者，还只在极少数高等华人，可以有福享受这种高贵的食粮。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不但不能了解报纸的使命，甚至见着新闻记者，还莫名其妙地问：“恭喜贵行，究竟做的是什么买卖？”我们从整个世界新闻事业的潮流说来，“大众化”不但不新奇，而且腐之又腐。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正和民国初年，拿剪辫子、放小脚当做新政，是同一的叫人惭愧，尚何新奇之有？

第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如果我们从中国的人口土地比例计算，那只能说，这是“大众化”报纸的一个起码数字。我们试看，不满五千万人口的英伦三岛，只伦敦一处，日销两百万份的大众报就有四家。即人口不及百万的比利时京城，仅一个“晚报”，就销四十万。那么纵不拿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算做对象，而只就所谓将近四百万人口的大上海说，这个“日销百万”的数字，还能算是夸大吗？^①

他非常痛心中国社会发展太缓慢、太保守，自甘孤立于世

^① 《我们的宣言》，《立报》1935年9月20日。

界潮流之外，反而还沾沾自喜。但是，他并不太了解，“大众化”在中国社会实行起来特别困难，一则固然是因为国民党的新专制阻扰，但另一面呢？却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太低；老百姓文化水平和参与公众事务的水平太低。成舍我年轻时常常饥寒交迫，在《益世报》“打工”时又受到过“剥削”和欺压，因此常常咒骂“万恶的资本家”，思想上有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在诠释他所理解的“大众化”时，他不能不带有“批判资本主义”的眼光。他说：“不过，我们虽然不承认‘大众化’是新奇，‘百万销路’是夸大。但我们所标举的‘大众化’，与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大众化，却实有绝对的差异。我们不想跟在他们的后面去追逐，而是要站在他们前面来矫正。因为最近的数十年中，报纸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绝大多数有着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倾向，从苦寒卑贱的民间而来的成舍我更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西方当时的“大众化”报纸的鄙薄性评价，不是一种情绪，而是指示着他“中国式”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方向——他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描述和阐释他理想中的“大众化”报纸的精神面貌的。他对中国当时不少所谓的民间报纸的精神格调，特别是与广大民众严重隔膜而浑然无知深怀忧愤。因此他认为，报纸仍应当肩负起“唤起民众”的启蒙重任——应当通过启蒙，使国民树立牢固的国家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推动国家朝着民主、宪政的方向，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大众化报是一种革命”，其思想和文明的意义正在于此：“我们所揭举的报纸大众化，不仅是对于中国报业的一种新运动，并且也是

对于现在世界上所谓大众化报纸的一种新革命。不过我们特别感觉到中国报纸大众化需要，那就因为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甚至遇到空前困难，而最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与国家的关系，何者为应享的权利，何者为应尽的责任，却模糊不清，莫名其妙，一方面，政治可听其腐败，领土可任人蚕食；一方面，也不肯为国家有分毫牺牲。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其所以造成这样现象，我们敢确切断言，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实为最主要原因中最主要者。诚如韦尔斯氏所说‘中国报纸，内容艰涩，国民能完全了解报纸所记载者，为数极少’。且中国多数报纸，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所载材料，又恒与最大多数国民，痛痒无关。此种报纸，固然自另有其宝贵的价值，但欲达到普及民众之目的，则显然十分困难，以致现有报纸，只能供少数人阅读，最大多数国民，无法与报纸接近，国家大事，知道的机会很少，国民与国家，永远是隔离着。在如此形势之下，要树立一个近代国家，当然万分困难。要打破这种困难，第一步，必开创一种新风气，使全国国民对于报纸，皆能读、爱读、必读，使他们觉得读报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要基才能树立坚固，立报所以揭举大众化的旗帜，其意义在此，其自认为最重大的使命，也在此。”

不过他认为，这件事光有他们这些人来做还远远不够，应有尽可能多的民间自由主义报人加入，才能使之成为“中国报业的新运动”。因此，他首先向中国自由主义最“发达”的上海呼吁道：“不过‘唤起民众’的重大使命，决不是这样一个刚刚坠地的婴儿所能负荷得起。尤其不是我们这十几个能力薄弱的创办人，所能保其必达的。我们仅是愿意在这划时代的中国报业的新运动中，各做一名开路小卒。我们还期望着中国

——尤其报业最发达的区域的上海的先进同业来共同努力。更期望最大多数的读者，在达到‘立己’和‘立国’的共同目的下来给我们许多的指导。”

他认为，根据中国社会的现状，启蒙还首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做起，因此宣布《立报》的营业和编辑方针应遵循这样的“大众化”四原则：一，凭良心说话；二，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三，“除国家币制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我们当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的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四“除环境及不得已的原因外，我们认定，报纸对于读者，乃一种无形的食粮，和无形的交通工业，应当终年为读者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

四“立己立人”与“立国立世界”

成舍我的报刊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这个理念与他所提倡的国家观念和“世界主义”在思想线索上是一致的。这就是“立己立人”与“立国”乃至“立世界”的伦理、哲学关系。他说：“我们不相信什么叫国运，我们想信只有生息在这个团体中的全人类，共同奋斗，不论何种灾难，都自然可以度过。我们认为不仅立己立人不能分开，即立国也实已包括在立己的范围以内。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国立报惟一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最主要的使命。”^①也就是说，国家观念、世界观念和“立人立己”是相辅相成的。“立人立己”是这个伦理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① 《我们的宣言》，《立报》 1935年9月20日。

也是价值归宿。“立国”和“立世界”如果不包括“立人立己”这一核心内容，其意义也就丢失了。“大众化”报纸应坚持这样的伦理哲学原则。否则“唤起民众”就是一句空话，报纸就会走向逻辑的迷途。

成舍我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明显承续着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传统，也明显表现出对政治革命，特别是对用暴力革命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持不赞成态度。在这一点上，可见他深受胡适的影响，但是，李大钊、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不能说没有——“健全的个主义”和“合理的个人主义”都可以在他的“立人立己”论中找到观念的影子。他一生的报业活动，包括他那“狂妄”的托拉斯梦想，都是循着“立人立己”——“立国”——“立世界”的伦理哲学方面顽强伸展着。

险些成为北洋军阀刀下鬼的成舍我，一直将自己视作邵飘萍、林白水自由主义事业的继承人和薪传者。1945年11月20日，在《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复刊的时候，他又一次全面回顾了中国民间报人与极权主义悲壮搏斗的历史，同时宣誓决不放弃民主宪政的努力。他特别以自己大半生的办报遭遇，再次重申他的自由主义信念。他论断说，中国的民间报人“真不幸，也真太幸”，最后归结出他们应负有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历史使命，特别强调“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的作用”是至尊至上的。他还敦促“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强调走“第三条道路”于民于国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这篇题为《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的长篇复刊词，其实质是战后中国自由主义参政浪潮中的宣言性呼号。虽然《大公报》、《新民报》和《文汇报》等大多数民营报刊战后都发表过类似的宣言，但成舍我慷慨悲壮的这一篇，更集中和更典型——它对30余年来中国民间报人自由主义奋斗史的总结

更具有文献性意义——

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在艰苦奋斗中，万千同样的报人中，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出版较晚，它创刊于民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因为诞生地在北平，北平，此伟大庄严的古城，二十年来却多灾多难，内有各种军阀的混战，外有日本强盗的劫踞，《世界日报》和许多恶魔苦斗，所以也就不能不与北平同遭惨酷的厄运。厄运最后一幕，竟使我们经过八年零三个月悠久时间，不能和读者相见，全部资产被敌人没收。起初竟盗用原名，继续出版，后改称《新民报》，再改《华北新报》。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一个纯粹民营的报纸，竟如此牺牲。实则此种艰辛险恶的遭遇，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也可算司空见惯、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不能依循轨范，求本身正常的发展。人与报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我们虽曾遭受各种军阀的压迫，现在这些军阀，谁能再压迫我们？许多恶魔叱咤风云，这一个起来，那个倒去，结果同归于尽。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真可使人股慄。

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他屡想和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

民国二十三年（即一九三四年），因为反对汪精卫的媚日外交，和包庇贪污，被他封闭了我的南京民生报，并将我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四十天；一面又电令他的北平同志，将《世界日报》也停刊三天。他无法定我罪名，也无法消除由此而起的全国沸腾的清议，我终于恢复了我的自由。他的党徒唐有壬劝我：“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我很坚决地答复：“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我们的谈判，因此决裂，民生报被强制“永久停刊”。然而几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我举以上二个例，并非故作快语，更无自我宣传之意。而且张汪两贼，势倾全国的时代，凡稍有正义感的，哪一个报人，不恨张宗昌；哪一家报馆，不反汪清卫？我仅是万千报人中的一个。

现在我只真凭实据，证明我们的确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忠诚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再以此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在中国，因抗日而牺牲的报纸，不知有多少。当敌人没收我们资产时，岂不志得意满？利用我们资产，出版了多少伪报？曾几何时，我们终于旧地重来，物归原主。我为收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报纸器材，曾因小小波折，写

过一封信给中央某部当局，我很率直地说：“抗战八年，我们做报人的，没有饿死、炸死，已算托上帝保佑，心满意足。我不希望向政府要一官半职；也不向任何机关要一文半钞，更不想藉此机会混水摸鱼，抢他人一草一木，但凭自己血汗，辛苦经营得来的一草一木，可以掉头不顾被人没收，却决不能在自己政府之下，自动放弃，无故牺牲。”我们有笔，要写文章；有口，要说话。报纸是发表意见最著功效的工具，我们一定要竭尽心力，珍重爱护。北洋军阀和日本强盗，都不能打倒我们，不仅过去如此，相信一切反时代反民众的恶势力，无论内外，都将永远如此。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我们有无限的光明。我们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报人！’^①

五 “正义的报纸”与正义的悲剧之路

关于如何才能按自由主义预设的“正义之路前进”？他居然雄心勃勃地以政治战略家的口气为中国的民间报人“指出我们今后的任务”：“第一，中国现在虽已是全面胜利，列为四强之一，但无可讳言的，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在今日并没有整个消除，甚且还更比以前严重。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对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始可使这种危机，归于消灭。不过，所谓超然也者，既不是一般人所悬想的，像两个车夫打架，警察出来，一人一巴

^① 成舍我：《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世界日报》1945年11月20日复刊号。

掌；也不是不分皂白的和事佬，东边作一揖，西边作一揖。这两种办法，都不能息争排难，解决问题。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以目前震动中外的国共纠纷来说，决非空洞敷衍写几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所能奏效。我们必须发动全国舆论，造成一种最大的力量。就当前形势，我敢放心大胆代替最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说，老百姓的一致要求，是‘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假若现政府不能实行民主，肃清贪污，安定人民生活，而欲一手把持，天下为私，我们就要向政府革命；假若在野党不能从民主政治的正轨，争取政权，而仍私拥重兵，四出窜扰，尤其破坏铁路，奴役民众，使国家无数千万生命财产换来的成果化乌有，我们就要请政府剿匪。革命不是做汉奸，剿匪不是打内仗，这是我们全国真正‘超然’的报纸，所应该一致确认的，也就是全国老百姓心坎上真正要说的话。我们如果不能将最大一前提决定，不明辨是非曲直，而只想两面求饶，甚或因为怕现在被国民党捉去砍头，就不敢喊‘革命’；怕将来被在野党捉去砍头，就不敢喊‘革命’，怕将来被支部在野党捉去砍头，就不敢喊‘剿匪’，这乃万分卑怯的可怜乡愿，决不配称报人，更不配称‘超然’。我要在这样的原则下，去发动全国舆论，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老百姓是主人，主人有力量，任何党派，应该听主人的话，国共纠纷，自可得到解决，而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也就有从此消除之望。这是我们这一代报人，今后在政治上应尽的责任。”

不仅如此，成舍我还雄心勃勃地试图扭转世道人心，以有利于家国家和“世界主义”的通行。他接着大声发喊道：“第二，我们这一代报人，还另有一重大任务，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转变

和国民心理的改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前一个口号，我自始就没有怀疑过。至于‘建国必成’，则确实大有问题。不说政治纠纷，专从社会方面来看，假使我们一大部分中华贵国的国民，还像从前那样偷惰泄沓贪污苟且，那么我们要建国，试问将从何建起？几十年前，李鸿章、张之洞那一班人，也未尝不想将中国建成一个近代化国家，他们办过造船厂、枪炮厂、纺织厂等等，然而结果如何？哪一个厂不是弄得一塌糊涂？长官贪污，职工偷惰，不是关门大吉，就是虚有其名。现在抗战胜利，中国要大规模建设，纵然英美盟邦，能供给我们几千万万的资本、最新最好的机器，然而国民心理不改进，社会风气不转变，我敢预下断语：他的结果，一定不会比几十年前李鸿章等时代，胜过几何？旧官僚贪污，多少有点顾忌，目前大多数青年，一经做官，只要权势在手，开宗明义，就是怎样买汽车、盖洋房、换老婆。我们看看，抗战以来所谓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官营事业，有几件真有成绩？所以我们不谈建国则已，要建国，心理建设，其重要实远过于物质。我们必须将全国贪污苟且、偷惰泄沓的心理与风气，彻底扫除，然后才有物质建设可言。否则所谓建设，不过是替若干新官僚，增加揩油发财的机会。至于心理如何改造，风气如何转变，这一重大任务，除了教育以外，就完全落在我们这一代报人的肩上。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建国必先建设’也正是这个意思。”

在文章的最后，他悲壮地呐喊道：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应走的正义路。归根结底我们真不能否认这一时代的报人，确太幸运。国内军阀，摧残不了我们；外国帝国主义者，也消灭不了我们，我们现在还能挺起腰干，替四万万五千万国民说话，我们要发挥舆论权威，一方面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一方面改造封建腐恶的社会。我们的任

务是何等伟大；我们的前途是何等光明。眼前若干错综复杂的危机，只是黎明前暂时的昏晦。大家努力！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将为国家奠下富强康乐的基石，将为后世下灿烂丰厚的资产。我们何幸而为这一时代的报人！在万千报人奋斗的行列中，我及每一《世界日报》同人，都愿发愤淬励，将永远追从先进 成为这行列中的一员！”

这篇文献性宣言里面，他所阐述、呼喊的要做“正义”的报纸、走“正义之路”等等，不过是在重复他一再坚持的报刊自由观念，这就是：不党不偏，不受津贴；不畏强暴，恪守公正立场；替民众说话，做民众喉舌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尽管言词中他充满自信，对自由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但是经验和理性给他带来的忧虑却是无法排遣而去的。这些，在战后他所撰写的大量言论文章中都充分表现了出来——矛盾和悲剧不断打击着他的信心。他的言论和当时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主要集中在民主与宪政建设、经济问题、国共争端、中美苏关系问题，特别是如何走通“第三条道路”上面。《世界日报》是以“人民公论”的独立视角来评判这些芜杂的时政难题的。在这一非常的历史时期，他坚持认为，只有代表“新生力量”的自由主义者才能“改变政局的前景”。在探寻“第三条道路”的迫切性和可行性价值目标时，《世界日报》发表的《中国需要新革命运动》和《大苦闷与新革命运动》将他的思想理念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前一篇是这样来推论自由主义作为“新生的中国革命力量”的必然性登台亮相的意义的：“凡是有心人大概现在都很苦闷，苦闷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无能；苦闷在野党执迷想中的目标，实行破坏残杀与内乱，不顾祖国的前途；然而，苦闷不能窒息我们，有心人必须在苦闷中发现他们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要在国共之外另建一个新生力量。”还说，

因为既不满意在野党，也不满意国民党的人，到处都有，这个事实也就是新中国的基础。所可惜的只是这些人还没有组织，没有组织也就没有力量。因此，“国家一切大事的支配权仍落在国民党手里，一切社会动乱的因素都操在在野党手里。”便是“人们既不能让祖国逐渐烂完，也不能使中国人都成为悲剧的扮演者，所以一个新生的中国革命力量必定要产生。虽然这个新生力量，从组织上说，是在国共两党之外，但从组织分子方面说，国共两党之内的进步党员却同样可以参加，并可成为它的有力支柱”。^①

这篇社论还谈到一个组织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是要有领导人物，二是要有一套新的学说主义。”对于前者，社评认为尽可让它慢慢地自然产生，对于后者又觉得“今日中国人的问题，不是一个说理问题而是一个行动问题。复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好，参考英国的社会主义也好，采取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好，总而言之，所贵者在做，而且要做得对，做得好，而不在空说，不在颛顼暴动。如果一个组织只靠说话就可成事，今天的国民党不仍然说得很好听吗？如果只要颛顼暴动就可解决问题，今天的在野党不正在循此而动吗？所以我们认为今日中国革命力量的产生，应当以自由、民主、正义分子的团结行动来表现，而不是一个革命学说的抽象演绎。当然为了支持自己的行动，新团体不能不有它的一些主张与看法，但这些东西并不需要很多。今日中国所急需的是新革命的事实，如像肃清贪污与活化民生主义。我们不要空说，也不要颛顼的暴动。”^②

陈剑恒：《中国需要新革命运动》，《世界日报》1946年11月2日社评。

^② 同

在这篇定调子的社论后，他又在 1946 年 10 月 10 日、16 日、18 日、19 日的四篇社论中依次用《何以自处？》、《大局如何》、《和平空谈与和平实现》、《走第三条路》这样一些文章，来从各个方面阐述这个“中间道路”的观点。然后于同月 21 日用《大苦闷与新革命运动》为题，综述“我们需要这个运动”的主张。在这当中对“社会上冒用中间派之名而不走中间路的先生”也有所指责，认为这些人的行径会断送中国前途的生机。最后希望中国的“中坚知识分子”团结行动，以英国“社会主义工党”为榜样。还说：罗斯福的“新政”在他死后的今天，才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谋团结再起以遂其志。中国的条件比人家差，需要的苦干精神自然更高，所以“我们的革命运动决不是一件可以急切速成的事业”。于是总结“我们”对时局的态度说：“我们今天对于什么和谈和并无中立性的什么政盟（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引者注）之类，已完全丧失期待之想而不感兴趣。可是，假使国共两党还能暂时量力而苟和，我们也并不反对，因为这也许是培养新生革命力量诸多条件之一。最后再说一句，我们的希望是温和的中国新革命运动的成长！”

以成舍我为代表的这批自由分子认为，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实际上是“冒中间派之名而不走中间路的先生”因而“新生革命力量”不包括他们，而只能是像他这样真正“超党派”的“中坚知识分子”。1949 年，随着他绝望逃往香港，“第三条道路”，连同他所倡导的“世界主义”一道终告灰飞烟灭。

第八章

“人文论政”与自由主义的 终结

第一节 历史大变局中的 参政豪情与悲剧落幕

一 三种参政模式中的最佳选择

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演进史上，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

非常重要和特殊的时期。其显著的标志是：民间自由主义报业在抗日救亡民族情感和大无畏牺牲精神的支配下艰难地发展着。在这个历史大变局的十年中，前一个五年，自由主义报人着眼于民族大义因此不能不服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战时原则。这种特殊的情形不是简单地用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在自由主义报人那里，坚持和发扬民族气节与坚持和恪守自由主义情操并不是矛盾的。惟有不同的是，其时，民族精神彰显使自由主义处于潜隐的状态。张季鸾的“外圆内方”即典型地道出了这种特殊的情状；后一个五年，由于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矛盾迅速上升并呈现为尖锐的冲突状态。在这种冲突中，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文人论政”作为一面高扬着的自由主义旗帜，在战后宪政浪潮中显得十分醒目。

在自由主义者的理喻中，历史的机遇来到了，尤其是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事实上，此时极权主义已成为保守主义的显著表征——笔者注）对峙的夹缝当中，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怀抱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的自我期待和自我欣赏的豪情壮志。这是因为，“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段落里，他们只能处于社会边缘地带默默地积蓄自己的能量”，而到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得到这种特殊的历史机遇的刺激，他们“蓦然产生了参政的狂潮，发展成一股波澜壮阔的自由主义运动”^①。可以说，从西方自由主义观念引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这个运动就一直在暗中积蓄着能量，艰难地找寻着它的“自由”喷发口。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由

^① 许纪霖：《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第38~39页。

于西方社会思潮的大规模东渐，促使中国的现代化焦灼日益强烈。从这个世纪之初开始，中国的社会经济逐渐打破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一大批以创造和传播抽象符号系统为己任的自由职业者的出现，使中国的知识阶层“第一次从政治系统中剥离下来，崛起于民间社会，这就为知识精英参政样式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的空间”^①。截止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参政已形成了这样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个人身份进入官方政治系统成为职业官僚。这些自由分子的初衷是楔入官方系统，使政府中的“好人”逐渐增多，借以推动官方政治朝“好人政府”的方向转变。可悲的是，由于角色的转换，这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几乎全被官方政治所消解，其中学界人物如翁文灏、蒋廷黻等人，报界人物如陈布雷、吴鼎昌等人就是这一悲剧的最有力的证明。徐铸成关于自由主义者就是“独身主义者”的形象诠释，即来自于对这种悲剧的深刻反省和觉悟。第二种是坚持以本朴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留在民间，与官方系统和党派政治保持距离，而通过“文人论政”的方式批评官方政治和党派政治、鼓吹个人自由和民主宪政，在他们看来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对此傅斯年曾有个精彩的说法，他认为：“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②以《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世界日报》等为代表的民间报业之所以特别执着于这种选择模式，的确与他们的价值信念以及对官方政治、党派政治同

^① 许纪霖：《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 12 月版，第 38～39 页。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70 页。

化、消解的高度警惕有关。第三种模式就是自由主义者联合组党，试图以独立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强行打入政治系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不少自由主义学者和报人按捺不住这种参政模式的诱惑而大规模加入“第三种力量”。这种来自政治乌托邦激情的悲剧选择尤其耐人寻味。

虽然自由主义者的这三种参政模式，其结果都逃不脱悲剧的命运，但除开被极权政治系统所消解的第一种模式，事实上真正恪守自由主义立场和本分的只有后两种模式，即采取民间办报和自由分子组党的方式来保持其独立性和挑战性。因此，抗战胜利以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实质性展开就是从这样两个层面体现出来的：第一个层面是直接组党参政。据统计，截止 1946 年，在民间组党狂潮中，至少有近百个政党在国内外宣布成立或公开活动。其中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组成的政党组织颇著名者就有如下一些，它们是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中国农民党等。1945 年 10 月，民主同盟临时大会的召开及所通过的政治报告和行动纲领，“可视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大宪章”^①。民主同盟不仅公开宣布要牢牢“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②，而且还以中国的“第三大党”的身份雄踞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前卫序列。自由分子民间组党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史上，其文明意义是非同凡响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政治和文化的颠覆性意义的。“中国虽有士大夫政治的悠久历史，但由于‘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根深蒂固，向来匮乏反对党的政治传统。历史演进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 1 卷，第 588 页。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7 页。

国知识分子的参政形式从个人清议、进谏、入阁发展为大规模组织反对党，不啻开拓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全新格局。”^①第二个层面上展开的自由主义攻势亦同样是相当强劲的。这就是采取民间办报的手段，通过宣传与自由主义有着亲缘关系的民主和宪政意识形态以及呼吁对官方政治实行监督、批评的制度建设等，竭力从舆论和立法的层面促进时局朝着有利于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据统计，仅 1946 年，在国民政府辖区之内正式登记注册的报刊杂志就猛增至 984 家，加上原有的民间报刊，其总数高达 1832 家，而新登记注册的大多为由自由分子主办的时政类报刊，“这表明大众传媒和读者群的某种心理倾斜”^②。民间办报与民间组党在参政狂潮中相互策应，彼此唱和，形成了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

为了阻止和击退自由主义向极权主义的挑战，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向自由主义组党力量施加强硬的政治压力，不允许其继续存在，终于导致民主同盟在 1947 年 11 月宣布“自动解散”。到 1948 年以后，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重要成员都处于流亡的状态。他们大部分聚集在香港等国民党鞭长莫及之地，恢复组织，进行活动，并干脆宣布放弃“中间路线”，积极“向左转”，直至投奔到解放区。他们从这一个层面上宣告了自由主义的终结。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也加大了对民间自由主义办报的打击力度。1945 年 9 月，国民党即颁发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的法令，并借此迅速恢复和扩张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其中在报纸方面很快建立了以《中央日报》为首的党报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四个部分组

① 《中国现代化史》第 1 卷，第 588 页。

② 1945 年 9 月，《华西晚报》等 10 余家报刊的联合声明。

成：其一是中央直属党报，其二是军队党报，其三是地方党报。这三个部分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巨大的党报控制体系。最精彩的是其四：“民间党报”。这种以国民党党员“个人名义”出版发行的“民间党报”明显是针对自由主义者的民间报纸而展开的一种狡猾渗透和遏制攻势。当然，国民党对民间自由主义报业的残酷打击，主要是通过野蛮无耻的新闻检查制度和报刊封禁手段来显示其专制威权的。1945年8月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的出版，拉开了民间报刊拒检的序幕。以此为契机，国统区的《宪政》、《国讯》和《中华论坛》等16家自由主义刊物联合发表声明，宣布不再送检。这一举动迅即得到国内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报刊的支持和响应。他们表示要“共同高举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①在强大的反抗压力之下，国民党政权被迫宣布废除法西斯新闻检查制度。但是，随着军事上失利和自由主义浪潮的高涨，国民党政权在走向穷途末路之际更露出了其狰狞可怖的极权主义面目。在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的同时，仍强行宣布《修正出版法》和《新闻记者法》的管制法规有效。1946年，有195家民营报刊被查封，有47名记者被缉捕；1947年5月，仅上海就有包括《文汇报》、《新民报晚刊》在内的三家民间报纸被查封；1948年，封禁报刊、逮捕和枪杀新闻记者更成了国民党的特殊嗜好。《大公报》、《新民报》和《世界日报》在这期间所遭到的极权政治的打击，终于导致了这些民营报纸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导致了王芸生、徐铸成、陈铭德、邓季惺这样的铁杆自由主义报人的被迫“向左转”；成舍我、胡政之这样的自由主义报人的新闻

^① 1945年9月，《华西晚报》等10余家报刊的联合声明。

托拉斯梦幻的破灭，集中发映了自由主义在与极权主义的对抗中走向式微的历史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二 请来拉斯基与“第三条道路”的破产

然而，在这个血火交织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的贡献却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在推动中国民间自由主义报业长足发展的历史行程中，张季鸾、胡政之是必须浓墨重彩予以描画的重要人物。他们不完全是“五四”的精神产儿，他们亲近自由主义，既有着渊深的中国古老政治文化的“文人论政”背景，同时更有着假道日本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强力支持。他们在早期既是有着浓厚激进革命倾向的民族主义者，而在中后期又是有着明显倾向于英美政治文化模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既继承了英敛之旧《大公报》在言论上的“大公”和独立的民间立场，并最终完善成为“四不”原则，又接纳了英美自由派，特别是以拉斯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体系，糅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政治思想理念，而锻造成了具有醒目的“中国特色”的民间报业思想体系。

和前辈自由主义报人相比，张季鸾、胡政之等人在接过“文人论政”的旗帜、开创全新的民间自由主义报业局面的进程中，并不完全是在等同和复制谭嗣同和康、梁的模式，而是在深刻反省和总结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表现得更加理性和智慧；尤其是在思想和德行方面，在经营才干和办报经验方面，都较前辈自由主义报人更为突出，甚至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这些勇于传承薪火，并努力将其

光大而烛照人间的人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抑或近代意义上的那种只会撰写立意高深、只供精英知识分子阅读的“政论”文章的党际文人，而是现代国家意义上，特别是现代民主意义上的民间报人。他们不仅能娴熟地撰写大量的、站在民间立场上且饱含自由主义精义的通俗时评，而且，他们还精于企业管理，会熟练地运用现代经营手段大胆改革报务，积极投身市场竞争。他们深知，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一个先决条件，民营报业要恪守其独立于党派之外的民间立场，不受任何政治派别的豢养和操纵，没有经济独立作为强大的支持基础，只能是一句空话。

真正称得上“五四”精神产儿的，是王芸生、陈铭德、邓季惺、徐铸成、储安平、王造时和萧乾这些更年轻的自由主义报人思想家和实践家。“五四”之后，剧烈的政治动荡和思想分化，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向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归属。他们中的精英分子一部分转入了国共两党，投入到激烈的政治纷争之中，包括像胡适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人物，也在“好人政府”，的梦幻驱使下，放弃“中立”，亲近政府，出谋划策；另一部分，或继续立足民间，坚持更本朴的自由主义立场，或主动或被迫脱离了激进主义而进入了民间阵地。没有英美留学经历的陈铭德就是在北京受到“五四”的深刻影响，抱着办一张类似西方的“自由报纸”的信念，而“埋伏”在民间、开始艰苦创业的一个典型。由于经济的缺乏独立，因而被迫在政治上受到地方军阀的掣肘，其曲折痛苦的心路历程，较之同时代的许多民间报人，更有其难言之隐。而王芸生由激进主义者和左翼工会组织者、宣传者被抛出血腥酷烈的党争轨道，尔后转变为一个铁杆自由主义者的奇特经历，似乎更显得有历史的探询意义。这个被张季鸾先生视为最得意的传人的年轻主笔，与

另一个同样被张先生视为传人的年轻总编辑徐铸成，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民间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有过极为出色的自由主义表现。然而，王芸生后来所受到的政治礼遇以及因这种礼遇所带来的无穷困惑，似乎远比徐铸成的故事更为精彩和耐人咀嚼。比他们更为年轻的储安平 and 萧乾，或许是因为有着更为直接的英美自由主义血统，有着更为纯粹执着的自由主义追求，所以，他们不仅有着更为学理化的原则性，而且更表现出书生气十足的道义的顽强性，甚或还有着更为文学化的浪漫倾向。这样，无论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的自由主义宪政参与狂潮中，还是在新政权旗帜下的新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处处都显得是那样的“不合水土”。但，诸安平的冲冠一怒毕竟又和许多的自由主义者拉开了相当的距离。这对我们来说，都非常具有研究和玩味的价值。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储安平、胡政之和王芸生显得相当重要。储安平创办的《客观》和《观察》周刊，特别是后者，之所以能与前辈自由主义报刊，如《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再生》、《主张与批评》、《独立评论》等比肩而立（当时在南京由张纯明主编的《世纪评论》，可以说是与《观察》相伯仲的一本影响较大的自由主义刊物。它明确宣布：“本刊的立场是超然的……我们审察中国现在的环境，感觉自由主义尚有提倡的必要。”），之所以能在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报刊中雄踞前锋，不光在于储安平本人的自由主义思想水平和透视能力大大超过了许多前辈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是在这本里程碑式的刊物后面，集结起了自中国产生自由主义思潮以来最强悍和最庞 然的……我们视能 超悍诤辈自

云集了一大批最著名的自由主义作者，以坦率、公允和智慧的笔调吸引了全国大量的知识分子读者，销量从 400 份迅速上升到 100500 份，左右着舆论界自由主义运动的风向。”《中国现代化史》的这段评述，可以让我们充分领略到《观察》在历史中的思想分量。同样在自由主义运动演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还有《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民报》等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突变。1948 年 1 月 8 日，《大公报》破天荒地公开打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号，在题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的社评中，这张民间大报情绪激昂地宣称道：

在举世巨齿獠牙、草木皆兵的今天，夹于左右红白之间有一簇难以分类的人物，通常称作“灰色人物”……因为“灰色人物”们反对追随两极化的世界潮流，有人又以“中间路线”来形容其主张。……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

为了表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存在的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同时表明其特立独行的观念品质，它又向中国社会公布了它的“五大基本信念”：

- 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
- 二、相信理性与公平，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
- 三、我们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
- 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
- 五、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革并驾齐驱。

事实上，这篇惊世骇俗、且招致“左右”不满的“自由主

义”宣言，其真正的作者就是长期充任该报旅英记者的萧乾。萧乾受过系统完全而且严格的英式教育，也对英美的政体及其人文背景有着细致深刻的了解，属于世称“英美派”的那种自由知识分子。这一派的重要人物在当时还有潘光旦、罗隆基、储安平等。“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是英国两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素和拉斯基。尤其是拉斯基，在中国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灵魂”^①。因此，胡政之和王芸生授意萧乾撰写这篇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就是极为自然的了。

稍知战后中国知识界思潮衍变轨迹的人都知道，当时，胡适、傅斯年等与权力中心非常靠近的一批上层知识分子，即“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中国应走“英美道路”的时候，以张东荪、张君勱和罗隆基等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却明确地打出了“第三条道路”，或曰“中间道路”的旗号。其中，张东荪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文章中表示：“中国必须在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上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对这种意见，《观察》周刊和《大公报》是极为赞赏的。

公开扬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公开宣称走“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件惬意的，或充满浪漫情调的好事，《大公报》深知这一举动将面临的种种风险和尴尬。在另一篇题为《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的社评里面，在告诉人们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特殊地位和处境的同时，再次重申了它的执着信念：

^① 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读书》杂志 2000 年第 1 期，第 39 页。

大公报不属于任何党派，它的地位是独立的，却不是一般所谓的“中立”。大公报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作风，大公报同人信奉自由主义；我们无大野心，却有极大热忱，愿为国家建设做些填土工作^①。

《大公报》自始至终奉行“国家中心论”。虽然它也知道，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肉搏厮咬正酣，根本不会理会它那书生气十足的唠叨，但是，它举着那面悲怆的自由主义旗帜，在“第三条道路”的入口认真打量的表情，却给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探询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来说，《大公报》“请来”了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教授，这件事非同小可。尽管拉斯基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中国新闻界的异样感受，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其意义却是不可小觑的。

在20世纪上半叶，杜威、罗素和拉斯基，是三位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英美思想家。

杜威和罗素都到过中国，并到处演讲，其思想和学术风采给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因此被许纪霖称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教士”。而拉斯基呢，其足迹未踏上“东土”半步，尽管如此，却丝毫不影响其作为与杜威、罗素等量齐观的“大师级”人物，而被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仰望。他甚至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其感召力，或者说煽惑力似乎都非杜威、罗素能望其项背。所以，许纪霖先生大为感叹地介绍说：至于拉斯基，虽然没有来过中

^① 《大公报》1948年2月6日社评：《政党、和平、填土工作》。

国，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实际影响要远远超过杜威和罗素。现代不少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如罗隆基、陈源、王造时、储安平、蒋廷黻、吴文藻、杭立武等留学英（美）期间，都是受拉斯基亲炙的学生。张君勱虽然留学的是德国，但他自认政治思想是英国的，对拉斯基最为崇拜，将他看做是洛克、边沁和密尔之后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正宗传人^①。

拉斯基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除了“亲炙”罗隆基等人以外，还通过他的著作对这些“弟子”之外的更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发挥着感召和煽惑作用。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就先后翻译出版了拉斯基的三部最重要的思想学术著作，它们是：《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政治典范》和《共产党批评》。这三部书的译者分别是中国的“自由分子”张君勱、王造时和黄肇年。另外还有一本由丘辛白翻译的拉氏的《政治》也曾在30年代初经新月书店出版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当然，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大规模介绍拉斯基是在40年代，主要是由以《观察》为代表的各种时事政治批评杂志，作了大量的系统的译介。以《观察》为例，它的许多言论几乎就是拉斯基在中国的翻版。《大公报》在这个时期与拉斯基邂逅，并且在精神深处产生共鸣，确是一件非常自然、非常有趣的事情。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热情而颇有深意地接纳了拉斯基，确可堪称是件重要的事情。拉斯基试图通过某种努力，来使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战后的中国达到“亲和”。当然，他对这种极类于乌托邦的玄想在中国是否能实现缺乏把握。我们完全可以

^① 参见《读书》杂志2000年第1期，第42页。

从他对中国命运的仁爱忧戚的语调中充分体会到^①。

在历史大变局的最后关头，以《观察》周刊、《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民报》为代表的民营报纸的急速“向左转”就深刻地说明了国民党专制主义是如何地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了自王韬开始的自由主义新闻实践是如何地不合中国的“时宜”。国民党的统治崩溃了，但是，除了储安平等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自由主义报人并不知道，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在思想的暗穴里，他们将被严密地封存起来。

但是，储安平、王芸生等人的悲剧无论如何都要比王韬、谭嗣同等人的悲剧更为复杂和费解，其个中缘由恐怕就在于他们作为自由主义最后的牺牲，亲自目睹了自由主义和他们自己的全军覆灭，以及被葬入历史坟场的整个凄怆的过程。

第二节 胡政之：“东方《泰晤士报》” 之梦的破灭

一 生平及思想简述

胡政之的自由主义脾性使这个人在风格上与张季鸾的“外圆内方”迥异。作为《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他，其傲然崛起有似被暗弹“清算”了的史量才先生。张季鸾去世后，胡政之

^① 拉斯基：《对于中国胜利展望的一些感想》 参见《大公报》 1944年10月8日，星期论文专栏。

便与“领袖”处于若即若离状态。蒋介石每每念及张季鸾即喟叹不已，原因是“胡太不听话”！

胡政之早年即以“冷观”的笔名频频撰文于《民立报》，开始其“文人论政”的自由主义报人生涯。他所自诩的“冷观”并非什么隔岸观火、不痛不痒之类，而是后来储安平等“自由分子”谓之“客观”的那样一种独立傲岸的精神姿态。他认为，中国的民间报刊“原则上应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之为社会的活力，不在于位高爵显，不在于财富倾城，而单凭了他们见解深阔，勇气磅礴……必须脱去沉默旁观的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

余英时先生所激赏的古希腊知识分子独立昂扬的精神风貌，正是胡政之先生所企望于知识分子的至高境界。余在论及古代希腊知识分子的精神风度时，是这样评价的。他认为，这些高雅的人们不是为了求生活而去找知识。这与胡政之的见解有惊人的相似，胡一再告诫同仁，绝不能将办报视为一种职业，而必须将其视为有益社会人生进步、有助于民主自由前行的事业。不是为了生活而去找知识，这就养成了优良的学风，保障了知识的纯粹性。余英时还认为，古希腊知识分子大都热心于政治，但政治对于他们只是一种社会活动，乃至是他们思考的一种对象。他们并不将政治作为个人惟一的出路，因而保证了他们对政治的独立的个人立场，保证了他们始终能以健康的公正的社会立场去批评政治及一切社会问题。其实，这一种特质在胡政之和“大公报人”身上也是凸显的。

胡政之一生的梦想是将《大公报》办成像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自由主义大报。

他在生命的最一刻，还为中国自由主义民间报业的前途而失声恸哭。他知道自己的大限快到了，但《大公报》却应重新开始。然而他并不知道，这时，同样被苦痛折磨着的王芸生，正在等待着某种不期而遇的“浪漫”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胡政之是悲剧的，但却又有正剧嘎然而止的干净利落，一点也没有王芸生那样的拖泥带水的大尴尬。

胡政之（1889~1949）原名胡霖，生于四川成都一个“旧官僚”家庭。其父胡登崧是甲午（1894年）科举人，后捐官安徽和县。1894年，他随父亲出川到了安徽天长县，在那里，先在私塾读了几年儒家典籍，后进入安徽当时最负盛名的新式学堂——地处安庆的“安徽省高等学堂”续读。在这所学校里，他第一次接触到自由主义大师严复的《天演论》，以及大量的西方科学和人文著作；而从长江下游传递来的《新民丛报》、《苏报》和《申报》等鼓吹革除中国衰朽政治的“进步报刊”，则使他变成了一个思想和行动均呈现激进色彩的青年学子。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报刊自由主义言论深深地启迪和影响了他一生的职业和精神选择。1907年，胡政之自费赴日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主攻法律。这使他在日后的报人生涯中，能始终居于人权和宪政的法律高度来阐释和捍卫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日本，他曾与同乡吴鼎昌一道去拜谒过孙中山先生，并与张季鸾结为至交。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回到上海办律师事务所，但不久便关门大吉；1912年，进《大共和日报》任日文翻译，同时被于右任延揽，与张季鸾一道襄助《民立报》编务并兼任“中国公学”法律教员。1913年起，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1919年，他受友人王揖唐资助，代表当时安福系的机关报——《大公报》去采访巴黎和会。其后游访了英、法、德、意和瑞士诸国，历时两年，对西

方新闻界的言论自由体察甚深并心向往之。回国后，他与林白水一道先后创办了《新社会报》，不久又去上海创办了国闻通讯社。1924年，安福系垮台，胡政之不再受军阀掣肘，独立执掌了通讯社大权。1924年8月，在挚友李子宽提议下，他正式创办《国闻周报》，并使之一跃而成为影响中国政坛和自由主义大报。到1938年终刊前，该刊始终与《大公报》结为同盟友军。这份刊物的风格和精神向度，特别是在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与实践上累积的经验，对《大公报》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1926年9月，他与张季鸾、吴鼎昌接办《大公报》，梦想将该报办成像《泰晤士报》那样的自由主义“高级报纸”，并艰苦奋斗了20余年。张季鸾病逝后，《大公报》的社务和笔政一直由他和王芸生主持。1948年，在中国自由主义者憧憬中的“第三条道路”宣告失败后，他拼尽最后力气亲自赴香港恢复出版了《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4月14日，在病痛和世事亟变之交相抑迫中逝世。

二 舆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

胡政之早年主持《国闻周报》时就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可以这样说，没有《国闻周报》时期的胡政之，就绝不会有《大公报》时期的胡政之，甚至可以极端地说，就绝不会有《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的顽梗和彻底。《国闻周报》是他打出的第一个“自由主义”险球。《国闻周报》的发刊词由胡政之亲自撰写，可视为中国现代的一篇较早的“报刊自由主义”宣言。他说：

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

逾古昔……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此同人所由三年以来屏除百务以从事通信事业，盖欲搜罗社会各方之事实，一一写照于国人之前，以供其自由判断而为构成真正舆论之资料……

在这篇“宣言”中，他还着重叙及自己十多年来致力于进步的甘苦，反复强调“真正的舆论之资料”对国民自由选择、自由判断、自由批评的重要性。这和约翰·弥尔顿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以及“自我修正过程”的观念简直是“不谋而合”的。《国闻周报》无疑是一块早期的“自由主义”的演练场地。胡本人为其撰写了大量批评时政的文章；吴鼎昌亦以“前溪”为笔名撰写过大量的经济论文。最值得注意的，像胡适、潘公展、黄炎培、马相伯这样的“自由分子”，也为该报经常撰写介绍各种社会思潮、针砭时政的文字。当然，由于军阀政治的阴影穹盖，其“自由”亦非常有限，甚至非常局促。另外，必须提及吴鼎昌对《国闻周报》窘厄时的无私解囊相助。每当胡政之心灰意冷时，吴都从经济和政治上鼓舞他重新树立起自由主义的信心。

胡政之一生梦想中国能成为英美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他始终坚信，舆论自由是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的起码前提。早在《国闻周报》草创时，他即在《国民对于大局采取之态度》的时评中发表意见，认为国家政治糟糕，当权者要负责任；国民政治觉悟不高，其责亦在当权者滥设牢笼、在舆论受压制。他说，“今人政，本系以民意为背景，而民意的寄托，又在公是公非之舆论”，而舆论为权势者私家把持，国民安能自由，安能不蒙昧！

就像所有的自由主义者易被人们误解一样，胡政之有时被人理解为“左倾”，有时又被人指责为“反动”。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事件”，胡政之愤而撰文责问那些枪杀学生的屠夫：“学生们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尚不得而知。假如是共产党人，从公理和法律上来说，也没有格杀勿论的理由。何况枪弹无情，一排枪下去，学生、工人、商贩、过路的，胡胡涂涂倒下许多。这是什么理由呵……”^①

当时，上海的报纸不少，但绝大多数都“反应异常迟钝”，作呆傻状。故政之痛彻心脾，于是忍不住冷嘲热讽道：

有人说这几天上海人心的激昂和报纸的冷静，几乎是反比例，因此很不满意上海报界。安晓得大凡住在乡下的人高兴起来，骂总统，诋政府，尽管随便乱说，无人出来干涉。但是，对于眼面前的乡约、地保、县差、团丁却绝对不敢丝毫侵犯。上海报界之冷静，正和乡下人不敢得罪地保们的情形一样，却是越可见静穆的悲哀，才真是彻骨的苦痛^②。

是胡政之迂不可耐吗？他难道不知道，在人的生命权都无法保障的国度里，言论自由不是显得太奢侈了吗？自由主义者严格地讲，都是这种迂不可耐的人。在中国，这种不知悔改的“迂”，将使他们陷入万劫不复的窘境。胡政之此时如此“左倾”的表现和他在20年后的“右倾”表现相映成趣，党际之争中的人们是绝对看不清他们的“真实面目”的。

① 《国闻周报》1925年第2卷，第21期。

② 《国闻周报》1925年第2卷，第21期。

胡政之在《国闻周报》期间像个唐·吉诃德，独自持戈苦战了整整 14 年。由于他的自由主义顽梗，该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当时名气很大的《东方杂志》。20 世纪 20 年代报刊虽多，但大多囿于文学的“牢笼”，纯粹的时事政论报刊相对非常少，因此，这个唐·吉诃德的引人瞩目就极为自然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像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这样的自由主义报人，以及沈从文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都是从《国闻周报》的“温床”上生长出来的。

“胡政之的性格是多方面的，同样，他的才能也是多方面的。他善于交际，在军阀圈子里兜得开；除了能说日语、英语外，还能看懂意、德两国文字的报纸；他采访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巴黎和会、马厂誓师，有过很多的新闻采访实践，而且阅历很广；他除了写得一手好政论外，每次外出总要自己动手写通讯、拍照片，还会使用电码；他还能独立编排整个版面的新闻；就是对于副刊，也并不外行。胡政之早年精力充沛，办事十分得心应手。在民初的记者中，邵飘萍、林白水是笔力潇洒，洋洋自如，但终缺少他这样的韬略。……”^① 这些描述不啻于天方夜谭！尤其对于日后报界不少顶着“总编辑”之类的头衔却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混世高手来说，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自由主义的报业尤物！胡政之的知识结构、才能结构、业务结构，乃至整个作为“自由分子”的人文结构，有力地支持着他的自由经营和自由批评，否则，《大公报》的自由主义不会比其他的现代报刊走得更远。

不仅如此，胡政之和张、吴二人还将自由主义原则贯彻到社内，李纯青深有感慨地说：“大公报任人唯贤，不任人唯亲，

^① 《大公报报人忆旧》第 313 页。

这是一个企业成败的主要关键之一……胡政之颇能兼容并收，不拘一格……大公报内部有一定的自由空气，各人可以各言其是，无所顾忌。编辑、记者思想不必走钢绳，因而就缺乏产生八股文的土壤。’^① 尽管《大公报》的编辑和记者人数不多，但他们能团结国内外的许多通讯员，使重要消息能及时获得。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例，当时在美军的舰船上，在英国蒙巴顿元帅的坦克里，在赴缅甸参战的中国远征军中，均有《大公报》的记者随军采访，其营构的国际国内通讯网之强大，连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如《中央日报》，亦不能望其项背——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不难发现胡政之自由主义经营方略的强大生命力。

三 “中国报是文人论政的机关”

胡政之一直梦想把《大公报》办成一张像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的《卫报》那样的能充分体现“报刊自由主义原则”的民营大报。为此，他不仅借鉴了《泰晤士报》和美国早期通讯社在组织、人事、发稿、通讯等方面的经验，而且大为赞赏美国报业巨头霍华德、斯克里斯普等人的经营方略。他曾暗暗发誓要彻底改革中国的新闻机构，使之真正成为“国民的喉舌，社会的缩影”和“国之锐器”。在《作报与看报》中，他充分考察和思考了中国实践自由主义的困难，从而提出了这样四大方略：其一，他认为，“中国报和外国报的发达程序差不多，亦即大致经历了如下一些阶段：先有政治性、革命性，之后才渐渐商业化；先以记者个人名望权威作号召，之后才以报纸内容取胜；先是三五人的同仁集团，之后发展成为报业公

司；先是少数人的报纸，之后才是越来越大众化的读物。”其二，胡政之认为，“报纸因为是商品的关系，所以竞争性很厉害，一方面是人才的竞争，同时也是资本的竞争，不过如果同一资本而怎样去运用，却要看人才如何而定。”因此，他格外重视去发现和挖掘各方面的人才，用自由主义的兼容风度迎纳各路才俊，坚决不介绍亲友、同乡和熟人到社内。他亲手制定的人才录用管理制度、奖金制度、高薪制度等等，都充分展示了他经营优势。其三，胡政之体会到，“报纸生活根据，原建筑在广告与发行两方面上的。英美国为资本主义发达，所以报馆并不多，大部分依赖广告费生活，大陆诸国，广告较差，就只好依赖广告的收入双方均匀维持。事实上，《大公报》的广告所占版面相当多，但由于它持守民间立场，坚持自由主义原则，因而发行量大，故商家百姓都愿刊登广告，而不惧其价位。其四，胡政之还充分认识到，“报纸是文化的工具，乃天下之公器，非作报的人所得而私，同时政府与国民对于报纸也应当尽力调护，使它能够生存发达，无忝于文化工具的使命。”虑及中国报人的险恶处境，胡政之心有隐痛地写道：“现在文网严密，法令滋多，作报的人毋宁要‘有闻不录’，遇到良心上不能不说的事，也只能在字里行间呻吟咏叹，予读者以暗示。”总之，不能丢弃良心和“自由分子”的责任。

1949年他辞别《大公报》时，正值他的六秩寿辰。他去世的那天，《大公报》头版刊出了具有讽刺性的消息：《和谈进入正式阶段 双方讨论核心问题》。他去世的翌日，《大公报》上海版全文刊发了他在1943年祭奠张季鸾先生的文章《回首十七年》，内中所暗含的悲慨与壮烈，非自由主义者不能体察和触摸到。他没有像王芸生那样——带着喜剧的面孔走进一个全新的舞台，结果却扮演了一个真正的悲剧角色……

李纯青先生提醒我们：

光说张季鸾一人是不公平的，胡政之对《大公报》的贡献不下于或者说大于张季鸾，他主持《大公报》时间也比张季鸾多出七年……

1940年5月10日，距密苏里大学颁奖前整整一年，《大公报》的社评《上层知识分子的责任》，即集中反映了胡政之的独立精神。社评说：“今日中国智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

当然，考虑到能团结全国上下精诚抗敌，社评中同时亦说了些诸如“我们希望各负责当局，能仰继领袖恢宏之襟怀，广采舆论，虚怀接受，善为疏导”之类的真假杂糅的套话。但对“上层知识分子”亦即“绅士”阶层的自由期待却是相当急切的。

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中坚，都在艰苦卓绝地为民族解放、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的可能性而奋斗着。

1941年5月15日，是胡政之和全体大公报人无比荣耀的一天。这一天，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新闻荣誉奖章”，报纸也在同一天被“国联”推选为全世界最具有代表性中文报纸。而在此之前，获此殊荣的东方报纸，只有日本大阪的《朝日新闻》一家，所以这个日子不仅感动着大公报人，而且也感动着当时中国的新闻界。在陪都新闻同业人举

① 《大公报人忆旧》第311页。

行的庆祝会上，胡政之和张季鸾共同向美国公众发表广播演说，题目就叫《自由与正义胜利万岁》。早年曾作为“自由分子”的老报人于右任应邀致贺词——《荣誉之大公报》。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理解、感奋和期望都可从这篇热情迸射的演说词中真切地感触到。于右任说：

方今天下汹汹，民主阵线与独裁者，正在全世界澎湃动荡之中，作殊死之奋斗。言论自由之命运，将与民主政治共其兴亡，我与英美应负共同之责任。今者美国新闻最高学府密苏里大学以最高荣誉之奖章，赠予我之大公报，其意盖可深思，《大公报》勉之！全国报界勉之！^①

喜极而愈勇。《大公报》当即发表社评——《本报同人的声明》，再次借这个机会向中国社会各界以及全世界重申：

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②

“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这不仅是胡政之等人一贯的办报思想和自我角色定位，而且也是承袭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乃至英敛之的办报思想且弘扬光大的大公

^① 于右任：《荣誉之大公报》见《大公报》1941年5月15日。

^② 《本报同人的声明》见《大公报》1941年5月15日。

报特色。倘若还要深加追究，甚至可以找出他们远溯的古代士人，如黄宗羲、顾炎武、东林党人和复社先贤等等。“文人论政”，是胡政之引以为自豪的自由主义本色。据徐铸成先生回忆，“张季鸾、胡政之两位，他们在天津时期，就以大阪《朝日新闻》作为学习榜样，而自诩为东方的孟彻斯特《卫报》”。但是，胡政之又始终觉得，这些他理想中的资本主义报业的政论，还不及“中国报”的“文人论政”来得精彩。

还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1944年，胡政之作为“中国友好访英团”中的“无党派社会贤达”成员去英国采访丘吉尔，同时又以“民间报纸”实业家的身份同英国报界交流两国报人的自由心得及经验。尽管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英国的《泰晤士报》钦佩不已，但还是认为他们不是纯粹的“文人论政的机关”，因此隐隐有些遗憾。胡济生先生说，那次回来，“记得他对我说：‘英国一般人士知识较高，具有绅士风度，严肃拘谨，言不及私，颇似中国的士大夫。’”，他认为，如能将这种“士大夫”的风格运用于报纸的社会批评，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的“上层知识分子”论政、刺政，乃至“选政”的机关，那就更是妙不可言了。李侠文先生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京、沪两版次第恢复，胡先生载誉重返京沪。有一天，“他对我说：‘这张报纸的影响不下于一个政党，你看办报是不是很有意义？’”^①

四 “报纸是千秋万世的大事业”

1945年春天，胡政之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到美国参加制

^① 周雨：《大公报报人忆旧》第264页。

定《联合国宪章》后归来。在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各方面都很重视他这位“中间路线人士”，尤其是美国特使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他们迫切希望胡政之能出面联合上层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共同参与国政。胡汗漫奔走，徒劳无功，知道内战必不可免。有一次，他对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说：“你们要改变蒋介石是不可能的，惟有打。”这和当时悲愤至极的储安平之口吻如出一辙。储曾怒吼道：“除非用枪杆子否则根本无法和国民党说话！”据胡济生回忆：“（父亲）曾对我说：‘中国的事情复杂难办，人们的社会世故深，难得真诚爽利，像马歇尔这样有世界威望的人物把纳粹打败了，可是在中国却栽了跟头。’美国人期望的中间路线人士迟迟不能出台，他们奇怪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大事如此淡漠。我父亲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知识分子不抓军队，而军队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①

最有意思的，是他对国共两党各自依靠美国和苏联很有意见。他说：“我们走自己的路，可以两面敲竹杠嘛！”董必武当时曾苦心劝他参加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我父亲却有自己的想法”^②。一个活脱脱不思悔改的自由分子的“死硬”形象跃然纸上，难怪国共两党都不喜欢他。可是，他的政治透视水平却是很高的。相形之下，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反倒显得书生气十足。

“我还要提醒诸君一声，就是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民主自由。假如中国是英国和美国，那我们还用得着‘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吗？一张报纸是一个千秋万世的事业。我们的前途是漫长艰苦、曲折多变的。在前进的时候，我们要有无比的自

^① 周雨：《大公报报人忆旧》第274页。

^② 同^①。

信、无穷的忍耐。我们要时时牢记着‘操心危，虑患深’这两句话，谨言慎行，敬业尽职……”^① 1949年7月，在重庆《大公报》报馆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胡政之这番话是针对一个月以前，国民党当局逮捕重庆《大公报》8名记者这一严重事件而说出的。

这以后，胡政之的心情一直不好，就像大多数梦想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分子”那样，他的心境和这个战乱中的国家的情形极为相似，一天天变得非常糟糕。他那种集悲愤失望与坚忍自信于一体的矛盾文字，隔三岔五地出现在《大公报》上。这年的11月，他又在《大公报》上感喟，并又一次表明他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痛心和茫漠。他的那种哭腔酷似古代屈原变时的“国土”，他说：“抗战以来，国事日非，仍然有许多人发议论、发牢骚、求痛快。我因办报多年，尚为国人所知，近十年来，也曾参预过国家政治，比过去更认清了中国政治问题的特质……”

说这是“国土”之哭，恐怕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胡政之在这里不是哭“党国”已陷入穷途末路——他没有胡适先生的那种复杂感受，而是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生不逢时”，为“新记”《大公报》20年独立生动的历史行将结束而惶惑不安。

这样复杂苦痛的“表情”，使他既不同于张季鸾，也不同于王芸生。

胡济生先生回忆说：“1941年，张季鸾先生在病中自重庆给他写信，说：大公报只有紧随着蒋介石才有前途。我父亲大不以为然。他说：吴、胡、张可以不办大公报，而大公报必须办起来，因为它是社会事业。张在抗战时期与蒋甚为接近，我

^① 胡政之：《报人自处之道》见《大公报》1947年7月12日。

父亲也不以为然，认为会失去大公报的一贯风格。张去世后，我父亲与蒋若即若离……据说，蒋每每喟叹思念张季鸾先生^①，其原因是“因胡太不听话”^②！可以说，在最严酷最绝望的历史关头，胡政之愈加恪守《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立场，所谓“穷且益坚”即此。他认为，《大公报》绝不是私人的财产，可以没有“吴、胡、张”，但作为“社会事业”和自由主义的阵地，《大公报》必须走出困境，以延续它的生命，因此他始终对“党国”频频递来的秋波连正眼都不瞅一下，更不用说有丝毫的动心了。

《大公报》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第二天即悲愤刊出《少残杀，少破坏》的社评，内中哀告道：“两年来，烽火连天，砍杀无数。我们甚愧挽狂澜无力，呼天弥战无门，旦夕悬念着生灵无辜，而受涂炭。大兵过后，极目灰烬之中，血肉模糊。为此我们曾本人类恻隐之心，常作不见谅于世的为人请命——祈中神放下屠刀。”这番苦心议论，执笔者当然是王芸生。但张季鸾之后的社评，始终掌握在胡政之手中，一直表现出十足的自由主义风格。而联系到头一天复刊时的“宣告”被人讥之为“书生之见”则自然是完全可能的。《复刊词》中称：

《大公报》沪、津、渝、港各版的言论方针是一致的。《大公报》名之所至，谤亦随之……现在的国家情形非常之乱，善良的老百姓夹在无休止的战火中，真是痛苦

^① 胡济生：《忆我的父亲胡政之》，见周雨编《大公报报后人忆旧》，第272页。

^② 同^①。

不堪言状……我们是民间事业，其艰难困苦当为识者所共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书生以文章报国的本心，恢复香港版，要想利用经济比较安定的环境，加强我们为国家和民族服务^①。

关于胡政之此时的痛苦“表情”，后来有人这样揣测：“第三条道路”美丽的梦幻终于被现实所消灭。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胡政之在自己的政治生命上打了一个钩……

五 言论自由建筑在经济自由之上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报人，胡政之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报刊政论家和组织家，而且他的杰出还凸显在其经营的原则和艺术上。《大公报》能一直保持其自由主义立场，除观念的支持外，胡的独立经营思想和策略，亦充分保证了自由主义的实践和贯彻。

他在忆及《大公报》初创时的经营情形曾说道：“先是我等三人决议之初，约定五事。……这差不多是我们创业时的宪法（即五条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引者注）”^②

平等与民主这些看似抽象的观念，在这个“宪法”中体现得很充分。在自由的关系上，张、胡、吴三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相互尊重的，而“不向任何方面筹款”、“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则是保障这种社内自由平等的先决条件。而令笔者感慨万端的，恰是这种以“经营”面目出现的

① 《大公报》（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

② 《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5月19日胡政之先生的回忆文章。

自由主义“宪法”，竟往往被许多研究者省略掉了。他们似乎不知道，只有对经济上（经营上）的自由的争取和捍卫，才有可能过渡或产生对政治的主动的自由诉求。

或许正是因为窥破了《大公报》的这种试图“自由”的心机，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盘的当权者都曾试图以巨款来收买和控制它。孔昭恺先生回忆说，1930年4月23日，军阀阎锡山的北平警备司令部一个处长突然约曹谷冰“谈话”，实际上是警告《大公报》。那家伙说：“《大公报》自某时期起接受蒋介石贿赂，自某时期以来言论记载偏袒蒋介石，又常有攻击阎总司令的言论记事，本司令部将来认为必须执行干涉时，即不宣布理由，实行干涉。”^①由于《大公报》向来坚持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原则，所以心中无冷病，当即在第二天不软不硬地予以回击。声明曰：“本报绝不变更其独立公正之立场，绝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地方政令虽愿遵守，至于官厅谅解与否，只有听其自然。”^②在邵飘萍和林白水之“殷鉴”未远的情势下，竟敢如此顶撞，可见胡政之等人因经济自由所涵养出的浩然正气。“阎锡山深谙以金钱买舆论之道，在山西不用说，在北平他就先后办了《新晨报》、《全民报》。此外收买为他作宣传的更不是绝无仅有……”^③胡政之他们对这种来自当权者的豢养阴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维护自己的自由主义尊严。

翻开《大公报报人忆旧》等文献资料，我们会明显地感觉

①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年12月版，第10页。

② 同，第11页。

③ 同①。

到，许多当年的报人，包括“自由分子”和“非自由分子”，他们对胡政之的钦慕，除了其政论家的独立傲岸风采外，更多的是针对其作为经营家的特立独行风范而生发的。李纯青先生在谈到《大公报》的经营自由与论政批评自由的关系时，说过一些意味深长的话。比如他说：

大公报经济独立，不接受政治津贴。在旧社会，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经济不能独立，向政治集团伸手要钱，它就必然要受到那个政治势力的支配，不能自由发言。言论自由建筑在经济自由之上。大公报工作人员不吃大锅饭，不端铁饭碗，不把报办好，大家都要失业。大公报报纸是一种在市场上竞争的商品，不是免费奉送的政治传单。^①

谈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的浅直涵义，李纯青深有感慨地又说：

这“四不”社训，照我个人理解，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报纸的弊窦，在中国确立一个新的办报方针。当时确有若干报纸是依附一个党派，拿津贴过日子，所以大公报决定不党、不卖。当时确有若干报纸是为个人或一部分人吹捧，只要达到目的，宣传上可以造谣生事，不择手段，所以大公报提出不私、不盲。^②

^① 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 312 页。

《大公报人忆旧》第 309 页。

张季鸾所谓“以本报为例，假若尚有微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执着商业经营，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面目”，究其奥妙，也就是指这种由经济自由所坚强支撑着的思想自由。为什么《大公报》“不许极左极右的新闻言论漏过政治的筛子”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在共产党处于政治和军事劣势，被国民党斥置为“匪”时，大公报在报纸版面上从不用‘共匪’、‘匪军’字样，只用‘共党’、‘共军’，它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而不是土匪。^①同样，在面对激进主义的暴力时，它坚决主张和信守自由主义的渐进原则，不惜背上骂名。它始终认为：“凡一个政党，都是为了争取政权而组成，所以政党要争取政权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而不应该以兵争……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

《大公报》将这种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立场表达为“尊重事实”，它对来自各方面的事实“不抹煞、不歪曲、不捏造，确实在向着这个目标（指所谓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原则”——笔者注）迈进”^②

胡政之在《作报与看报》一文中，还本着自由主义的原则，对中国和国外的报纸作了系统详细的比较研究。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需要好报，新闻记者就不敢不努力；社会各方进步，报纸也天然会随着改良，所以作报的人与看报的人，原本应该合作，而况报纸是一种商品，社会需要什么，它便不能不供给什么。”

① 《大公报报人忆旧》第 307、309 页。

② 《大公报》（重庆版）1945 年 11 月 20 日之《质中共》。

③ 同①，第 311 页。

六 一块动人的自由主义园地

胡政之和张季鸾先生除了坚持用社评鲜明体现《大公报》的民间特色和自由主义立场外，还开辟了在读者的，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影响相当大的一块自由主义言论阵地，那就是集中了当时国内学界和思想界名流为之撰稿的《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

“星期论文”专栏始创于 1934 年 1 月 1 日。在最初的几年里一直由张、胡二人共同掌握；1941 年张季鸾先生作古后，就由胡政之先生一人操持。

可以说，在储安平先生的《客观》和《观察》没有出现之前，《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几乎成了当时国内独树一帜的、具有最高知识水准和理性风度的自由主义园地。事实上，“星期论文”为以后储安平主办《客观》和《观察》不仅作了充分的作者队伍的组建准备，而且最值得欣赏的是，它还后者作了丰富的思想和经验积累。尤其是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它在胡政之先生的看护和培植下，更茁壮长成了一棵格外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大树。

据方蒙和谢国明先生回忆，“星期论文”这一设想最先是张季鸾先生提出来的。当时的用意有二：一是组织社外人士每周贡献一篇，以便减轻社评撰稿人的“负担”；二是有利于加强报纸与知识界的联系。另外，由于当时《大公报》的主要发行范围是天津地区，为扩大报纸在学术界和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所以特约北平的名教授撰稿无疑是上策。1934 年 1 月 1 日，报纸在要闻版中以显著的位置加框刊出了下面这则《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

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①

1934年1月7日，新年的第一个星期日，《大公报》刊出首篇“星期论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撰文者为胡适先生。此后，《大公报》的社评一改半文半白的面目，直接用白话来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星期论文”创辟时的八位撰稿人中，丁文江、胡适、翁文灏、傅斯年和蒋廷黻五人，都是《独立评论》的中坚人物，因此，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这个专栏的自由主义思想基调和组织基础。又由于张、胡二人特聘胡适先生为该专栏的主持人，所以，这些撰稿人又被称为是以胡适为首的“星期论文团”——由此，这个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团队就不能不格外引人注目了。

不光这样，《大公报》开办“星期论文”还是一个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自由主义事件，它表明，张季鸾和胡政之这类留学日本的自由主义报人，第一次认真地和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学人握手言欢，从而集合成了一股具有空前力量的民间自由主义阵营，自此开始，集中各方火力向中国现代的极权政治发起了新一轮凌厉的攻击。

“星期论文”实行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用稿政策，以言论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感召着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名流，队伍年复一年逐渐壮大。特别是在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辟后，重心南移，撰稿者更是扩大到全国范围。

^① 《大公报》1934年1月1日之《本报特别启事》。

根据《大公报报人忆旧》一书中的统计：从 1934 年 1 月到 1949 年 6 月，共刊出“星期论文” 750 余篇，作者多达 200 余人。下面是发表“星期论文”四篇以上的作者名单：

胡适（19 篇）、傅斯年（22 篇）、吴景超（15 篇）、陈衡哲（17 篇）、陶孟和（15 篇）、张其的（34 篇）、沙学俊（15 篇）、周太玄（15 篇）、何承信（16 篇）、谷春帆（31 篇）、伍启元（16 篇）、丁文江（11 篇）、黄炎培（20 篇）、方显庭（13 篇）、陈博生（10 篇）、王芑生（11 篇）、费孝通（11 篇）、蒋廷黻（7 篇）、翁文灏（4 篇）、杨振声（8 篇）、陈振先（4 篇）、任鸿隽（8 篇）、梁漱溟（4 篇）、张奚若（4 篇）、梁实秋（4 篇）、何廉（8 篇）、徐淑希（5 篇）、陈岱孙（6 篇）、吴俊升（4 篇）、陶希圣（6 篇）、潘光旦（7 篇）、秉志（4 篇）、张纯明（4 篇）、蒋方震（4 篇）、侯树彤（4 篇）、黄卓（5 篇）、蒋百里（5 篇）、陈之近（8 篇）、陈序经（4 篇）、郭沫若（4 篇）、陈豹隐（7 篇）、陈西滢（4 篇）、林同济（6 篇）、李烛尘（7 篇）、杨人梗（4 篇）、公孙震（4 篇）、吕复（4 篇）、萧一山（8 篇）、青山和夫（8 篇）、张道行（9 篇）、钱穆（6 篇）、章乃器（9 篇）、赵乃传（6 篇）、谢南光（5 篇）、蔡尚思（5 篇）。

余者，则有马君武、吴其昌、萧公权、王志莘、穆藕初、顾颉刚、朱光潜、张君勱、竺可桢、曾昭伦、吴世昌、程沧波、邵毓麟、顾毓秀、余协中、雷海宗、范旭东、沈宗瀚、茅盾、于右任、胡秋原、甘乃光、张钰哲、罗香林、杭立武、徐青甫、孙科、徐继壮、邵力子、龚德柏、太虚、叶君健、陈立

夫、老舍、梁思成、沈从文、张佛泉、巫宝三、漆琪生、汪馥荪、王亚南等非党人士和党派人士，可谓左中右各色名流都能在“星期论文”这个宽大的舞台上尽情上演自己的观点。这种盛状，是中国自有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后绝无仅有的；它的繁荣多彩甚至令后来那些自我标榜为“百花齐放”的诸多报刊也相形失色。

由于作者队伍构成的五彩斑斓，势必形成论题的广泛多样，观点的杂阵，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在长达 15 年的时段中，论题最多的却是关于如何瓦解中国的极权政治和如何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这一重大问题。当然，围绕这一论题，各方态度并不统一，有时争论相当激烈。比如，1934 年 12 月 18 日，丁文江发表了题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星期论文”，率先挑出话题，并表示赞成“试行新式的独裁”，以此来救国。随后他又再次撰写了《再论民治与独裁》，强调自己的观点并解释说：“中国今日的政治原来是‘旧式专制’……惟一的希望是知识界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他还宣称：“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也不愿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① 丁的言论与他此时辞去北大教职，就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有关。他的观点虽得到了蒋廷黻等人的称道，但却当即受到张奚若的抨击。张撰文说：“统一不须专制，专制或于统一有碍；独裁救不了国难，国难或因独裁加重。”^② 而胡适先生则撰写了《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信仰》一文，一本其在《独立评论》上的立场，重申自己厌恶专制，崇尚民主，并提出：中国人应以孙

① 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大公报》1935 年 1 月 20 日第二版。

② 张熙奚若：《独裁与国难》，《大公报》1935 年 1 月 13 日第二版。

中山先生的遗教为“最低的共同信仰”，努力走上“民主宪政的路”。对此，《大公报》适时刊出社评文章《中国不适宜于独裁》，以此鲜明公布报纸的基本态度。

事实上，在“星期论文”发表的 750 余篇文章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是讨论“民主与独裁”问题的。从以下列举的这些论文的题目上，我们即可见这一论题的确是自由主义者和反自由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的尖锐话题——

《中国的政制问题》，吴景超撰写，1934 年 12 月 30 日刊出。吴认为，在技术上中国尚不具备民主政治的条件。因此，“在最近的将来，中国还摆脱不了一党专政的局面”。

《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胡适撰写，1935 年 9 月 29 日刊出。胡先生说：“极少数人把持政治的权力，是永不会使民众得着现代政治的训练的，……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宪政促进言论自由》，朱光潜撰写 1944 年 4 月 9 日刊出。朱先生提出：“言论能否自由就是宪政能否实行的试金石。”

《社会公道的意义与使命》，陈衡哲撰写，1944 年 8 月 20 日刊出。陈先生认为：“现在我国缺少社会公道是不容讳言的，……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现象。”

《从美国大选说到政党政治的“窍”》，何永佶撰写，1944 年 11 月 14 日刊出。何先生指出：“有了两大党的竞争，才会吸收；没有竞争，就只须扑灭。”

《政治的斗争》陶孟和撰写，1945 年 1 月 28 日刊出。陶先生说：“政治斗争是每个民族永远扮演不完的正剧。……大家一齐努力，遵守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斗争的规则与典范好好地玩，巧妙地耍，以发展我们民族的政治天才。”

《官僚政治之由来与其净化》，吕复撰写，1945 年 2 月 11 日刊出。他指出：“居今之世，欲澄清吏治，净化仕途，惟有

一变以往以官治官之旧法，而代之以：以民监官，考试官吏。”

《英国政治的‘窍’》何永佶撰写，1945年3月7日。他认为：“不能单靠一纸‘宪法’，英国政治的‘窍’在于：确立民意机关应该抓住国家荷包的原则，始能控制军队，控制政府。”

此外，在民主政治涵盖下对自由和人权的争取，以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等，也是“星期论文”着力最多的话题。

1934年12月9日，即“星期论文”创辟将近一年的时候，胡适先生发表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一文，就蒋介石和汪精卫“原则性地提出言论结社自由”的表态，具体提出了具有自由主义纲领意义的五项要求：

第一，政府应该明令全国，凡“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的结社与言论，均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第二，政府……应该明令一切党政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第三，政府应该即日禁止公安与司法机关以外的一切机关随意逮捕拘押人民。第四，政府应该明令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第五，领袖诸公应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

1935年3月31日，胡适又在“星期论文”中刊出了他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就当时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一事，指出：“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他进而指点道：我们应该“让这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这里的“老文化”自然包括死不接受自由主义劝诫的极权政治。因此，

陶希圣一眼就看穿了胡适的心思，他于是在4月2日发表专文：《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读大公报三月三十一日胡先生星期论文》，指斥和讥嘲道：“……说中国只要仍然在回转十九世纪欧美自由主义的路，便是前途，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①5月14日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以《我们的总答复》为题，集体批驳了胡适的自由主义梦想。

1935年9月15日，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费边社中坚人物拉斯基的嫡传弟子蒋廷黻，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了《民族主义不够》一文，干脆全盘贡献出乃师的自由主义政治心得，希望“政府”能予以重视。他说：“我们根本是农民的国家；政府应该是农民政府；政权应该建立在农民阶级之上。”因此，民族主义必须要“加上高度的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才合乎国情。

同年12月15日，胡适先生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又在“星期论文”中引人注目。他说：“变态的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懂得了这一条很浅近的历史公例，我们就应该明白，这几年中国国难之下，青年学生的沉寂，只是一种变态，而不是常轨。”

笔者不打算再冗赘地举例。仅在1935年一年间，“星期论文”就向中国社会贡献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思考。说《大公报》是“小骂大帮忙”，仅以“星期论文”为例，即知此说是无知与偏见的产物。只要稍稍拂去一点点覆盖在历史上的尘埃，历史那动人的真相就显露出来了。

^① 陶希圣：《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读大公报三月三十一日胡先生星期论文》，《大公报》1935年4月2日第四版。

在这些论文的字里行间，我们确实见不到张季鸾、胡政之二位先生的名字，可是，谁又能否认在那些卓越的思索中，没有他们作为自由主义报人的追求和努力呢？真正的匠心是不见刻意的痕迹的。

民生问题一直是《大公报》社评的重要题目，同时也是“星期论文”极为关注的重要话题。比如，1935年10月13日，丁文江在《实行耕者有其地的方法》中，对蒋廷黻提出的实行三民主义，首先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作了具体的筹谋和规划；同年10月12日，何廉又加入进来，以《“耕者有其地”与“耕者有其赋”》一文进行深入的论证，使学术问题与民生始终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抗战结束前后，“星期论文”更是发扬着学术关注民瘼的传统，因而使学者们的自由主义梦想更有了坚实的民间基础。仅以民众最揪心关注的物价问题为例，1942年5月17日就发表了西南联大教授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联名文章：《我们对物价问题的意见》；1944年5月16日，“星期论文”再次发表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的联署文章：《我们对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事隔一年，杨西孟等五人又在“星期论文”上发表联署文章：《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这么多学界名流、自由思想者就物价问题坚忍不拔地发表意见，逼问政府“给个说法”，这在中国的历史中，不啻是个绝无仅有奇迹。

另外，“星期论文”还曾就战后的建都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复员问题、东北问题、内战问题、学生运动问题、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问题，特别是胜利后如何实行宪政和推动自由主义理想实现等问题进行了热忱而又深入的讨论。所有这些思

考，都积淀成了中国最珍贵的现代人文传统，特别是其中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作为一种本土稀缺的思想资源，有力地补充进了《大公报》原本单薄的自由主义身体，使之真正强健起来。

张季鸾的卓越创辟，胡政之的坚韧撑持，终使得《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成了可以和《独立评论》、《现代评论》、《努力周报》以及《观察》并肩而立的自由主义思想楷模。

第三节 王芸生：从激进主义到自由主义

一 生平及思想简述

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第二代领袖人物。在张季鸾逝世以后，《大公报》的笔政主要由王芸生主持。作为张季鸾所寄予厚望的事业传人，王芸生和胡政之一道继续贯彻“四不”主义，并且进一步将“文人论政”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谢泳先生在评价王芸生时写道：“旧中国的新闻事业，我个人认为在《大公报》身上已经很成熟。这更主要体现在它所具备的现代新闻观念上。初期《大公报》即能确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预示了它日后的成功，加上它后来形成的‘文人论证’的办报思想，可以说代表了特定阶段内中国新闻发展的最高水平。”^①他是在将《大公报》与《观察》作

^① 谢泳：《逝去的年代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版，第 19 页。

相提并论的评估时来赞赏王芸生的，因此其意义的特殊就自不待言了。

王芸生早年是一个典型的“五四”激进青年和左翼工会宣传家。大革命挫败后，陷于极度精神困窘并急于寻找灵魂皈依的他与张季鸾的遭遇，在某种意义上说，已完全超逾了他个人的经验，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由激进主义重归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典型缩影。王芸生的著名不光在于他主持《大公报》笔政长达 20 余年，且至少有两件事给历史留下的印象堪称深刻。一件是：30 岁出头即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上庐山给蒋介石讲课，并深得蒋的赞赏；另一件是：重庆谈判期间，他设宴招待中共众领袖，居然当面批评毛泽东，希望中共“不要另起炉灶”。著名自由主义报人俞颂华称赞他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颂。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①在国民党眼里，“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而在野党又严厉斥责他说：“王芸生是国民党的帮凶。”针对国民党极权统治钳制自由言论的“嗜好”他怒不可遏地将愤恨投掷出去，大声宣讲道：“言论与发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人民可以公开抨击政府施政，在野党在宪政轨道中尤以推翻政府为其能事，

^① 俞颂华：《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311 页。

那非但不犯法，且是一种特权。’^①

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王芸生和储安平一样，都是当时最顽梗、最具有挑战性的自由主义者和报刊评论家；在以呼唤言论自由和民主宪政为主要内容的自由主义运动中，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一直是居于前卫序列。王芸生经常宣称：“《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也就是说，王芸生的自由主义性格就是《大公报》的自由主义性格。

虽然王芸生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报刊自由主义实践家，但是，他的那些贯穿在大量社评文章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中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

王芸生（1901～1980），原名王德鹏，天津静海人，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家。幼年在乡间读过 8 年私塾。18 岁以前，曾先后在天津的茶叶店和小布店当过学徒，利用业余时间读过诸如《花月痕》、《忠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民间通俗小说。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将这个处于社会层底的青年学徒的眼界和思想迅速引领到激进主义的时潮当中。1921 年，他被当厨师的哥哥介绍到“中国北方木行”当了一名小工。在这家由买办开设的公司里面，他接触到大量的介绍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民粹主义和新村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的读物，并积极热情地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同时不断地撰写文章干预被激进风潮席卷的社会生活。1925 年，他联络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成立了工会，并被推选为工会的宣传部长和工会周刊的主编。1926 年 3 月，为逃避军警的追捕而亡

^① 王芸生：《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大公报》1948 年 7 月 10 日社评。

命到上海。他描述自己“真像个游魂鬼”。不久，他几乎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是当时的中共领导博古——他又回到他格外醉心和动情的激进主义政治革命生活之中。这期间他和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办过《亦是》、《短棒》和《猛进》等激进主义报刊，同时还担任过《和平日报》的编辑。1927年，王芸生归返天津，与国共两党失去组织联系。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天给《华北新闻》写一篇社论。后来又加盟天津《商报》，1928年，他担任了该报的总编辑并主持笔政。1929年，他在《商报》上撰写文章与《大公报》展开论战，双方交手几达白热化。正是在这场交锋中，张季鸾发现了他的超人的新闻才干。这年夏天，他被求才若渴的张季鸾揽进了《大公报》。到1931年《大公报》已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重要的是，王芸生的思想已逐渐由激进主义转变到了自由主义。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他广搜精研，写成数百万字的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举成为海内外闻名的日本问题专家。1934年，应蒋介石之邀上庐山进行采访，并给蒋讲课，蒋对其非常赞赏。1936年，《大公报》增设上海版，他赴任主持总编事务。1938年随张季鸾、胡政之流亡到重庆，襄助张、胡编辑出版《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张季鸾病逝后，报社笔政由胡政之和王芸生共同主持。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他直言劝诫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同年11月，亲撰社评：《质中共》，引起轩然大波。1946年2月，他又发表社评《读雅尔达秘密协定有感》，并由此成为导火线，引发了数万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市民参加的“反苏大游行”，对苏联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示了强烈抗议。同年4月，又因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而惹上笔墨官司。1947年2月，他代表《大公报》随中国记者团赴日本考察，回国后

写成《日本半月》，对美军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进行了深刻的剖析。1948年他撰写大量社评，一方面忧戚于内战连年，生民涂炭，民主建国无望，另一方面执着于自由主义理想，对“政府”进行毫不畏惧的尖锐批评，因而惹致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刻骨痛恨。“三查王芸生”的结果，使他对国民党残存的那一丁点希望也随之破灭了。1948年11月，《大公报》发表王芸生亲撰的社评《和平无望》，声明“转变立场，靠拢人民”；之后“又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领导了《大公报》香港馆的起义”^①。1949年1月，王芸生与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等数十位“民主人士”到了北平，他兴奋地写了《我来到了解放区》，描述自己获得新生的无限欣喜。同年6月17日，《大公报》发表了他为该报撰写的最后一篇社评：《大公报新生宣言》，沉痛地回顾并检讨了《大公报》50年的办报历史和自由主义“过失”。

自1949年起，他历任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务……晚年的王芸生是在沉痛的自责和极度的困惑中度过的。1980年5月30日，他于复杂的灵魂痛苦和忏悔中去世。《人民日报》总结他的一生时评价说，他是“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是“受人尊敬的日本问题专家”。

二 “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1934年8月，王芸生以《大公报》编辑部主任和著名的

^① 王芸生：《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大公报》1948年7月10日社评。

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受蒋介石邀请上庐山对这位委员长进行采访，并且给蒋讲课，主要内容是关于“三国干涉还辽”。蒋对其非常赞赏。王芸生后来兴奋地说：“我当了八九年新闻记者，大概都是在屋里抹桌子，出门访新闻，这是破题儿第一遭。这次奉命到江西旅行，由八月八日出发，至九月九日归来，共用三十三天时间，在牯岭住了二十四天，其余时间大都消耗在火车轮船上了。这次旅行经过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七省，见过不少朝野要人。汪、蒋、林、段是国家先后四位元首，这次都见到了。余如各部部长，各省主席、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各地学者，就是我们同行也会见了几位……”^①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激励着他。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和这些权力中心人物的接触，并没有使他丧失掉《大公报》所持守的民间立场。应该说，这时，他和他所供职的报纸所崇奉的“国家中心论”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同时，他之所以倍感荣耀，是因为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终于被“权力中心”所重视，终于有了和所谓的“最高领袖”“平等对话”的一天，他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影响中国的政治。

这当然是《大公报》一以贯之的独立品格，即可以与政治系统，甚至与“权力中心”有所接触，但必须始终保持距离，因为只有这样，方能确保“书生议政”的基本样式和精神品格。王芸生上庐山给蒋介石上课，不仅和王世杰、张道藩、翁文灏、蒋廷黻等人以士人仕，最终彻底丧失掉了其自由主义的品格迥异，而且亦迥异于后来自由主义者组建的国民参政会和

^① 汤恒：《王芸生》参见《新闻界人物》第4辑，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96页。

民盟——这一路自由主义者是试图以组建政党的方式，将自己的理念楔入“权力中心”。不明白这一点，就极有可能误读王芸生，甚至误读张季鸾。吴鼎昌是《大公报》的一个例外。可贵的是，吴做官后一直敬重和遵守《大公报》的“四不”社训，从此再未过问该报的办报方针及人事经营。王芸生和张季鸾等不愿走吴鼎昌的路，还有一个被傅斯年一语点破的秘密：为了保持批评政府的民间独立地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以采取的办法中有两条：一是组党；二是办报。盖因“与其组党，不如办报”^①。足见“办报”较之“组党”更艺高一筹，为自由主义者的最高境界。王芸生又何必要退而求其次呢？

1936年，影响遍及中国的《大公报》又增设了上海版。王芸生以资深大公报人和日本问题专家的双重身份回到上海主持总编事务。旧地重游，百感交集，恍惚间有隔世之感，他以自由主义者惯有的伤感喟叹道：

那时的朋友们（指“大革命”时的激进主义同志们——引者注），到现在已死的死，散的散，都为一个大时代尽过他们的责任了；屈指数来，也有不少的人们业已显达。我对于显达的人们毫不羡慕，而对于被时代巨浪吞噬了的朋友们，每一念及，辄不免心头滚烫，暗暗的落泪。

· · ·

他似乎没有透露自己的变化，没有吐露自己从激进主义转

^① 《傅斯年致胡适》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 170 页。

^② 《芸生文存》上海大公报馆 1937 年版，第 346 页。

变到自由主义的种种惊心动魄的灵魂冲突的痛苦过程。但看得出来，从民间的立场，从道义和良知的立场，他对十年前的“大时代”在悲悼中是持肯定态度的。不同的是他服务和尽职于国家的信念愈加强烈了：

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残破局面，已在妈妈的怀抱下过去，孩童的脑子里没留下一点印象。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和杀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的纠葛，安心过来做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但自信我的心未曾冷。这十多年来，我一贯是在编报写文章，报已编了三四千天，文章便也写了一堆。我的报自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生命史料，我的文章也不至太对不起我的国家。……

王芸生是个文学感伤情结很深的忧国伤时之士。这篇刊于《芸生文存》中的《自序》，其对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成长过程，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芸生文存·自序》。

一是他认为，是五四运动给他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那么很显然，这就是在懂得了“科学”和“民主”的最基本的人文蕴涵的同时，更懂得了作为一个人，他有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尊严的自由权利。

二是革命阵营的腐败现象之所以使他伤心至极，终至使其“摒绝一切政治的纠葛”，安心做一个报人。事实上，这一觉悟的起点即来自于自由主义者为维护每一个“个人”的幸福和尊严而对极权政治和暴力政治的勇猛批评立场——因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最终完成，是必须以严厉抨击极权和暴力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为标志的。

三是国家职守的基本观点。自由主义者崇奉的“国家中心论”并不是“党国”的翻版，而是以能提供和保证每一个国民的自由为前提的国家主义。王芸生说他的报纸和他的文章都要对得起这个国家，就是说要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以及不欺不瞒的新闻写实和坚持民间立场的“文人论政”，来报效国民，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希望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诚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不知足，不满足于现状，敢说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绎曼先生。”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的这些话，完成可以移用来状说王芸生由激进主义者“进步”到自由主义者的深刻感人的内心转变。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讲坛上发表演讲时，其坚毅敦厚已经与青年时代作为一个工会活动家演说的狂热煽动性判若两人。这时的王芸生已习惯于用自由主义的“平常心”对待任何一种人生和社会难题了。当谈到中国的新闻时，他说：“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

而行 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 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①

三 自由主义的想象力及其尴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大公报》在呼吁全体国民和所有党派共赴国难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民的传统品格的可贵和可敬，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完成了他们向自由主义的进一步转变。曾经当过大公报人的旅美华裔学者梁厚甫先生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评价说：“在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的需要，是推销自己的商品，其次是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两种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还是让前者先行。因此，美国的报纸，必须装成及摆出完全为读者来服务，完全以报道及分析新闻为职责的样子。若问报馆的立场，则标榜‘独立’。什么叫做‘独立’ 换言之 就是要做‘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的乡愿。”^② 美国的报人确实爱标举“新闻自由”的旗帜，甚至不少人还要标举“自由主义”，但比之中国的大公报人，却总有叶公好龙之嫌。所以他又慨叹道：“我经常想，有朝一日，如果美国也像中国一般，遭逢国难，

《新闻事业与国难》见《芸生文存》第260页。王芸生还在《招魂》中这样说道：“做新闻记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新闻记者手上有武器，容易受人恭维，也容易被人诱惑。你们尽看见有许多新闻记者很得发，若从一个角度上去看，他们是成功了，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走这条成功的捷径，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在我的眼里，便有许多被人恭维做‘无冕之王’的实际上是‘无魂之鬼’！”

^② 周雨：《大公报报人忆旧》第326页。

美国就不可能有一张像是大公报的报纸。’^①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中国“文人报国有心，而回天无计，于是寄希望于白纸黑字的报纸，把内心蕴藏去告诉人家。其用心，实在有‘还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苦况”^②。具体到有着倔强的自由主义脾气的王芸生来说，就更是如此。因此，自1936年至1948年这12年间，由他那支犀利的笔所惹出的几桩公案，就充分凸显出了大公报的那种“还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苦况。对此，胡政之曾有言：

我们真是有苦自己知。我们的社评，不见得就是露布（中国古代最早的军事消息，其由羽檄演变而来，有“宣露于外，闻之于世”之意——笔者注），我们的笔，也不能横扫千军。我们始终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秀才。^③

这里的“有理说不清”，主要是指他们因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所陷进的“自我设置”的尴尬；是指学不会八面玲珑、周遭讨好所带来的诘难和窘迫，这一切，不仅是对极权主义和激进主义而言，即或是对“爱国学生”，也是如此。王芸生的社评虽然其“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谈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并且由于他“富于热情，

① 周雨：《大公报报人忆旧》第329页。

② 周雨《大公报报人忆旧》第328页。王芸生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认为，新闻人必须“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要有冷霜的操守，要守得住寡，熬得住清冷，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③ 周雨：《大公报报人忆旧》，第267页

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但也一样使他常常陷入尴尬。他所惹来的第一桩著名公案是他在《国闻周报》上写的“六寄北方青年”。

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北方的青年学生忧国伤时，对国民政府坐视东北和华北大片国土沦丧而不顾，产生了激烈的愤懑情绪，进而酿成震惊中外的请愿学潮。面对这种感奋和危急，忧心如焚的王芸生从自由主义恪守的“国家中心论”考虑出发，写了《寄北方青年》，劝慰“爱国学生”应以理智来修正“稍有凌乱的步骤”。他首先肯定了学生们献身国家的啼血呼号，他说：“我曾亲眼看见你们‘一二·九’以来的苦斗。你们在北方局势最震荡时喊出了拥护国家的口号，你们在北方大局要崩溃时阻止了国家的分裂……虽然你们的步骤稍有凌乱，把敌忾的怒潮一部分转成内讧的意气，但我总以为，这种缺憾是可以由理智来弥补的。”最后，他热情赞扬道：北方的学生运动“转变得健全了”^①。

在《再寄北方青年》中，王芸生逐渐陷入了尴尬。他说：“《学生与国家》的创刊号上，曾刊登过一篇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意见和希望》，那种真诚的流露、勇敢的忏悔，我读后感到莫大的兴奋，并加强了我对民族国家前途的光明希望。我为那篇文章所感动，不自禁地写下了一篇《中国的青年心理》，登在津沪两地的《大公报》上……”王芸生的意见是规劝学生以“国家利益”为重，好好回去读书。但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危急关头，他的规劝怎能不引起各方的误会？他不仅如此，

^① 王芸生：《寄北方青年》，《国闻周报》第14卷第2期，1937年1月4日出刊。

还对学生支持“西安事变”表示不理解，对张学良不以“国家为重”表示责难。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呼喊道：“国民党啊！你对国家的任务太重了！你将如何戒慎戒惧地来履行这个庄严神圣的大任务呢？我认为国民党及其党员应该痛切地认清这个任务，放宽襟度，走上一条公正和平的坦途。”^①其实，早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王芸生便曾说过：“我就预料它所可能引起的反响，这反响或是你们的眼泪，或是你们的怒骂。”后来证明，骂他的人远比赞同他的要多得多。

但是，自由主义者是不惧怕任何误解和责骂的。王芸生很快又发表了《三寄北方青年》，继续以“国家中心论”的立场来规劝青年学生。他旦夕为国难之亟的焦虑所痛，在这篇文章里更是语重心长地向学生们分析时局的危艰，分析中共所倡导的“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并且反复向他们阐明自己的自由主义者身份。基于这些，他写道：“我的看法，应该把‘统一战线’的口号改为团结建国，以国民党为中心，共产党和绝大多数无党无派的国民，共同督促，并培植这个中心走向民主建国的大路。”不久，他又相继发表了《四寄北方青年》、《五寄北方青年》和《六寄北方青年》三篇文章，继续穷追不舍地向青年学生们分析和讲解他所奉行的“民主建国”主张。其中，他着重讲说了他对“民主政治”的诸多设想，企望经由“抗日统一战线”最终通往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幻境。为此，王芸生兴奋地写道：

现在无论是谁，只要是中国国民都有对讨论中的国民

^① 王芸生：《再寄北方青年》，《国闻周报》第14卷第4期，1937年1月18日出版。

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发表意见的权利，我认为要实现一个真正民主化的国民大会，除了在立法技术上注意之外，最根本的是观念问题。在观念上应根本洗刷掉包办的思想。这一点是应该由国民党来放大襟度的。^①

他并不是不了解国民党的极权脾性，但大敌当前，欲御侮于外，就必须维系这个“中心”。其实，关于这个观点，在当时的中共文件中也是有着许多相同或相近的表述的。显然，在此前提下，不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又怎么能经由“团结抗日”最终抵达“民主建国”的目的呢？企望国民党“放大襟度”，切实实行宪政，这当然是胡适先生“好人政府论”的翻版，不过，王芸生的自由主义想象力似乎还要比胡适先生“杰出”，因而，他所招致的责骂就更加多而且厉害了。在王芸生的《六寄北方青年》刊出时，中共的高级干部、当时的理论家凯丰就在延安的《解放》杂志上以《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的文章，对其进行了“尖锐的驳斥”，并严正指出其自由主义追求的危险性，不赞同他的若干主张。而且，在人们以后的回述和批评当中，王芸生的“六寄北方青年”，皆被认为是“立场完全站错了，这是他的新闻生涯中的一处‘败笔’”^②。

四 笔墨官司与“政治技巧”

王芸生所惹上的第二桩著名公案，是1945年11月20日

^① 王芸生：《六寄北方青年》，《国闻周报》第14卷第20期，1937年5月24日出刊。

^② 汤恒：《王芸生》第89页。

他所撰写的社评《质中共》，以及其后引起的轩然大波。当时，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刚飞返延安不久，国共军队在局部区域已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大公报》一则出于维系“以国民党为中心”的立场，二则出于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武力的立场，发表了这篇惹祸的文章。王芸生在《质中共》中严厉质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是：朱德代表中共军队发布受降令是不妥当的。“今天的局面形成，从文献上探索，日本宣布投降之初，延安总部发布的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是一个根源。那个命令，称为‘延安总部命令’，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得缴敌军之械，受敌军之降，编遣伪军，……这命令，显然与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对立，而以独特的统率，从事单独的进兵与受降……广大的北方到处起了砍杀之战。”因此，他提出质问。

第二是：认为中共意欲凭武力实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特殊化，就更是极大的不妥。“看北方的战乱局面，很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是中共意欲凭它的力量，凭它的武力，做到‘会谈纪要’（指‘双十协定’——引者注）中所要求的陇海线以北苏北皖北的特殊化。假使做到那样的局面，那便成了所谓‘南北朝’的局面了，国家便被分裂成两半了。”因此而痛心疾首，于是又提出质问。

第三是：中共应该以政争，而不应该以兵争，劝中共交出军队。王芸生认为，“凡是一个政党都是为了争取政权而组成，所以政党要争取政权是应该的，而不应该以兵争……为共产党计，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我们希望共产党为国家人民争民主，争宪政，在这方面，应该一切不让。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权，以争全国政权……我们希望

中共转此一念，那不但是国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诸公也将被全国同胞弦歌丝绣而奉为万家生佛了！”^①因此，想入非非的他又代表《大公报》提出了最后一个质问。

王芸生的这些意见，以及所表达的愿望，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战后不少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但事实上，对于国民党的“放大襟度”这一点来说，他们暗中是缺乏信心的。国共长达20年的武力较量，也让他们多少悟出了一些道道。稍后，连最铁杆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的极权凌迫下，假如没有军队，简直是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不过，自由主义者的本性使王芸生不能不在原则上称颂“政争”，而反对一切“兵争”，否则，他就不是自由主义者了，他所代表的《大公报》也就不是一张真正的自由主义报纸了。其实，在11月2日《大公报》的社评《中国政治之路》中，王芸生就已经强调过了。他说：“必须走向民主……而最能使国家尽速走上民主之路的，实系于中国一二大党及一二领袖的做法。……我们总以为，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什么人，都应该向民主方面想，而不必叮叮当当于枪杆与地盘的问题。”其天真与执着，严肃与滑稽，既使人捧腹，又不能不使人生出许多感喟。

王芸生的质问当即遭到中共党报的严厉谴责。11月21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对《大公报》的错误论点逐一加以批驳”并辩解道：第一受降问题。国民党军人在离前线很远的后方要去受降，而坚守前线的八路军却不能受降，实属离奇。“朱总司令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坚持进攻敌伪军，须知这些还未投降的敌军既然就在十八集团军的前面，则十八集团军只要不想等候敌伪军来缴自己的

^① 以上引文皆见《大公报》1945年11月20日社评：《质中共》。

械”，就应天经地义地去缴敌伪的械，这哪里是“北方斫杀之路”的根源？第二，特殊化问题。中共要求还政于民，政权由人民选举产生，华北、东北已首先实行，而国民党偏不愿实行，并要在北方夺政于民，还政于党，这不是闹特殊化是什么？“国民党当局却偏偏不愿实行这个民主的办法……这不是闹南北朝是什么呢？……现在《大公报》却把这个决定的权力推到中共的头上，岂不是张冠李戴！”第三，军队问题。军队国家化本是跟着政治民主化而来的，军队不化于民主国家，难道还该化于国民党的“党国”吗？还该化于封建独裁的“国家”吗？

逐一痛加反驳之后，《新华日报》归纳嘲笑道：“这些问题都是当今国是的根本问题。我们现在无需乎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并进一步讥嘲道：“好一位妙舌生花的说客呀！但是天下一切大公无私的人们请判决吧！《大公报》在这里是大公呢？还是大私呢？”尤嫌不能解恨，最后又痛斥道：“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以“文人论政”为职守为荣耀的王芸生们，其实可怜得很，他们除了空怀自由主义的凌云壮志，对“民主建国”怀抱瑰美的梦想外，从来就没有搞清楚中国的“政治”到底为何物，更谈不上懂得什么“政治技巧”之类。因此，反被质问得哑口无言，甚至连自己的“基本立场”也被别人羞辱了，这简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呀！

五 “左右开弓”与“左右不是”

自由主义者的执着和梦幻使他们很难有什么记性。仅仅

隔了几个月，王芸生又为《大公报》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

1946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发表了《雅尔塔协定》全文。尽管这个由“三巨头”形成的“协定”有维护远东和平利益的一面，但是具体到“外蒙”问题和“两路两港”问题，却明显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为此，《大公报》在2月16日发表了王芸生的社评：《读雅尔达秘密协定有感》表达了他既作为一个中国人，同时又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严正立场。社评愤慨地披露了该“协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即：外蒙古独立；辟大连为国际港，苏联保有优越权利，旅顺由苏联租用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中苏共管，苏联保有优越权利等。然后尖锐指出：“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被处分的地位。这是我们引为感慨的第一点。”因为，既然自1896年李鸿章在莫斯科与帝俄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早已被列宁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又“何必在文字上公言‘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岂不难看？”^①

以此为导火线，2月24日，傅斯年、储安平、王云五、赵超构等20位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星期论文”——《我们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就在同一天数万名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普通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由重庆沙坪坝出发，沿途高呼反苏示威口号，而被视为严重的“反苏”事件。

《大公报》引起中共的不安，还有2月21日王芸生写的《东北的阴影》一文。这篇社评被中共指责为“把内政与外交问题混淆起来”；为国民党反动派独占东北制造舆论”。王芸生写道：“据中共中央发言人说，东北的民间武装，与进入东

^① 《大公报》1946年2月16日社评：《读雅尔达秘密协定有感》。

北的八路军，‘现已组成一支数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又说，‘各地人民又根据地方自治的原则，推选各方公正人士，成立了各县民主政权’。因此要求政府承认这些武装，承认地方自治政权，且要限制国军开入东北的数量。这看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了，其实这里面却蕴含着一个外交问题。”既然如此，王芸生“声明一个界限”：“我们要对内争民主，对外保独立。若国家独立的不存或有损，尚何民主可言？”

2月29日，王芸生又发表了《东北的经济和金融》的社评，引起中共更大的不安。对于王芸生的这些言论，中共报刊逐一进行了辩难和批驳。遗憾的是，王芸生没有一点忏悔的表示，反而进一步将笔锋指向中共。

1946年4月13日，王芸生重返阔别已经8年的上海。第二天，他在编辑部主持工作，得到重要电讯：苏军于14日撤离长春，国共两军争夺长春的战争开始。15日在《大公报》上海版的头条新闻上，他专门作了这样的一个标题：《长春苏军昨已撤去，共军进攻接踵而来》，并特意加了一个小标题：《国军既归来，还流同胞血》。16日，他忍不住发表了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这篇社论根据来自沈阳的通讯《春天里的秋天》所报道的内容而生发，指责东北民主联军，说其“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并且为之惊呼：“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家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起来了，且已攻入市区。……流的却是中国同胞的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①

《大公报》上海版，1946年4月16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

这篇社评发表后，当即激起了中共极大的愤怒，重庆的《新华日报》在4月18日郑重发表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击和痛斥：“除了从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抄来的以外，世界上找不出这样的战术。《大公报》在反人民这一点上真正做到家了，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联系到王芸生所代表的《大公报》当时的一系列表现，《新华日报》就更是怒不可遏——看来，王芸生们确实是将毛泽东期望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告诫彻底忘掉了——这甚至引起了中共对《大公报》以“自由主义”自命的怀疑：“大公报为什么会忽然登出这种社论来？大家记得，当二月里国民党法西斯集团策动反苏反人民的反动游行，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公’的大公报，首先在社论上大肆反苏，做法西斯进行最残暴无耻的特务暴行之先锋。事后，许多被这个反动报纸欺骗了的青年学生，才觉悟其中的鬼把戏，大呼‘上了大公报的当！’大公报里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伪装自由主义，一至紧要关头，一至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不但效劳，而且还替法西斯当开路先锋，替吃人的老虎当虎伥，替刽子手当走狗，以便从法西斯和刽子手那里，讨得一点恩惠，舐一点喝剩的血，嚼一点吃剩的骨头。大公报社论作者暴露其原形，不止一次。这一次，大公报社论作者又把自己的原形暴露出来了！人民必须严重警惕！”^①对此痛骂，王芸生未作表示，直到5月26日他才在《长春收复以后》的社评中作答：“长春既经收复，政府更要戒慎戒惧，勿以一时的军事进展而轻忽大意，更不必因此而轻视‘政治解决’的必要。中共呢？憬然

^① 《新华日报》1946年4月18日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于武力之不可恃，应坚决走和平谈商之路。”5月30日，王芸生万分委屈地在《论宣传休战》的社评中备述自由主义的“左右开弓”与“左右不是”的苦楚：

我们努力维持可怜的人民立场，努力保持头脑清明，心境平和。……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奉告一面，不可为渊驱鱼，把天下都看做共产党。奉告另一面，要争政权，就不要作践人心……

六 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

王芸生引起国民党满脸的不高兴，主要是因他主政的《大公报》强烈反对美国在战后不遗余力地扶植日本军国主义。

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代表《大公报》随中国赴日记者团去日本考察。这个记者团的成员一共十人，计有：王芸生、陈博生、牛若望、王去槐、余大酉、崔万秋、陆铿、宋越伦、范厚勤等，他们是应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的邀请去这个战败的岛国的。半个多月的考察，使王芸生感慨良多，回国之后，他将访日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以《日本半月》为题的十多篇通讯，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中，他一方面为战后日本国民在焦土上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重建家园的“伟力”所感动，另一方面又为他所亲见的美军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卑鄙行径而愤慨。他甚至一眼看穿美国假借“管理”日本的

① 《大公报》1946年5月30日社评：《论宣传休战》。

便利，扶植日本充当其在远东的冷战打手的阴毒用心。事实上，在这个记者团中，只有他窥透了麦克阿瑟的“秘密”。

这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他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爱国、爱自由主义对他来说，是一枚银币的两面。因此，他不能不对马歇尔、司徒雷登等美国的“自由主义”说客有了怀疑。1947年5月15日，王芸生应邀到北京大学作了《日本问题再认识》的演讲；第二天，他又风尘仆仆地走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坛，以《漫谈国事》为题，继续发表有关日本问题的意见；5月23日，他又赶到天津，面对南开大学的师生发表了题为《我对国事的看法》，尖锐抨击了美国的无耻行径，并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同年10月，为国运多艰而忧戚的王芸生又在黄炎培主编的《国讯周刊》上发表了《麦克阿瑟手上的一颗石子》，严厉揭露和斥问道：“麦克阿瑟为什么要这么干？……日本有句成语叫做‘一石两鸟’，尔今日本正是麦克阿瑟手上的一颗石子。他拿这颗石子预备打两只鸟：（一）对付苏联；（二）警备中国。”这篇文章旋即被上海《大公报》所转载。胡政之读了此文深感不快，面对质问，王芸生似乎显得有些“大义凛然”。

王芸生的这番表现在国民党看来当然是不可思议的，若不是被“赤化”、为共产党代言又是什么？再加上这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奉“党国”之命专门修改了《学生自治规则》，以防范和钳制越来越呈汹涌之势的学潮。针对这件事，《大公报》发表了社内的“左倾分子”李纯青写的《何必防范学生运动》的社评，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专制无理。对此，国民党恼羞成怒，《中央日报》当即刊出社论《爱护学校 爱护自己》指责《大公报》“淆乱是非，颠倒黑白，危害青年，破坏学术之研究”并且严厉警告道：“大公报不是租界，王芸生之流何能自

外于法律；爱国人士岂能坐视彼随意发表谰言，助长动乱，危害国家？”不仅如此，《中央日报》的社评还对《大公报》和王芸生的“自由主义”立场进行了恶意的讥嘲：“至于大公报王芸生之流，其主义为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主义与方略具备，现在又有行动了。他的行动就是不左也不右的，政府与共产、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者。”^①在“一边倒”已经成为冷战时尚的时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很像一些不识时务且可恶至极的怪物吗？国民党的中央党报公开点名破口大骂《大公报》及其主笔王芸生，这可谓空前的。

谁知王芸生竟不思悔改，1948年1月16日，他又在《大公报》上推出社评《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兴起》，对战后在国际上兴起的、以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个人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势力——即“第三方面势力”——推崇备至，因而更加引起“党国”的切齿忌恨。

面对压力和威胁，得理不饶人的王芸生并不因此撒手讨乖。他并未记住前些时候在点评“东北问题”时得罪在野党的教训，很快，又在这个问题上“恶毒攻击”执政党了。如1948年，“国军”在四平激烈的巷战中败北，《大公报》即在刚刚复刊的香港版3月16日的版面上发表了社评《少残杀，少破坏》一文，对战争屠夫“砍杀生灵无辜”表示极大愤慨；3月29日，又在社评《国大开幕》中，对国民党执政20年却迟迟不遵循孙中山遗训“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表示冷嘲热讽；3月31日，又在《当前国际形势的特征并略论我们的问题》的社评中再次谴责道：

^① 《中央日报》1947年12月30日社论：《爱护学校 爱护自己》。

一个政府若是到了只能执行利于少数富人之政，而不能执行利于多数穷人之政，甚至好官办不通好政，且不免穷愁而死，岂不是很危险了吗？……国民政府执政二十年，大量推行了不平之政……在这种情况下，纵使没有共产党兴兵捣乱，攻城略地，也是一种挽不了的局面。认清了这一点，便可知道，今天的问题已不单纯是战场上决胜负的问题，根本的症结在于如何得其平的问题。

对这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和规劝，国民党的表情当然更加难看。报复的机会终于等来了——1948年7月8日，国民党依照以其极权性格而制定出的《出版法》，悍然勒令南京《新民报》停刊（1947年5月25日国民党封闭《文汇报》、《联合晚报》以及《新民报》时，王芸生曾因发表社评《请保障正当舆论》而引起社会舆论的谴责。《密勒氏评论报》当时即指出：“中国今天只有两张真正的民间报，一张是中间偏左的《文汇报》，一张是中间偏右的《大公报》。”并讽刺说：这两张报纸“应彼此扶持、支援，而不应冷眼旁观，更不应投井下石。”随即，储安平在《观察》上著文批评说：“《大公报》的短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太违犯起码的新闻道德了！”而先供职于《大公报》，而后又供职于《文汇报》的徐铸成更是痛心疾首，斥骂王芸生的文章“是《大公报》历史上罕见的卑鄙评论……”——笔者注）。不过，这一次王芸生的表现就不再像一年前那样机巧了——7月10日，王芸生拍案大怒，刊出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他怒不可遏地将愤恨掷向“党国”：

言论与发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例

有保障的规定。出版法的立意，乃在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人民可以公开抨击政府施政，在野党在宪政轨道中尤以推翻政府为其能事，那非但不犯法，且是一种特权

…

七 “谏议” 碰壁与绝处逢生

王芸生坚持《大公报》自创办以来所呼吁和追求的“言论与发表自由”的新闻理想，认为这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要义。在评述《新民报》停刊这一非常事件时，他不仅勇敢地重申了这个原则，而且更发声为啸吼，主张应彻底废除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出版法》。根据他多年与“党国”较劲的经验，他当然知道这一次肯定捅马蜂窝了。果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继1947年12月29日的社论（即“一查王芸生”）之后，在1948年7月16日开始了“二查王芸生”。《中央日报》的社论《在野党的特权》认为：“大公报本月十日社评，抄袭赵普‘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旧话，主张‘三部法律可以治国’。这三部法律就是宪法、民法和刑法。”继而攻讦矛头直指王芸生：“他又提出一种理论，以为‘在野党以推翻政府为能事，那非但不犯法，且是一种特权’……我们深知王芸生君心中有许多妙论，不料这一篇社评已经含有三个妙论在内，待我们一一指将出来。”最后，“党国”羞愤难当地说：“新华社咒骂我政府为袁政府，所以王芸生君在这篇社评中斥责现行出版法为袁政府时代的产物，以影射我政府为袁政府”，进而作结说：“王芸

① 《大公报》1948年7月10日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

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这真令他哭笑不得 因为《新华日报》刚骂过他是“国民党的帮凶”。他就像一只被踢来踢去的“自由主义的皮球”，一会儿被戴上红帽子，一会儿又被戴上白帽子，殊称滑稽而凶险。

7月18日，向来以不怕事著称于世的王芸生发表了《答南京中央日报两点》称：“大公报向有一种气度 就是挨骂不还嘴”之后 指出了《中央日报》“极险辣地罗织”大公报罪名的用心，表示了他对“二查”的极端蔑视。这下，漏子捅得更大了。国民党的中宣部长陶希圣亲自出马撰写了《王芸生之第三查》发表在7月19日的《中央日报》上。“三查王芸生”其势之汹汹，罪名之巨赫，都是前所未有的。陶列举了王芸生的“三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支持学生运动；第二大罪状是煽动在野党推翻“党国”；第三大罪状是“致力国际干涉运动，使莫洛托夫提议苏、美、英三国共同干涉中国”。

“三查”的结果使王芸生对国民党残存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他曾企望通过“谏议”的方式，用“诤言”来帮助和打动国民党，使其“自新”，但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梦幻。当此之时，“王芸生绝不希望共产党取得天下，同时又看到国民党的统治腐败无能，人心思变，江山日蹙，……找不到一条光明的出路”^①，故而思想矛盾重重，若闷至极。

“中间道路”被彻底堵死了，《大公报》的老板胡政之又患病在床……乱了方寸的王芸生和所有乱了方寸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如热锅上的蚂蚁，出路到底何在？他不得而知。

记得张季鸾在世时，曾授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 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① 周雨：《大公报报人忆旧》第316页。

回首两年前，中国的“自由分子”们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炙手可热。尤其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在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这些“自由分子”，特别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党”和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间报业集团，是如何的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政治筹码和道义筹码。如今，国共在战场上已决出了雌雄，不仅是《大公报》，也不仅是民盟，所有的自由主义者，一夜之间都成了暴跌的股票，成了像金圆券那样的一文不值的废纸……王芸生怎能不忧戚悲怆至极？他和胡政之等人对个人命运的险恶前路自然有所预感，但并不特别在意，甚至有种“临命”的坦然。然而，对《大公报》这个民间自由主义事业的走向绝境，他们却是于心不甘的。

苍茫大地，四顾惘然。谁能网开一面？

1947年11月，民盟在国民党的勒令下被迫“自动解散”。国民党的这一愚蠢至极的专制之举，得到的唯一回报便是将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自由主义者中的大部分赶到了共产党一边。虽然也有一部分像胡适、张君勱那样的自由主义者，抱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恐惧和伤感心理，选择了“死跟”国民党的权宜之策，在肝肠寸断的回望中飘离了大陆。但是，在两极分化的情势逼迫下，他们也不能不重新掂量掂量：国共两党谁更值得“投奔”？事实上，就在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储安平主持的《观察》和北平部分教授主持的《新路》抱定坚守自由主义的最后的堡垒的时候，愈来愈多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秘密“偷渡”到了“解放区”。面对这种悲剧和喜剧兼而有之的局面，杨人榘先生在《再论自由主义途径》中慨叹道：“在目前国共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中，最现实的态度是‘择一而事’。要两面讨好是不可能的，两面不讨好是最不‘现实’的，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保持缄默，待机而动……”王芸

生和胡政之、储安平以及北平的那些教授们，可以说在这时都是对“择一而事”投以极其轻蔑的眼神的，他们的确对“保持缄默，待机而动”持欣赏的态度。可是，这种“最聪明”的态度很快就被现实击得粉碎——因为，一方面是国民党在愚蠢野蛮地驱赶，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在聪明友好地迎纳，而且中共最高妙的是以诚恳的民主的笑脸在迎纳。自由主义者不是最喜欢民主和自由吗？当他们面对中共博大的民主襟怀，并亲耳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自由歌声时，最后的堡垒很快就自行瓦解掉了。

1948年10月30日，当王芸生得到由《大公报》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和李纯青转给他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亲笔信时，他曾“几夜没有睡好觉，辗转反侧，考虑了许久。最后，他终于决定了——投奔解放区，参加新政协”^①。那百般折磨人的几夜他到底在考虑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他本人“新生”了，然而《大公报》是否也能跟着“新生”呢？不能说他没深怀疑窦。不过，转念一想，一张报纸的消亡和一个国家的“新生”孰轻孰重？如此一琢磨，他似乎也就释然了——不过，他对《大公报》还是心存幻想的。

1948年11月5日，王芸生假托赴台湾游览观光，独自从上海虹桥机场飞赴台北，在台湾《大公报》分馆严庆澍、吕德润那里仅住了三天，即又悄悄飞赴香港。

1948年11月10日王芸生发表社评《和平无望》声明“转变立场，靠拢人民”；之后，“又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领导了《大公报》香港馆的起义”^②。石破天惊，蒋

^① 汤恒：《王芸生》，《新闻界人物》第4辑，第104～105页。

^② 同，第105页。

介石被惊得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他至死都没有弄明白中国的“自由分子”何以突然灵魂出了窍？

1949年1月，王芸生和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等“民主人士”从香港乘船北上到了北平。几天后，他兴奋地写了《我来了解放区》，描述了他获得“新生”的无限欣喜。同时在《五十余民主人士抵达解放区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中签了名。

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亲撰的最后一篇社评：《大公报新生宣言》（王芸生先生的公子王芝深近年来著文声辩说：《大公报》并不是“起义”，也不是投诚。但事实终究是事实，王芸生确实是“起义”了；“投诚”了——笔者注）

一个主动争取进步的民主人士诞生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报人消失了；一张为人民服务的报纸诞生，一张“文人论政”的报纸消失了……以这篇不同凡响的“新生宣言”为一个明显的分界线，此后，王芸生的几乎所有活动，都与自由主义没有多少关系了，这和罗隆基、储安平等是非常不同的。和自由主义在思想上割断了联系，并且进行了持续的彻底的清算，又使他和萧乾，甚至李纯青等有了相当的距离。

第四节 陈铭德与邓季惺：悲情 坚韧的新闻伉丽

一 生平及思想简述

在中国现代报业发展史上，如果没有陈铭德和邓季惺的名

字，那么，就会有严重的缺憾；同样，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史迹，那么，这部思想史将显得不完整。与同时代的民间报人相比，这对“新闻界的右派夫妻”，他们走向自由主义的历程远比别的报人要艰辛、曲折和痛苦得多……

陈铭德和邓季惺创办了《新民报》，并始终把握着它的“民间方向”，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坚忍执着地把这张以“作育新民”为其宗旨的民间报纸导向了自由主义的航道。

很长时间，《新民报》根本无法做到像《大公报》那样的奔纵放达、“为所欲为”。原因何在？就在于其身后站着一个人兵自重的赳赳武夫！

抗战前夕，陈铭德应邀在南京以《我国的新闻事业》为题，作了反极权主义的新闻思想的发挥，以及对自由主义新闻前景的乐观憧憬。嗣后，邓季惺与他前往日本考察《读卖新闻》，回国后更坚定了《新民报》的民间立场和自由主义方向。由此，使他们在思考和行事上常常与“政府”和各党派政治集团意见相悖，并不断使自己陷于尴尬。

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在中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报人，必须提着脑袋时刻与魔鬼周旋。他们感到悲哀的是，好不容易盼到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民主与和平刚刚露出微光之时，自由主义报人的处境却愈加险恶。

他们确实想以知识精英的身份留在民间社会，但他们却又幻想以“选举”的方式楔入现实政治系统，进而通过参与制定“出版法”来保证言论出版的自由。在国共两党武力斗争的年代，他们提出了“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方针，但结果却是“左右为难”，始终不得要领……他们的墓碑上刻着赞美他们一生业绩的颂词，其中官方对他们“毕生追求新闻自由”作了充

分的肯定……

陈铭德（1897～1989），重庆长寿县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7岁时，父亲奉派到汉口做生意，亏蚀后，被东家诬陷为贪污营私，百词莫辩，终于一死以表清白，这件事对陈铭德一生的刺激相当大。在重庆读中学时，他和同学刘正华结下友谊。1919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这年春天，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学运，并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立志追求中国的民主、自由和繁荣富强，同时在灵魂深处暗暗种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这一特点，和《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等人的思想经历有极其相似之处。1921年，还是“新青年”的陈铭德经好友谢持、张继介绍，与王昆仑、许宝驹、邹明初等一同加入了国民党^①。

陈铭德在北京政法大学念书时，就深受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对新闻事业具有浓厚的兴趣，课余曾兼任北京《国民日报》编辑，这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1924年，毕业回到四川，在成都法政学校教授新闻学，向学生介绍西方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同时任《新川报》编辑，两年后到重庆参加《大中华报》的编辑工作。1928年，他来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参与编务。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感到非常的苦恼。因为“在这个官方通讯社工作，事事受到束缚，无法自由发展，与自己幻想的新闻自由抵触很大，因此，产生了自己办一份民间报纸的念头”^②。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同事吴竹似、刘正华商

^① 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②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量，取得认同后，又将具体计划告诉了当时在中央社任主任的
同乡学友余唯一，当即得到支持。《新民报》创办，陈铭德被
推举为社长。

邓季惺(1907~1995)，字友兰，重庆奉节县人。1925年，
与《大中华报》编辑吴竹似结婚，育有一子二女。其子即为当
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931年7月，吴竹似先生积劳
成疾，病歿于北平；1933年1月，邓季惺与陈铭德先生在北
平结为伉俪：这年夏天，她毕业于私立朝阳大学法律系，在南
京先后任司法行政部民事司和刑事司科员，不久从事女权运
动，并任南京私立第一托儿所所长，与曹孟君、谭惕吾等主编
《新民报》副刊之《新妇女》周刊，旨在“群策群力，为妇女
界作一番日新月异的工作”^①。并同时主持“法律问答”专栏，
后任《新民报》副经理，成为陈铭德先生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和
思想追索艰险旅途上的忠实伴侣。

徐悲鸿在陈、邓二人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以两画相赠。其一
是《八哥图》题诗为：“幸有立场容饶舌 如今为政在言多”；
其二是《风雨鸡鸣图》题诗为：“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取
意《诗经·郑风》。徐的诗画准确地预言和赞颂了夫妻二人执着
于“文人论政”的可贵和艰险。

1929年9月9日，《新民报》正式诞生于南京。报纸取名
“新民”大有再创《民报》“作育新民”的理想追求。后来
陈、邓还阐释了另一层更深的意义，那就是想把“五四”与新
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通过这张民间报纸继承和发扬光大。但
是，该报在创刊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一直受到四川军阀刘湘的
控制，无法施展其作为民间喉舌的抱负。直到抗战爆发后的

^① 参见《新民报》：《新妇女创刊词》。

1938年，才得以摆脱这种不自由的尴尬。抗战8年中，《新民报》在陈铭德、邓季惺的艰难操持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特别是在坚持自由主义办报方向的同时逐步完成了现代企业进程。1945年底，因卷入《大公报》与《新华日报》间的笔战而招致批评。1946年11月，陈、邓二人双双当选入国大和立法院，希望能促进“宪政”、制定“出版法”来保障公民及自由主义报人“言论自由”的权利，结果碰了一鼻子灰。1947年4月，陈铭德主持制定了《新民报》“五社八版”言论编辑方针，继续恪守自由主义立场。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社被查封，陈、邓二人被“党国”诬为“匪谍”。1949年2月，《新民报》北平版被解放军接管，宣布与总经理陈铭德脱离关系。同年4月，邓季惺在中共作家夏衍安排下抵达北平，主持北平版报务；同年5月，陈铭德亦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秘密潜回上海。5月27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在军事管制委员会查明其经济来源后，定上海版为“民营报纸”。同年7月，《新民报》成都版和重庆版先后被国民党劫掠。1953年初，上海《新民报》与《亦报》合并，易名为《新民晚报》，陈铭德任社长，邓季惺为顾问；该报由全盛时期的“五社八版”变为上海一版而告终。其编辑方针亦入乡随俗，不再与自由主义有任何关联。不久，赵超构被任命为《新民晚报》总编辑，陈、邓二人均以政协委员的身份频繁参加开会、观光之类的重要事务不再与报务有涉。1957年5月，本来与新闻界毫无关系的他们，突然被邀为“老报人代表”参与大鸣大放，结果双双被打为“右派”。1978年平反后，陈、邓同时被邓小平提名选任为第五届政协委员；同年10月，陈铭德任“民革”五届中央委员；1981年，增选为中央常委；1982年，二人同被邀任《新民晚报》顾问；1988年二人又被选任为第七届政协

委员。1989年2月21日，陈铭德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3岁；1995年8月29日邓季惺亦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二 自由主义之累

《新民报》草创时期的干将级人物吴竹似和刘正华之外，另一个必须提到的重量级人物，就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报人张友鸾。早期的《新民报》，仅靠吴竹似和刘正华的业余兼职，是难以打开局面的。于是，在1929年冬天，陈铭德约请张友鸾来报社担任总编辑，从此，才打开了局面。张此前曾就读于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是邵飘萍的学生，故而深受邵的影响，是个具有坚定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年轻报人。张在主笔《新民报》之前，曾有过担任北京《世界日报》和南京《民生报》总编辑的经历——张任《新民报》主笔时年仅25岁，可谓后生可畏。

自陈铭德延请张友鸾加盟后，《新民报》才进一步明确了“办报方针”即以青年人为主要读者对象，在尽量发表国民党和四川省有关方面的消息外，更广泛登载一些传播新思潮且能争取青年人阅读的内容。

1930年9月9日，陈铭德在《新民报两周年纪念专刊》上撰文，提出以“四事”与同人共勉，这实际上可以被视作是《新民报》草创时具有淡淡的自由主义色彩的办报宣言，这“四事”为：

- 一、传达正确消息；
- 二、造成健全舆论；
- 三、促进社会文化；

四、救济知识贫乏。

决不能将民营之《新民报》变成“官报化，传单化”

.....

可叹可悲的是，真正要做到非“官报化、传单化”，且“造成健全舆论”实可谓何其难矣。原因何在？就在于它的身后站着——一个军阀武夫刘湘——《新民报》从创刊到1938年刘湘去世，在这长达10年的时间中，它一直没有真正摆脱过刘的阴影。

经济上的不独立，致使报纸从一开办就受制于他人。当初为筹集办报经费，陈铭德被迫回重庆找到《大中华日报》的主持人陈学池，陈当时正做着刘湘的政治部主任。由他向刘的旅长蓝文彬筹得经费两千元。随后，陈铭德又通过孙科身边的几位老朋友的关系，由陈学池拨津贴两千元资助，所以后来在检讨这一重大失误时，陈铭德和邓季惺遗憾地说：“就是这样，一面向地方军阀求援，一面向国民党伸手……”^①另一方面，刘湘割据四川，他在与四川各派军阀逐鹿争雄之际，也正需要有一张“自己的报纸”来宣传其文治武功，这样，陈铭德的这张报纸就无可奈何地成了刘湘的私家报纸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民众抗日热情高涨，借此“保种救国”之历史契机，中国的自由分子和民间报刊在思想观念和政治追求上悄悄地向自由主义的立场回复，从这一角度来审视和考察《新民报》及它的主事者陈铭德先生，其回复和转变亦是有迹可寻的。

这一年的12月15日，蒋介石迫于党内反对派系的压力宣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春秋》第3~6页。

布“下野”。而就在这一天，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代表又云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政府出兵抗日，当即与军警发生激烈的冲突，学生代表多人被捕。当晚，陈铭德及报社同仁惊闻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会，张道藩等要员主张将逮捕的学生一律处死。情况十分危急，经反复考虑，陈铭德授意《新民报》撰写社评，向学生和民众透露这一阴毒黑幕。12月16日，《新民报》初显其自由主义锋芒，以《昨日中央党部门前学生行动评判》的社评巧妙而不失原则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局面的严肃立场。其中耐人寻味的有这样一段文字：

所幸今日政府，乃民众之政府，故时时尚能予以优容。假使有一二不肖之徒，从中挟嫌中伤，则死一学生即减少国家一份力量，学生诸君愿之乎？学生诸君如以赤血牺牲一不肖之手，何若准备牺牲于未来疆场之上乎？试观昨日在中央党部被逮之学生，有主释之者，有主杀之者，使真杀之，诸君又将何以对学生耶^①？

由于陈铭德的节外生枝，张道藩等人的图谋终未得逞，但却引起了“党国”及其喉舌《中央日报》的极度不满。为混淆视听，这张第一“党报”竟说当日被军警击毙并推落南京珍珠桥下的请愿学生，是“自行失足落水”；而《新民报》在披露事实真相时，还悲愤地刊诗一首，中有两句写道：“中央日报门前？不知多少冤鬼。”《中央日报》遂以诬蔑中伤为由，将《新民报》告上法庭。由于学生和民众纷纷表示，在南京地方

^① 《新民报》1931年12月16日社评：《昨日中央党部门前学生行动评判》。

法院开庭时将前往作证，终使第一“党报”怯退而作罢。很快，陈铭德便接二连三受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警告，CC系头目、“中宣部”秘书方治还直接打电话威胁陈说：“关于学生的消息，你们要慎重刊登；如果仍然不听话，只好把你们的报馆封掉，把你们关起来！”面对极权政治的压力，《新民报》并未屈服，12月20日，在《学生应有之觉悟》的“星期评谈”中幽默地说：“青年学生之责任，乃在唤起广大民众共同对外；其对于政府，不过以民众力量，采取有效方法，以监督其不敢卖国与不敢误国而已。”就在这篇后来被陈铭德和邓季惺检讨为表示了“《新民报》软弱屈服……从同情学生一转而为国民党政府张目”^①的评谈中，仍坚持认为，监督政府“不敢卖国与不敢误国”是民众和民间报刊不可让夺的神圣权利。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由此加强了对《新民报》的检查和压制。1932年6月19日，《新民报》首次受到“首都警备司令部”停刊一日的处分，其罪名是两天中有三条新闻未送检即“径行发表”同年11月1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继停发每月给《新民报》的800元“津贴”之后，又使劲向前推了一把。最后将陈铭德彻底推向了民间报纸所应有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其公布的《宣传品审查标准》中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均为“反动”；凡批评“党国”国策者，为“危害民国，必须一律禁止”。这种意欲禁绝民间自由主义呼声的极端做法，终使陈铭德和他的报纸公开地走向了与“政府”对峙的境地。

^① 参见《新民报春秋》第7页。

三 公开对峙与委曲求全

这种公开的对峙和独立，是以罗承烈担任主笔后为其明显的标志的，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1935年6月。罗承烈的到来，一改《新民报》此前两三年的悲愤和隐忍，重新举起“社评”这面自由主义的旗帜。尽管在他主持笔政之初，其自由主义色彩远不及《大公报》鲜明，甚至还曾出现过诘难胡适先生的《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这样的尴尬和荒唐，但是其在大量的社评文字中所暗含的自由主义苦心，却是不难让人觉察到的。

对学潮的声援和对学生的同情，是《新民报》借机发表其自由主义意见的一大由头。

1935年12月，《新民报》连续发表社评文章：《北平学生万岁》、《为平市学生运动敬告全国青年》和《再论学生运动》等，悲愤批评“政府”并认定“保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和爱护国家民族的天赋人权”的学生运动，是“合理举动”，政府无权横加干涉和武力镇压，因而更引起“党国”的百般忌恨。尤其是在接连刊登了首都妇女救国会和南京学术团体救国联合会筹备处的“寻找学生代表启事”后，更是“授柄”于“党国”。12月26日，在给《新民报》以停刊三日处分的同时，南京警察厅又把陈铭德拘留起来：警察厅调查课课长赵世瑞教训陈先生说：“《新民报》刊载这个启事，暗示学生群众，政府扣留了他们的代表，故意造谣，煽动学潮。你的老婆邓季惺在妇女救国会，叫她当心些！”^①被警方放出来后，陈铭德和邓季惺却“死不悔改”，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潮，关注民生，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

争取舆论自由，仅在那段时间，《新民报》便接二连三地就声援公务员被裁、灾区流民困苦以及大学生就业等社会问题发表了《论失业请愿》、《再论失业问题》、《为灾民请命》、《大学生就业运动》，以及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新出版法》出台的社评，因而导致“党国”宣传部检查机构对它的严厉监控，报纸“开天窗”更是家常便饭。如 1936 年，由于纪念“九一八”的社评和副刊文章被扣，陈铭德指示编辑部同时在两个巨型天窗嵌入“请看新民报言论正确消息灵通”十三个不屈的大字，以示抗争。第二天，副刊中又专门刊发施白芜先生的《曳白记》，对“党国”检查手段之卑鄙无耻作了辛辣的调侃和挖苦。文曰：“胡为曳白，我何多说，事到如今，本来只有焚笔掷砚矣，奈何饶舌？留待‘五十年后’再说可耳。于是乎得过且过，心安理得，上下恬嬉，天下太平。投笔问天，今世何世？”^①

在对“七君子事件”的连续报道和点评中，陈铭德和他的《新民报》更显出自由主义之风采。而在纪念鲁迅先生的社评文字中，更将该报的思想评判引向客观和深刻，而这种价值评判甚至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是卓越、清醒和令人信服的，它在社评中指出：

先生与陈独秀诸人创办之《新青年》杂志，即负启蒙运动之责任，今则官者官，死者死，而变节者变节也。数年前左联之声著于国内，许多自认为领导文化运动之‘前进’分子，对鲁迅先生且加以诋毁，殆见环境日非，纷纷转变，而先生仍保持其高洁之情操，独特之见解，与其嘲世讽时之一贯态度，不以贫苦易其心志、威武屈其性行，是真可

^① 《新民报》 1936 年 9 月 19 日南京版副刊《曳白记》。

以模范人生而劝来兹也。

.....

目前国势贴危，言文学者多纷言民族文学事，先生于病苦颠连之中，犹力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以期促成联合战线之建立，热情奋发，老而费懈，是真可谓东方之高尔基欤。^①

这种言论，在同时期的南京报纸中实为仅见。

1936年早春，陈铭德先生应邀在南京“冬令讲学会”上以《我国的新闻事业》为题，作了反极权主义的新闻思想的发挥和对自由主义新闻前景的憧憬之后，由夫人邓季惺和报社经理张君鼎陪同前往日本。表面上，他的直接目的是向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购置一台旧轮转印刷机，但其真正的目的却是借机考察这张日本的自由主义大报的办报思想和经验。这次东渡考察，使夫妻两人更坚定了《新民报》的民间立场和自由主义方向。

1936年夏天，陈铭德正式邀请夫人邓季惺参加报社的工作，担任副经理职务：邓参与《新民报》的经营管理后，对财务会计和发行、广告、印刷等业务建立了一系列科学严格的制度，使报纸逐步走上了企业化经营的道路，并促成其改为公司。由于考虑到自由主义在中国处境的艰难，“我们把个人的事业变成公司组织，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既要找些人来挡风挡雨，掩护这个事业；又要合作的人不过分干涉《新民报》的内政（包括人事、财务和版面），好让我们还有点‘自由’。”反复酝酿之后，一个名为《新民报》

^① 《新民报》 1936年9月26日社评。

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成立了——1937年7月1日，《新
民报》发表了董事长和董事、监察人名单：

董事长：萧同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
常务董事：彭革陈（国民党中宣部新闻事业处处长）；
 梁寒操（立法院秘书长，属孙科系）；
 王漱芳（南京市政府秘书长，与何应钦等有关系）；
董事：方治（CC系头目）；
 卢作孚（代表四川民族资本家阶级）；
 李泮香（财阀刘航深之妻）；
 张廷休（与CC系和何应钦有关系）；
 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
 邓季愷（经理）；
 罗承烈（总主笔）；
 赵纯继（总编辑）；
监察人：李秉中（黄埔系代表）；
 黄仲翔（复兴社代表）；
 沈辅彝（刘湘派系代表）；
 余致中（即余唯一，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主任）；
 邓建候（立法委员，与孙科有关）。

这份名单对我们深入和多角度地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报业发展的历史，具有不可缺少的特殊的意义。

陈邓二人后来感慨万端地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安排这张名单，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这个名单，包括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各派各系（只是还没有孔宋家族在内），而与刘湘有关的人则都以夫人出名而不使其直接露面。这样，就名单阵

容来看，是多么的‘中央化’，不带刘湘色彩，可以苟全性命下去了。国民党各派系中哪一派也把《新民报》吃不下去。加以除了李泮香代表刘航深，沈辅彝作为刘湘代表的代表，先后确对《新民报》各有若干投资外，其余萧同兹以下的国民党官员及《新民报》的高级职员都是赠股。他们当然不会来干预《新民报》的内政，遇有迫害来临，多少还可以来几句口头春风。以董事长萧同兹来说，他就从未对报社发过任何指示，干预过任何行政。在国民党内，萧同兹的确为《新民报》受了不少怨气。蒋介石曾当面斥责过他，迫使他于1945年辞去《新民报》董事长名义。当然，这些董监事中也并不是人人都对《新民报》友好的，如方治就是对《新民报》仇视到底一个。萧同兹对《新民报》的前途也还有他自己的看法，在1946年蒋介石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之际，他几次同铭德和南京版总编辑曹仲英谈话，说：‘战争认真打起来，共产党一定顶不住，那时，南京就将是《救国日报》的世界而没有《新民报》的份子。’他还举史量才《申报》因与国民党政府作对而招致丧命垮台的后果劝引为殷鉴。^①

这不是什么“软弱性”和“两面性”所能简单说清楚的。自由主义报业与整个自由主义运动一样，其在中国成长的险恶与辛酸、无奈与坚忍透过这份别出心裁的名单，可以让我们充分体会到。

在此，特别要谈谈卢作孚先生。陈铭德邀请卢参加董事会，虽然主要是借重他的崇高声望，但更深的用意是看重他骨子里的自由主义精神。陈铭德和邓季惺回忆道：“民生公司对《新民报》的投资和增资，还是抗战期中迁到重庆以后的事。

^① 转引自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

卢在 1935 年先后在《新民报》发表了《广西之行》和《和谐运动的具体意见》……”

为什么特意要提到卢作孚的《和谐运动的具体意见》？是因为这篇具有文献意义的自由主义“纲领”，对《新民报》的精神走向有着特殊的意义。卢作孚的这些观点，不应被我们所忽略——他并不仅仅是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角度，而更多的却是从一个卓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度，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现状提出了他的诘难和远景规划——他说：

（一）盼望国内不和谐的双方自身扭转局面是不容易的，应该由要求双方和谐的第三者起来，客观观察研究其不合作的原因而促成其和谐。这第三者是国民全体，尤其是社会上有知识、有地位的份子。

（二）目前的中国局势，绝对不容再给伺隙者以任何机会，要改变现状而不容许根本推翻现状。

（三）要求全国统一必须先有整个计划：就生产建设说，整个国家应该有全盘自给计划，各省间也应该有相互交换的办法，中央应尽力扶助地方或指导地方经营的事业，凡能在国家统一的要求下努力，不论是地方或私人，均应给以奖励，至少予以承认。

（四）要从中央政府起健全政治机构，领袖只是指导动向，而不是越过专管机关，直接处理一切琐碎事情。凭着领袖一时的情绪，急遽下判断，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五）地方与中央要时时接头，时时商洽，排除隔膜^①

^① 转引自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

这些温和善良的意见体现了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卢所谓的“和谐运动”，实质上就是他和陈铭德、邓季惺所企望的自由主义报业前景和中国文明进步的前景。卢的一些精彩意见，已超越了其对国民党的规劝和批评，而上升为超越时空的、对中国形形色色的极权政治的规劝和批评。陈、邓二人在时隔 50 多年后是如此深情地提到卢作孚，提到他的这些精彩意见，明显可见这些思想对《新民报》的影响是深远的。

四 南京旧姿态与重庆新面貌

1938 年 1 月 15 日，《新民报》重庆版以南京旧姿态和全新的精神面貌与后方读者见面了。这时，陈铭德与张恨水和一度离开《新民报》的张友鸾取得了联系，约请两位先生参加了《新民报》的编辑策划工作。稍后，张慧剑和赵超构也相继加盟进来。“三张一赵”的会师不仅壮大了陈铭德的办报力量，而且还标志着这个自由主义者群体的又一次全新组合与登台亮相。

在陪都的八年中，有几件事不可不特别提出来讲一讲：

一件是报社人员的壮大，到 1942 年，人员就已经增加到 200 多人；这期间担任过主笔的就有罗承烈、赵超构、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姚苏凤、崔心一、方奈何等人，均为当时有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第二件是以自由主义的兼容并包气度壮大了作者群体。陈、邓曾非常得意地说：“几乎把先后入蜀的文化界各方知名人士罗致无遗。”这些人士中大多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其中重要的有：章士钊、陈寅恪、吴宓、孙伏园、顾颉刚、朱伯崑、黄炎培、崔敬伯、卢冀野、老舍、巴金、朱自

清、叶圣陶……他们感慨地说：“一个报纸能拥有这样浩荡的作者队伍、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作者们荟萃到后方，是不可能的。”^①

第三件是采编队伍的空前壮大；其中先后担任过副刊主笔或编辑的有夏衍、凤子、沈起予、李兰、张恨水、张慧剑、吴祖光、孙伏园、谢冰莹、王楷元、施白芜、黄苗子、郁风、陈白尘、聂绀弩、陈迦冬、张白山等。担任新闻编辑和记者的先后有：张友鸾、程大干、赵纯继、陈理源、方奈何、胡乃琨、郑拾风、张林岚、王志俊、方白非、张十方、张先畴、王达仁、浦熙修、张西洛、周亚君、李廷璜、廖毓泉、高汾、何鸿钧、姚江屏、邓蜀生、韩辛茹、胡作霖、程海帆、曾梦生、何明光、张天授等。

邓季惺解释说：“铭德曾想学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作风，把各党派人物都网罗进来，只要对报纸的发展有利，实行兼收并蓄。”^②这些人中大部分也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

第四件是在抗战中逐渐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企业进程，“大踏步走上了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的道路”。八年中，先后投资《新民报》的就有：民生实业公司、四川畜产公司、宝源煤矿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华西兴业公司、华懋公司、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轮渡公司、重庆牛奶公司、和成银行、美丰银行、川康银行、川盐银行、华康银行、和通银行、成都济康银行、怡益银号，几乎将大后方著名的“川帮”工商企业和银行都囊括了进来——与民间企业的股份制合作，充分保证了报纸经济独立于党派之外这一自由主义的根本优势。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春秋》第3页。

② 同①。

正是由于做成了这几件大事，《新民报》努力在意识形态上鼓吹民主宪政，对国民党包办的参政会、省市参议员选举等进行了讥嘲和揶揄；并且对国民党官僚资本对民营企业的种种管制和束缚政策进行了持续的批评和规劝。不过，鉴于抗战时期的特殊性，《新民报》也和《大公报》等民间报纸一样，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着想，社评自然不如抗战前那样锋芒毕露；加上战时国民党宣传部和军警特对新闻控制的严密，一般而言，社评往往多谈国际少谈国内，评远不评近，“从正面反映真实、伸张正义既难办到，于是退一步运用社会新闻和副刊从侧面、从背面、从小事物，点点滴滴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的恶政与社会病瘤。”^①陈铭德和《新民报》骨子里的自由主义使其在行事和思考上常常与党派政治集团利益不合，并常常使自己陷于尴尬境地，最突出的有这样几次——“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当即到《新民报》向部分同仁叙述了“真实情况”，但迫于政府压力，只得以《抗命叛变袭击友军新四军全解散／叶挺就擒交军法处审判／项英在逃正严缉归案》的“通稿”刊发了消息。后来，又再次迫于压力刊发了《军事上不许民主》的社评。这篇社评说：“民主是件好事情，我们愿在一切方面赞助民主的要求，同情所有在政治、经济、社会上争取民主制度的人，但是只有军事上断然不许民主！”^②尽管说是“迫于压力”，然而陈铭德以后坦然承认，“这虽是奉命发言，同时也多少代表了当时我们和不少资产阶级的真实思想。”^③可惜，正是这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春秋》第6页。

② 同①。

③ 《新民报》重庆版 1941年1月21日社评：《军事上不许民主》。

种赞同“军事上不许民主”的“真实思想”，恰恰可悲地暴露出了中国自由主义者思想上的尴尬和精神上的先天不足。

再一次是 1945 年 11 月，《新民报》所介入的《大公报》与《新华日报》的那场论争。

以“超党派”和“真正代表老百姓讲话”的《新民报》自然毫不踌躇地加入了论争，并不假思索地站到《大公报》一边。11月26日，在《对大公、新华两报论战之观感》的社评中，对《大公报》的“敢言”极为赞赏，而对《新华日报》却是这样评价的：“它是色彩鲜明的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自不能认为《新华日报》的话是老百姓心里的话，可是也不能说一句没有。我们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说，他们是比较代表共产党说话的成分多。”社评还说：“《大公报》有个主张是‘要变不要乱’，这个主张在字面上是正确的，而《新华日报》就以为中央不曾变，而中共不曾乱……变了没有？似乎很少；乱了没有？似乎不很少。……我们以为法律的观点不要去事实太远。变而不乱的关键，就在于调和法律的观点与现实的观点，一方面尊重法纪而同时能顾全一部分的事实问题，否则，永远是个僵局。”社评最后还“代表人民”说话了，它说：“《大公报》也好，《新华日报》也好，大家看看人民有些什么痛苦？人民急于要求些什么？人民要求的是：别以家里的星星小火闹出大乱子，要交通恢复早早回家；要求物价平定，好好计划一下，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以补偿八年颠沛流离之苦。这是最低最急而又最平凡的起码要求。国是不定，一切谈不到，大家继续痛苦下去 事实也好 法律也好 和人民有什么相干呢！”^①

① 《新民报》1945年11月26日社评：《对大公、新华两报论战之观感》

陈铭德几十年后亦认为，“要变不要乱”的主张，在当时确实反映了“某些中间阶层人士对时局的看法”。

这种令《新华日报》非常愤慨的“新闻言论”应该让国民党对《新民报》满意了吧？其实不然。由于它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始终和《大公报》等民营报刊一样，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力量”的身份发言，所以“政府”对它仍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控制 and 凌压，试图迫使其就范。陈、邓回忆说：“找铭德寻麻烦最频繁的，却是国民党中宣部秘书、季惺的一个胞弟，他每天只要看到《新民报》有一条消息对国民党不利，就要给铭德来电话，有时严斥：‘你们还不想开门’。”有一次，他甚至严辞警告陈铭德：“《新民报》这样搞下去，不仅报馆会关门，连你自己的生命也说不定要出问题！”陈回答说：“那就让他们把我杀死好了！”^①

五 “中间偏左，遇礁即避”

严格意义上讲，陈铭德和邓季惺之所以这样顽固坚持其自由主义立场，之所以敢不听“党国”的招呼，是有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大背景在鼓舞和鞭策着他们——这就是以自由主义者为中坚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战后“如同火山一般喷发出塞，形成空前绝后的‘参与爆炸’（Participation explosion）浪潮。”^②许纪霖先生在分析这种政治参与浪潮的主观来源时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反省和强烈的赎罪心理所致。他还专门引用了青年党领袖、著名的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

^② 许纪霖：《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 1997年版，第 41 页。

自由主义者左舜生的话来对胜利前的历史进行检讨。左舜生是这样检讨的：

过去五十年，中国之所以不能有一种真正的宪政出现，其大部分的责任，应由中国的知识分子负之……他们只知道如何去找一个可以使我们升官发财的主子，而决不敢建立自己的政治主张^①。

因此，和不少民间报刊的主持者和经营者相似，陈铭德和邓季惺内心中亦有这样的自省和悔罪意识。

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三种模式当中，他们都似乎沾边，但又有明显相异之处，比如，陈、邓二人在 1946 年 11 月。都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所谓的国大和立法院选举，并双双当选：他们幻想能插进所谓的国家权力机关，希望凭借“宪法”和“立法院组织法”，能制定出一个“出版法”来保证言论出版的自由。本来，《新民报》参选的还有罗承烈，但由于罗和邓季惺均受到国民党的排挤，不予提名候选，罗只得被迫放弃。而邓季惺的当选却是因为四川省 140 多个县参议员的支持，加上邓的故乡奉节县无他人“竞选”，才决出了喜剧性的结果的。然而，陈、邓二人加入“政府”却不是职业官僚——此不同于第一种模式。再比如，他们确实是以知识精英的身份留在民间社会，与政治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绝然不同于梁漱溟等人。他们以民间报人的良知，以文人论政的智慧和勇毅，与政治系统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又不同

^① 左舜生：《谈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 参见《宪政》杂志 1944 年 2 月 1 日，第 2 期。

于第二种模式。又比如，他们反对党派政争，主张自由和中立，但并不是毫无政治倾向性。战后，迫于“形势”，他们无可奈何地确定了一个“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办报方针，赵超构（林放）《延安一月》连载通讯的发表。就是《新民报》贯彻这个方针的首次具体表现——但在1946年，《新民报》向社会宣示的政治态度却是这样的十个大字：“公正客观、不左倾、不右袒”，甚至还具体表达了这样一些原则：“言论态度绝对与人民共休戚，与时代共呼吸”；“发挥自由主义精神，不为任何势力所左右”等等。

陈铭德和邓季惺与三种模式均沾边，实在是透露出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处于国共政治争斗拉锯战中的尴尬和无奈。

后来，在回忆何以要确定“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八字方针时，他们是这样叙述的：

……我们和报社的主要骨干罗承烈、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等感到《新民报》在中国的舆论界已有一定的地位，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有明确的言论编辑方针。在国共两党的尖锐斗争中，报纸必须倾向进步，多少反映人民群众反暴政、争民主的要求，才能拥有读者，才不愧做一个民间报纸，也才能有所发展，跟国民党走是死路一条。另一方面，报纸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办的，对国民党的劣政是憎恶的，但我们和部分同人对蒋介石个人还寄予幻想；再说刀把子操在他们手里，他们可以随时摧毁你的报纸，而生存至上，事业第一，是我们办报的信条。在发展和生存的矛盾中，要想左右逢源，怎么办呢？大家凑了一个八字诀，就是：“中间偏左，遇礁即避。”主观认为：居国共两党之中，而偏向共产党；遇到国民党的高压时，又

要暂时退避。张恨水还就此向重庆社编辑部作了一次讲话。所谓“超党派”、“超政治”、“纯国民”的口号，也同时在报社内外叫开^①。

他们还解释道，执行这一尺度，“左”不能左到把报社弄关了门，“右”不能右到和国民党一个鼻孔出气。

其实，通观《新民报》在战后的“表现”，都是未偏离其自由主义的立场的：所谓“中间偏左，遇礁即避”，亦不过是“公正客观、不左倾、不右袒”的另一种微妙的表达罢了。

为了使我们能充分了解，或者说能领略陈铭德们的“左右逢源”，或者“左右不是人”，这里再举《新民报》北平版1946年4月4日的《发刊词》，看看它到底是偏左还是偏右。北平版的主持者张恨水是这样来表达其政治信念的：

八年苦战之后，无论前后方人民都疲劳极了，所需要的是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谁不让我们安居乐业，谁不让我们休养生息，无论你什么政策，什么党纲，我们实在都不感兴趣。凡是不体恤老百姓的举动，报纸纵不能反对，至少也不应当捧场。再说明一点，我们应当向执政的党和在野的党作积极的建议，请他们顾全老百姓。倘若我们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建议，我们也不为执政的或在野的曲为解说去欺骗百姓。……我们感觉到老百姓对哪一天哪一处能买到平价面粉是感到兴趣的事，我们应当设法报道；反之，老百姓对各党各派分配府委、部长并不关心，我们也不引为是重大新闻而去加倍渲染。还有，八年来的新闻是

^①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

一贯的紧张，我们愿意在纸面上轻松一点，免得读者对报纸寂然寡欢。

六 几个纲领性自由主义宣言

为了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将《新民报》南京版日刊 1946 年“双十节”所发表的《复刊词》转述如下：

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大多数人群的意见和要求，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我们在政治斗争极端尖锐化的环境之下，精神上时时感受一种左右不讨好的威胁，但我们的态度很鲜明：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我们服膺三民主义，决不信奉共产主义；我们拥护现政府，但确不满现状，认为一党专政的办法，应该赶快结束。我们相信大家只要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要向同归于尽的道路上走，则忠实执行政协各项决议，未始不是解决政治纠纷的有效办法。我们反对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不能反苏，也不能反美，中国应做苏美间的桥梁。我们对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式的财政经济政策深恶痛绝，希望增加生产，促进外销；紧缩通货，平抑物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救济贫苦失业大众。有人说：你们这样主张，必为当局所不喜，又不啻做了中共和民盟的尾巴。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以主观之良心裁判，配合客观上人民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

我，皆非所计了^①。

从这个具有纲领性的办报宣言可知，它是一张信奉自由主义原则、矢志坚守民间立场的报纸。它所尊崇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可以说都是正宗的自由主义原则。如：反对暴力解决政治争端，呼吁国内和平；反对极权政治，主张民主自由；反对一党专政，提倡多党协商；反对外交上的一边倒，主张理性外交等等。特别是它对民盟的批评，以及它郑重声明要坚持“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明显将自己的自由主义水平提到了当时的《观察》和《大公报》等民间自由主义报刊的高度。

事实上，早在抗战胜利之初，《新民报》在南京版日刊发表《复刊词》之前，它就已经“自由化”得非常厉害了。在它所属的上海版、北平版、南京版、重庆版和成都版的版面上，特别是在它的言论文章里面，主张“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多党协商”；“向往英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等等，已成了它思想和观念的基调。而希求在国共两极争雄时探索出一条可行的“第三条道路”，更是成了它急切的向往。

但是，南京版日刊的《复刊词》毕竟还“自由化”得不太彻底，其中所谓“我们服膺三民主义，决不信奉共产主义；我们拥护政府，但确不满现状”等字句，就明显与自由主义相悖，至少在表情上显得有些暧昧。稍后，上海版的《复刊词》就更进了一大步，首先，它毅然扔掉了“服膺三民主义”和“拥护政府”的陈词滥调，同时也扔掉了它的嗫嗫嚅嚅，谈到

^① 《新民报》1946年10月10日《复刊词》。

自己的立言态度时大义凛然地宣称：

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我们相信一张报纸必须配合时代的需求，始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这很容易回答：为了国民的幸福，我们需要民主自由；为了国家的富强，我们需要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平统一，这是普遍于我们民间的要求，也都是极平常的道理，我们愿追随各界稍尽一点鼓吹的责任^①。

1947年4月14日，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举行了董事监察联席会议——这是《新民报》发展史上的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事，会议除通过了总管理处设置总编辑，由彭革陈担任的决定外，还通过于由罗承烈、赵超构、彭革陈合拟的五社八版总的言论编辑方针，这实际上是《新民报》具有自由主义最高水准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这个方针决定，本报的整个意识形态，应以客观的态度，发挥民主自由思想为原则；本报立场应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及促进人民自由幸福之前提下，不偏不倚，不囿于任何党派之立场；本报各个地方版以及同一版面之新闻态度与言论方针，应力求统一；并须严格遵守总管理处之指示，力求避免有自相冲突矛盾之情事发生，尤忌各自为政，自由发挥其个人思想自由之作风。必须牢牢记取“报社有自由，个人无自由”之原则。在言论方面，要求不受

^① 《〈新民报 春秋〉第50页。

任何党派意见之束缚，追求真理，明辨是非；对政府施政的批评，应取建设性的建议态度，不作消极的讽刺或破坏性的抨击，应审度当前的政治社会环境，采取稳重而进步的言论标准。在编辑方面，要求对国际国内要闻处理，态度力求严肃公正，并多采用本报特访消息；社会新闻应避免无谓之刻薄与刺激；标题切忌逞一时之痛快，而入于尖酸刻薄之恶习，以免招引不必要之反感。在副刊方面，应避免作政治性之宣传和主张，应幽默多于刺激。在采访方面，要求对实际政治问题之访问与描写力求客观，最忌受人宣传，被人利用；在写政治性文稿之时，应刻刻不忘本报公正不偏之立场，对政治社会人物之描述，尤不应有个人爱憎之表现。^①

这次董监会上，陈铭德还提出了《本报言论编辑方针总检讨》。他着重指出：“过去各版连续出毛病，在于各自为政；个人有自由，报社无自由，而作风上偏于幽默讽刺，缺乏一种积极性的严肃稳重之泱泱风度。”还指出：“本报虽拥有广大群众，但只具有社会影响，而政治上之影响并不大，国际新闻界虽很重视本报之超然立场，但亦只限于消息报道。今后应该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本民间报纸之公正立场，发挥言论上之领导作用，使政治影响能高于社会影响。”会议还决定以《新民报》创办人之一的刘正华为总管理处协理，并兼任重庆社经理，成都社总编辑赵纯继改任经理。这是由于原先担任这两社经理的张君鼎和崔心一加入了张君励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有违《新民报》的超党派立场，所以毅然免去二人职务，以保

^① 1947年4月14日《新民报》：《本报五社八版言论编辑方针》。

持报纸超然独立于党派之外的清洁与劲挺。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新民报》具有自由主义气息的综合性副刊《呼吸》。

《呼吸》正式创刊于自由分子掀起宪政高潮的 1946 年 10 月 16 日。由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聂绀弩任主编。在创刊号上，这位主编以一篇仅 300 来字的发刊词《让我们呼吸吧》同时刺激着朝野。聂堪称“幽默大师”，他先冷嘲说：“我们国家有的是加引号的‘自由’的呼吸”，然后又热讽道：“呼吸是重要的，在‘自由’中呼吸是重要的，自由的呼吸更是重要的，……让我们从‘自由’呼吸到自由呼吸吧！”短短数百言，即把极权主义者标榜的“自由”与自由主义者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鲜明区分开来。可是，从“自由”呼吸到自由呼吸，到底有多大的距离，有多险恶的旅程，聂绀弩从一开始就是心知肚明的，但最凶险的一幕幕，却是在 1947 年以后才连连遭遇上的。

常识告诉我们，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民间报刊，其行事和思考是绝对做不到“左右逢源”或者“左右规避”的，极权主义政治作为新闻自由——特别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天敌”，它那鹰隼般的眼睛始终死死盯着民间报刊的一举一动的。

1948 年 7 月 8 日傍晚。国民党社会局派人送来“重要公文”。正在进餐的邓季惺搁下碗亲手接过这份扼杀《新民报》的“判决书”。她看后顿感愕然，“因为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正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军政府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单行法。”而那一段时间，她还正在立法院和新闻界酝酿废止旧出版法的运动呢！

书生气十足的陈铭德和邓季惺就是在这种惊愕和屈辱中，约集全社同仁开会，“告诉他们，命令终于送来了。大家在万

分悲愤的情绪下，结束了正在编辑和排印中的次日的报纸。”

和《大公报》、《文汇报》等民间报刊所作的自由主义的努力终于遭到重创一样，陈铭德、邓季惺试图效法英美民间办报精神，效法蔡元培兼收并蓄的作风，虽不能说没有成效，可是，他们到底还是难以腾挪跳踉出极权主义的手掌。

第五节 徐铸成：奇异的政治 “独身主义”者

一 生平及思想简述

在中国现代报业史上，只要提到徐铸成，就不能不提到《文汇报》，同样，只要提到《文汇报》，就不能不提到徐铸成——徐铸成的一生和《文汇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徐铸成的自由主义性格也就自然地 and 《文汇报》的自由主义性格同构在了一道上。

徐铸成是以“大公报人”的特殊身份加入到《文汇报》里去的。可以这样说：《大公报》的自由主义传统正是通过这种奇异的方式被《文汇报》所续接的，假如离开了徐铸成，这种精神传接或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徐铸成主持《文汇报》笔政初始即宣示天下：《文汇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必须反对“舆论统一”；只有不折不扣地独立于党派之外，才能反映百姓的心声，跟上民主与自由的潮流趋向，才能有存在的价值。他一生中

倾慕和激赏的报人是张季鸾和胡政之二位先生，这里面既饱含着他《大公报》自由主义风度的倾慕和激赏，同时也饱含着他对自己的精神期待和鞭策。

抗战后期，他在香港见到了邵飘萍先生的夫人，念及自由主义报人在中国遭遇到的种种险情和悲壮故事，不禁感喟万端。

而在重庆，他还见到了蒋介石的“文胆”——前自由主义报人陈布雷先生。他对陈敬佩有加，惟对其主动放弃自由主义立场不敢苟同。徐铸成用“独身主义”来深刻喻指自由主义者的清操守，不仅隐含着他对陈布雷的政治批评，同时也表明：新一代的自由主义者要比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所站的角度更高、原则性更强，更警惕极权主义布下的种种铺花的陷阱。

真像拜伦的故事一样：“我一觉醒来，发觉我已是名闻天下了。”在徐铸成的自我欣赏中明显可见他对自己开创的事业充满了乐观和自信。

然而在后来，他却深刻地认识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谋略家和游击军事家的卓越和精彩。晚年，回忆和检讨自由主义成了徐铸成惟一的功课……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1922年16岁时，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了鼓吹新思潮的《时事新报》知道了北大教授朱谦之的名字和他那惊世骇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还知道了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个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和陈独秀；他还爱上了当时名声很大的两张自由主义报纸——《申报》和《新闻报》，尤其是对邵飘萍的“北京通信”爱不释手。很明显，他与自由主义思潮有了最初的接触，尽管零星不成系统，但其感触却是前所未有的。17岁时，他又与鲁迅——这个中国最彻底最勇猛的自由主义者遭遇上了。正是鲁迅的书把他引上了自由主义的道路。

1926年，他借别人的文凭考进了清华大学，“从一个朴素的师范生，跳进了美轮美奂的清华园，真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①半年后，因借文凭一事被原母校告发，“就一路跌回人间”，到河北大学“混了半年”，旋即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又从地底里钻出地面”。

然而，“混进”清华的半年对他一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徐铸成选读的是政治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授们，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杨树达、李济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的还有图书馆里的《大英百科全书》、《东方杂志》等大量近现代“时事刊物”教务处梅月涵先生把他举荐给南开校长张伯苓一事，更令他终身难忘。在天津，他开始给新创刊的《庸报》写文章，并获征文首奖。由于河北大学为直鲁联军所控，校长是张宗昌，所以徐铸成日后戏谑说：“张宗昌曾自称为‘绿林大学毕业生’。准此，则我亦为‘绿林大学’一名学生矣。”^②其实，细品此语，亦未尝不可。如果把自由主义的民间报业视作与“庙堂”和党派政治相异的“绿林”，不就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其严肃的真实一面吗？

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后，“授业者有钱玄同、朱希祖、吴承仕、刘毓盘、刘文典、周作人诸先生……都是当时的大师”，他们在传布知识的同时，更将新思潮的文明种子播撒进了年轻的徐铸成的心灵之中。

1927年，20岁的徐铸成托其舅父介绍，以“抄写员”的身份进入了“新记”《大公报》的姊妹企业《国闻通讯社》。

①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② 徐铸成：《传记三种》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事实上，在这以前，他已经与人合译过一部外国的中篇小说，并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做抄写员一般是不会引人注意的。他被当时的《国闻通讯社》社长胡政之发现，并认为其“重要”却是由于他偶然写的一封信。

“胡先生接到信后，约我至其书房谈话，说：‘你的信很有见地，我也有此意，苦于无从着手。’旋问我在师大功课忙否？能否抽出更多的时间为国闻社工作？……’^①随后，胡先生手书介绍信，并速为徐印了记者的名片，派其至河北定县采访平民教育家晏阳初。

至此，他由抄写员一跃而成为了《大公报》记者，开始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民间报人的光荣而险恶的生涯。

从1927年到1937年，徐铸成在《大公报》工作薰、陶了整整11年，完成了由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意识的“新潮青年”到一个自觉的自由主义报人的嬗变。“自然，从一个抄写员到总编辑，时间虽只有十一年，道路却是不平坦的……”^②

从1938年1月他发表了加入《文汇报》的首篇社评，到1945年8月光复，漫长而险恶的7年间，徐铸成和《文汇报》屡屡受到日伪炸弹的恐吓和停刊的惩罚，但却气节高昂、义无反顾。从1945年8月到1949年，徐铸成和《文汇报》在尝试走“第三条道路”的梦幻破灭后，终于“向左转”。1949年3月，他和大批“民主人士”辗转到达北平接受新政权的领导。1952年8月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和“救报运动”。1953年到

^①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页。

^② 同^①。

1955年，主要以“民主人士”的身份频繁开会和到处观光，以及看戏听歌、出国慰问，不断写思想汇报材料。1956年3月，赴京筹办《教师报》；5月，《文汇报》“自动停刊”。1957年6月，毛泽东发表著名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8月，徐铸成被划为大右派，送上海郊县劳动改造。1980年平反，1991年12月23日逝世。

二 从大公报人到文汇报人

徐铸成曾是被张季鸾先生寄予厚望的人物。张先生在晚年，甚至是在肺病最厉害的时候，只要病痛稍缓，即必约徐到他的旅舍长谈，“从他的经历到心得、经验；从文字锻炼到推理方法，无所不谈。真是循循善诱，希望我尽快成熟起来。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知道来日苦短，而事业要后继有人；他显然是希望王芸生兄和我能成为他的‘传人’——接班人的。”^①在《报人张季鸾传》里面，徐铸成的这段回忆文字可以说是饱含着纪念的深切情感的。

半个多世纪中，徐铸成为自己同时是大公报人和文汇报人而深感自豪：他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先生对他的教诲：他说，胡先生“要我把大公报当做终身的事业，不要仅仅当作一个职业……大公报是文人办报的企业，全靠有志之士共同办好，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对这些话，深信不疑……”^②

^① 徐铸成：《传记三种》第5页。

^② 徐铸成：《文汇报的诞生》，参见《文汇报回忆录：从风雨中走来》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徐先生虽然没有在《大公报》继续干下去，但他却秉承《大公报》“文人办报”的精神，与有志之士一道，用自由主义的薪火点燃了《文汇报》。胡政之先生在《文汇报》开办之初就敏锐地发现“文汇报社论的风格，很像大公报”，这是很有些道理的。

徐全身心热爱《文汇报》，但是，他对《大公报》的感激欣赏和赞美皆超过任何一张现代自由主义报纸。特别是他对张季鸾和胡政之先生的软佩和景慕，几乎充满了他一生的著述当中。他在《报人张季鸾传》中，对张先生的经历、气质、情操乃至音容笑貌，都一一作了生动感人的描述：他说美国密苏里大学把奖章授予《大公报》，认为它是东方最优秀、最严肃的报纸。它的成功，谁都知道，主要是靠张季鸾先生的那支笔。^①他还念念不忘张先生的教诲，并以此作为自己一生思想与行动的指针——“以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认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拘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②在谈到胡政之时，他特意将其放入中国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报人的精英画廊里加以比较。他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功于筹计，擘划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

① 徐铸成：《传记三种》第4页。

② 徐铸成：《传记三种》第29页。

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①毫无疑问，在对张、胡二先生的倾慕和激赏中，更饱含着他对《大公报》自由主义风度的倾慕和激赏，因而也就必然包含着他对《文汇报》的期待和鞭策。

徐铸成加入《大公报》时，正值该报“复刊”时期，其艰辛可想而知。但就在这时，它已经成了北方第一张全国性的民间报纸，其政治文化影响已超过了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

徐铸成上任之初即反复强调：《文汇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立场，必须反对“舆论统一”；只有不折不扣地独立于党派之外，才能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跟上民主和自由的潮流趋向，才能有存在的价值。事实上，这些原则特点，无一不是来自《大公报》的训导。

在《文汇报》创刊号上，醒目地刊发了由编辑部人员执笔、克明署名的《为本报创刊告读者》一文——该文尽管有针对性对日军检查的敷衍成分，但其潜隐却是执着的自由主义信念——文章宣称：

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如不幸遭受外界的阻力，余必设法排除之。消息力求其正确翔实，言论更须求其大公无私，揭穿黑幕，消除谣言……

不仅如此，在当天的第四版副刊《文会》中，还发表了一篇《实现言论自由》的“文会发刊词”，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原则”。据储玉坤先生回忆，在筹备创办《文汇报》时，严宝礼就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要他必须在几天内

^① 徐铸成：《报海旧闻》第96页。

写成一篇发刊辞，向读者宣布《文汇报》的办报方针，表明态度和立场。严先生特意向他提了四条意见：一、主持公正言论；二、树立高尚报格；三、有独特之消息；四、无外来之阻扰^①。这时徐铸成还没有加入，但明显可见，筹备之初的《文汇报》已暗暗地受到《大公报》以及抗战前的《申报》等民间报纸自由主义办报方针和办报理想的影响。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向度上的契合，徐铸成就顺理成章地被接纳了进来。

关于徐铸成如何被延揽进《文汇报》的过程，不仅徐本人有详细的回述，而且不少老文汇报人也有清晰的记忆。当时，胡政之是不想徐离开《大公报》的。具体细节是：“在严宝礼和李子宽谈判文汇报与大公报合作时，文汇报董事中对于大公报提出要徐铸成主持编辑部这一条件，不是没有意见的；但是严宝礼却力排众议，坚决认为徐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新闻人才，就一口答应了。及至徐参加文汇报工作为编辑部实际负责人之后，为了使他安下心来，把文汇报当做他自己的事业，又让他一千元文汇报‘发起股’使之成为‘英商文汇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②由此足见严宝礼的眼光和过人的魄力。而最根本的却是，严不光是欣赏徐杰出的办报才干，其实他暗暗欣赏的应该还有他的大公报人性格——即自由主义性格。文汇报不罗致这样的干才，又怎么能保证其自由主义原则得以贯彻下去？

其实，在此之前，严宝礼本不认识徐铸成，全赖储玉坤以同乡关系约请徐暗暗为《文汇报》撰写社论，才猛然被严“发

^① 储玉坤：《我所知道的严宝礼先生》，参见《从风雨中走来》，第385页。

^② 同，第386页。

现”并得到其赏识的。严先生认为徐才气横溢，文笔犀利，所写社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因此毅然决然“委以‘主委’名义，并授与处理编辑部事务的大权，使他的权利凌驾在总编辑之上。”^①

《文汇报》与《大公报》的关系一直非常特殊。除了其在创办之初与《大公报》有形式上的“合作”关系，以及在精神向度上的一脉相承之外，其主笔徐铸成与《大公报》若即若离的关系则更富有象征意义——徐在《文汇报》第一次停刊后，又复返《大公报》担任总编辑；1946年初，他又毅然辞去影响大、待遇优厚的《大公报》总编辑的职务，回到刚复刊但困难重重的《文汇报》担任主笔……

有种说法，认为上海的“新新俱乐部”是《文汇报》的摇篮——包括徐铸成本人也这样认为——其实，这种说法是缺少逻辑根据的。这个当时设立在南京路新新公司三楼以京沪、沪杭铁路局里的中级职员为成员的“吃喝玩乐的俱乐部”，怎么可能催生出一张自由主义的民间报纸呢？仅仅因为严宝礼等“少数几个并无资财的人”在里面“吃喝玩乐”过？我认为，《文汇报》真正意义上的摇篮不是别的，正是《大公报》！

三 自由主义与民族大义

《文汇报》正式创刊是在1938年1月25日。当时上海、南京等地已经沦陷，但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法租界还未被日军占领。因此这些受法英等国控制的地区就成了“孤

^① 储玉坤：《我所知道的严宝礼先生》 参见《从风雨中走来》第386页。

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爱国人士”严宝礼就在这“孤岛”里创办了《文汇报》。为了避免日军的检查，他以高薪雇佣了英国人克明，以“英商”的名义出版发行了这张报纸。

1938年1月28日，徐铸成发表了他加入《文汇报》后的首篇社论：《淞沪之役六周年纪念》，大意是缅怀国军十九路军将士，亟盼国人发扬光大烈士的抗战精神，共救国家危亡。

2月8日，徐因一篇《告若干上海人》的社评，对混迹上海滩的汉奸发出警告，而使《文汇报》招致炸弹破坏——惨案发生在2月18日，当场炸死报馆职员陈桐轩；黄岫卿、毕祉芬被炸伤。第二天，报馆又接到署名“正义团”的汉奸组织的恐吓信，信中指责说：“贵报言论激烈。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后务望改弦更张，倘再有反日情绪存在其中，即将与对付蔡钓徒者同样对待……”

蔡钓徒是“孤岛”时期另一家民营报纸《社会晚报》的社长，曾风传其与日本人有“勾结”，后不知何故，又在报上登了一些有“反日情绪”的新闻，最后被日伪绑架杀害，并悬首在上海法租界与南市接壤的闹市示众，以此警告其他有“反日情绪”的中国报人。

徐铸成接到恐吓信后，既愤慨又不安，当即电话询问储玉坤：“社论还要不要继续写？”储说：“当然还是要写。”徐不放心，又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最好问问报馆当局为好。”稍后，储说：“已请示过严宝礼，严先生斩钉截铁地嘱咐我，务必请你照样写下去！”

从这个细节至少可以看出，徐在当时对《文汇报》的民族气节和自由主义性格还缺乏了解，尤其是对严宝礼先生，对其

① 徐铸成：《我参加文汇报的经过》，见《报海旧闻》第276页。

是否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硬汉，他还吃不透。可以说，正是通过这一非常事件，特别是通过严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徐铸成才真正对《文汇报》的自由主义性格有了起码的了解。

在严先生的民族气节的鼓舞和激励之下，徐铸成满怀悲愤地写出了社评《写在本报遭暴徒袭击之后》，并刊载在《文汇报》2月12日的重要位置上，社评愤怒地写道：

炸弹的光顾，黑暗的势力向我们进攻，正足以证明我们的苦斗，已获得相当的代价。我们愿为正义而流血，并愿为维护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2月22日，《文汇报》为陈桐轩大殓，发表编辑部文章：《悼本报同仁陈桐轩先生》，说：“本报始终抱定一贯之政策，不受任何方面之威胁与恐吓，以尽报人之天职，决不因陈君之死，而变更本报之宗旨及信条。”

中国的自由主义报人，并不是那种无视民族正义，恪守抽象的“中立”立场的“自由人”。应运而生的《文汇报》，从一开始就铁肩担着国家民族的煌煌道义。徐铸成说，“我们首先冲破了‘洋商’报‘中立’的界线，热情歌颂抗战，反对投降卖国……无论在社论、标题，还是在新闻写作和副刊编辑等方面，都堂堂正正地毫不隐讳这个立场。”在日伪竭力垄断新闻舆论阵地，强化法西斯新闻检查手段，特别是有效地控制了《申报》和《新闻报》等为其作法西斯宣传之时，《文汇报》坚持新闻独立的斗争，就更加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的历史价值了。《上海新闻史》一书对“孤岛”时期《文汇报》的民间立场进了客观的高度评价：“《文汇报》的宣传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救国，坚持民主正义。……传颂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捷报，

是其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文汇报》还无情地揭露日军的暴行和汉奸的投降活动……每天发表一篇社论，分析国内外时势，解答群众的疑惑，这是《文汇报》的一大特色。由于当时上海各报均无社论，因而《文汇报》的社论使广大读者有空谷足音之感，甚受欢迎。”

自由言论，即使是在痛击汪伪政府要人的时候，《文汇报》也竭力透过他们的无耻蜕变，去深刻挖掘那些源于传统古旧文化，特别是源于极权政治的复杂原因。多年以后，当笔者读到李零先生在《汉奸发生学》一文中的精彩思考时，不能不惊异他与徐先生的英雄所见竟是那么的相同。

1939年5月18日，《文汇报》突然接到英国驻沪领事馆的通知，以“言论激烈”的罪名，罚令停刊两星期，同时被罚停刊的还有《文汇报晚刊》。徐铸成说：“显然，这是英领事馆屈服于日方压力而来的这一手。”^②

6月1日，在《文汇报》和《文汇报晚刊》被罚停两星期后，并未能复刊，于是——

徐铸成、李秋生、储玉坤、张寄涯、朱云光、程玉西、余鸿翔、魏友琴、高季琳（柯灵）等二十六人，在《申报》等报刊出了《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人紧急启事》：“同人等服务《文汇报》一年有半，立场坚定，向为社会人士所深悉：兹因报馆内部发生变动，严经理去职，特向本报当局提出要求保证不变本报原来编辑方针，庶得保持

①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836~837页

② 参见《从风雨中走来》第31页。

本报一贯立场。在未获得满意答复以前，同人等暂不参与编辑工作，一俟交涉获有结果，自当另行声明。”

据《文汇报》编辑部负责人徐铸成、《文汇报晚刊》负责人李秋生等回忆，克明当时已被汪系汉奸收买，组织了一个汉奸编辑班子，准备盗用《文汇报》名义，继续出版。为挫败他们的阴谋，编、经两部的负责人决心采取“宁为玉碎”的斗争方法。

四 自由主义就是“独身主义”

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徐铸成与报社同人化装遁离，后辗转广州，最后驻扎桂林继续出版《大公报》桂林版。

1943年元旦刚过，胡政之函告：陪都新闻界将应邀赴美国参观，王芸生在应邀名单之列，于是，徐铸成当即飞赴重庆接替王芸生主持《大公报》重庆版笔政。

这时，他见到了先前曾一度是自由主义报人，后来成了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先生：徐对陈敬佩有加，惟对其主动放弃自由主义立场不敢苟同，下面这个细节即可看出，陈布雷对徐铸成是非常欣赏的，然而，徐却并不欣赏陈的选择——

陈布雷先生，他也是我国新闻界的前辈，又是张季鸾先生多年的至交。在20年代初，他以“畏垒”的笔名，为上海《商报》写社论；季鸾先生则在《中华新报》主笔政，署名“一苇”，都风靡中外，有“一时瑜亮”之称。布雷先生一再谬奖，谓故友季鸾曾郑重谈及，我与芸生为其得意之传人。布雷先生并力劝我加入国民党，他自己愿

破例当介绍人。我婉谢其意，并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布雷先生莞尔一笑，不以为忤。”^①

徐用“独身主义”来深刻喻指自由主义者的清操操守，此段议论非常精彩，不仅隐含着对陈的批评，也表明，新一代的自由主义者要比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站的角度更高，原则性更强，更不容易受“忠君报国”，甚至“国家中心论”之类观点的蛊惑，而稀里糊涂地陷入极权主义布下的陷阱。陈先生的“莞尔一笑”似也表明他对徐的选择是暗暗赞赏的，同时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则深以为悔。

1945年8月，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获得空前胜利。8月18日《文汇报》在光复后的上海复刊。

事实上，《文汇报》早在当月23日的社论《今后的本报》一文中，就已重新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号——即“办报方针五”：

- 一、宗旨纯洁，完全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发言；
- 二、实行宪政，势在必行；有待报纸之启迪民智，必赖言论的自由。是以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发表社论，力求大公无私；
- 三、报道新闻，迅速翔实；
- 四、本报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高尚品格，今后仍当保持；
- 五、报纸为发展社会事业之工具，故本报同人必竭尽

^①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第107页。

所能，为社会服务^①。

同月 26 日，又在社论《迎冯专员》一文中，再次重申了《文汇报》的自由主义立场——希望国民党中宣部专员冯有真能发起“新闻界自肃运动”。文中说：“新闻从业人员最重要的条件，乃思想纯正和认识清楚，决不容许有不清不白的份子混迹其间。”^②

9月6日，发表《复刊词》，又一次声明：“本报为无党派色彩纯粹商业性报纸，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矢志保持高尚的报格。”

11月1日，发表社论《请问毛泽东先生》，内中说“毛泽东先生在重庆与政府当局会谈……临别的寄语是‘和为贵’……但自毛氏返延安后，华北各地的摩擦冲突，不仅未见消弥，而且日见表面化激烈化”，于是，“想先请教毛泽东先生一个问题……”

其实，这时的《文汇报》对国民党的批评其锋芒也是相当凌厉的。

重新创辟之时，徐铸成与宦乡、陈虞孙、柯灵等人全面掌握着言论、编辑工作；新聘人员也大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其中的寿进文、钦本立、王易今、王思曙、杨培新等人，都是重庆《商务日报》的“进步分子”；马叙伦、郑振铎、傅雷等为《文汇报》撰写“星期评论”，更壮大了报纸的自由主义力量。

同年5月1日，徐铸成成为编辑部撰写社评《我们的自勉》，再一次说明《文汇报》的立场：“要求民主，拥护经济建设，

① 《文汇报》1945年8月23日社论：《今后的本报》。

② 《文汇报》1945年8月26日二版：《迎冯专员》。

扶植民族工业；反对一切独裁、垄断、剥削及违反自由、民主的现象。”不仅如此，徐铸成还不断以个人署名的方式，阐述其自由主义信念。早在这年的1月25日，他就在《文汇报精神》一文中高呼：“文汇报精神就是敢说话，无私见党见，大家只知道有报，不知有个人。”而在同一天由他撰写的《今后的文汇报》，在回顾了报纸八年的苦难顽强的历程后，强调：“我们不染任何党派关系，纯以人民的立场，纠正落伍偏激的不民主反进步的倾向……不屈于暴力，也不趋媚时尚，一切把握定见，而不固执己见……这张文汇报，就是你们的，是全国无党派无偏见的同胞所共有的。”

对于国民大会和民间报纸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应以怎样的立场和姿态发挥作用，徐铸成也有不同凡俗的见解。他说：

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使本报成为一真正独立的民间报，代表人民利益说话，而不是依违两可，在党派间看风色，行市之所谓中立报纸。我并阐发此意：如所谓国民大会，政党间对此问题，容有妥协。作为民间报，则只问是非曲直；国民大会从产生到组织，始终是非法的。作为民间报纸，不能因政党间之暂时妥协而改变反对到底之态度。

由此足见，徐铸成并无丝毫“向左转”或“向右转”的迹象，当然他也决不是什么“中立”，而是一如既往地一切以国民的利益为准——以国民的是非为是非，以国民的利害为利害。

曾在“下关事件”中被特务痛殴的雷洁琼女士几十年后在

纪念文字中犹念念不忘称赞这张报纸的“人民立场”，她说：“当时站在人民一边，态度最坚决者，厥为上海之《文汇报》及重庆之《新华日报》。”——将《新华日报》与之并提，简直太具喜剧性了。这大概就是向来被“民主人士”总结的《大公报》代表民间的右翼，《文汇报》代表民间的左翼说法的“根据”吧？

其实，这样来评价或者臧否徐铸成和《文汇报》至少是一种无知和肤浅。不能因为“党国”在1947年5月查封了《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晚报》三家民间报纸，而没有查封《大公报》，特别是好事的《大公报》这时又偏偏发表了一篇《请保障正当舆论》的短评，就指认《文汇报》是在坚持“左”的立场。

五 索性来一番自我欣赏

徐铸成非常欣赏当时一篇写他的文章——《记徐铸成——我所知道的一个自由主义报人》。在这篇颇带抒情色彩的人物述评中，作者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艰难行走中客观地审视和评价了徐铸成。其中，既赞颂了徐铸成与《文汇报》所创造的光荣。也赞颂了徐铸成从《大公报》所传承来的光荣：请看如下这些文字：

徐铸成三个字是随着《文汇报》三个字的起来而起来的。其实，他在报界已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而且这长长的年月，一直是为了《大公报》而消磨了的……真像拜伦的故事一样：“我一觉醒来，发觉我已是名闻天下了。”徐铸成三个字发了亮而是在《文汇报》创刊的时候。

.....

《文汇报》因为是所有洋商报纸中最大的一个，而且它团结着最大多数的有志之士，遂自然而然成了黑暗势力最痛恨的一个目标。总主笔的徐铸成收过两次骇人的礼物：一次是一只血淋淋的手臂，附上几句话：“若再写社论，有如此手！”一次是一篮馨香扑鼻的水果，仔细检查之下，每只果子都打了毒针。

.....

桂林陷落前的最后日子，也是《大公报》最伟大的时代。他（徐铸成）的社论真是赛过几师雄兵。

.....

徐氏一旦以全部精力用在《文汇报》，《文汇报》这个慧星立刻光芒万丈。^①

作者为徐先生的至交郭根先生。郭对《文汇报》的二度夭折——特别是竟夭折于“建国时期”尤感愤慨。在文章的末尾，他索性大段抄录了当时徐铸成答《人物杂志》记者的一席话，作为对徐的高度总结和礼赞——徐铸成是这样来表达一个自由主义报人的痛楚和悲愤以及不屈的：

目前新闻界发展到极可怕的时期：黑白颠倒。中国文人传统的精神：春秋之笔，董狐之笔，贬褒极严，史家认为真理所在，振笔直书，虽杀其父子兄弟，在所不顾。这种传统精神是可贵的！中国之有近代报业不过百年历史，虽然内容上技术上还很落后，但近几十年来，的确有不少

^① 转引自《徐铸成回忆录》第156页。

志士如孙中山、梁启超、宋教仁、于右任、邵力子诸先生投身新闻界，奋如椽之笔，启迪民智，开创革命先河。

《大公报》张季鸾先生曾经说过：“平常待人和气，遇有大事虽六亲亦不认，决不袒护，决没有不敢说的话。”这次抗战，陷区报人很多与党派没有关系，然而都有奋斗精神，诛伐丑类，虽死不辞，前仆后继，大义凛然。胜利以后，报人或者由于生活所迫，或者由于言论受制，失去了这种传统精神。过去，有些报纸像鸵鸟一样，对有些事情避重就轻，但还没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可是，现在却发展到对于血淋淋的事实加以抹杀，反口噬人。这对于下一代青年记者养成不顾真理，歌颂暴力不以为耻，反以说谎为当然。这影响太大了！新闻界的遭遇，的确是空前未有的沉重，然而即使如此，也未必可以作为噤若寒蝉或颠倒黑白的理由！^①

在整个战后，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蔚然发展成“运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按殷海光先生的说法，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形成了“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两类。但具体到完全大异于学院派自由分子的民间自由主义报人，如胡政之、储安平、陈铭德、徐铸成这样的著名人物，恐怕就不能这样简单来划分了。事实上，他们是集“观念”和“行动”为一体的最值得我们注目和研究的“特殊人物”——尽管他们“群而不党”，但我们又有何种理由将他们划出“行动”的序列呢？

和绝大多数民间自由主义报刊一样，《文汇报》的观念和言论就是他们义无反顾的“行动”样式。

^① 转引自《徐铸成回忆录》，第 157 页。

当 1946 年元旦的钟声敲响时，《文汇报》就在《关键在今年》的社论中重新诉说了它最朴素自由主义理想：

我们过去有许多梦境，希望抗战胜利以后，马上加紧建国。……我们绝对是一张民间报纸，绝无背景，所有爱国的各界同胞，都可以利用我们宣传正义，研讨问题；所有民间疾苦，社会隐病，我们都愿意尽情揭露，以求解决……今后我们因深感言论责任的重大，更当再接再厉，以尽职责。^①

这一天，《文汇报》所宣示的观念和言论似有一种悲壮感人的象征意义，它兼容并包，立足民间而气魄宏大。它甚至在醒目的位置上发表了著名的“反自由主义者”郭沫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精彩文字——在它的副刊《世纪风》当中，郭的《历史在大转变》显示出了其独特的观念价值意义：

一党专政的作风不能再用了。国民党固然有不少的人才，但中国之大，除国民党员之外，就没有人才了吗？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应该是某一党的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历史的主人，为了应付大时代、大转变，国家的根本组织法都可以变，兢兢于既成的法统之争，那完全是近视眼式的见解。^②

① 《文汇报》 1946 年 1 月 1 日元旦社论：《关键就在今年》。

② 郭沫若：《历史在大转变》，《文汇报》 1946 年 1 月 1 日副刊《世纪风》。

六 “董狐之笔”与记者之“节”

在徐铸成的主持下，《文汇报》战后的新闻和言论在自觉担当“春秋之笔，董狐之笔”的前提下，更将笔力贯注到向专制极权主义争民主、争自由；反内战，反党见党争高于国家民族；关怀民权、民生；呼吁舆论自由，以及主张宪政，反对军政和训政诸方面。每天的新闻都忧心如焚，报道着民间悲惨的现实：每天的言论都在破嗓裂喉地为民主、自由的命运而大声疾呼。

面对血腥可恶的内战，它大声呼吁道：“一己的名利地位算什么！一党一派的私见私利算什么！惟一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继续生存”^①；“当前的问题，厥在民主的实施：民主如何实施？首要为人民基本自由之获得切实保障，政治犯之开释，一党治国之终止，……老百姓要的不是字面上与纸面上的自由权利，他们要的是事实上真正的自由。”^②

面对国民党的专制作风，它大声批评道：“为什么国民党‘训政’了二十年，中国的民主政治还是建立不起来呢？这当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我们觉得最主要的是因为国民党本身没有建立民主的作风。……一切国家大事，都不准别人过问。不特不许党外人士批评，就连国民党本身自我批评也不准许。”^③“(国民党)必须严厉制止党政军各级官吏滥用权力侵犯人民自

① 《文汇报》1946年1月11日社论：《停战令下》。

② 《文汇报》1946年1月12日社论：《停战以后》。

③ 《文汇报》1946年1月29日社论：《国民党今后应有的作风》。

由的一切行为。’^① “今后中国政治要求进步，我们以为首先要修正‘手令政治’的办法，树立法制楷模并尽量延用人才。”^② 尤其是在《国民党的自觉与自新》中，它尖锐地指出：“一个政党的成败，决不是单靠过去的光荣传统，更主要的是依凭她现在的作风和行动。”^③

自复刊伊始，《文汇报》和几乎所有的民间自由报刊一样，从未放弃过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在大量的社评文字中，它对极权者钳制新闻自由不断发出勇敢无畏的声音：1946年1月18日的社评《让舆论界尽力》，就又一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要求，文章说：“我们新闻界不仅要求揭露的自由，同时也要自由采访。”我们提议政府和中共方面应该允许新闻记者到冲突的地点去实地观察 探讨问题的真相和症结”；不仅在这一时期需要舆论的力量，今后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都应该重视舆论的监督”；政府已宣布尊重人民基本自由，各党派均可合法存在、公开活动。在这民主的大潮流下，一切钳制舆论的法令自然都应取消。当前的第一要看，就是让新闻界自由发展、自由采访、自由刊载……’^④ 同月23日，就著名记者羊枣（杨潮）被捕后瘐死狱中，《文汇报》联合上海民间报刊记者发表抗议书，要求彻查羊枣惨死真相，要求言论自由和保障人权，并要求全国新闻同业一致呼吁言论自由，向政府索取新闻记者的人权保障。9月1日，在《记者节自我检讨》的社评里面，徐铸成在悲壮回顾了百年来中国报业的喋血苦斗历

① 《文汇报》1946年1月31日社论：《十八年来第一天》。

② 《文汇报》1946年2月13日社评：《所望于蒋主席》。

③ 《文汇报》1946年3月7日社评：《国民党的自觉与自新》。

④ 《文汇报》1946年2月18日社评：《让舆论界尽力》。

程，以及背负着无尚光荣的中国新闻界所面临的更黑暗的专制处境后，坚定地說道：

这一年中，一面高唱新闻自由，一面是尽量使报业“一元化、标准化”新闻界的遭际的确是空前未有的沉重。然而即使如此，也未必可作为噤若寒蝉和颠倒黑白的理由。作为一个报人，必定有所不为，守住一个最低限度的立场，正视事实，正视真理。……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假使政府及各党派真有诚意实行民主，就必须真正的爱护言论出版自由。而新闻界本身，必须争取这自由、善用这自由。……新闻记者应有定见，对于真理和国家民族的利害大义，不容含糊歪曲；也不许有私见党见。另一方面，新闻界不许以新闻做买卖，所有业务以外的收入，职业以外的酬报，都不该收受，严格地说，就是说人情，索便利，也等于变相的贿赂，间接的买卖。凡是自重自尊的新闻从业人员，都应该守身如玉，保持这点清白。^①

“记者节”之“节”其中心意义是追求自由和民主所必须保持的气节——对“记者节”的这一鲜明的阐释，无疑是徐铸成从《大公报》那里接续过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记者的“守身如玉”，是与他们能捍卫真理和国家民族大义、不陷于“私见党见”、不卖身投靠政治或金钱的“霸权话语”成正比的。不仅如此，徐铸成还对当时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仅在1946年的12月

^① 《文汇报》1946年9月1日社评：《记者节自我检讨》。

份，《文汇报》就集中刊出了《重建第三方面》、《新的和平攻势》、《第三方面没有中立》、《再论第三方面》以及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张东荪和施复亮的争论文章：《所望于第三方面者》、《第三方面的组织问题》还有马叙伦先生的《再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并质民主同盟》等。徐铸成对“第三方面”作了更宽泛更符合自由主义精义的阐释。他大气磅礴地提示和号召道：

第三方面是国共之外的中间党派，但决不是今日政治斗争的旁观者和中立者。……因为所谓中立，实在就等于无立场。^①

从客观的社会基础来看，第三方面是应该有伟大的力量的，凡是被压迫被损害的人民，不论其为民族资本家，如中小地主，如工人、农人、店员，如自由职业者以及青年，都是他的力量所在，我们广大的中间人民，种种惨痛，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只要有人来号召，立刻就会凝固成一股坚强不可侮的力量……可以使相持的战争局面停止，使国家走向民主独立的康庄大道。^②

遗憾的是，愿望和期盼既无法更改现实，也无法阻止现实向着完全背逆“第三方面”政治意愿的方向发展。善良、悲怆却充满乐观情感的徐铸成根本就没有料到，他所期待的那种与自由主义、与广大“中间人民”有关的远大前程，在半年以后，全化为了令人心悸的泡影。

至此，徐铸成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报人，《文汇报》作为一

① 《文汇报》1946年12月22日社评：《第三方面没有中立》。

② 《文汇报》1946年12月23日社评：《再论第三方面》。

张自由主义民间报纸，事实上随着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大陆的终结而结束了自己的悲剧使命。

第六节 储安平：自由主义命运的悲剧预言家

一 生平及思想简述

储安平是个非常怪异的历史人物。他曾以两篇文章分赠国共两党而惹来无穷的祸端。尤为怪异的是，他的神秘失踪竟成了当代政治文化史上一个诱人却无解的话题。许多年来，人们都在饶有兴致地揣测：有的说他愤而跳海。这自然令人联想到陈天华的壮烈悲慨；有的说他遁迹古刹。这又自然令人联想到李自成兵败后归隐林泉投契禅宗的空灵诡秘……然而，透过这些传说，我们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历史人物的无所不在，能感觉到他似乎在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影响着历史，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

其实，储安平早在 1947 年就“死”过一回。当时，他因胃部手术而被“施用闷药”（即麻醉剂——笔者注）——就在他的思维即将终止，“死即将来临之时曾有过既朦胧而又清晰的感受”。关于这些，他在题为《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一文中极其细致地描绘了出来。其经验是：“我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这些文字使我们不禁惊叹：他简直称得上

是一个出色的预言家——一个关于自己命运，或者说关于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预言家。

储安平告诉我们，他不惧怕肉体的死亡，他最惧怕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完全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失去任何表示自我意志的能力，特别是当这个人尚“抱持有一个人虽然飘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时，其悲哀和恐惧就远胜于肉体的死亡所能比拟的了。

《观察》时期的储安平无疑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他深知，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权谋面前只有极少数的自由主义者不会被瓦解掉；面对一盘尚未开局却输赢已定的博弈，他们纵有天大的才艺和勇毅也注定不会反败为胜。正是因为洞悉了这个悲剧般的历史秘密，他那先知的目光中常常充盈着苍凉的泪水……

冯英子先生在《追寻储安平》中悲慨地说：储安平有他的办报理想，“一句话，就是书生论政。他很向往于伦敦的《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但他毕竟是个书生，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怎么会允许有一家《泰晤士报》呢？”

储安平（1909~1966），江苏省宜兴县人，1909年生，幼年即丧母，为其祖母所抚养；14岁时祖母去世，转而是由其伯父培养。伯父储南强先生，乃地方贤达，早年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与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黄炎培是同学。南强先生在晚清曾做过几天南通知县，“后在家乡兴学，兴办水利，建设宜兴市政，修筑古迹。50岁以后，致力于整修善卷、庚桑两洞，直到抗战爆发。”他是一个在最初对储安平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些基本品格，比如勤俭坚毅、独立自信、乐善好施，体恤民瘼，勇肩道义等，都

是在南强先生的教诲和身体力行的示范下养成的。

储安平最早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 1929 年，当时他是以一个“新起的文学青年”的形象而为人们所知的。谢泳先生在 1929 年 6 月 21 日的《鲁迅日记》中，对“寄安平信并稿”作了考证，认为这个安平就是储安平。其时，他向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投过稿。但他最初发表的文字，却是在《北新》上面，其中有一篇名叫《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个〉》给人留下了依稀的印象。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他在《中央日报》编过副刊，从事与新闻沾边的文学活动。1936 年 4 月，他把 1931 年至 1934 年间写的小说辑入一本叫《说谎者》的短篇集中，由上海良友公司出版。在这期间，他还主编过一本月刊《文学时代》，那是由邵洵美所办的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这本文学杂志最初包含着小小一个愿望。在“编辑后记”中他写道：“我们并没有这种企图，想使读者从这一个刊物里看到有任何一种集体的流动——不管是感情的或者是理性的。我们都尊重思想上的自由。我们允许每一个在本刊上写稿的人，有他自己在文艺上的立场与见解。”可见，他是把“尊重思想的自由”作为文学所追求的至高无尚的价值的。

然而，他对政治的兴趣在这时就已经暗暗超过了文学。最有力的证据是，1931 年 10 月，这个刚满 22 岁的青年就兴致盎然地编了一本名叫《中日问题各家论见》的时政论集，内中搜集了左舜生、陈独秀、汪精卫、陶希圣、张东荪、萨孟武、俞颂华、梁漱溟、胡愈之、罗隆基、王造时、武育干、高永晋、樊仲云、陈启天等著名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的论文。这个举动，实际上已经预告了他日后的人生选择。

1928 年，储安平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就读新闻系和英国文学系。那时的光华大学堪称是自由分子的一块绿洲，或一座

堡垒。王造时担任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时，储正好在那里当他的学生；其时，任教的还有罗隆基和潘光旦等，罗是政治系教授。储安平在光华的4年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通过文学和学术的方式强有力地影响着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光华大学的前身是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后来许多研究证明这所大学具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温床的显著特点：“那时的光华是一所自由空气很浓的学校，它的校长是张寿镛先生，文学院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主任廖世承，社会学系主任是潘光旦，其他著名教授的阵容是胡适、徐志摩、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等。可以这么说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一时都集中在了光华大学。”^① 光华大学对储安平一生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在这所大学里，他一边不停地进行自由写作，一边不停地向自由主义报纸投稿——先是《申报》，后来是《大公报》。1932 年，大学毕业后的他成了南京《中央日报》的副刊编辑。1935 年，他利用采访柏林奥运会的机会奔赴英国，考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在一个更高的自由主义平台降落。他选择该院的政治系，师从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教授。伦敦大学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活跃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中坚人物，都曾有过留学该校的特殊经历。1937 年抗战爆发，储安平尚未毕业就忧心如焚地乘槎归国。当时慕才如渴的张季鸾和胡政之曾想聘其为《大公报》主笔，由于种种原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8 页。

因，他仍回《中央日报》，被任命为主笔，但很快地便辞去了这个令许多人垂涎欲滴的职务。之后，他带着妻儿辗转流亡到了湘西，在著名的蓝田师范学院任教，向流亡的学生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这是在1940年。而1939年，他有近一年的时间是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度过的。在那里他除了为新闻专修班授课外，还参加了“渝社”的自由主义政治学术活动。1945年春，他曾在黔湘边境的晃县办过一张名叫《中国晨报》的民间小报。这年冬天，他又回到重庆，与同仁一道编了一本自由主义时政杂志《客观》。1946年创办《观察》杂志，并很快使这本时政周刊成为当时波澜壮阔的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面大旗。1948年底《观察》被国民党所查封。1949年初他来到北平解放区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政协”的工作。多年来，一直信守无党无派原则的他，竟然一下子破天荒地参加了两个民主党派——民盟和九三学社。1949年11月，《观察》被中共中央批准复刊，他仍为主编；1950年5月，鉴于该刊已与过去的自由主义传统完全割裂，索性改名为《新观察》，这时的储安平，其身份已是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基本上不再管该刊的编务。1957年4月，由胡乔木举荐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6月，因一篇《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即后来著名的《党天下》——笔者注）而被划为“右派”。1966年8月31日，与老舍同一天投湖自杀，但没死成。同年9月上旬，突然失踪，由此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史上最大的一宗悬案……

二 “《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

准确地讲，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活动，特别是他的思想历

程，是从光华大学开始的。谢泳先生是这样来评价光华对储安平思想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的：

他（储安平）后来成为胡适之后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他早年在光华大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大学时代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活跃的时期，那时《新月》刚刚由罗隆基主政，不久就引发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虽然当时储安平没有在这次论战中留下什么文字，但可以说《新月》的精神和气质影响了他，他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差不多 15 年之后，这位沐浴着《新月》阳光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终于接过了他前辈的事业。^①

这种思想影响后来通过伦敦学院，特别是拉斯基教授的亲炙而更加深入和强固。尽管他以后一直在从事新闻编辑和新闻教学工作，但在《中央日报》却根本无法施展其自由主义才能与抱负。即使是在蓝田课徒，他也无法将他的思想辐射到更加广大的社会和精神空间。应该说，他最有历史影响力和精神辐射力的自由主义活动，是从《客观》开始的。也就是说，储安平在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从《客观》开始而逐步奠定的。这是在 1945 年的冬天。从湘西再次回到重庆的储安平，已不再是“渝社”时期的清谈家和学院味十足的“政治票友”了，他想干一番大事业，而且马上就干！于是很快联络了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陪都创办了《客观》周刊（据谢泳先生考据，当时名为《客观》的杂志尚有两家，一

^① 谢泳：《储安平评传》，《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第 4 页。

在上海，另一在广州，均为半月刊——笔者注）储安平任主编，张雅琴为发行人，编辑有吴世昌、陈维稷、聂绀弩、张德昌、钱清廉等，这班人后来又大多成了《观察》周刊的中坚力量。

就为什么要创办《客观》周刊，储安平后来回忆时粗略讲了一下，他说：“在三十四年（即民国 34 年，1945 年——引者注）冬天，我们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① 只要稍微了解后来《观察》的编辑旨趣，我们就不难知道储安平内心中所包藏的自由主义动机，甚或可以说是野心。在这篇名为《辛勤·忍耐·向前》的回顾文章中，储安平写道：

那时正是抗战刚告胜利，政治蕴酿改变的时候。多年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许多积郁，我们这时秉笔直书，亦确能言所欲言。我们愿意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确有许多读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观》的出版——这些读者后来都成为《观察》的读者。……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②

读者，还有自由主义的前辈——他们的期盼和鼓励，以及战后正蕴酿着的国家的民主改革风潮，是他们创办《客观》周

① 《观察》周刊第 1 卷第 24 期，第 2 页：《辛勤·忍耐·向前》。

② 同，第 3 页。

刊的基本动力。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安平先生却没有谈到——也许这在当时是个不言而喻的背景。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英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期待：

我们不应该听凭美国的生活方式自行推销，那样做的结果势必将典型的乡镇居民意识、画报、合约桥牌、美国俚语和大学校园风尚等等原封不动地搬到全世界。……对于成熟、忧患的中国知识阶层来说，它只能引起厌恶和反感。我们必须以一个高于《生活》杂志（指当时畅销欧美知识界的美国自由主义杂志《生活》周刊——笔者注）的水平来寻求同中国知识分子的联系。所谓比较高的水平，指讨论的应当是社会道德准则，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是我们怎样做……它是通过“文化媒介”来表达的。它对富有创新精神的追求新观念、新艺术形态的作家，而不是对银行家，产生感染力量。

概言之，我们美国人形成了我们称之为民主生活方式的文化价值观念，我们依然珍惜它，相信它，并努力从中探索出适合全人类的原理。^①

这是 1943 年 1 月，时任美国战时情报协调局驻中国首席代表费正清向华盛顿递交的一份关于中美文化关系的备忘录中的一段话，他将战后美国的对华政治文化战略作了全面的设想和细致的阐述。因此，这是《客观》及后来的《观察》问世的

^① 转引自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1 页。

国际背景。尽管《客观》周刊在出了第 17 期后就因“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但它的影响却是值得纪念的，尤其是作为一块自由主义的实验园地，它对安平先生后来干练老道地大办《观察》周刊，是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的。他倒不是刻意在按照英美国家的政治文化战略作策应，然而，他确实是愿意从《客观》的努力中，去探索“适合全人类的原理”——这个“原理”就是制度化生活化的自由主义。他后来在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中的思想，其实在《客观》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综合起来看，储安平在《客观》上刊出的政论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的评价，二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三对美国的态度，四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五对内战的批评。”^①

首先，储安平对国民党的批评和对政局的批评，是放在一块儿进行的，因为两者间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时局相当糟糕，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而根子就在一党专政，以军政和训政压制宪政的进程。为此他怒不可遏地批评说：“我认为无可推诿，现在的执政党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②他痛心地为，国民党的腐败和它失去革命的活力，是互为因果的；以一党专政抗拒国家民主化进程，使民众对它的期待落空。

其次，是对共产党的分析。储安平认为，共产党的长处是明显的，但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他说，“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但是，对于当时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他表示不敢恭维，认为“过于崇奉外邦、一味视外邦为宗旨，则不免丧失自

① 《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第 15 页。

② 《客观》周刊第 1 期，第 2 页。

己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①事实上，这个批评远比王造时他们的更为厉害。另外，对中共是否在掌权后能“完全实行它的主义”，他表示疑惑。但是，对共产党迟早会夺取政权，他比同时代的许多自由分子更为敏感，更有先见，只是他的批评总是充满着与生俱来的忧戚。

第三，对美国的态度是理性的，他并不认为美国一切都好，都值得效仿。吴世昌的观点在当时似可为储安平的态度作一注释，吴认为苏联“人人丰衣足食，决没有英美资本家拥资百万，而失业者得不到面包的现象”，他称之为“经济民主”。而英美政治民主呈现的却是：“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权则不足。”^②稍稍不同的是，与美式民主相较，储安平更笃信英国的民主制度。因此，他对美国的批评主要是参照“威斯敏特”那种民主理想来进行的。

第四，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他深信，中国自由主义者是真正有力量的，真正对这个国家负责的。中国民众争取思想言论自由，以及整个人权状况的改善，必须通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坚忍顽强的努力，方能实现。他提议：“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③当务之急，是快速大量地从中产阶级中培养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民主政治的干部”。冯英子先生感叹道：安平这个人，总以为英国的民主

① 《客观》周刊第4期，第1页。

② 《观察》周刊第1卷，第5期：《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③ 《客观》周刊第12期，第1页。

制度是可以效法的，因此“才气横溢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书生。”^①——不幸，抑或是可贵，他压根就没有把自己看做是书生，而是看做匹夫——他自信，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大无畏的，因而是不可战胜的。

在重庆，他还随许德珩等 10 多位学界名流到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演讲，呼吁反对内战，使军队国家化。只是他的追求与同行的大多数“左倾”人士不同，他始终憧憬的是英式自由主义的理想。

三 《观察》的四个基本原则

1946 年，历史是如此地使储安平亢奋不已，我真感到有一种天降大任的激动，这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报人必然获致的历史感觉。此刻，国共两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彼此间剑拔弩张，都恨不得一口吃掉对方。因此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出来收拾如此危乱的局面，更待何时？

元旦刚过，他和同仁已迫不及待了——1月6日，在陪都阴冷的雾气笼罩中，《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召开了。会议讨论和定下了刊物的名称，起草了缘起和征股简约等。当然，会议更集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观察》到底能否办下去，会不会像《客观》那样昙花一现？“当时储安平他们笼统地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是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却还没有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

^①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第 13 页。

面的支持。二是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① 现今的学者认为，储安平的这个分析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尤其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这一判断，更为《观察》在后来成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重镇，作了力量上的估计。但可惜的是，他对“自由思想分子”政治上的幼稚性和摇摆性估计不足，最终，几乎使他成了孤军奋战的荆轲或者项籍。

会议后不久，储安平一行即乘着民生公司的客轮，穿越险峻的三峡而下，大有当年李太白“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生命惬意。9月1日，在经过一阵思想和身体的劳顿后，《观察》周刊终于在中国自由主义报业的中心和“自由思想”的大本营——上海，正式诞生了。

《观察》的问世，在中国应该说得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它把中国广大的自由思想分子充分地调动和集结了起来，更把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想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观察》要干的的确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业，即使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亦不能不被其独特的“志趣、风度和立场”所惊惶得目瞪口呆。可以想象，储安平当时是以起草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的严肃和激昂来撰写这份发刊词的——在这篇名叫《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的自由主义宣言中，他较之前辈和同辈的民间报人更全面系统和高水平地阐述了这本刊物所坚持和追求的自由主义“志趣、风度和立场”。在“缘起”中，其面对国势，忧心如焚，一种舍我其谁的类宗

^①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第19页。

教献身勇气直向历史逼来。

他写道：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虑；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面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也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迫切需要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未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

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

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①

可是，身为无党无派的“自由思想分子”，又该怎样去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呢？他呼吁道：应该对国家的政治感兴趣；政治不是有党有派者的专擅，政治应该是众人之事；一切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应该接受自由主义者和民众的各种批评。于是，他合盘托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企图”：

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

① 《观察》周刊第1卷第1期：《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力求彼此的了解。^①

其实，熟悉储安平和拉斯基的所有中国门生的人都明白，他们的这个“企图”早就为中国社会，特别是国共两党所熟知。只是像这样急切地呼喊、建议和责难，这样的不容让夺、不许讨价还价的命令口气，却是令执政党非常不舒服的。储安平自告奋勇地为“政府”和民众制定双方必须信守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虽是英式的，但他认为也适合于中国的政治：

一、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拒。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事，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措施设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最大的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还须经济民主。

二、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须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的。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

^① 《观察》周刊第 1 卷第 1 期：《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①

在接下来的第三条“进步”这一义项中，他更是充满了一个预言家的忧虑和焦灼。他深怀超党派自由情愫写道：“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惟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储安平不是诗人气质的那种病态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有激情，但骨子里却非常理智。因此他认为民主政治和国家工业化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神和现代头脑的基础之上，而所谓科学精神和现代头脑又必须是以超逾党派的私利和鄙陋视野为标志的。他最后所强调的“理性”其基本含义也就是这样的。他接着写道：

四、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和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

^① 《观察》周刊第 1 卷第 1 期：《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解决。惟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他将其称为《观察》乃至整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应信守的“四个基本原则”，同时也诚挚地奉劝拥兵相抗的国共两党亦能信守这“四个基本原则”——他并非不知这种奉劝的艰难，甚至是根本无效的，但是，他必须让自由思想分子做出榜样来给他们看看。“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在文章的最后，他既有种“铁肩担道义”的负重感，又似乎还有一种“妙手做文章”的轻松感：

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①

《观察》就这样无所畏惧地诞生了。其时，储安平一面在呕心沥血地编着这份不识时务、不讨乖巧的民间杂志，一面做着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向学生讲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评论练习》等有着丰富自由主义内涵的课程。他培养的学生后来大都成了具有自由思想的新闻界骨干人物。谢泳先生在评价储安平他们的这种空前的理性努力时，语调中不能不充满着深深的悲怆与苍凉。他说，“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的同人刊物，在《观察》之后，

^① 《观察》周刊第1卷第1期：《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似乎（他居然用了“似乎”——笔者注）再没有这样允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在中国的消失，是一件至今还牵动知识分子的大事。”^①不能说储安平对“前景”缺乏起码的预见，但他的确不会知道，他创办的《观察》周刊，将成为自由主义最后的墓碑——他自己最后的墓碑。

四 “自由思想分子”的大集结

《观察》一问世就格外引人注目，除储安平在发刊词中展示的博大高远的自由主义抱负外，还以它所展示的一个强悍的主要撰稿人阵容而使人惊讶不已——在创刊号上，它就像恶战前布列军阵一样，将 68 位撰稿者的名字赫赫然排列在封面下方，以此来表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独立评论》和《大公报》“星期论文”之后的又一次大集结和总动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只有储安平的自由主义人格魅力——他的胸怀和气度的感召力，才能使他造成这样一种雄阔精猛的局面。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和重新“检阅”这支强悍的队伍，我们不妨将这个阵容排列在下面。他们是——

卞之琳	王芸生	王迅中	王赣愚
吕 复	沈有乾	吴世昌	吴恩裕
李洗培	李广田	沙学浚	周子亚
徐 盈	孙克宽	马寅初	许君远
陈之迈	陈友松	陈衡哲	陈瘦竹

^① 《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第 19 页。

曹 禺	梁实秋	张印堂	张沅长
张德昌	笄移今	黄正铭	郭有守
傅斯年	费孝通	杨 刚	杨 绛
曾昭抡	赵家璧	赵超构	雷海宗
刘大杰	蔡维藩	钱端升	钱能欣
钱锺书	鲍觉氏	戴文赛	戴世光
萧公权	顾翊群		

进入这个军阵的，当然不全都是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里面也有偏左或偏右，甚至也有暗暗隶属于某党某派的分子。即使是这样，他们在骨子里亦有程度不同的自由主义倾向。不过，内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却是这个自由主义“联合阵线”的“英美特色”。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过良好的英美教育，因此，自由主义自然是这种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下面这个对照可以看《观察》“约定撰稿人”的英美文化教育背景：

姓 名	身 份	背 景 说 明
王迅中	清华大学教授	
伍启元	清华大学教授	留学英国攻法学
吴泽霖	清华大学教授	留学美国攻民族学
柳无忌	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	1927年清华留美预备部毕业
马寅初	前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陈之迈	中国驻美大使馆参事	1928年清华留美预备部毕业

姓名	身份	背景说明
陈衡哲	前北京大学教授	1914年清华学堂专科毕业后留美
郭有守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委员会专员	留学日本攻教育学
张东荪	燕京大学教授	留学日本攻哲学
冯友兰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杨西孟	清华大学教授	留学美国攻经济学
叶公超	外交部参事	曾留学美国
潘光旦	清华大学教务处	1922年清华留美预备部放洋学生
钱端升	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萧公权	燕京大学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
任鸿隽	前四川大学校长	曾留学美国
沈有乾	前光华大学教授	1922年清华留美预备部放洋学生
梁实秋	前北京大学教授	曾留学美国
张印堂	清华大学地理系主任	留学英国攻地理学
张忠绉	前北京大学教授	1923年清华留美预备部放洋学生
费孝通	清华大学教授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曾昭抡	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雷海宗	清华大学教授	留学美国攻世界史
戴世光	清华大学教授	留学美国攻统计学
陈友松	清华大学教授	留学美国攻教育学

姓名	身份	背景说明
顾翊群	国际基金银行董事	留学美国攻经济学
吴世昌	中央大学教授	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兼导师
胡先骕	中正大学原校长	留学美国攻植物学
廖世承	国立师范学院院长	
宗白华	中央大学教授	留学德国攻美学
萧乾	大公报记者 复旦大学教授	曾留学伦敦大学
吴恩裕	东北大学法商学院院长	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
李纯青	大公报社评委员	留学日本攻新闻学
王芸生	大公报主笔	
戴文赛	燕京大学教授	留学英国攻天文学
笄移今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专员	
陈瘦竹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	
李广田	南开大学教授	
邹文海	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	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
戴镛龄	武汉大学教授	留学英国攻文学
孙克宽	内政部参事	
杨绛	震旦文理女子学院教授	留学英国攻文学
杨刚	大公报驻美特派员	哈佛大学女子学院
沙学浚	中央大学教授	
卞之琳	南开大学教授	旅居英国的研究员
钱锺书	前西南联大教授	牛津大学硕士
张德昌	前西南联大教授	留学英国攻政治学
赵超构	上海新民报总编辑	

姓名	身份	背景说明
周子亚	中央政治学校教授	留学德国攻政治学
杨人榘	武汉大学教授	留学英国攻历史学
夏炎德	复旦大学教授	留学英国攻经济学
钱能欣	中国驻法大使馆秘书	留学法国攻国际关系学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背景”中没有一一列出的，即少数没流过洋的，也间接受到过留学英美的这些人们的点拨和熏陶，因此，同样具有相当的自由主义气息。特别是像傅斯年、陈衡哲和任鸿隽，以及明确支持这个阵容的胡适，他们作为新文化运动催生的“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加盟，就更使以储安平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备受鼓舞，斗志猛增。

《观察》办起来以后，储安平先后给胡适写过好几封信，内中明显可见他对这个前辈自由主义大师的尊崇和景慕，亦明显可见他立志将自由主义的薪火勇毅承传下去的决心。其中有一封写于1947年1月21日，储安平向胡适坦陈了自己的愿望：“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又说：“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①事实上，胡适本来就是《观察》最重要的撰稿人，尽管他的名字并没有在创刊号的封面上列出（第二卷第一期开始列出——笔者注），学术界对胡适的加盟予以了很高的价值评估：

储安平对胡适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自觉联合。我们现今没有见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回信，在有关的胡适传记资料和他的书信日记中都没有发现胡适与储安平的联系。由此可以说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感情。^①

储安平的这种感情并不完全只是他个人的，其实，这种感情还代表着绝大多数加盟者对胡适的尊崇和期待——在这里，它更有其特殊的认知意义。

前辈自由主义者中，写稿最勤，对《观察》支持最大的是傅斯年。傅对储安平极为欣赏且寄予厚望，因此赐稿之余，他还给《观察》提过不少非常有价值的建议。从储安平写给傅斯年的信中可见其万分感激之情，他写道：“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到；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观察》非无基本撰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②作为晚生，亲聆教诲，接受意见，恳切之至，可谓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感人至深的又一段佳话。

谢泳先生曾对《观察》的撰稿人进行过简要的分析，由此梳理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从年龄结构上看，大体两个年龄段，其中一个是以胡适、马寅初、傅斯年、张东荪、

①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第23~24页。

②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第28页。

萧公权、冯友兰、胡先骕等为代表，多属于 19 世纪末出生的，曾亲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第一代自由主义者里的中坚人物，约占撰稿人中的百分之十左右；余下的大多为 20 世纪初叶出生的——这两代人在思想勾连上非常紧密。第二，主要撰稿人是第二代，当时年龄大都在 50 岁以下，无论在专业、思想，还是在勇气和精力上都是人生最佳时期，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 1957 年。第三，他们大都直接或间接受过带有浓厚自由主义精神气息的英美式教育。第四，从职业考察，绝大部分人都是专家学者，尤以大学教授为最多。第五，1949 年新政权建立后，除少数人去了台湾或美国，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大陆。他们的或去或留无不隐含着深刻的文化根源。第六，1957 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打成了“右派”。而罹祸的诸多因素中，有一个最不可饶恕的原因就是：他们几乎都是自由主义者，并且在新政权治下居然还顽固地怀抱着文人论政、文人参政的信念，死不悔改地坚持用自由主义的口气说话。但是，在新的情势面前，他们的经验几乎毫无用处——《观察》的性格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性格，尽管他们先前知道，但却知道得并不深刻具体……因此，《观察》上的那份“约定撰稿人”的名单，无异是一份预先草就的“阵亡者”名单。

五 “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

《观察》自觉承续着前辈自由主义者的传统性格，那就是坚持“文人论政”。用储安平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议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也就

是说它决不是党争的产物；“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①——在他看来，文人论政是自由主义者最自然不过的日常功课。像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以及《独立评论》、《新月》和《大公报》那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从创刊号始，《观察》就在扉页的右上方醒目地标出其政论的品格，强调必须是“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储安平 and 几乎所有加盟的撰稿人都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有利用言论的力量来批评和监督政府，甚至各个政治派系，并以此来影响和迫使它们向民主宪政的前景迈进。《观察》非常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非常清楚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必须始终站在民间的、超党派的立场上自由地发言，以此向不习惯以超然独立的态度批评政府和各种政治派系的中国民众作出表率。

据《观察》第三卷“报告书”和第四卷“报告书”的统计数字表明，它拥有大量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知识分子读者。其中第一次公布的 6732 名订户职业分类中，学界读者 1572 名，占 23.4%，居各类职业读者之首；第二次公布的 16086 名订户职业分类中，学界读者 4182 名，占 26%，仍居各类职业读者之首。何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胡素珊的研究认为^②：这是因为《观察》是“一份不受任何党派控制，自由发表政治言论的独立性刊物”，而这一“形象”，毫无疑问是《观察》的编者、作者和它的读者所共同创造的奇迹——所以，它能成为“20 世纪 40 年代末同类刊物中最受欢迎的一份”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观察》的政论，从创刊号伊始就凸显出了它与众不同的

① 以上所引分别见《观察》周刊发刊词及第 5 卷第 3 期储安平文章。

② 引自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8 页。

性格姿态。其中署名打头阵的是《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的《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文章中，王从以下三个方面为时局把脉：（一）南北朝。他认为“这是中共要做到的”；（二）十月革命。他说：“中共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主观力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客观的条件却在慢慢进展着”，排除国民党军队哗变的结果；（三）政治协议之路。他认为关键是改组政府，实行民选，借此过渡到民主宪政的道路上去。他主观认为“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故特意向国共两党提出忠告：“国民党应该深刻了解民主宪政的路，是需要高度的宽容与高度的智慧的”——言下之意：智慧不够怎么办？那就从自由主义者那里去吸取吧！“最后，需要中共将来甘心做一个民主政制下的宪政的党。”

王芸生的此番议论并无新异之处，与其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大量社评文字并无二致。不过，他能欣然加盟《观察》，并且首先挺枪出战，需要我们作出特别的评估。这就是《大公报》和《观察》的思想联姻，充分显示出了两大民间传媒的“强势组合”，由此作为一个显著的象征，有助于我们理解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团结猛进态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观察》的政论性格由此亦可见一斑。仅以第一卷上政论的标题为例，即可知其论政姿态之矫勇。除王芸生之外，余者为：

伍启元：《论当前中国经济情势》；

张东荪：《中国之过去与将来》；

储安平：《失败的统治》；

杨西孟：《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金及薪金实值》；

吴世昌：《谁能替人民说话》；

吴恩裕：《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民主政治》；
庄智焕：《如何走上民主建设之路》；
萧公权：《说民主》；
吴世昌：《中国需要重建权威》；
李纯青：《战从义·政从仁》；
潘光旦：《军与民的社会地位》；
韩德培：《我们需要的“法治”》；
庄智焕：《中国政治的四种矛盾》；
李澈庐：《以民主缔造统一》；
邹文海：《民主政治与自由》；
张锐：《论行政的无能》；
楼邦彦：《“自由·平等·博爱”的再生》；
孙克宽：《人心·国是·现状》；
周绶章：《论神话政治》；
楼邦彦：《论官吏的民权》；
.....

这些政论文章，集中对中国极权政治的可怖和民主自由的可怜现状，作了细致的披露和尖锐的批评，以及在揭露和抨击中所饱含的自由主义渴望。从第二卷、第三卷一直到 1948 年 11 月 24 日《观察》被“党国”武力查封，文人论政的态势越来越悲壮矫勇——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张东荪）；《论政府大捕学生》（赵超构）；《政治力量能安穩物价》（严仁赓）；《评最近官方抢救经济危机的办法》（施复亮）；《论党的职业化》（吴世昌）；《保障人权》（北平十三

教授);《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傅孟真);《国民党往何处去》(杨人梗);《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杨人梗);《关于自由思想分子》(陈衡哲);《中共临末为何拒绝和谈》(梁漱溟);《大局浮动·学潮如火》(储安平);《新闻自由的低潮》(葛思恩);《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施复亮);《中国向那一条路走》(陈旭麓);《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储安平);《论公务员的罢工问题》(楼邦彦);《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马寅初);《经济正义与社会安全》(郑林庄);《英国工党政府关于民营事业的管理办法》(The World Repoit);《谁说中国人没有自由》(邓嗣禹);《为本届大学生进一言》(任鸿隽);《民主国中的嘉木与恶草》(陈衡哲);《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王遵明等);《评出版法修正草案》(储安平);《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朱光潜);《从民主到帝国》(谷春帆);《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周炳琳等);《关于“中共往何处去?”》(杨人梗);《改进中国政治的几个问题》(孙克宽).....

这些文章在尖锐批评以党派政治为特征的极权争斗时，把理性思索的目光一步步导向深入。其中，自由主义者之间就各自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以及英美自由主义道路能否解中国之危厄，亦有不小的争论。比如，吴世昌认为：民主主义尽管是大势所趋，甚至没有一个极权国家“会自己承认其本国政治是不民主的”，但具体“牵涉到民主化的概念”却是“歧义太多了”^①。

吴世昌：《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观察》周刊创刊号，1946年9月1日。

伍启元则认为：“在亚洲，民主主义应以民族自由为第一要义……对‘民主主义’解释的冲突，是今日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①。梁漱溟却在《予告选灾·追论宪政》中“论证”：英美的民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路”。他站在“新儒学”的立场上疾呼：“西洋不可学”！而蔡维藩则对美苏二强对抗中，美国所推行的“自以为最理想的那一套民主方式”，并试图“建设许多能过像美国生活那样的国家，来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表示疑惑，但他还是清醒地指出：

世界进入民主时代，民主须赖多党政治，而多党政治下的民主，要有自由，要有平等，要能宽容，要能互让。可是受了美苏斗争的影响，一国政治上往往保持不住民主必须的这些基本条件，……用一个文化来支配世界，也必阻碍世界文化的进步……文化之求“清一色”的势力，发挥了数十年，可以阻止文化数十年不得进步，发挥了数百年，可以阻止数世纪不得进步。^②

这番议论完全具有悲剧般的预言性质。不过张东荪的悲观主义却要来得更彻底一些，他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所下的病案竟是这样可怖：由于中国“自始即永远滞留在‘天下式国家’的落后阶段”，英美的民主政治再好，但贸然搬到中国，“除了助长天下式国家的政府的权力，供其对人民更高压更榨

^① 伍启元：《从世界潮流论中国出路》，《观察》周刊第2卷，第7期，1947年4月20日。

^② 蔡维藩：《美苏斗争的影响》，《观察》第3卷，第22期，1948年1月24日。

取以外，没有别的”；尽管民主政治“本来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中国患的是“文化失调症……尤以‘政府病’为其主要症候。”^①这不能说不是射中鹄的的悲观论者的真理。

六 解剖中国的“自由思想分子”

作为《观察》的举旗人和主将，储安平的政论文章自然更加令人注目。在《观察》开办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就撰写了40多篇个性非常鲜明、言辞非常激烈的政论文章，它们大都极有资格被收入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经典序列，如将永远脍炙人口的《蒋主席的一篇新演说》、《自由与守法》、《失败的统治》、《我对于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的一个重要进言》、《评出版法修正草案》、《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白报纸配给情形》、《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以及《政治失常》和《一场烂污》等等，它们永远能使人感觉到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强劲脉跳。这里仅例举他发表在《观察》第二卷第二期居头条位置的《中国的政局》一文，让我们能一睹他的“自由思想”之风采。对国共两党性格的细致分析是他一贯的强项，先看他是如何分析和评价执政的国民党的——

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

^① 张东荪：《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诊断》，《观察》第3卷，第7期，1947年10月11日。

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

在历数国民党政权在野蛮挣扎中所暴露出来的丑态后。他忧心忡忡地写道：

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底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后，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但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号召，加入联合政府后，必不致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他还由此生发开来，对民盟的骨干分子和已经宣布脱离民盟组织的梁漱溟和张君勱等作了揶揄和批评。其中他评价民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那句精言，后来竟成了人们评价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首选评语——

在中国，散布于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为数极

多，不过他们较为散漫，甚少严密的组织。其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我们现在先就民盟作一个大概的论述。

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民盟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历史环境，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情绪下集合起来的，就是“反对国民党”，这是他们惟一联系的心理中心。民盟到底是一种政党的做法，还是一种运动的做法呢？

就过去情形观之，似属于后者而非属于前者。民盟的历史已有数年，而其出头则为前年的政协时期。不过在过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种印象，即政府来借重他们时，就有了“民盟”，不来借重他们时，就没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谈”，民盟就大大热闹，没有“和谈”，民盟就冷冷清清的无事可做。这情形至少在过去是如此。

照近来的趋势看，他们似已企图改向政党的做法一途发展。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民盟的领导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辈。我们若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政团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像张表方（澜）、沈衡山（钧儒）等几位老先生，实在都是过去的人物了。民盟领导人物中实际治政经验最丰富的当推黄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黄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了。

张君勱先生（现已脱离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宪政学者，一个最好的政论家，然而他只是一个论政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物，他至多只宜于任国会议员，而不宜于掌行政责任。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

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从各方面分析，民盟实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团体，而所以能勉强集合起来，完全是由于实际的政治环境逼成的。但单靠对国民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来维系一个政团，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结合。照我个人的观察，民盟诸君子，可以共患难，不一定能共富贵。这句话或许说得太率直，我们将来再看吧。至于现在一般人都说民盟太左，成为了共产党的尾巴，关于这种批评，我认为无甚价值。凡是进步的政治集团，当然是比较左的，世界大势如此。成为了共产党尾巴一点，纯然是恶意的侮蔑。要知实际政治不能完全摆脱权术，从战略上说，民盟和共产党互为呼应，实为必然，两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国民党，在这个前提下，两者当然要并行连系的。假如一定要说如此就是民盟被共产党利用，则我们也未尝不可说，民盟也利用了共产党。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为民盟之病。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民盟与中共就可能继续维持其连系的步调。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在那个时候，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应了。

这几十年来，就民盟为什么要“向左转”的问题，年轻新锐的学者们怀着极大的破解历史之谜的兴趣，作过多种多样的理性探询。这些探询中，尤以许纪霖先生的意见最有代表性。他在一篇特别具有悲怆意蕴的论文《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1945~1949）》（后来收入他的论文

集时索性直接改为《一幕悲壮的参政实践》——笔者注）里面，是这样说的：“政府对自由主义的过度反应活生生将这批温和的知识分子赶到了共产党一边……1948年以后，民盟等一些民主党派流亡到香港，恢复组织，发表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决裂，放弃‘中间路线’，支持中共的武装革命。随着国民党大势已去，愈来愈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秘密奔赴解放区，一边倒向共产党。”^①而在1947年初民盟二中全会时，他们还宣布将继续在国共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何以仅仅只隔了一年，民盟就突然左倾得如此厉害？不错，国民党的反民主反自由主义的威逼是一个必须承认的重要因素，但是民盟试图取利于中共以换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不也是非常功利的一个主因吗？因此，扮演“先知”角色的储安平，不能不在分析和评估包括民盟在内的中国自由思想分子时，内心充满了绝望者的悲沉和无奈。他说：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以重视的组织。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

自由思想分子的彼此相通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分子的长处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长，其短处则为胸度狭窄，个人主义。

^① 许纪霖：《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参政（1945～1949）》，《二十一世纪》杂志，1991年第6期，第44页。

因为“相轻”及“自傲”从中作祟，所以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的，不是权力的，所以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①

七 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墓志铭”

可以说，除了储安平之外，在那个自由主义者大出风头却又浑然不知他们作为一个可悲可怜的整体行将式微的年代，没有别的自由主义者能坦诚勇敢地自揭其短，无私无畏地说出这个骇人的真相。

储安平索性将这一切合盘托出——

今日中国极其需要自由分子的抬头，但事实上自由分子的抬头非常困难，这与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制有关。国民党二十年统制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抬头的限制，是三方面的：1. 政治方面的限制。这点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释。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其他自由自然都谈不到。2. 经济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八年抗战，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了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力量。3. 在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

^① 以上引文皆见《观察》周刊第2卷第2期：《中国的政局》。

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像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厌恶国民党不要紧，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现实而日益泛滥。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但现实环境逼得青年左，于是青年越来越不易保持其冷静的头脑而对各事作沉着的思想。在国民党，可谓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义的传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我称那些只知享乐百事不管的青年为浪才。浪才越多，对于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限制。自由主义是最讲是非的，那些浪才什么都不管，哪还管什么是非呢？

事实上，这是一篇关于自由主义命运的悲情宣言，同时更是一篇提前为自由主义者撰写的祭文。可是，在自由主义营垒即将大乱，且忙于“两极分化”的这一时刻，又有几人会认真地去领会他的这番苦心呢？他不否认，自由主义者对极权政治来说确实可怕，然而，这种可怕的力量却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计谋——威逼或利诱来瓦解的。

储安平深知，只有极少数的自由主义者不会被政治计谋所瓦解掉。这时，他不能不想到“牺牲”这个悲凉而高贵的语词——特别是如果这种牺牲注定是他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那么，姑且就留不这篇“墓志铭”，让未来的人们重新开始吧

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内，一般情景还是很黯淡的；说得远一点，则我们这一代，大概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虑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①

就像预期的那样，他的吁告没有得到太多的积极反应。离乱之秋，“两极分化”，谁有闲心去理会这个行将被“时代”所放逐的屈原式的人物弹出的这种“不合谐”的变奏呢？惟有躲在重庆北碚一隅撰写《中国文化要义》的保守主义者梁漱溟先生，抱着对自由主义命运负责的态度写来了他的不同意见。这对储安平来说已经是大可聊以自慰的了。

储安平的思想性格就是如此，事实上，他的政论性格就是《观察》周刊的典型性格。1947年快要结束时，他又针对国民党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的《出版法修正草案》，写出了他的“点评”文章，对“党国”阴谋用“法律”的方式来钳制新闻出版自由予以批评。而这些批评与他同一时期的《读孙科谈话》和《评翁文灏内阁》等时评文字一样，无不充满自由主义者的理性精神，无不表现出建设性和道德劝诫性。然而，到了1948年底，他终于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教诲和劝诫的耐性，决定写一篇“悼词”来送给这个极权政府，以此对它20年的极权统治作一个总结。《一场烂污》这篇文章自然引来“党国”领袖的极

^① 以上引文皆见《观察》周刊第2卷第2期：《中国的政局》。

端震怒，并直接导致了《观察》周刊的被查封。写这篇关于国民党命运总结的文章时，他更像那个在酒楼上题写“反诗”的宋公明先生。在文章的结尾，他索性“当街”大骂道：

七十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七十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自尽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阴魂不散的……惨啊，惨啊！冤啊，冤啊！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吗？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折足！烂污！^①

民瘼惨不忍睹，更何论民主自由之遥不可及！《观察》被武力查封时，本来就在国统区无以安身的储安平，不得不被迫“向左转”避难于中共占领下的北平。《观察》的确如他预言的那样是彻底的牺牲了。“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被赶跑，旧的极权主义对手已不再成其为对手，新政权又表现出对民主和自由的极大兴趣。住在高级的北京饭店，日夜参与新政权主持下的国事讨论，原打算“荷戟独彷徨”的储安平一时失去了彷徨的理由，那支曾伴随他骁勇征战的自由主义之“戟”，仿佛也失去了用场，便干脆将它放在了一边……1949年以后，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储安平，其思想生涯基本上已宣告结束……

^① 《观察》周刊第5卷第11期：《一场烂污》。

余论：

对自由主义的检讨与清算

1949年，自由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还是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运动，在中国大陆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的悲剧命运。大陆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终结，也必然使自由主义新闻实践陷入了穷途末路。但是，这种终结并不意味着事情已经完全了结，对自由主义的检讨与清算从这时开始，被严肃地摆在了议事日程中。由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悲剧失败是 20 世纪震动极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所以对这场运动

的检讨与清算就不单单是自由主义，或者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它还必然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反响。

当然，检讨和清算首先是由自由主义者内部所主动引发的。事实上，这种反省早在自由主义运动行情看好时就已经在其内部展开。无论是对文化自由主义还是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检讨，在此之前都已经深入到其悲剧的病状灶：如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总体设计未能充分满足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历史的水平自然不会向它倾斜；再如，由于缺乏法制的保障、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它所企望的自由只能处于乌托邦的幻想之中；又如，缺乏类似西方那样的宗教背景，因此不可能构成执着深远的终极关怀。特别是当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发生严重冲突之际，不是价值倒置就是手脚无措等等。应该说，这种从文化哲学与制度文明合理统构的层面所进行的反省是比较深刻的。但是，1949年以后，无论是从新政权，还是从自由主义营垒内部抑或是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它们对自由主义的检讨与清算基本上都是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层面上展开的。

首先是从自由主义者内部。新闻界的自由主义与学术界的

① 所谓“文化自由主义”，是指企图凭借思想和文化来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诸多难题。文化自由主义发端于启蒙维新时期，其代表人物为严复，后炽烈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以后，其代表人物为胡适。“政治自由主义”一直隐伏在“文化自由主义”的背后，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为陈独秀。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极权统治甚嚣尘上之际，政治自由主义被迫蛰伏。到4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宪政浪潮高涨之际，政治自由主义才得以有短暂抬头的机会。报刊自由主义主要属于文化自由主义的范畴，但是它与政治自由主义所企望的以直接介入政治来解决问题，仍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自由主义的检讨与清算有惊人的一致性。以《大公报》和《观察》周刊的自我批判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同时又最耐人寻味。1949年6月17日，在《大公报新生宣言》中，这张老牌的自由主义报纸对其50年的思想及实践进行了沉痛的检讨和严厉的清算。它写道：“……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间’、‘独立’的外衣，实际上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它表示要痛改前非：“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①同样，《观察》周刊也在1949年11月1日的复刊号上公开表示自己新的政治立场。应该说，《观察》周刊与自由主义告别的姿态是感人的，其洗心革面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第一，以前列在封面上的那个庞大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以前环绕刊徽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也没有了；第三，以前每期必重复声明的坚持“民主、自由、理性、进步四个基本原则”的字样也主动抹去了。复刊号上以“本刊同人”名义刊发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更是全面彻底地作了自我检讨与清算。文中所表示的政治态度是诚恳的和积极的：“坦白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积极地，我们希望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我们

^① 《大公报新生宣言》参见《大公报》1949年6月17日社评。

的国家能够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上述的理想，走怎样一条道路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在我们的内心里是空洞的，徬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不能说储安平和《观察》同人的这番表态是没有进行认真反思的套话，事实上，字里行间明晰可见，他们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挫败是有清醒的理性反刍的。正是如此，他们才深感自己落伍于新时代，并为自己的觉悟而感到欣慰和鼓舞：“解放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个新的境界和我们过去所接触的、所了解的、所追求的，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①他们还进一步表示今后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真诚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客观地讲，以《大公报》和《观察》周刊为代表的民间自由主义新闻人的这种政治姿态是深受新政权的赞赏和肯定的。这些民营报刊在其后的新闻实践中表明，它们已不再坚持自由主义的新闻观，而是迅速转移到新的办报方针和新的政治立场上来了。

但是，新政权对自由主义思潮的认识和警惕要远比自由主义者深刻得多。他们知道对包括自由主义新闻人在内的整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改造，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要真正把这一大批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改造为符合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的新型知识分子，必须同时从思想和制度建设两方面入手，才有可能奏效。

在思想层面上展开的这场改造运动是严肃的，同时也是行

^① 《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参见《观察》周刊第6卷第1期，1949年11月1日复刊号。

之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①其中，以上海这个民间自由主义报业聚集的大本营为改造的中心。上海新闻界从1952年8月21日开始，历时整整两个月。参加这一运动的主要有《文汇报》、《大公报》、《新闻日报》、《新民报》和《亦报》等51家著名的自由主义报纸。随着改造的深入，新闻界的自由主义者都自觉地“联系实际”作了自我检讨和批判，并深挖思想根源。而检讨和批判又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原则问题上：首先是“错误的办报思想”即“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工作方法”如强调“报纸的独立性”“强调‘报人有超然地位’”；追求形式，不注重思想内容，脱离人民群众，走所谓的“专家办报”的路线，以及坚持“有闻必录”的所谓“客观主义等错误观念”。徐铸成在检讨中是这样痛悔的：“在解放前，我在文汇报标榜‘独立’的报纸……在反动统治下这样标榜是可以的，但我的思想上也一直认为超然独立是清高的、应该的，认为办报不能有政治目的……1949年3月我从香港到北京来的时候，拖着一肚皮的‘雄才大略’，想在北京再搞一个文汇报，以后至少全国有三个文汇报，我就可以成为新闻界的巨头……”^②他坦承，自己的这种潜隐的自由主义情绪是错误的和反动的。随后，又接着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和“救报运动”，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就这样逐渐被赶出了头脑。

^①事实上，这种改造在此前就已经拉开序幕。1950年2月，新政权还以依法登记的方式，对全国55家私营报纸进行指导性改造，鼓励它们朝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

^②孙葵君：《记忆深刻的两次运动》，参见《从风雨中走来》，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光这样还不行，还必须以强有力的制度和法规建设作保障，才能有效地规范和遏止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死灰复燃。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其实远比“思想改造运动”开展得要早。1949年11月12日，新政权成立新闻总署，负责领导全国的新闻事业并管理国家的新闻机构。该署成立后，迅即着手制定和贯彻针对新闻事业的政策、法令和指示；召集全国性新闻工作会议，调整结构，指导业务。这项改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在《共同纲领》的指引下实行报纸杂志登记制度，将所有的报刊纳入有序的法制管理的轨道；第二，加强和改进报刊经营管理：一是报刊经营实行“企业化”方针；二是报刊发行实行“邮发合一”的方针。第三，对于不同新闻工具之间和报刊之间的分工进行统一调整；第四，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全面促进新闻事业发展；第五，指导新闻业务工作的改革；第六，协助进行对私营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私营报纸实行“公私合营”政策……

随着这两个层面的工作的开展，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可以说已完全失去了市场，失去了继续实践操作的基础和条件。但是，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新政权又从改造新闻教育体制、清算自由主义新闻教育思想和重新组建新闻队伍入手，继续扩大战果。为了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闻教育单位进行改造，1952年，新政权集中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新闻教育单位在调整过程中一举拔掉了其自由主义的思想根基，“大学新闻系的办学宗旨，主要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人才”，以便更好地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新闻教育中将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提到了首要的地位^①。

^①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2版）第417页。

新闻教育体制的更新，使新闻队伍的重新组建得到了思想和制度上的保证。但是，这种队伍组建并不是要一味排斥和摈弃“旧知识分子”，它还包括“团结改造和任用部分旧报人”的政策。事实上，在新政权建立的前夜，中共中央就针对新闻干部缺乏的状况，多次指示要注意稳定和充实新闻队伍。其中，“放手利用”旧报纸中的“进步分子”，吸收和改造他们“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是当时的政策重心之一。在对来自各个不同的社会层面的“新闻干部”进行培训和改造时，都强调“把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放在第一位。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革命者’……”^①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方针和措施对于改造自由主义新闻人朝着有利于新时代的方向转变，其成效是相当显著的，其政治和文化意义也是十分深远的。——尽管在1957年新闻界的“大鸣大放中”不少有关新闻改革的言论带有相当幼稚的自由主义理想色彩，尤其是在“舆论监督”和“新闻自由”上有一些激烈的主张，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与“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妄图使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是根本搭不上界的。新闻界的不少前自由主义报人确实是在真心诚意地帮助共产党整风，只是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冷战背景下“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严重的失误，最终导致“反右”扩大化，使原本取得的改造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成果，又被他本人所完全否定了。关于这段历史，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了理性的反思和总结。特别是在反思和检讨“反右”扩大化的历史错误时，对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客观评价，对自由主义思潮在中

^①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2版）第390～391页。

国大陆的终结作了肯定的答复。

在中国大陆对自由主义进行检讨和清算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也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在认真进行检讨。当然，美国的检讨更主要的是集中在“谁丢了中国”的政治战略责任追究的命题和诘问下展开的。但这种检讨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和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的。即使是以美国战时情报协调局驻中国首席代表费正清为首的“客观主义”的分析和评价，也仍然没有走出肤浅和偏见的阴影。费正清后来在其重要的政治学术著作《美国与中国》中，也只检讨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他写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般缺乏保护私人经济手段的安全防卫措施，而西方则是以这种安全防卫措施来支持自由主义运动的。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法律和财产作为防御手段，他们在学者所享受的较高地位中仍然感到安全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同教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也提到了中国的文明传统，特别是专制主义对多元文化的排斥和扼杀，甚至断言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榜样相结合只能产生“个别的自由主义者而不能产生自由主义运动”，更不能使“自由主义制度化”^①等等，但他很少检讨美国的所作所为正是加快中国自由主义运动走向悲剧终结的一大主要原因。中国自由主义者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最大的困惑和痛苦是：美国作为中国自由主义者最向往的“自由主义制度化”的经典范例，为什么会用枪炮支持国民党这个极权政府去屠杀中国人，包括酷爱自由、民主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司徒雷登和马歇尔的那些动人的许诺岂不成了空头支票？“谁丢了中国”“谁

^① 以上征引皆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4 版），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40~241 页。

为渊驱鱼——把大批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往“向左转”的道路上赶？不就是标榜“自由主义制度化”的美国么？很显然，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官方学者，他们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悲剧命运的检讨，既谈不上客观，更谈不上真诚，因此是毫无深刻性可言的。

当然，还有一场大检讨是在台湾这个孤岛上展开的。惟有不同的是，这场大检讨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国民党极权政治的罪恶而展开的，其持续时间之长，剖析之深入，可以说，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需要补充说明一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在大陆宣告终结之后，其余绪仍在海外，特别是在台湾省继续显示着批判和反抗国民党极权主义的顽强生命力——笔者注）

国民党出于其极权主义冥顽本性，根本谈不上有只言片语的自我检讨，亦拒绝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在大陆的失败承担任何责任，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的失败正是他们所求之不得的。因为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蒋介石就在《中国之命运》中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其在忧心忡忡的同时还恼羞成怒地大张挞伐。他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只是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只是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的文人学士（即传统的士绅阶层的子遗），丧失了自新与自信。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在专门抨击自由主义时，他的情绪相当激动而且不能自抑：“（自由主义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时，他们的主张，也能鼓动民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们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

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我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① 蒋介石是站在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来检讨和抨击自由主义的。他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视为洪水猛兽。或许在他看来，1949年秋冬，大陆自由主义者大批量地“向左转”并不是失败，而是与共产主义融人到一起了。国民党拒绝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一则出于这个政党组织惯有的肤浅蛮横和恼羞成怒，一则出于他们习惯以“领袖”的思维代替全党的思维。既然“最高领袖”早已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了判词，那还有什么可反省、可痛悔的呢？

真正意义上的检讨和清算是在“向右转”的那一大批自由主义者营垒内部所展开的。首先这场检讨是聚焦到胡适身上的。胡适的大半生的思想和政治文化经历，正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从勃兴到衰败的一个悲剧缩影。杰罗姆·格里德在检讨胡适的悲剧时是这样感喟的：“胡适代表了稳健、宽容、学术自由、个人自由以及法治和理性”，反对用抽象的“主义”来总括地解决问题，“他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打中中国人民的中心问题。”^② 可惜，胡适并没有从这样一种客观的立场去检讨自由主义和他自己。1949年4月，就在王芸生、徐铸成、陈铭德、储安平等一批自由主义者通过不同的地下渠道被“转移”到解放区时，胡适——这个中国老牌的自由主义大师，正

①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伦敦1947年版，第98~99页。

②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第241页。

在驶往美国的轮船上，为即将创刊的《自由中国》撰写纲领性文章。这篇自由主义纲领几乎无一点新意可言。它所重复的几乎都是胡适几十年的老调。他写道：“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不能说胡适对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失败是缺乏检讨的诚意的，问题在于，胡适的检讨由于他和蒋介石政权的特殊关系而显得暧昧和极不彻底——由于他始终对国民党极权政治抱有幻想，因此，他在称大陆为“沦陷区域”的同时，竟极其错误地将自由主义的价值目标与国民党“反政大陆”的政治军事目的搅和在了一起。这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胡适为《自由中国》设定的这个含混错谬的价值目标，其水平不仅大大低于20世纪20年代的“好人政府”主义，而且大大低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国家中心论”。如果比照《观察》的水准，胡适简直是低俗不堪。这就必然使这种检讨陷入滑稽和荒唐的境地。

所幸的是，由《自由中国》所代表的台湾自由主义运动，并没有按照胡适的先期设定发展。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价值目标是与极权主义完全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即使是在该刊的创刊号上，不少文章就已经与他的价值设定形成了冲突的态势。《自由中国》虽然尊崇胡适，并将他视作旗帜。但是，在事关自由主义原则的大问题上，却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自由中国》的一大批同仁的目的，是期望通过这个舆论阵地重新集合台湾和海外的自由主义队伍，从而继续自由主义

① 胡适：《自由中国的宗旨》，《自由中国》杂志第1卷第1期，1949年11月20日。

的事业，并与形形色色的极权政治抗衡。因此，从一开始胡适与这些信奉“不偏不党”的“第三势力”知识分子就体现出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分歧。

在这种尖锐的分歧和批评过程中，《自由中国》的两个核心人物——雷震和殷海光凸显出来，成为了中国自由主义史上的重要人物。雷震率先向国民党极权政治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在这本杂志上连篇累牍揭露国民党反自由、反民主、反宪政的极权主义嘴脸，最终导致其锒铛下狱的悲壮结局。与雷震相比，殷海光的攻势还要更加厉害。如果说，雷震在展开文字攻势时更热衷于投身自由知识分子的民间组党活动，因而犯了国民党极权主义的政治禁忌，实属“罪不可赦”。那么，殷海光在攻讦和揭露国民党极权真面目，以捍卫自由主义的尊严时，更出人意料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自由主义的营垒内部——这在中国自由主义史上是具有空前的里程碑意义的。作为胡适的学生、作为前《中央日报》的主笔和国民党的“叛徒”——殷海光的勇毅无畏和思想贡献是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殷海光对其恩师胡适与蒋介石的暧昧关系以及胡坚持用“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来解释他的价值理想，一直抱有不满情绪，认为是对自由主义的曲解的阉割。但殷海光所获得的思想鼓舞和献身热忱主要是来自西方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启示。正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重要启悟，不仅磨亮了殷海光的批判锋芒，同时也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针对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所抒发的悲悯和宽容情怀，殷海光毫不留情地予以了驳斥。胡适说：“我在这个社会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所以我总觉得

我应该用容忍和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① 殷海光当即以《胡适论 容忍与自由读后》为题，劈头盖脑地将批驳掷向了恩师：“……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说。我们认为胡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的‘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② 对殷海光的如此激烈的诘难和训斥，胡适相当尴尬和难过。因为他从不赞同这种“激进”的批判方式；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应该是自始至终怀抱宽容精神的人。可是，殷海光毫不妥协和顾及恩师的脸面。甚至面对胡适规劝他“最好把穆勒的《自由论》翻出来好生读读”的建议亦置之不理。殷海光甚至愤慨地认为：“五四的父亲”的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在胡适看来：“五四的儿子”不过是“欠稳健的时代的判徒”^③。两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相互讥嘲和带刺的评价，自然使他们之间的理性和情感距离越拉越大，终至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悲剧境地。

正因为胡适始终对国民党寄予着希望，始终幻想在一个非理性的专制秩序中，去寻找自由主义的位置，甚至去试图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图景。这样，就不能不使他在其晚年的悲剧中

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第 20 卷第 6 期，1958 年 3 月 20 日。

殷海光：《胡适论 容忍与自由 读后》，《自由中国》第 20 卷第 7 期，1958 年 4 月 1 日。

殷海光：《致张灏》1967 年 3 月 8 日 转引自章清：《自由主义两代人：胡适与殷海光》。

又不幸加入了闹剧的色彩。殷海光坚持认为，任何极权统治都不是自由主义的朋友，而是其十恶不赦的敌人。他们之间另一个巨大的差异是：“父亲”背负着很重的传统文化的包袱，而“儿子”却几乎没有这种优良但可恨的文化包袱。许多人只知殷海光对中国自由主义者下的那个“失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判语是至为深刻的，却不知这个判语还有一个具体所指，那就是胡适先生。

胡适与殷海光之间爆发的激烈争论这一非常事件，已不是简单的新闻事件，它后来成为了中国自有自由主义以来，最具有批判性和颠覆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理的大事件。他们之间爆发的这场争论，已全然超越了个人恩怨的范畴，凸显为两代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和学术理念，以及思想和情感上的严重分歧与冲突。如果用殷海光的话来说，那就是“五四的父亲”与“五四的儿子”之间的巨大差异与对抗。

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分子“精神领袖”的胡适对自由主义的信念可以说终身都未动摇过：从早年策划《新青年》到后来创办《努力周报》、主持《新月》与《独立评论》，一直到最后成为《自由中国》的“灵魂”。他的悲剧可谓多姿多彩、险象环生，因而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缩影。在与极权政治抗争的复杂变局中，他逐渐学会了以“容忍”来应对严酷的现实，同时也一再以“容忍”来解释自由主义和他自己。然而他对民主政治的追寻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过。

与胡适相较，殷海光的心路历程也同样充满了曲折和惊险。作为“五四的儿子”，其深受“五四的父亲”的精神滋养。他早年也曾对国民党抱有极大的希望，这种情景可远溯到他在西南联大当学生的时候；他在《中央日报》任主笔时言论激

烈，曾使他一度被列入“文化战犯”的序列……他与国民党极权政治的决裂与冲突，使他从极右的立场真正转向了“自由”；而他与胡适的决裂只不过是它与国民党决裂的一种逻辑折射罢了。

胡适逝世后，殷海光多次对他的学生谈及胡适。他说：“早年的胡适可打八十分，中年的胡适可得六十分，晚年的胡适只有四十分……”分值越来越低。这说明在“五四的儿子”那里，岂止“五四的父亲”，甚至连同“五四”本身，其分值也意味着越来越低。

有充足的理由认定胡适和殷海光两人都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身上都集中体现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自由、民主理想奋斗的壮志与豪情。如果说胡适的理想主义多少含有传统儒家由‘独善其身’转向‘兼济天下’的豁达情怀；那么殷海光的理想主义则包含着强烈的反叛精神……他以无比的道德勇气和特立独行的人格力量，获得了真实的悲剧意义，并实际取代胡适，成为了台湾争取自由民主的主要精神力量。”^①

胡适溘然辞世不久，殷海光也竟以 50 岁的英年早逝。在巨大的悲剧气氛的笼罩下，台湾自由主义作家和报人李敖陷入了深深的追忆和痛楚中。他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去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态，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②。李敖还写道：“在这摧毁知识分子的绞肉机下，殷海光是大陆狂飙型知识分子的

① 章清：《自由主义两代人：胡适与殷海光》。

② 参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 5 集，第 158 页。

最后一个。殷海光生于五四之年，他以 50 年的生命，为五四精神做了创新与创建。殷海光的死去，是那一代蛟龙人物的光荣收场。’^①

两代大师都去了，但自由主义却在继续前行，惟令人悲憾不已的是，再也难有荷马史诗式和蛟龙式的英雄现世了。

一百多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遭受到的磨难和打击，所经历过的危机和困惑，远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以比拟的——他们自始至终在苦闷和痛楚中寻找“自由”的出口，在绝望和希望的叠合中顽强构筑精神生活的超越性面貌……特别是这些令人感佩不已、唏嘘不已的民间自由主义报人，他们更处处陷于历史的尴尬境地，以热忱的“人世”情怀来表达他们美丽的“出世”梦想……这幅悲怆奇幻的历史长卷中亟需我们去破解的思想秘密、文化秘密以及社会和人性的秘密尚有许多许多。

^① 参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 5 集，第 158 页。

后 记

我写的这是中国的第一部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

在迄今为止出版的有关中国新闻史、新闻教育史和新闻思想史的诸多著述当中，对近代以来一百余年间，曾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它对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的研究，明显存在着一个不应该有的极大的认知盲点。我之所以执意要写这本书，其目的有二：一是出于尊重历史，尊重古老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原则，并希望通过我的点滴努力，能与新闻学术界同仁一道逐步恢复历史的原貌；二是出于一种神圣的学术责任，或者说是出于对当前新闻学术界的不满和批评。在新闻史的研究中，新闻学术界的浅陋无知、怯懦保守和自鸣得意与其他学术领域相

较，可以说是十分惊人的。我甚至为此感到可笑和可悲：我居然成了第一个写作《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的人！如果新闻学术界能像文学理论界、艺术理论界、政治学理论界、经济学理论界、法学理论界、哲学理论界那样大胆解放思想，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原则，这样的“好事”难道还轮得上我吗？

既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现代化嬗演历史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那么它也理应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对其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研究。须知，这种梳理和研究将给我们今天的新闻改革提供诸多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多年来，由于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史缺乏应有的正视，所以才使得我们的新闻教育凸显出了不应有的知识空白和思想盲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才戏剧般地使本书的写作具有了重要的学术探索的“处女地”垦拓意义，同时也具有了非常诱人的思想探险角度上的“考古”意义。

这本书是继《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十六个断章》之后，我的第二部以自由主义新闻史为探究和写作对象的学术著作。虽然这两本书都是以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和终结（事实上似应理解为“中断”更恰当些）为悲剧线索，但是它们之间却有比较大的区别。简言之，“断章”更偏重于描述，更着眼于从叙事的立场将新闻史上那些思想的残片拼贴到一块，从而形成一种粗犷而苍凉的历史影像。这种写法颇类于近年来风行于世的“文化散文”或“大散文”的笔法，从历史和思想中去寻求那种审美的冲击。而这部“思想史”则更偏重于研究和阐释，着眼于思想线索的梳理和思想面貌的细致描画，因此，其写作立场就必然与“文化散文”的浪漫抒怀拉开了距

离，而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文化学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我为什么要这么写？主要有这么两个原因：其一是得益于 R·C·科林伍德的指点。他认为，思想史是惟一的历史。具体到新闻学术领域，尤其是新闻史的写作就更是如此。在科林伍德看来，历史主要包括这样两种东西：一种是知识和技术的累积和传接；一种是思想和追问的累积和传接。不是说知识和技术不重要，而是必须认识到思想和追问的重要性远在知识和技术层面之上。离开了思想和追问，知识和技术就失去了灵魂；思想和知识的逻辑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科林伍德还特意提醒说：“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实之中。”这种永存性其实就是活动在每一个学术领域中那种心灵的历史，它们不仅在我们现在的知识和技术中活着，并且也将在今后的思想的历史中活着。其二是得益于现今的新闻思想史和新闻教育史的肤浅写法的刺激。尽管在这一学术领域中，不少的研究者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和贡献，但是粗陋和皮相化却是明显存在着的。特别是长期以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深度影响，已有的新闻史和新闻思想史的写作无不打上这种陈腐僵化观念的烙印；新闻思想史的写作几乎就是政治斗争史，甚至是政治派系纠葛叙事的翻版，非杨即墨，非左即右，完全形成了一种荒谬的套路。本来，新闻思想史是一个包容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乃至政治学、法律学和意识形态学、逻辑学等等在内的“大历史”学。但是，在一些新闻学者那里竟变成了单一浮浅的庸俗政治学和过时的意识形态学，以及新闻知识学和技术学。特别是隐伏在新闻思想史核心内部的哲学和伦理学背景的被排拒，最后使得我们所见到的新闻思想史竟成了徒具庸俗政治学和意识形态学躯壳的尤物。这既不符合新闻思想史的客

观事实，也不符合新闻思想史写作的客观依据和科学方法。我的写作并不是为了显示我有多么高明，而是为了真正能回复到客观的历史真实和科学的方法论立场上来。

还必须说明的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自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新闻实践家的接纳和重视，并通过他们持续不断的中国化转述和创建，在 20 世纪前半叶兴起的自由主义运动中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思想资源。可以说，研究 20 世纪三大社会思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光着眼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因为，漏掉了自由主义这个客观的历史存在，不仅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会出现明显的缺失，而且中国的新闻思想史研究也会陷入与实事求是原则相悖的学术窘境。

近年来，对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和批评更多的是停留在对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悲剧责难和惋惜上。应该看到，这种简单套用储安平和殷海光现成“语录”来评价和裁断自由主义这一复杂的社会思潮的学风是懒惰、教条和极不可取的。事实上，只要稍稍着眼于历史事实并且尊重历史事实，就不难发现，自由主义真正的悲剧成因恐怕更主要的是在于它的历史超前性。在 20 世纪前半时，启蒙思潮所呼唤和张扬的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之所以被救亡思潮所压倒和遮蔽，恰恰就在于它的超前性。当然，这种超前性悲剧也包含着它自身的矛盾冲突——在自由主义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启蒙和救亡——压倒和被压倒同时都集于一身。在寻求“国家制度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全能主义政治注定要比自由主义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地位，因而更能得到特定的历史支持。但是，当全能主义政治一经取得历史成功并全面进入和主导一切

社会领域之际，自由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来了。邹说先生认为，20世纪的中国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即个人自由与国家制度重建的张力，亦即我在本书的绪论部分中所指出的那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尖锐冲突的奇观。在这种冲突中，自由主义的超前性悲剧恰恰体现出的是历史的悲剧，尤其是思想史和中国现代化史的深刻悲剧。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超前性悲剧，其责任光由自由主义来承担是不够的，也是肤浅的和可笑的。这个大悲剧还应由中国的思想史和现代化史来共同承担。我之所以在这部新闻思想史的写作中，同时也深刻地检讨了中国的现代化史，就是因为考虑到了这种悲剧责任的共同承担更接近，或者说更符合历史的理性真实，更能触摸到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的悲剧内核。

由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悲剧中断或终结，所以，研究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文献资料匮乏的困难。我选择类于“纪传体”而非通史的方式来思考和写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匮乏的逼迫。当然，用“纪传体”的一大好处是，它以人物的思想及实践活动为线索使新闻思想史更能展现出它的生动具体以及血肉丰满的生命活力。特别是第七章和第八章甚至采取了叙事和人物刻画的手法，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新闻思想史不应是刻板与冰冷的观念的堆积，它应该是人的心灵活动的鲜活的历史。当然，“纪传体”的疏漏也是非常明显的——它不可能像通史那样面面俱到、框架整肃、详略得当、无所遗漏。比如，本书至少就“漏掉”了这样一些与自由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新闻界人物。像陈霭亭、郑贯公、杨笃生、叶楚傖、邵力子、俞颂华、曹聚仁、邹韬奋、胡愈之、罗隆基、王造时、张友鹤、雷鸣远、张友鸾、张东荪等等，他们都是应当在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占有

一席之地的人物。由于本书篇幅所限，因此不能一一纳入。希望日后有志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通史撰写的方家，能救正和弥补我的浅陋。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本书所研究和描述的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以及自由主义思想家 and 实践家，他们与现今自称为“新自由主义”的那些矫情者无关——“新自由主义”的表演作秀与书中的自由主义者的悲剧表情和悲剧命运完全是风马牛不及的两回事。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并从近年来不少人文学者的著述中得到了诸多的提示和启发，在此特表诚挚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倘若没有他们的鼓励和奖掖，这部《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或许只是永远埋藏在我内心的一个学术梦想。

张育仁

2002年8月2日于重庆暑热中

21 世纪新闻传播知行丛书

总 序

张育仁 郝明工

中国是世界最早创办报刊的国家之一，可是，中国又是世界上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开展得较晚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新闻活动，可远溯到数千年前的商周，甚至更为久远的年代。可悲的是，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皇权专制下的这个古老帝国，其新闻活动仍停留在相当幼稚的水平，它的新闻统驭观念不仅与西方的文明理念大异其趣，而且最令人惊悸的是，这种野蛮落后的新闻统驭观念还与人类文明潮流形成了严重的悖逆。所幸的是，中国最早的那些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革新家，都不约而同地从投身新闻事业开始，拉开了他们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悲壮生涯的序幕。自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末，新闻传播在轰轰烈烈的中国近现代史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文明角色——特别是在历史关键时刻，新闻传播更是以传播者各不相同的新闻思想理念和实践导引能力，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历史的走向。由此可见，新闻传播的力量是如此强悍，但是这仅仅是表象；因为真正使它变得强悍的，是隐伏在它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和伦理体系。由于这个原因，新

闻传播有时又是庸懦的悲剧的，这要看它是否具有民主与自由的现代灵魂。

这套丛书正是驻足于 21 世纪现代文明的背景和立场，从各个不同的学术角度和学术层面上，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从而合力塑造出一种“立体”的学术群像。其中，既有对新闻学术“冷门”的执著探究，也有对新闻学术“热门”的独到见地；既有着眼于思想和文明的层面对新闻史实所做的深广开掘和比较，也有着眼于“经世致用”的层面对新闻操作所做的讲解和示范……总之，这套丛书所做出的努力是非常有学术意义的，同时也是非常有思想性、审美性、历史性和前瞻性意义的。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是一个人才荟萃、名师聚集的科研、教学群体。这套学术丛书的参写者，都是颇具社会影响的中青年教师，他们同时又是作家、评论家、报刊专栏撰稿人，影视编导、资深记者和编辑，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繁忙中，更积极投身于生龙活虎、新异迭出的新闻传播实践活动，这不仅给他们的教学与科研注入了源头活水，也同时给他们的新闻实践注入了人文精神。从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诸多努力是具有开拓性甚至“前卫性”的。当然他们也有借鉴和传承，有回望和反省。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这些努力，无论是从新闻学术和新闻教育角度，还是从新闻理念和新闻改革实践的角度来衡量，才显得那么的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2002 年 9 月

守住我们的精神谱系

——序张育仁先生《自由的历险——中国
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

王 康

这是一份现代中国精神家庭的墓志铭，中国自由主义新闻巨子们启示录式的悲剧历程，我们睽违了半个多世纪的精神谱系。

像所有可以传世的著述一样，本书也是全局式退潮中一次英勇的回越，具有深广的时空视野，透露着若许重大消息，令人掩卷扼腕之际、仰首闭目之余，对中国文化“贞下起元”的庄严复兴，再抱希望。

我与育仁兄同属一代，本应成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天命所赋、继往开来一代的我们，却几乎沦为全面悖离中国常道、畸零虚无的一代。在最积极的意义上，我们作为中国历史链条的自然环节，依凭基本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责任，有望成为中国历史文化起死回生的最后一代见证者和传人。

与我们的西方精神同辈相比，与战前战后西方“跨掉”、“颓废”、“嚎叫”、“分裂”的一代相比，我们的精神病痛和道德错乱更需疗救。从尼采到希特勒，从奥斯威辛、达豪到卢比卡扬、古拉格群岛，从广岛、长崎核蘑菇云到纽约世贸双子星座的噩魇，西方确实危机重重，乱象环生，三百年来辉煌全球的西方文明确实正滑向洪水——十字架——世界末日的险境危途，但那终归需由西方去面对，何况西方向来不缺少自己的异端和叛逆。

尽管我们迎头撞上的二十世纪，中国精神年表已空前紊乱，引领风骚、宰制天下的是异常强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尽管经历迷失、倒错、断裂，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陷置于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精神荒原；尽管我们因为天真无知，曾经尽情践踏撻伐历经千万载、由无量数农民、诗人、工匠、歌者、樵夫、哲人、渔夫、史官、武士、高僧、禅师、隐士、大师天才、匹夫匹妇、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共同垒筑的文明圣殿整整十年之久，至今未有痛彻的忏悔，但中国文化命脉并未断绝，虽已花果飘零，却无比坚韧，数度从极其艰危的困厄，对中国发声，向未来嘱托。

在我们从“荡起双桨……推开波浪”到揭发父母、批斗师长的年头，五十五万知识界人士（包括众多自由代表人物）沦为中国文化噩运的苦难先驱，继之是老舍、田汉、傅雷、田家英、潘天寿、马一浮、张志新和几乎全体中国的性灵良知，一齐跌入深渊。熊十力曾在无限寂寥的暮年作绝世哀叹：人生七